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合　　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7月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10千　插页：2
印数：1—3000册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毕遇辉　李　艳　责任校对：刘继云　李　艳
刘继云　贺久杰
封面设计：宁　政　版式设计：刘继云　李　艳

ISBN 7—227—01330—8/K·129　定价：8.00元

编辑：李楷顺　张树金　邓贤赞　冯钧平
孟国芳　鲁学让　韩新华　汤永才
余骏升　简　政

目　录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关连吉（1）
陕西回民起义……冯钧平（22）
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冯增烈（31）
白彦虎轶事……马　辰（35）
肃州回民起义及其领袖马文禄……张世海（36）
穆生花起义……马重雍（40）
马占鳌的起义与投降……马培清（45）
李德仓与陇南回民起义“南八营”……袁思维（52）
宁夏金积回民起义与马化龙……马寿千（62）
青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汪受宽（69）
迪化回民起义与妥明……马成基（79）
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马培清（85）
辛亥革命中的陕西回族名将马玉贵……马寿千（90）

第二章　不屈不挠的反蒋斗争

回族英雄马和福……张　鼐　马峰玉（96）
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马思义（98）
宁夏回汉支队……孙国标　胡迅雷（115）
昌吉县回民起义纪略……吴英等口述　丁承平等整理（128）
马仲英轶事……马全钦　马文祥（137）

第三章　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

火烧沙俄贸易圈 ……苏　萼（148）
新疆回族人民抗击阿古柏侵略的武装斗争 …王　平（151）
抗战时期的陕西回民 ……金　兰（162）
青海骑兵师抗战纪略 ……马有光（167）
国民党81军绥西抗战……王五典（177）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

临夏回族的商业 ……马占奎　王廷俊（185）
吴忠回族的工商业 ……牛百川　张山林（191）
平凉回民经济生活 ……平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4）
回民与古城驼运 ……包　山　王　晨（199）
甘肃的皮筏运输业 ……王信臣　苏耀江（202）
张家川的皮毛业 ……麻　均　马辅臣（211）
昌吉的六保馆子 ……杨荣湖　焦万和（214）
西安的牛羊肉泡馍 ……白剑波（218）
西安的“一间楼”……郭新坤（219）
西安名菜馆天锡楼 ……马德宏（221）
洪福元和洪家街的兴衰 ……杨荣湖（223）
天成和商号兴衰记 ……李凤藻（227）
西安回民古玩业史话 ……马德宏（234）

第五章　回族的教育事业

回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马寿千（239）
平凉国立陇东师范 ……马汝邻（242）
张家川私立新民中学 ……李文著　李生民（246）
西安市回民中学的创建和成长 ……马景华（249）

西安市第一所回民完全小学 ……马希明（253）
新疆回族文化促进总会 ……郭　德　马登贵（255）
昌吉县回族小学教育 ……王玉春（258）
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吴敦善（261）
马福祥与回民教育 ……宁　文（263）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孔祥录　喇秉德（270）
青海回族女子教育 ……马迪甫（278）
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国英（280）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明贤（282）
青海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文才（284）

第六章　风格独特的文化艺术和习俗

河州花儿 ……孟国芳　柯　杨（288）
临夏回族宴席曲 ……周梦诗（295）
回族姑娘的口弦 ……丁一波（302）
米泉县回族民歌手韩生元 ……杨　杰（303）
河州的回族砖雕 ……李　亨（307）
回族武术 ……王新武（311）
回族老拳师马怀德 ……牛怀民　马迪甫（316）
回民习俗简述 ……马玉琪（319）
回族婚俗 ……李树辉（324）
回族爱好清洁 ……喇海青（333）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

西北回族的宗教信仰 ……马　通（338）
格的目教派 ……马　通（348）
伊合瓦尼教派与马万福 ……马占彪（353）
西道堂教派 ……陆进贤　陆聚贤（363）

哲合忍耶教派创始人马明心 ……马　辰（371）
马元章与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 ……马　辰（377）
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 ……朱　刚（389）
尕德忍耶九彩坪门宦 ……周彦奎（393）
虎夫耶洪门门宦 ……马峰玉（395）
临夏市八坊清真寺 ……马占奎（400）
西安清真大寺 ……马良骥（405）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孔祥录　喇秉德（418）
乌鲁木齐市陕西大寺 ……乌鲁木齐市政协（427）
伊宁回族大寺 ……马玉林（429）
同心清真大寺 ……马峰玉　马占珍（433）
陕西伊斯兰教 ……冯钧平（437）
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孔祥录　喇秉德（439）
朝觐亲历记 ……韩生贵（449）

第八章　历史知名人物和事件

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 ……马青年（457）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诞生 ……田忠诚（467）
爱国民主人士马辅臣 ……汪　溶（470）
“和平老人”郭南浦 ……师　纶（475）
和平勇士王莲茹 ……赵长明（478）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赴青海的回忆 ……马丕烈（480）
张乐山事略 ……张春在（487）
马德函事略 ……马士年　丁　旭（491）
深切怀念马腾霭同志 ……马思忠（496）
忆父亲洪寿林掩护红军 ……洪清国（502）
著名经师刘遇真 ……马靖夷　马德宏（504）
西安市化觉寺掌教马谦益 ……马希明（508）

我的外祖父马良骏大阿訇 ……赛明月（511）
乾德县第一任回族县长马征履 ……杨　洁（518）
春蚕到死丝方尽 ……于志祥口述　于秀兰整理（526）
何义江生平事略 ……何凤祖（530）
实业家冯瑞生先生 …… 马希明　马锡屏　冯钧平（533）
回族名医马芾轩 ……马德宏（541）
农民土专家丁学礼 ……丁学礼口述　李艳整理（544）
后记 ……（549）

第一章　揭竿而起的反清斗争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

关　连　吉

清朝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二年（1862—1873年），陕甘回民坚持进行了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反清斗争。这次起义，既是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西北地区广大回民为争取本民族生存权利及其维护宗教信仰而写下的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这次陕甘回民起义的特点是头绪繁多，过程复杂，地域广阔，时间较长。一般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二年（1861—1863年），为起义的发动时期；

第二阶段从同治三年到同治六年（1864—1867年），为起义的高潮时期；

第三阶段从同治七年到同治十二年（1868—1873年），为起义的失败时期。

一、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1）起义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王朝对外屈辱投降，对内加紧镇压，

使中国社会开始一天天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咸丰以来（1851—1861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又把沉重的军费负担强加到人民身上，各种捐输和盘剥又应运而生。当时甘肃的情况是“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竭，亦窘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调重兵以协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方。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舁土一掩”。① 陕西的情况和甘肃类似，从咸丰到同治初年变临时为永久的兵徭、兵差，还有“流差”、“正差”、“黑差”，不但出人，更重要的是出钱、出面、出各种费用，沉重的负担都落到农民的头上。

这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构成了陕甘回民起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但这只是起义的条件和一般的社会根源，而不是起义的直接原因。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清朝统治者一贯执行的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更加变本加厉罢了。此时民族宗教政策的反动，一方面表现为清政府对广大回民的直接的歧视和压迫，更多的则是挑拨回汉关系，通过民族偏见间接地表现出来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同治年间，满汉地主阶级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勾结，清王朝的中央权力开始向地方权力转移。所谓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地区的民族矛盾更加突出。无论官方或满汉地主及其封建文人，都对回民和伊斯兰教倍加歧视。“回子”、“回逆”、“回匪”、“回贼”，各种侮辱性的称号不一而足，甚至以“狪”代“回”，表示回民不齿于人类。《平回记略》上写道：“撒拉狪猾，素称化外，由来不靖，其俗男女混杂，不知伦常，好杀食人，淫狠无良”，还写到：“此等回丑，环处中土，宜令其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举汉人教其子弟，使知伦常礼义，日积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无虑耳。”② 歧视和偏见，跃然纸上。官方文书

和地方史、志中对回民的污蔑歧视亦比比皆是。歧视之余，就是加紧防犯和镇压。在法律地位上，回民低于满人亦低于汉人，回民犯罪要罪加一等，回民流徙要远放，甚至要在脸上刺字。陕西华州、大荔有“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③的判词。回民聚居区要设重兵“弹压”，回民不许3人以上持械行走。对回民所普遍信仰的伊斯兰教一再三令五申，施行种种限制，甚至于要取消阿訇，如此等等，实际上要剥夺回民的生存权利，取消回民的宗教信仰。

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清廷对回民的民族偏见主要来自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歧视。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民族压迫不但从宗教歧视开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宗教的压迫来实现的。在陕甘回民起义爆发的前夕，上述民族矛盾的激化，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2）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爆发

陕甘两省的回民起义以不同的形式自发而起。甘肃的首义地点是河湟地区的循化和巴燕戎格（即化隆），陕西的爆发地区是临潼和渭南。宁夏金灵地区受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肃州受河湟地区的联络和策动。只是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下，陕甘回民起义才在“护教”的口号下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以后又形成了反清的四大据点，这已经是同治三年到六年间的事情。在这之前的第一阶段，各地回民起义不但是自发的，而且在事前并无联系。起义的爆发完全是统治阶级兵刃相加，官逼民反的结果。

陕西回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受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直接原因是由于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压迫和欺凌。由于反动统治阶级长期挑拨离间的结果，陕西的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朝邑、三原、富平、泾阳、咸阳等地官衙，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而组织起来的团练，此时充当了欺压和屠杀回民的急先锋。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和捻军由武关直逼西安，汉

族地主阶级大肆散布回民“勾结长毛”的谣言，渭南一带首先发现“见回不留”的传单。很短的时间内，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大规模的械斗自华州开始，罪魁祸首就是地主团练。据《续华阴县志》记述：“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二华团众，即寻华州之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持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以烧房杀戮为令。”① 《秦难见闻记》云：“四月二十七日，大荔县禀回汉械斗，请大兵镇压，二十九日，抚台派委员并回绅刘健川、米小官前往劝止。不知汉民将华州所属之回村尽行焚烧，大荔正在受乱，地方官左袒，其势遂不可止。”⑤

以上史料，从各方面反映出了汉族地主团练欺压回民的事实，回民为了捍卫民族生存起而自卫，但暂时还没有发展到杀官起义，直接与清政府对抗的地步。而团练却是受到官府的赞同和支持的。团练头子如冯元佐、柏景伟、梅锦堂等欺蒙无知汉民，对回民大加杀戮。“长安柏景伟的团练，将户县、周至回民尽杀无遗”⑥；渭南的冯元佐团练，则“与本县富豪赵姓及大荔之李姓，潜行唱和，声言奉旨洗杀回民……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⑦；梅锦堂团练则“纠合汉团二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渠堡回村围攻，合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⑧ 清政府利用团练屠杀回民，等到回民奋起反抗，又假惺惺地派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到临潼去招谕，“劝寻回汉息事”。五月十一日，张芾偕知府马百龄等耀武扬威地到了临潼油坊街，声言要惩办“首逆”任老五。殊不知，任老五正是

领导回民反抗的领袖之一。当时，回民聚众反抗，以各个教坊为单位结堡自守，在大荔有王柯邨、乔店、羌白，在渭南有禹家庄、仓渡、邸家庄，在大荔和渭南交界有乜家滩等，“其余星罗棋布，不下数邸堡”，“首祸者，则赫明堂，任老五也”。⑨张芾的劝谕，实际就是恐吓和镇压，而且汉团早以灭回传单相约起事，“单中即推张芾为首”⑩。愤怒的群众在任老五的领导下，于十三日将张芾和汉族随员杀死，反团练斗争正式转化成了反清起义。

陕西回民的斗争由反团练向反清起义的转化，从清政府的态度上反映得更清楚。三四月份，事态急剧发展时，清政府派多隆阿部总兵雷正绾驰赴关中剿办，上谕“不问回汉，但问顺逆”，“不遵教化者毋论是汉是回即著督兵进剿，剿汉不得助回民，剿回亦不可借资汉练”。⑪可是，仇视回民的汉族官僚地主，无一不报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光禄寺卿潘祖荫奏：“渭河以北汉村二百有余被回民焚杀几尽，死者十余万人。回民旗帜枪炮马队无一不备，其蓄志已久可知，特借械斗为名起事耳。”⑫同年八月胜保进至潼关以后，清朝最高统治者很快就下令：“回族猜疑激变各情，朝廷早已闻知，第回匪挟此嫌隙，剧肆鸱张，焚掠村堡，是启衅之由，汉民不能无过，而叛逆之罪实在莠回。……必痛加惩创，使其畏威怀德，方可剿抚兼施。”⑬致使回民起义迅速扩大，几乎全陕西都揭竿而起，并以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苍头镇为主要据点，号称十八大营。东路攻下了华阴、华州、高陵，围困省城；西路进攻泾阳、三原、咸阳、凤翔，以至全陕震动，省城危急，胜保八月进关以后，一路挨打，东西不能兼顾，起义烽火遍及渭河两岸。

甘肃回民起义始于循化和巴燕戎格，并略早于陕西回民起义。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起义的过程并不如陕西那样单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是间接的，起因主要是民族宗教压迫，但亦有教派门宦问题掺杂其中。原来，清政府对这里的回民（特别是撒拉）

一贯怀有戒心，动辄“弹压”屠杀，早就使这里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处在极度激化之中。咸丰七年(1857年)，就有循化街子工撒拉回民聚众围攻厅城。烧毁要路桥梁、抢劫解省人犯的事件发生；九年，又有撒拉回民聚众持械赴丹噶厅与狄道回民的“辨教”教案；十年，辨教回民与大墩坪汉民发生械斗；十一年正月，陕甘总督乐斌派甘肃提督成瑞对撒拉回民进行围剿，西宁小南川的汉团乘官兵进山之际，在丹洛桑等庄“袭杀撒拉同教回民泄忿”，致使本来已平息的回撒群众从三月初九在南川与汉团展开了激战。乐斌慌忙调甘肃提属，肃州、凉州兵马2000名赶来镇压。三月初十，成瑞派先头部队500名前往南川，会同该处团勇堵剿。至此，官兵和团练完全站到了一条战线上。英勇的回撒群众给官兵和团练以歼灭性的打击。带队的守备陈治猷、把总王德被起义军击毙，成瑞因战败被撤掉了提督之任，由西宁办事大臣多惠接替，起义军旗开得胜。

多惠到任之后，慑于起义军的军威不敢贸然进攻。起义军在马哈三（马文义）、马桂源领导下与多惠议成“抚局”，乐斌、多惠还吁请豁免了西宁碾伯两县的应征粮草。这是西宁起义后的第一次“抚局”，实际上对起义军和回、撒拉群众是有利的。但是，汉族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却很不满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御史陈延经、裘德俊先后奏参。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清廷即将乐斌革职，改派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肃查办。起义军被迫再度围攻碾伯。沈兆霖接任了陕甘总督，气势汹汹地调兵遣将，妄图借民团之力一举歼灭回撒起义军，但很快就落了个虎头蛇尾的结果。二三月后，沈兆霖几次入山进剿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四月初，沈又分兵四路，动用大炮火弹，也遭到失败。时值陕西回民起义处处发动，沈兆霖进退两难，反倒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在自请交部议处折中不得不承认自己的

无能，“惩创似不为不严，而该匪持险负隅，尚无就抚之机……彼时相持，饷需难继。现在豫、捻、川匪均扰及陕甘交界地方，较撤匪之患尤甚，此处军务未了，拨兵筹饷更难兼顾。再四思维，实深焦灼。”⑭最后不得不“以防为剿”。六月，与马桂源议成第二次“抚局”，即告草草收场，悬拿马哈三一事亦付之空言，回撤起义军实际上得到了又一次胜利。沈兆霖匆忙起程，旋即在平番（今永登）被山洪淹死。起义军继续扩大并发展，随之陕甘回民起义即联成一气了。

同治元年十月，清政府又派多隆阿佩钦差大臣关防入关。星夜倍道而行，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驰抵同州，与胜保合军，使起义军腹背受敌，形势开始逆转。多隆阿手毒心狠，第二天就出队“将东西韩村贼营八座悉数焚毁”，⑮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即使“求抚”亦“严斥不许”，或者只是被利用来做为大屠杀的欺骗手段。同治二年二月，羌白镇、王阁村先后被攻下。羌白镇“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王阁村被攻下时亦“杀贼尸山积”、“流血成川”，⑯以致于尸体腐烂，“时疫大作”，可见其残忍到什么程度。四月初二，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苍头镇亦被攻下。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只能老幼参战，一面西撤，一面进行拼死反抗。七月初，多隆阿兵到省城，相继攻陷沙河镇、高陵、泾阳、咸阳等地，所到之处，大出杀手，不是“焚毁”，就是“平毁”，渭河两岸，火光冲天，尸体遍野，回族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正是这种屠杀政策，使“杀回灭教”的流言不径而走，整个陕甘回民人心惶惶，无形中促成了广大回民在“护教”口号下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全民族大动员，使陕甘回民分散的斗争汇成了争取民族生存的悲壮斗争的洪流。

综观起义的发展过程，清军由东向西节节进逼，陕甘回民起义步步结合，镇压和屠杀逐步升级，反抗与斗争日益扩大。与陕西省毗连的甘肃宁灵、盐固和平凉的反清斗争，爆发于同治元年

的八月以后，这决不是偶然的。此时正是胜保奉命入关“痛剿”的时刻，当陕西回民起义军西路发展到陇州、邠州的时候，盐茶厅一带的回民为了反抗清军的屠杀起而响应陕西回民起义军。接着，清政府平远所的把总马兆元在预旺城起义，固原纳三率众起义，平凉阿訇穆三（穆生花）起义，马化龙据金积堡起义，这些起义的原由很大程度上是“见回不留”流言的迅速传播所致，流言的制造者是汉族地主。地方官又请大军西来为依凭，加紧掠夺和欺压人民。如盐茶厅一带的起义，就是“该厅同知屈升之……于上年捐输后，借相验命案，带领多役来堡，勒令再捐，以致激变。”⑰

同治二年正月初，穆三、纳三为首的起义军里应外合，攻占固原，王大桂跑去劝降被杀。二月初六，又攻占了盐茶厅，接着开始围攻平凉，到八月十二日平凉被起义军攻占。十月，宁、灵各路起义军和金积堡回回一起占领了宁夏和灵州。在西宁，花寺与大会门宦辨教激烈，汉团介入，官府镇压，马文义、马桂源带领群众围攻西宁府城。河州回民不忍崔甘庄汉团的欺凌，在闵殿臣等人领导下起义，十二月突袭河州城。狄道（今临洮）回民反抗汉团杀戮，以牟夫提门宦（即大会）为首，一度攻占县城。肃州有已革猎兵马得功与西宁、河州回民联络的起义。甘肃各地，凡回民聚居处，处处揭竿而起。到同治二年年底，陕甘回民起义已联成一气，控制了陕甘交界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多隆阿进退维谷，惊呼：“甘肃逆焰方张，情形危机，似宜全军西讨速殄寇氛。然而发贼盘踞汉南，川匪寇伺商雒，周至攻克之后，更臣军一动，陈得才大股势得上窜凤邠，窃踞我军后路。若再勾结蓝逆由商南并力回窜，省城无兵无饷，势难支持。我军既已入甘，即成鞭长莫及之势，腹背受敌，粮道阻绝，全军诧溃堪虑，且宁、灵相继失守，北山节节空虚，偿逆气联成一片，秦陇必同时震动，西北一隅，势将前功尽弃。”⑱陕甘回民起义的大火已经熊熊燃起，

进入了反清斗争的高潮。

二、1864—1867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全面高涨

同治二年以后，陕甘回民起义的重心移到了甘肃。甘肃回民斗争的烽火四起，逐渐形成宁灵、河州、西宁、肃州四大中心。陕西回民起义军在陕甘边界的董志塬坚持斗争，清政府剿抚不力，领兵大员事权不一，军队叛变溃散，标兵哗变，造成了回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大好局面。

（1）陕甘回民起义军的相互支援

清政府原来把镇压回民起义的希望寄托在多隆阿身上，不料同治三年正月初二，多隆阿在指挥进攻蓝大顺占据的周至县时，“头眼俱受枪伤”，四月十三日死于周至大营。清政府慌忙重新部署力量，一面顾防陕疆；一面由原固原提督雷正绾率陶茂林、曹克忠深入甘省镇压回民起义。四五月间，平凉、瓦亭、固原、盐茶、张川等地相继失陷。八月中旬，当雷、陶的军队逼进莲花城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此处的回民以哲合忍耶教派为主，领导人正是马化龙派任的秦安、莲花城一带的“热依斯”（总管）穆生花。清军又调来曹克忠部为援军，才在十月攻陷莲花城。但在起义军的英勇打击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由于清军孤军深入，后路被起义军截断，“八月初四日四鼓，陕回孙义保潜带贼众四千余人直逼固原西门，又有城中陕回赫明堂阴为内应，潜开东门，贼众拥入”，[19]固原又回到起义军手中。时张集馨正交卸陕西巡抚后奉旨到甘肃会同恩麟帮办军务，闻信慌忙向清廷报告：“回逆自攻陷固原后，麕集泾平交界之新城地方，欲断平凉各营粮道，又有马步贼万余人盘据泾州城北之北分股肆扰，逆首孙义保（即孙玉宝，见《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欲将老弱送回白吉塬，自率死党扰长安。”[20]陕情一时紧张，张集馨滞留泾州不敢前往。陕西回民起义军的英勇战斗，有力地支援了甘肃的回民斗争，使

清军不敢向甘省发动进攻。十月初二，长期被围的河州被起义军攻占，十月二十七日，全县落到回民起义军手中，靖远亦被包围。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兵无饷，困守孤城，任凭起义军驰骋。宁夏方面，起义军仍然占领着宁、灵州城。陕、甘回民起义军东西支援，南北呼应，和清军处处展开了拉锯和争夺战。

（2）杨岳斌在陕甘的残败

进入同治四年以后，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回民起义的方向发展。三月，肃州被起义军占据。四月初，新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在"一片贼气"中正欲由雷正绾、陶茂林保驾进入兰州，陶茂林的兵变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省城粮道被起义军截断，文报不通，陶茂林驻守安定，粮断饷尽，军心不稳，加上军官的克扣，士兵十分不满，乘陶"丁忧"要求回籍的时刻，"中左前后四营，提选二营及新中一营及卫队各勇同时哗变"[21]，不愿再为清政府卖命，使杨岳斌刚一入甘就焦头烂额，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哗变镇压下去。六月，雷正绾、曹克忠的军队因进攻金积堡失败又发生溃变。残军节节败退，一直退到平凉才止。清政府借重压甘肃回民起义的两支"劲旅"从此一蹶不振，杨岳斌进入兰州之后，只好困守危城。七月以后，中卫、古浪、平番、武威、皋兰之北、碾伯之巴暖营、靖远之芦塘，处处告警，且有"另星股匪，游弋往来不可枚举"。到了年底，杨岳斌计尽力竭地哀叹："臣抵甘后，因粮饷两绌，原就现有兵力图以进取。自陶茂林军溃于前而兵不足，雷正绾勇变于后而兵愈不足……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省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22] 同治五年正月，杨岳斌冒险出省城出巡，谋与陕西巡抚刘蓉商议"剿回"之策。刚至庆阳，又发生了兰州督标兵变。这些督标兵勇，本是土著士兵，受杨岳斌的苛扣欺压，受回民起义军的影响，以王占鳌为首沥血酒谋变。回兵马文、马

魁以“献城归教”加以鼓动。三月初二日三更时，“私启城门放外城兵丁潜入，旋继沿街纠党。”五更时包围督署，将督办委员、幕僚亲兵杀死，差一点控制了兰州城。杨岳斌闻变，“愤恚不食”，与刘蓉的“面商机要”因此告吹，急急忙忙回省镇压。与此同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发起了一个东归陕西的强大攻势，刘蓉也慌了手脚，赶紧布置陕防。五月以后，陕甘交界战事更猛，起义军在隆德、静宁、固原、平凉一带驰骋，并包围了庆阳府城。“逆酋马生彦、孙义章纠集静隆各处回股，携带家眷，复窜陇州。其前次剿败之崔三、穆三、马万祥等股，亦回锯固关、咸宜关、神林铺、曹家湾、太冲峪、玉马嘴、高岭子、蒲峪川等地，蔓延数十里。”㉓刘蓉气急败坏地奏请宁夏将军穆图善和陕甘总督杨岳斌调兵支援，在凤、陇一带阻截。清军处处挨打，顾此失彼。此时的甘肃省城，已处于起义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特别是粮道被起义军截断，使杨岳斌困守待毙。“军民之困无以复加，杨岳斌内抚饥军，外筹逆匪，触处棘手，焦灼万分”。㉔

正在此际，甘肃陇东一带的安化、正宁直到陕境的鄜州、保安一带，有以董福祥为首的“饥民土匪”，号称十万之众，揭竿而起。在静宁有张贵率领的农民聚众起义，号称二十八营。杨岳斌焦头烂额，于同治五年八月上书，“仰恳天恩另简能员接替办理，使甘事早有转机”。㉕九月，清政府即任命在镇压太平天国中被分封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时任闽浙总督）为陕甘总督，催调速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十月，张宗禹带领的西捻军向陕西挺进，十二月在坝桥大败清军。回民起义军亦向陕西大举进攻，先头部队已经有部分深入到省城附近，一时声势大振，陕甘回民起义进入反清斗争的第三阶段。

三、左宗棠的残酷镇压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

（1）左宗棠“平回”的反动政策和策略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十一月

即起身赴任。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清廷著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旋继又授给钦差大臣关防，催促速往陕甘。但左宗棠真正开始镇压回民起义却是在同治七年十月（1868年11月）以后。在此之前的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余波又继续坚持斗争将近四年。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六月由潼关入陕，年底又追捻出陕。直到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在山东终于惨遭失败，左宗棠才正式来到陕甘履行清政府交给的镇压回民起义的反动使命。这期间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正是他所谓“平回”的准备阶段和反动政策的酝酿安排时期。从左宗棠的正式登场，联系到全国的形势和陕甘的具体情况来看，一是清政府完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已可腾出手来扑灭陕甘回民起义的烈火，而左宗棠正好充当了清政府反动的民族宗教政策在陕甘的忠实执行者；二是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逆转，陕西回民起义的高潮已经低落。到同治七年（1868年）年底，陕西起义军都已退入甘肃或退守陕甘边界，甘肃起义军四大据点基本处于不同程度的“抚局”和自卫阶段。左宗棠的所谓“平回”，就是来向陕甘回民进行总的反攻倒算，进一步执行镇压和屠杀政策，陕甘回民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左宗棠“平回”的反动政策和策略，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精心布置了“先捻后回”的战略。

左宗棠接任后，马上向清政府献计献策，其第一步计划是：“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主，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可免中梗之患。”[28] 第二步计划是：“甘肃回多于汉，兰州虽为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将来巨军入甘，应先分为两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矣。”然后杀气腾腾地归纳说：“是故进兵陕西，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

无梗，得以一意进剿。"[27] 最后落实在一个"剿"字上，而且他刚一接到陕甘总督的任命，就"清饬蒋益澧于香港购买上好洋枪二千枝及枪药铜帽便交高连升解以济军需。"[28] 借用资本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来对付少数民族的起义。

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所制定的恶毒计划，确实打中了起义军的致命弱点。回民起义军与捻军之间，本来因指导思想和性质的不同，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捻军失败之后，陕西回民起义军更加孤立和分散，终于为左宗棠各个击破。

其二，顽固的民族偏见和宗教歧视。

左宗棠是陕甘领兵大员中第一个系统地了解过伊斯兰教的人，这一点反映在他著名的《奏请禁绝新教折》和其他一些文稿中。左宗棠对回民的起源、信仰、真主、《古兰经》以及宗教仪礼、圣行五功都讲得头头是道，甚至注意到了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演变。对于新教的来龙去脉，更讲得了若指掌，结论则是："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断绝者，以其自托神灵，妄言福祸，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卑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显戮而不悔。一如白莲、清香、天为、园顿诸邪教，之足以酿乱而祸天下也。"[29] 在左宗棠的眼中，回民是"牲与人殊"的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怀德"[30] 的刁民。他表面上也讲"祇分良莠，不分汉回，为制贼之本"。在公开的《谕汉回告示》中更是讲得堂皇，骨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

其三，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

左宗棠一到陕西，就投入当地地主阶级的怀抱，上为清王朝尽命效劳，下为汉族地主阶级伸冤报仇。其下属和幕僚大多是和他气味相投的汉族地主官僚。这里特意举一个向不为人注意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团练头子柏景伟。柏景伟是陕西长安人，举人出身，同治二年大挑二等选授定边县巡导。回民起义打破了他升官发财的美梦，就一变成为残酷屠杀回民的团练头子。其初期

的罪行已如前述，后又赴甘助剿，功赏蓝翎。“六年，钦差大臣左宗棠奉命督师入关，知柏景伟识略过人，辟为参谋军事”，因出谋划策有功，“宗棠深才之，以属帮办军务刘典。”[31] 此人早在同治六年十月就上书左宗棠，认为“回逆较发捻各逆均易办，以其贪狠成性，各霸一方，不相统属也。”进而献策曰：“甘肃回逆大势，西南以河州为主，东北以金积为主，两处皆陕回西逃薮，阳为就抚，阴则挟陕回以为之屏蔽……非先剿陕回，而河州金积之回不能抚；非并剿河州金积，而平固甘凉等处之回不能抚……进兵先从董志塬始，远抚而近剿，顺抚而逆剿，取其渠魁而歼除之。”[32] 他还向左宗棠建议，“回逆多诈而善疑”，“败则饰词投诚，其故智也。……然彼既以抚诈我，我何难以抚制彼，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33] 另外，他还力陈陕西回民的种种“叛迹”，要求将叛户归属堡寨，并特别提出金积堡在陕甘回民起义中的地位和对清军的危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团练头子的毒计受到了左宗棠的重视和采用。左宗棠后来提出的“一意进剿”，“各个击破”，“涣其群，孤其势”，“关陇诸回，视金积为向背”，禁绝新教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提炼和发挥。在剿抚问题上，历来的领兵大员有主抚者，有主剿者，亦有剿抚兼施者，都不及左宗棠处理得独具匠心，得心应手。在柏景伟“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的启发下，左宗棠对待回民起义的手段是以剿为主，剿中有抚，抚中有剿。他认为“议剿议抚必须通筹全局，不致坠贼奸计”。

（2）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

左宗棠全面展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镇压是同治八年（1869年）。史家多称左宗棠的进兵甘肃为“三路平回”之策，即北路刘松山由绥远、花马池直至灵州、金积；南路周开锡统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今陇西）进攻河、狄；中路左宗棠与刘典督军由陕甘大路入甘。实际上，左宗棠的进军方略以北路为主，步步推进。南路是为了巩固秦州，维持饷道，保卫省城，并割断河狄与灵宁的

联系；中路实则为后路，一面全部逼陕回入甘，一面巩固后方，坐中指挥。在军事上，这是一反过去全面出击的做法，对起义军极为不利。再加上同治七年年底，刘松山又在花马池收复了董福祥的部队，改编为董字三营，“流民土匪”基本上为清军收编和打散。回民起义军形势更加孤立。左宗棠的“平回”从董志塬开始。

同治八年二月上旬，左宗棠乘董志塬陕西回民军粮草几乎断尽并屡次求抚的时候，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董志塬是陕西回民军唯一的一个根据地。北至安化，南至宁州，西到镇原，东到合水西华池，西北勾通毗连金积，西南威胁平泾。当时起义军粮食非常困难，拖家带口，归乡心切，缺乏统一指挥，在清军压力下只有向西撤退。二月十八日，起义军在肖河镇集议，“并十八大营为四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巍（即崔三）、马正和等率悍党万余伏董志塬断后”。[34] 二十五日，庆阳为清军占领，二十七日，董志塬失陷。左宗棠向清廷报功说：“统计是役杀毙饥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积年数穴扫荡一空，贼之悍精骑党，销亡殆半，该逆由环县、固原两路窜至下马关，复由下马关窜金积堡一带”。[35] 可见起义军损失是很惨重的。失掉了董志塬根据地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只有分别依附于甘肃的四大据点。这年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州，步步为营，向西推进，依次展开了对甘肃回民起义军四个据点的进攻和屠杀。

左宗棠进攻的重点首先是金积堡。如上所述，攻打金积堡早就在左宗棠的谋算之中。当时金积堡的形势是：早在同治四年年底，穆图善就在宁灵和起义军议成“抚局”，宁夏的马万选、赫壮图被穆请赏加副将衔，马化龙被赏加提督衔，并改名为马朝清，其子马耀邦赏戴花翎。[36] 起义军退出了宁灵郡城，马化龙还为清军倡捐了数万两饷银和数十万担粮食。这种“抚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全局来说并非好事，表现了整个起义的分散和缺乏统一。

马化龙本人显然也有保全势力和地位的个人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宁灵的安定，中止了抢劫和屠杀，对广大回民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抚局”能够维持多年的原因。从清廷大员方面来看，则是利用民族宗教上层，拉拢群众，其主要原因是兵力限制，无力围剿。但是左宗棠成见在胸，决意从金积堡开刀，拔掉这个眼中钉。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刘松山奉左宗棠之命自花马池拔队出发，一路剿杀。八月初二，刘松山进军途中遇到灵州回民阻截。八月初五，回民起义军在自卫中再次占领灵州城。刘松山即督军大举进攻。九月灵州得而复失，清军进而逼近金积前哨吴忠，金积堡之役正式打响。

金积堡之役中做为哲合忍耶教主的马化龙，虽然和陕甘回民军有一定矛盾，但他只是“代为求抚”，并不出兵助剿同类，仍不失其民族的立场。而这正是左宗棠所谓真抚的首要条件。八月至九月初旬，送到左宗棠手中的马化龙求抚禀呈就有四次之多，八月二十九日，马化龙还亲赴刘松山营中，“禀求停兵，待其劝导陕回听候查办”。“九月初三至十二等日，马化龙逞递陕回禹得彦禀结并陆续交抬枪七十杆，战马七十匹。”[37] 左宗棠则认为“惟马化龙之阴谋险狠，天下共知，自就抚后筑寨修堡，购马造械，仍于陕回互相首尾，自宁灵以至河狄回民大都仰其鼻息，旋抚旋反，是其惯技。”[38] 所以一面敷衍，一面催令刘松山加紧进攻并大肆杀戮回民。据左宗棠向清廷汇报八月至九月的战况时承认，清军每攻破一个堡寨，“寨内贼匪……悉行歼毙”、“斩杀净尽”、“逸出者无几”、“无一漏网”、“生擒者，立即斩决”。[39]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派金顺由定边与张曜进兵金积北面的宁夏，雷正绾、周兰亭沿黑城子北上占据峡口，对金积堡施行了军事大包围。到了同治八年九月中旬，马化龙指令新教各回堡如预望城、同心城求抚，“陕回心更不安，于是禹得彦、白彦虎、李经举等之在预望城者，潜率各部队，由盐茶厅西窜，纠居宁安四百户之崔三、马生彦及

马正和部众，金积所留之陈霖等，悉数西趋。图由长流水、打拉城出会宁安定，而河州之回，暂延喘息"。[40] 左宗棠认为正是痛剿的大好时机："现在陕回既去，金积堡贼势已孤，惟马化龙以甘词求抚，阴谋蓄谲，若非痛加剿洗，必至贻患将来。"[41]

从同治八年九月到同治九年十一月时，金积堡保卫战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他们认不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而一再求抚，但同时他们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坚持战斗，成为此间陕甘回民起义的中心和堡垒，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九年正月十四日，刘松山在马五寨被起义军击毙，陕西回民起义军和宁灵起义军乘机反攻，雷正绾在峡口大败，左宗棠则任命刘松山之子刘锦棠统帅湘军，更加穷凶极恶对金积堡围攻。

到同治九年十一月时，金积堡弹尽粮绝，河狄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支援亦被阻截。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递呈求降，并表示："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恳恩施。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42] 狡猾的左宗棠当时并未立即杀害他，因为这时还有个回民起义的据点王家疃久攻未下，他还利用马化龙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的招降活动，同时在为杀害马化龙寻找借口。左宗棠在奏文中云："马化龙稔恶三世，谋逆已久，纵有后效，不蔽前辜，若宽贷其一死，必滋后患。此时议暂缓其诛者，以王家疃堡墙高厚，存粮极多，非猛攻所能骤得。"以后王家疃攻下，左宗棠以"两次挖掘获洋枪一千二百杆"为借口，于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1871年3月3日）将马化龙父子"凌迟处死"。[43] 马化龙亲属及附近村堡回民被杀害者数千人，左宗棠还出示严厉禁绝新教，宁灵地区的回民亦遭到大肆屠杀。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初由静宁取道会宁到达安定（定西），开始向河州回民起义军踞点进攻。在此之前，清廷急催左宗棠"鼓行而西，灭此朝食"，老谋深算的左

宗棠却一面镇压零星反抗；一面筹办粮草，把进攻河州的时间定在七、八月秋收之后。河州的马占鳌、马尕大（马悟真）托张家川回目李德仓向左宗棠乞抚。左宗棠也明知金积堡失败后马尕大、马占鳌求抚之心乃益坚。但他坚持认为“河州贼氛不靖，兰州不能解严。河回轻生，性喜剽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毫无畏忌，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44] 左宗棠拟定了三路进攻计划，中路由傅先宗搭浮桥过洮河结垒而进，左路由杨世俊取道南坪进攻峡口，右路由刘明灯从红土崖进安定，扼制洮河康家崖渡口，并派徐文秀由静宁进驻会宁为后继，在岷、洮分驻部队五营，并派土司杨元守隘口阻截，妄图把河州起义军一举制于死地。另一方面，左宗棠故技重演，乘退踞西宁大小南川的陕回崔三、禹得彦“来信哀恳，具保投诚”的机会，进行了分化和离间。布置停当，才于八月初间向河州发起了进攻。由于起义军英勇顽强的反抗，左宗棠上述的三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如愿以偿。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六（1872年2月14日），起义军抓住清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在敌营之间偷筑三垒，忽然发起反攻，里应外合，清军大败而逃，自相践踏，溃不成军。其统帅傅先宗被起义军击毙，徐文秀阵亡，这就是著名的太子寺之战。但是，马占鳌却利用这次胜利做为换取自己名利的资本，和马永瑞等力主胜而后降。“先后呈交马匹四千有余、枪矛一万四千有奇”，并“各遣子弟皆回目马永瑞等赴军前献马。”[45] 马占鳌、马永瑞、马悟真等还把自己的儿子（当时号称十大太子）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46] 左宗棠亲自给马占鳌的儿子马五七改名为马安良。马占鳌等以回民的鲜血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回民起义军被改编成了两营马队，由马占鳌、马悟真统领，反过来又去镇压回民起义军。“当时有一支回民起义军由杨继芳、马彦隆、马聋子率领，往来于河州和盐茶一带，清军久不能扑灭。马占鳌一投降马上利用民族上层的关系将他们捕献左宗棠，为此深得左的赏识。马占鳌赏给花翎五品、

马永瑞赏给蓝翎五品、马悟真赏给五品”。[47] 河州的回民起义终被马占鳌等人出卖而告失败。

河州回民起义失败后，左宗棠立即开始把矛头指向西宁。当时西宁的情况亦是“抚局”。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饷无兵，长期以“抚局”“羁縻”起义军，实际上西宁成了回民起义军的天下。同治七年年底，玉通更保举马桂源署西宁知府，以马本源为西宁镇总兵，以马福为大同营都司，基本上把地方政权交给了起义军。在左宗棠看来“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48] 同治十年六月，左宗棠就拟定计划，“俟河州大定，再图西宁”，就在河州战事期间，西宁陕甘回民起义军求抚时，左宗棠又耍政治手腕，骗得“陕回及米拉沟西马营回众陆继共交马三百六十六匹，枪矛一千二百九十二件。……宁回一共交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枪矛一千零八十五件。”[49] 其实这都是缓兵之计。

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河州战事结束，左宗棠进驻甘肃省城兰州，立即以陕回“所交马匹多不适用”、“仍借故迟延”为理由，“饬令道员刘锦棠率马步各营分赴前进”，[50] 并要求马桂源等夹攻陕回，以试其真伪。陕甘回民起义军一再要求“官军缓进”，左宗棠执意不肯。面临着清军的镇压和屠杀，西宁的陕回和甘回又一次联合起来斗争。十月十九日，清军进至西宁城下。马桂源退到巴燕戎格。马永福在清军前面招降，马占鳌、马永瑞随军助剿。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马占鳌等在巴城东山诱捕了马桂源兄弟，解兰州交左宗棠杀害，大通等地亦告失陷，崔三、禹得彦等投降。白彦虎由西宁退往大通，又从大通过扁都口向肃州方向撤去。

肃州战役是陕甘回民起义军与清军的最后一战。肃州城从同治四年三月被起义军占领以后，同治七年又议成“抚局”，实际上一直控制在起义军手中，形势与西宁基本相同。同治十年七八月间，左宗棠攻陷金积堡后又移师西进，肃州回民起义军和陕西

回民起义军又一次公开占据州城。左宗棠在清政府催促下于同年即拨徐占彪十二营往攻肃州，第二年正月又派陶生林等率领五营清兵去协同攻城。河州起义失败后，白彦虎部从扁都口来到肃州支援，被清军阻截，只好向关外西撤。后由新疆入俄境，从此定居务农。到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亲率大军到达肃州，战斗持续到九月初十，肃州起义军领袖马文禄在左宗棠诱降下开城投降。左宗棠让马文禄等交马械、造名册，“分班带大营听候面谕”，然后于二十三日即“令提逆首马四即马文禄……等各犯，数其罪恶磔于军前，臣金顺、宋庆、刘锦棠亦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轰击，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外，尽付焚如。”[51] 事后左宗棠自己承认：“肃州克复，首要各逆，实无一漏网。土客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女概免诛。数十年征战之事，以此役最为妥善。”[52]

轰轰烈烈的陕甘回民起义，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历时13年，终于在左宗棠的镇压和屠杀下宣告失败。

注　解：

①《甘宁青史略》卷二十四。

②《平回纪略》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14页。

③同上（111页）。

④引自《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序言》，见《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⑤见《西北回民革命史》附录：《秦难见闻记》。

⑥《秦难见闻记》。

⑦同上。

⑧《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一。

⑨《平回志》卷一，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60页。

⑩《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一。

⑪同上，卷十三。

⑫同上。
⑬同上，卷二十一。
⑭同上，卷十三。
⑮同上。
⑯《平回志》卷一，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68页。
⑰同上，卷二十九。
⑱同上，卷五十七。
⑲《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七十六。
⑳同上，卷八十一。
㉑《平定关陇纪略》卷二，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17页。
㉒《平定关陇纪略》卷二，《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29页。
㉓同上，339页。
㉔《平回志》卷三，《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348页。
㉕《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三九。
㉖《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四六。
㉗同上。
㉘同上。
㉙《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八。
㉚《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一，第7页。
㉛《课吏馆日记·国史本传》，见西北师院历史系资料室复印本。
㉜同上书，《办理回逆腊议》。
㉝同上书，《论贼情》。
㉞《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一九三。
㉟同上。
㊱同上，卷一五一。
㊲同上，卷二〇六。
㊳同上。
㊴同上。
㊵《平定关陇纪略》卷七，见《回民起义》资料三册第12页。
㊶《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〇六。
㊷《平定关陇纪略》卷九，见《回民起义》资料四册第92页。
㊸《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三八。
㊹同上书，卷二四八。
㊺同上书，卷二六六。
㊻《马占鳌的反清与降清》，见《文史资料选辑》27辑。

㊼《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七四。
㊽《左文襄公奏稿续编》卷三十二。
㊾《青海奏疏》79页。
㊿《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六九。
(51)《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八三。
(52)《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三。

陕西回民起义

冯钧平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春，陕西回族人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推动下，不堪忍受清朝残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揭竿而起。起义狂飚席卷西北大地，为我国反帝反封建的近现代史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壮丽战歌。

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在清朝咸丰（1851—1861年）末年，陕西有近百万的回民，主要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同州、西安、凤翔三府，以及乾州、邠州两直属州的数十县内。他们与汉族人民世代和睦相处，生息繁衍在三秦大地上。在渭河两岸，回民村寨林立，有清真寺800余座。

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洋人的炮舰政策之下，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从而把战败的负担全部压在各族人民身上。据统计，陕西的税捐多至50多种，各种附加税金竟为田赋正额的一倍半之上。赋税之外，各县遍设差徭局，巧立名目，敲榨勒索。尤其是地方官衙，挑拨回汉族人民的和睦关系，以期分而治

之。如在诉讼大堂之上，“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甚至有“回杀一汉，以十抵之；汉杀十回，以一抵之”的判词。在经济上，官衙税卡任意压低售价，对回民农产品百般刁难，使其无法正常营业。如此残酷的剥削和民族歧视，官逼民反，广大回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当临潼汉族农民杨生华率2万回汉群众“聚众抗官，攻扑城池”时，惨遭清军血腥屠杀。杨的全家斩杀尽绝，连杨生华2岁的儿子也被割了头。

同治元年二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部由武关趋蓝田，进逼西安。“陕西巡抚英棨虑标兵不可恃，与张芾谋举乡绅，募勇丁，防南山要隘。”于是，汉族大地主张芾、梅锦堂、赵权中等组织团练，协同清军镇压起义。四月，陈得才部以回民为向导攻陷了渭南、华州等县城。清军为切断捻军后援及其耳目，乃决定首先向回民开刀。四月十九日，华州、华阴团练准备血洗秦家村。该村回民问何罪之有，并苦苦哀求刀下留情，然团丁似野狼，先任意抢劫，后放火焚村。他们还各处散发传单，扬言：“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霎时，同州、咸阳、耀州、富平、大荔、高陵等地团练“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各地地主武装团练如同清廷的恶犬，对无辜回民残酷屠杀，迫使广大回民为了自己的生存揭竿而起。

二、起义的爆发

同治元年四月底，同州府的回民在洪兴、任武、赫明堂等人的率领下，为反抗地主武装团练的暴虐，举行武装起义。官衙在外无援兵之下，采取了缓兵之计，于五月四日由督办团练大臣张芾、临潼县令缪树本及回绅马伯令等20余人赴临潼油坊街同起义军“和释”。但在谈判时，张芾出言不逊，不但不停止对回民的烧杀，反而以武力要挟，强迫回民交出武器和首领，致使谈判破

裂。恰在此时，回民群众在张芾的大轿中发现剿灭回民的传单，遂引起公愤，扣押了张等人。十三日，数万回民在渭南苍头镇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处死张芾、缪树本等反动官吏，从而点燃了陕西回民起义的火炬。

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高陵县城，俘获县令梁书麟。数日内，大荔、朝邑、临潼、渭南、华州、三原、泾阳、蒲城等县的回民纷纷响应，从而形成了以西安省城东的王阁村、羌白镇、苍头镇、沙河等地为中心的起义大本营，并向省城西部迅速发展。

省城官吏和团练头目梅锦堂、柏景伟、梁冀之、石仓、冯元佐等乃大造舆论，到处散发“杀回者有赏无罪”、“面生可疑，格杀勿论”的传单。五月十四日夜，梅锦棠、冯元佐等人带团练数千人“先将长安境内回镇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渠堡回村围攻烧杀，阖城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团练还在西安郊外的二郎庙、宏福寺、铁塔寺以及西关等处安放铡刀，一经辨认出是回民，当即身首分离。团练辨认回民的口歌是：“高鼻梁，深眼窝，不是回子是哪个。”数日之内，西安城外回民村寨遍遭焚杀。连一些汉族封建文人也对团练的暴行十分愤慨，认为“陕西今日之祸，柏、梁、石、梅诸人为之也，上害国家，下害苍生”。西安周围数万回民，死里逃生的只有3000人。他们在孙玉宝等人的领导下，集中在西南乡的鱼化寨、坡上村一带发动起义。长安与户县一带的数十村汉族农民纷纷前来投奔起义军。与此同时，渭河以北的咸阳、泾阳、三原等州县的回民在马正和、马德兴、杨文治、毕大才等人的带领下，亦多次南渡渭水，配合孙玉宝部起义军在省城与清军和团练激战。

起义之初，陕西清军只能勉强守城，围剿起义军全恃团练。因而团练头目梅锦堂、石仓等人极为嚣张，他们带团丁数万横行乡里，对长安、咸宁一带的回村大肆杀掠，并扬言“三天平川，五天搜山，五天内洗尽陕西回回，然后在金胜寺摆太平宴。”同

治元年六月初四日，孙玉宝联合渭北起义军马德兴、马正和等人共同行动，他们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佯攻省城东关，待城内清军集中于东关之际，事先埋伏在西梢门外的起义军猛攻团练指挥部金胜寺，“将团勇杀尽，用火焚金胜寺。而梅五、石仓从此抱头鼠窜，不知下落，官绅为之胆落。”省城的团练被消灭，大振了起义军士气。不久，起义军又攻打团练巨巢六村堡。该堡地处省城西北30里，城高沟深，官绅、富豪多居此堡，时刻威胁着西安与渭北起义军大营的联系。七月十六日，西安、咸阳等地的起义军围攻六村堡，激战数日。二十三日，省城派提督马德昭护送军火支援六村堡，中途被起义军阻截，败回省城。二十四日夜，马德昭纠集潼关协领图克唐阿、纳勒合春等带大批马队步兵前往六村堡解围。起义军埋伏于六村堡以东的杨家城，与清军激战数小时，击毙了图克唐阿、纳勒合春等头目，占领了六村堡和西安城郊，使清军龟缩城内不敢妄动。起义军包围西安城达3个月之久，以致省城消息不通，粮食不济，清军惶惶不可终日。

在同州、西安等地团练剿杀回民之际，凤翔府的官绅也大办团练以“剿回”。八月初四，崔伟召集凤翔回民于城外麻家崖，被迫自卫。初五，乡团剿杀回村，壮者皆从义军，所留老幼均被惨杀，房舍一烧而尽。初六，凤翔知府张兆栋将城内2坊48家回民，不分男女老少皆杀尽。初九，张调集团练2700人，会同城内清军围剿起义军。凤翔回众在崔伟的率领下，冒死与敌拼搏，首战告捷，击毙清军百余人，团丁死伤不计其数。九月十三日，由外地增援的3000清军会同城内官兵乡团约近万人分几路进攻起义军。崔伟部除正面迎敌外，崔则带马队向清军两翼猛冲。清军大败，乃龟缩凤翔城内不敢再战。

在这几个月内，全陕各州县涌现了许多回民起义军领袖：东路有任武、洪兴、赫明堂、于彦禄、禹得彦、蓝明泰、马振纲、马彦英、阎兴春、冯钧福、陈霖等，西安地区有孙玉宝、马正和、

马德兴、杨文治、毕大才及白彦虎；西路则形成了以崔伟为首的领导核心。他们先后在渭河两岸建立了起义据点，如东路的羌白镇、王阁村、苍头镇、乔店；西安府的沙河、广大门、渭城、塔底下、鱼花寨；西路的麻家崖、崔家洼等地。至此，同州、西安、凤翔、乾州、邠州等地起义军连成一片，互相配合，先后攻陷渭南、高陵、华州、华阴，围西安、泾阳，犯三原，攻咸阳，扑凤翔，横扫三秦数十州县，致使关中多为起义军所控制。

三、清军围剿起义军

清廷面对如火如荼的回民起义，深感“陕省为饷源所在，非有劲兵名将，难冀保全”。于是各地清军入陕剿回。先有甘肃提督马德昭、广西提督孔广顺带兵勇入陕，但无济于事。八月初，清廷令直隶提督成明带5000兵丁入陕，但在大荔县之战中，全军溃败，后收拾残部退驻朝邑，不敢轻举妄动。九月，钦差大臣胜保带步骑8000余人入潼关时，被东路起义军截击，死伤近千人。胜保慌忙退临潼，入夜时才沿南山小路入省城。此后，他率部在西安、咸阳、同州等地与起义军激战，屡遭惨败，只好龟缩省城，以勒索财物、淫乐挥霍为能事。其部众军纪败坏，在省城近郊以剿回为名，不分回汉，一律惨杀。乃至假冒回民，为非作歹，烧杀抢掠，回汉人民恨之入骨。不久，胜保被清廷“锁拿进京，如律赐死”。十一月，清廷令多隆阿为钦差大臣。二十七日，多隆阿军依仗洋枪洋炮的优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进攻王阁村、羌白镇等起义军据点。双方相持月余，多采用诱降办法，瓦解起义军斗志。个别起义军首领见死伤惨重，乃向清军交出军械投降，造成军民内部混乱，多军趁机用洋炮轰击羌白镇、王阁村。据点失陷后，多军烧杀抢掠。接着，多军围攻苍头镇，西安起义军孙玉宝带数千人东援，但中途受阻。苍头镇激战一个月，起义军内讧，清军攻占苍头镇。乔店、庞谷庄、沙河等起义军据点也相继

失陷，起义军遂向西安退却。同治二年七月，当沙河失陷后，近万名回民老弱妇孺，因渡渭水不及，"皆投河而死"。此时，渭河以南只剩下孙玉宝部，因势单力薄，乃于八月下旬北渡渭水退守渭城。渭城南临渭水，北倚洪渎塬。起义军在此设渭城府，并构筑城防工事，东西500丈、南北700丈。多隆阿于九月初集中兵力数路合围渭城，孙玉宝、马生彦等部与其激战4昼夜，于十三日城陷。多军入城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老弱妇女多被推入渭水溺死，回民死亡两万多。

同州、西安府的斗争失败后，起义军民分南北两路撤退：北路由马正和、马生彦、马振纲等人带领，于九月初到礼泉，清军雷正绾等穷追不舍。十一月，起义军在邠州设埋伏，打败了尾追的清军后，进入甘肃的董志塬。南路在孙玉宝、禹得彦、赫明堂等人的率领下，向凤翔退却。时值隆冬，孙部等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多隆阿令陶茂林带精兵急驰凤翔增援，并亲率大军分三路包围云集凤翔的数十万起义军。孙玉宝、崔伟等率部退入凰翔北山，以"议抚"拖延时间，然后乘机退入甘肃。至此，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的第一次高潮结束。

四、第二次反清高潮的形成

同治三年（1864年）初，南北两路起义军被迫退出陕西战场后，会合于甘肃东部的董志塬。董志塬北至安化，南至宁州，西到镇原，东到合水，方圆数百里之阔。数十万陕西回族军民，离乡背井地溃退到这里，饥寒交迫，人心涣散。但一些起义军首领并没有被失败后的艰苦环境压倒，他们利用清军主力在陕西境内对付太平军而无力西顾之机，把失败后的军民组织起来，安排他们分住董志塬十八处，每处组为一个大营，边耕边战。大家推选孙玉宝和禹得彦为总元帅，马正和、白彦虎、崔伟、杨文治、马生彦、毕大才、冯钧福、陈霖、于彦禄、赫明堂、蓝明泰、阎兴

春、邹保和、马长顺等人分统各大营。董志塬十八大营的创立，使起义之初那种各自为阵的松散局面得以改善，加强了组织性和战斗性，同时也得到了暂时的休整。

同治三年秋，十八大营各部纷纷出动，打击董志塬周围的反动政权。八月，崔伟率部配合孙玉宝夺取了固原州城。这是陕西起义军入甘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极大地鼓舞了陕西回族军民。清廷慌忙令雷正绾、曹克忠等部清军前来镇压。这时，孙玉宝以固原为根据地，自称为“大汉平西王”，蓄发易服，与清廷势不两立。孙玉宝等人一边与清军对阵，一边组织骑兵马队，重返陕西战场。同治四年二月，在雷、曹两路清军的夹击下，由于张保龙、赫明堂等人暗降敌人为内应，以致固原城失陷。孙玉宝这位农民出身的起义军首领为掩护部下撤退而力竭身亡。

同治五年春，崔伟、邹保和、禹得彦等人率五六万起义军重返陕西战场，分数路向西安方向进攻。参加这次反攻的还有甘肃回民军的李德仓、米贾、张非等部和不堪忍受死伤饥饿而溃变的清军兵勇。他们在陕西战场上与清军相持半年之久，不仅支援了陕北一带李双良、张俊等汉族起义军的斗争，而且在客观上也配合了西捻军进入陕西战场。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在“进甘陕往连回众，以成犄角之势”的战略指导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6万人向陕西进军。张部由马生彦等回军为向导，攻陷渭南。十一月，与清军大战于西安东十里铺，清军30余营皆溃，死者数千人，捻军乘胜围省城西安。甘肃境内的董志塬回民军趁机分数路重返陕西战场。同治六年初，回民军打到陕西腹地的蒲城、富平、三原、高陵、临潼、渭南一带，并占领了同官城。另一路回民军在崔伟率领下，联合甘肃回民米贾、张非等部及东乡、撒拉族武装，经陇州、千阳、宝鸡到凤翔，与西捻军仅一河之隔。二月十九日，西捻军北渡渭水，与崔伟部汇合，袭击清军刘松山、谭玉龙部。三月二日，西捻军东

进乾州、礼泉，崔部派出人马随之。但双方又依战局变化，时分时合，令清军惊慌失措，声称"陕西东西两路同时吃紧，势难兼顾"。

同治六年（1867年）夏，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数万湘军分三路入陕。西捻军与回民军放弃攻省城的计划，回民军在凤翔、邠州一线作战，西捻军则自南向北，与活动于陕北的回民军及汉族起义军协同作战。至此在一年内，陕西战场上形成了"捻自南而北，千里有余；回自西而东，千里有余"的二次反清高潮。至秋，东捻军在山东告急。十月二十三日，在回民军的掩护下，西捻军自宜川渡黄河入晋。左宗棠率主力尾追西捻军而去。同治七年初（1868年），十八营起义军趁陕防务空虚分几路东进陕西。崔伟、马正和、白彦虎、禹得彦等部先后活跃在凤翔、扶风、岐山、眉县、咸阳、宜君、三水、三原、临潼、渭南等地。清军无力反击，惊叹"渭河南北，贼踪已满。"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左军镇压了西捻军后，二次入陕，分5路进攻，崔、白、马等人带数万回民军与左军大战于邠州白吉塬，伤亡惨重，乃被迫退回董志塬。至此，陕西的第二次反清高潮结束。

五、陕西回民起义的低落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左军对董志塬回民军发动大规模围剿。十八日，回民军在粮草断尽的情况下，于肖河镇计议，决定合并十八营为四大营，推白彦虎、崔伟、禹得彦、马正和为四大元帅。白、禹2人率部向宁夏转移，崔、马率精壮万余人在董志塬断后掩护。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庆阳。二十七日，董志塬失陷，回民军及其眷属被杀或死于饥饿者"实不下二三万人"。四月，左宗棠进驻泾州，自居中路，刘松山为宁夏北路，李耀南、吴士迈为秦州南路，对陕甘宁青新回民起义军全面清剿。

清军北路刘部首先对灵州金积堡周围500多座回民村发动了野蛮的烧杀。当地回民在马化龙的指挥下，与陕西白彦虎部联合，

凭借交错纵横的沟渠和坚实的碉墙同清军殊死拼搏。同治九年（1870年）元月十四日，刘松山被击毙，回民军大振，乘胜夺取了青铜峡口。与此同时，马正和等部由环县、庆阳等地再入陕，三水、甘泉、韩城、郃阳、高陵、泾阳、礼泉、乾州、延安、鄜州等地先后告急。左为此而受清廷严旨责斥，遂之全力围剿金积堡。

南路陕回民军崔伟、禹得彦等部增援金积堡受阻后，将其家眷安置在河州，又东进陕西，以牵制围金积堡之敌。他们经陇州、千阳、宝鸡到凤翔陈村后，兵分东西两路：东路的禹部活动在扶风、礼泉、渭南、蒲城、白水、宜君等地；西路的崔部活动在宝鸡、千阳、陇州以及甘肃的秦安、清水、庄浪、隆德等地。

同治九年（1870年）底，金积堡陷落。陕西回民军在血战中，弹尽粮绝，后以草根树皮充饥，马正和、杨文治等首领战死，陈霖、阎兴春、蓝明泰等部被迫投降，崔伟、白彦虎、禹得彦、毕大才等部退往青海西宁，部分回民军退入肃州（酒泉）、河州。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河州回民起义军被镇压和投降后，左宗棠坐阵西北枢纽兰州，全力围剿在西宁府的陕青回民军。八月，刘锦棠率清军主力进军西宁，陕回民军与当地马桂源兄弟起义军联合反击。双方激战50余次，历时2月之久，回民军的长矛大刀不敌清军的洋枪洋炮，白彦虎、禹得彦、马本源均带枪伤指挥作战。十月十九日，西宁陷落，马桂源部败退巴燕戎格。

西宁战役失败后，陕西回民军精壮损伤惨重。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人被迫放下武器“就抚”，以换取随军到西宁的两万老弱妇孺的生存——被押送平凉、秦安、清水等县，而拒不投降的白彦虎则率2000余人向肃州（酒泉）败退。

六、最后的斗争

同治十二年初（1873年），白彦虎部突破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今张掖），清军尾追。三月

初，白部至肃州郊外的塔尔湾，试图解城内马文禄回民起义军之围，但因势单力薄，加之粮草奇缺，乃被迫翻越文殊山，出嘉峪关西行，经敦煌入新疆哈密。

当时北疆以陕西回民妥明为领袖的回民起义军杀死了都统平瑞和提督业布冲额，占领了迪化州。白彦虎部入疆，就是投奔妥明的。

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刘锦棠率清军入疆，相继攻占阜康、古牧地、玛纳斯，白部且战且退。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刘部攻占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被俘的阿古柏外国侵略军大总管等军官，同声代阿古柏乞降，愿缚献白彦虎以赎死。白彦虎为求生存，曾暂与阿古柏结盟，但时刻有所提防。因此，阿古柏被清军杀后，白部即走南疆，刘部则穷追不舍。白无奈，乃派人进入沙俄用重金买路求生。光绪三年（1877年）十月，白部数千人由喀什噶尔西北经纳林河桥逃入俄境，从此结束了历时15年的陕西回民起义。

陕西回民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

冯　增　烈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春夏之交，陕西关中回民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民族和宗教压迫，在当时入陕太平军的直接影响下揭竿而起。此次起义很快波及全省，并逐渐燃起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熊熊烈火，长达16年之久。它虽以失败告终，但却

给清朝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成为继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反清斗争。

此次起义，是陕西省回民各阶层全面投入的一场反清民族斗争，其主力是数十万淳朴善良、英勇奋战的农民，并涌现了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白彦虎便是其中之一。

白彦虎是陕西省泾阳县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幼时曾在清真寺里上过经文小学，据传曾一度在清军绿营中当兵，后又以屠宰为生。据说，其“洪声伟躯，平素以孝名闻乡里，对友义”。

同治元年五月，泾阳等县回民因不堪忍受清军团练武装的虐杀，便在杨文治、毕大才等当地回族农民的率领下，进行自卫反抗，以求生存。不久，泾阳、三原等县回军由塔底经沙河、光大门而屯兵于西安府东北，归长安屠户马振和领导，长安农民孙玉宝则活动于城西南郊，双方联合进窥省府。白彦虎参加了此次由马、孙2人联合指挥的金胜寺和六村堡之战，全歼凶残的长安梅五、石仓团练，迫使清军龟缩城内。于是，清廷先后派督办全省团练大臣张芾和胜保施以剿抚并用之计谋，但均为起义军所粉碎。此时，陕西关中回民起义军在咸阳建立了以孙玉宝为首的政权，设置了渭城府和新冯县。清廷在震惊之余，速派多隆阿率大军入陕征剿，不分妇孺老少，悉行残杀。白彦虎等数路回民起义军与之展开殊死搏斗，但寡不敌众，渭城失陷，他们遂分两路掩护群众突围西走。其北路义军由白彦虎、马振和、马生彦、马振纲等率领，经礼泉、邠州（今彬县）至长武白吉塬。白彦虎在白吉塬埋伏击溃了清军雷正绾部的追兵后，遂即退至陇东董志塬，从此成为十八大营统帅之一。

白彦虎和十八大营在陕西和董志塬的活动期间（1862—1869年），他们曾与太平军、李兰军、西捻军、当地汉族农民武装和哥老会等各路反清武装联合作战，由董志塬出发向关中发动了两次进攻，迫使清军“首尾不能相顾”、“陕省几无完地”。为此，

他们有两条出路，一是长途跋涉，投奔云南回民起义首领杜文秀；一是走捷径投奔甘肃回民起义首领、肃州的马文禄，白选择了后者。然而，肃州战而无功，又誓死不降，只有冒严寒，涉戈壁，携老扶幼，千里奔往北疆，期与当地回族起义领袖妥明余部会合，将抗清斗争进行到底。

当时新疆的形势较为复杂。当地清军力量薄弱，地主武装团练首领徐学功、孔才同回族起义军时战时和，时而投靠外国侵略军首领阿古柏。阿古柏又企图假清廷之手消灭回民。白部正是在此形势下赢得3年的喘息时间。当时，白部一面变运动战为游击战，周旋于清军、团练之间，同阿古柏不接触，自思脱逃之计。白彦虎曾决定西渡玛纳斯河经伊犁入沙俄，然后逃往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定居，但因河水猛涨和伊犁有清朝重兵防守而未遂。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刘锦棠率大军入疆，于七月向北疆进攻。白部苦战两月，玛纳斯失守，向南突围成功。用清军左宗棠的话说，白借阿古柏“给其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伺机脱逃”。这样，白与阿古柏父子一年半的“勾结”，造成他的晚节有亏。

其实，阿古柏对白彦虎也是心存戒惧的。他一面对白“遇之甚倨，勒其党傍三城以居”，一面又命白部守吐鲁番。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刘锦棠向南疆进攻，先陷达坂城。阿古柏守军投降后，表示愿往吐鲁番缚献白彦虎，并为阿古柏乞降。然而，白有所准备，乃率部弃吐鲁番经托克逊逃往库尔勒。七月，白下令凿决开都河阻敌，并遣甘肃回民马壮携金银重货往俄方买路求生。十一月，白率5000军、眷由喀什出哈马克，入沙俄的托克马克一带，遂结束了他将近16年的游击征战生活。

白部入俄境后，被当地哈萨克穆斯林留下来，故而放弃了逃麦加之念。托克马克一带，土肥水美，白部在这里垦荒放牧，建立家园，并发展为三四十坊，拥有三四十座清真寺，遂被后来的苏维埃吉尔吉斯共和国称为“东干族”，又称“回族”。而他们

仍自称是“中原人”，说的是原陕甘家乡话，仍保留着浓厚的家乡回民风俗。在宗教方面，部分格的目和哲合忍耶门宦教民互有嫌隙，不通婚，白无法调和。此外，一些部众为饥寒所迫，便在边境“抢掠偷生”，白因此受到俄方斥责。光绪十七年（1891年），白彦虎忧愤成疾，患食道癌而病故于伏龙芝，终年41岁，从而结束了这位回族反清英雄的一生。

白彦虎轶事

马　辰

清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白彦虎带领5000多人撤退到中俄边境，向俄军请求入境避难。俄国沙皇政府向白彦虎提出三个条件：（一）必须缴出全部武器、马匹；（二）准许白彦虎和部众在俄国避难，但不许有任何政治活动，服从俄国法令，当俄国的顺民百姓；（三）不准和俄国境外的人暗搞军事活动。白彦虎答应遵守条约，服从俄国法令制度。但是，白彦虎也提出三个条件：（一）完全保护起义军生命安全，不能把起义军送回交中国清政府；（二）起义军打了十几年仗，多为老弱病残，在俄国休养生息，请免征兵、征粮10年；（三）能否借路去土耳其。白彦虎的三个条件，沙皇政府只批准了前两条，借路去土耳其不能照办。这样，白彦虎的5000多人缴械进入俄国，被安置在阿拉木图一带务农、经商，安居乐业。当地居民是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都信仰伊斯兰教。由于信仰相同，互相都很关照，也愿和白彦虎的部众结为亲眷。沙皇政府也不迫害白彦虎的部众，和睦相处，

生活安定。但是，白彦虎部众内部起了矛盾，因为白彦虎的部众中有1000多人原是宁夏马化龙教派（哲合忍耶）的人，其余的都是陕西白彦虎的老派（格的目教派），虽都信仰伊斯兰教，但派系有别，不能合作。白彦虎见此情况，就把宁夏人分开住在哈拉湖，其余的人住在阿拉木图一带。

清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亲率5万清军进入新疆平息了阿古柏叛乱后，奏明清廷用外交途径向俄国交涉引渡白彦虎和部众归案，清王朝派往俄国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三次向俄国政府交涉引渡白彦虎等人，均遭到沙俄政府的拒绝。白彦虎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得食道癌病故，卒年41岁。白彦虎临终遗言说："以后中国如改换朝廷，不杀回回，望众弟兄仍回中国，到那边（中国）言语同，习惯同，谋生容易。"以后，苏联政府把白彦虎的部众更名为"东干族"（回族），成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人口约10万人。以上所述，仅仅是采访西北回族老人的口头传说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白彦虎逃到俄国境内的原因，是不愿投降清廷左宗棠而遭屠杀，仅仅是为了逃命，而不是叛国。

肃州回民起义及其领袖马文禄

张　世　海

清同治年间，在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回民反清起义。当时，除陕西的回民起义外，甘肃的回

民起义形成了四大中心，即以河州（今临夏）为中心的马占鳌；以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以西宁为中心的马桂源；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本文主要介绍肃州回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失败的经过及其领导人马文禄的事迹。

肃州是甘肃省河西走廊的重镇，是甘肃省回族聚居区之一。由于清朝统治者对回族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肃州人民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反抗的情绪日益增长。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肃州南山回民猎户因不堪忍受清军勒索军饷而吹响了起义的号角，其首领为马文禄。马文禄原名马安良，又名马四，是河州回民，他曾经是甘州（今张掖）提督索文部下的猎户长，驻防嘉峪关外赤金地。起义后，马文禄率回民军攻占了嘉峪关城，直接威逼肃州。

回民起义军的进逼，使安肃道恒龄与护总兵成桂甚为恐慌。为了防止起义的发展，他们密谋策划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即准备在预定的日期召集四乡团练猝不及防地将肃州东关的回民全部杀死。恒龄又把这个计划告诉知州陈墉。陈墉认为“肃回善良，不如前往窥察，果露痕迹，则继之以兵”（《甘肃通志稿》卷四十七），恒龄只好允从。恒龄、成桂的恶毒计划，回民早已风闻。故当陈墉于二月二十五日带领仆役出城到东关礼拜寺窥探动静时，回民将计就计，把陈墉等扣留在寺内，当晚二鼓时分，借用陈墉的“舆盖旗灯”诈开了城门，攻占了肃州城，很快消灭了守城清军。恒龄在顽抗时，被鸟枪击中，“退入东街关帝庙，伤重不能起，令焚庙尽节”（《肃州新志》卷七）。成桂受伤落壕而逃，狼狈至极。马文禄进城之后，利用安肃道关防发布安民告示，整顿城内秩序，并加紧准备城防。肃州回民起义的胜利，鼓舞了邻近地区的回族人民，起义很快蔓延开来，东自古浪、民勤，西至敦煌、玉门、甘州、凉州、安西州等广大地区，到处燃起了回民起义的烽火。

河西重镇肃州的失守，使清廷大为震惊，连连派将前往肃州镇压回民起义军。先是饬令提督曹克忠率军西进，但甘肃这时烽火四起，曹克忠被拖在甘肃中部而无暇西顾。清廷于是又派甘凉道黎献带兵开赴肃州。同治五年（1866年）初，马文禄设计向黎献诈降，以麻痹敌军，然后突然发动攻势，黎献部十营清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军械物资全部被回民军夺获。同治五年五月，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率军由兰州抵达高台县境，向回民起义军展开进攻。起义军分路反攻，杀得官兵大败，死伤达千余人。成禄军推进到肃州后，与回民起义军呈对峙状态，并开始与马文禄媾和。

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甘肃军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派遣提督徐占彪（字昆山，四川人）督带蜀兵先开赴肃州，与成禄会合。同治十一年（1872年），徐占彪部进攻肃州城，遭到起义军的狠狠打击，徐占彪部无功而退。这年五月二十七日（1872年7月2日），徐占彪率领所部夜袭肃州西南30里的塔尔湾。起义军虽然作了顽强抵抗，但是，由于兵力不足，最后只得放弃了塔尔湾这个要害之地，打通通往肃州的要道。六月，双方在许多地方进行了恶战，徐占彪部攻占了起义军的许多堡垒，并进至离肃州城只有3里的沙子坝，但仍不能攻入肃州。十一月，左宗棠增派陶生林、金庆元、戴宏胜等马步五营前往助攻。十二月，清廷又从宁夏调金顺一军西进增援。这时，甘肃的另三处回民起义已先后被左宗棠镇压下去了。白彦虎等率领的陕西回民起义军以及金积堡、西宁、河州等处回民军陆续退却到肃州，肃州遂成为西北回民起义军的最后基地。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湖南提督宋庆率马玉昆、蒋东才部九营至肃州。这样，肃州城下，清军云集，但面对坚城（肃州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城外环以深壕，壕深二丈余，阔十丈），竟一筹莫展。徐占彪于是筑炮台于肃州城西礼拜寺，开始用大炮攻城。“六月朔发150炮，次月发120炮”（《清平定甘

回纪略》），疯狂攻城，但终未打开缺口。闰六月徐占彪又挑选亡命之徒越壕攻城，占领东关正门楼。在激战中徐占彪脚被飞子打穿，不能临阵指挥，于是让宋庆、金顺所部仍驻东关，将自己所部各营移扎大南门外长壕。马文禄见有机可乘，便指挥数千回民起义军从城内杀出，猛攻长壕附近堡垒炮台，起义者个个奋勇，杀伤清军甚众。徐占彪在养伤营内闻讯，急调各营增援，起义军见众敌扑来，始退入城中。

清军大兵压境，将肃州城围攻了一年有余，仍未攻下，清廷对此甚为不满，连连催促左宗棠速破肃州，限令“克期攻拔，以安边圉”（《平定关陇纪略》卷十二）。七月十九日，左宗棠由兰州起行，亲往肃州督战。八月十二日，到达肃州。回民起义军面临着同清军的生死决战，肃州保卫战进入最后的艰苦阶段。左宗棠令副将赖长（大炮专家）的炮队轰击城池，于是用后膛炮克虏伯大炮轰击着厚厚的城墙，大批清军在硝烟中冲向城墙，登城进攻。八月十五日夜，大批清军在城西南强攻，登上城腰，但城上起义军英勇还击，“炮石如雨”，清军在丢下大批尸体之后，只得退却。失败之后，徐占彪、杨世俊又在城下挖掘地道，埋雷轰城。八月十九日夜，克虏伯大炮与地雷齐声轰鸣，清军又发动了一次强攻，邀功心切的杨世俊持刀指挥所部奋勇拚死登城，但回民起义军沉着应战，从城上施放密排叉子枪，打得清军抱头鼠窜，伤亡五六百名，杨世俊片功未得，反受枪子贯脑，死于非命。宋庆、金顺在城的东北面发动进攻，但未得手。强攻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左宗棠越发焦急，又调刘锦棠的老湘军全力合攻。九月初十日（10月3日），刘锦棠率湘军五营及部分收编的回军赶至肃州。左宗棠见强攻难以奏效，便让降回首领崔伟、马福寿等骑马环城呼喊：“马文禄速降”，想劝降马文禄。在清军一年多的围困之下，肃州城内粮草已尽，回民起义军“宰骡马充饥”（《平定关陇纪略》卷二十），许多人被饿毙，

起义军的处境极端艰困，并且这时各地溃退来的回民军多已四散，白彦虎带领其部回民军退往新疆，肃州已成孤城，内外交困，面临空前的危机，起义军已无法继续坚守下去，人心惶惶。马文禄见此情形，也动摇起来，想亲自出城投降，以小的牺牲来保全大部。九月十五日，马文禄亲至左宗棠大营投降。左宗棠让他先缴马匹枪械，次造清册，然后听候处置。马文禄交出劈山炮、过山炮、狗头炮、鸟枪和抬枪数百件，叉子枪1170余件，矛1000余件，刀叉无数，战马70余匹。马文禄交械后，左宗棠于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将马文禄、马永福、马照、马金龙、马凉臣等主要回民起义军将领杀害。同时，左宗棠令各军对回民起义军骨干1573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当天夜晚，清军入城纵火，竟对赤手空拳的回民进行肆意屠杀，“枪轰矛刺，计土回5400余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平定关陇纪略》卷二十），这真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至此，坚持了十年之久的马文禄所领导的肃州回民起义最后失败了。左宗棠在镇压了肃州回民起义后，又将肃州残留的回民与河西其它地方幸存的回民一起迁往甘肃南部。对此，左宗棠曾得意地写道：“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三）。

穆生花起义

马重雍

清同治间（公元1862—1874年）的甘肃回变，始于西宁，终于肃州（酒泉），历时10余年，是近百年来甘肃民族问题上最激

烈最惨酷的一次斗争。这一斗争的历程是：先由西宁发展到河州，继由莲花城蔓延到固原、宁夏、平凉。到了清军把渭河南北的陕回完全从东面逼进甘肃，遂激成轩然大波，北到延（延安）、绥（绥德），南及阶州（武都），东起泾（泾川）、庆（庆阳），西抵肃州，几乎无地不燃起熊熊战火。由于清廷所用昏聩贪婪的官吏执行着压迫箝制的民族政策，他们不但把地域不同、教派不同的回民全部“逼上梁山”，并且把受战争影响无法存活的汉民也拖入战局，挑拨离间使其相互仇杀，惨绝人寰。这一斗争的结果，破坏了许多城池，荒芜了许多田地，劫灰遍地，白骨如山，使甘肃人民的元气长久不能恢复，也使清廷的腐败政权日益动摇。在这一斗争中，攻破平凉名城的首领是秦安莲花城的穆生花阿訇。兹就平日耳闻，述其始末如下：

穆阿訇名生花，平凉人，早年在平凉著名的穆大阿訇是他的族祖。他弟兄四人，两兄早亡，他和四弟生辉共同生活。当他年轻念经的时候，伏羌（甘谷）南关有个马二阿訇很有名，回民通称为关里爷。从甘肃各县远到云、贵、川、陕，很多回民青年到伏羌来求学。生花也在他门下受教，因而交识很广。卒业后，秦安莲花城的同学邀请他到莲花城去游玩。这里是秦安有名的镇子，东连马家河、马家堡子、龙山镇、马黑瞒、川里王；西连上下梁山、杨家去、杨家崖边、斜头上、樱桃沟一带。过龙山镇则属清水的张家川、马家窑、甘头川、李家山、白沙镇；北连静宁属之仁达川、雷大湾、滚八儿等地。虽然山谷错杂有九沟十八岔之称，但四通八达，土地肥沃，人物殷富。回民聚居在这里的有王、马、杨、李、张、田、苏、麻各姓。王、杨、马三家尤为其中的大族。生花一到，看中这里的风景优美，人情浑厚，就卜居在距莲花城二里多路的杨家店子，做开学阿訇，深得远近回民的信仰，大家呼他为“平凉三爷”或“杨家店子三爷”。

清同治元年，正是太平天国的末期。太平军赖文光部从湖北

进入汉中，攻破阶州。同时甘肃西宁回变未平，陕西渭河南北回民起义又起，因此谣言大兴，说："西北回民和云南闹事的杜文秀连为一气，勾结太平天国扰乱西北。地方长官奏闻清廷，清帝震惊，要用兵惩办回民。"回民闻此风声，惶惶不安。清官吏又配备营兵，在靠近回民的乡镇驻扎，还大办民团，严加防范。营兵素无纪律，办团的又大半是劣绅恶棍，他们兴风作浪，倚势逞刁，常借盘查匪类为名，到处肆行讹诈，遇操外省口音的人，便指为太平军奸细，弄得商旅裹足不前。若是抓住一个异乡人，就给回民以包藏"长毛"之罪，严刑逼供，被摧残而死的日有所闻。即使没有抓到异乡人，也是翻箱倒箧，随意掳掠。另外他们还用"鸡毛传帖"到处煽动。传帖上写着："要除大害，扫地寻针，起土三尺，斩草除根，一寨连一寨，把回子赶到西口外"。回民发现这样传帖，更加惶恐起来。

同治元年夏初，甘肃清水李德仓、固原纳三、盐茶（海原）田成吉、预望马兆元一时俱起。清军及各地民团对回民压迫更甚。在这种情况下，宁夏金积堡马化龙派长子耀邦和固原王家团庄的王大桂阿訇同来莲花城和穆生花商议对付方法，约定各自集众准备：秋天，耀邦从灵武南下，生花从莲花城北上，取得平凉再定行止。耀邦等走后，生花在莲花城作军事部署。因回民中世传"十回保朱"的故事（常遇春、胡大海、沐英、铁铉等10人都是明初勋臣），对明代重用回人有好感，遂以扶明抗清作起义的宣传，所用文书，都以崇祯纪年，不用同治年号；挑选各庄青壮年为战斗兵，以原有的头目人为带队头人。适有云南回民纳尚邦，精通武术，膂力过人，带武术家8人来甘相助。生花以尚邦为先行，定期出发。临出发时，给部队作了"仇恨只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回汉本是一家，照常亲爱，不许伤害欺凌，更不许烧杀抢劫，如有犯者绝不饶恕"的约束。原拟从张家川东赴平凉，因为在"扶明抗清"的号召下，曾联系伏羌、巩昌、岷州、西和、礼县一带

的回民同时并起。不料起义的群众尚未完全集结，镇压的清军和民团已经在分头防堵。他们虽然击毙了秦州（天水）州官托克清阿，攻克了不少秦州南北山寨，并击败清副将李玉珊、参将范铭兵于郭家河，但沿途被堵截，不能畅行，并且在常家圈子乱骨堆之间与清军激战，死亡特重。生花以这样步步作战，损失大、费时久，恐延误会攻平凉之期，遂掉转马头改取静宁道路前进。当退回莲花城时，虑部队北进后清军到莲花城抄家，即扶老携幼，拔眷而行。行抵扯扯沿山（静宁），地形异常险恶，清军追及，矢石交飞，从后猛攻，生花部队知面临死地，人人奋勇争先，双方拚死决战，损失均极惨重。其最伤心惨目，令人永不能忘的是生花所携数以万计的老弱妇孺，飞崖落坎，填满沟壑，能生存者寥寥无几。生花至此，辎重全失，残余部队大有饥寒交迫之势。幸清军亦因损失过大，再未穷追，生花始得稍舒喘息，继续前进。途中招集溃散，吸收新众，由于各地人心动摇，部队很快就得到补充，声势又壮大起来。过静宁阳三川时，攻破堡寨，烧了团头王瞎熊母亲的牌坊，提取了堡内的存粮，于是士饱马腾，进入固原，联合固原回民，一直奔向平凉。

是年十二月，生花部队到达平凉，东关回民群起响应，焚毁平凉城外的太平、岨峪二桥。城中民团在昏聩官吏的嗾使下，屠杀了城内回民，并杀了回绅曹晏礼，这更加深了民族间的裂痕。同时汉民团从东西两路来援。穆生花派固原石家沟回众伏空堡中围杀东路民团几尽。西路民团闻信掘生花祖墓，聚骨骸焚灰扬散。生花痛极，决计要攻克平凉。适清总兵吕元率甘凉兵到达，入城坚守。生花因马耀邦南下之兵毫无动静，度平凉一时不能攻下，清军四面来援，独力应付有困难，不如退取固原，作为根据，再图平凉。遂于是年除夕，串通固原城内回民，打开城门，杀巡道万金镛、千总张凌汉、朱殿勋等，据有固原，修葺城池，为持久计。是时岷县马屋的张满拉（一说是宁远新市镇张满拉）在盐关

镇，马圣清在伏羌，铁正国、李承思在龙山镇，马化龙在金积堡，生花弟生辉在秦安通渭间，和生花相呼应，清官吏穷于应付。同治二年二月下旬，生花再围平凉，四月击溃清总督熙麟所派援军，八月中秋攻克平凉，杀总兵吕元、知府田增寿、千总徐魁，士民死者甚众。

先是，同治元年十二月，生花围攻平凉，消灭了东路民团，占有大教场。有人献计造木制大炮，内装弹药，支向城墙。炮后准备精壮兵士，乘炮火冲开缺口涌进。不意数十木炮炸开，弹药倒射，反受损失。清军及民团又乘势从城内冲出，教场无险可守，阵角大乱。幸纳尚邦及所带武士奋不顾身，左冲右突，清军不敢过于相逼，部众得以保全，而纳尚邦等均于是役战死。生花因锐[4]受挫，退而袭取了固原，大加修葺，作为进攻和退守的根据。时有湖南柳某前来投军，生花用为谋主，言听计从。二月，清凉州镇总兵万年新驻防盐茶，招生花部众投降。生花伪与接洽，意在麻痹清军。而柳某密与团庄王大桂阿訇通某清军，杀盐茶起义回目马兆元，动摇军心。事为生花发觉，急进兵击杀万年新，同时杀柳某，搜捕大桂。大桂情急纵火自焚，军中编出“王阿訇心变了，草胡子火炼了，大教场揭面了，王阿訇烧烂了”的歌谣，斥骂王大桂的无耻变节。旋即联合白吉塬、铜官镇、宁州各地回众进围平凉，终于是年八月，达到生花攻克平凉的志愿。

穆生花先后向平凉进军，马耀邦始终未率部南下，马化龙扩建金积堡城为保生寨，在城内大兴土木，修建住宅，与宁夏纳家户等处回众攻破宁夏灵州，自谋发展。同治二年五月，陕回西上，占据董志塬。清军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各部先后入甘。三年五月，经过几度激烈战斗后，平凉被清军收复。未几，固原亦因张堡隆叛变失守。生花退至灵武与马化龙父子相见，谋重整旗鼓。化龙父子对之非常冷淡。生花无可奈何，挥令各寻出路，自己留住灵州，愧恨成疾，不久逝世。残部流散到张家川，为李德仓所

收容。后来雷正绾、曹克忠攻破张家川、莲花城各堡寨，李德仓降清，所部编为南八营。同治十年，全省平定，清政府分别把他们安插于张家川、龙山镇、沙沟、化平、海原等处务农。

马占鳌的起义与投降

马　培　清

清同治间（1862—1874年）甘肃回民所发生的事变，是一次严酷的民族斗争。起事的中心地点有西宁、宁夏、肃州、河州四处。后来西宁、宁夏、肃州的领导人都遭受了血腥镇压，惟河州的马占鳌不但无灾无害的善终，并且其子孙当了七八十年的封建军阀。这样离奇侥幸的事例，鲜明地表现出马占鳌的作法是投机取巧，心计独工，也说明了清王朝的政策是以回制回，阴险毒辣。这一事变的起讫，去今已过百年，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传闻。不过本人曾在马占鳌的长子马安良部下从事多年，多次听到马安良讲述他父亲的故事。

马占鳌是河州（今临夏市）摩尼沟何家庄人，先世念经，家道贫寒。他开始在本地念经，随后到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留学。那时政治腐化，在陕甘的大小官吏，强半庸劣贪鄙。其当权的将军督抚纯系满人，昏昧无知。遇到民族问题，经常揣瘦掂肥，歪曲偏袒，各地回汉人民极不能平。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战火四起，西安交通四达，不能不受影响。陕西回民在剥削、压迫和歧视之下，秘密酝酿起事，占鳌在留学中曾经有所见闻。穿衣（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能言善辩，敢作敢为，得

到教下的信仰。他虽然贫寒，却有个很有钱的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剥削穷人，群众极为不满。占鳌经常劝叔叔放弃债权，并暗中让穷人抗债不还。叔叔向穷人追讨，占鳌就引用教义，斥责叔叔违背经典，扬言要杀他，终于使叔叔屈服，烧掉了穷人借债的约据。这样一来，他更得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好感。

咸丰年间，土门关内的藏族互相掠夺，引起清政府迭次在西宁的用兵。接着巴燕戎格（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回族马尕三暴动，北至西宁南川，东到河州积石关大掠。占鳌集合邻村回民抵御，屡次取得胜利。大家认为他有勇有谋，又是通晓经典的阿訇，就自然成为当地回民的首领了。到同治初年，清朝政治愈加腐败，对西宁巴燕戎格的事变，忽剿忽抚，兵行所至，捐输、差役，骚扰不堪。及至陕西回众起事，太平军此时也进入西北地区。久困暴政的河州回民再不能长此忍受，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在东南乡回民首领马悟真、南乡首领闵殿臣（即闵阿訇）等率领下首先起事，围攻河州不下，请求马占鳌援助。占鳌倡议，反清不是寻常的事情，要河州的各“门宦”都拿出力量，领导大众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于是东乡北庄门宦的马悟真、太子寺洪门门宦的马万有、八坊花寺门宦的马永瑞等公推马占鳌为帅。从此，摩尼沟阿訇马占鳌自称“都招讨”，成为领导河州暴动的中心人物。

同年十一月，马占鳌即被推为主帅，发动各门宦的力量，再攻河州城，由于城中有充分准备，久攻不下。撤退时，占鳌的二弟被前面的矛头穿入体内，挣扎不脱，大喊阿哥赶快救我。他见事势危急，回答说：“你向胡达（真主）归顺吧，以后阿哥给你报仇！”城上听见这个人是马占鳌的弟弟，就投下油棉焚烧，在城下活活烧死。因此，马占鳌同河州守城的清军结下了杀弟的深仇，决心要把河州拿下来。不久，在休整之后，他又把人马集中到河州城下，考虑到破城后汉民会遭到残杀，就和部众立下禁约：

"入城后对俘虏只要顺随回教，一律保护，不准乱杀。"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攻入河州城时，对城中居民伤害较少，汉民均顺随了回教。马占鳌降后向左宗棠述说了当日情形，左对此大为赞许。

占鳌攻破河州后，东西乡的门宦和群众都信服他有办法。他的势力从北面扩展到黄河沿岸，东南扩展到洮河沿岸。这时的陕甘总督熙麟，除了派人抚谕讲和外，没有一点办法。

事情越闹越大，正当陕回被迫西来入甘，占据了董志塬，致使甘肃回族到处燃起战火，追随占鳌的人越来越多，成份也日趋复杂。很多人由于冲破了旧日官府的约束，就凭人多势重，任意妄为，常常奸淫掳掠，残杀无辜。尤其东乡的一部分表现得特为恶劣。占鳌对这种情况极为不安，曾经到宁河城（今和政县城）召集部众讲话，大意说，大家开始起事时赤脚上穿着麻鞋，拿的是一丈多的矛竿子，是从艰难困苦中来的，如今大家都抢富了，脚上穿的是羽绫靴，身上穿的羽绫马褂，都惜钱爱命起来了，出去不好好打仗，只打算挖地窖，把矛头变成铲头了。东乡头目听了大为不满，认为占鳌故意辱骂他们，鼓动群众包围占鳌，扬言要杀他。幸有东乡三家沟的一部分群众挺身保护，并劝告大众说："现在要顾全大局，内部万不可闹意见，分散自己力量。"这样苦苦相劝，才解了围，把占鳌保出宁河城。占鳌临走时说："既然东乡对我有意见，以后我就守积石关，守循化，河州的事我再不管了，你们另推元帅吧！"从此他愤然离开河州城回到大河家去了。

占鳌退回大河家，河州的事情由东乡和八坊的头目处理，失去统一的指挥，内部闹不团结，彼此不服，部队自由行动，毫无纪律。事情越弄越糟，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正月初，清朝左宗棠军入甘，总兵傅先宗、徐文秀等从临洮一带渡过洮河，占领三家集，进逼太子寺，大有一鼓荡平河州之势。河州的各头目在

节节失败之下，大家商议，仍请马占鳌回河州负责指挥。占鳌提出“凡作战不力，不遵守约束的定要杀头”的严格要约，并且说，口说无凭，如果真诚受我指挥，须向我纳经（即抱《古兰经》发誓）。大家接受了这个要约并纳了经，占鳌便同他们回到太子寺，主持攻守计划。

占鳌这次到了太子寺，首先调查失败的原因，搞清责任，杀了三个作战不力的“先行”，另派先行官反攻进逼的湘军，仍被湘军击败，又杀了两个先行官，乃亲自带上他得力的帮手马海宴到前线侦察。他看到40多营湘军分布在太子寺南面20多里的路坡，坡上较高的山峰都被湘军占领，中心有一个稍低的山峰没有军队。侦察以后，占鳌挑选了300名最好的枪手，交马海宴率领，夜间潜入新路坡，占领了这个山峰。那时正是严冬季节，地皮冻结，无法安营，又密派1000人送土坯，挑水，在一夜之间砌墙浇水，筑成光滑坚硬的冰城。枪手们有了很好的掩护工事，安排了足用弹药，准备天明应战。湘军因屡胜而骄，一夜未曾发觉，待天明突见回军插进他们的中心，在前线督兵的新任河州镇总兵傅先宗既惊且怒，立即调配部队亲自督战。马海宴在湘军围攻中，沉着应战，毫不惧怯。他把300名枪手分为两部，150人持枪射击，只射不装；150人轮装弹药，只装不射。因为所持的是旧日线枪，这样做就可以连续射击，不给敌人一刹那猛扑的空隙。并严令枪手看先行官的动作为进退，先行不开枪，别人不能开枪。因此，湘军几番进攻，都败退下来，死伤甚大。傅先宗是湘军中著名的勇将，他看到死伤多人，攻不下一个新立小垒，一怒之下，亲掌大旗勇猛冲锋。马海宴见来势凶猛，命枪手瞄准射击，立将傅先宗打死阵前。傅先宗死后，后路西宁镇总兵徐文秀继续作战。次日拂晓，马占鳌率领大军由外面围攻，马海宴指挥枪手从中冲杀，白刃相搏，杀声震天，战斗异常激烈。湘军内外受敌，阵势大乱。徐文秀力图挽回颓势，亲自奋勇冲杀，仍被枪手打死阵前。进扎新路

坡的40营湘军就这样全部溃败，回军得了不少的军用物资。此后，湘军退守三甲集，马占鳌进驻马里庄，战事告一段落。后来谈及这一战役，马占鳌把他所利用的战术名为“黑虎掏心”。

驻定马里庄以后，马占鳌召集紧急会议。所有前后方参加这一战役的头目都以为他们打了大胜仗，一定是研究如何进攻的方法。不料会集以后，占鳌突然提出投降问题。大家听了都很吃惊，立即质问：“我们以前屡打败仗，还要坚持斗争，如今打了这样的大胜仗，为何却要投降？”马占鳌说：“陕西的白彦虎失败了，宁夏的马化龙也失败了，陕西已告肃清，甘肃也大半平定。我们只剩河州和西宁两个地方，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况且已经闹了10年了，再不想结束办法，究竟闹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他们一定少办善后（即镇压一批起事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等到失败了才投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恐怕死的人不少。”说到这里，多数人还不同意，还有人主张攻过洮河，再看形势。占鳌说：“我们一直往下搞最后目的是甚么？如果说一直要战到成立国家的话，必须选出一个皇帝来。坐皇帝我可不行，大家如能选出个令人心服的皇帝我愿意扶持，我们就一块儿干到底。不然的话我看还是早点投降的好。”说到这里，大家虽然知道终究得走投降道路，但仍有人主张把三甲集的驻军赶过洮河，叫他们更知道我们的厉害，然后再议投降。占鳌说：“够了！只是这一个胜仗，已经助长了大家的骄气，忘记了胜仗中曾有不少人死亡；再打个胜仗过洮河，那一定会再死亡一些人，然而大家却只知胜不知败，话就更难说了。”马占鳌就这样再三开导，终于决定了一个胜利后而投降的历史“创举”。

投降问题决定之后，当夜即请文案马镛写好投降禀帖送投三甲集的左军。这时左军在失败之后，损兵折将，惊慌万状，正计划向河东撤守。统兵的山西人陈湜出乎意外地接到投降禀帖，将

信将疑。对来人指示说："你们如果真心的话，回去告诉你们的头目，立即挂出免战牌，双方停战，再派头目到安定大营去见左帅，请求收抚。"占鳌得到这一指示，召集各头目商量去安定大营见左宗棠的人选。占鳌表示自己亲自去，各头目均不同意，讨论结果，决定派头目的儿子先去。于是选出马占鳌的长子五七（即马安良）、花寺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洪门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等10个人，次日即通过陈湜赴安定去见左宗堂。当时称为"投降的10大少爷"。

自从新路坡战斗之后，部分回民已经偷过洮河抢掠，河东各地人心惶惶，极为慌乱。驻在安定大营的左宗堂得到失败消息，十分焦急，或赶派援军，或暂撤过河，尚自踌躇不定。突然接到投降禀帖，并有头目的10个儿子来见，真是喜出望外。他断定这是真心投降，不再是缓兵之计，当即欣然接受。在谈话中知道占鳌的儿子五七还没有大名，就当面给他起名叫"马安良"，还赠了"翰如"的表字，对这10个少爷说："你父亲能真诚悔罪，率众归顺，很好很好，我一定接受他们的诚意，好好招呼。现在我就要进兰州，回去告诉你们的父亲，叫他们不要害怕，都来兰州见我，商量善后办法。"于是这10个大少爷很满意地回到河州。

马安良等10大少爷从安定转回河州，马占鳌即照左宗棠指示，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宴等12人赴兰州，住绣河沿清真寺。报到以后，左宗堂随即传见。占鳌自带铁索向左叩头，左宗堂惊问左右："谁叫你们锁他？"左右都说不知道。占鳌哭着说："我有万死之罪，应该上锁，是我自己带的锁。"左宗堂即吩咐左右当堂开锁，向大家一面晓以大义，一面还作了一番安慰。12人同声说："我们罪恶大，应该严办。"但马占鳌却说，罪恶在他一人，其余人众都是他裹胁的。左说："你们今天洗心革面，过去的罪恶都可以洗刷。"于是，左分别赏了他们六品军功的顶戴，带罪立功。

那天夜里，左又传占鳌一人去见，由戈什们领入左的卧室，左躺在床上，占鳌跪拜后起立，左命坐，占鳌不敢坐，站在床旁。左向他询问起事原因，询问为何强迫汉人顺教。占鳌说："起事为的自卫，要汉人顺教是借此保护汉人。"左听到占鳌这样解释，觉得这个方法很有作用，便喜悦了。接着说："你这个办法也对，你能明大义，又能率众投诚，这是很好的。不然的话，大军进讨，要斩草除根呢。"随后又问占鳌："如果我不接受投降，三路进攻河州，你将由什么方法防御？"占鳌不敢回答。左鼓励说："你不要怕，尽管说，将来我要你为国家报效呢！"占鳌说："大帅如不准投降，我们就决以死战。"左说："你决以死战，总得有个办法。我要问你是怎样应战哩？"占鳌说，他们还有若干人马，前方如何布置，后方如何准备，还要抽出一部分精壮人马，去扰乱后方。左听得笑了，在占鳌肩上拍了一下，要占鳌坐下细谈。占鳌遵命坐定，一直谈到天明。最后命占鳌荐举诚实可用的人员。占鳌分别推荐了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海宴等，然后退出。

马占鳌回到住处，给大家说明见左经过，并商量接受官职任务。惟马万有不愿受职，他说："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我只要保全性命就够了。"以后左宗堂给马占鳌编了三旗马队，以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管带，马悟真为左旗管带，马永瑞为右旗管带，归河州镇节制；调派马海宴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从此他们就由投降而做官，率领骑兵参加刘锦棠西进镇压回民起义的部队，由循化进入化隆、归德、碾伯，最后进入西宁、大同，结束了河州、西宁的事变。这次事变的起讫，经过10余年时间，左军每克服一处，都办了严厉残酷的"善后"。惟河州因左宗堂赏识马占鳌的投降，只令赔修了在战争中摧毁的城墙、庙宇，过去的罪恶一概从宽免究。因此，马占鳌父子对左宗棠的感戴真是达到了沦骨浃髓的程度。

以上是马安良经常对人谈说的发迹故事，我听到的不止一两

次，特别追忆叙述如上。当然儿子表扬父亲或许有点夸张。不过河州这番新路坡的战斗及其战胜后而投降的经过，不管汉回传说，还是别的记载，大体相似。

此外，这次事变，汉回人民被封建官僚挑拨离间，互相残杀，死亡的人确实不少。根据临夏市政协所提供的材料看，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马占鳌攻破河州城，城内就死亡了1万多人。同治六年(1867年)陕回杨文治、马士彦等在董志塬失败，分窜河州，人数众多，马占鳌等令其分驻四乡，叫随教汉人供给粮食。陕回因无家可归，起了夺取随教汉人产业的思想。那年冬天，马悟真的弟弟人称三师父的，到北塬上开会，表面上说要陕回和随教汉人和平相处，却阴谋叫陕回杀死了数十名汉人，夺取了财产。四乡随教的汉人听到消息，集结到烟囱山，准备逃向藏区。马占鳌探悉这种情形，纠集回军4万多人，围困烟囱山，把数万随教的汉人完全杀尽。等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马占鳌投降左军，却说他强迫随教是保护汉人，这就和我所听到的事实大相径庭了。

总之，马占鳌等投降效忠，弯弓反射，杀自己的同教同族，做清统治者的奴才，换得了父死子继的富贵荣华，说明他是善于投机的阴谋家。

李德仓与陇南回民起义“南八营”

袁　思　维

李德仓领导的张家川回民起义军与“南八营”的史料在民间广为流传，见于史载的却不多，有些史料偶而涉及，也是只言片

语，一笔带过，难有详尽的记述。为了对李德仓及其所领导的这支回民起义军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仅就笔者所见、所闻之零散资料加以整理，以供有关专家参考。

李德仓其人

李德仓（1827—1896），回族，甘肃清水县李家山村（现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管辖）人，人称“李大帅”。

清同治元年(1862年)，清军在陕西屠杀回民时，张家川的回民被迫自卫起义，李德仓被推为首领。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秦安县莲花城被清军攻克，首领穆生辉兵败自刎，余部投奔李德仓，又陆续汇合伏羌、巩昌、宁远、盐关、两当等陇南一带的回民起义军，在陇西豹子川整编为八个营，号称“南八营”，推德仓为大帅，率“南八营”转战南北，誓与清军对抗，颇具声威。

同治六年(1867年)年底，迫于清军残酷镇压，为广大回民的身家性命计，李德仓在硝河城（今宁夏西吉县境内）率众16万人向清军投降，还居甘肃省张家川，受清廷派遣仍约束所部回众。后得左宗棠的赏识，被钦封为武翼都府，赏戴红顶花翎四品衔，并恩准有越级呈禀之特权，成了清廷在张家川的代理人。

此后，他广置田产，开设“得盛”系列商号10余家，成为地方豪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病殁于家，终年70岁。由其子李占鹏袭其余荫，至解放前夕逐渐衰败。

张家川回民起义的原因

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陕西陇州固关回民风闻关中回民被清军屠杀，因人少势孤，不敢留住原籍，遂携眷离境，翻越陇山，取道清水之麻池（现归张家川县管辖），欲就近来张家川暂避战乱，以观局势变化。其中丁壮300人，余皆妇孺老弱，行至恭门镇（现张家川管辖），适逢秦州知州赵桂芳率兵300堵截，双方

触战，赵桂芳败退清水城。① 固关回民直奔张家川城，要求收容。城内回民唯恐惹起祸端，不敢收留。他们只好停留在城东5里之上磨村。此时，他们得到上磨村附近的王家堡汉民头目王平安的接济，得以暂住。固关回民对汉民的接济甚为感激，曾编出一段顺口溜表达感激之情，其词曰：

骑耕牛，过关山，
大营扎在上磨川，
……
王平安真好汉，
一笼油，两装面，
由你吃，由你站（住）
……

由此可以看出，固关回民确是为躲避战乱而来。当时，张家川地区的回民相安无事。不料，当年十月，清军参将范玉春复率大军前来张家川剿杀。在这紧急关头，张家川回民被迫自卫，公推董家坡人李朝栋为头目，出城迎击，协同固关回民在城南10公里之瓦泉沟与范部接触。“冲败官军，军械多失。玉春退住清水城外。”② 张家川回民头目李朝栋阵亡。接着事态愈演愈烈，张家川及固关回民完全集结于张家川城内，并在城周围挖壕引水，栽排木栅栏，并编群众为中、前、左、右、后五营，推衙役出身的李德仓为帅，做好防卫准备，誓与清军对抗。

清军进剿张家川

张家川、莲花城、龙山镇一带燃起的反清烈火愈烧愈旺，使清廷深以为虑：“……莲花城、张家川等处……若不痛加剿洗，徒事羁縻，适以遂其奸谋，将终无了局耳。”③ 同治三年（1864年）清廷不顾固原城吃紧，急调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等精兵良将筹攻张家川，一时大军压境，旌旗密布。自七月十四日起，大雨

连绵，二十八日始霁，清军不顾道路泥泞，进军急切，八月初一日即拨劲旅，先夺取田家山制高点，又转攻木城。回民军在城头用炮石纷投，清军猛攻不克，范玉春头部受伤，因暴雨忽至，清军传命收兵。初二日，清军全部出动，攀拽木城，裸体奋进。城内起义军照例以石块、火炮猛投，加之龙山镇回民军在城外支援，又使清军大败。初三日黎明，清军部署战术：由总兵谭玉龙、胡大贵等去南山列阵，以截上山之路；派总兵张在山、陈开泰等率兵越壕狠扑；派副将刘效忠等各带队往来游驰，以引诱而防援；陶茂林率余部高踞田家山制造声势。清军按既定方略同时行动，鏖战一天，清军用火器焚毁木城，一齐拥上，双方激战，各死伤1000余名。至晚，清军遂架云梯，火器竞发，不料城中回军火药库引爆，起义军烧毙无数，其余惊溃不已，开西门直奔龙山镇。清军乘机攻入城内，“并拦途截杀，前后夹攻，约死五六千名，投井自缢、焚毁者更难以数计。”④从攻城至城破，回民群众死亡将近万余名。

“南八营”的形成

与张家川回民被迫起义的同时，毗邻的秦安县龙山镇、莲花城的回民亦在穆生花、穆生辉、李承恩、铁振国的率领下相继起义自卫。一时间，伏羌、盐关、巩昌等地回民也汇合于这几支起义军内求得保护。

当张家川城吃紧之时，龙山镇一带的回民曾前往支援，在城外与清军周旋。城破后，他们又与城内突围的回民群众一起连夜退守龙山城内。雷正绾与陶茂林商定：趁其疲惫，疾驰追击。遂抽出三成部队由陶茂林指挥，留驻张家川继续镇压，其它七成清军由雷正绾带领跟踪追杀至龙山镇。因龙山镇地形复杂（相传为古街亭之地），城坚壕深，孤立无连，周围将及10里，进攻非易，遂驻城外各关口把守，轮番进攻。起义军一面与清军作战；一面

在城内稍事休整。后见清军又增派兵马压境，“自知难敌，遂于初七夜开门潜遁”，⑤直奔莲花城，与莲花城回民军汇合。莲花城地处山沟，易守难攻，清军调集大队人马经过两个月鏖战，十月初六日莲花城破，清军大肆杀戮，回民群众死亡几千人，妇孺老弱跳崖者惨不忍闻。莲花城回民军首领穆生辉因兵败自杀身亡。幸免于难的回民群众纷纷投靠李德仓部。李德仓率部进入陇西，陆续汇合两当、盐关、伏羌、巩昌、莲花城、龙山镇等陇南一带的回民群众，在陇西之豹子川休整半年，整编为八个营，号称“南八营”，公推李德仓为大帅。此后，李德仓便率“南八营”转战于张家川、秦安、平凉、固原、宁夏、灵州等地。

李德仓与捻军联合抗清

李德仓曾经与捻军有过几次配合作战。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与清军正在凤翔、周至一带作战。这时，李德仓在毗邻地区举起义旗，给清军以有力的打击，牵制了一部分清军，无疑是对太平军的有力支持。

第二年，当太平军在周至失败，向南撤退之时，李德仓率部进入陇州之神裕河，截断清军粮道，阻碍了清军的行动，以利于太平军的撤退。

此外，李德仓部与捻军有过一次更大的、直接的联合行动，就是在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李德仓部进入凤翔、汧阳、麟游一带，在凤翔与捻军仅有一河之隔，并且已有过河会师之议，不料机密泄露，清军急调刘松山、谭玉龙合力堵截，终未实现。接着，回捻两军同时向东移动准备联合作战：“惟据擒贼供称：回捻合谋，欲以捻逆窜同州、朝邑，回逆扑犯省城。”⑥清廷急忙调兵入陕，一面令在陕之刘松山等追剿于后，郭宝昌等围截于前。

回捻两军在三原至咸阳间被冲散，致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留下了各民族共同抗击清军的史话。

李德仓降清

李德仓率“南八营”长期转战，清军穷追不舍，迫于清军大肆屠杀，为数十万回汉群众身家性命计，李德仓遂于同治六、七年之交率众16万人，在硝河城（今西吉县境内）向清廷求抚。清廷派张瑞珍、王得胜前往招抚。“瑞珍按册稽点，实得九万六千二百余人，其中汉民协从者三万一千五百余人……。回众陆续因饥饿病患死亡，尚存三万一千余人，皆愿回原籍。瑞珍以回众旧住秦安、清水所辖之张家川等处，令其各认旧产生理，遣李德仓严束所部。”⑦约于同治七年初，回众辗转回到张家川。随之安插在张家川的还有盐关、伏羌（甘谷）、巩昌（定西）、莲花城等地的回民群众。清廷按口计粮，大口日给粮半斤，小口六两，秋后停止。

当时，清政府对投降回民限制极为严格：由地方官选择荒绝土地、无汉民居住地方安插，查明户口，点名造册，每良民发一“良民牌”，一律设立十家长、百家长进行管束。由地方官发给号签方能出门探亲、入市交易，不准三人以上聚处。出州县须有路票以备查验，逾期不归者，按律治罪。有亲友到家，须报经百家长方能招留。不准私养骟马、私藏枪炮军火，一经发现，按律论罪。直至光绪二年，张家川回民群众按历史惯例，请票去陕西赶麦场，清水县令高蔚霞以“结众不便”为由，不予放行。而西去凉、甘、肃各州及关外则一律明令禁止，回民群众几乎失去一切人身自由，忍辱屈从，苟延残喘。

向清廷上万言书

李德仓降清后，清军尚与陕西、河州等地回民起义军作战，因张家川地处关陇要道，常有回民经过，或有零星回民群众前来

躲避战乱，李德仓曾暗地给以接济，引起清廷对他的严加防范。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底六月初因龙山镇、马家堡、马家河等村庄的回民收留河州回民周瑞（名七十）所带1000余人，驻在康坪寨抢收小麦。适逢吴士迈由陕入甘，剿杀驻在康坪寨的河州回民，有些河州回民被当地回民藏匿，清廷因此迁怒李德仓，大加斥责："李德仓就抚以后，心怀两端，早已认识……纵该匪不听约束，亦须据实禀请官军分别剿办，率同良回助剿，方可自脱干系。乃竟糊涂至此，装聋做哑，将谁欺乎？"⑧加之在此之前，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陕西回民起义军首领崔伟、禹得彦、陈琳、马正和等请李德仓代为求抚，李德仓遂有复信。不料，此信落入敌手。同治八年初，左宗棠就此事批道："李德仓所致禹、崔诸逆书，昨已于贼巢中搜得，其为陕回、甘回及自为之计，亦可谓工矣，而卒不免于败露……"，⑨此时，李德仓非常恐惧，召集部下文人撰写了一封禀帖，申述自己被迫应变的苦衷和投降诚意，于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派苏生杰持禀帖去西安面见左宗棠。相传这一禀帖长达万言，当时被人们引为杰作，竞相背诵，可惜今天难见全文，直至全国解放时，有些老人尚能靠记忆背诵片段，现抄如下：

"我大清临御以来，列圣相称，回汉两教一视同仁。自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以来，有白莲教、八卦教、长毛、南蛮、李顺达、蓝天顺前后叛乱，是皆汉民叛逆，未闻我回民作乱者也。自同治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陕西同州赵老五与回民有隙，因砍竹竿起事。长毛残部窜入陕境，皇上有令，到处防御。赵老五不许回民砍竹竿，只许汉民砍竹竿，两下相争而打架，回民打死汉民一人，汉民打死回民两人，回民上衙告状，其官不分黑白，将回民打押，回民呕气不过，又和汉民打架……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沿路一带设立铡子会，到处铡回。此刑比唐吏之铜驼铃⑩、商纣之炮炉刳剃歹有甚焉！彼时回回欲翔

无翅，欲潜无源，势如穷途，激成变乱……我回民自唐以来迁入中国，食毛站土一千余年，安忍甘心叛逆？……翻来复去，昼夜思量，终乱于几时？……故此前来投降。至于收回一事，如汉武侯渡泸水恩服南蛮，宋曹彬下江南德感李煜，譬如白起收赵一事。我回民虽愚，因愚而有预备，今口里口外回民不下百万，战将不下千员，不争江山，不夺社稷，意欲杀尽贪官污吏、团练之匪首，然后甘心。……我回民文不下阁台之铨，武不下武略之才……溯水思源，应效蛟人谛，……叫回修盖礼拜寺，内设万岁牌，一则报其皇天原造之恩，二则报其皇王水土之德……恳祈公保大人转呈皇上皇太后御前，回回感其教，汉民感其德。”

左宗棠看了禀帖颇为赞赏，当面赠苏生杰乘马一匹，盘费白银50两，并嘱转告于李德仓，他到平凉时亲自来见。左宗棠恩威并施，使李德仓感激不已，便于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亲赴平凉，面见左宗棠，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被赏戴红顶花翎四品衔，诰封翼都尉，并恩准有越级呈禀之特权，成为清廷“以回制回”的工具。

因李德仓“约束有方”，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又将在西宁投降的陕西崔伟、毕大才两部回民分两次解到张家川一带安插。崔伟部被安插在恭门镇一带，毕大才部被安插在龙山镇附近。从此，张家川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回族聚居区。

河州劝降

同治九年（1870年），李德仓上书左宗棠，请求亲赴河州劝马占鳌、马永瑞等投降。左宗棠虽然同意，但又提出了条件：“趁大军未至，先自行悉缴马匹枪械，平毁堡寨，头目人等自缚来营，才算真心就抚。若经该李再三劝说而后就抚，只能算作该李招抚，而非河回求抚，是断然不能准许的。”给李德仓出了一道难题。

同治十年（1871年）一月，马占鳌、马永瑞禀请李德仓前去河州议抚，由于在禀帖中申诉了从前冤抑，归咎地方官办理不善，而对如何尽缴马匹枪械等项只字未提，致使左宗棠不悦，并且因马占鳌在给李德仓的信中写了“今天悉金积穆民设计收抚，一概受诛，并无漏网一人”、“如蒙大冤，勿效金积之样，实心收抚，无不踊跃向化”。⑪更使左宗棠恼火：“官军既是设计，他不中计就是；官军既非实心，他不实心就抚就是。”⑫李德仓旋自折回，自行失败。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左宗棠发布了进军河州的檄文。此时，李德仓又请求赴河州劝降，左宗棠仍批示：“听其自投，不可招致”、“德昌行至洮河东岸，马尕大等递呈求抚，适逢河西用兵，德昌给已，德昌亦疑抚局有变，忿惧而归。”⑬后来，马占鳌、马永瑞求抚之心更加迫切，但左宗棠每以“不是真心就抚”为由，予以塞责。其实左宗棠内心早有主意：不管李德仓屡为河回请抚也好，还是马占鳌等再三求抚也好，早晚非用武力不可。他认为：一则河州系汉唐湟中之地，为历代军事要塞；二则兰州东、西、南三面被河州所包围，河州不靖，难保兰州安全；三则河回因距清军主力尚远，十年来一直未受重创；四则河回“嗜利轻剽”，不给点厉害，日后容易滋事。基于这些想法，在河州回民军未受创伤之前他是决不轻易令其就抚的，更何况“先剿后抚”是一贯手腕。果然，在夷平金积堡之后，左宗棠急切移营安定，督大队人马直刺河州，穷追猛打，在尝到河州回民军的厉害后，才以马占鳌、马永瑞等十大统领的十个儿子为人质的条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接受了他们的投降。

扶持哲合忍耶教派中兴

关于李德仓投降的原因尚有一说：相传李德仓在穆家营（今西吉县）时，曾派马义林（绰号红房大老爷，张家川西关人）、苏

师傅（张家川崔家村人）二人前往金积堡与马化龙联系，欲投其部下。马化龙自虑与清廷结仇太深，恐后果危险，乃嘱李德仓先设法投降清廷，仍还居张家川，万一他将来失败后，哲合忍耶教派也有个归宿之地（李德仓及其南八营的回民为该派教徒）。

马化龙被清廷残害后，哲合忍耶也在明令禁绝之列。同治十年（1871年）一月，左宗棠发布告示："惟马化龙父子兄弟以新教惑众……查新教本是回教异端……如仍敢行新教……谓官军将尽歼回族，尽灭教门。"⑭字里行间一片肃杀气氛！因而该教派当时正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就在哲合忍耶教派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确实是李德仓冒险接纳庇护了从云南逃亡到张家川的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并把他们收留，住在自己的家里，后来允许他们在张家川北山建家立业，修建拱北，传播哲合忍耶的宗旨。马化龙的孙子马进西解送北京宫刑的途中，李德仓与马元章合力派人营救脱险，后来朝廷向李德仓索要马进西，令交出杀害解差的人。李德仓以清廷准许越级禀报的特权，与马元章商议，以"赦一人而万民安，杀一人则万民不安"为词上书清廷，保赦了马进西。从此，清廷不再追究此事，才使马化龙全家留下来的唯一的根苗幸存下来。这样，哲合忍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的后裔马元章、马元超；马化龙的后裔马进西全都免于追捕杀害，幸存下来。他们以张家川为基地，继承了先人的事业，从事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使该教派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转危为安，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兴时期。尽管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在当初是借助了李德仓这个保护伞的。

注　解：

①《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概况》
②《平回志》卷三
③《平回志》卷三

④《平定关陇纪略》卷三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平回志》卷四
⑧《左宗棠全集·札件》
⑨同上
⑩铜驼铃，即古代用铜铸骆驼立于宫门，唐武则天时，酷吏用铜骆驼作刑具。
⑪同上
⑫同上
⑬《平回志》卷五，左宗棠多次将李德仓的“仓”字改为“昌”字，故有时也写作李德昌
⑭《左宗棠全集·札件》

宁夏金积回民起义与马化龙

马　寿　千

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陕西关中回民在太平军和捻军的直接影响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甘肃回民也纷起响应，短时间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抗清中心，它们是：宁夏地区（当时宁夏属甘肃省的一个府）、河州地区、西宁地区（时西宁属甘肃省的一个府）和肃州地区。其中以灵州的金积堡（一作金鸡堡）为中心，以马化龙为领袖的宁夏地区是最重要的一个。当时谓：“各地回众皆观望宁郡举止，以为顺逆”，① “率视金积为向背”。② 左宗棠的军队也是首先从攻夺金积堡着手，进而镇压甘肃各地回民起义的。

19世纪中叶，宁夏回族无论在农牧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内部贫富分化的现象也更加突出，出现了不

少的地主富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进一步激化。

马化龙是宁夏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的大教主，世居灵州金积堡，依靠秦渠、汉渠的水利灌溉，占有广大膏腴之地。他还善于经商积累财富，伙友们往来于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以及北京、天津等地，交结回民中的“洋商”。马化龙凭借经济上的优厚实力和宗教上的特殊地位，又捐纳了一个千总的头衔，成为宁灵地区富甲一方、武断乡曲的最有势力的豪门地主。在宁夏其他回族堡寨也出现了不少地主富豪，成为各地区回民中大大小小的头目，其中有的还是宗教上的阿訇或是官府的员弁。这些富有的上层毕竟是回族中的少数，大量的还是生活不稳定的回族群众。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同治年间宁夏地区的回民抗清斗争，是由民族上层和广大贫苦回民共同发动，并且由民族上层所领导的斗争。下面就这次抗清斗争爆发的历史条件作一简略分析。

首先，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回民实行了严酷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使得包括上层在内的几乎整个回族同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有一触即发之势。历史上宁夏地区回汉之间“平日本无嫌隙”，而腐朽昏暗的清朝官府却人为地制造矛盾，挑拨回汉关系，借端凌辱回民。对于民间词讼，“任意出入其法，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葬银24两”，③造成回民极大不满。更有甚者，遇有回汉纠纷，“无知官吏不肯详细体察”，“但系回民皆目为贼”。④地方上的汉族地主武装团练，在官府的怂恿下，也往往借端对回民村寨进行焚掠，甚至“不容回民行路，擅自截杀”。⑤再加上早在咸丰年间青海撒拉族人民和回族人民就已遭到焚杀，特别是从同治元年春天开始，太平军、捻军进入关中，陕甘震动，陕西回民已经到宁夏来买马制械，并且带来了邀请宁夏回民前往陕西助战的传帖。这样，终于激起了宁夏回民抗清斗争的爆发。

其次，清朝官府的各种封建捐输勒索是迫使回民起义的一个

重要原因。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历来贫困，主要靠各省的协饷支援才能勉强维持局面，自从咸丰以来，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协饷已经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而越来越繁多的军政饷需更加沉重地压在西北各族人民头上。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不少地方，包括宁夏、宁朔、灵州、平罗等府县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清朝政府虽然明令缓征受灾地区的赋额，实际上各种捐输勒派却丝毫没有减缓。而军政的败坏，吏治的腐朽，无不给各族人民带来重重的灾难，成为激起反抗的导火线。所以左宗棠后来也承认，当时的“甘肃之军，不能卫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为乱”。⑥就在同治元年八月，盐茶厅（今属宁夏海原县）同知屈升之竟在回汉人民已经缴纳捐输之后，又带领兵役勒令再捐银钱，这样就激起了平远所（豫旺城，今属宁夏同心县）的回民起义，揭开了宁灵地区回民起义的序幕。

其三，咸丰以来，随着太平军、捻军革命势力的发展，清朝的半壁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陕甘的清军被大批外调，造成了大西北严重的防务空虚，而留下来驻守的以及新召募的兵丁处境又极为困苦。咸丰六年（1856年），宁夏等处的清兵就发生过“请饷滋闹”⑦的事情。在当时西北地区食粮应役的兵弁中，回民约占十分之三四。由于防务空虚，粮饷不继，社会上封建勒派、民族压迫的种种刺激，加上太平军、捻军、云南回民起义革命风暴的强烈影响，所以当宁灵一带回民起来进行自卫反抗的时候，清军中的回族兵弁往往是首先发难者。像首举义旗的平远所回民马兆元原是清军的把总；宁夏府城的起义也多是回族兵弁带头；在灵州为马化龙出谋划策的云南回族王锡爵，原是清朝花马池参将，被调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中途跑来金积堡，策动回民反清。所以防务空虚和军队内的滋变，对宁夏回民起义的爆发来说，也是应该估计的一个因素。

同治年间宁夏地区的回民起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概述如下：

从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马兆元在平远所举行起义开始，到同治四年（1865年）秋天回民军在金积堡外围自卫反击大捷为止，这是宁夏地区回民反清斗争的第一阶段，即发动阶段。

马兆元在平远所发动起义之后，形势发展很快，从西南向东北，举凡灵州属之同心城、金积堡；宁夏府属之通昌、通贵；平罗属之宝丰、石嘴山等处回民都纷纷响应。平远所的反清武装成为各路反清军的中坚，首领马兆元称元帅，马万冈称副元帅，率众转战各处，清军和民团一触即溃，声势大震。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平远所的汉族就有不少人参加了回民反清队伍，其中杨祥、叶金兰等还参加了起义的领导。遗憾的是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挑拨分化，回民军未能很好地发动和团结汉族人民共同抗清，而使自己很快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不仅如此，就是在宁夏各地回民之中，反清行动也未能统一。当马兆元率众进攻灵州受挫之后，金积堡的马化龙、同心城的周法等竟“与之拒绝”，表示不愿共同反清。不久，王家团庄的王大桂勾结官府定计诱杀了马兆元和马万冈，解散了反清武装，向清朝邀功请赏，这一叛卖行为受到广大回民群众的同声斥责。与此同时，平罗的反清武装在当地回族上层的诱骗下撤退了包围银川的部众。这样，从盐茶到宁灵一带的反清怒火曾一度平息下去。到同治二年秋，由于各地团练仍在用官府的名义到处焚掠回民村寨和陕西起义回民的陆续北来，进一步刺激了宁夏回民自卫反清的斗志。于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起义的回民武装相继攻占了宁夏府城和灵州城。固原州城在同治三年八月也被陕西回民军孙玉宝部攻占。宁、灵、固原的占领震撼了清朝在宁夏地区的统治，宁夏回民反清斗争走上了高潮。

同治四年二月，清军雷正绪部在回族上层张保龙的配合下攻陷了固原州城，并会合曹克忠部向金积堡一路杀来，在六月间展开了第一次金积堡战役。雷、曹二部原打算通过这次进军一举扑灭宁夏回民反清的烽火，同时这两支饥疲贪婪的清军还妄想攻破

金积各回民堡寨，大肆抢掠，“得其积聚”，以遂其兽欲。所以，尽管马化龙一再派人送银送面，并递呈求抚，清军根本不予理睬而一味进扑，于是在金积附近的强家沙窝，当地和陕西的回民马步劲旅给予来犯敌人以猛烈的阻击。清军腹背受击，狼狈逃窜。这一仗，清军弁勇伤亡了两千多名，军装、火药和器械、马匹也都成了回民反清军的战利品。紧接着，雷正绾部全军溃变，陕甘同时震动，这是宁夏回民自卫反清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

从同治四年年底宁灵回民首领马万选、马化龙等先后向清朝投降开始，到同治八年八月刘松山部向金积堡进军为止，宁夏地区曾经维持了将近四年的所谓“抚局”，这是宁夏地区反清斗争的第二阶段，即抚局阶段。

强家沙窝自卫反击大捷之后，马化龙就连同宁夏府城的马万选等回民首领接受清朝宁夏将军穆图善的招抚。然而，当宁夏府城回民已主动缴械献城之后，清军都统都兴阿在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背信弃义率队入城，发生了对银川回民招抚后又大肆屠戮的惨剧。都兴阿率队进城后，对部下作了可耻的屠城动员，说什么“兵勇太苦，借此可以发财”。这批凶残的兽军把宁夏城内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不分汉回，尽力诛洗，大肆焚掠，城中户庐灰烬，火光烛天”，彻夜不熄。⑧穆图善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宁夏府城被回民占据“两年之久，民居完整，积储甚多”，清军“收复宁郡时城内尚多汉民互相安处，足见甘肃省汉回平日本无嫌隙”。⑨而经过都兴阿的这次“杀降”，“百姓猝遭焚掠，城内精华蹂躏净尽”，⑩“万家皆成焦土”，不仅回民遭此浩劫，城内汉民也“大半遭屠戮，其逃出者仅以身免”。⑪

在都兴阿的杀降下，宁夏府城以及通昌、通贵、纳家闸等地虎口余生的回民群众不得不忍辱含冤地暂时接受抚局。灵州方面，马化龙也接受了穆图善的招抚。穆图善想利用马化龙在回族中的声望和地位去“开导”和影响各地反清的回民，以取得在战场上

得不到的“胜利”。马化龙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当地回民的利益和逃来的陕西回民的安全，希望求得一个太平安定的局面，也尽力应付穆图善的要求。抚局期间，马化龙为清廷倡捐了数万两银子和数万担粮食，并曾配合官府扑灭了宁灵一带零星的反抗活动。马化龙的这些行为受到穆图善的赏识，他称赞马化龙“秉性忠义”，“办事认真，不护同教”。因此，马化龙被赏加提督衔，并被改名为马朝清，作为他向清廷效力的报酬。当然，马化龙奔走于抚局，又不能不受到广大回民群众反清义愤的制约，所以当时有所谓马化龙“每次求抚，多无其党所持”⑫的说法。左宗棠后来指责马化龙抚局期间仍在“筑寨修堡，购马造械”，“阳虽就抚，阴实助逆”，固然是为进军镇压寻找借口，同时也反映了马化龙为首领的宁灵回民武装对敌人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备。

从同治八年八月刘松山等部进军金积堡开始，到同治九年年底金积堡陷落为止，这是宁夏回民反清斗争最激烈的阶段。

清军刘松山等部奉左宗棠之命，以追剿陕西回民反清军为名进逼金积堡。在清军环逼下，马化龙最初对抚局仍存幻想，一再向穆图善、左宗棠以及刘松山提出维持抚局，表示要劝导陕西回民投降，请求不要进军。由于刘松山部突袭吴忠堡，终于激成金积各堡寨回民的自卫抗清的高潮。

清军统帅部在对宁夏回民剿抚的决策上意见并不一致。宁夏将军穆图善以及绥远将军定安都曾力保马化龙“立志坚定”，主张维持抚局，他们反对刘松山在进军中滥杀以致引起激变。而左宗棠和刘松山正以镇压了太平军、捻军的老湘军为王牌，骄横地主张对回民必须“通剿”。主剿派最终占了上风。刘松山等部清军在“通剿以慑服其心”的思想支配下，凭借着优势兵力，依仗外国列强提供的贷款和新式枪炮，对金积500多座回民堡寨进行了野蛮的剿杀。

在这次保卫战中，以马化龙为首领的金积各堡寨的回民和留

在那里的陕西回民联合一道，为了生存的权力，发扬了回族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凭借着纵横的沟渠和坚厚的碉墙，逐堡逐寨，寸土必争地同来犯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使得清军每前进一步，每攻占一座堡寨，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在马五寨的争夺战中，骄横不可一世的清军统帅刘松山被寨中回民击毙。刘松山是各路清军的翼长，他的死在清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回民军乘胜攻夺了青铜峡口，清军雷正绾、周兰亭、徐文秀、张文齐等四军粮路被截断，同时溃退。左宗棠受到清廷的严旨斥责，叫他们心自问，何以对朝廷？内阁学士宋晋建议，让李鸿章到西北来，把左宗棠调到贵州去。可见当时的形势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有多么严重！

同治九年夏秋以来，对于被围困的金积堡回民来说，形势变得愈加险恶。这是由于甘肃河州等地回民援军始终接应不上，清军的粮运和军火也未能全部截断，各回民堡寨的水利遭破坏，青苗被蹂躏，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因而回民武装的粮食和后援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环境虽然险恶，回民军的斗志却始终顽强，拼死力斗，英勇不屈。在自卫反击中，有的堡寨没有了武器，堡内回民竟从寨墙上“倾热汤麦，釜盂齐下”⑬；有的堡寨被攻破，回民老幼妇孺都赴火自焚，军械什物皆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特别是马家河滩的战斗，在整个金积堡战役中最具代表性。经过反复搏斗，后来这里只剩下一个大堡和一个小堡，由几百名回民军据守。清军以优势兵力和枪炮逐日肉搏，而将领受伤者几十名，兵勇伤亡一千余名，一个多月也未攻下，回民军前赴后继，最后相率投河死，无一降者，各种殊死战斗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直到同治九年年底，金积堡由于粮援俱绝，回族军民以秫秸、草根杂牛皮为食，马化龙只得亲赴刘锦棠军营投降，并慷慨地表示“族众无辜者多禀求曲宥，愿以一人抵罪”。不久，黄河西岸王家疃等回民堡寨在恶劣形势下，经过拼死力斗也被清军攻陷。同

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父子、亲属以及回民军中抗清英雄1800余人惨遭杀害。金积堡反围剿战斗，坚持了约一年半的时光，至此悲壮的失败了，整个宁夏地区的回民抗清斗争也到此结束。

注　解：

①《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下面所引史料凡未加注者均见此书。
②《平定关陇纪略》卷九，见《回民起义》第四册第92页。
③《平回志》卷三，见《回民起义》第三册。
④宁夏将军穆图善奏折，见明清档案部藏军机处录付奏折民族类。
⑤同上，护理陕甘总督恩麟奏折。
⑥《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二。
⑦《清文宗实录》卷二百十。
⑧⑪同治五年二月三日穆图善奏折。原件藏明清档案部。
⑨同治五年三月五日穆图善奏折。原件藏明清档案部。
⑩《清穆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
⑫《平定关陇纪略》卷九，见《回民起义》第三册。
⑬《平回志》卷五，见《回民起义》第三册。

青海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汪　受　宽

一、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青海循化县爆发了回族和撒拉族首次反清斗争，其领袖是伊斯兰教哲合忍耶门宦的苏四十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青海循化、化隆一带，伊斯兰教花寺门宦第二代教主马国宝与哲合忍耶门宦创始人马明心发生

教争。自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双方发生械斗，互有伤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派到循化处理教争的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协副将新柱公开偏袒花寺派，声称要“杀尽新教”（指哲合忍耶门宦）。苏四十三等人愤而杀死杨、新及守城官兵，使教争转化为反清斗争①。

参加此次起义的是循化厅查加、清水、张尕、别列、草滩坝、崖曼、苏只、街子、打苏古九工等地哲合忍耶门宦的撒拉族群众，化隆、甘都地区苏胡家、阿路乎、阿黑旦三庄的部分撒拉族群众也参加了起义，另有部分老教回族参加。苏四十三、韩二个率领1000余起义军于三月二十一日攻克河州城，旋即向兰州进发，沿途回族群众纷纷加入，二十五日抵达兰州西关外时，队伍已达2000余人。

起义军要求释放教主马明心，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竟下令将其杀害。于是，起义军猛攻兰州城。清军2万人前来镇压。7月初，因寡不敌众，起义军全部壮烈牺牲在兰州城西南的华林山上。

二、黑城子事件

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化隆地区的回、撒各族人民没有被清政府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仍是坚持各种形势的斗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黑城子回民要求在拉曲岭修建拱北，得到西宁镇总兵的同意。不久，新任西宁镇总兵杨昌泗到后却禁止修建拱北，并挑动尖巴昂庄藏民以“有碍风水”为名，与黑城子回民相争，双方械斗，死伤多人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黑城子回民联合循化、洮州、泯州等地回、撒各族群众四五百人围攻巴燕戎格城，后前往黑城子，砸毁了官府树立的木架禁条，将黑城工所的砖瓦搬到拉曲修建拱北。官衙无可奈何，急报陕甘总督，请求援兵。道光三十年（1850年），陕甘总督琦善率大军镇压柯柯乌苏藏族，但无所获。为冒功请赏，琦善于十月初，秘密驱兵巴燕

戎格，连夜包围了黑城子。西宁镇总兵萨炳阿和甘肃提督桂令带兵堵住该城南北两门，其它军队布置在东、西两山。琦善亲自带炮队登上西山梁，于丑时（夜1－3点）趁人熟睡之机，用大炮向城内猛轰。城内毫无准备的回民群众“夺门而出，拼命拒敌，枪矛齐举，施放鸟枪”，“城外各回庄又复同声相应，各执刀矛聚党扑敌”③，牺牲200多人，另有220多人被俘杀害。

琦善的暴行，使当时朝廷某些要员亦觉过甚，故上书指责他“晚间开炮轰毙撒拉回子，情形尤为残酷”。④道光皇帝故将琦善革职，发吉林充苦差。

三、西宁回族撒拉族起义

清咸丰（1851－1862）、同治（1862－1874）年间的西北回族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汇成了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第一次高潮。西宁回族、撒拉族的起义是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宁起义于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爆发，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四月失败，历时13年，参加起义的人数达十几万，并一度控制了几乎整个西宁地区。

西宁回撒起义始于化隆地区。其领袖马文义，人称马尕三，是巴燕戎格厅昂思多人，回族，伊斯兰教花寺门宦的阿訇。当时，碾伯县（今乐都县）、民和等地团练在清廷防范回民起义的要求下，一再焚烧回村，无故将放牲口的两回民杀死，扬言“见回不留”、“回民必须尽行剿灭”。⑤所以，马文义联合循化、巴燕戎格、碾伯三厅县的回撒群众，乘西宁裁减驻军之机，于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揭竿而起，⑥揭开了西北回族反清大起义的序幕。

起义军迅速攻克碾伯县里二堡和周家大庄，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兵，随即向西宁城进军，并分兵循化，进攻积石关。咸丰下令陕甘总督乐斌全力镇压，甘肃提督成瑞带3000人马到西宁。马文义率队退守巴燕戎格厅待敌。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二十三

日，起义军围困清军游击闵相儒部500敌兵于扎什巴城，同时以主力埋伏于青沙山南的红土坡。次日，义军成功地伏击了清参将希郎阿部，迫使其狼狈后退30里，由此粉碎了清军第一次围剿。

三月初，新任西宁办事大臣多慧率各路清军，会合蒙、藏官兵计6000余人，再次向巴燕戎格厅扑来。此刻，回民总约、伊斯兰教花寺门宦教主马桂源（1843－1873）从西宁赶来，称“得到西方圣人玉印”，⑦使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士气旺盛。多慧看武力不行，只得议和。双方达成协议：解散西宁、碾伯团练，释放被捕回民，送还死者尸体；起义军交付赔偿费1万串钱，交出破残军械。多慧率兵在平戎驿（今平安镇）驻7月之久，未接一仗，含混败兵，乃以撤回“悔惧投诚”之名向清廷奏报，草结了第二次围剿。

但是，南川、碾伯等地的士绅对多慧的处置极为不满，纷纷上告。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钦差兵部尚书麟魁、户部尚书沈兆霖赴甘查办。旋以沈署陕甘总督，全权处理西宁事件。于是，多慧、成瑞等被革职议罪。沈表示决心消灭起义军，尤其要“诱除马尕三，以为一劳永逸之计”⑧。他在命令西宁、碾伯各村庄一律办团练的同时，调集各路军队、纠集团勇和藏兵，对巴燕戎格厅形成包围圈。沈派恭钊、闵相儒会同藏兵取道崇兰牙壑，意在偷袭起义军基地，侥幸取胜。起义军英勇坚守崇兰牙壑隘口，激战五昼夜，打退清兵数十次轮番进攻，迫使敌军丢下200余具尸体，败退而去。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十八日，沈率兵进驻碾伯，分兵五路围攻巴燕戎格厅。由峡门出发的第一路清军，于三月初七窜入巴燕戎格厅城。次日，马文义率起义军包围该城，断其水源，沈急调藏兵前来解围。第二路由索尔伽出发的清兵，被起义军阻截于群舱牙壑。第三路由甘凉道杨柄锃统领的清军主力，在青沙山即多次遭小股起义军的阻击，至扎什巴城西关外，又与起义军主力万余人遭遇。起义军“矢石如雨”，双方鏖战四

时之久。清军一将领中枪，致全军溃逃。第四路清军由药草台进山，因山路崎岖，雪深数尺，无法前进，只得退碾伯。第五路由同知严长宦、知县赵桂芳带领，从河州向循化进攻。在张哈工遭起义军伏击，伤亡惨重。五月十七日，清军主力又一次越过青沙山，在红土坡与起义军血战6个小时，起义军退守扎什巴城，击毙西宁民团团长杜绍武后，敌兵退却。五月二十日，三路清军会合，于二十四日再攻扎什巴城，并将周围6个回民村焚毁。3000余起义军向二龙山清军防线展开猛攻，黄河南的康、杨、李三寨的撒拉族、回族纷纷过河支援。此时，同治皇帝急令沈率部扑灭陕西华州、渭南等地正在燃起的回民起义。沈只好致信马桂源，要求议和。六月二十二日，在扎什巴城外举行有5000余人参加的抚和仪式。此后，沈便匆匆起程返陕，行至今甘肃永登县（时称平番县）被山洪淹死⑨。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至十月，起义军包围西宁城。清朝因忙于镇压其他各地起义，无兵可调，只好“改剿为抚”、“罢兵息事”。起义军以合法身份进入西宁城⑩。从此，西宁地区勉强维持了近10年的“抚局”。起义军首领马桂源被任命为西宁知府，其兄马本源为西宁镇总篆务，西宁成为起义军的一统天下⑪。西宁办事大臣玉通等人在起义军软硬兼施下成为傀儡。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起义军以西宁为中心，南有循化、巴燕戎格和贵德厅，北有大通县，东有碾伯县米拉沟、马营地区。

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玉通病死，接任西宁办事大臣的豫师驻扎平番，图谋西宁。九年（1870年）十一月，宁夏马化龙领导的金积堡回民起义军投降清军。十年（1871年），清军左宗棠兵临河州。三月，马文义病逝，马桂源的叔父马永福接任西宁回撒起义军首领，进行了一系列乞降活动。十一年（1872年）正月，临夏起义回军首领马占鳌等投降。七月，左宗棠率部进驻兰州，派刘锦棠等率老湘军进驻平戎驿。在阿訇光眉克、巴麻耳

支持下，马桂源兄弟识破左宗棠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阴谋，与驻南川的陕西回军联合抗清，共推马本源任统领陕湟兵马大元帅，指挥数万回军，从八月十一日至十月十八日的67天中，在小峡东不足40里的战线上，与装备优良的湘军血战50余阵，近万名回军壮烈牺牲，巴燕戎格厅回军首领多拜也在激战中献身⑫。

十月十八日，小峡失守，马桂源兄弟撤至巴燕戎格。马永福自八月初投降后，此时奉刘锦棠之命，到巴燕戎格瓦解义军余部。马桂源兄弟率千余人出米拉沟向东突围，但因在河州降清的回军马悟真将黄河冰桥击断未获成功。马桂源又遣使与大通回军首领马寿联络。大通回军于十二月初在向阳堡重新起事，迅即攻克大通县城。刘锦棠率军扑向大通，马桂源率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进小南川的塘隆台，准备袭击清军后路，未遂。马桂源部只好返回扎什巴一带驻扎。这时，河州清军陈湜、沈玉遂部奉左宗棠之命率部围攻。陈、沈以河州投降回军首领马占鳌、马永瑞为前驱，于二十九日抵达巴燕戎格城20里的端庄。马永福打开城门迎敌，守城起义军不愿投降，弃城西投马桂源。同时，清军刘明灯、敖天印亦率部会师巴燕戎格城，马桂源处于层层包围之中。沈玉遂、刘明灯派回族兵勇混入马桂源队伍，造谣煽惑，瓦解斗志。时连日大雪，行动不便，马桂源部走投无路，密派心腹求救于马占鳌。马占鳌约他于二月初四在巴燕戎格东山会面，同时密报沈玉遂，致使马桂源兄弟被俘⑬。陈湜在巴燕戎格城将起义军骨干马主麻、海乙什、马肖个、麻个子等30人杀害，又将马桂源用煤气熏哑，押往兰州。三月十三日，马桂源、马本源以谋反大逆罪被凌迟枭示，其弟马真源被斩首，妻妇子女被阉割锢遣⑭。

马桂源弟兄被俘杀害，激起化隆回族群众的无比仇恨。青库尔庄的回族群众拒绝交出武器军马。二月二十八日，清军将领陈湜、刘锦棠率两支大军前来镇压。青库尔庄回民迅速撤至山间反击，坚持4日，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陈湜残酷地将该庄马乙麻、

马米力、冶主麻等56名起义群众全部杀死，并将首级悬挂在庄前示众。卡尔冈地区的13个村庄中，有10个村庄反抗清军。三月初五，卡尔冈回民伏击清军，将总兵刘厚福击毙。陈滉于初七派刘明灯、马占鳌、沈玉遂等人分路扑来，卡尔冈地区各庄回民奋力抵抗，经5天激战，击毙敌军100多人，回军牺牲300余人。十六日，回军攻击清军，枪伤河州镇总兵沈玉遂。刘锦棠派西宁镇总兵何作霖率湘军4营及200骑兵来解围。二十六日，卡尔冈群众被淹没于血泊之中⑮。四月初，清军进驻循化，起义终于失败。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达到所谓“长治久安，永纾边患”之目的，在化隆地区驻扎大量清军。他们与循化、西宁、碾伯等地的清军“互为联络”，对当地回撒人民“重绳以法”⑯，进行长达9个月的大屠杀，其“屠戮之虐，搜刮罗织之苛，使九边泣血之死声，千里暴骨之惨状……不忍闻也”⑰。

四、光绪河湟事变

镇压了回、撒大起义后，清政府“严行保甲”，对群众土地常以所谓“匪产”名义没收，分配给地方豪绅。光绪十七年和十九年连遭旱灾，群众说：“板柜里没面了，牲口槽里没草了，造反的时候到了”⑱。

这次反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马桂源之子韩文秀。韩自幼被流放直隶，为一韩姓的军门收为义子，其后被西宁地区回民寻访回到河湟。光绪十九年（1893年），他以韩尕儿之名活动于化隆、西宁一带，组织群众，准备起义。

当时循化伊斯兰教中的尕德忍耶门宦和花寺门宦教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一年（1895年）先后发生两次大的械斗。陕甘总督杨昌浚派西宁道陈嘉绩前往处理。三月初，陈到循化，传唤各庄头目入城后，即关闭城门，将其中花寺门宦的11人斩首示众，引起公愤。陈竟下令向说理群众开炮。近万名撒拉族

群众忍无可忍，遂于三月初八包围循化城⑲。尽管光绪皇帝也承认，“此次回乱，由地方官审断不公而起”⑳，但仍派驻固原、甘肃、新疆等地清军和在天津驻军的甘军董福祥部前来围剿。

韩文秀看出时机已到，于是在甘都宰牛聚众，当地15岁至90岁的群众多参加响应。霎时，甘都、卡尔冈等地均燃起烈火。他们不仅过河参与包围循化城，而且将巴燕戎格厅内各要道挖掘沟堑，以阻遏清军。三月十五日，循化撒拉族群众以羊皮筏渡过黄河，与巴燕戎格回、撒群众联合，袭击驻扎甘都堂的西宁镇标中营游击王振德部，全歼其步队和部分马队，夺得大量军火㉑。不久，西宁镇总兵邓增率领循化、西宁练军两旗进至黄河以北加如庄，甘都起义军乘夜袭击，将其全部歼灭，仅有两旗官渡河幸免。

在清军进攻下，循化起义军于五月二十日撤除对循化城的包围，分东、北两路转移。北路撤至卡尔冈和甘都堂一带，与巴燕戎格十五会的起义军联合，于闰五月十二日，连续攻打巴燕戎格厅城，“势甚凶猛”㉒。后继续北向攻黑城工。韩文秀、马成林联合米拉沟回民首领冶主麻、安朝玉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将驻化隆的由苏贵兴统带的新疆三营清军诱败，消灭清军200余人，夺得新式军械200余件㉓。

六月初二，邓增由循化返西宁经扎什巴，正值当地回民起事。邓增迫令扎什巴起义群众投降并“献首恶，散胁从”。起义者“抗不受命”。邓增分三路向起义者扑来，起义者退入村庄内死守。邓增四面包围该庄，用大炮轰击，并纵火焚烧草堆民房，然后挨家逐户搜捕杀人，使“庄内千余人无一脱者”。韩文秀、马成林急调10000余起义军于六月初三前来支援。黎明前，回撤起义军埋伏于扎什巴城东边的山坳，以老弱在西边山头呐喊以为疑兵，又以骑兵在南面平川扬起旗帜往来奔跑。邓增调军队向东，回军伏兵四起，“炮石如雨，势甚张”。清军退守扎什巴城，回军“弥山塞谷”，包围该城。城内无水无粮，城外杀声震天，清军吓得要

命。邓增手刃一副将，迫士兵拼死突围。双方交战10余阵，清军毙命不计其数。回军首领马成林受伤后，仍坚持战斗。战至天黑，清军仍未突围。次日黎明，邓增所调南川、乩思观等处援军赶来，袭击回军后方，邓增才得以狼狈逃归西宁[24]。

在韩文秀号召下，七月十三日晚，西宁三川回族同时起事，很快占据东关，围困西宁城。邓增率4营清军出城，在保良门双方激战。回军愈战愈勇，消灭清军数百人。此后，回军又多次进攻西宁城。于是，西宁城“道路梗塞”、“四面受敌，粮草不济，危至万分”[25]。甘肃提督李培荣从平番、碾伯进援西宁，回军在峡口与李部激战，将其阻于平戎驿一带。十一月，宁夏总兵牛师韩部攻入大峡，河州镇总兵汤彦和由碾伯赶来，甘军何得彪部亦开来西宁。韩文秀抵挡不住，提出愿受“招抚”。此时，巴燕戎格、大通等地的回民仍在坚持斗争，西宁城外和大峡一带还遍布回军堡垒。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初，各路清军合力进攻，始解西宁之围。随即对西宁回民进行大屠杀。正月初八，李培荣将东关回民起事首领70余人杀戮于西门外。不久，魏光焘又将收监的韩文秀、包良等杀害，西宁镇总兵邓增则将北关回民青壮年2000人诱捕杀害[26]。然后，清军手提屠刀向各县扑去，一至三月间，先后攻占北大通营等回军据点。当时，巴燕戎格回撒群众在马成林领导下，重新高举反抗的旗帜[27]。陕西巡抚魏光焘赶快调派湘军总兵龙恩思等率兵于三月十五日镇压扎什巴与黑城子的起义，后军分统徐有礼于三月下旬扑灭了水地川各村的起义。四月初八，两军联合攻击甘都塘，回撒军英勇抵抗，使敌军寸步难行[28]。四月初，董福祥为清廷任命各路清军的总指挥兼甘军总统，他增调10余营清军围攻巴燕戎格回撒军的最后基地——卡尔冈。马成林率军抵抗，使清军不能得手。清廷对此极为不满，在10余天中两次传谕董，责问：“卡尔冈有十余营环攻，何以尚未攻拔？著督饬上紧速了”。董逼令马安良加强进攻。五月二十

八日，八庄失陷。三十日，连起义军的最后堡垒曲麻陇也陷于敌手。马成林撤至淹巴寺峡口，为敌军捕获，于六月初三日被杀㉙。

武装斗争失败后，不少化隆回民结伙逃亡新疆。一路无水无路，饥寒交迫，很多人丧生，最后到达伊犁河畔时已所剩无几。清政府以健字马队一营（约500人）专门负责对巴燕戎格厅进行残酷的“善后”。他们肆意虐杀起义战士和无辜百姓。当时，回民只要接到“你的官司到了”的通知，就要准备“换水”，第二天就要被拉上刑场，家属跟在后边收尸。

注　解：

①《循化志》卷八，《回变》。
②《撒拉族档案史料》，第183－185页。
③同②，第184页；《清宣宗实录》卷二十一。
④《东华续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丙寅条。
⑤《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十六、卷十二。
⑥《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
⑦《左文襄公全集》（十一）告示；《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十五。
⑧《清穆宗实录》卷十七。
⑨《甘肃忠义录》卷一“沈兆霖传”；同⑤，卷十三至十五。
⑩同⑤，卷八十三。
⑪《关陇思危录》卷四。
⑬《中兴将帅列传》卷二十《刘锦棠传》，《左文襄公奏稿续编》卷四十二。
⑬《豫师青海奏疏》104页，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⑭同⑦，（11）批札卷五《与陈舫仙》。
⑮同⑬，第108－111页。
⑯《平回志》卷六。
⑰《春冰室野乘》卷中。
⑱转引自《青海历史纪要》第87页。
⑲《劳薪录》卷四“随笔”。
⑳《清德宗实录》卷三九六。
㉑同③第335页。

㉒《西宁军务节略》。
㉓同⑲。
㉔同⑪卷四，“邓军门战事纪略”。
㉕《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389页。
㉖《西宁府续志》卷十。
㉗《奎顺奏稿》。
㉘《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六。
㉙同㉒。

迪化回民起义与妥明

马 成 基

一、妥明领导回民起义

妥明，一名妥得璘，经名达吾德。生年不详，卒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回族，原籍陕西渭南（一说是甘肃河州）。青年时代，因家境贫寒，遂出走家乡，在宁夏灵州、甘肃、青海等地游坊念经为生。他到甘肃河州后，曾拜伊斯兰教格的目（阿拉伯语，意为“尊古”）、虎夫耶（阿拉伯语，意为“低念”）门宦某支系教长的名下为徒。因为他勤奋好学，聪慧过人，经文学识渐长，很快就“穿衣”，曾在宁夏金积一带讲经，被回族群众尊称为达吾德“哈里发”（“哈里发”系阿拉伯语，意为“传教师的高徒”）。

清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在回民中颇有声望的阿訇妥明无地立足，便携眷出关来

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旋即与清军绿营中军提标参将索焕章取得联系，住进索家。他在传教讲经之时，抨击清朝政府残酷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屠杀回族人民，迫害宗教人士的罪行，激发教民们的反清思想。

索焕章是原甘肃甘州提督索文之子，回族，祖籍宁夏固原，世代军籍，其部下官兵有不少是回族。在妥明的影响下，索焕章对当时关内各地人民起义日炽，政局动荡的形势有所了解。这时，关内各省为筹措镇压回汉起义军的军需中断了供给新疆的协饷，官府对军饷粮款一再拖欠，士兵怨愤。有的地方发生兵丁胁官索饷事件，营官无法约束。迪化都统平瑞为筹划防饷，卖官鬻爵，裁减绿营兵额，加征田粮赋税。一时，差役四处严刑催逼，百姓度日艰难，离乡背井，流浪四方，民怨沸腾，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大有“官逼民反”之势。索焕章审时度势，静观待变，也想伺机起事。于是他便拜妥明为师，并推举妥明为掌教阿訇。他们利用民族宗教关系，在迪化、吐鲁番和今昌吉回族自治州所属各县的回族人民中进行秘密活动，谋划举行反清暴动。

正当妥明等人在迪化积极进行起义准备之际，新疆库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

同治三年五月初一（1864年6月4日），参加起义的库车各族农民，在维吾尔族托乎提尼牙孜哈里、回族马三保、马隆及玉门回族杨春等人的领导下，攻占了库车城，杀死了清朝官吏和王公伯克。库车人民斗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了附近各地人民的斗争。布古尔（今轮台）、拜城、赛里木、库尔勒、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地农民纷纷起义，聚众持械，攻城杀官，开仓放粮。不到半个月时间，起义烽火便在东起喀喇沙尔、西至阿克苏所属拜城的大片土地上燃烧起来。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喀喇沙尔办事大臣依里奇、叶尔羌帮办大臣武仁布、英吉沙尔领队大臣文艺等清朝官吏和库车扎萨克郡王爱玛特、阿奇木伯克库尔班及另外7名伯克，

都在这次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怒火中丧生。在各族反清义军占据的地方，清朝官府和本地王公伯克所构成的全部统治机器随之被推翻。

库车农民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迪化，清朝官吏惊恐万状。同治三年五月初八、初九（6月11、12日）两日，都统平瑞连接告急文书，急派都司张维昶率兵100人于五月十三日（6月16日）先发，再举绿营提督业布冲额统兵前去镇压，业布冲额托病不出。平瑞无奈，只好改派协领穆克德肯、佐领冬瑞等率清军400名于五月二十一日（6月24日）由巩宁城出发，赴南疆镇压起义，并急调喀什乌苏领队大臣文永、佐领穆隆阿等率清军600名、团勇陈子才等400名继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8日）陆续起军南行。索焕章得知后，立即密遣马如智（迪化城南关回族商绅）率数百回民昼夜兼程赶赴要隘埋伏截击清军。

这时候，驻防迪化的满汉官兵多被调赴南疆镇压起义，伺机举事的妥明、索焕章等人急与从库车潜来迪化的杨春密谋，决定以掌教阿訇妥明的名义连夜召集马升、马泰、萨拉阿訇等数十名回族头面人物在城南关清真寺内列炬横戈议事，响应起义的回族群众闻讯后，也持械赶来集结在清真寺周围各街巷待命。不料此举被开赴南疆落伍的遣勇朱小贵看到，顿起疑心，慌忙返奔向提督衙门喊报，声称他亲眼见有许多回民持械藏于某街巷待变，提督业布冲额命中军参将索焕章前去察看。索焕章在行前已先密遣亲信将集结的回众疏散，待他返回向业布冲额复命时，谎称并无回民聚众行叛之事，并说这是朱小贵诳报军情，有意蛊惑人心，应按军法诛之以安军心。业布冲额轻信索言，即将朱小贵就地处死。驻在满城的都统平瑞得知这一情报时，立即派主事荫德赫去汉城欲提朱小贵亲询。荫德赫飞骑汉城索人，朱小贵已被诛杀。平瑞疑心更甚，遂下令满汉两城实行戒严，对出入城内外的人一律严行盘诘，谨防不测。自是以后，再无人敢以回民举事之情况

向官府告发。

同治三年六月十日（7月13日），杨春被妥明派往迪化南山一带农村率领回民2000余人，攻取达坂城，全歼喀喇巴尔噶逊营清军400余人，扼守住吐鲁番、托克逊等地清军增援迪化的通道。十二日（15日），妥明得知去镇压南疆起义的清军在喀喇沙尔的领队大臣文永等官员被杀死的消息后，即决定于当天宣布起义，攻打迪化汉城，并派人相约马明率领古牧地回民义军（马明所统义军，原为古牧地回民自卫组织，平时从事农商，战时按册应召入伍）去包围巩宁城。入夜后，索焕章借故巡城，令部下马顺开启城门，将起义回民接入城内，打开军械库房，夺取枪炮戈矛，围攻提督衙门。提督业布冲额闻变，惊慌失措，急趋索焕章家藏匿，待知索已參与兵变，和妥明联合起事，遂服毒自杀。绿营把总金章、卸任游击张维峻不知索变，犹率数十名兵丁与起义回民军巷战，张维峻被杀，金章负伤逃往巩宁城。平瑞得报知迪化城危，便急忙率满汉官兵百余人驰救。军行红山嘴下，与起义回民相遇，激战少时不支，平瑞败回巩宁城，因惧怕住在城内的回民策应起义，下令将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戮，将城外的满汉商民移入城内。同时，飞报伊犁将军，请求派兵增援。起义回民占领迪化城后，起义首领之一的杨春被萨拉阿訇所杀，索焕章惊愕，随即和部下拥戴掌教阿訇妥明为领袖，以防令出多头。同时，公举索焕章为元帅，马升为先锋，与古牧地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明等奋力攻打巩宁城。

在迪化回民起义的当天，昌吉城乡的回民也聚众起义，杀官据城。同治三年六月十四日（7月17日），玛纳斯南城被当地起义回民占领。十五日（18日）以后，三道河子、乌苏、沙湾、济木萨尔、奇台等地的回民纷纷起义，攻城戕官，抢夺武器。伊犁将军派出的援军，在向迪化行进中被呼图壁县起义的回民义军击

溃。吐鲁番等地的回族、维族人民也相继起义，占领县城，领队大臣荣庆只身逃回巩宁城。马如智等率领吐鲁番起义的维吾尔族、回族人民五六千来迪化助战。霎时，回民起义军声威大振，将巩宁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的清朝官兵，惊恐万分，人心惶惶。

同治三年七月初一日（8月3日），平瑞与镇迪道尹伊常阿等人计议，令其遣使赴汉城向索焕章致书劝降。七月十五日（8月17日），索焕章复书拒降。伊常阿复遣使乞和，妥明不准，清使被逐而还。平瑞、伊常阿、吐鲁番逃回的领队大臣荣庆等看到孤城被围近月，外无援兵，内乏食粮，讲战不能，求和不成，慌作一团，束手无策。城内牛马猪狗及可食之物均被吃尽，军民饥号，饿殍横陈街巷。巩宁城被围困80余日，终于在粮尽援绝、军无战力的情况下，于九月初三日（10月5日）被起义回民攻破。平瑞召满汉营壮丁20余人，伧促应战至鼓楼东，见义军蜂拥而来，自知身不可免而自杀，镇迪道尹伊常阿投井而死，领队大臣荣庆、迪化州知州孔昭恒等大小满汉官员100余人均被回民起义军所杀，巩宁城也在此次战火中彻底焚毁。至此，迪化城已完全被回民起义军占领。

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妥明阿訇被部下奉为“清真王”。妥明封马升为统领总兵元帅，马泰、马仲、马明、马官、索焕章等10余人分别为各路元帅，分兵攻打各地清军据守的城堡。马升坐阵迪化号令全军；索焕章镇守吐鲁番地区；马官分军向昌吉、呼图壁、玛纳斯，沙湾、乌苏一带推进，联合当地起义回民攻占各城；马明防守古牧地及迪化郊区，并图取阜康；马升传令奇台、古城等地起义回民会合向西推进，自率一旅由迪化向东推进，攻打济木萨尔、木垒等东路各县，并向哈密地区挺进。当时，驻守在北疆各地的清军已无斗志，有的接仗就败，有的未战即溃。迪化都统所依赖的劲旅满州骑兵，在各地回民起义军的重创下，有幸活下来的只有150余人，且散居各地，不成一军；上万名绿营

兵和当局从“遣犯”中挑选编入清军的数千名遣勇，也先后被回民起义军歼灭，侥幸脱逃的少数散兵游勇加入了地方团练，在迪化地区与回民起义军作战。到同治四年八月（1865年9月），清真王妥明的统治势力范围西起乌苏，南至吐鲁番，东至木垒，还曾一度占领过哈密。原属迪化都统管辖的北疆各州县，除巴里坤外，均被回民起义军占领，甚至甘肃西部的一些回民起义军首领，如肃州的马四、河州的马彦龙、西宁的马尕三、宁夏的马化龙等人都接受了清真王妥明封给他们各自所在地区的元帅头衔，曾一度听从妥明的号令，配合了迪化回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二、反抗阿古柏的入侵

正当迪化回民起义斗争节节胜利之际，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与柯尔克孜头目思迪克和回族头目金相印勾结，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入侵南疆，侵占了南疆主要城镇，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在喀什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为“洪福之王”），与英俄帝国主义勾结，得到了英国的军事援助，旋即驱兵进占库尔勒，觊觎吐鲁番。同治八年（1869年），阿古柏要求妥明让出吐鲁番遭到拒绝。回民起义军首领索焕章看到起义军外有侵略军的威胁，内有徐学功民团的袭扰，遂致书清军驻哈密领队大臣文麟请降，愿归顺朝廷，受清军节制，共同反击外国入侵者，文麟复书拒降。

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阿古柏兵进吐鲁番，回民军全力反抗，收回库尔勒、库车、拜城等地。四月，阿古柏派兵6万再次围攻吐鲁番，十月初九（11月1日），马仲、马人得父子开城投降，并引导侵略军进攻迪化。十月二十九（11月21日），侵略军兵临城下，起义军奋力抵抗兵败，闰十月初（11月下旬），妥明开城投降，被废黜“清真王”；降将马仲被封为阿奇木伯克，总理迪化地区民政事务。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迪化回族人民与南山汉族民团首领徐学功取得联系，再次攻占迪化，马仲被徐学功擒杀，妥明又恢复“清真王”的统治政权。而马仲之子马人得为报父仇，复引阿古柏侵略军进攻迪化，妥明率军迎战不支，败走玛纳斯。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妥明向徐学功表示摒弃前嫌，联合回汉军民，合攻外国侵略者，收复迪化等地。二月，徐学功进驻迪化，妥明也从玛纳斯回师，形成回汉人民团结合作、并肩抗侮的大好局面。五月，妥明令回民起义军首领马金贵在达坂城堵截阿古柏由南疆增援迪化的侵略军，激战数日，起义军溃败，阿古柏进逼迪化。徐学功、妥明又率军迎战侵略军，义军败，妥明率残部复逃玛纳斯。阿古柏写信威胁妥明投降，妥明置之不理，阿古柏派兵西进入侵玛纳斯，妥明在势单力薄、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坚守数日，城破后便自杀身亡。迪化回民起义亦随之失败。

光绪二十一年河湟起义

马　培　清

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是清末西北的一件大事，蔓延今甘、青两省，为时一年有余。当事变初起时，清廷曾以甘肃全省兵力数十营尚不能平息，最后不得已又调派驻北京附近的武卫后军董福祥部（共二十八营）入甘，始行镇压下去。所谓“河湟事变”，河是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湟是西宁，为原西宁府所属七县。但起事的地点却在一个很小的县分——循化。循化县以前属西宁府，现为青海省的撒拉族自治县，地居青海的

东南，为河州赴青海的孔道。当地民族有撒拉、回、藏、汉等，伊斯兰教则有新、老教派之分。

循化县本是我的原籍家乡。清光绪二十一年事变时，我年纪还小，但家中老人们常把起事的原因当故事来讲；同时我家也有被当时官方派出求援而牺牲了的人，故每逢其忌日，便说起他们殉难的经过，我听熟了，至今尚能记忆。

清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循化曾为马明心等为教争起事的地点。光绪二十一年事变起事地点，仍在循化。两次起事的原因，都是为了教派之争。循化县人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老教。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有街子工①的韩穆洒者，传授伊斯兰教的理学，即一般人所谓的新教。在老教方面，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出来干涉，不准他教授生徒。韩穆洒不管他们怎样反对，始终坚持传授。入教的人，自然以街子工的人为最多，更重要的是“中原四庄”和“河沿四庄”②的回民，亦多数加入了新教，这就更引起了老教的注意。老教中有“八工”的头人韩努力及其长子腊月保和韩五十三等出面干涉。韩五十三又是老教的“哈最”③，当然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光绪二十年秋季，以韩努力等为首的老教要求新教讲经、辩论。老教是讲伊斯兰教所谓“常道”的，新教是讲所谓“中道”的，辩论结果，意见未能一致，从而打架闹起事来。老教人多，占了优势；新教则因人少吃了亏。老教乘胜之余，还放火烧毁了韩穆洒在街子工的房屋和河沿四庄新教徒的房舍。这样引起了新教徒的极大愤怒，就向循化厅提出诉讼。

循化在乾隆年间有过马明心为传新教围攻河州和包围兰州的一段历史，因而自清朝内庭直至地方官吏，对新教都存戒心，认为老教驯良，新教狡诈、乖张，难以控驭。此次新教来打官司，循化厅同知长斌认为新教有意滋事，不直其诉。新教不服，又上诉到西宁府，府里仍根据长斌所报予以驳斥，于是又激起了新教

徒的愤怒。

老教打赢官司后表现十分骄傲，当他们由西宁回循化时，集合群众在"依麻目庄"夹道欢迎，并宰牛聚餐，欢庆胜利，这样更使新教徒反感。

这时河州官方为息事宁人，派"花寺门宦"④的嫡系马永琳、马永瑞二人赴循化调停，因韩努力等原系"花寺门宦"的教徒，以为通过他二人的关系容易说合。谁知马永琳首鼠两端，表面上似为官方奔走，实际上心怀叵测，暗中鼓动其教徒图将事态扩大。如说："我曾派人到东边侦探，潼关以外2000余里没有官兵，你们去攻循化城没有问题"。不久，甘肃总督杨昌浚又派道员徐锡祺（一说欧阳道台）和庄浪茶马厅洪翼二人来循化调解，要"新老和好，服从朝廷"。韩努力等因受马永琳的怂恿，并知道清军空虚，认为调解是"木勺里炒豆子，共同烧焦"的办法，拒不接受。适于此时，有循化厅的班役数人去距城20里的"查家工"办案，老教群众杀死了"快班"班头毛勒格等3人，因此事情就越来越紧张了。接着循化厅调腊月保、韩五十三等11个头人进城商量，意在通过他们向群众说服，缓和紧张局势。时西宁知府陈嘉绩见事态扩大，来到循化，感觉到新、老教都是一丘之貉，无分轩轾。且在陈嘉绩至循化途中，亲眼看到新教徒房屋被烧毁的惨状，更感到老教之蛮横无理更甚于新教。于是一变以往重老教轻新教的态度，遂将腊月保等扣押起来。撒拉族群众闻讯后，集结城边，要求释放。城上不问青红皂白，开炮轰击，群情大哗。陈嘉绩下令关闭城门，并立将腊月保等11人全部杀害。还下令调全部新教徒入城防守。这一系列的措置，激起了撒拉族的无比愤怒，遂于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三月初八日纠众围城，事态竟演变到无可转圜的地步，这是循化起事的原因。

循化被围后，河州镇派镇南左旗马队管带马麟（东乡族）开赴循化协同防守。马麟先派其帮带马永祥带队一部进循化城，他

自己由于群众的拦阻，驻在离城40里的白庄塘地方，未得前进。陈嘉绩在城内将所有回汉群众编为“靖循”四营，回汉族各有两营，回族分左右两营，即以马永祥、蒋钦分任管带；汉族分中、前两营，由城内原驻的参将、守备分任管带，部署了防守配备。但仍旧感觉兵力不够，曾派马鸣凤、徐某二人出城先后赴河州和兰州求援。马、徐等回到循化时，被围城群众发现，认为他们替官方奔走呼吁加以杀害。事平后，地方上曾给这二人立了牌位，入祀“昭忠祠”。循化整整被围了70余天，后经兰州派固原提督邓增率兵10营，取道藏区，经果实滩、查家工、街子工等处进抵循化城郊，城内出兵夹击，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围始解。

先是，循化被围后，河州总兵汤彦和率兵八营，经韩家集、起台堡等地赴援，当其进至白庄塘时，河州又发生了事变。他闻讯后，于六月初十日即将部队折回老鸦关。河州暴动头目听见汤军回师，十分惊慌，乃派探子向汤军向导武进士马福禄请教，马叫他们速向汤投诚，如来不及写降禀，可先派人输款。同月十一日，汤回至距城40里的双城堡，有军功马福旺等出头迎接，各头目都前来探听消息。他们通过马福禄，要求汤暂驻双城，并提出此次暴动群众被胁从者实多，如能派人劝谕，自能分散其众，叛乱容易敉平，汤亦首肯。同时双城以东有地名夹汤湾者，汤彦和迷信于大将犯地名，于行军不利，就将计就计，驻军双城堡。为策安全，马福禄建议汤彦和说：“双城北面倚山，南面隔河为一开阔地，军队必须占驻高地，掩护南川，如万一有警，即可向藏区撤退”，汤不听。但马福旺等却暗暗派民兵占据了山头（后来以此致马福旺有助变之嫌，几乎牵入“善后”案内）。到十三日夜间，大雨倾盆，马永琳及其侄马如彪和周七十等，乘机于当晚集合了撒拉、东乡、回族约万余人，冒雨包围汤军，猛烈袭击。汤军毫无戒备，立即溃逃。是夜马福禄因驻地较远，对汤军溃走情况，毫无所闻，及至拂晓，以汤营寂静可疑，始起而往视，才

发现汤军死亡枕藉，且已溃逃多时。他即率领家属，跟踪追上汤彦和，引导汤军经过藏区，并向嘉木样四世借银3000两，到岷县收集残部，整编为五个营，拨归陈宗藩统带。此次汤军仓卒溃退，损失武器很多，临行时在河边埋藏了不能带走的四门大炮，后被变回挖出，成了围攻河州的有力武器。

当汤彦和由白庄塘向循化进兵时，马永琳阴谋在河州起事，并以烧拱北为衅端，借以牵制清军援循化兵力。因此他派教徒瞎老九、马三顺等赴东南乡一带串连，约定在花寺拱北附近举火为号。五月十八日晚，瞎老九父子和马三顺父子在花寺拱北牌坊前放火，时夜晚风疾，火光冲天，附近八坊回民约千余人前来救火，有少数汉人也混入观火，回民认为火系汉民所放，当场杀死王永寿等5人，捉去6人。黑夜中火光很大，城内官兵不明真象，不敢出城。天明后州官拟亲自出城查勘，被城内绅士劝阻，乃派粮差徐其先去查明究竟。徐某出城后，因花寺拱北附近无人，遂到马永瑞家去问，被马永瑞孙子马显文杀死。城中旋获悉徐某被杀消息，认为回回反了，即紧闭城门，作守城防备。马永琳以汉民火烧拱北的借口业已成功，即以保教为名，号召各路头目，纠集徒众，包围了河州城。同年六月，董福祥部大军到达临洮一带，董本人驻新添铺，先行马安良进驻康家崖。因洮河水涨，不能立即过河。直到十月初，水势稍退，马安良方先过河，对暴动的回民群众多方进行分化，如对东乡的头目马忠孝，西乡头目马占奎、马国良等委以军职；对其他一般回众能收抚的即予收抚，能遣散回家的即予遣散。一路势如破竹，未打一仗，于十月十八日进抵河州城郊，城围遂解。

循化、河州和西宁等地事变平定后，马安良被派到循化办理善后，他先杀了韩努力，其余参加过暴动的人都陆续被杀了，前后共杀800余人。河州的善后，初期也由马安良办理，先后共杀137人。其中周七十是清同治、光绪两次变乱的首领。马永琳原是被

派赴循化收抚“花寺门宦”教徒的，但因他使用两面派手法，暗中煽惑，扩大了循化事件，河州事件，他又是直接操纵者，因而董福祥于十一月初十日命将此二人枭首后并分裂其尸示众。马永琳的两个儿子马镇（武举）、马福（秀才）同时被杀，后来又在抄家时将马永琳的其他两个儿子（一个是武秀才，一个是阿訇）也杀了，三个孙子都钉进木笼，另外将两个二三岁的孙子解送兰州，永远监禁，直至民国初年，始行释放。

注解：

①循化的地方组织，分为内八工，外五工，等于乡的组织。内八工是原有的，外五工是新入教的藏族。八工又分上四工，下四工。上四工是：街子、查家、苏知、查汉大寺；下四工是：清水、张噶、崖曼、孟达。

②“中原四庄”是回族、汉族离城五里的四个村庄。“河沿四庄”是撒拉族离城十里的四个村庄。

③“哈最”是伊斯兰教掌法律的一种官职。

④“门宦”即教派的意思。

辛亥革命中的陕西回族名将马玉贵

马 寿 千

马玉贵（1885—1957），字青山，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文风亭，回族，弟兄四人，青山排行为四。自幼家境贫寒，3岁时丧母，5岁丧父，随大哥马玉山生活。

光绪末年，青山还不到20岁，为生活所迫，即到新军入伍，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我国遭到惨重失败，割地赔

款，国家濒临被列强瓜分之际。青山生长民间，饱尝压迫剥削之苦，富有爱国反清思想，在新军中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几年后，由湖北分配到西安，在陕西新军二标一营左队为正目，后升为队长。

到西安的几年中，青山深受同盟会在新军中传播的革命思想影响，反清意识更加坚定，更加成熟。西安回民从事小商小贩和出卖劳力者居多，他们与哥老会有着共同的反清要求，加入哥老会的人不少。青山此时已是哥老会在新军的重要头目，本身是回民，因此在回民中进行反清秘密活动特别方便。宣统二年六月三日（1910年7月9日），马青山参加了由新军头目、哥老会头目和同盟会会员在西安大雁塔举行的歃血为盟仪式，宣誓同心同德，共同反清。结盟者称作36弟兄，他们开始接受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想。马青山参加大雁塔结盟会议，不仅加强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回汉的民族团结，推动了西安回民积极参加起义前的准备活动。起义前夕，青山委托麦苋街回民杨三组织500回民，编成一个营，由小皮院回民乌登瀛任营长。

辛亥西安起义原来打算在宣统三年八月十五（1911年10月6日）动手，因准备不及向后推延。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西安的同盟会会员、新军、哥老会联合发动起义。反清革命的第一枪打响后，青山即率领新军和哥老会成员以及所联系的数百名回族武装投入激烈的战斗。特别是第二天（农历九月初二）进攻满城之役，青山和他率领的新军和回民武装，在西华门经过激烈的战斗，奋勇冲进满城，成为第一个攻开满城的部队。他率领的另一支回民军，由他指挥，与另一革命军头目刘世杰部队协力，由大小差市间对面残破城墙攻入满城。

起义成功后，由于哥老会成员文化水平低，又没有行动

纲领，在革命阵营里发生了一次权位之争，青山深明大义，以革命大局为重，恳切表示自己“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后来他一生的作为，确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陕西革命军政府和秦陇复汉军建立后，任他为总理粮饷兼管军务都督，并兼任秦陇复汉军第二协协统。陕西是继武昌首义后光复最早的一个省，光复后东部受到河南清军的进攻，西部受到马安良、陆洪涛各部清军在陕甘总督升允率领下的进攻，两面受敌，形势相当紧迫。东路以张钫为主帅出兵保卫潼关，马青山派参谋谢彩臣率部分回民军参加保卫潼关的战斗。青山任西安督运各路兵马的粮饷和处理军务，并曾多次率兵出西路与甘军马安良等部清军激战。1911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他曾亲率所部回民官兵参加了长武冉店桥战役。当时敌军陆洪涛部猛扑冉店桥，革命军向紫山营英勇奋战后，全营壮烈牺牲。后援各路革命军遭敌进逼后纷纷败退，只有青山部回民军，因其严禁官兵退却，敌军见状亦不敢迫近，青山镇定自若，全师而归，有名将之风。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西路乾州告急，陕西革命军大统领张凤翙亲自出援，分兵三路进攻乾州北原，兵马都督张云山当西路，张凤翙居中路，马青山居东路，十一月十五日三路会攻的时候，青山以数百人突入敌阵，因后无援军，致被甘军包围，青山见情势危急，乃振臂高呼，奋勇冲杀，终于赖官兵用命杀出重围得以脱险，这一仗青山腿部受轻伤。不久，青山率谢彩臣全标和炮卫队一营把守泾阳临潼渡口，捍卫咸阳，并曾在泾河对岸礼泉东部与清军激战。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宣统被迫宣布退位，而升允却封锁消息，仍迫令甘军出击。当马安良率军东犯的时候，马青山曾以同是回族的关系与马安良互通音讯，并号召甘肃回族官兵舍逆从顺，勿为升允所愚。所以当马安良闻知宣统已经退位的消息时，便不顾升允的命令开始向西撤兵。

民国元年（1912年），甘肃宣布拥护共和，马青山代表陕西革命军政府去兰州，与甘肃方面达成停战和议。他多次在兰州

的群众大会上和甘肃各界人士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屠杀，热情歌颂创建中华民国与五族共和的伟大意义，呼吁西北回汉各族加强团结，建设国家。在兰州，马青山与马安良、马福祥等回族将领互换庚帖，结为金兰之好。马青山在辛亥革命中不仅联合西安回民在反清起义中建立功勋，而且对联络西北回族上层投向共和方面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民国初年，陕西革命军政府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立宪派与旧官僚利用会党的力量夺取了政权之后，本来就很松散的联盟关系立刻解体，他们对会党掌握的军队开始压制、收编，有的甚至取缔和镇压。在新的形势下，马青山主张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和限制会党码头的活动，但这仍然免不了遭到排挤和暗算。民国2年（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8月初川军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陕西军政府派青山率所部一个混合协入川“讨伐”熊克武。9月中，当青山率军经秦岭过栈道入四川到达夔州的时候，熊克武早已放弃重庆他往。此时，马青山意外地接到袁世凯的电召，赶赴北京面见袁世凯。见袁以后，袁给他官作，他婉言谢绝。袁曾问他：“回民闹革命为啥？”他回答说：“回汉团结，保护自己。”袁又问他：“你为啥要革命？”他说：“奉孙中山命令。”话不投机，语多顶撞。第二天，袁世凯以“援川不力，逗留不前”的罪名，将青山扣押在军警执法处。据青山本人回忆：因为自己是个大老粗，不懂政治，所以没有被袁杀害；另一方面，还有黎元洪以乡谊力保，得以免祸。扣押不久，他即获释，返回四川前线本部军中。当他返抵汉口的时候，给四川军发了封电报，不意又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扣住，派一连宪兵送往北京，仍押在军警执法处，后来改为软禁，行动有所自由，但不能离开北京。直到袁世凯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马青山才获得完全由由，被任命为陆军部少将咨议。

民国2年在北京被扣押，是马青山生平事业中的一个大的转折，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兵权，从而也丢掉了在陕西的一切。原来辛亥之役时，清朝陕甘总督升允的家眷尚在西安，升允本人逃往甘肃。陕西军政府为了让升允回心转意，让马青山把升允的家属礼送出境。分手时升允的夫人把在周至、户县的万亩水浇地的地契送给了马青山，青山接受了这笔馈赠，准备一旦解甲归田，可以躬耕为生。当马青山在北京被扣押时，这项田产被袁世凯在陕西的心腹陆建章下令没收了。

民国5年，马青山恢复自由时，只有个陆军部咨议的空名，闲住北京，没钱没势，民国元年由大哥玉山在家乡谷城购置的几十亩田产，此时也变卖一空。青山一面与西北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在官场上应酬，一面又与北京著名阿訇王浩然等往来谈论教义。马福祥、马鸿逵集团待青山为上宾。1923年马福祥任绥远督统时，青山出任他的参谋长，时间很短暂。

1932年马福祥死，第二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邀青山同去宁夏。宁夏回民多，青山也愿意去宁夏安度晚年。1933年青山携夫人王氏，女培华，子寿千同去宁夏。

在宁夏，马青山只有一个省府参议的空头衔，从来不办公也不开会，只是经常参加马鸿逵的宴会，陪同听秦腔，陪同去贺兰山避暑。

马青山性格豪爽、乐观、开朗。身在官场，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生活简朴，自甘清苦。在宁夏上至省主席，下至马伕都有交往，都是朋友。官场上都叫他“马老汉”，老百姓称呼他“老参议”。遇到马鸿逵发脾气要枪毙人，或者要把人家的羊只、货物充公一类的事，人们都要来请“老参议”去劝说，去求情。1946年夏季在贺兰山避暑时，马鸿逵写了一副对联赠给马青山，对联是：“升官发财身外事，行善积德留子孙”。解放前出版的《西北革命史征稿》，有马青山传略，说民国元年马青山在陕西为都

督，后来“谢事远游，见者不知其曾为都督也”。都从一个侧面概括青山不为名不为利的一生。

1951年春，青山携夫人王氏、子寿千到北京。夏天寿千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后分配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回族史至今。解放初青山已年近古稀，终日礼拜、养生，过着悠闲安定的生活。1956年甘肃友人来京时，介绍青山参加民革。1957年原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领导，听说马青山在辛亥革命时的业绩，准备给青山安排一个职务，以便在经济上给予补助。是年9月25日青山患脑溢血去世，安葬在北京西郊西北旺回民公墓。寿千为父亲立碑，碑文曰：“忆昔日辛亥首义，念七树勋，总督秦疆，声威显赫；看今朝革命成功，古稀归真，安厝京郊，身后哀荣。”

第二章　不屈不挠的反蒋斗争

回族英雄马和福

张　鼐　马峰玉

马和福，经名尕西姆。1893年生于甘肃省临夏东乡的一个贫苦回族家庭里。兄弟三人，行二。

马和福4岁时，祖父携带全家老小逃荒到今宁夏西吉县沙沟落户。1920年宁夏海原大地震后，他在同心县豫旺堡一带做苦工，干过赶脚、榨油、锻磨打石等活计。1928年，他与白寡妇结为患难夫妻，生一男一女，在同心县豫旺堡南塬刘家冈子租地务农。

1936年6月，西征红军攻下了豫旺堡，百姓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而四处逃散，马和福却怀着一种好奇心理没有跑。在接触中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便到处宣传，动员群众回家。此后，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群众纷纷给红军送“欢迎粮”，捐“抗日款”，并帮助红军解决吃水问题。

马和福在红军的教育帮助下，提高了阶级觉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带领20余名回族青年组成的回民游击队，同红军一起打土豪，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民族政策，组织群众为红军捻毛线、织毛袜，积极为红军和党工作。

1936年10月20日，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了，马和福当选为主席，并兼任县回民游击队队长。

自治政府成立后，他带上自己签署的《告白圈子四周围同胞书》，在同心县城、豫旺堡、王家团庄等地向回族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说："我们豫海地区的各族人民得到了解放，可是宁夏川区的劳苦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搭救他们，解放宁夏城！"

11月上旬，红军在同心西城外河滩上举行了万人军民联欢会。马和福代表回汉族人民致欢迎词："千百年来，回汉兄弟贫苦度日，受牛马苦，吃鸡狗食，连条命都保不住！今天，搭救我们的天仙来了！我们的大救星红军会师了！我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回汉群众，祝贺红军胜利会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努力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红军东撤后，国民党马鸿逵的军队疯狂地在豫海县大搞"清党"和"清红"，一片白色恐怖。

1937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组织派马青年同志秘密来豫海县与马和福联系，但未成。不久，马在锁家岔被捕，并押解至宁夏省城。马鸿逵亲自审问，还严刑拷打他，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痛斥了国民党政府的暴政罪行。

马鸿逵无奈，于1937年4月3日，命令部下在同心枪杀了马和福。临刑前，他拖着沉重的铁镣，坦然地说："为民族的解放，虽死无怨！"他换了水（洗澡），穿好衣服，在同心县城西门外西河滩英勇就义，时年45岁。

解放后，同心县政府为马和福同志建了烈士陵园。

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

马 思 义

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海原、固原、隆德、静宁四县回族农民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在马国瑞、马国璘、马思义等人的领导下，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暴动。第三次武装暴动失败后，一部分人由马思义带领进入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直到全国解放。

我是海固回民暴动的参加者、领导者之一。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缅怀牺牲的战友，特写此文以作纪念。

一、咆哮的沙沟

在以往的苦难岁月里，固原县的西吉、鹦子川、沙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地里的麦子上场了，
地主老爷的大骡子来了，
交过了租子，挨饿的日子到了；
柜里的粮食早光了，
一年的辛苦白费了，
穷人们没活的路了。

还有一首歌谣是说国民党抓兵、要枪、敲诈勒索，农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的：

抓兵的官儿下乡了，

保甲长张牙舞爪地跟着来了，
有钱的拿钱来赎了。
没钱的连夜逃了，
抓了去就没有命了！

那年头，农民的日子真难熬。驻在地方上的国民党军队、常备队、保安团、民团、联保主任、保甲长和地主、恶霸、豪绅，抓壮丁，摊派苛捐杂税，要粮要枪，敲诈勒索，没完没了。国民党向地方派一次捐，经过联保主任、保长的手就增加了好几倍。国民党抓兵、要枪，有钱人可以拿钱来抵，没钱的只好逃，逃不了的就被抓去送死。国民党军队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那些狐假虎威的保甲长、地主土豪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借给贫苦农民的钱，每元月息三角，借粮一石，本息一石三，这种日子叫人咋过?!

马国瑞对大家说："这简直要官逼民反了！"受尽剥削、压迫的穷苦农民决心把压在头上的这些石头掀下来，砸它一个粉碎！马国瑞在北平念过书，一贯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地主土豪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欺压。因此，在回民中很有威信，大家都叫他"小师傅"。当时，很多人对马国瑞说："小师傅，你见识多，你来带头，咱们照你的意思行事吧！"

于是，鹞子川、沙沟一带农民都行动起来了。1939年1月15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上千的农民从家中拿出旧枪，有的把铡刀一改为二，做成武器，有的拿着长矛、大斧，有的拿着铁锹、棍棒，一齐奔向红套，一下子就攻下了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这次起义开始后，马国璘就贴出布告：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意即国民党马上就要灭亡了），救民抗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此布！"

当时，马国瑞的弟弟马国璘和国民党斗争也很积极，于是群众就拥戴马国璘为海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阿訇马英贵担任了固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

那时，沙沟附近的李俊堡驻扎着一个保安分队，队长叫穆玉清，他老子穆生春是个联保主任，又是地主兼恶霸，平日无恶不作，农民非常恨他。马国璘号召我们把李俊堡拿下来。几千农民齐声响应，就一齐向李俊堡卷去。那些地主、恶霸知道我们在沙沟一带起义了，早把寨门紧闭，架好了枪，我们还没有站稳脚，子弹就噼噼叭叭地飞到头顶上来了，我们立刻还击，战斗越来越激烈。我们弄来了柴草准备烧堡子的大门，同时喊道："寨上的民团快投降吧！要不你们就完蛋啦！"穆生春这个老家伙这时便在堡子上连蹦带跳地骂着："我们是规矩的良民，怎会投降你们这些土匪呀？过去你们的上一辈造反，现在又造反，大概你们也不想要脑袋了吧！"我们也大声喊道："好呀，你们穆家过去杀咱们先人，现在还想杀咱们啦，别做梦了，今天非宰了你们不行！"原来，穆生春的祖上在清同治年间曾经惨杀过无数跟随马化龙起义的回民群众，并拿人头向清朝报功领赏，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时，马国璘亲自指挥，我们对准堡子，当那老贼又跳起伸头咒骂时，被我们一枪击中。只见一顶瓜皮帽飞上了天，接着，堡子里面就传出惊慌的哭声，嚷道："老太爷给打死了！"我们听见了一齐欢呼并喊道："缴枪的不杀！"咚！咚！堡子上的保安队纷纷交械投降了。

这样，参加起义的农民一天天多起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国璘和马英贵互相闹不团结，彼此争夺势力，开始发生了分裂现象。此时，敌人又对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说什么"不要误入歧途，回头是岸"、"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等等，起义农民中有些人动摇了，不去和国民党军队坚决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司令部兵分两路，各自行动，马国璘带领5000人攻打隆德城，马英贵带领3000人攻打固原城，但由于力量分散，没有攻下城池。马国璘的部队撤退到套马山梁上，又回头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这时，马国璘的腿上挂了彩，不能指挥作战，部队就撤到了偏城；没有攻下固原城的马英贵部队也七零八落地撤到偏城来了。当时，偏城附近高崖上有一个土豪海老四的堡子，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由于两个司令部汇合后力量增强，我们就把这个堡子攻下来了。

当时，敌人对起义农民的政治攻势越来越紧了。马英贵在敌人派来的固原三营小学教员白受采的劝降下，写信给朱绍良、郭南浦和海原县长张桃，要求在释放马国瑞和严办贾县长后，愿同马国璘一起前去投降。郭南浦要起义军的两个司令部派代表到祁家堡子谈判。这天，马国璘因腿伤不能行动，推马英贵带领60几个战友骑马前去谈判。祁家堡子大门里站着几个人恭敬地笑着说："马司令来啦，欢迎！欢迎！"马英贵点点头，跨下马，和同行的人一起走进去。哗啦啦一声响，两扇寨门紧紧关闭，方知上了敌人的当，在后面的50多人一看情况不妙，喊了一声，便迅速勒马往回跑了。

我们的起义队伍，由于马英贵被捕和马国璘受伤不能指挥，加之敌人的政治攻势，使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动摇分子主张投降，有一部分人把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枪支整捆整捆地又交给了敌人。马英贵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于1939年春被国民党杀害于固原，起义暂时失败了。

二、野火烧不尽

1939年5月9日，被国民党扣押在兰州的马国瑞密秘地回到了西吉。他一到艾蒿湾村，就派人到处寻找上次参加起义的同志。

当时，我父亲连夜找到了他。马国瑞一看见我们就说："我早就听说，咱们起义失败后，敌人对我们回民的压迫更凶残了。"我爸爸将第一次起义失败后群众受难的情况向他大体汇报了一下。我爸说："小师傅，现在你一回来咱们就有了头了。"我在一旁插嘴道："要活命，非再起来干不可！"，马国瑞点点头说："好，我们马上分头发动吧！"

在艾蒿湾附近驻扎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八十一军马鸿宾的部队，在王家新庄有一个连，小坡南湾有一个营，还有不少保安队、民团。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我们头一天就找了一些妇女，带着面呀、饼呀、蛋呀等，借口走娘家，到敌人驻扎的庄子里去探听虚实。曾经受过国民党军队蹂躏、毒害的农民，知道我们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白天黑夜悄悄地跑来把有关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小坡庄的农民陈志福说："在我们庄子上，那些国民党连长一天到晚吵着打麻将！"我们告诉他，那你正好凑个热闹，奉承他们，凑上个八圈，我们发动的日子还请你稳住他们，让这些家伙不能够指挥战斗。我们商定农历四月十一日晚上月亮担山畔的时候，以枪声做为暗号，各路人马同时下手进攻敌人。马国瑞拟好了命令后，说："我们还差一个全军行动的口令。"我说："你看用'得胜'好不好？"马国瑞双手一拍，高兴地说："旗开得胜，好彩头，现在马上传令！"我们把鸡毛分插在信上，立即出发。各庄的农民一接到鸡毛信后，就分头悄悄地行动起来，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许多庄子都自动组织，编成了排、连、营、团组织。人们纷纷说道："杀他们一个够本，多杀一个就是利钱！"青年人更是心情激动不已，准备连夜大干一场。

大家焦急地瞧着天上，到月亮担西山的时候还有多久啊？等着，等着，当月亮爬向绵延起伏的山畔时，我们悄悄地埋伏在敌人的驻地前，架好枪，举着刀。5月29日凌晨（民国28

年农历四月十一日），一声枪响，立刻杀声震天，西海固回民第二次起义爆发了！我们的人一下子就冲进了敌人的窑洞，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突然袭击，一时惊慌失措，乱做一团。时值半夜三更，敌人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我们俘虏了不少，有些敌人光着身子拿起枪，钻到隐蔽的地方进行还击。小坡庄的几个敌人连长正在陈志福家打麻将，听见外面枪响，把牌一摊，起身要走，陈志福拔出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一个连长举起双手，但另一个却乘机开枪打伤了陈志福，我们早已埋伏好的人一齐拥上，把这两个家伙捉住。这时，村子外面的战斗已经结束，小坡庄两个连的敌人向我们缴了枪。

为了把敌人吸引到外地进行歼灭，为了避免被众多的敌人包围，我们研究决定到海原县去。5月31日晚10点钟左右出发，第三天早上就和驻扎在和尚铺的国民党97师某团接火了。我当时担任司令部特务连的排长，在反复冲杀中，全排52人只剩下20人了，在攻击敌人一个碉堡时，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左大腿。

这场战斗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反复冲杀到天黑，还没能突围。敌人97师全上来了，我们且战且退，才到北面河附近，又上来敌人98师、99师和从隆德、固原出来的追击部队，他们把北面河围得铁桶似的。经过6天的反复冲杀，双方尸体摆满了阵地前沿。我乘敌人两个营被冲垮之机，忍着伤口的疼痛，指挥战士们撤退下来。这时候，从北面河的南山上传来了马国瑞、马正川和我父亲马喜春等不幸牺牲的消息，一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往后撤退。我因受伤走不动，我的两个弟弟思贞、思荣轮流背着我和大家一起赶到老龙滩口。老龙滩口山上还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我对大家说："要是打不退敌人，我们会全部死在这里。要活命，就得杀出去！"这

时，我们还有二三千人，虽然我们已几天没有吃饭，但仍然和敌人英勇地肉搏着。敌人不敢靠近我们，只用枪炮朝我们乱放一通。

天黑了，几个团长和营长在山上开了一个会。地主出身的咸成华团长说："咱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个样子怎么打下去呢？"秦团长摇摇头说："看来呆在这地方，敌人会把我们全部消灭掉！"还有的说："咱们杀出重围找红军去吧！"当马国瑞还没有牺牲，和我们一起被围在和尚铺时，他就找了一个姓马的大夫，到边区和红军接头，想不到他一去音信全无。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候他而贻误了军机，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投奔红军，一些地主、恶霸出身的营团长却不同意，有的甚至主张投靠国民党。可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农民站起来反对说："你们忘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咋对付我们的？"有一个青年农民面对主张投靠国民党的人大骂道："你们这些×××！"他愤怒地拿起枪，一个人朝山下走了。我也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了创伤，可象跌倒在地的人一样，养一养神，还会爬起来的啊！"大家讨论了一夜，没有结果，不等天明就各自分散了。马思贞、马思荣护送我撤退到米岗山附近。在敌人追击下，我掉了队。和大伙儿失去了联系，拖着伤势很重的身子，在深山密林中，饿了吃树上的野果树皮，在没有水的地方就喝自己的尿，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我又回答自己："我要坚持活下去，为了终有一天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算清这笔血债！"

三、马东山上的曙光

1941年2月的一个下午，沙沟的老百姓站在庄子前，迎接下乡来收款的国民党委员。走在头里的是12个背枪的常备队员，后面是两位委员也骑着毛驴来到了。他们戴着礼帽和黑

农民！”这天，他们以迫击炮等重武器轰击，我们看见地形不利，就决定连夜撤退，第二天上了清水县的大麻子山。我们在山腰的田埂后面埋伏了7000多人，在后面纵深地带是我们的第二梯队，有1万多人，还有数千骑兵把守在通往张棉驿和马鹿镇的两条要道上，以防敌人援军的袭击。我们2万多人，只有六七十枝步枪，要想凭枪炮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想了个土办法，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叫大家听指挥，我打三枪，大家就冲锋。我不打枪，大家不许动，也不许开枪；第二，每人就地在身边碾碎一堆土，冲锋前乘风把土对敌人扬起，作为烟幕弹。中午，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顿时满山枪炮声隆隆，烟尘遮天蔽日，鸟兽惊吓得乱飞乱跑。突然，敌人停止了射击，阵地前面像死一样寂静，敌人如潮水一样向山上涌来了。敌人爬过田埂，离我们越来越近，50米、20米、10米……已经到了我们面前的最后一道田埂了，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力。“叭！叭！叭！”我打了三枪，7000多战士从田埂后面同时跃起，把土朝敌人扬去，敌人一阵混乱。我们立即跳下田埂，举起斧头、大刀向敌人猛砍，敌人一排排地在我们面前倒下。

我们继续追击溃逃的敌人，连投降的敌人也没有逃过我们的刀斧，等我和一些指挥员赶来制止，只剩下3个活的。我们发现俘虏的腰间都缠着又粗又长的绳子，便问：“这是干啥用的？”他们战战兢兢地回答：“我……我们以为一打……你们就垮了，这是准备……捆你们用的。”哈哈哈！战士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这一仗，我们杀敌900余人，缴获敌人的全部机枪和800多枝步枪。我们的30多个弟兄也壮烈地牺牲了。在掩埋好他们的尸体后，又继续前进了

在行进至张家川我们又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敌人兵力雄厚，对我们作战不利，因此决定北撤，经华亭、泾源、隆德，于

五月初四到海原县烂泥河一带。在板石窑的森林里，我们找到了前三天被敌人屠杀的许多起义者家属的尸体，有一个孩子还爬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吃奶，当我们把他抱起来时，许多老乡看着都哭起来了。

一路上，我们边走边战，国民党的好几个师在后追赶着。撤退到西吉县时，郭南浦从兰州派了个姓马的来找我。那个姓马的对我说："团长，你看咋样？国民党希望你过去，你要地盘，可以给你们几个县。"我说："我要陇东17县，你看怎么样？"姓马的说："我汇报了上级再说吧！"呸！我在姓马的背后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心里说：你当我们是傻瓜，我们会忘记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吗？！你们又想来玩弄阴谋诡计了，我不上你们的当！姓马的家伙一走，我知道，我们和敌人的最后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自从起义以来，我们的队伍每天打仗，从未得到休整，早已人困马乏，粮草奇缺了，现在后面还有强大的追兵，难道我们真的去投降敌人吗？不，决不能走这条路。然而，出路又在哪里呢？我的心像一扇磨盘一样沉重。突然，一道刺破黑暗的光明照亮了我的心扉，我想起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一些亲眼见过红军的曾说过：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打人，不骂人，主张打倒土豪劣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还想起，第二次起义时，马国瑞也曾几次说过："我们应当去投奔红军……。"

在陈家大坪土窠子，我和部分指挥人员开会讨论，决定走边区投红军。当时，在我们中间也是有分歧和犹豫的，因为我们对于红军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队伍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不少人恋念乡土，不愿去边区；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宗教上层分子则害怕共产党，不敢去边区；还有一些被迫参加或来投机的地主和土匪等则根本就不想去边区。当时，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我没有把会上的决定告诉大家。

五月十二日，我们两万人马由土窠子出发，朝边区的方向前进。在全儿湾，敌人的6个师，加上保安团和自卫队总共7万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反复冲杀了20多次，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死了几千人，我们也牺牲了1000多。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我们撤退了。

第二天，我们向海原县前进。一路上只靠吃野菜充饥，身上的衣服早已变成了破布片儿。到石县子，这是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庄子，我把在土窠子作的决定告诉了大家："兄弟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到边区去投红军。我们参加队伍都是自愿的，愿意去边区的就跟我走吧，不愿意的，各讨方便。"听完我的话，许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眼泪。

我们怎能不悲痛呢？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剥削与压迫，从第三次起义以来，将近40天，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牺牲了多少兄弟的生命！流了多少鲜血，现在眼看着起义又失败了……难道我们只有永远做奴隶的命运吗？难道我们对敌人的仇恨还不够深吗？难道我们和敌人搏斗时还不够勇敢吗？那末，为什么我们一次、二次、三次举行的起义总砍不倒暴君们的宝座呢？这天下午，几千个心里有疑问和不愿去边区的人走散了。五月十八日，我们到沙沟的只剩下400多人，决定连夜通过敌人封锁线挺进边区。这时马国璘也不愿走了，对我说："你先走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找我。"深夜里，在马东山跟前，土匪出身的团副带着100多人悄悄地走了，我们只剩下200余骑。我骑着马，在山头上望着黑沉沉的地方，心里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心想：明天，明天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但是，我已下了决心，不管怎样，就是死，也宁愿去边区死在红军手里，决不愿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我回过头，用力把手一摆，对大家说："走吧！"我们200多人就一齐策马扬鞭前进了。

四、沐浴在阳光中

1941年6月9日，我们一行200多骑进入了边区。越往延安的方向走，欢乐、自由生活的景象就越明显了。在庆阳县，我们和边区司令员萧劲光、358旅旅长王维舟接上了关系，就住了下来。党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送来了衣服、鞋子，还宰了许多羊招待我们，但血战40多天的战友们一躺在草铺上就呼呼睡着了。

“你们要不要去延安见见毛主席？”肖司令和王旅长问我。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够见着毛主席，如果能去见一见他老人家，那太好了。到了延安，我和4个同伴住在交际处。我们参观了民族学院、抗大、鲁艺、医院……。在民族学院，我还作了一次讲演，说到我们受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三次革命起义失败的经过时，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7月下旬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中午刚吃过饭，杨静仁同志喜冲冲地走进屋子里说道：“思义，边区政府打来电话，毛主席在那里要见你哩！”我跑过去紧紧握着静仁同志的手，心跳得很厉害，简直说不出话来。一到延安，就天天想着，早些见到毛主席。现在这个愿望要实现了，怎么能使我不激动呢！

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了边区政府院子正面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两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见了我，连忙站起来，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不由自主地高喊了一声：“毛主席！”

“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毛主席背着手，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

当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整个回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是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关怀。临别时，毛主席对我说：“你回去，代我向200多位战士问好！”

1941年8月，党中央批准我们成立了“回民骑兵团”，我担任了团长，杨静仁同志担任政治教员，马克同志担任文化教员。由于我们回民骑兵团的成员成份不纯，思想复杂，加上有些士兵思家心切，到11月我们又离开了边区。但是，一到家乡，那残酷的现实又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家11口人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敌人一知道我们回到家乡，就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企图一网打尽。我们连夜突围，经过14天的战斗、辗转跋涉，怀着悲痛、惭愧的心情又回到了边区，回到了党的怀抱。至此，我们才认识到党一再告诫过我们的话：没有党的领导，农民革命不可能成功。我们需要学习，思想要改造。

1942年春天，我和几个回民骑兵团的干部进了延安民族学院。半年以后，我又转到抗大学习。在革命大家庭中，我们一方面受政治、军事训练；一方面学习文化。经过了整风运动，同时还参加大生产，大家都学会了纺织、木工、种田。虽然我们只有不多几个回民，学校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为我们特设了回民灶。这几年来，每当我受到党的教育，看到党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时，我总想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残酷迫害，使我对敌人的仇恨就更加强烈，倍觉党对我们是多么温暖、亲切。

转眼就是1945年秋天了，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国民党反动

派撕毁了“双十”停战协定，挑起内战。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我在抗大提前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何长工副校长给我们讲了话。接着，学员们分别各赴革命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返回原来的单位，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分配到各地工作，我仍回到骑兵团。

当我走进固城小庄子，急于想看看一别三年多的回民骑兵团的同志们。头一个就遇见我弟弟马思贞，他正拿着镰刀和绳子走着，看见我就亲切地说：“哥哥，你回来了，我们今天要割完最后一点糜子呢！”我问：“怎么，你们不再练兵了？”马思贞说：“我们一面练兵，一面搞生产哩！”我随着思贞朝庄外走去，远远就听见山坡那边传来歌声和笑声。思贞说：“这一带都是近两年开出来的荒地，你看庄稼长得多好！我们每人差不多开了20亩地呢……这3年里，回民骑兵团的变化可大啦！哥你不记得？过去，我们看见八路军种田，还说咱们军队管打仗不管种田。如今，我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懂得为什么要生产了。我们要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呀！你看，我们刚来时，马草都要385旅拨给，现在啥也都能自给啦！”

年轻的战士马智俭问道：“团长，你回来啦？我听说咱们现在要和国民党那些坏蛋打仗了！”我问他：“听谁说的？”马智俭说：“我们这里有《解放日报》、《人民战士》，都说国民党在各处加紧对我们封锁，准备进攻呢！”我又问：“如果打起来，那你打算怎样？”马智俭忸怩地笑着说：“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啦，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命令！”面对这个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的青年，我心中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在1941年冬天，我们回民骑兵团有些同志闹着要出边区的时候，这个心地纯朴的青年，因为想家，也一起随大流走了出去。想不到在党的教育下，才不过3年多的时间，他就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五、子午岭上红旗飘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8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我们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攻势。这时，我们回民骑兵团在陇东分区驻防。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陇东的主力部队调去保卫延安了，整个陇东只剩下我们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连分区地委干部在内，总共一千四五百人，而敌人的兵力却有5万多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能和敌人硬拼，去争一城一镇的得失，而应当在本地区内坚持游击战和持久战，诱敌深入，然后待机反攻。自从这年敌人开始向陇东进攻以来，我们退出了环县、曲子、庆阳，接着又退出了华池和合水县。敌人的气焰越嚣张了，现在他们又妄想越过子午岭向老边区纵深进攻。突然，司令部的通讯员在我背后喊了一声报告，说："马团长，徐副司令员请你马上去开会！"徐国珍副司令员在会上报告了最近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根据田家洼子和红土嵋岘一带老乡送来的情报和我们自己的侦察，已经了解清楚，在惠安城里驻扎着国民党2000多骑兵，这些家伙非常野蛮嘌悍，因为他们头戴钢盔，所以老乡们都叫他们'铁帽军'。最近他们每天派出二三百人到红土嵋岘一带进行武装侦察，看样子，是想占领红土嵋岘前面的高山，然后进攻二家川。"徐副司令员点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同志们，虽然目前在整个陇东战场上，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好几十倍，但是战线延长了几百里，他们兵力很分散，这就为我们反击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现在是我们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党委决定要在最近打一仗，以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你们看这个仗有把握吗？"我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副司令员的分析和意见，我们骑兵团愿意担负这次出击任务！"

"那好呀！"徐副司令员笑着问道："不过这个仗你们准备

怎么打呢？”

“报告副司令员，我们对红土嵊岘的地形非常熟悉，那里很适合打游击战，等敌人的武装侦察部队来了，趁他们立脚未稳，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惠安城里敌人骑兵虽然很多，但离红土嵊岘还一二十里，如果我们能迅速解决战斗，胜利一定有把握！”经过研究讨论，徐副司令员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由我们骑兵团打主攻，并由两个步兵团配合。

第二天晚上，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大家衔枚疾走，拂晓4点钟到达红土嵊岘，立刻进入隐蔽区。红土嵊岘下面有一块洼地，是来往必经之路。洼地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林后是起伏的高山。我带着第一连埋伏在洼地正面的密林中，其余的骑兵和两个步兵团分别埋伏在两边的树林中和高山上。

上午10点左右，敌人将近300名骑兵由惠安城出发，走了15里，来到红土嵊岘的西山脚下，派出40多名尖兵下马搜索前进，目的是想熟悉地形并侦察我军的虚实，其余的200多名骑兵登上西山掩护，随时准备出击。我们远远地就看见了敌人的尖兵扛着两挺机枪，排成两路纵队，由几个“黑狗子”带路，沿着山沟向洼地走来。11点整，敌人离我们埋伏的地点只有300米，“叭！”我首发一枪，发出冲锋命令，顷刻间我们一连骑兵从密林中冲出，这时由老乡组织的担架队也在四周呐喊助威，喊杀声震天动地。在西山上打掩护的敌人一听到炮声、喊杀声，知道情况不妙，就想奔下山来接应，他们刚一出动，就被我们集中在东山上的20几挺轻重机枪一齐扫射，把跑在最前面的十几个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其余的连忙退回山上。我们居高临下，火力集中，敌人的第二次反扑，又被我们压下去了。

这时，我们一连早已冲到洼地中央敌人尖兵的跟前，敌人还想顽抗。战士们收起长枪，从背上取下镶着六七尺长木柄的斧头和大刀，狠狠地朝敌人砍去，就像砍瓜切菜一样。这些武器用来

打肉搏战，敌人只要一看见它，连魂也会被吓掉的。这次战斗中，全团有名的猛将、排长杨生华一连斩杀、俘虏了好几个敌人。他杀得兴起，把身上的衣服都脱光了。敌人钻进一片黑刺林，他也跟着往里钻，身上被刺破了好些处，流着血，他也不顾，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捉活的，别让这些家伙跑啦！"

在一座密林深处，我们有个大个儿的战士追上3个敌人，他举枪射击，没有打响，他心里一愣，但是丝毫没有犹豫，便一个箭步窜到敌人跟前，用枪口对着敌人大喊道："缴枪不杀！"3个失魂落魄的敌人乖乖地扔下武器。正好，另外几个战士也赶到，他们收缴了敌人的武器，一起押着往回走。那位大个儿的战士板开枪拴一看，便笑着说："好悬啊，枪膛里连一颗子弹也没啦！"

当惠安城里敌人的大队骑兵赶来，战斗早已结束，敌人怕我们后面有大部队，未敢还击就夹起尾巴逃回去了。这一仗仅仅打了15分钟，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除两名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消灭或俘虏，而我们却无一伤亡。

这次战斗为陇东反击打响了第一炮，当我们打扫了战场，把队伍集合起来后，这时，我听见从我们的队伍里，从周围的山头上爆发出了"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我们的红旗在子午岭上高高飘扬。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由西海固回民起义队伍组织起来的回民骑兵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宁夏回汉支队

孙国标　胡迅雷

宁夏回汉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建立的一支以宁夏籍干部、战士为主，由回汉族人民参加的革命武装。它转战于宁夏的盐池、同心，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吴旗，甘肃的环县等地及内蒙古边缘地带，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宁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宁夏解放前，军阀马鸿逵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全省原有70万人，养活10万名国民党军政人员。苦难的民众愤怒控诉："养下儿子是马家的，打下粮是蒋家的，赚下钱是县长、乡长的。"苛捐杂税，派粮抓兵，使人民难以忍受。马鸿逵为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普遍实行常年国民兵训练，造成大批民众逃亡躲兵，三五成群地涌向边区的定边、盐池一带。1946年初，逃到定边、盐池的回族民众已达3千人，这些难民对于马鸿逵的暴政是极端不满的。定边县城在1936年只有一户回民，到1945年发展成回民一条街。我党为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定边县城西关成立了回民自治乡，并为发展回民教育设立了伊斯兰小学。三边专署增设了民族科，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起到了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作用。宁夏还有许多穷苦人在打盐、拉骆驼过程中，接触到我党工作人员，将革命道理加以

传播，为我党在宁夏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展全面内战，派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马鸿逵部不时派兵对边区进行袭击、骚扰，边区军民奋起自卫。余庄子、红井子和三段地工作据点根据上级关于扩兵的指示，分别于7月建立了游击武装。到1946年冬，余庄子游击队已有80余人，红井子游击队发展到50余人，三段地游击队10多人（后合编于余庄子游击队）。

1946年11月，在三边地委领导下，回民金三寿等在定边县西关回民乡和盐场打盐队回族群众中活动，成立了回民支队，约100余人，在宁夏的灵武边境，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发展壮大队伍。

上述革命武装力量，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几经曲折，终于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不久，就投入了保卫边区的战斗，推动了回汉支队的诞生。

二

1946年11月，马鸿逵看到全国内战已起，趁我军主力集结在其他战场之机，于11月16日出兵侵占盐池县的兴武营、大圪塔、天池子等地，马鸿宾也派他的35师103团侵占盐池县的石家圈、长流墩等地。12月4日，我三边主力部队警备第3旅8团，夜袭兴武营，痛击马鸿逵骑兵19团。在这次战斗中，余庄子游击队曾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回民支队奉命到盐池叶湖井一带牵制敌军。红井子游击队曾两次向西出击，摧毁了王庄科乡公所和击垮狼布掌国民兵训练队，解散了几百名被强制受训的农民，造成很大影响。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何广宽部向下马关一带出击的消息。

在兴武营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为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打击敌人，保卫边区，向宁夏地区发展，经西北局批准，三边地委和

三边军分区决定将余庄子、红井子游击队和回民支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1947年元月中旬，在三边军分区所在地——定边城南关，召开了回汉支队成立大会。三边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朱敏、曹又参、郭宝珊、赵忠国（即孙殿才）等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们阐述了成立回汉支队的意义，指出回汉支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击马鸿逵及其扶植的地方反动武装，有效地控制三边这块战略要地，为解放宁夏打好基础。回汉支队的建立，标志着宁夏人民武装的诞生，它肩负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重任。他们号召回汉支队全体干部战士加强团结，勇敢对敌作战，发展壮大队伍。大会在“解放宁夏”的口号声中，宣布回汉支队正式成立。

三边地委确定，回汉支队在政治上属绥宁工委（后称宁夏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领导，为团级建制。回汉支队整编后，共有232人，其中党员47人，回民65人，宁夏籍人占90%。回汉支队设正副队长、政委、参谋、政治干事、副官、教官、书记、军医、事务长、上士（生产管理员）、通讯排、号目长等。支队下辖3个中队，中队部设正副队长、指导员、司务长、文书、上士、号兵。每个中队下辖2个分队（其中一中队有3个分队），分队下设3个班，每班6—8人。一中队70人，二中队54人，三中队68人，支队部25人，学习班15人。刘振宇任支队长，金三寿任副支队长，梁大均任政委。

回汉支队成立后的主要困难是：大部分战士觉悟较低，部队成份复杂，纪律松懈；经费困难，部队无军装，连菜金也无法保证，生活艰苦；部队武器装备不足，只有步枪130支，机枪1挺，子弹2000余发，数量少，武器破旧，不少战士还是徒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支队成立后即在定边南门外进行训练。采取了如下措施：1.各队举办训练班，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2.通过审查，清除不合格人员；3.照顾部队家属（有家属的干部和战士24家），安定人心；4.集中部队物资进行生产自救，解决

经费。

1947年2月，根据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开赴盐池县四区政府所在地——雷家沟进行整训，继续扩军和准备西进。这次整训，主要是以政治教育为主，提高觉悟，加强组织和纪律观念，辅以军事常识学习和简单的战术训练。部队还专门举办了干训班，讲授政治课，对班以上的干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教育。根据西北局的指示，回汉支队要继续扩充到500—1000人。为此，部队除在盐池四区扩充人员外，还派人到红井子、余庄子、三段地联系扩军，10天内扩充了几十人。由于人员增加，支队由3个中队增设为4个中队，干部也作了调整。雷家沟整训，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胡宗南进犯延安。马鸿逵和马鸿宾也于3月底出动4个师约5万余人进攻盐池、定边、安边。马鸿逵部暂9师先头部队进抵距雷家沟约20里时，回汉支队连夜撤离雷家沟，经马坊、太平庙撤至坂窑，在赴羊圈山途中与马鸿宾部3个团遭遇。由于回汉支队占据有利地形，敌人不了解我方虚实，不敢贸然进攻。回汉支队对敌进行袭扰后，随即撤上羊圈山。与此同时，马鸿逵部已相继侵占了盐池、定边、安边等地。在这种情况下，回汉支队决定向南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活动。

回汉支队从羊圈山撤离后，经范源到吴阳山。这时，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邓国忠来到回汉支队驻地，传达了敌人侵占三边的情况和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司令部的决定：改“回汉支队”为“宁夏人民解放军”，以扩大部队编制，造成声势。宁夏人民解放军司令员为赵忠国，政委邓国忠，副司令员梁大均，政治部主任何广宽，参谋长刘振宇（后为郝耀）。下辖一支队（即回汉支队）和新建的第八挺进支队。回汉支队兵员300余人，支队长刘振宇（兼），政委梁大均（兼），副政委马立凯；下辖3个大队。

第八挺进支队兵员200余人，支队长金三寿，政委何广宽（兼），副政委彭华庵；下辖3个大队。

部队改编后，决定第八挺进支队西进解放甜水堡，打到同心、中宁，在罗山建立根据地。第八挺进支队在何广宽、金三寿、彭华庵率领下开始西进。这时，由于敌人占领三边，整个形势对我军不利，因此，原定八支队解放甜水堡、进占罗山已不可能，便决定停止西进，转向唐平庄与回汉支队会合。

两个支队会合后，决定向陕甘宁交界的王标台转移，伺机出击敌人，经两夜行军到达王标台。这时，马鸿宾部骑、炮各一个连，经王标台、刘崾岘进攻环县，在王标台与宁夏人民解放军发生激战。八支队抢占了大坝嘴塬上的高地，没有遭受损失。午后，一支队与敌军在王标台交战。敌军集中炮火猛轰我方阵地，步兵顺着山势往下冲锋。一支队被三面包围，背崖作战，加之兵力、武器的巨大悬殊，战斗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形势非常险恶。支队长刘振宇受伤被俘，战士纷纷跳崖撤退。当晚，部队在范源畔，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向老爷山突围，争取与我陇东军区保安二团会合。会后开始行动。部队行至杨掌附近时，又遭团匪袭击。部队主力在拂晓前穿越要隘桥儿沟，到达环县老爷山与陇东保二团会合。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王标台战斗中被打散的回汉支队部分人员。这次战斗我军共伤亡40余人。

次日，宁夏人民解放军领导干部在老爷山敬崾岘召开会议，研究部队如何行动。会上有两种意见：一、部队向西到盐池五区、定边七区一带打游击，并寻找支队长刘振宇的下落；二、认为王标台一仗部队损失很大，需要到后方去休整。最后经过讨论，决定部队撤向吴旗整训。经过几天急行军，部队安全到达吴旗，与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取得了联系。这次“宁解”保持原建制转移到吴旗（还剩300余人），并且保护和带出了盐池县五区的干部和民

兵以及土改团工作人员，对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也为后来部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受到三边地委和军分区的表彰。

部队到达吴旗后，邓国忠便调回三边地委。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三边军分区派郝耀任宁夏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一支队（回汉支队）队长，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这次整训先后在蔺家砭、金佛坪、阳庆川、三道川等地进行。由于当时三边战争形势紧张，部队是在连连失利情况下撤到吴旗的，因此，战士思想波动较大，甚至个别人产生了悲观情绪。针对这种状况，整训着重抓思想和形势教育，大讲全国形势，用陕北战场青化砭、羊马河战役的胜利鼓舞战士，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针对部队组织不久、军事素质差的状况开展了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并总结了历次战斗经验。这次整训中，决定取消一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的番号，将原2个支队的6个分队合编为4个队（共300多人），支队部和军部合为一个单位，恢复回汉支队的建制（保留宁夏人民解放军的名称）。经过半个多月的整训，稳定了部队情绪，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战术水平。

从支队成立到吴旗整训，历时5个月，是回汉支队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但部队经受了考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渡过了难关。

三

1947年6月，西野继蟠龙大捷后，挥师西进，直取陇东，威逼环县。在此胜利鼓舞下，回汉支队（即“宁解”，下同）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要求打出去。支队领导人决定去环县找西北野战军求援，解决武器装备问题，派金三寿、何广宽带两名战士先行前往。金、何两人到达西野司令部驻地后，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得知他们是一支宁夏人民武装很高

兴，给予了鼓励，答应打下环县后给一些武器，并指示各部大力支援。几天后，西野攻克环县，将缴获的一部分武器分配给回汉支队。6月23日（端阳节）早晨，梁大均等带领部队赶到环县，每个战士都领到了枪，各个连队都配备了机关枪、掷弹筒，部队情绪活跃，士气空前高涨。回汉支队战士们把这次到环县领枪，叫做“彭总赠枪”。

西野打下环县后挥师北上，直向定边。回汉支队也跟随北上。1947年6月29日，在吴旗头道川的王台吃午饭时，二纵队司令员王震来到回汉支队驻地，与战士们一同吃小米饭，和干部谈话，询问情况，并赠送卡宾枪作留念。梁大均、何广宽随王震到二纵队所属的独4旅和359旅谈了宁夏马鸿逵军队的情况。当时，王震司令员提出要回汉支队调几名回族干部支援主力部队，支队当即将杨吉德、马天忠等3名回族干部调给西野。

6月底，回汉支队随西野四纵队出发，过环县，收复定边。7月初，西野决定收复盐池，为防止敌人逃跑，我军扩大包围圈。回汉支队奉命进抵盐池县城北面的土沟，拦截敌人。7月7日，马部骑兵20团果然向土沟逃来。回汉支队早就设下埋伏，打退敌骑多次冲锋，打得敌骑互相冲撞，狼狈逃命。战士们纷纷跳出战壕，追赶敌人。战士何占龙端着机枪边跑边射击，敌骑纷纷落马。此战，毙伤敌数十人，缴获一部分战马，受到西野一纵队张宗逊司令员的表扬。盐池土沟战斗后，部队进驻马坊一带进行整训。

回汉支队自“彭总赠枪”，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定、盐一带，补充了装备，壮大了力量，素质明显提高，战斗力空前增强，士气高涨，面貌大为改观。这是回汉支队由弱变强，逐步走向正规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战略反攻问题。会后，西野主力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从三边挥戈北上，佯攻榆林。回汉支队返回盐池南山一带。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三边地委的决定，1947年7月，部队在盐池县北马场宣布取消“宁夏人民解放军”的建制番号，恢复了回汉支队的名称，干部作了调整。赵忠国调回地委统战部，参谋长郝耀调回军分区司令部，何广宽仍搞红井子工委工作。原警3旅8团副营长刘思孝接任回汉支队队长，梁大均仍为政委，金三寿仍为副队长。支队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梁栋岳任总支书记，彭华庵任组织委员，杨生桂任宣传委员，以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

1947年8月8日，西野撤离盐池。马鸿逵部于8月12日再次进犯盐池、定边。回汉支队随同我三边党政军机关再次撤到吴旗一带山区，一面继续整训，一面防备敌人进攻，并派出一部人员担任掩护红井子、余庄子工委的工作。

由于部队东移，回汉支队基层干部和战士思想上又有波动。绥宁工委于8月22日在张阳湾召开会议，讨论了支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件，讨论全国形势，加强革命人生观教育和时事教育。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发展了一部分党员，整顿了部队纪律。为进一步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成立了支队党委，以梁大均、刘思孝、梁栋岳、金三寿、马立凯为委员，梁大均任书记。

部队在这次整顿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较大的整编。支队转为团级建制，队部设立了参谋、政工和后勤班子，下辖直属警卫通讯排和4个中队，总兵员达400余人。部队在整编的同时，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除讲授军事技术知识和进行战术训练外，还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为适应战斗需要，集中力量开展了山地作战训练。经过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

1947年8月底，马鸿逵部两个团进犯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

部驻地——吴旗。敌军由三边清乡团张廷芝部作先锋，进抵孙克崾岘一带，回汉支队奉命牵制和监视敌人。敌军又推进到新安边，因得不到我三边党政机关驻地消息，又怕遭我军突然袭击，于是敌人只好向定边撤退。回汉支队派二中队尾随其后，伺机收拾敌军散兵。在狼崾岘与张廷芝部遭遇，将敌打散。

狼崾岘战斗后，张廷芝又派齐仁得率领团匪一个营窜抵新安边一带，企图袭击我军分区机关驻地凤凰寺。回汉支队闻讯后，即以二中队为主，阻敌于梁天池和赵崾岘。敌人依仗优势兵力，将我支队分割在两个山头上轮番进攻。支队凭借有利地形固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经一天一夜激战，终于将敌击退，对保护掩蔽在山后的我军后方仓库和医院以及家属的安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三边军分区的表扬。此役是回汉支队吴旗整编后的第一次恶战。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以弱胜强，增强了领导和吴旗群众对回汉支队的信任，扩大了影响。

在沙家店战役胜利后，我西北野战军转入反攻。1947年秋冬，回汉支队逐渐前进到定边海底涧、杨山涧、油坊涧等半山半滩的地方活动。部队在这里几次击退定边团匪的零星骚扰，保护了这一带群众的安全，战斗间隙还帮助群众秋收，深得群众的爱戴。

1947年11月，我西野主力在榆林外围歼灭敌22军及马鸿逵援兵2000余人，迫使马军龟缩在盐池、定边等几个据点内，不敢贸然进攻边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便成为回汉支队的主要打击对象。回汉支队在1948年元月从吴旗向西推进到定边的最西边，即六、七区一带，于春节前到达蔡家峁。这一带团匪活动比较猖狂。在回汉支队到达蔡家峁的次日，区干部报告，团匪敬明君在姬塬和左塬一带抢劫。回汉支队立即轻装出动，团匪闻讯而逃，我部连续追赶一天一夜，直追到环县李慧台，保护了当地群众过好春节。

1948年2月，我三边地委决定，消灭宁条梁的团匪冯海潮连，清除定榆公路上的障碍。回汉支队奉命配合警3旅8团和蒙汉支队等一起攻打宁条梁，将敌人包围于柳桂湾、强寨子。经过激战，击毙匪连长冯海潮，俘获国民党安边县长及冯部100余人，拔掉了安边和靖边之间的钉子。此战俘虏人员的一部分，经审查后，补充进回汉支队。

1948年3月份，回汉支队奉命开赴吴旗县阳庆川进行整军。这次是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部队战士普遍开展诉苦，控诉了蒋、马的罪恶，提高了阶级觉悟，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这个根本问题。同时教育战士树立坚定的革命理想，从根本上肃清狭隘的民族隔阂和陈腐的地域观念，增强了部队内部的团结统一。还组织干部战士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解放战争的目的和解放军的任务，大大增强了纪律观念和革命自觉性。各中队还通过办墙报、刷标语、组织歌咏队、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提高战斗力、迎接宁夏解放，部队开展了扎实的练兵运动，专门进行攻坚战术训练，并发动战士绘制宁夏各县地形、地物图，积累战术资料。各中队都成立了民运小组，专门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统一负责改善驻地军民关系事宜。

通过这次新式整军，回汉支队的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队纪律和团结大大加强。回汉支队成为一支有觉悟，打不烂、拖不垮、冲不散，装备齐全，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新型人民军队。

四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宜川大捷，歼敌3万余人。三边地委决定绥宁工委及所属回汉

支队抓紧这个有利时机，用全力开展宁夏工作，并积极主动地在宁夏境内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陕北遭灾，加上战争破坏，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回汉支队坚决执行上级关于“打出去就食”的指示，于4月2日离开吴旗，随同三边军分区的二、八团，在定边一带会齐，向西转入外线作战，首要目标是攻克盐池西部重镇惠安堡。

惠安堡地处盐池、同心、灵武、金积四县交界地带。1936年6月我西征红军解放盐池县城后，马鸿逵的盐池县政府即设于此地，是马鸿逵在陕甘宁边区西大门设置的一个顽固堡垒，也是马部防卫宁夏的重要据点，驻有马军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清乡团，共约300余人。拔掉这个钉子，就打开了解放宁夏的大门。4月10日下午，回汉支队和二、八团以及盐池县游击队在苏家堡子集中出发，奔袭惠安堡。当时敌骑兵连已调出。我军包围了清乡团，由二、八团担任主攻。回汉支队配合作战，在惠安堡通往韦州的路上设置阵地，准备阻击韦州增援之敌，并拦截惠安堡逃出的敌人。战斗打响后，金三寿带领一个排到战斗外围游击歼敌，相机潜入敌盐池仓库搬运物资。经过一天激战和政治攻势，守敌被迫交械投降，惠安堡宣告解放。此战，俘虏了敌盐池县国民兵大队长和警察局长赵耀西等30余人，捣毁了敌县政府、国民兵司令部，收缴了许多枪枝弹药和档案。

惠安堡战斗结束不久，二、八团开往陇东活动，宁夏工委和回汉支队继续西进，开辟宁夏工作。当时组织了西进指挥部，由赵忠国任总指挥，军事上由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负责。决定以回汉支队及盐池、定边游击队为主，继续向盐、环、同边境一带前进，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武装，为解放宁夏扫清道路。回汉支队奉命进驻甘肃环县的丰太堡一线，开始了艰苦的剿匪斗争。

同心、环县一带地处省界，历来匪患严重。当时，这一带共

有大小10余股土匪。势力较强的有：镇原清乡团的敬明君，环县甜水堡的赵清彦，各有200多人；环县垦区清乡团的李阳珍，有数十人。此外，还有刘世颜、赵怀章、张瑞兰、李林武、史彦芳等，号称是这一带的“八大山王”，兵力共800余人。他们投靠马鸿逵，组成清乡团，在马鸿逵扶植下，凭人熟地熟，时分时合，出没无常，不断袭击我基层政府，屠杀干部，残害群众，截劫我支前物资，是我陕甘宁边区的心腹之患，也是解放宁夏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我西进部队必须清除这些障碍。为此，回汉支队首先选择赵清彦作为主要打击对象。

赵清彦是盐、环敌“游击大队长”。1947年3月马鸿逵进攻三边时，他侵占了我甜水堡，以此为据点，出没于我盐池五区、环县耿湾区和定边六、七区抢劫财物，破坏我基层政权，组织伪保甲。5月2日，回汉支队由环县丰太堡出发，经一夜急行军，3日拂晓前袭击甜水堡，将赵匪击溃，并追敌10余里，俘3人，打伤2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3支，子弹300余发，物资一部分。

回汉支队打下甜水堡后，又会同盐池县骑兵游击队，奔袭赵清彦的老家——李家口子，将其院落包围，活捉了赵清彦及其随从4人，并没收其羊、牛、驴300余头。距李家口子20余里的赵匪40多人闻风而逃。我党建立了里山、甜水两个区政府，回汉支队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参加建政工作。

活捉赵清彦后，回汉支队得知刘世颜率30余人在同心下马关附近活动，支队就连夜出发，拂晓前赶到下马关附近的白家滩，活捉刘世颜，消灭了全部土匪。

接着，回汉支队又和环县保安大队联合围攻李阳珍。李闻风将队伍拉上山，回汉支队搜山未果。后得知李逃回李家湾子，回汉支队连夜袭击李家湾子，李阳珍丢下枪弹文件逃跑，从此李匪人马全部瓦解。

至此，仅剩下势力较大的敬明君。他是盐池县敌“游击大队

长”，号称有120余人，实际有90多人。敬明君气焰嚣张，曾在耿湾区老虎口子偷袭过回汉支队，使我指导员马琳等3人牺牲；1948年8月，又趁三边军分区“七七剧团”进行慰问演出、回汉支队在唐平庄休息看戏之机，偷袭我甜水堡区政府，杀害我干部两名。回汉支队会同盐池县保安大队在刘家口子痛击敬明君，缴获其坐骑，将敌一直追到八里堡。敬狼狈逃窜，从此元气大伤，潜逃他方。

这样，盘踞在盐池、环县、同心一带的所谓“八大山王”烟消云散。我军势力以甜水堡为中心，一直扩展到同心的豫旺、锁家岔、下马关和盐池的萌城一带。这一带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我军处于绝对优势。回汉支队剿匪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当时中共三边地委办的《三边报》报道说，“听说回汉支队来了，土匪就吓跑了”，这就是回汉支队勇猛剿匪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1948年春攻打惠安堡、收复甜水堡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回汉支队主动向敌区出击，连续不断向西挺进，打击消灭盐、环、同一带团匪，摧毁敌人的保甲组织，收复、扩大根据地，帮助建立区、乡人民政权，积极为解放宁夏做准备。

1949年9月，解放军分三路进军宁夏，回汉支队也在胜利声中奉命进入宁夏。先抵达吴忠羊马湖，补充重火器，组建了骑兵队。后又奉命开到同心下马关一带剿匪，数月后返回驻永宁塔桥。1950年元月，回汉支队进驻银川，与定边县大队合编为宁夏独立团，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授团旗，刘思孝任团长，政委王兴邦，副团长许学道。元月12日，部队调防磴口。6月调驻永宁塔桥进行改编，调拨给榆林一个营，其余编入各县保安队。后又组编为公安纵队，最后成为宁夏独立师，其中一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至此，回汉支队完成了肩负的“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历史使命。

昌吉县回民起义纪略

吴英等口述　丁承平等整理

一、动乱的局势

1931年哈密农民起义，请马仲英第一次入疆，支援处于劣势的农民义军。十月，马仲英军事上未获胜利，便率部退回河西，改变对新疆的作战方略。1932年8月，马仲英派马世明入南疆，骚扰金树仁的后方，切断粮源；派马赫英入北疆，占据阿山，向塔城发展，争取哈萨克；派马全录、马德祥到天山南北活动，威逼迪化，动摇大本营。这三股势力受命后，各自到指定的地域内宣传民众，发展武装。仅半年多时间，全疆烽火四起。迪化经过几次马军攻击后，不仅内部秩序未复，难民嗷嗷待哺，且因战争死亡军民暴尸荒野，疫疠蔓延，虽有慈善机关救济与掩埋，仍无补时艰和安定人心。

昌吉与迪化毗邻，迪化动乱，莫不波及昌吉。早在马仲英第一次入疆时，这里县政府就十分吃紧，纷纷挑选民丁，组织民团，准备武装自卫。1933年春，马全录、马德祥围攻迪化，昌吉波澜又起。一方面，马全录部经常潜入昌吉，进行鼓动宣传；另一方面，官府加紧对回民镇压，经常唆使民团出没回族农民居住的村落，以稽查为名，寻衅闹事。2月初，县政府逮捕南关马成（回族、河州人，杨增新时期官吏），以通匪罪，就地枪杀。当时陪杀的还有三岔口村回民乡约米万成。

面对残酷的现实，昌吉城乡回民都十分惊慌。当时，由哈密逃往昌吉避难的王明德（哈密稽查，杀害起义农民的刽子手，河州人）向南关回族巨商陕西寺理事洪福元建议，组织商团，武装自卫。洪福元为保护自己的家产，采纳王明德的建议，向官府报告，愿组织商团，与民团联防，共同保卫县城。洪福元为了取得官府的信任，还表示愿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搬进县城作抵押。县政府为了壮大自卫能力，批准成立商团，任命洪福元为团长，王明德为副团长。商团成立以后，积极配合民团行动，在南关各巷口设卡，昼夜稽查，盘问行人，昌吉城乡形势一时显得十分紧张。农村的汉民设法躲进县城，回民则携带老小弃家出走，全县处在一片慌乱之中。

二、河州工回民兴兵抗暴政

1933年2月中旬的一天，马全录的手枪队10多人，由林生福带领来到昌吉县河州工，住进乡约吴天福家（回族）。林生福下令找来农官王登科（回族）、马金良（前乡约、回族）等人，对他们进行宣传鼓动后，即任命王登科为团长，马金良为副团长，吴天福、张万有、依司马尔为营长，要他们发动民众，组织队伍，攻打县城，配合马全录推翻金树仁政权。王登科等人受命后，又任命小马应海、蒋明忠、单土满拉等10多人为连、排长，叫他们分别动员回族青壮年当兵。这些人都是本地行政长官又兼宗教头人，有很大的号召力，三五天内就将河州工、军户一带的回民青壮年组织起来。这个团约500人上下，自称革命军。

河州工回民兴兵的消息使官府万分惊慌，加强了镇压防范措施。2月20日，三岔口村回族青年米万奎、马友兴等4人从乾德县长山子探亲归来被民团发现，官府一口咬定这是乾德县“土匪”窜入三岔口，勒令三岔口交出米万奎等人。三岔口村头人正踌躇

时，官府迫不及待，于2月25日派吕正月带民团30多人，进抵三岔口村追逼要人，开枪打死回民马尔不都，激起群众的愤怒。三岔口村民一声吆喝，全村男女老幼200余人顿时聚集村头，手持刀矛棍棒与民团隔庄相峙。同时派人向河州工革命军报信，请求援助。午后，民团撤回县城，由100多名省军前来接替。马登奎率青壮年数十人跃马扬刀，向省军示威，结果被省军一阵乱枪扫射，惊吓逃回。

傍晚，河州工救兵不到，三岔口全村老小200余口回民趁夜弃家向河州工逃难。26日清晨，三岔口难民到达芦草沟三十里墩，与下头工难民相遇，大家共话背井离乡之苦。早餐毕，三岔口难民又前行。不久省军追至三十里墩，不分清红皂白，将下头工难民100余人尽皆杀戮。

下头工难民遭屠，三岔口回民弃家出走，激起河州工军民极大义愤，要求攻打县城，为死难亲友报仇。正议论中，南山马全录派来长枪队20多人，手枪队也从绥来县返回。当即，团部任命马登奎为三岔口村连长，选拔青壮年数十人编入河州工革命军中。至时革命军士气大振，大家聚会一起，再议攻打县城一事。

三、马应海的应变

昌吉南关是回民聚居区，这里有陕西寺、西河寺、兰州寺、本地寺，各寺的坊民虽然都是同一民族，但由于来自不同的地域，利益和要求各异，因而政见不一。当时这里流传着“陕西人是忠臣，西河人是奸臣”的说法，忠臣，指以洪福元为代表的陕西寺坊人，他们同官府合作，抵制回民反对金树仁；奸臣，明指马仲英，暗指宁夏、甘肃、青海各寺坊的回族居民。这种政见上的分歧，导致了回民内部的纷争，以致出现互相仇杀的悲剧。

马应海原籍甘肃河州，21岁来到昌吉，靠贩卖黑货（鸦片）为生，本地人都说他们是一马三械（一匹马加长枪、短枪、大刀）的刀客（侠客）。他的家是私贩黑货的客栈，向北去阿山贩黄金，向东去关内贩鸦片，经过昌吉都要在他的店里落脚。由于他长年从事黑市买卖，造就了他为人胆大心细的品格，能说会道的泼辣作风。他的家资富有，交游广泛，朋友众多，因此被官府选任委三县（昌吉、景化、绥来）稽查。他作为一个穆斯林，富而不啬，经常给寺里资助，给穷人施舍，所以西河寺坊民又推选他当了舍头（理事长）。1933年初春，全疆战乱迭起，来往昌吉的客商稀少，而马应海家来往陌生人却有增无减。3月14日，西河寺“抵各”毕（做完第三次乃麻子），洪福元、王明德带领卫兵数人气势汹汹地闯进西河寺，当着50多坊民说道：“你们的舍头是稽查，要协助政府查办坏人。他却说这里没有坏人。今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叫坏人，坏人就是西河人。”众坊民大怒，当场纷纷议论。新庄马阿訇驳斥道：“西河也有好人，怎么都成了坏人？”王明德说：“你能保证西河没坏人？”马阿訇回答：“这里都是老坊民。”洪福元说：“不管那么多，明早我要来点名的。”又转头对马应海说：“你的稽查不能当了”。说罢2人率卫兵扬长而去。马应海微微一笑说：“不干更好，我们明日见。”

当晚马应海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初更他到西河巷卡口，对当班的沈德云等说：“今晚十分要紧，你们要注意观察，如有人来，马上向我报告。”沈等不知是什么事，只管小心下夜。半夜，忽有一士兵，脚蹬高头大马，身背着洋枪，来到卡前，要见稽查，卫兵问道：“你有什么事？”士兵回答：“说了你们记不住，快去报告。”一会儿，马应海至卡前，同士兵寒暄问好，请邀入卡内密谈。片刻，士兵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四、革命军围攻昌吉县城

昌吉县城有两个居民区，一个是城里，主要是汉民居住，它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里住着省军一个营，约350人。另有张志元的民团，约有460人，配有各种轻武器。他们以城墙为依托，外有护城河，凭险据守。县城白天敞开城门，晚上城门紧闭。在当时情况下，昌吉县城是易守难攻。另一个居民区，是城南的回民居住区，又称南关，迪（化）伊（犁）大道纵贯其间。这里由洪福元的商团防守，兵力约150人，配有少数土枪，多为大刀长矛。南关有西街、西河、八工、火神庙四个街口，均用土坯木栅阻隔。白天木栅打开，晚上堵塞，四个街口分别由杨贵、韩撒拉、吴生福、吴英四个排把守。为了互相支援，县府派汉人陈商总为联络员，协调民团、商团的行动。

1933年3月15日，天麻麻亮，河州工革命军500多人由王登科率领，迅速包围了南关和县城。

进攻南关的一路由营长张万有带领。他们来到西河口，要进南关。商团守军当班的沈德云等央求革命军说："洪团长说我们西河人都是坏人，今天要来点名的，你们还是从八工巷口进吧。"张万有也不争辩，带领人马绕到八工巷口。这里的排长是陕西寺坊民吴生福，他也坚决不准革命军进卡。革命军排长单土满拉见吴生福这般为虎作伥，分外眼红，一声吆喝，大家一起动手，当场将吴生福、马万林等4人砍死。而后，分兵两路，一路继续同商团撕杀，一路直奔南门城下，参加围城战斗。此时，城里城外枪声四起，杀声冲天，韩撒拉带领西河排倒戈内应，火神庙、西街口商团士卒不战自溃。洪福元同陈商总去昌吉城下联络民团，结果城门紧闭，省军不派一兵出城援救，还用绳索将陈商总吊入城内。洪福元大失所望，悔恨交加，只得自逃性命。王明德带领商团一部，且战且退，最后身负重伤。商团所剩士卒四散躲藏，

商团顷刻瓦解。

南关得手后，韩撒拉带领手枪队寻找商团头人。在易兴和家（洪福元外父）找到洪福元，洪执枪抵抗，韩撒拉冲入，将其砍死，剁下胳膊一只。接着又在喀什寺东边找到王明德，此时王明德腿已折断，躺在门后，呼喊韩排长救人。韩撒拉说："你不是要点我们的名吗？我们西河人是坏人，你是好人，今天我是来要你的命的。"说着举刀将王明德的头砍下。

南关战斗结束，革命军在马全录手枪队的指挥下集中兵力攻打县城。王登科率部主攻南门，马登奎部佯攻西门，南山哈萨克民队200多，硫磺沟万家煤窑维吾尔矿工40多协助合围北门、东门。南门战斗最为激烈，王登科集中全部长枪，占据南关高层建筑，以火力压制城头守军，攻击士兵则挖通居民房屋，直逼城墙脚下，架起云梯攀援登城，由于火力掩护不足，士卒每登爬一次，都被射杀城下。马登奎佯攻西门，有数名士兵曾抢上城头，也因火力支援不力，顷刻滚落城下。革命军攻城战斗受挫，只得暂时停止战斗。这时形成城里城外省军与革命军互相对峙的局面。

傍晚，手枪队来到陕西寺，召来各寺头人，向大家介绍马应海旅长。尔后头头进行训话："听说陕西人不投降，今天我们住在这里，你们看怎办？"陕西寺头人面面相觑，不敢回话。手枪队头头又厉声问道："你们准备怎么办？"众头人回答："投！投！"当晚，各寺头人将本寺原商团士卒找来，面交手枪队安排。手枪队从西河寺、陕西寺、兰州寺、本地寺各选调精悍士卒10人，编成突击队，准备来日攻城。其它士卒按商团原建制，加入一批骨干，仍分配他们守备南关。

3月16日，革命军赶制点火车，训练突击队，加紧攻城准备。南关各寺宰羊炖肉，犒劳革命军，庆贺起义军攻取南关的胜利。下午，有一架飞机从东方飞来，在南关上空盘旋一周，投

下炸弹两枚，尔后返向东去。这两枚炸弹，一枚落在马海江家院内，当场炸死马家7人，伤7人，另一枚落在陕西寺坟院内。据事后推测，可能这是迪化省方得知昌吉县城被围，派飞机前来侦察。

入夜，革命军计划由突击队推动点火车（四轱辘槽子车装满羊毛，浇上石油作引火物）至城门下点火，趁势攻击。各突击队按时推动点火车向预定目标前进。陕西寺突击队由南关出发向东推进，当行至城东南拐角处，被城上民团发现，一阵乱枪，当场打死余金祥等3人。民团攀绳索而下，将伤员于福祥扔到点火车上，放火焚毁。闵福德腿负轻伤，滚落沟下，幸而脱险。其它3路突击队得知东门人死车毁，不敢前进，于是攻城计划失败。

五、南关大屠杀

3月18日清晨，南关骤然紧张。据悉迪化省军由陈品修指挥率领向昌吉增援。革命军紧急集合速往头屯河东岸阻击，守备南关的士兵仓促向各巷口哨卡增兵，实行戒严。南关居民扶老携幼惊慌出走，戒严士兵东挡西阻，大声劝告："不要走，不要走，等打退了官军，我们还要攻城的。"

革命军赶到头屯河东岸，在三十里墩列阵，准备同省军大杀一场。但这些刚编入队伍的市民和农民，没有见过这样的战斗场面，省军的大炮一响，便乱了手脚，一个个沿着沟坎向后逃跑。还是马全录的手枪队、长枪队富有战斗经验，拼命进行阻击，待河州工革命军脱险后，才沿三屯河向南离去。

县城的省军和民团登高望远，看得清楚。待迪化来的省军迫近便大开城门，倾巢出动，一步踏入南关，一场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下面是在这场大屠杀中吴英、于福海遇难脱险经过：

吴英，原商团火神庙巷口哨卡排长。18日清晨，革命军东去，他留守南关。早饭时候，索五十传令："官军已经败走，我们快去攻城。"吴英率兵20余人登上八岔庙台子瞭望，见县城民团已经拥入南关，正沿街搜捕杀人。吴英不明真相率众逃走，民团尾追，击毙2人。吴英跑回家中，见炕上坐满了人，都是避难的乡邻。吴英依门后坐下。民团追捕他家，逼近门窗，开枪射击，炕上的亲友一个个匍匐倒地，呼叫哀鸣。吴英抓起折腰子枪，向外斜开一枪。民团惊呼："里面有枪！里面有枪！"怆惶逃出院外。吴英趁机抱起亲友呼喊，见母、妻连同乡邻共14人死亡，两个受伤，活着的人个个满身是血，如痴如呆，悲愤难平。片刻，民团搬来柴草将门窗堵塞，放起一把火，浓烟烈火熏得大家满屋乱窜，喘不过气来。吴英想到与其烧死，不如破门而出与民团拼搏。于是摸着斧头，将侧窗砸烂，率众跳出窗外。此时，邻居李阿訇的房屋已是烈火熊熊，屋内惨叫声不绝，民团在对面院里抢劫财物窜来窜去。吴英等人见逃出无路，便攀绳索而下，潜入院内井中躲藏。入夜，吴英等爬出井外，见四处无人，便趁黑逃出南关。

于福海，现在是陕西寺的乡老，当年14岁。18日清晨，他随父母同众乡邻一起外逃，结果被戒严士兵阻拦折回。这时，大家都不回家，却三五人一堆，相互攀问，人人忐忑不安。忽然，枪声大作，人群飞奔，原来是民团出城杀人了。众乡邻个个惊慌失措，翻墙越院，不约而同地拥进陕西寺，不分男女老幼，大殿内外，急速跪拜在地。正祈祷时，寺院山门起火，浓烟滚滚，越烧越旺。众坊民央求阿訇出去说话，马彦忠阿訇无法，只得手举红旗到山门前向民团摇旗求救。民团不理睬，迎面一枪，将马彦忠阿訇毙倒在地。众坊民见阿訇遇难，山门火势又猛，便纷纷出后门向陕西寺坟园转移。民团尾追而至，将坟园包围。当众点名，将马文元、高天中等14人叫出，就地枪杀。尔后，民团又钻入人

群搜捕，将其中的维吾尔族人全部拉出，说他们是和加尼·孜的帮凶，新疆倡乱的祸首，一阵矛戳刀砍，30多名维吾尔族兄弟倒在血泊之中。

下午，民团将难民由坟园赶到东街维族车马店，后又赶到东门城外。这时，有一队归化军（白俄）到来，将难民逼进土坑里跪下。只听到城上城下民团呼喊道："贼娃子，土匪，杀了了事"。据说由于省军指挥陈品修制止，这300多难民才免于一死。傍晚，民团将难民赶进城里，男女分开关入县衙监狱内。

19日上午，民团将难民放出，每人发给号码牌一个。尔后难民又被赶到难民局（东街维族车马店）收容。约五六天以后，难民局挑选于福海等30多人掩埋死难者尸体。当时这些人都是老的老、小的小，又是3月天气，地冻未消，且死尸遍地，哪能挖坑掩埋。他们将死尸如堆柴火一般或填进坑里，或堆入窑中，尔后铲些浮雪泥浆稍加掩盖了事。于福海回忆：陕西寺坟园南于家菜窖，堆放死尸300多具。马忠奎家菜窖里，堆放死尸100多具。吴英及马忠仁家院内坑里，填进死尸80多具。这些都是无主尸体，那些有主尸体均由各家自埋，也是5人一坑，10多人一坑，临时掩盖，尔后才另行安葬。据埋葬队估算，当时共掩埋南关居民尸体和革命军战死人员约1000具以上。

昌吉回民起义就在这场反动派血腥大屠杀中失败了。

马仲英轶事

马全钦　马文祥

马仲英的家世

马仲英父名马保，也叫九保，因有点神经病，又称“憨憨九保”，是个独生子。在绥远都统马福祥属下马鸿逵混成旅当过短时期的骑兵队长，后因神经病回家。马仲英起事后，有人劝他逃走，他准备了400块银元，说：“我是好人，‘海底耶’（施舍）费用也准备着，跑什么？”结果被甘肃督办刘郁芬捕到兰州杀害了。马仲英祖父马海渊和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是亲弟兄，因行七，人称“七太爷”，辛亥革命时在马安良的帮统马麒部下当管带，1913年在马麒的宁海军当分统。马仲英起事后，马海渊因马麒的庇护，得以免受牵连，以后病死河州。马仲英兄弟三人，仲英居长，次仲杰，三仲福，都随祖父在青海读书。有一个姐姐嫁给马虎山，马虎山是马仲英起事的主要帮手之一。

马仲英起事原因和离开西宁的经过如下：

1926年春，冯玉祥在南口与直奉联军作战，命令青海马麒和凉州马廷勷各派一旅骑兵参战，青海派马步元旅，凉州派马廷贤旅。后因冯军作战不利，马步元擅自率队回青海，马廷贤则随国民军回甘。从此。马麒常不自安，惟恐冯玉祥追究责任。1927年春，冯玉祥出潼关与奉军作战，又令青海、凉州各派一旅骑兵参战，曾任马步元旅团长的马辅臣向马麒建议：“冯玉祥先调骑兵，

后调步兵，最后什么都完了。应联合凉州共同抗命。”马麒也怕冯战胜后，追究马步元在南口逃跑的责任，于是派马辅臣持《古兰经》一本，上盖青海镇守使官印，到凉州与马廷勷联络。这时马廷勷已决定执行冯的命令，派马全钦率骑兵一旅，准备出发，马辅臣到凉州后，马全钦、马培清等认为马麒反复无常，不能联合，仍主张接受冯的命令出兵。但马廷勷改变了主意，接受马辅臣建议，不仅不出兵，反而联合奉系张作霖反冯。马麒派马辅臣为代表，马廷勷派副官孔庆福为代表，同往北京谒张作霖，张委马麒为甘肃督军，马廷勷为省长，发来委任状，并派骑兵一部进驻包头。当冯部刘郁芬派郑道儒到凉州催兵时，马廷贤将马麒、马廷勷联合张作霖反冯事流传出去。

1928年春，马仲英在其祖父的卫队任哨官，和马虎山、马占仓、马毛毛等计议说：“老汉们干球蛋，要干，咱们先干。”于是先派马占仓到河州联络人枪，于同年三月间，一行7人离开西宁，先到循化，绑了县长，放出狱囚，夺了警察的枪支。这时国民军有24人从河州去循化，经马占仓在河州联络的人报信，马仲英等便在大力家山伏击，国民军仅一人跑脱，其余全被打死，夺得了一些枪弹，向河州西乡进发，在麻尼寺沟、小瓜坪、韩家集等地，又裹从了一部分人和枪马，这时大约有三四百人，枪百余支，遂即到河州南乡一带活动，继续扩充人马约达1000余人。当马仲英离开青海向河州西乡行进时，有青海军马六邦率“银褐”马队一营随后跟进。马仲英到了韩家集，“银褐”马队驻韩家集西10里之麻尼寺沟。以后这支马队和从青海陆续来的“海骝”马队、“白青”马队等，都在河州投了马仲英，还带有两门小炮，因要用铁锄头击发，故称“锄头炮”。这些马队是怎样来的？据当时推测，名为哗变，实是暗派，每一马队相当于一个营，都由连长带领，营长并没有来。

马全钦剿办马仲英

马全钦当时在河州有步兵一个团，约1000余人。一个营驻宁定，两个营驻河州附近。有骑兵两个营，共约300多人，均驻西乡大沟一带。这时，适马廷勷因奔叔父马国良（马全钦之父）丧到河州，他和马全钦为向国民军表示忠诚，由马全钦向赵席聘自报奋勇“剿办”马仲英，并请赵派兵协助。赵怀疑马全钦是否真心，既不派兵，又关了城门，拒不见面。当时河州人把马全钦看成国民军，而同情马仲英。所以，当马全钦向他一个叔伯兄弟马永昌探问马仲英兵力时，马永昌骗他说：“只有七八百人，六七十支枪。”马全钦信以为真，便率领骑兵三百多人、步兵100余人向南乡追去，并命令所属驻宁定的马开诚营到南乡会剿。马开诚以守城为重，没有执行。马全钦到和政县的武家梁，有一条东西向的大沟，他的骑兵在沟南山上已和马仲英部接触，他率步兵在沟北山上，大约激战了两个多小时，马仲英突然抛开马全钦部骑兵，从西面迂回到马全钦右侧冲入其步兵阵中，短兵相接，马全钦见势不好，仅率卫队数人逃走，他的100余名步兵，或被杀，或投了马仲英，没有回来一人。骑兵伤亡很少，回到河州。马仲英部也伤亡100余人，他的副司令马占仓阵亡。

马仲英原计划在南乡串联一部分人马即去陇南活动，待实力壮大，攻占兰州。当时他的副司令马占仓已参加帮会，打算到陇南后利用帮会关系，可以迅速扩大力量。此次打败马全钦，声势大振，投奔的人更多，加以马占仓阵亡，便又回到西乡买家集、三法观，以串联和威胁的方法，大肆招收人马，莫尼三沟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马全钦部驻河州史家嘴的一营步兵，也被营长马桂清的哥哥马昌祥拉走投了马仲英，马桂清只身逃出。因此，马仲英的实力很快扩大到了万余人。到他围攻河州城时，四乡回汉群众，因忿恨国民军的苛捐杂税，又有不少人参加。马廷贤

从大河家到八坊搬家时，也投了马仲英，更扩大了马仲英的号召力。

马全钦自八松崖失败，回到八坊驻河滩关店里，即向赵席聘报告作战失败的情况，赵仍不肯和他见面，只派人出城慰问，治疗伤兵。一天夜里，南乡买家集来了几个乡绅对马全钦说："马仲英到了买家集，因你打了他，要去大河家抄你的家。"马全钦立即率领两营骑兵和一营步兵回到大河家。马仲英第一次攻城失败退到西乡后，赵席聘、戴靖宇转来刘郁芬给马廷勷的电报，叫他派一全权代表去河州城商办善后。马廷勷派一营长张义山去见，赵席聘不问情由，把张义山扣押。马廷勷见双方误会已深，便回了凉州。

马廷贤在马仲英攻城失败后，只身跑到大河家。四月末，他密召马仲英来大河家取枪弹，并解决马全钦的部队。马仲英遂即率部到离大河家不远的寨子沟、尕马家一带，马全钦率步骑兵400余人，祁太沟藏兵200多人去打，过了尕马家后，在莫草坪马全钦部营长马丕烈率队与马仲英部打了两个多小时，只听枪声很密，却未伤亡一人，马全钦恐发生哗变，急收兵退回大河家，次日放火烧了储存的子弹百余万发，带骑兵回永登。马仲英到了大河家，由马廷贤引导，抄了马全钦家，挖开马廷勷的银窖，得银币30万元，又解决了马全钦的步兵三四百人。

马全钦到永登后，要求刘郁芬派兵协剿马仲英，并愿把家属送到兰州，以表诚意。刘郁芬派汽车接马全钦到兰州，向马征求意见，马全钦说："我们兄弟中，马廷贤已投了马仲英，青海的马步元也靠不住，马步芳还可以利用，你给我两团人就可以消灭马仲英。"马还就联张反冯的事向刘认罪。刘郁芬当时表示过去的事不提了，对马全钦的要求未作答复。不多日子，刘郁芬把赵席聘调离河州，马全钦即被刘郁芬管押起来。

马仲英再走青海

1928年秋，冯玉祥派马鸿宾到甘，同时派孙连仲率部队与刘郁芬共同到永靖县招抚马仲英。适马仲英等在上河家，马鸿宾到潘家河沿与马仲英、马廷贤的代表马占奎（马安良之叔）洽谈。马鸿宾提出给马仲英、马廷贤各编一个旅，叫他们把围河州的部队撤驻小关里的孟达一带，并要他们到永靖看看由兰州新到军队的实力，劝其不要涂炭地方百姓，接受招抚。马仲英因旅长官小没有接受。孙连仲部队遂向河州北塬推进，马仲英部即溃逃。孙连仲、马鸿宾到达河州西乡后停留几天，又同部队到西宁。孙连仲就任青海省主席，马鸿宾旅返河州，在收集遗散武器和发放良民证等安抚工作后仍返回宁夏。

马仲英从河州溃走陇南后，于1929年初，攻打巩昌（今陇西县）未成，退到岷县东南之申松六经地方。吴佩孚当时适在四川，派河州太子寺人马某见马仲英，说吴欢迎马去四川。马仲英未允，即经临洮、拉卜楞入青海。马仲英和黄正清打了一仗，马俘虏黄部80多人，获迫击炮数门，又抢了18“昂欠”（即18个小寺），休兵三四天，即走青海贵德。贵德当时没有驻军，马仲英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就过河向西宁行进。这时约在春末夏初，马仲英号称有三师之众，一个师长是马虎山，一个叫歪脖子师长，一个是马毛毛。在西宁以南数十里之尕拉沟与马麒率领的一支青海军相遇，一经接火，马麒部半数以上哗变投了马仲英，其余溃散。马麒只身逃走，几被活捉。第二天，马仲英即围攻塔尔寺，经一夜战斗，于凌晨攻开，抢了不少财物，当天上午又向西宁进发。途中听说孙连仲要杀马麒，遂又引队至大通，青海军尾追至大通，交战后，青海的两营黑马队投了马仲英，马又奔向湟源。湟源驻有青海马步元旅，城内守兵只有一个步兵营，其余都

在城外。马仲英以两个旅攻城，一个旅长叫马海龙，一个叫大眼睛旅长，只交战一个多小时城即攻破，城内守兵四五百人，都换成便衣匿藏，军装枪械遗弃满街。马仲英部队进城后杀了很多人。驻城外的青海军全部投了马仲英。马即于当天晚间弃湟源，在扁都口南之毛百胜（即门源县）打退了青海军与国民军的追兵，进入河西走廊。国民军安树德部进入湟源后，将马步元及该旅官兵家属不分老幼，集合在一起，全部枪杀。

马仲英攻占宁夏省会与退走后套

1929年5月上旬，马仲英率众由民勤经阿拉善旗奔宁夏。行前，马下令禁止扰民，严禁抢掠杀戮，5月8日（一说4月17日）到定远营。时阿拉善蒙旗达王不在，王府负责人范营长、毛八吐鲁、八哈乃等出城迎接，并称要什么给什么，只求不要杀掠。马约束部众较严，只收受王府送来的子弹万余发和一部分粮草，次日即出发，于5月10日到宁夏城西十多里之新城，部署攻城。这时，马仲英自称总司令，马谦为副司令，有众七八千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沿途掳掠的家属和胁从的人，还有一部分商贩，能作战的约四五千人，枪支不齐，子弹更缺。惟马匹很多，除每人一匹外，大部分人还有从马，驮载行李给养。

宁夏城内只有马鸿宾的留守司令马子才部百余人，由营长马焕之率领守西城。曾在马鸿宾部22师当过旅长的王德铨适回家，也参加守城，又组织机关职员、警察、市民等分守东南北城墙。马仲英于5月11日凌晨从城西北角进攻，战斗约两个多小时，由于马子才部士兵内应，攻入城内，王德铨阵亡。省主席门致中率卫队出大南门逃走，秘书长赵雪田在省府库房放火自焚，建设厅长魏鸿发出城逃走，代理教育厅长邵禹芝改装混入泥瓦工中未被发觉，财政厅长扈天魁因公去甘肃未归，只有民政厅长马福寿未逃走。城内市民、学生、职员在马部初进城混乱时，伤亡约

百余人。马仲英进城后即约束部众，并夜间派人巡察，禁止官兵外出。所以，除西北银行和一些机关被抢外，居民和商店均未受损失。

马仲英攻占宁夏不几日，盘踞平罗之苏雨生率队来攻，企图逐走马仲英，马派队迎击于宁夏城北40多里之李岗堡，苏雨生败退平罗，投了马仲英。窜扰在吴忠一带的杨老二也表示愿意与马合作。苏、杨均到宁夏与马仲英见了面。

5月下旬，国民军吉鸿昌率30师经中卫到达分水岭（青铜峡西）。这时马仲英因得了马福祥、马鸿宾存在宁夏的枪械，已人各一枪，又招收了不少河州籍回民，实力有所增强。在分水岭以北大坝、小坝一战，吉鸿昌部牛团长的一团人几被全歼。吉部另一团长孟宪德阵亡。马仲英部因贪拾吉部官兵遗弃财物，没有追击。吉鸿昌得以在广武整顿部队，调集援军反攻。马仲英部因子弹消耗殆尽，后方又无补充来源，便败退宁夏城。5月末某日晚，马仲英放火烧了马福祥和马鸿宾的公馆和带不走的枪炮弹药，退至宁夏城北百余里之黄渠桥。城内河州籍回民因惧怕国民军屠杀，几乎全部跟随马仲英。吉鸿昌于马仲英败走的第三天进入宁夏城。

前面提到青海马麒和凉州马廷勷联合张作霖反对冯玉祥，派马辅臣去北京谒张作霖，后来马廷勷与马培清亦相继逃到北京。还有马仲英派往天津的马廷贤，因在报上看到马仲英攻占宁夏城的消息，于6月初相约来宁夏，并运来原给马廷勷代买的手枪200支。途中闻知马仲英退至黄渠桥，便来到黄渠桥。马仲英在这些人的支持和谋划下，二次攻进宁夏，在城北八里桥打退了吉鸿昌的一支搜索部队，6月7日晚逼近城西。马仲英把全部兵力部署在城西唐徕渠上，次日清晨进攻西门，双方为争夺西门外的居民区，反复冲杀，互有伤亡，最后马仲英部逼进西门，吉鸿昌从小南门出兵包围马的右侧，其埋伏在新城的一支骑兵又攻击马部的后背，马仲英部腹背受敌，加之师长马毛毛和另一团长阵亡，马

辅臣右臂受伤，便引兵至石嘴山，接着又退至后套之三道桥、黄羊木头、渡口堂一带，马仲英司令部驻渡口堂。据马文祥回忆，马仲英驻后套期间，马鸿逵曾派一名叫三保（即马子尚）的副官和马仲英联络。蒋介石也曾派来一孔参谋，通过王英部的谭旅长（孔与谭是结拜兄弟）和马仲英见过面，会谈的详细情况不知道。

马仲英去北平，部队被吉鸿昌收编

马廷勷自部队被国民军解决后，亡命四川成都。当时四川军阀邓锡侯的一个师长马育之是回民，对马廷勷很关照，出主意叫他去南京见蒋介石。马以无人引荐为难。经马育之向邓锡侯疏通，由邓写信介绍马廷勷到南京先见邓驻南京代表（姓名不详）。马廷勷经邓锡侯驻南京代表的帮助，果然见到蒋介石。时约1929年6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关系已破裂，蒋介石为利用马廷勷联络西北回民反冯力量，便任命马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廷贤为第一纵队司令，马仲英为第二纵队司令。一切具体问题，命马到北平向何成濬洽办。马到北平后，设办事处于皇城根，吸收了一些流落在北平的河州人，筹组指挥部。何成濬只应允给几十万元维持费，其余一概不管。马廷勷既无兵，又无枪，只挂着一个空头衔。马仲英在后套听到这个消息，让马培清、马辅臣、马廷贤等人先到北平。接着马仲英也和其弟马仲杰到北平。7月间，适蒋介石到北平与张学良、阎锡山会晤，马福祥、马鸿逵也到北平。马家父子为拉拢马仲英，一方面以5000元活动了一批甘肃人，在街上游行示威反对马廷勷、马廷贤、马仲英屠杀甘肃人民；一方面指使马子丕（马鸿宾亲弟）对马仲英说："事情是你闯的，总指挥应该你当，马廷勷凭啥当总指挥？"不数日马仲英回到后套，接着蒋介石就明令撤销了马廷勷的十五路总指挥部。这时马仲英部因受晋军王靖国的逼迫，在后套不能久住，而且内部对以后行动意见又不一致，马仲英便离开部队去山东泰安投马鸿逵，部队则分裂为以下几股：

一股由马谦（马仲英的副司令）率领，约两三千人，回到宁夏，接受吉鸿昌收编。以后马鸿宾被委任为甘肃省主席，委任马谦为肃（州）甘（州）警备司令。

一股由韩进禄（马仲英部旅长）率领，约两三千人，回到宁夏，受吉鸿昌收编后驻灵武。1930年马廷贤到灵武，韩又随马廷贤到陇南窜扰。

一股由马存良（马仲英部师长）率领，约数百人，被吉鸿昌收编任金积警备司令，驻金积，以后编入马鸿宾部。

一股由马汝仓率领，约千余人，受吉收编后驻中宁，以后随马廷贤窜扰陇南。

一股由马占彪（马仲英部师长，外号尕官，原是马占仓的管家）率领，未收编，窜扰陇南一带。1930年春到河州，被马麟解决，马占彪只身逃走。

一股由马老四（马仲英部师长）率领，约数百人，受吉收编后驻广武。马仲英再返河西时，把这支部队带去。

马仲英再返河西

1930年春，马仲英从山东泰安回到宁夏，马鸿宾委为教导队长，一则借以羁縻，免再滋事，再则想叫马仲英在教导队学习。但马仲英志不在此，他来宁夏的目的，是为了收陇旧部东山再起，对教导队长仅挂名而已，并不管事。每天出城放鹰走马，联络旧部。当时，教导队不少学员，就是马仲英部被收编后无处安插的骨干。宁夏城内和四乡也有他的不少旧部，大多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有的还曾担任过司令、团长，改营卖锅盔、凉面的生意，故民间有“锅盔司令、凉面团长”的传说。

约在同年10月，马仲英和联络好的几名旧部借放鹰沿贺兰山去中卫，马老四也从广武率队随到中卫，宁夏城内外他的旧部、河州籍回民、教导队员等络绎前往者数百人，还有一部分中学生

和马鸿宾部士兵也随之而去。

马仲英到中卫后，首先提取中卫盐局银币2万元，又向中卫县府索要银币5000元作为经费，自封为“河西保安总司令”，找来两名刻字工，刻印封官，并利用帮会关系，开山堂招收人马（据说马在陇南时入了帮会）。同时派人与马谦联系，马谦既未答复，也未敢把情况告之部下，马仲英又派人送信给马谦驻山丹的骑兵团长马文祥（曾给马仲英当过护卫团长），叫他带队到大靖、土门子来迎接。马文祥以无马谦命令不敢行动，同时凉州驻青海军一个团，也怕在途中遭到截击，便派人送银币500元到中卫看马仲英。马仲英大怒道：“我就缺你这500元？我要的是人！”命令马文祥5天内到大靖。马文祥接到命令，和几个连长研究，连长们一致表示坚决迎接马仲英。于是马文祥第二天就出发，和马仲英相遇于凉州附近之丰乐堡。马仲英从中卫带来数百人，加上马文祥一团骑兵，共有千余人，即向甘州前进。马谦出城迎接马仲英于甘州之东乐镇。据说马谦见马仲英后痛哭流涕。马仲英则大骂马谦“不是先人的后代（他们是叔侄关系）”。

马谦共有两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骑兵团马文祥部已为马仲英掌握。马仲英又多次要集合部队点名，企图夺取步兵，均为马谦所阻挠，但一般连排长和士兵多倾向马仲英，两个步兵团长则委蛇于两者之间。马谦自感力单，便秘密与青海联络，想借青海力量收拾马仲英。1930年11月某日，马仲英与马谦商议好共同集合部队点名讲话，马仲英计划事先把马文祥的骑兵团秘密集结在一个店里，趁集合部队的机会占领马谦司令部（旧提督衙门），马仲英则在集合场把部队抓过来。不料到部队集合时，马谦未到，他的手枪营和护卫营也紧守司令部，未来集合，马仲英的计谋未成。过了几天，马谦请马仲英洗澡，在澡塘里预伏五六人，想趁机打死马仲英。马仲英虽知马谦对他有芥蒂，但还没有意识到马会向他下毒手，所以只带一个姓王的副官去洗澡，马仲英刚脱去

上衣，马谦即借故走出。这时便有两人各持手枪冲进房门，门口还站着两三人，马仲英见情况不对，就大喊王副官，王这时还未离开马仲英，便向冲进来的人开枪，这两人在马仲英喊王副官时，便又转身跑出，并未开枪（这些人当时也不愿打死马仲英）。马仲英便趁机跑出房门，到马文祥的团部，立即命令马文祥率队包围了马谦的司令部，又把马谦的两个步兵团长叫来。经马仲英一说，都表示愿听指挥。马谦的司令部被包围后，虽有手枪营、护卫营共八九百人防守，但兵心不稳，外无援兵，不多时就被马文祥攻进头门。马谦便从电话上迎请马仲英，自己又出门迎接，低头大哭。马仲英踢了马谦几脚，大骂一顿之后，便将他禁闭起来。从此马谦部队，便全部归马仲英了。

（作者马全钦即马廷斌，当时为马廷勷部旅长，马文祥为马仲英部团长）

第三章　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

火烧沙俄贸易圈

苏　萼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沙俄根据《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强迫清朝答应他们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经商，并在此二城建立了贸易圈，即成为享有治外法权的殖民地，从此成为他们侵华的重要据点。

当时距塔城西南80公里左右的雅尔噶图，乃是回族等各少数民族长期采金之地。咸丰三年(1853年)年九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丰坤奉清廷户部咨文："准许各地矿工广为开采。"此后，前来雅尔噶图采金的贫苦百姓就更多了。

但是，沙俄对雅尔噶图金矿早已垂涎欲滴，故由其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以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的名义向清朝伊犁将军奕山呈文，胡说雅尔噶图是沙俄领土，无理要求清政府撤出该地的中国采金工人。他威胁说，不然，日后出现不和之事，我们不保！

奕山将军照会沙俄，乃郑重声明雅尔噶图是中国领土。但是，他又屈服于沙俄的武力，借口金矿不旺，暗中下令封闭，严禁百姓开采。因此，引起各族矿工的强烈不满，他们冲破官府的封锁，

继续开采。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见清朝官府软弱可欺，便亲率200余名沙俄士兵开赴矿区，武力驱赶中国矿工，将6名矿工用浓烟闷死在矿洞内，还无故枪杀矿工5名。

沙俄野蛮残杀中国矿工的行径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无比义愤。于是，众人推举回族矿工徐天尧、安玉贤等9名代表，抬着死难者尸体，向塔城通商事务署的章京萨碧屯控诉沙俄霸占中国金矿和杀害矿工的罪行，恳求清政府为民做主申冤。然而，章京萨碧屯与塔塔林诺夫狼狈为奸，竟然以尸体无指证为借口，不予验尸，反以“聚众闹事”之罪名将徐、安2代表打得遍体鳞伤。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以徐、安2人为首的各族矿工聚集在塔城沙俄贸易圈附近，强烈要求沙俄领事交出杀人凶手。清朝塔城参赞大臣英秀闻讯后，唯恐事态扩大而得罪沙俄，乃派章京萨碧屯到塔城雅尔噶图调查，对塔塔林诺夫提出质问，并同时派兵驱散示威的矿工。矿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在安玉贤、马隆兴等人的领导下，于八月二十六日夜，600余名矿工秘密包围了沙俄贸易圈，用芦苇点燃草堆，趁风势而成火海一片，圈内的51间大货房及其货物均被烧光。塔塔林诺夫及大批俄商狼狈地逃至巴克图边卡。

十月，徐天尧、安玉贤、马兴隆等向伊犁将军派来调查此事件的官员阿克达春递交状文，控告章京萨碧屯等人“通俄夷害人”的罪行。该状文写到：“具投天仰，冤民徐天尧，年52岁，系通州人。今告前任厅官萨大人老爷侵吞国课，私通番夷，出卖疆土，目无王章，大干犯纪事情。因小的等于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八月间有奉大人施忠君爱民之心，在南小雅尔噶图开设金矿，民人采挖，裕国便民，伊厂主发给委牌执照为凭。是年八月，内有番夷俄罗斯忽到山沟声言用金银购买疆土，不准尔挖，若在此地采挖与伊纳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具系皇上地界，开基以来原有，天朝下邦胆敢霸占疆土，藐视天颜。又于十一月间，大雪遍

天，暗地用金买通萨厅私衙，官厅夷贼，仗官势力，迫害良民，冻饿绳捆，投河立即身亡，数百名沿途可证死尸。四年（1854年）腊月二十六日，番贼用烟火烧熏，死良民6名，有花名册验。锡跨兰达皆知萨厅长在贸易圈之事，明来暗往，又拜干亲，又请番犬衙内钦筵作乐，请锡跨兰达、萨跨兰达、阿老爷众官相陪。萨厅官居五品，与番犬为亲为友，大失皇上纪纲，惹众耻笑，成何道理。所有伤害人命，俄罗斯补赔命价4千有余，有周瓦匠为证。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蒙参帅大人施恩，仍准开设官厂。萨厅旧恨不息，寄信番贼，沿途勒杀，将死尸抛入河内。小的等一行进山，被贼用枪打死5名，将安玉贤活捉，用刑拷打，安逃回城报信。此情参帅大人蒙准，派萨厅萨老爷及跨兰达和老爷等一同进山安民查办。萨厅皆因受贿，逼人暗地逃回，大宪返回谎报军情，小民焉敢承担。夷贼等又4次来厂，剿死良民200余人。小民等7次上呈禀报，有无所查死尸，良民冤枉，非天不明。今国不应出此贪官，万民受害不浅，种种灾情哀哀投天上告，今来叩头。

青天参宪大人施天高地厚之恩，如见青天，提案问拿，介戮施行，则万民均沾天恩于生生世世矣。

良民：徐天尧、康得禄、安玉贤、李林有、马文栋、马隆兴
马占彪、王宗浩、何腾蛟

熏死良民：陈　兴、张　元、张　七、黄保兴、王麻子、白大洋

枪杀良民：周　三、郭登子、温老五、刘　兴、易玉成

此文呈后，伊犁将军扎拉芬泰采用安抚之计，不得不将参赞大臣撤职，又将萨碧屯革职，并派协领哈布齐贤等前往塔城与沙俄交涉。沙俄照会，诬塔城矿工为“匪徒”，但不敢提火烧贸易圈起因，只逼清廷“务将人犯拿获归案，以警其余”。清廷屈服于压力，以“挟嫌妄控”和“烧圈泄愤”等罪名将徐天尧、安玉贤、马隆兴等人解往伊犁，判以重罪。

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沙俄派代表到伊犁要求赔偿损失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答应重修贸易圈，赔偿白银13万两——以武夷山茶 5500 箱作抵偿，分 3 年付清，并同意沙俄在伊犁和塔城的贸易圈内各驻军50名。至此，这场新疆各族矿工反对沙俄的斗争，终于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镇压下失败了。

新疆回族人民抗击阿古柏侵略的武装斗争

王　平

1864年，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回、维吾尔等族反清起义。6 月 4 日，库车回、维人民首先起义，新疆各地大多随之起事。短短几个月时间，天山南北两路几乎全部被起义群众占领，清政府在新疆的军府制度和封建徭役制度被击得粉碎。

由于起义具有强烈的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自卫斗争性质，决定了这次反清起义的局限性，个别起义领导人囿于狭隘的民族、宗教意识，把斗争引入仇杀的歧途。在喀什噶尔，柯尔克孜族首领思的克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竟派牌素巴特（今伽师县）屯田回族头目金相印等人赴中亚浩罕国，请求将南疆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后裔布素鲁克和阜放归新疆，以便举他的旗帜作为号召。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乘机挟持布素鲁克，于1865年元月侵入中国境内。不久，将思的克驱逐喀什，掌握了实权。思的克聚柯尔克孜等族人民六七千人反击阿古柏。斗争不幸失败。不久，思

的克出亡，布素鲁克也被放逐西藏。阿古柏占据了喀什噶尔回城，取得了入侵中国后的第一个立足点。

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入侵，新疆各族人民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进行了艰苦的反侵略斗争。新疆回族人民在这场反侵略斗争中，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为摧毁阿古柏政权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南疆抗击战

阿古柏占据喀什噶尔后，便将魔爪伸向了叶尔羌（今莎车县）。叶尔羌回族人民和维吾尔族、汉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侵略军。当阿古柏军队攻入叶尔羌城时，人们高喊“杀死安集延人”的口号和侵略者巷战。① “莎车的民众到房顶上，用砖石抛打。库车籍的东干人也在街上开枪开炮，杀死了阿古柏伯克的许多骑兵。阿古柏伯克损失惨重。”回、维人民的联合抗敌斗争，顿挫阿古柏的嚣张气焰。②

叶尔羌人民战胜阿古柏入侵军后，又约会库车“汗和卓”热西丁派兵合击喀什噶尔回城，驱逐阿古柏。但他们自己急于攻打被困于叶尔羌汉城内的清军，没有将军队派往喀什噶尔，造成了库车方面的孤军深入。在罕阿里克（今疏勒县东南）和阿古柏入侵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东干人和库车人也列下阵势，双方开始射击打炮，打得惊天动地，许多骑兵和步兵都负了伤”，“阿古柏库西拜格全身三处中弹”，几乎丧命。③ 据侵略军中目击者事后回忆，“东干人在十分接近阿古柏伯克的军队时，非常准确地向他们开火，造成了很大的伤亡”。④ 后因援军未至，库车兵力渐不支，“许多东干人和库车人被杀”。阿古柏入侵军以惨重的代价侥幸获胜。

阿古柏死里逃生后，贿买了拥兵自重的喀什喝尔汉城（今疏勒县）清军绿营守备何步云，加之浩罕逃来的残兵败将7000余人

投靠阿古柏，使其力量大为改观。6月，阿古柏军侵入玛喇尔巴什（今巴楚县西南）。当地仅有屯田的维、回、汉户3千余人奋勇抗敌失利，城堡陷落，阿克苏与叶尔羌之间的交通中断。秋季，侵略军再次大举侵犯叶尔羌。叶尔羌人民联络库车方面军队，并派“3万东干人和莎车人出来迎战”，英勇阻击入侵军。新城的回族掌教马阿訇（名字不详，维文史籍称“马大老爷”）在一天半夜里，“率1.2万名东干人袭击了阿塔勒克阿孜（即阿古柏）的军营”，⑤ 以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由于原清行政官尼牙孜通敌泄密，夜袭失利，回族义军损失惨重，“东干的尸首像伟大的农民收下的庄稼一样，零乱的横躺在旷野上，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⑥ 几天后，库车援军首领及当地掌教阿訇先后举叶尔羌回、汉城投降。

回族和各族人民以高度的爱国热情和不畏牺牲的勇敢精神，奋勇抗击外来侵略，但由于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和统一的指挥，斗争一再遭到失败。阿古柏又用阴谋欺骗、军事袭击、血腥屠杀等手段侵占了和田，于1867年初自封“巴达吾来特阿孜”（意即“洪福之王”，汉文史籍曾译作“毕调勒特汗”）。⑦ 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区为其吞并。

不久，“阿古柏转移其注意力于阿克苏的东干回。他聚集相当可观的兵力攻打阿克苏”，⑧ 回族人民“作了拼死的抵抗”。⑨ 但由于“主力军的质量方面，以及武器和军官经验的总效率方面……阿古柏伯克占绝对优势”，各族反侵略军又不能配合协同作战，致使“东干人的全力抵抗失利”。在雅卡伊热克（今拜城西之察尔其），1000名回族士兵全部战死。回族人民不畏强敌，以顽强的毅力继续战斗。他们夜袭驻守拜城的敌营，以灵活战术杀伤敌人。当阿古柏匪军进攻库车时，“东干人奋力抗击，使他（阿古柏）所有的直接进攻都受到重大损失而被击退”。侵略军进入库车后，各族人民坚持巷战，狠狠打击敌人。阿古柏长子库

达·库尔伯克在巷战中被愤怒的人民杀死。⑩

阿古柏在侵入中国两年半时间里，用各种恶毒、阴险的手段侵吞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在天山以南建立起伪政权，他与俄、英、土耳其等国勾结，获取军火供应及谋求国际上的“承认”，将入侵军刀矛换成火枪、火炮，用英国武器装备了自己，尔后，发动了入侵妥明（又称妥得磷，维文史籍称达吾德）回民政权的罪恶战争。

二、“清真王”妥明领导的反侵略武装抵抗斗争

阿古柏占据库尔勒后，便与妥明联系，要求划定边界，“边界线划在喀喇沙尔城堡以东50俄里处的乌沙克塔勒庄（今和硕县乌什塔拉回族乡），⑪ 以此巩固其在南疆的统治。以妥明、索焕章为领袖、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回民自卫抗清武装力量，在阿古柏的军事威胁面前，并没有因为与阿古柏集团同样信仰伊斯兰教而与之同流合污。他们断然拒绝了划定边界的要求，摒弃前嫌，一再派人向过去的敌人——清军和团练讲和，要求合力抗击阿古柏。同治八年（1869年）初，索焕章亲自由乌鲁木齐到吐鲁番，委派7名维吾尔人去哈密面见哈密王，转请其向清廷说情，愿意率众投诚。⑫ 回族抗清武装领袖在此紧要关头高风亮节，将斗争矛头转向入侵军。这一战略转移极为重要，它为摧毁阿古柏伪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

1870年3月（同治九年二月），阿古柏侵略军进犯吐鲁番。吐鲁番各族人民纷纷组织起来，予以侵略者以猛烈的打击，使侵略军丢下数千具尸体狼狈逃窜。同年4月，妥明命令元帅马仲、马泰、赵生才率大军“南击安集延”。回民军长驱直入，很快收复库尔勒。不久，回民军又在牙卡（今库车县东）与阿古柏入侵军进行激烈战斗。两军遭遇后，“东干人开始开枪打炮，他们打了

一天一夜，东干占了优势”。[13] 回民军经奋勇战斗，打败了阿古柏的骑兵部队，“继之（阿古柏的）步兵也被包围在一座山梁之上”，被回民军全部歼灭。回族军队乘胜追击，在当地人民协助下连克库车、拜城，收复了大片失地。

吐鲁番回民在攻下库车后不久，一部分返回吐鲁番，另一部分继续留在城里。这种作法贻误了战机，给了阿古柏喘息之机。经调整的阿古柏侵略军，气势汹汹扑向回民军。在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战斗中，回民军两次抵抗失利，被迫退回吐鲁番。阿古柏再次重新组织兵力，逼向吐鲁番。经过托克逊时，侵略者“纵马于大街小巷，不分青红皂白乱砍乱杀。天明之前对男女老幼全部屠杀”。经这场血腥报复后，侵略军“在吐鲁番城外的大东地方树起了营寨，包围了吐鲁番”。[14]

此时，妥明、索焕章以民族大义为重，已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归抚。[15] 腐朽的清统治集团对妥明等人的爱国义举先是怀疑，“著一面密为侦探，一面严加防范”，[16]后竟然荒唐地相信阿古柏的什么“报效”清廷、[17] “扬言助中国讨‘贼’，将以南八城归献朝廷”的谎言，[18] 认为“吐鲁番被安集延围攻，机会大有可乘”。[19] 随后，北疆团练头子之一的徐学功“督率团勇2000余名赴番会合，协力围攻”，“与贼（注：指回民军）接仗连胜，擒斩逆首多名”。阿古柏在对各族人民的罪恶战争中“深得其力”。

吐鲁番回族人民在此险恶情况下，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他们和当地维吾尔族人民紧密团结，与阿古柏侵略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在阿古柏刚驻扎吐鲁番城外两天，回民军乘其立足未稳，“凶猛地直扑野米西地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非常猛烈，东干们破命地硬冲”。然而，武器质量的悬殊和战斗人员素质的差异致使回民军失利。这些反侵略的勇士们，抱着为神圣的祖国领土牺牲的信念，至死不退，最终大多“离开了人间”。[20]

妥明在吐鲁番危机之时，不断从乌鲁木齐派出援军和吐鲁番军民共同战斗。阿古柏久攻不下，气急败坏，令侵略军“在营寨的四周打起了围墙，挖下了壕沟，修筑了炮台”，并不断派兵攻打城池。回民军顽强地抵抗着，“东干们仍守城以拒，在城墙上不断鸣枪打炮。夜间，他们从坎儿井里出城，杀了许多骑兵。每天都有1万到1.5万名东干分两三路出城作战”。[21]“他们拼命的死攻硬打”，6个月来，日夜战斗，最后因炮弹落入城内爆炸，他们无法立足，加之阿古柏攻占了达板城，切断了乌鲁木齐至吐鲁番的交通要隘，“城里的东干们也感到不宜久支，于是他们集合在一起，重新商量着办法，祈祷着真主。最后他们发誓要同心同德破命冲出去，打败阿古柏的军队”。[22]于是，回民军将领马泰率大军5000余人出城，作拼死一搏。然而在此关键时刻，清军及反动团练却瓦上加霜，“徐学功等带勇与贼接仗”，[23]回民军猝不及防，败在清政府走狗手中。吐鲁番各族起义军在内外夹攻下，被迫投降。索焕章出城后不久病故，马泰及大多回族人民被侵略军强行迁往南疆。

吐鲁番保卫战历时半年，狠狠地打击了阿古柏侵略军，使其付出3万多名士兵的代价。回族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坚定的信念和英勇顽强的精神，与清政府及其走狗的昏庸、无能、出卖祖国利益的卑鄙行径形成鲜明对比，更显回族人民的高尚、无私和爱国，从而也激励着全疆其他各地回族人民更加英勇地打击侵略者。

1870年11月，阿古柏兵分5路进攻乌鲁木齐。妥明立即组织当地兵力6万、玛纳斯兵力4万抵御侵略军。回族人民倾其全部力量投入战斗，使阿古柏入侵新疆后遭到了最强大的抵抗。

在阿古柏侵略军入侵乌鲁木齐途中，回民军奋勇出击，袭击阿古柏军营。途中天气突变，回民军迷了路，行动迟缓，使阿古柏发现意图，并有了军事准备。回民军赶到预定地点，不顾疲惫，怀着对阿古柏入侵军的仇恨，发起猛烈攻击，“东干们

枪炮齐发，顿时硝烟弥漫，天空一片乌黑，子弹象雨点般飞来"，[24]回族军队英勇奋战，而侵略军"有些士兵在这场残酷的撕杀中，企图逃路"。阿古柏无情地下令可杀逃兵，才逐渐稳住阵脚。这次战斗如此之剧烈，这是阿古柏带兵以来第一次碰到的场面。虽然回民军作战英勇，重创了敌人，但实力比侵略军要弱，也缺乏善于作战的指挥官，战斗最终失败。阿古柏残酷地命令见到中国人就杀，小孩、俘虏一个不留。给阿古柏唱赞歌的英国人包罗杰也称"把被屠服者屠杀净尽，已经成为阿古柏的习气了"。[25]

在这严酷的形势面前，妥明再次向清廷求抚，呼吁清军以民族大义为重，共击阿古柏，但清统治者却再次落井下石，与阿古柏继续军事联合。清军及地主团练武装纷纷出动，配合阿古柏作战。乌鲁木齐竟在阿古柏入侵军与清军、团练的夹攻下陷落。[26]妥明在一徐姓汉族志士保护下逃往玛纳斯（此事在乌鲁木齐一带回民中有广泛传说），后被阿古柏拘管。大批回、维人民再次被"执往南疆"。投顺阿古柏的原回民军将领马仲被委派为乌鲁木齐伪阿奇木（总管）。在对这一地区进行"无情破坏"和对居民"残酷屠杀"后，阿古柏仍返回吐鲁番。

三、回族人民反抗阿古柏统治的斗争

回族人民在经南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多次战役后，损失惨重，大批的人被杀或被剥夺家产发配南疆。回族人民不知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被迫忍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战后的纷乱和入侵者蹂躏等等巨大灾难。但是，英雄的回族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并未消沉下去，去做侵略者的羔羊。他们擦去血泪，在坚定的爱国信仰促使下，以难以置信的坚强毅力，从血泊中爬起来，举起了反阿古柏统治武装斗争的大旗。

妥明被拘管玛纳斯后，不顾自己险恶处境，想尽办法不断用

各种方式与清军联系，表示愿意谈判投诚，合力抗击阿古柏。为壮大反抗阿古柏的武装队伍，他还以“清真王至圣裔督招讨总统兵马粮饷大上人”的身份联络西宁、肃州回民，恳请这两处回民领袖“俯念口里口外穆民均系一体，观其依思两木分（份）中，敝帅邀请麾下之兵迅速出口前来会合进剿”，他并对胜利充满信心：“谅此安子占缠夷托主圣相助，何难一鼓而下，共立大功。”㉗妥明在信中还对清将进攻关外回民驻托城堡一事表示：“回汉彼时原属一家，两相共事，设或有此参差，诚恐伤害大事，殊为可惜”。妥明精忠报国之赤子之心，于此可见。但昏庸的统治者囿于民族偏见，不但拒绝他一再请求，反而在玉门、敦煌一带设立严密防线，禁止这种爱国之举。㉘白彦虎率陕西回民及肃州回民多次出关被拒之安西、敦煌一带。㉙甚至北疆回民自卫武装到团练赵兴体营中送信，联络投诚，只因信中有“求和”等字，便被斥逐，“未允所请”。㉚

在爱国被猜忌、防范甚至被镇压的情况下，北疆回族人民仍以爱国大义为重，在阿古柏入侵乌鲁木齐不到半年就武装起义，他们联络曾是自己宿敌的团练头目徐学功，从乌鲁木齐赶走了阿古柏及其走狗，共拥妥明恢复“清真王”地位。

阿古柏得此消息后，惊恐不已，急忙派自己的儿子伯克·库里·伯克率援军扑向乌鲁木齐，在回奸马仲之子马仁得引导下，和回民军在“乌鲁木齐城郊发生了罕见的撕杀”。回军失利，妥明退走玛纳斯。侵略军对回民施以残酷的报复，乌鲁木齐成千上万的回民被阿古柏匪军活活烧死，或被当作活靶乱箭射死。幸存的人被课以6000两至1000两的重税，最穷的人也得交出10两银子，㉛回族人民再次惨遭灭顶之灾。

阿古柏为回族人民拼死决斗的精神而感到恐慌，遂决定和达吾提哈里发（即妥明，其经名为达吾提）和平往来。他派使者“携带着大量的、名贵的礼物和一封甜言蜜语的信出使玛纳斯”。

妥明听到使者来临的消息后，愤怒地说："我绝不和这些安集延人们来往！"遂下令处死来使，以示反阿古柏决心。[32] 不久，玛纳斯等地被侵略军攻破。据《伊米德史》记载，妥明在玛纳斯城破之时，服药自尽。

随时间的推移，清统治集团中终于有人看出回民军与阿古柏拼死搏杀是正义的反侵略之战，从逐渐同情、支持回民斗争到紧密联合回族共同战斗，徐学功便是其中1人。他们在妥明等回民领袖不懈努力下，终于摒弃前嫌，和回族人民联合抵侮。1872年2月，在回民迎接下，徐学功率所部进驻乌鲁木齐，他主动发给回民军旗帜，派其弟徐学弟协同回军作战。一时，回军"均与徐学功和好，一同攻击安集延"，徐学功所需粮草"皆系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处回民供支"。[33] 玛纳斯回民亦主动与民团赵兴体部讲和。回奸马伏源投靠入侵军，被回民将其"全家抄袭"。5月，阿古柏军千余名进犯乌鲁木齐，肃州回民派来与清军讲和的回民首领马金桂（贵）闻讯后，"带领徐学功所部勇丁由迪（化）前往堵击"。因敌众我寡，被侵略军包围，马金桂（贵）在激战中为国捐躯，徐学功之弟徐学弟也在此役中中弹身亡。阿古柏军再次占领乌鲁木齐。

英勇、顽强并能为正义事业坚持战斗，决不屈从，是回族人民高贵的品格。新疆回族人民更是如此。被阿古柏及其走狗采取残酷的"釜底抽薪"毒计，强行抽往南疆的大批回族人民，在半路上由马泰之弟马明率领，英勇机智地"逃出自归……据古县（即古牧地，今米泉县，为回族聚居之地）与帕夏（即阿古柏）相恃"。马明与滞留甘肃安西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派往奇台的官员桂洪员"深相纳，大出刍粮供军，共图帕夏"，[34] 并与徐学功、赵兴体、沈延秀等人商议具会作战方案，"挑选马队"，紧密配合作战。提督张玉春在马明帮助下，率队二百余名由奇台、济萨一带西进古牧地，建立了一个反阿古柏的前哨阵地。[35]

各民族人民放弃前嫌，合力抵侮，在北疆地区形成了反侵略的有利形势。阿古柏侵略军处处被动挨打。回汉人民武装力量西起玛纳斯，东至哈密，协调一致，实力十分雄厚，肃清阿古柏侵略势力的时机业已成熟。

但是，面对回汉人民联合战斗的大好局面，清统治者却恐慌万分。他们看不到民族敌人侵入国土后产生的形势转化，反倒担心回汉联合力量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清政府在新疆的代理人囿于民族偏见，首先要回族人民"献出城池，不妨赦其前罪，予以自新"，[36]又要北疆汉族民团充当清军的"屏蔽"，以保存清军实力。清政府还授意现在巴里坤的景廉乘回民军与侵略军作战之时，"确切侦探，设法进取"，将"丑类（指回族人民）悉肃歼除"。这些不顾大敌当前，分散瓦解自身力量的作法，真可说是助纣为虐！7月21日，阿古柏匪军乘回汉抵抗力量受令撤归原地，清军势孤力单之机，勾结内奸，袭击清军张玉春部。在激战中，张玉春身负重伤，清军面临全军覆没之危。此时，马明不顾自身困境，赶来奋力救援，使清军死里逃生。

古牧地及回族人民是阿古柏眼中钉，肉中刺。阿古柏匪军在打垮清军后，立即围攻古牧地。马明率回民军奋力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然敌众我寡，加之"城中兵粮缺乏"，形势"危急万分！"马明不得已以欲与安集延逆众假意讲和以为缓兵之计，禀请（清军）速发大兵星驰救援。他大义凛然地宣称："纵然死于国法，亦不愿从顺安集延！"[37]在紧急关头，清统治者坐而不视，景廉竟要马明以家眷做人质，才肯出兵相救。9月，阿古柏断古牧地水源，马明率部分回族群众突围。回族人民抗击阿古柏侵略军的根据地——古牧地失陷。

自清政府插足回汉人民反侵略斗争后，形势急转直下，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纷纷失利。清政府不但没有从自己的政策中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肆意破坏已损失殆尽的回汉人民反

侵略斗争联合局面。在回汉人民联合抗敌时，各族人民纷纷恢复贸易交往，古牧地回族群众持有马明的路照，便可径往汉族团练控制地区做买卖。然而在12月18、19两日，景廉借口有人窥探当地清军兵营，唆使凶顽的走狗孔才将在古城、济木萨做买卖的回族平民二三百人全部屠杀。景廉这一暴行，使北疆回汉人民联合斗争的局面彻底破坏，回族武装受抚的可能完全消失。

四、小　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大众反侵略武装斗争就这样失败了。究其原因，回族武装力量弱于阿古柏侵略军固然是一重要因素，但根本原因却是清政府反动政策所致。回族人民历尽艰辛、苦难，英勇顽强地抗击外来入侵者，为祖国付出重大牺牲。在抵抗外国侵略势力过程中，回族人民一面要与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侵略军作拼死搏杀，一面还被迫分其力量与龟缩在后方的清军及地主团练武装作战。回族人民有的是反侵略的勇气和信心，但无法在此险恶条件下取胜。妥明、马明、索焕章等回民领袖，代表全疆回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汉族团练极力联络、团结。经不懈努力，回汉人民终于摒弃前嫌，握手言欢，合力共击阿古柏侵略军，形成抗击侵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然而，由于清统治者昏庸无能，鼠目寸光，不顾大兵压境和回族人民放弃前嫌，全力抵抗侵略者的战略转变，坚持其反动的“杀回灭回”政策，一手破坏了这来之不易的团结抗敌局面，并将回汉人民重新引入互相仇视的歧途。这种作法致使阿古柏势力在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继续嚣张跋扈，回汉人民继续遭其蹂躏、荼毒，也使以后撤退至新疆的白彦虎领导的回族义军进退失据，走投无路，被迫与阿古柏“互为声援”以为脱身之计。回族人民悲壮的抗侵略斗争就这样夭折在清政府手中。回族人民没有被凶恶的外来势力征服，却被反动的清政府剿灭，这就是历史上演的一场椎心泣血的悲剧。

回族人民抵抗侵略者的武装斗争虽惨遭失败，但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使其损失惨重，实际上已丧失了大规模作战能力。回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为清军大批进军新疆，彻底摧毁阿古柏伪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 释：

①、⑥、⑬、⑭、⑳、㉒、㉜，引自毛拉木沙《伊米德史》，维文，历史调查组油印汉文译稿。

②、③、⑤、㉑、㉔，《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佚名著，宗教所汉译稿。

④、⑪、〔俄〕A·H·库罗帕特金著《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版汉译本。

⑦，《巴达吾来特传》。

⑧，〔美〕贝尔思《左宗棠传》306—307页。

⑨、⑩、㉕，〔英〕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⑫、㉗、㉝，国家第一档案馆军机处录副档民族类回、维项1578号。

⑮、⑯、㉘、㉙、㊱，引自或参见《清穆宗实录》261、255、265、303、320、335卷。

⑰、⑲、㉓、㉖、㉚、㉝、㉟、㊲，引自或参见《平定陕甘新方略》298、233、233、242、263、265、267、268卷。

⑱《辛卯侍行记》第6卷，陶葆廉著。

㉞、《戡定新疆记》第1卷。

抗战时期的陕西回民

金 兰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秘密组织下，西安市于9月27日召开了几万人的反日救国群众大会。许多回

民群众同各界爱国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蒋介石政府对日宣战。省回教公会会长、省政府参议冯瑞生被选为省反日救国会会员。10月15日，冯带领回族中的工商界人士参加了省商会和省反日救国协会举行的抵制日货活动，他们深入大街小巷的商号，查禁日货，并电告津沪等地勿将日货运入陕境。同时，回族爱国人士马德涵、乌光焕等人在西安小皮院清真寺内召集群众开会，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马被公推为会长，有500多会员。他们上街游行，张贴反日标语，声援东北将领马占山部的抗日行动，为其募捐。

在1931年秋至1932年夏期间，中共地下党员刘格平在陕西国民党第17路军作兵运工作时，得知冯瑞生先生是一位回族进步人士，很有声望，即以回族身份接近冯。“九·一八”事变后，在刘的影响下，冯以陕西回教公会会长名义组织回族群众，成立了“陕西省回教抗日救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刘向到会的回族群众进行了反日、爱国的宣传，并被公推为会长。此后，刘除经常参加省各界的救亡活动外，还倡议在回族中组织了一个青年读书会，深得冯的赞扬。刘每周为读书会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打内战政策，激发回族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几个月后，读书会的活动引起蒋帮特务的注意，冯立即资助并派人把刘护送过黄河到山西省。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西安一中、二中、师范学校的数千名回汉族学生上街游行声援。

1936年底爆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全市的抗日救国运动达到了高潮。12月14日，西安召开了“陕西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成立大会，通电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大会的还有宁夏、甘肃、山东、河南、青海等9省的回族代表。联合总会于当月向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将领致电，言称“年来蒋氏扩

大内战，丧失国土，罪大恶极，已为举国所不容”，呼吁马步芳等人“速派代表来陕参加救国会议，共商国策，为国家求生存，为回族谋解放，当机立断，幸勿迟疑”。

1937年1月28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下，西安400多个救亡团体，共约15万人在革命公园召开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大会，数千回民参加了大会。大会在潘自力同志的主持下，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誓死保卫全中国。

二

“七·七”事变后，在成立“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同时，又成立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支会”，学生也成立了“后援会西安回民学生支会”，冯增烈、刘焕章等近百名学生参加了“学生支会”的爱国活动。

1938年9月13日，西安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大会除了向政府献旗外，还向全世界伊斯兰教界通电共同声讨日寇，“抵制日货”，通过了《告西北回民书》。11月23日，是穆斯林的开斋节，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群众在清真寺聚礼之际，日机20余架疯狂轰炸西安，投弹80余枚，回胞伤亡130余名，炸毁清真寺4座和民房数十间。日寇轰炸清真寺的野蛮行径，激起全国穆斯林群众的极大愤慨。南京有4万回族群众集会游行，发表《告全世界伊斯兰兄弟书》，“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发表《为暴敌惨炸西安回民同胞告全世界伊斯兰兄弟书》，愤怒声讨日寇屠杀回民的野蛮罪行，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抵制日货”，“扩大援华”。

此后，日寇又多次轰炸西安城，四周乡村的汉民多热情接待从城里出来避难的回民，腾房、送水送饭，尊重回民习俗，有的还互认“干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1934年初，在原“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分会”的基础上，成

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马平甫、马福泽、白楚珍、冯耀轩等人先后任理事长，陕西省的宝鸡、汉中、安康、凤县等也成立支会。当时，华北沦陷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的数万回民纷纷逃至陕西，回协发动群众，打扫清真寺的空房、过道等遮风避雨处，安排难民临时吃住事宜。许多回民群众募捐钱粮、衣物，以解燃眉之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回协救济生产基金委员会”，向部分难民发放小额贷款，一些回族青年被安排到大华纱厂和华峰面粉公司等企业当工人，以尽量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

“陕西回协”还组织了“西安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号称800青年，由回协理事杨绍源（系42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任团长，马图轩任副团长。他们在日机轰炸期间，冒死疏散群众，抢救伤员，掩埋死难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回协安康支会”在其理事长的领导下，动员数千回胞于1939年承包了修建飞机场的石料采运任务，并按工程要求如期完成。

三

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涌现了许多回族爱国人物。杜秀升先生原是河南省总商会会长，于1935年在西安创办西北地区第一个现代机械化的华峰面粉公司。开封沦陷后，杜到西安任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1941年，杜又任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负责统一接受省政府下达的军粮生产任务，协调所属西安的华峰、成丰、福豫、和合，宝鸡的福新、大新，汉中的大新等面粉厂的生产任务。他的华峰公司把日产面粉4000袋提高到6000袋，并研制出少量一等粉和麦精，供给来华的美军第14航空队食用。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地相继失陷，中国大后方整个军民用粮的加工任务，主要依靠四川的大米和陕西的面粉。杜秀升领导陕西省面粉生产同行，克服困难，保证需要，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4年初，在绥远省包头市清真寺开学的西安清真大寺掌教马谦益哈吉，得知日寇要他代表西北回民赴日朝见天皇，以示“中日亲善”后，装病卧床不起，并乘机化装随骆驼商队逃出包头，几经辗转到了定边。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张杰、刘春、宋友国、丁溪野等人热情接待了他，并请他在定边清真寺为群众领了开斋节的礼拜。还有许多回族青年走上抗日第一线，参加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汉中回族青年沙兆豫，他在天津南开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后，他作为平津学联的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1937年初，他以记者身份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接见。周恩来指示他赴天津办新闻社，宣传抗日救亡。“七·七”事变后，沙兆豫领导“全民通讯社”，宣传抗日。“皖南事变”后，沙在我党新华社工作，成为当时抗战宣传的知名记者。

四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回族工作。早在长征红军刚到陕北时，即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传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共同抗日的主张。1937年7月，党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了回民工作部。1941年7月，中共西北局也成立了少数民族工委会。8月，边区政府成立了少数民族事务工委会。这些少数民族专门工作部门的成立，为团结回族人民抗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9年至1940年，延安中央党校举办回民训练班，其他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定边县民族学院均接受回族青年学习深造。1940年2月26日，延安成立“回民救国协会”，金浪白、马文良、马寅、马青年、苏冰为理事，并发表了《告全区回民同胞书》，呼吁“加

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10月7日，在延安中央礼堂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和“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的成立大会。朱德、王明、洛甫、高自立、谢觉哉等千余人参加。会议选举鲜维峻、金浪白为回协分会正副干事长。

回协分会成立后，除组织边区回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外，还参加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三边分区的回民经济总产值，1943年比1936年提高50%。定边县新华街回族自治乡的回民已有千余人，大小商店数十家，有旅社、骡马店、日杂百货店等，形成长达一华里的商业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回民成立了以马思义为首的回民抗日骑兵团，还有关中回民支队、三边回民支队。1944年4月，华北的冀中回民支队也到达陕北。这4支回民队伍在抗战和保卫边区中做出了贡献。陕甘宁边区的回民在政治上也当家作主，1941年11月，有7名回族代表成为延安第二界参议会的参议员，延安清真寺阿訇马生福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942年，在定边县成立了新华街回族自治乡，杨彪、金凤歧等被先后选为乡长。

青海骑兵师抗战纪略

马　有　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曾调青海以回族为主的一个骑兵师出省，参加抗日战争。我当时在该师任过参谋，对这个师参加抗日战争前后的情况略有所知，现就个人回忆和有关人

员提供的资料，将这个师参加抗日战争的一些情况整理出来供作参考。

暂编骑兵第一师的组成

当时，骑兵师的组成是以原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一旅为基础，拼凑了原驻防在河西走廊一带的马步青部的一部分，并征调大通、互助、湟源三个县的民团共8千余人。成员中有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民族，其中回族较多。马步芳调派原海南警备第1旅旅长马彪（马步芳的族叔）为师长，赵仁为参谋长，龚浔为政治部主任。全师分3个旅，马元祥为第1旅旅长，马禄（原马步青部）为第2旅旅长，马秉忠为第3旅旅长。1937年8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颁令为暂编骑兵第1师番号，正式任命马彪为师长。

开赴抗日前线及初期一些情况

同年9月11日（农历中秋节），马步芳在西宁大教场对新组成的暂编骑兵第1师进行检阅，并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当日在城乡父老热烈欢送下，从西宁出发，经过兰州、平凉到达陕西乾县，沿途人民群众热烈欢迎、欢送抗日将士，部队也精神抖擞，士气昂扬，表现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爱国的英勇气慨。

部队进入陕西后，即隶属当时的第8战区和西安行营指挥，各旅分驻兴平、扶风、醴泉、永寿和咸阳等县待命。1938年2月，奉命调驻临潼，各旅分扎在西安以东地区、河南陕州以西，担负陇海铁路沿线的灞桥、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和灵宝一线与西安至河南荆紫关公路沿线的蓝田、商州、龙驹寨（丹凤、商南、山阳）一线防守铁路匪及保卫公路安全等任务。同时，并派出部分骑兵小队，由潼关、凤陵渡北渡黄河，至晋南的芮城一带，奇

袭运城的日军，确保潼关安全，并消灭了这一带进行骚扰的白莲教匪徒和一些惯匪，取得了初步战绩。

4月间，部队奉命剿西荆公路龙驹寨一带由日本浪人和汉奸参加的白莲教匪徒，很快就将千余匪徒全部消灭。当时该匪众盘踞在华山南麓，据情报得知，在华山寺有几个化装的日本人暗中指挥。白莲教（又名红枪会）专门以邪术愚惑群众，其组织如同封建王朝以“玄德汉明元年”为国号，其服装亦按级别着莽袍、官服、兵勇等；所用的刀或枪均贴有写着咒符的黄标纸，自称刀枪不入，不时出没于西荆公路线上，肆意拦劫车辆，抢夺物资，致使西荆公路无法畅通，严重影响华中战备物资的运输与供应。这股匪徒被消灭后，此线随即畅通无阻，因而曾得到西安行营的传令嘉奖。7月，将第2旅（马禄旅）调赴开封以东兰封、商邱一带，堵击西犯的日军。但该旅正在和日军奋战之际，忽奉8战区指挥部紧急电示，嘱即退守郑州以西待命。于是星夜退至泗水、黑石关，这时蒋介石命令空军炸毁郑州以东花园口的河堤，黄河决口，淹没了豫东和皖北10余个县区，其效果只是阻止了淮阳西犯许昌的一部分日军（当时一部分日军乘空投的橡皮船逃走了），可是这次水灾给当地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方面的损失，确是历史上罕见的。随后，全师奉命调赴河南许昌待命，继又进驻黄泛区的尉氏、扶沟、鄢陵和西华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受一战区孙桐楦集团军的指挥。

在驻守河防期间，不料驻守在扶沟县尹郭、白马庙等地的第2旅马秉忠部3团1营1连排长马元林（原哥老会分子）暗地勾结河东伪军，并枪杀了一营营长马某，带走了几十名士兵东渡黄河泛区叛变。不到1个月时间，与日本侵略军的1中队及伪军千余人偷渡黄河，竟然侵占了我河防的七八个村寨，并扬言皇军即将西进，要夺取洛阳。一时情况紧急，马彪即电告洛阳求援，第一战区长官部立即派庞炳勋的两个师，开到郑州等地，准备堵

击来犯敌军。这两个师进至离前线二百里处就停止不前。时值严冬季节，气候突变，风雪交加，师部即决定利用与敌不利的恶劣气候出动两个旅的兵力，向侵占我防线内村寨的敌伪军展开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敌势顿挫，我军连续收复各该村寨，打死打伤伪军数百人，同时将叛徒马元林生俘，当场杀头示众了。其余溃退的伪军数百人正想仓惶乘船东渡，因一时气候酷寒，黄河冰块集聚，加之朔风逆向，渡船很难成行，结果一半被我歼灭，一半跳河溺毙，无一生还。当时，洛阳后方曾因此敌情，搞得人心惶惶，直至大获全胜的喜讯传来，该防区各县百姓，无不箪食壶浆，犒军慰问，并给马彪师长赠送“万民伞”一把，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与慰劳。

扩编后的淮阳之战

1939年春，第2旅马禄部由郑州调往陕西耀县后，由驻防甘肃武威的骑兵第5军马步青部增补了两个旅，另组成暂编骑兵第2师，由马禄升任师长，驻防北同官（铜川）等地，与陕北边区八路军长期对峙，始终归胡宗南指挥。据闻马禄师长系哥老会头子，与陕北边区对峙中，在禁运等方面始终处于缓和情况。

与此同时，马彪的3旅旅长马秉忠调为2旅旅长，马步芳又从青海抽调了一个旅的人马，派孟全禄为旅长，补充为马彪师的第三旅。春末，暂编骑兵第1师，全师调驻周口至界首一带的黄泛区，主力驻项城，任务是防御淮阳的日军，因为淮阳是苏、鲁、豫、皖边区日军主要据点之一，所以日军不惜调集各兵种，严加防守并随时出击我部。而我师所驻河防，地处平汉线中段的漯河东站东侧，关系华东、华中战略要地，因此对淮阳的日军，我师常以轻骑不断地加以袭击，牵制其龟缩城内，而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师参谋长赵仁因受内部派系的排挤，自行离职，投奔胡宗

南部。马步芳另派马仁接任参谋长。

这一年的八九月间，马彪师各旅先后轮渡黄河，经常以“小骑群”的游击形式，袭击淮阳一带日军，而主要任务是侦查日军在淮阳一带的敌情。先是1、3旅轮流渡过黄河偷袭敌军，任务完成后仍返回黄河南岸，最后以马秉忠全旅人马渡河进驻宝塔孔庄一带，进军围困了淮阳城，并占领了淮阳城西关。当时日军从开封调来一百辆大卡车的援兵，与淮阳日军配合步、炮、坦克各兵种，大举进犯我河防阵地，双方展开冲锋，形成了白刃战，我全旅将士奋勇迎战，马秉忠旅长在激战时中弹阵亡，全旅人马伤亡损失严重，同时牺牲的还有李营长、赵清心连长等。其所部暂由该旅四团团长韩某指挥，连续浴血苦战。在这期间，马彪师长从隔岸下达命令，要血战到底，并派一旅旅长马元祥率部分部队渡河前往宝塔前线支援，直到马元祥旅长负伤后才渡河返回后方疗养。由于我军与日军顽强交锋，誓死不退，并以轻骑迂回敌后奇袭，致使日军腹背受击，终于不支溃退。日军在仓惶溃退中，有两门大炮未及带走，当我方正设法拖拉中，敌人又反扑上来，使用催泪性毒气，于烟雾弥漫中又被敌人抢了回去。在这次战役中，前后总计消灭敌官兵1000多人，俘虏日军数十人均送交战区指挥部，而我军伤亡共2000余人。

事后，在水寨还为阵亡将士马秉忠、李营长、赵连长等开追悼大会，并在其墓前立了纪念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部及青海当局都有悼念唁电，西宁也开了追悼会，悼念抗日阵亡烈士。此时全师官兵，以马秉忠等将士壮烈牺牲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鼓舞、增强了杀敌复仇的决心，同仇敌忾，化悲痛为力量，誓死继续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接着便在一次战役中，打死敌骑兵500余人，缴获战马数十匹；其中还选了20匹送往青海向马步芳报捷。因此，在以后的敌我接触中，敌人未免恼羞成怒，抽调重兵，配备优势武器，不仅将我宝塔一带阵地

用炮弹摧毁，并在坦克掩护下，步兵向我猛扑。在这次战斗中，虽然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我军伤亡也相当严重，有百余战士陷于背水之战，弹尽援绝，因不愿被俘受辱和惨遭折磨（日寇将我军俘虏，常以剜眼剖腹致死）而投水自溺，壮烈殉国。同时，敌军还将我军遗弃拴在树桩上的战马200余匹用机枪扫射致毙，真是惨不忍睹。

整编为骑8师后的建制与作战情况

我军在各次战役中，由于豫东地势平坦，隐蔽不易，在作战中虽然行动敏捷，但骑兵目标过大，马匹损失不少，曾由青海补充战马500余匹。一战区长官部考虑到我师人马由于多次奋勇作战，伤亡较重，长此下去，不易补充，便于1940年5月间暂调后方至豫西叶县、午阳等地进行整训。

同年7月，全师调赴皖北的临泉及豫皖边界的沈、邱两县，并整编为骑兵第8师。为了便于指挥，有利于战斗，取消了旧的旅、营建制，改为新的师、团、大连编制。当时全师共编为3个团，1、2两个团为骑兵团，第3团为步兵团。此外，尚有师直属营、连等，马彪仍然担任师长。整编后，依然属于洛阳第一战区战斗序列，同时接受第五战区李仙洲集团军的指挥。

8月间，调赴皖北的涡阳、蒙城、怀远等县，驻守涡河以南，沙河以北三角地带，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沿线的日军。当时日军在蚌埠一线为第60师团，伪军两个师，经常与我对峙。其间，我军经常进行出其不意的奇袭，破坏敌占区的铁路、公路、桥梁等，以断敌通路，使其运输物资困难，并牵制了敌军的行动。据当时情报侦悉，日伪军称我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对我戒备甚严。此时马元祥副师长回青海探亲，被马步芳留用未再回皖，于是，孟全禄就代理了副师长的职务。

1940年9月间，我师工兵连和一个步兵大连，进驻怀远县境

涡河北岸的一个重镇——龙岗镇，并修筑了两道防御工事，埋设了很多地雷。日本侵略军认为对其构成了威胁，便以大炮、坦克、装甲车配合步兵，围攻龙岗镇，首先以大炮连续轰击后，就以坦克冲我阵地，而我军就大大发挥了地雷战的威力，当时一辆坦克被炸毁，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接着，敌人即以猛烈炮火掩护，派步兵持探雷器寻找地雷，我军便在隐蔽工事内，以机枪扫射敌人的探雷部队及出动的步兵，因而屡挫敌军的锐气，使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打死日军有好几百人。此时，忽见敌军的一面太阳旗突然倒下，敌阵出现混乱情况，于是马彪师长当即命令两个骑兵大连，由附近的一个渡口渡过涡河，迂回袭击来犯龙岗之敌，敌军急忙溃退，而被我军击毙的日军尸体，因来不及运走，仅仅割走了各尸体的每只胳膊（据说日军把烧化的骨灰送回日本，叫做无言回国）。在龙岗镇战场上，尸体纵横，不下三四百具。敌人在退却中大放毒气，我军未敢穷追。经过这次战役后，皖北一带的敌军犹如惊弓之鸟，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从此，“马胡子军”的声誉传遍附近敌占区群众之间。

蒋介石历来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后方，把地方等杂牌部队摆在前线充当炮灰。1941年夏，日军以优势兵力由皖北的寿县、凤台两县出发，三面包围我军。当时马彪师长考虑到我军防守之地是涡河、沙河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敌军第60师团和一个师多的伪军沿沙河西进是在骑八师的右后方，我师腹背临敌，难以支撑，并判定敌军的出动是扫荡，而不是西进，因此，决定我军由怀远的河溜集，蒙城的双涧集、陆瓦房等地转移到阜阳、颍上沙河以北地区。这个时期，敌我仅发生小部队遭遇战，并无大的接触，敌人扑空后仍退回原据点。当我军返驻原防地时曾与新四军彭雪枫部接触，发生冲突，双方在黑夜中展开战斗，结果，彭部与我师双方都受到了一定损失。后来才知道，我师与新四军彭雪枫部所以发生战斗，完全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这次发生的不幸事件

正值抗战第二阶段（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包藏祸心，对日采取消极抗战，对八路军、新四军则暗中采取冲突磨擦，充分暴露出了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回忆马彪部队初到皖北时，全师官兵都认识到是来打日本侵略军的，因而与友邻部队彭雪枫支队双方经常派员联络，友好往来，彭雪枫部曾派人给骑8师100匹军衣布料，马彪骑八师也派人给彭部送去战马10匹和20支步枪，还随时互通情报，共同对付蚌埠的日本鬼子，为此曾受到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战区来电报责备。以后不久，彭部就调到津浦路以东去了，再未发生过联系。

马彪离职与马步康接任骑8师师长

1941年以后，马彪师的内部勾心斗角，意见分歧。当时马彪因兼任何柱国骑兵第2军副军长，并有升任64军军长的传说。于是有人即向青海马步芳告密，说马彪有野心，想脱离青海；加之补充兵源，多是来自豫皖陕西地区所抽调的壮丁，大有摆脱青海的迹象。1942年夏，马步芳生怕骑8师的兵权完全落到蒋介石中央军的手里，因而急忙由青海飞往重庆，向何应钦进行活动后就向蒋介石当面报告说："马彪因年老申请退休，拟由马步康去接替……。"蒋介石随即准其所请。马步芳返青后，即派马步康带领部分人马（马步康系马步芳的堂兄，时任马步芳的100师298旅旅长之职），前往皖北阜阳东北的马店子与马彪办理交接手续。马彪至此含冤未去青海，索性居住西安。不久，马彪接到蒋介石电召，旋去重庆，面谒蒋介石，当面诉说他并未要求退休，并表示：当此抗战紧急关头，宁愿当个老黄忠战死沙场，为保卫"党国"，死而后已。而蒋介石也假意地嘉许马彪勇敢善战，屡立战功，犒赏了美币10万元，并分别电示西安胡宗南及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妥善安置马。汤恩伯接电后，便在沈邱筹备成立骑兵纵队，打算由马彪来领导，曾派人在甘肃夏河等地买马

数百匹，先成立了第1团，当时由谁来任团长还未加肯定。但在继续买马中受到了马步芳的忌恨刁难，买马事宜很难进行。马彪在这种情况下，看到成立骑兵纵队的计划就要落空，于是他仍返回西安，即以中将参议的名义休居西安市。以后还是马步芳把他叫回到青海了。

中原大会战前后

1942年，整个苏鲁豫皖边区一带除了零星的拉锯战以外，敌人基本上改变了战略方针。自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后，在日伪合作下各地大力推行伪政权，积极收买汉奸、叛国分子，扩编伪军，企图收到“以华制华”的效果，特别是要进一步勾结国民党军，共同进行反共。当皖南事件发生时，骑8师一直在皖北，没有参与其事。回忆在敌我进行拉锯战的一段时间里，在蚌埠靠铁路沿线一带，曾出现过3个轮替性的地方政权组织，即：汪伪政权、人民政权和国民党政权，由于汪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里的官员乘机发国难财，压榨迫害群众，真是搞得民不聊生。

1943年至1944年之交，敌人又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掀起了中原大会战。先是攻占了河南洛阳，后为继续打通平汉线，重占该线水、陆码头的漯河据点，调动板垣师团的主力，首先围攻漯河外围的阜阳重镇。为了保卫阜阳，苏鲁豫皖边区总部调马步康骑8师赴颍上一带作为侧翼掩护，参加了保卫阜阳的战役。在颍上县与友军主力部队取得联系后，作为机动掩护力量尽量迂回到敌后侧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当时正值田苗茂盛季节，人马容易伪装隐蔽，在偷袭、奇袭中，常使进犯的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来，骑8师司令部暂驻后方的一个村子，由于敌密探告知，在我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副师长卢广伟和一士兵被敌人飞机投弹炸死。

中原大会战结束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敌人的种种不利

因素，豫皖一带的日军除和骑8师部队发生若干零星接触外，没有发生较大的战斗。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密令，积极进行反共。惟这时在铁路以西活动的革命部队，如新四军的彭雪枫部早已调往铁路以东去了，所以再没有和骑八师发生过冲突。接着，骑8师又划归第5战区指挥，仍驻皖北。

日本投降以后

1945年日本投降后，骑8师同其他友军，奉命开往徐州"接收"，在徐州九里山一带待命。因为当时的中央军视骑8师是地方杂牌军队，只准在城郊驻扎，不准进城实际执行接收任务。而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接收"中，舞弊弄私，大发横财，故当时人民群众把"接收"称作"劫收胜利果实"。

"接收"完毕后，听说直接指挥骑8师的第22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和陈大庆等建议调骑8师到山东去打内战。当时马步康鉴于所属官兵多属家乡子弟，而且亟欲凯旋返乡；同时马步康也看出打内战将愈陷愈深，最后全师有被消灭的危险，因而除急电青海马步芳代为向有关方面斡旋外，马步康自己也直接向总部大事活动。最后，该师于1946年元月，由陇海路调至陕西富平一带，当时由于战后部队缩编和整编的需要，就与暂编骑兵第2师马禄部合并，整编为1个师，保持骑8师番号，马步康仍任师长。同年3月，调驻甘肃永登。

回顾这个师自离青东下，几经扩编、改编、整骗，伤亡近万人，逐年补充的豫、陕籍士兵达半数。尽管这个骑兵师是国民党地方部队，有它反动落后的一面，但在整个抗战8年期间，全师官兵远离家乡，转战苏鲁豫皖边区，不惜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军奋勇作战，为保卫祖国是作出了贡献的。

国民党81军绥西抗战

王　五　典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宁夏以回族为主的国民党35师奉命扩编为81军，并开赴当时绥远省西部抗战前线，几经激战，令我难忘。今仅就个人所经历的战役，记述如下：

一、办抗日训练班

马鸿宾于1938年春在宁夏省永宁县望洪堡举办81军军官训练班，把全军营附、连长两级军官集中训练。在开学典礼上，军长马鸿宾特地穿着一身黄呢子军装，外套黄呢子大衣，佩戴着中将衔的领章，足蹬马靴，腰挎佩剑，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我们军人首先要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时时刻刻记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保土卫国，尽职守责。在战场上能攻能守，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和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还指出，日寇有飞机大炮，我们没有飞机，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坚固的工事，加强射击训练，做到弹不虚发，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发挥我们的优势；同时，要加强陆空联合，步炮联合训练，多多训练防空、防毒。马鸿宾的这次讲话，对将要开赴前线的战士指明了方向，鼓了士气。当时我正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兼分队长。训练班根据马鸿宾的讲话精神，不仅专门进行抗日军事训练，而且还进行了抗日爱国主义教育。在军事训练中，因无防毒面具，我们就采用纱布口罩装锯末用煤油浸湿戴上

以顶替防毒面具。后来在绥西抗战中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训练班进行了两个月即行结业，与此同时，对整个部队亦进行了抗日战争的训练，充实了装备。

二、开赴绥西抗战

1938年5月，蒋介石发表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除绥西现有各部队统归马鸿宾指挥外，并由马鸿逵部调拨步骑兵各一旅也归马鸿宾指挥，相机收复包头绥远。5月底，马鸿宾坐雪福兰汽车，带领随从人员赴绥西临河就职。他亲自察看了防区各友军设防情况，指定了81军的防区范围，即命令他的部队开赴绥西抗战。在部队出发前，他召集军官反复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战争，我们要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要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认识到抗日战争是艰苦的，要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因此，无论行军驻防都要讲究军风纪，爱护老百姓，时刻牢记“观民心之向背，知军纪之良否”。沿途决不能骚扰老百姓，任何人不准进入民房，一切辎重炊具、用具都要带全，不准借用老百姓的任何东西。

后来，马鸿宾在临河军部和他的三子马惇靖军参谋长经常召集军部幕僚人员研究作战计划，把防区内外的川山地形，以及各部队设防位置、火力配备、假设敌的位置等都做在沙盘上，进行沙盘战术教育。马鸿宾父子都特别注意构筑防御工事和射击教育。马鸿宾经常亲自指导检查各部队的射击教育，并不断组织各部队的军官进行射击比赛。他自己的射击技术高明，弹不虚发。对各部队所做工事，他都要亲自进行反复检查，不断加固。马惇靖为了在作战中进行多层通讯联络，除了电报、电话外，还有骑兵通讯、号音通讯、旗语通讯、火光通讯等，尤其注重夜间野外的实战训练，曾在乌镇与司仪堂、乌布浪口地区进行过大型野外演习，并请苏联专家作指导讲评。

1938年农历四月中旬，马鸿宾命令81军35师205团团长马文清率领该团首批由永宁县仁存渡坐木船沿黄河顺流而下，赴绥西抗日前线作战。行船13天到达临河县境的灰德城下船，农历五月初四，步行经临河到达五原县城南关，已是上灯时间。当时我任81军35师205团2营6连连长，由于天色已晚，为了不惊动老百姓，我们连驻在一个车马店的房顶上，次日黎明即撤出南关，全团都在南关外的树林子里，热热闹闹地欢度端阳节。初六日即从五原出发，205团团部及第三营驻五原县城东北约40华里的乌镇，第二营驻乌镇东约10华里的万和堂，第一营驻守在乌镇东北约10华里的司仪堂。后续部队到达以后的设防部署是：马鸿宾的81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驻临河县城；马腾蛟的35师师部及其直属特务连驻五原县城东北约30多华里的折桂乡；马玉麟的103旅旅部及其所属部队驻乌镇；张海禄的206团团部及其所属三个营守乌拉敖包（乌镇东约5华里）；马锺的104旅208团团部及其所属三个营驻守在乌布浪山口（乌镇东北约10华里）。

三、乌拉敖包战役

1939年夏秋之交，日寇从包头乘汽车、装甲车、坦克向绥西81军防地进犯，企图消灭81军主力部队，侵占绥西。马鸿宾的三子、81军参谋长马惇靖在日寇进攻前几小时从临河军部出发到达乌镇检查防地。这时我任205团第二营营附，被安排在阵地电话旁看守电话。日寇到达81军阵地前，首先用大炮轰击乌拉敖包206团和205团阵地，敌人的一颗炮弹落在我看守的电话机前的一座田埂上，我只觉得身子往起一跃就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耳朵闷响，睁开眼睛一看，电语机被震到身后的水坑里，我赶快把电话机从水坑中取出来，重新安装好。马惇靖在电话里急切地询问电话为什么中断了？火线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不断地向他汇报着火线上的情况和传达他给火线上的命令。如他叫立即转告205

团、206团第一线的官兵弟兄们注意，现在既要利用我们的防御工事，沉着应战，充分发挥火力，杀伤敌人，又要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夺取胜利，不能只守不攻；还令206团派出小部队沿乌拉敖包东南利用地形向敌人侧背迂回。他的这两道命令在这次战役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日寇向81军阵地开始炮轰，我军206团迫击炮连用八二迫击炮还击。由于我军用的是旧式迫击炮，一冒烟即暴露了目标，敌人立即向我炮兵阵地倾泻炮弹200余发，我军迫击炮只打了3发炮弹就被敌人打哑了。敌人在炮兵、机枪的火力掩护下，用坦克、装甲车、汽车等机动车辆向我阵地冲来，我军遵照马惇靖军参谋长的命令，利用工事沉着固守，发扬火力，当敌人进入我军阵地步枪有效射程以内，趁其下车之际，206团一营官兵发起猛烈冲锋，一下冲到敌人的机动车辆跟前，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并用大刀砍敌人的汽车轮胎，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有的敌人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打死在车上，下了车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剩下的抱头鼠窜钻进汽车、装甲车逃跑了。我军缴获了两辆汽车、100多发炮弹、几十箱子弹、少数枪支、指挥刀、食品罐头等军用物资。这次在战场上发现敌人把被我军打死的日寇尸体用装甲车上的特殊装置翻挑到车上去。

81军缴获日本鬼子的汽车，开到五原县城向群众展览宣传。老百姓自发写的庆祝标语在汽车全身贴上一层又一层，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热爱祖国、仇恨敌人、军民一致的民族感情。乌镇街上有位老艺人，在81军打了胜仗后的几天内就编出了不少歌曲，在街头自弹自唱，唱词中有这样几句："咱们的老西军（指81军），打起仗来真能行。打跑了日本兵，缴获汽车拉进五原城，全城百姓庆祝又欢迎。依靠咱们的老西军，打败日本兵，百姓得安宁。"

四、乌布浪口、司仪堂战役

1940年2月1日，日寇3万余人，汽车、装甲车、坦克1500多辆，飞机多架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分两路进犯绥西：一路向乌布浪口、司仪堂、乌拉敖包、乌镇一带的81军防区进犯；一路在马七渡口与门秉岳的骑7师接触。当时马鸿宾正在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部队由35师师长马腾蛟指挥，几个团长对马腾蛟的指挥不是十分尊重的，执行命令有点满不在乎，这是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日寇到达81军阵地前是2月1日早晨太阳刚刚冒花约8时许，在司仪堂的正北、乌布浪口的正东枣树林口子大沙滩集结兵力。时我任205团一营营附，驻守在司仪堂阵地上。日寇车辆经司仪堂正北向枣树林口子集结时，我自己和另外3个人专门数敌人的车辆，从早晨到中午，敌人共集结780多辆各种型号的车辆。日寇先头部队到达81军阵地前，先用3架飞机开始在81军阵地上空盘旋侦查并轮番轰炸，第一次投弹就炸死老百姓的群牛70多头。在飞机投弹指引下，紧跟着就是大炮轰击。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掩护下，敌人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向我军阵地接近。他们首先用4辆车向驻守在乌布浪口的208团阵地作试探性进攻，接触仅10多分钟，3辆车慌忙调头往回跑，只留1辆车停在原地不动。我208团驻守在战壕内的官兵误认为这辆车已被打坏，再开不走了，跃出战壕向敌车冲去，不料敌人的这辆车调头扫射，立即打死打伤我士兵10多人后调头东去。日寇在向208团作了试探性进攻之后，集结在枣树林子大沙滩的车辆已近300辆，便开始向乌布浪口和司仪堂阵地接近。81军按照马鸿宾的命令在阵地前挖有3米宽、3米深的一道防御壕沟，从乌布浪口的山脚下一直到黄河沿岸约20华里长。防御壕的前面还有50米宽的一道陷坑，这对防御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是起了良好作用的，但同时又被敌人利用作为掩体，对我军不利。日寇

到达我阵地前沿离开车辆向我扑来，双方激战到天黑。夜间9时许，我营一连连长丁良玉负重伤，次日牺牲。排长、班长、士兵30多人阵亡。营部跟随我的文书薛万有被炮弹击中，血肉横飞。敌机又不断利用顺风向我方阵地施放毒气，使得我军官兵不断咳嗽、流鼻涕、淌眼泪。有的人胸闷、头痛、呕吐，根本不能作战，只得送下火线，大大削弱了部队作战能力。夜10时许，206团第二营营附马建功率两个连从乌拉敖包出发，经司仪堂向乌布浪口增援，由于夜黑，地形不熟，脚下发出响声，被敌人发觉，马建功在激战中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死。但这两个连已与208团守军汇合在一起，敌人也发现了208团阵地增加了兵力，便加强对阵地的攻击。夜间约11时半左右，208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但敌人仍不敢贸然前进。在后半夜的战斗中，时而紧张，时而缓和。2日黎明，战斗又紧张起来，我营伤亡较多，特别是机枪连战斗力大大减弱。马腾蛟命206团第一营向司仪堂增援，这一营人从司仪堂的正南乌拉敖包向司仪堂增援。他们在敌人的炮弹、土雾浓烟中时而卧倒，时而向前猛冲几步又卧倒，尽管牺牲较大，但终于越过七八里的开阔地面增援上来了。敌人的炮火没能阻止206团一营人向司仪堂的增援，便加强了对司仪堂阵地步炮联合进攻，激战越来越猛烈，我在掩体中站着观察战斗情况，刚往后一坐，一颗炮弹把我站的这个散兵坑掀掉了半个，推出了2尺多深的一道壕，我的下半身被沙土埋实了，枪杆被打折了。下午1时许，敌人从我们的阵地东南突破，208团的一个营遂被迫从乌布浪口子上山向蒙古地区撤退。

2日，司仪堂阵地被敌人突破后就从阵地右侧堵住了我军的退路。司仪堂阵地全部是大沙漠，地面上又被白雪覆盖着，利用自然地形、地物很难得到适合作战的掩体物，敌人又是陆空联合、步炮联合向我阵地步步迫近。我军开始撤退就失去了掌握，有的部队利用阵地中间的第二道防御壕沟往下撤，敌人很快就占领了

防御壕的东头，用机枪顺沟扫射正在壕内撤退的我军，使我军伤亡惨重。在另一条南北走向的洪水冲开的深沟里，敌人占领了壕沟的北头，用机枪顺沟扫射，我军无路可退，不少人就牺牲在这条沟里。这是司仪堂部队伤亡最惨的两个地区，比在激战中的伤亡大得多。我军在撤退途中，敌人除用地面部队追击外，敌机还在空中扫射，炮兵又延伸射程封锁我军退路。下午4时许，我从火线下来，到达乌镇，看见街上到处是敌机轰炸的弹坑，街上的一个理发店变成了一个大水坑。马腾蛟师长、马玉麟旅长都在乌镇收容部队，把我已算在可能阵亡之列了。日落时，我们又离开乌镇，向临河方向撤退。是夜8时许，马腾蛟师长挡住团长们不准再往后撤，叫部队返回去守住乌镇，配合傅作义的部队作战。但部队建制已乱，师长、团长谁也指挥不了在黑夜中乱哄哄的部队，旅长、师长只是商量了一番，又继续向临河方向撤退，日寇沿山向西运动，远远看见敌人汽车的灯光，炮声响个不停。我军从1日凌晨开始战斗，已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有的战士身上背的干粮袋里有点炒米，有的连炒米也没有，气候又十分寒冷，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路旁。有的人冻得实在受不住了，就拾柴烤火。官兵一律穿着自织的毛鞋、毛袜、毛手套，在战斗中由于出汗和沾上积雪，鞋、袜、手套都冻成了冰块，火一烤热，手脚更加疼痛了。有的人想把鞋、袜、手套脱了烤一下，谁知一脱，手、脚上的肉皮都被撕掉了。战后，马鸿宾命我在平罗县燕子墩收容伤残人员，其中光冻伤的就有700多人。

2月3日上午，我和一些人到达临河县城81军军部所在地，可是军部已经撤离了临河，这时我们的思想又紧张又失望。敌人的追击部队已在临河县城东门打起机枪，恰好我营的邹树林拉着我的两匹马正在等我们，我们一行即出西门追赶部队。离开临河，部队分成几批向磴口方向撤退。马培清率2000多人进入北沙漠，经3天3夜的艰苦行军，到达磴口西北的哈巴尔滩才第一次看见

了村庄，稍事休息再到磴口，沿公路撤退的其他部队也陆续到达磴口。日寇在占领了五原、临河以后，派出少数部队追至临河以西的黄杨木头才停止了前进。这次战役中，81军损失兵员千余人，丢失不少轻重武器。

马鸿宾在重庆得知他的部队战败的消息，立即赶到磴口，收容部队，查询情况，追问责任。召集军官讲话时，讲了其他战区的抗日情况，讲了81军的简要历史和战史，责问208团马锺团长和该团第二营长马希舜："为什么在2月1日夜间，日本鬼子进攻乌布浪口阵地时你们不在火线上？"他的态度相当严厉，看来心情很沉重，两个眼睛血红血红的，嗓子沙哑沙哑的，生气地又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打起仗来怎么能拖着尾巴跑呢？往哪里跑？能跑出中国去吗？当军人的见打仗就跑，还不如回家给婆娘抱娃娃去！我们不能丢了地方和老百姓一跑不管，我们还要打回后套去，守住地方，保护老百姓。我相信我们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是好样的，只要指挥得当，是能够和日本鬼子周旋的。"他讲话以后，又和师长、旅长、团长们商议，立即将已收容到的部队重新组织了两个团，补充了装备，几日之后即令旅长马培清率领重返后套，协同傅作义部队继续与日寇作战。

马鸿宾将在乌布浪口战役中失职的208团团长马锺、该团第二营营长马希舜带上脚镣押到黄渠桥撤职查办，将坚守司仪堂阵地努力作战的205团第一营营长马维麟提升为205团团长，该营营附王五典提升为205团第三营营长。

第四章　历史悠久的工商业

临夏回族的商业

马占奎　王廷俊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地处甘肃省中部西南角，属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界地带，东北依托兰州及中原农区，西南毗连广大青藏牧区，是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结合部”。这里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商站。从宋代起，古河州的州府（今临夏市）又成为甘肃著名的“茶马互市”之地，即东部农产品和西部畜产品的交流贸易之地。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为居住在这里的具有经商传统的回族群众提供了用武之地，促进了这一地区近现代商业贸易的繁荣。据《河州志》载，明代时，河州南北市“四方商贾居焉”。到了清末，河州南关仍是“市面最盛，富商大贾群居”。因此，为沟通中原农区和青藏牧区之间的贸易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临夏回族商业的兴起

临夏原前是古“丝绸之路”的商站和“茶马互市”之地，但由于受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经济体制束缚，这一地区近代回族商业的孕育和发展还是很缓慢的。其大致过程是：明朝后期，居住在城镇附近的部分回族群众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始经营饮食服务、商品短途贩销、小型皮货加工、牛羊屠宰、鲜货、杂

货零售等生意。清朝初期，回族农民和居民中以搞副业为生的“脚户”（行商）不断增多。“脚户”们历经远行之劳，将陕西、四川等地的茶叶及其他地区的辣椒、旱烟、调味品、纸张等贩运到临夏，扩大了商品货源，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并带动了许多小商小贩。清同治初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临夏回族人民因反抗清朝统治的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农业生产及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萧条达二三十年之久。直到清末民初，随着近代皮毛交易的兴旺和发展，临夏回族的商业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清中叶以后，在临夏回族商业开始兴起的同时，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客商也陆续来临夏经商。他们设立字号，成立庄口（当地商人称之为“客货家”、“字号家”或“山陕商”），大量运销土布、棉花、小百货、副食品等。随后，京染市布、洋布料子等新产品和舶来品也经客商之手，出现在临夏市场。这种形势，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刺激了临夏的回族商业，使原先经营杂货的回族商人也开始兼营土布，还新设了许多专营百货、布匹的零售商店；另一方面，客商的大量出现，对本钱小、信息闭塞的本地商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使许多本地商人越来越感觉到无力与客商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回族商人开始将经商的目标转向气候严寒、外商很少涉足的甘南及青海藏区。他们根据藏族的生活习俗和需要，将青禾（藏民做炒面的主要原料）、松州大茶、布匹、装饰品及宗教用品等，用牲口驮运到拉卜楞（今甘南州夏河县），赶藏民“从拉”（藏民将摆摊设点，销售商品的集市称“从拉”），向藏民销售。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等土特产品，贩销给临夏及东部地区的商人。这样，临夏回族商人凭着机动灵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寻找了新的经商基地，自发地开始了与藏区的贸易。

为了做好与藏族的生意，临夏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学习藏语，加强与藏民之间的联系，在藏族中树立威信。不久，一部分临夏

商人在拉卜楞设立商号，成为当地的坐商。当时，比较殷实有名的有："同兴盛"（经理马福林）、"同心马"（经理牟来福）、"义兴马"（经理马五子）、"世兴锡"（经理马乐天）、"德兴元"（经理马云清）、"公兴元"（经理马仁轩）、"天顺祥"（经理马曼巴）等。这些商号的经理和雇佣人员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藏语，与当地寺院的活佛、喇嘛也有交往，关系十分融洽。有些商人，还逐渐深入川北马尔康及海南果洛、玉树等藏区，认当地千百户为主人家，窜行于牧民帐房之间，以物易物，换取羊毛、皮张、牛羊、马匹、野生皮、麝香、鹿茸等。就这样，临夏回族的商业在与藏区的贸易中逐步得到发展。

二、羊毛商与皮货商的兴盛

临夏商人在藏区销售商品的同时，从藏民手中收购羊毛、皮张转销临夏，使临夏的皮毛交易逐渐活跃起来，带动了一批专营皮毛的皮毛商。从清末开始，驻天津的英、美、德等国洋行（商业性质），如"新泰兴洋行"、"聚立洋行"、"高林洋行"、"怡和洋行"，相继派买办（经纪人）来临夏设庄，销售洋货，收购羊毛。这一贸易的开展，进一步带动了临夏羊毛商的兴起。洋行经纪人来临夏后与当地羊毛商取得联系，议订羊毛价格及交货合同，委托羊毛商代理收购、承运业务。当时，承揽羊毛生意的临夏回族商号主要有"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昌新店"（经理海安轩）、"天庆魁"（经理兰尧轩）等。这些商号派人去拉卜楞等地大量收购羊毛，用牲口驮运到临夏境内的黄河岸边（今临夏县莲花乡），将收购的羊毛整装于牛皮袋内，联成大筏（每筏共装4万斤左右），雇请当地的专业筏子客（俗称水手），从黄河经兰州运至内蒙古包头，交洋行收秤结帐（后由洋行装火车运到天津）。当时，临夏的羊毛商因本钱的大小、拥有牛皮袋及其它水运设备的多少，承运羊毛的数量各有不同。如"同兴店"每年可承运40至50万斤，较少的也能承运10余万斤。时每万斤的

全程运费为1700两银子。承运商除开支拉卜楞至临夏黄河沿的运费、黄河筏子客的工资及水上沿途税务费用外，每4万斤的一个大筏每次可得利2000余两银子。羊毛商如此承运几年，收益甚丰。羊毛的大批贩运还给临夏城乡近2000户居民提供了驮运、筏运、择晒羊毛等生计，增加了收入。

民国9年前后，驻临夏的洋行经纪人陆续撤回天津。从此，临夏羊毛商开始自购自运，运至天津直接卖给洋行。其后一段时间，羊毛继续畅销，销价上涨，使羊毛商财运亨通。这一时期，临夏出现了许多新的羊毛大商，如“复兴隆号”（经理王慎菴）、“玉盛公号”（经理白洁如）、“隆顺和号”（经理毛福亭）、“步云祥号”（经理马步云）、“福顺祥号”（经理马肇业）等。这些商号各有资本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其中“同兴店”经理王圭璋（时任临夏商务会会长）成为百万富翁。到民国十五六年，羊毛生意达到最旺盛的程度。随着羊毛生意的兴盛，羊毛商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展，视野不断开阔，他们在天津出售羊毛后，遍游京、沪、汉及景德镇等城市，大量采购布匹，绸缎、百货、瓷器等商品，京、津的由火车运到包头，再雇牲口运到临夏；沪、汉等地的装火车运到潼关，再雇畜力车运来临夏销售，从而扩大了临夏市场的货源。可惜到民国17年，因马仲英事变的影响，兵荒马乱，国民军火烧临夏回族商业的中心——八坊，商业贸易随之中断。至民国20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羊毛商又如雨后春笋，很快得到恢复。

在羊毛生意兴隆之际，天津外商还从临夏订购肠衣（羊肠）。肠衣收购与羊毛收购有连贯性，主要货源还是依靠藏区。临夏“琳义成”（“同心店”分店）专营肠衣生意。为了满足外商的需要，“琳义成”派人去拉卜楞及青海同仁、贵德、湟中、西宁等地收购肠衣，并就地进行加工腌制后运至天津卖给外商，每年的转销量为五六万付左右，收益也不错。民国26年，日本帝国主

义全面侵华，天津等地沦陷，临夏商人与外商的羊毛生意及物衣生意趋于停顿。

皮货商是临夏回族商业中与羊毛商并驾齐驱的另一支商业队伍。皮货商业在时间上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数量少，只在本地及兰州、川北部分地区销售。进入民国以来，皮货的产销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临夏的皮货商业是和皮货加工联系在一起的，即先由皮货商分头去甘肃甘南、青海海南藏区及河西（武威、永昌等地）地区收购羊皮，一般以收购羔皮为主，也收少量的老羊皮和野生皮，运到临夏后出售给皮货作坊的老板（俗称皮匠），由皮匠经过浸泡发酵、清洗、裁剪、缝纫等工序，制做成各式男女皮袍，尔后再由皮货商运到各地销售。当时，藏区产的羔皮称番皮，河西产的羔皮称江北皮。番皮皮袍适销于四川、汉口、西安、北平；江北皮皮袍远销上海；野生皮及皮衣大多由外国商人购买。在皮货商业发展旺盛时，皮货商每年购进羊皮五六万张，从事加工缝制皮袍的作坊有几百户，每年加工销售皮衣达万件以上。皮货商和羊毛商一样，在销售皮货的过程中，开阔了眼界，熟悉了经营渠道，后纷纷在西安、成都、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商埠设立常驻庄码，一面销售皮货，一面采购各地新式产品及民族用品运到临夏销售，进一步沟通了临夏与各大城市、商埠的贸易渠道，丰富了临夏市场的货源，使临夏逐渐成为一个商品批发业务兴旺的“旱码头”。

三、30年代回族商业的发展

30年代前期，临夏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回族商业得到了新的发展。在羊毛商和皮货商兴盛的同时，回族经营的其它商业也变得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瓷器商业。甘肃等地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人民喜欢用“三炮台”的盖碗喝茶，讲究用“三香茶”招待客人。因此，盖碗是每个家庭的必备品。藏族的日常生活以喝奶茶、吃酥油炒面为主，他们喜欢

用大小适宜的“翻边藏碗”，尤其喜欢印有龙凤、八宝、三道鱼等彩画的。一般藏民家以存放两磊（约20个）漂亮的“藏碗”为荣耀，非有贵客或节日而不轻易使用。为了满足回族等民族对盖碗和藏族对“藏碗”的需要，临夏的许多商号专门经营瓷器，部分商号还派专人常驻瓷都——江西景德镇，向瓷器生产厂家订做各种图案的瓷碗、盖碗以及其它瓷器，随时运到临夏、甘南等地出售。制做一个“藏碗”成本约为5角，而拿到甘南、青海的藏区销售，竟能卖5元硬币。解放前，临夏有瓷器商几十家，有些还将“藏碗”用牦牛驮运到西藏拉萨销售，倍受西藏人民的欢迎。（二）茶叶交易。喝热茶有利于消化和抵御寒冷。西北少数民族大多都有喝茶的习惯，特别是食肉较多的藏族，对于茶叶的需要量是较大的。适应这一需要，临夏的茶叶贸易也很活跃。临夏茶叶商主要从陕西、四川、云南等地贩运茶叶，品种有陕茶、茯茶、春尖茶、松州大茶等。当时有名的茶叶商号有“重露祥”、“隆盛德”等。（三）珠宝经营。临夏珠宝商主要经营妇女首饰。藏族妇女喜欢戴珊瑚、琥珀、玛瑙、象牙做的项链及其他装饰品，回族妇女喜欢戴宝石耳坠、金戒指、玉翠手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珠宝商人不辞辛劳，去北平等大城市采购珠宝，有些甚至跑到东南沿海及台湾采购，经营利润相当不错。（四）开展对外贸易。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临夏一部分商人还通过各种关系，办理护照，出国经商。1939年，临夏回族工商业家马辅臣（矿务）利用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吉卜坚措回西藏的机会，带儿子及马元海、马子恺等商人去印度做生意。他带去大批国产绸缎、金银首饰、瓷器等商品销售后，从印度购买价值10万元白洋的外国商品，派马子恺运回西藏，从西藏用200头牦牛驮运到临夏销售。一时，外国的毛哔叽、呢绒、香料等货物大量出现在临夏市场。临夏的回族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与中亚、西亚各阿拉伯国家有着悠久的交往和经济往来。如临夏回族去麦加朝觐，回来时从阿拉

伯、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购买精致的工艺品及各种名优产品，带到临夏销售，为临夏回族消费者所称道。同时，一部分临夏商人还去新疆的哈密、迪化（今乌鲁木齐）经商，将新疆的葡萄干、杏干、雅尔缎（一种丝绸织品）及俄国的“灯心绒”、“贵子皮”等商品贩运到临夏，为临夏市场增添了品种。（五）由于临夏是西北“五马”的家乡，他们看到在临夏办商业有利可图时，便从二三十年代起，先后在八坊设立商号，将一部分资本投入商业，赚取利润。如青海省马麟向几家皮毛商投资入股，马步青开办“勤平茂”商号，马步芳设立“德兴海”商号，马虎臣经营“新兴号”等，这是临夏回族商业中资金雄厚、带有官僚资本性质的一部分商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大商埠及主要的铁路交通逐渐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临夏商人便从西安、成都等地购进一些布匹、杂货、茶叶等物品，勉强维持后方的迫切需要。从1940年开始，也有人去敌占区天津等地购买商品，经内蒙古后套驼运到临夏销售。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多，法币大幅度贬值，临夏回族的商业受到严重影响，从此逐渐萧条，有些甚至倒闭破产，直至解放前，仍未得以恢复。

吴忠回族的工商业

牛百川　张山林

吴忠是宁夏回族人民聚居的地方之一。元朝时，大批波斯人、中亚人和阿拉伯人迁徙这一地区，带来了阿拉伯人的传统手工艺

和善经营、喜交易的传统。明、清两代，吴忠一带的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集市贸易繁荣。

抗战初期由商业户集资创办了一个小型的手工业织布厂，名曰“立新工厂”，推举王宪之任经理，李凤藻（回族）任董事长。有资金8000元，买回几十台人力织布机，厂址在东门外刘公祠（现吴忠中学），有厂房15间，于1944年投产，生产了一段时间，因棉纱来源困难，改用当地原料羊毛织毛毯和粗毛布，很受群众欢迎。在该厂准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时，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派财政厅长赵文府到吴忠，声称“主席有令，私人不能办工厂”，强行没收全部生产工具，运到银川转交给“宁夏毛织工厂”，“立新工厂”被侵吞。商业方面，在民国初年，本地富户纷纷进城经商，有李、白、牛、马四大家之称，商号名称为“天成和”（李）、“永兴隆”（白）、“万生财”（牛）、“福顺安”（马），嗣后发展成八大家，即马季林、马五洲、马月坡、马汉武、何义江、丁生魁、李凤藻、杨春光、杨志杰。这八大家除马季林开的“谦益店”是汉族外，其余七大家都是本地的回族富户。据《吴忠县志》记载，当时吴忠有坐商商号87家，资金在万元以上的24家，千元以上的58家，超过10万元资金的有“忠义荣”、“福兴奎”、“谦益店”、“宣德堂”、“振兴永”等。超过20万元资金的有“天成和”、“义顺源”。属于批发行栈的16家。这些商号的经营方式基本上采取“四兼”，即兼股东、兼会计、兼采购、兼运输。他们苦心经营，竞相发展，商品周转灵活，资金周转期短。经营范围和项目有：绸缎、布匹、百货、山货、海味、食品、饮食、旅店、行栈、金银手饰以及糖茶、水旱烟、粗老布、小农具等。由陕、甘、包、绥，远至京、津地区进货，少数商号也从沪、穗进货。几家大的商号都有骆驼队，如“天成和”有骆驼200多峰。他们单独或联合组成将近百峰的骆驼队，驮上宁夏的土特产品由吴忠出发，昼夜兼程，经过内蒙古伊克昭盟到包

头卸货后，又将采购的货物运回吴忠。往返一次，需时月余。在当时吴忠的商业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行商、单帮、小商小贩占商业贸易额的比例很大。还有一些私商与马鸿逵的一些军政官员相勾结，收购大量的鸦片，雇用当时专搞走私的马队（马帮）带枪护送。他们或单人独马，或结群搭帮，经过草地，避开关卡，运送到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包头等地销售。这些马帮都是一些会使枪用棒的亡命之徒。在起运之前讲明命价，由雇主一次付清，如遇官家的马巡队逮捕或遇大股土匪袭击被害丧命，雇主慨不负责。如果能侥幸生还，可发一笔小财。到抗战后期，宁夏烟土大涨价，包、绥敌占区种植鸦片，这些走私商人又从包、绥收购烟土运回宁夏贩卖，大发其财。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吴忠回族工商业蓬勃发展。当时复兴巷设立了一家地方工业“民生织布工厂”，东街又设立“建新织布工厂”。两家工厂都以回族马五洲、何义江、李凤藻为主。“建新织布工厂”有厂房30余间，机器10台，资金6万元，20余名工人，经营业务主要给国营花纱布公司原料加工，生产白布、劳动布，兼营洗染。该厂当时在吴忠影响较大。1955年，以该厂为主体与几家同行厂家联合，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新合棉织工厂”。

在同一时期，先后由回族马兴洲、何凤祥等人开设了“巨源恒”、“巨兴永”棉布商店，资金均在万余元，职工4至5人。

回族开设的饭馆比较大的有贾长俊、丁从兴、周尚仁、马四等几家。经营具有民族地方风味的饭菜，尤以白水鸡、抓羊肉、炒揪面片、锅贴包子、炒糊卜等远近闻名。回族群众经营的小吃摊点遍布大街小巷，据统计当时有300多个。这些小摊点以手推肩挑为主，本钱在10元以上、100元以下，大体有杂碎、熟牛羊肉、烙饹、凉粉、粽糕、挂面、馍馍等。还有杂货、小百货、小农具等摊点。回族人民还经营旅店，以王雨廷、满振江、田遇

春等开的旅店较大。牛奶业有马南全、郭玉文等经营的小型牛奶场，有奶牛五六头。还有回族马鸿钧、金占祥等七八家经营的驼运业，共有骆驼150余蜂，以自己牵引或雇 用个把人帮工，往返于包头、伊盟、盐环、银北、阿拉善旗等地，为商号、行商驮运商品。个别经营的还有打铁、皮毛加工、麻绳等手工业。1955年国家实行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回族工商业也进行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平凉回民经济生活

平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平凉地处陇关之右，历来是西北通道上的咽喉重镇和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加之物产丰富，劳力充足，这就给当地工商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比较优越的条件。自民国初年以来，中原多事，战乱连年不止，而西北各省却相对比较稳定，对内地工商业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及中原各地工商经济实力纷纷向西南、西北转移。平凉地接陕、甘、宁，又处交通要冲，一时客商云集，过往物资川流不息。加之以河南孟县回民为主的大批难民涌入，他们为谋生计，千方百计开辟各种生产和经商渠道。因此，从20年代末到抗日战争胜利，是平凉工商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同时也是陇东回民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平凉回民经济的突出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办承转运输业。平凉回民大多都能吃苦，而且有很强的自生能力。早在清末前，当地相当一部分回民就以贩运木炭、

粮食为生。到了本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北经济的逐步开发，商品流量日趋增大，一些稍有资本的富户便办起了以承转运输为业的车马店，用毛驴、骡马为客商驮运货物，牟取承运费。后来兴起了胶轮大车，承运量急剧增加，不到10年工夫，其中几家经营有方的行店便成了承运大户。这些承运大户为后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如解放前平凉有名的回民大商号文茂祥、锡裕丰、祥发和、毓庆祥等都是先从承运业发迹的。他们拥有的胶轮大车都在十几辆至二三十辆以上。经营承运业主要靠的是信用，都要承担不少风险。从货物承运到顾主验收，一路上既要防备盗匪劫掠，又要防止水湿雨淋，保证按质、按量、按期运到，不误行情，以此取得顾主信赖。更主要的是此业接触面广，通过货物流通，可以熟悉掌握各地的货源和市场行情，对后来经营其他行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发展食品饮食业。平凉回民素有善于经营餐馆和小食品的盛名。至今，在西安、兰州、银川等西北各大城市中，仍有很多出名的回民厨师都是从平凉出去的。在20年代初，与承运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要算是回民饮食业了。到30年代以后，密布于平凉东关和西兰公路两侧的清真餐馆已相当兴盛，总数不下30余家，成为回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以者清云的清和馆、杨春发的春华楼、李秀成的义盛馆最为驰名，号称平凉三大清真馆子。过去，凡是跑过西兰路的客商无不知其名。散布在平凉各条大街小巷甚至挨次摆摊相连数百米的平凉回民小吃，也是颇有名气的。如腊羊肉、五香咸牛肉、凉粉、酿皮、羊油柿子饼、烧馍、肉馅饼、糖肉包子、牛羊油茶等都是有名的地方风味食品，百多年来经久不衰。

三、兴盛一时的钱行。所谓钱行，又叫钱庄，或称银号，是20年代以前的金融组织，与现在的银行差不多，但一般都是独家生意，而且资金都比后来的银行小得多。其经营范围主要是为大

小商户或过往客商提供货币的储存、兑换、流通和信贷，从中赚取高额利息。有的钱行还小范围地发行一种“油布票子”，如同现在的购货卷。持此票者，可以按票面银额在规定地区内买卖货物，也可随时向发行钱行兑换银两、银元或通行纸币。在民国初年，经营银行的是吴九如办的天泰和商号，后来又有兰福贞办的源顺成商号，都是专做金融生意的，虽然时间不长，前后不到10年，却为地方工商业资金的积累提供了方便。

四、广开财路，拾遗补缺，不断扩大经营范围，逐步形成地方民族工商体系。30年代中期，在陇东地区，以平凉东关文茂祥商号为代表的回民工商业户抓住了有利时机和市场行情，积极扩大经营范围，由平凉逐步向内地及沿海各大商埠发展，成为多行业综合商业体系。

文茂祥商号经理白受三，平凉杜家沟人，兄弟6人，除老二当了阿訇、老五早亡外，其余4人均极善经营工商。早年以驮骡贩运为业，后与回民富商杨茂林合股经营京广杂货，立号文茂祥。生意扩大后，白家自立文盛祥商号（习惯上仍称文茂祥），独揽陇东京广洋货生意。所谓京广洋货，系指京津沪广等沿海各大城市生产的时兴商品和海外进口的洋货，如新式鞋帽、时兴服装、毛呢绸缎、妇女头饰、各种化装品和妇女嫁妆用品等。抗战初期，文茂祥商号已具相当大的规模，资金约达200余万银元，经营项目由京广洋货发展到裘皮、羊毛、绸缎、布匹、长途转运等多种行业。新开设的裕生祥皮毛商行控制了陇东地区大部分皮毛收购和加工业务，经营范围已由本乡本土扩展到西北各省及武汉、天津、上海等外埠各大城市。日军侵占京津时，仅文茂祥的棉布就包了一趟专列，24节车皮一次运到西安，其生意之大可见一斑。向外地商埠扩展的渠道一经沟通，平凉的地方工商业便更加活跃起来。这一时期，在平凉的回民工商业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行业大户，在陇东地区占据着控制地位。

（1）盐业。这是抗战开始后新兴起来的行业。由于沿海地区沦陷，内地食盐供应紧张，全靠西北调运。平凉北沙石滩、柳树巷一带以宁夏同心回民为首，办起一批规模不小的盐店。主要有：周克强的德心店、杨仁俊的俊泰裕、黄凤岐的福顺店都是经营食盐转运的，附带还经销土碱、皮硝、盆灰。彼时西兰路上终日驼铃声声不断，主要是从宁夏中卫往西南内地转运食盐，这些盐店都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2）茶业。平凉的茶业，历来多为回民经营。30年代后期，锁兰斋的清顺茶店基本控制了当地大部分茶业的经营权，总资金达50万两白银以上。他们主要经营的是湖南的砖茶，将原料成批地运到陕西泾阳县进行加工，然后运至平凉，再转发到甘、宁、青、新各地。抗战以后，由李云宾办的利中商号，成为茶业中的后起大户，直至解放初期仍兴盛不衰。

（3）绸缎业。经营此业最早的是李祥甫开的福顺贵锦货铺，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有马辑五家的祥发和商号。

（4）药材业。平凉的药材业原来多为汉民经营，3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以李志清的正兴隆商号为代表的回民药材店，并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经营范围主要是大批收购陇南、华亭、泾源等地药材，经简单加工打包后发往中原和南方各地。平凉虽不盛产药材，但却成了药材的重要集散地。

（5）酱园。此业主要包括食醋、酱油、酱菜和各种糕点的加工和经销。平凉最早的回民酱园是马怀德的清顺成，后来又兴起了米瑞卿的平和公。他们生产的米醋、糕点和各种酱制品在陇东一带享有很高的声誉。

五、皮毛业的迅速发展。平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泡制加工裘皮又是当地有名的传统工艺，多少年来一直流传着“宁夏皮子平凉熟”的说法。早在民国初年，原商会会长吴九如开设的锡裕丰商号就以收购、加工皮毛而兴盛于市，号

称平凉的东皮行。后来又有马连山开设的祥发荣商行，人称西皮行，还有魏尧清、马怀德合股经营的长盛店，人称北皮行。30年代以后，又陆续出现了李瑞成的瑞盛奎商号、杨得义的毓庆祥商行，还有抗战时期河南回民丁宏义的宏兴皮行、丁祥甫的祥记皮行等，都是比较出名的大皮行。但规模最大的要数白受三的文茂祥商号，其营业额约占平凉皮毛业的60％以上。40年代以后，为了经营方便，文茂祥又另立了裕生祥商号，成为西北最大的皮毛商行，雇用员工约400人以上，投入资金不下200万元。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大批难民涌入平凉，其中以河南孟县桑坡回民最多，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揉制、加工裘皮的技艺，使平凉回民经营的皮毛业达到空前鼎盛时期，出现了大小皮行30多户，皮毛作坊100多处。这些皮毛商行有的自设作坊，连收购带加工；有的将收购的生皮交作坊代为加工，所产裘皮以二毛筒子和黑子羔皮衣最为驰名。其生皮来源：二毛皮、老羊皮多取自宁夏、内蒙；黑子羔皮多取自甘南、青海。加工好的裘皮除当地少量销售外，绝大部分都打包发运到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抗战时，则只能发往西安、兰州及西南各省，但其兴盛程度始终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各皮毛商行大多还兼营羊毛、毛线的收购贩运生意。

总之，解放前平凉回民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的重重挤压下，能够有所发展，也是很不容易的。

回民与古城驼运

包 山 王 晨

清末光绪年间至民国22年，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和货运工具，为繁荣新疆古城经济，沟通新疆和关内、外蒙之间的贸易往来起了重要作用。而回民在古城驼运业中的业绩却鲜为人知。

古城回民从事驼运业的人，大部分来自山西，还有来自宁夏、甘肃的。最为知名的驼运户有：陆二宝、陆廷宣、陆廷荣、陆廷举。陆家养驼700多峰；狄玉才、狄玉胜、狄玉金弟兄3人养驼600多峰；马义养驼600多峰；马振威、马振云、马振鸿养驼200多峰；王河、王同弟兄俩同杨五旦合养驼350多峰；马顺、马恒（绰号马铲子）养驼550多峰；曹大个与其子曹万金、曹万银、曹万库养驼150多峰；王长汉、王生贵养驼400多峰；孙文茂、孙文奎、孙文喜养驼150多峰。除了上述养驼户外，小帮还有马琪、杨生瑞、马生福、包山等。在数十年间，古城回族中有20余家驼运业主，他们养的骆驼约有五六千峰左右。

当时古城的驼运业分为帮。一个帮有三四顶房子，每顶房子有骆驼100峰左右。驼户大都是掌柜雇用来的。

当时在驼户中流传着《驼户日月难》的一首歌谣，其中唱道：

驼户的日月难，自做吃来自做穿。
挨饿受冻鞋跑烂，还得自己连。
头发千条线，自己梳来自己辫。
困乏身子懒，毛盖子锈成毡。

好不过春月天，好不过春月天。
遍地的青绿惹人烦。
抬头见哀雁，两眼泪不干。
不提家眷还倒好，提起倒把心搅乱。
好不过夏月天，好不过夏月天。
太阳出来照西山。
织不完的毛口袋，补不够的骆驼鞍。
渴的咱头发昏，晒的那石头烂。
骆驼只是把毛脱，咱把身上皮脱干。
好不过秋月天，好不过秋月天。
庄稼熟了人喜欢。
只怕骆驼又起场，一天两搬鞍。
跟上掌柜连夜转，又不知道走哪边？
站大了半夜歇，站小黑了水。
忍饥挨饿得了病，想家千里路遥远。
好不过冬月天，好不过冬月天。
天气寒冷雪满滩。
冻的咱们肉皮绽，跑得咱们两腿酸。
房子搭起来，动手快和面。
肚子哄饱睡，早歇好安然。
五更起来抓骆驼，喊打火烧又是喊。
驼户的日月难，一年四季不得闲。
哎哟哟，驼户的日月难，一年四季不得闲。

这首凄惋催人泪下的歌谣，道出了驼户生活的艰难。当然驼户干的活又苦又重，他们的待遇也还不坏，驼户们还是愿意干下去。因为这些驼户在为东家运货的同时，可以靠用自己挣来的几峰骆驼驮上自己采办的货物，夹在整个驼队中往返买卖。这样一来，他们来往运货获利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驼户们的积

累达到一定程度，如达到有几连子骆驼时，自己就可雇驼户拉骆驼，离开原来的东家另外干了。古城的运货驼队主要来往于晋、陕、甘、津、迪化、外蒙等地。我的驼队专去外蒙的前后营，每年可以跑六七趟。

往来于商道上的驼队，长年贩运的货物有布匹、皮毛、干货、药材、烟酒、黑白糖，有时也驮运军粮、军草。每峰骆驼可驮约320至350斤货物。如果驼运的是货主的食物，驼户在途中可以食用。驼队到达目的地，收货人清点时，食物经常是只长不短。可见当时货主发货时就把驼户消耗部分留出来，打的折扣是很足的。有时驼队也从外蒙转道苏联用新疆的皮毛换回苏联的布匹、石油、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小物件熨斗、煤油灯、铁锅之类的物品。为了躲避当局的监视，驼队走的是偏道，多沿沙漠边缘而行。有时要过关卡，便推到晚上过关，在几里路外就摘掉了驼铃。骆驼此时也显得通人性，走得极快，蹄子放得很轻，连喘气声都小了。通常这些过关的驼队不易觉察，但也有被关卡拦住而遭厄运的。如王长汉400多峰骆驼驮着货途经甘肃被截，货被没收，本人连惊带吓，返回绥远后不久便死去。还有的驼户被当局扣压，遭受重刑而失去了性命的。如孙文茂可称为当时古城的大手笔，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和文章，不知运了啥犯禁货物，被盛世才抓去拷打致死。

古城驼运业在南来北往，东返西运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遭过几次浩劫，其中回民运业的损失也极为惨重。第一次是1930年（民国19年）马仲英率兵入疆，百姓为躲避战乱而纷纷逃难。在逃难过程中，难民受一小部分人的挑唆，有人便趁火打劫，对驼队进行拦劫和哄抢。第二次是1944年（民国33年），由于匪患猖獗，驼队在行进途中每每遭到突然袭击。有的连人带驼一起抢去，落得人财两空；有的骆驼被抢，如马生福等3人，骆驼被抢后，连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扣了几天，

给了两峰烂背梁的骆驼和几件破衣服放了回来。再如我被土匪抢后，差点丢了性命。

遭了这两场浩劫后，古城驼运业日趋衰落。一部分回民骆驼队被抢后，变卖家产回了家乡。有一部分人苦度光阴，仍以短途驼运为业，直至全国解放。

甘肃的皮筏运输业

王信臣　苏耀江

皮筏，过去是甘肃黄河水道运输方面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西北来说，也是别具特色的一种运输工具。我从事此项运输业务达30多年，对解放前20多年间甘肃皮筏运输业的情况，略知梗概，兹就亲身经历，从以下4个方面回忆记述，以供参考。如有不够详尽或错误之处，请予批评订正。

一、皮筏的来历、种类和演变

皮筏的来历，我没作过考证，不知其详。据过去老筏户们常谈，甘肃的皮筏是从清光绪中叶就开始行驶的，它是从过着游牧生活的藏族人民用皮筏袋装满衣物，利用皮袋漂浮不沉的特点，人抱着皮袋涉水渡河的习惯演变而来的，并且是由小筏而到大筏，由驶行短途而到长途逐渐发展起来的。

皮筏有两种，即牛皮筏和羊皮筏。这两种皮筏的组成过程主要是这样的：牛皮筏是用牛皮胎编组而成，其操作程序是先将皮

胎在水中泡软，如遇筏上载运羊毛，即在皮胎里装满羊毛，扎紧口子，再用大木椽6根、小木椽40根作骨杆，然后将皮胎串连起来；如筏上不运羊毛时，皮胎内即装麦草，又称草筏子。最大的牛皮筏需用牛皮胎120个，筏身长25米，宽7米多，筏上装设6把桨，一般载重量是20吨，也有达30吨的。羊皮筏的操作程序大致和牛皮筏相同，而不同之处，就是皮胎内不装东西，将羊皮胎泡软以后，平均每只灌入清油4两和盐水少许，然后用人工吹胀扎口，同样用大小木椽作骨杆，将皮胎串连而成。最大的羊皮筏需用皮胎600个，筏上也安装6把桨，筏身长22米，宽7米多，载重量和牛皮筏差不多。这两种筏都是担任长途运输，如由西宁到兰州，再由兰州经宁夏到包头等处。另外还有一种小羊皮筏是用10多个羊皮胎组成的，由一个人驾驶，其用途是担任兰州附近河道上的短途运输，如由新城、河口一带往兰州市区运送瓜果蔬菜以及渡送黄河南北两岸的来往行人，在沿河各县的各渡口，都有这种小皮筏转渡行人。

在1928年前后，兰州跑长途的筏户有50多家，绝大多数是回民，我当时是仅有的汉人。那时由于羊皮筏航驶技术不够精良，一般群众总认为牛皮筏稳妥，羊皮筏险多，因而商人运货，大多由牛皮筏承揽。当时虽有10多家羊皮筏，而业务是不发达的。到1930年以后，靖远、条城（即榆中的青城）的筏户（均是汉族）逐渐来兰，参加了兰州、包头间的皮筏运输，从此形成了兰州、靖远、条城筏户的三帮。靖远帮有10余户，共有载重15吨的羊皮筏十四五只；条城帮有十四五户，共有载重30吨的羊皮筏七八只；兰州帮最大，共30多户，有载重30吨的皮筏30多只（大多数是羊皮筏）。到1932年以后，兰州、包头间的水上航运全由羊皮筏担任了。这样演变的主要原因是：（1）羊皮筏的驾驶技术有了很大改进，途中事故大大减少，在群众中建立了信誉；（2）羊皮筏速度快，在正常情况下，由兰州到包头最快十一二天就可到

达，而牛皮筏最快也得21天；（3）羊皮筏吃水浅，驾驶灵便，遇到峡谷或礁、滩等险地时容易渡过；（4）羊皮筏编组快，从泡皮胎到组成最多需时一星期；牛皮筏最快也得20多天。在成本方面，差别也大，如一个大羊皮筏成本为600多现洋，而牛皮筏就需要1500多现洋。羊皮筏因具有这几种优点，因而牛皮筏很快就被淘汰了。

甘肃由水上出省的物产，主要有羊毛、水烟和药材。这些土特产过去多由皮筏运输到包头后，再经火车转运到津、沪等地。附带着也运送旅客和其它如猪鬃、肠衣等土特产，但为数不多。这些土特产，都是由筏户向毛商和烟商（烟坊）或过载行包运的。由兰州装货时先领一半运费，到包头或陕坝指定的行栈交货后即结清运费。如途中发生事故货物受损时，筏户不仅领不到运费，还要受到很大拖累。

抗日战争开始后，皮筏运输的重点又转在军用品方面。1940年冬，甘肃省政府成立的驿运管理处，将兰州所有皮筏编为该处“水上运输队”，曾派马得福担任队长，我负责筏上业务。当时筏户只向驿运站交纳管理费，所有运输的军用品，由驿运处向八战区运输处承揽，主要是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和绥远陕坝一带的傅作义部运送枪弹、汽油等。有时还运送壮丁，但次数不多。军用品在每次航运时，都由八战区运输处派兵押送。到抗战胜利以后，军用品停止运送，又恢复了由筏户自包自运的办法，这时承揽的货物种类较前繁多，而兰州的水烟和药材仍为大宗。

二、兰包间的航运过程和所经险地

从兰州到包头的航程，长达2400多公里，经过甘肃的榆中、靖远、景泰，宁夏的中卫、中宁、贺兰、陶乐、永宁、平罗、磴口以及绥远的临河、五原等县境。每年的航行期为3至10月，其中以5月至7月3个月速度最快，平均每天可行200多华里，其他各

月因水位低，平均每天可行120华里。由兰州到宁夏沿途停船6次，由宁夏到陕坝或包头停船七八次。每遇狂风暴雨筏即停驶。在正常情况下，每个羊皮筏每年可航运两次：第一次在每年3月间开始起运，返回来就到五六月了；第二次在7月间起航，返回来就到深冬腊月了。这样需费时间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筏子到达目的地后，经过拆卸，必须等待皮胎晒干，然后雇用骆驼驮运回兰。有时雇用木船将皮胎逆水拉运到石嘴山或中卫，再雇脚驮回兰州，因而中间经过的时间很长。也有一年赶运3次的，这必须在回程时用汽车送回皮胎，这样成本很合算，但汽车是不易找到的。

过去一般人总认为乘皮筏是很危险的。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危险确实有。因此，一定要有经验丰富、驾驶技术精良的水手多人护送，才能有把握地安全达到目的地。如一个6把桨的皮筏，一定要聘用长途水手6人，每桨配备一人，同时根据黄河水势的大小，在开驶中聘用临时转峡水手6至10人。转峡水手，是把筏由兰州护送出了大峡到西峡口（距兰州120华里），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当天可以返回兰州。不论长途或短途水手，绝大多数是回民，他们都是几代祖传的善测风云、有与惊涛骇浪作斗争经验的专搞此项业务的工人。

在兰包间河道中，由于要经过多处水势汹涌、山崖峻峭的山谷，因而人们提起黄河中的险地，常有“谈虎色变”之感。其中最有名的是：皮筏由兰州航行20华里即入小峡，行60里转进大峡。大峡是筏运过程中第一道危险关，峡内有“煮人锅”、“大照壁”、“月亮石”等处。因山峡过窄，水流湍急，如掌桨的水手技术不高，皮筏不是被“煮人锅”的大漩涡漩沉，就是被“大照壁”的悬崖或“月亮石”礁石碰翻。出了大峡，经过蒋家湾的“野虎桥”、“大浪”两险地后，即到靖远县城。过了靖远的黄沙湾即入红山峡，这个峡谷中的险地有“洋人摆手”（又名歪脖

子滩）①和“一窝猪”两处。再过景泰县境又入黑山峡，峡内的“五雷漩”、“老俩口”、“三弟兄”、“七子妹”等处也是有名的险地。出了黑山峡经过“龙椅子”险地，即到宁夏中卫的炭窑子。由于这里的河流多而水位浅，筏行到此，最怕搁浅。过此，由宁夏的青铜峡到石嘴山峡，虽还有“歪脖子滩”、“三道坎”几处险地，但情况都不十分严重。过了蹬口进入后套（今属内蒙古）以后，河面更宽，水流渐慢，我们常把两三个皮筏连在一起航行，一直可以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可是在遇到黄河水位过低时，由于水浅泥沙大，也常有搁浅的危险。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造成的困难和损失很大，需要雇木船将货物转下来，皮筏拆散另行组连，往往一月内还不能复航。

在上述危险地段，事故若发生在峡谷中，小则筏的一角被撞折，载运的货物即遭受部分的损失；大则筏被全部碰散，货物和旅客即被倾翻水中，顺流而下，往往捞救也有困难。过去的反动政府，只是收捐收税，并利用皮筏为他们支差服役，至于说协助筏业工人改良设备、减少事故方面，从来都不过问，一切都听筏业工人与自然作斗争。如因出了事故而使载运的公物受到损失时，筏户还得连带受害。记得在1939年有靖远筏户魏玉珠的皮筏，因装运军用品行至靖远黄沙湾附近出了碰筏事故，部分东西沉没。当时的八战区运输处不但严惩押运员，并向筏户追查责任，几使魏姓倾家荡产，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三、皮筏业的组织和所遭受的层层剥削

1926年前后，兰州筏户尚无所谓工会一类的组织。那时由皋兰县政府派有一个行头，负总任务。当时的行头是马得福（回族），筏户都受行头的领导。到1936年以后，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派人组织了所谓皮筏运输工会，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所谓“理事长”。从名义上看，这个工会好象是筏业工人自己的组织，实

际上是国民党利用的工具，一切活动都在党部的操纵下进行。到1941年冬，这个工会又拨归兰州市政府的社会局管辖，市党部也派人“指导”。这时又将名称改为兰州市皮筏运输业同业公会，限定筏户必须入会成为会员后才能经营皮筏业务。会员每年向公会交纳会费，并有承担各项捐款（如慰劳捐、救济捐等）的义务，所谓权利可说一点没有。

至于筏户们在旧社会很长时间内所受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层层剥削，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最主要的有以下各项：

（1）**筏捐**：筏捐在甘、宁、绥各省都有。甘肃在皮筏行头负责时期（1926年前后），由皋兰县政府指定向筏户收筏捐，总数每年达现洋800多元，召商承包，向筏户分摊。而分摊时的浮收，常常是数倍于此。一直到1942年皋兰县政府迁出市区后筏捐才停止征收。宁夏在未建省前的镇守使时代，就在青铜峡设有筏捐局，专司其事。到1929年分省后，筏捐数额提高，每个过境皮筏到中卫后，即征捐洋七八十元，一直收到解放前夕。绥远的筏捐，是由包头的航务段征收的，数额和宁夏差不多，也是多年来的例捐。

（2）**桨捐**：是由一种陋规形成的。兰州筏户，最初全是回民，搞的多是西宁、兰州间的运输。当时鉴于回民教育不大发达，筏户们自愿在每个皮筏由西宁到兰州后，捐出木桨两只及木杆多根，交由回民学校集存变卖，以补助教育经费。以后逐渐相沿成一种陋规，名称定为桨捐，凡遇过境筏子一律收捐。据说在张广建统治甘肃时期，又把这种桨捐拨归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经收，成为兰州回民教育经费来源之一，也是到解放以后才取消。

（3）**公房捐**：这是前清末年兰州有浮桥②时设立的一种苛捐。由于皮筏、木筏从上游经过浮桥时，一定要先向管理浮桥的公房（设在桥头）交了捐，然后才能拉开闸门，放行通过。因而筏户把这种捐名之为“公房捐”。可是到铁桥修成，浮桥拆除后

的很长时间内，公房捐照旧征收。后经筏户们的多次反对斗争，到市政府成立后才被取消。

（4）**税卡的各种苛索**：本来皮筏上载运的货物如羊毛、水烟、药材等应纳的所谓法定税款，照例在起运前由货商完纳，沿途税卡只是查验税票盖章放行而已。可是这个查验权，就给予税卡人员以贪污受贿的大好机会。特别是在宁夏的中卫、仁存渡、石嘴山、磴口等处，税卡林立，他们以查验为名，进行勒索，采取的方式是故意刁难。如对于装载羊毛或水烟的皮筏，即以"货物数量有问题"为词，声言要重行过磅，不然不予放行；又如禁烟善后局的查验人员，以"检查皮胎内是否藏运大烟"为词，要卸下皮胎抽查。筏户明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都是想借端勒索。为了免受拖累，于是只有托人分别讲情送贿以后，才可免除留难。到达包头后，绥远塞北关税卡人员借验票所进行的勒索，与宁夏毫无二致。

（5）**宁夏的"申请"关**：在抗战开始不久，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异想天开地规定了一种过境皮筏办理申请查验的手续。其办法是：除军用品外，其它载运任何货物的皮筏，到宁夏仁存渡后要在检验机关登记，向省政府呈递申请书，听候检查。最特别的是这种申请送上去后，规定由马鸿逵和他的财政厅长赵文府亲自审批盖了私章（任何人不能代盖），然后才允许放行。如有不办申请手续者，被查获后，皮筏及载运货物全部没收充公，人还要办罪。如有一次靖远筏户高雨亭的筏子因未办申请手续被查出后，除皮筏与货物被没收外，并将高雨亭与货主赵连才抓去戴上高帽子，在宁夏沿黄河各县游街示众达一个多月才算了事。

这种申请手续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要马鸿逵、赵文府亲盖私章，两人中任何一人不在，申请就批不下来。如1941年我们有一批皮筏到宁夏后，由于马鸿逵出巡外县，我们就在仁存渡停船等候了一个多月，一直到马鸿逵返回盖了章才放行。就是在正常

情况下，申请的审批也很费时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办法是分别找窍门，进行活动。如兰州帮的筏户找的是宁夏民政厅长海涛（兰州人）的路子，给海涛的公馆送去大批礼品后，再把申请送去，海涛直接找马鸿逵等审批，很快即可办成；靖远帮的筏户，找的是警察局长陈保泰（靖远人）的门路；我通过别人介绍，找的是老太太（马鸿逵生身母亲）的门路。每次筏到仁存渡停舶后，即托人把从兰州带去的大批礼品连同申请书一并送到老太太处，很快即可批准送下来。马鸿逵的“申请”关，我们常是这样闯过的。

四、一度活跃在嘉陵江下游的甘肃皮筏

1941年夏，国民党政府的油矿局总经理孙越琦来到兰州，对甘肃的皮筏运输很感兴趣，他通过兰州市政府找我去谈利用甘肃皮筏，试办嘉陵江下游从广元到重庆长达1400多华里的运输问题。我当时答应试办，孙遂决定由兰州买了羊皮胎40个，由我负责，带了同行的高凤吉、马得全二人，于同年秋前往广元，编组了一个小型皮筏，载了5大筒汽油（约1181多加仑）实行试航。当时，当地的群众对皮筏在江上航行极不相信，曾唱出讽刺的歌谣说：“石油局瞎胡干，羊皮筏当兵舰”。但试航的结果十分良好，于是我们又返回兰州，由油矿局购买了羊皮胎2000多个，聘用了筏业工人20多人，二次回到广元，由油矿局成立了“皮筏航运队”，派我担任了队长，筹备正式航运。我们用2000多个皮胎编成载重6吨的皮筏5只，专门负责运送汽油。

1942年夏，航运队正式开航，由广元到重庆需时两个星期（木船需一月多时间）。当5只皮筏第一次驶抵重庆时，曾轰动了这个山城，参观的群众如潮水般地涌来。油矿局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皮筏航运队大会”，并摄制电影，一时中外记者和外宾前来登筏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有些外国记者在参观后，还要求带

走羊皮胎，准备到外国去展览。油矿局为了满足群众要求，让我们把皮筏在化龙桥码头停留了两个星期，供群众参观。接着我们开始了汽油运输工作，一时甘肃皮筏在嘉陵江下游的活跃情况，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重庆各报都用显著篇幅连续登载了皮筏运输的新闻，当时我们也感到十分光荣。

皮筏在嘉陵江航行的优点是：江面平而无危险；由于江水冬季不结冰，常年可航行；根据成本核算，皮筏运输汽油较汽车运输能省运费80％。因此我们搞了两年多时间，对抗战后期的汽油运输起了一点作用。可是到胜利炮响，由于情况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对皮筏不重视了，简直到无人管的境地。我们只好返回兰州另作打算了。

后　记

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大力帮助下，甘肃的皮筏运输业曾一度得到发展，如在天兰铁路通车后，所有运往宁夏石嘴山等处厂矿的大型机器设备，都是由火车运到兰州后再用皮筏转运的。1952年，又经省交通厅介绍，我们部分筏户带着皮胎去陕西。在陕西交通厅的领导下，担任从汉中往安康运盐，再由安康装载桐油、猪鬃、大麻等土特产顺汉水往汉口航运的任务，经过4年多时间，后因气候过热，皮胎腐坏较多，遂结束返回。1959年，我们又组织了部分皮筏去临洮一年多时间，担任了利用洮河由黑店峡往临洮（150多华里）运炭的任务。随着铁路交通的迅速发展，自兰宁、包兰铁路通车后，在这条线上的水道运输，就被火车代替了，因而皮筏的长途运输即告停顿，筏户们都转业了。但根据我的经验，若利用皮筏的运输特点，在国内一些江河水道上，继续组织皮筏担任运输任务，一定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在本省的黄河水道上，从靖远到宁夏一带的皮筏运输，很有恢复的必要，因为靖远的农产品如瓜果蔬菜之类，因无皮筏运输，销路大成问

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注　释：

①据说在民国初年，有外国传教士一人乘筏东下，筏入红山峡后，由于水势凶猛，该传教士心生畏惧，突乘机一跃而跳到靠峡边的一块大石上。不料此处水流过急，筏不能停船，因此，每过一筏即摆手求救，终因无法营救而被饿死。从此人们把此地叫作“洋人摆手”。

②浮桥是在兰州黄河铁桥未修建前很长期间（据皋兰县志记载是明朝初期创设），用木船24只，浮于河面，驾以横梁，上铺平板，两岸各立两根铁柱，又以120丈长的铁链条和绳索等，将船串连起来。船随水位而涨落，人马车辆通行其上，故称浮桥。

张家川的皮毛业

麻　均　马辅臣

据说，张家川皮毛业的兴起远自明清时代。但据我们所知，自清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就有皮毛市场。光绪十四年（1888年），皮毛市场日渐活跃，羊皮均以户制，作光面柴皮袄，杂皮由当地皮匠制作各种皮革，就地销售。延至民国初年，皮毛业呈现上升的局势，经营者越来越多，经营地域日趋扩大，四川、重庆客商亦来张家川贩皮。当时在张家川首先出现的本地皮店就有东街苏尚达的万盛皮店和西街李德仓的德盛皮店。民国11年（1922年），德国德斯股洋行进入张家川扎庄。民国17年到23年（1928年至1934年），德国美得时洋行和英国聚生公洋行先后进

驻张家川开设皮店。本地人先后开设的著名皮店有：马锡武的天锡店、马桓武的桓盛店、马保元的大成店、马少凡的凡盛店、百云高的德新店、马振河的福来店，还有同盛店、德统店、万元店、兴盛永店、俱兴堂店等18家。这些皮店的东家都是张家川、龙山两镇的大财主。他们和官府勾结，领取押贴（即领证），取得合法权利，和外商互相争夺，坐食渔利。随着皮店一本万利的吸引和市场的日渐繁荣，外省客商来张家川经营皮毛业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河北省顺德府的顺德客、天津客、张家口客，山西省的潞安客，东北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客商，山东济南客，河南开封、洛阳、孟县客，湖北汉口、沙市、宜昌客，陕西泾阳、三原客，青海西宁客，宁夏银川、吴忠客，甘肃临夏、甘州、凉州、平凉、海原、固原、庆阳、临洮、岷县、西和、礼县、盐官等地的商客达100多家。这些商客有的是常年扎庄，有些是随购随运，来回经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掌握信息，看风使舵，利重多收，利微少收，一般通过皮店议价，皮店只收佣金，全由他们左右着市场的盛衰。受益匪浅者还是广大的贩皮户，他们中间大多数手头没钱，向皮店拉账，种罢庄稼就去平凉，庆阳，西峰一带买皮，少量的自己背回，稍多的雇脚户驮运，回来拿到皮店出售，哪怕是微利，皮一卖出去就能给人家还账。这些贩皮户大钱赚不了，小钱不断头。

张家川皮毛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民国21年（1932年）之前，张家川交通阻塞，皮运主要靠脚户的驮运和人力背挑（叫皮背夹客），少量通过邮电途经马鹿向东南各地寄出。输出者多系外商，他们手里拿着由他们国家领到的所谓“练单”，在我们国内可以不交厘金，脚户运输时在一帮驮队的头一个骡马驮子上，插着外国旗子，享有特权，中国人不敢过问。（二）民国23年（1934年）以后，陕甘公路（西兰路）修通，宝天线途经张家川，这时皮运由背、挑、驮等人力运输逐步转向马车、

汽车运输。随着运输业的发展，皮毛业也日渐兴旺。当时经营者均系各大皮店，凡售皮者均要在皮店议价，外商依价收购，皮店只收佣金。凡是背夹客从外地贩来的皮毛就能随行就市，随到随销。（三）民国28年至38年（1939年至1949年），这10年是皮毛业发展的全盛时期，无论品种、生熟皮加工等方面都呈现繁荣景象。经营的各类品种以牛皮为主，羊皮次之，少量狐皮以及骡、马、驴、狗、兔等杂皮。除一部分野生皮运销外地外，其它杂皮由本地皮匠加工成各种皮革鞋帽等，就地销售。生皮一般由外商经营，多系牛羊皮。尤其四川商客善于经营羊皮，他们把生皮运到重庆加工成品，然后运往外地出售。后来很多的人从外省外县买上大宗羊皮，特别是二毛、羔皮、猾子（山羊、羔皮）、云板（未到生育期流产的羔皮、毛短皮小）、板子（没有绒根的山羊皮）运到张家川卖。云板一出肚就很吃香，板面光滑色亮，毛眼细软，又轻又俊，每张售价8元（银元），是当时的抢手生意。客商在天津驻收，通过水陆两运全部销往英、法等国。河北、山西来张家川的客商达100多家，全部用银元交易。此时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每集不少于千余人，上市各种皮张每集可达2000多张。不仅销往外地，本地的作坊也相继出现（羊皮加工早在民国8、9年就有泡皮户），集中在瓦泉、崔湾一带以及街内，据传有30多家，产品远销武昌、天津、北平、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汉口、宝鸡等地，颇受顾客的好评。（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东面铁路中断，张家川皮毛全部销往重庆、成都两地，出口的洋庄被迫关门，外商大都回国，市场一度呈现萧条，有些需要出口的皮货经宁夏绕道天津运出。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于民国35年（1946年）皮毛业复苏，市场蒸蒸日上，客商相继来张家川，直至解放后，皮毛业的发展一直是兴旺发展的趋势。自1952年皮毛实行统购后，个体户搞加工者为数不多，自由买卖停止，市场萧条。迨三中全会后，市场重新开放，省市党政领导对张家川回汉人民

更为关怀，贷款15万元，扶持23个个体户重新恢复了民族地区历史悠久的皮毛业。1983年由县政协委员马辅臣申请办起了张家川县第一家私人联营皮店，生意兴隆。在他的影响下，龙山镇街上个体或联营的皮店就有40多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作坊加工业在全县范围内兴起。据统计，全县有3900多户农民从事皮毛业加工。张家川、龙山两镇的皮店一举发展为70多家，有5000左右的人搞皮毛运销，年成交各种皮张达250万张。皮毛业生产已形成由个体到联营，由粗加工到精加工的发展势头。由于皮毛业市场的恢复和发展，繁荣了城乡经济，促进了百业兴旺，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可喜变化。商贾往来，提高了购买力，商业、饮食服务各业互相协调，方便顾客，搞活流通。特别是广大农民得到了实惠，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昌吉的六保馆子

杨荣湖　焦万和

回族的烹饪历史悠久，独具风格，在我国绚丽多采的饮食文化中是一朵有民族特色的奇葩。

解放前，新疆昌吉县的“六保清真饭馆”，以经营回族风味小吃著称。饭菜讲究色、香、味，做功精细，有着独特的回族风味。

远近闻名的“六保馆子”

六保清真饭馆的创业者原姓马，名文玉。他喜爱秦腔艺术，结识了迪化秦腔汉族演员刘娃子，同刘拜为把兄弟，结成生死之

交，来往密切，人们给马文玉起外号叫刘保。于是，便把他开的清真饭馆称作“六保的馆子”。

马文玉原系宁夏人，生于1881年，12岁时跟随父亲闯新疆，来到昌吉落户。当时他给一家回族大户下苦，因为肯出力干活，为人忠诚，被东家看中，招他当了女婿。他的老丈人经营清真饭馆，以饮食服务业为生。1901年，马文玉进了他丈人的饭馆，学习烹饪技术，不久出师。民国初年，他自立为生，开了清真饭馆。饭馆在王清德的楼店饭馆北边，原公私合营商店处。这就是昌吉历史上著名的六保馆子。

六保馆子有9间门面，开业后主要经营回族风味小吃 。每天清晨，太阳刚张开笑脸，他就开门营业，馆子的火烧、油糕、薄皮包子、油塔、河汁、苜蓿汤，以色鲜味美、香甜可口而著称，一时在昌吉、迪化一带颇有名气。

他做油糕，先在锅里倒适当的水，水开后按比例把盐、碱、矾倒入锅里，再把羊尾油倒入锅里。烧开后把面拌入锅里，成糊状，熟后即可备用。第二天，把和好的面调上水拍软，捏成圆形，中间包糖、芝麻或其他东西做成的馅子，即可下油锅炸。这样，刚出锅的油糕，色质金黄，香酥起皮，脆乎乎，香喷喷，别有风味。

薄皮包子，馅是用皮芽子和羊尾拌有孜然、食盐等作料做成，由于火候掌握得好，刚出笼的薄皮包子具有皮薄、脆嫩清香、肥而不腻、入口即觉麻辣的风味。

火烧有肉馅和糖的两种，刚出鏊的火烧，色泽鲜艳，红黄相间，皮薄清香脆嫩，味道鲜美。

馆子最上乘的是油塔子。这是昌吉、迪化的顾客最喜欢吃的早餐主食。这是用死面加入少量的发面，揣入清油或羊油，多次搓揉，拧成油塔，放入蒸笼蒸熟。刚出笼的油塔，形似花卷，一层套一层，一圈绕一圈，层层环绕，有油香可口的特点。六保饭

馆做的油塔子与别的师傅做的油塔子相比较，在味、色泽和酥软程度上都略胜一筹。曾吃过六保饭馆油塔子的几位健在的老人，仍对当年六保饭馆里的油塔子赞不绝口地说："吃了六保饭馆的油塔子，能延年益寿。"

除了这些风味小吃外，六保饭馆还供应各种名菜，就是海参、鱿鱼一类的高档名贵菜，也是颇为拿手的。

六保馆子的经营特色

六保饭馆雇用6个人，面案上两个人，红案上两个人，1个人倒茶招呼客人，1个人跑堂。凡到馆子吃饭的客人，一进馆子堂倌就让坐，按照回族习惯，递上具有浓郁清香的盖碗茶。之后，清清嗓音，唱一段《打渔杀家》、《杨门女将》等秦腔，或者唱一段回族花儿，一方面招徕顾客，另一方面活跃饭馆的气氛。

六保饭馆的堂倌很会吆喝。吆喝有一定的调子像唱歌一样，向烹调师傅通报炒菜的名称、数量，如"一个平盘"、"前后三个过油肉"；向客人通报菜名，如"你要的薄皮包子来啦"、"你要的苜蓿汤来啦"。吃完饭的顾客，堂倌还要收钱算帐，也需要吆喝，如"5个薄包子5角钱"、"6个油糕4角8分整"等等。吆喝声有节奏，高低声调也各不一。饭馆的堂倌很重要，他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说会道，精干利落才能招徕客人。客人吃毕临走时，堂倌还要招手相送，说声"欢迎下次再来。"

饭馆的价格公平，每个油塔子一角，薄皮包子每个8分，油糕、火烧每个一角（当时货币）。馆子最红火的时候是赶庙会。赶庙会要在县城唱戏，届时县城周围的四乡五邻农民都要进城，热闹非凡。六保的饭馆随着庙会转，赶庙会的人多，吃饭的人也多。每年春夏之交，乡约、农官、渠长都聚在一起开会，商量河水的配水方案、管理制度、维修渠道的计划，他们都喜欢在六保

的饭馆包饭，每天几十桌。民国4年（1915年）昌吉县成立商会，工商界从业人员60多户，推举“清和城”商号寇云城（汉族）和高天忠（回族）为商总，负责管理工商界交纳税收和捐助，处理工商界纠纷，或当买卖中间人。商会成立后非常活跃，商总寇云城、高天忠经常召开商会，每次商会都要到六保的饭馆包饭。当年昌吉县的会馆林立，如河南会馆、天津会馆、秦州会馆、四川会馆等，各会馆每年定期举行活动，同乡欢宴多在六保饭馆包饭。每逢年关节日，各会馆举办的“社火”深受民众欢迎，看“社火”的人多，六保饭馆又随着各会馆的“社火”转。

六保饭馆的继承人

后来，马文玉年高体弱，儿子马登科继承父业。马登科继续经营回族风味小吃，保持六保饭馆的特色。1949年马登科病故，马吉明又接替父辈的事业。解放后的六保饭馆挪到洪家街的东拐角，有12间房子的门面，仍保持原来的小吃风味。

1955年，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马吉明响应党的号召，第一个报名参加公私合营。不久，韩德全、马连杰、阿鼻子、买明、刘光昌和马吉明等开的六家饭馆合并成立昌吉县公私合营饭馆，马吉明成了饭馆的一名职工。现在，马吉明年老多病，即将退休。他的儿子马荣华继承六保饭馆的事业，在昌吉毛纺厂附近继续开办饭馆，经营回族风味小吃。几十年前“六保饭馆”的饭菜香味，又弥漫在昌吉新城区的街上。

西安的牛羊肉泡馍

白　剑　波

牛羊肉泡馍是西安回族特有的传统风味食品，它以选料严、烹制精、营养丰富驰誉全国，深受我国各地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喜爱。

陕西牛羊肉资源丰富，秦川牛和陕北、关中羊久负盛名。宋陶谷《清异录》说：冯翊（今大荔县）产羊，膏嫩第一。苏东坡也有“秦烹推羊羹”的赞语。古城长安是东方大都会，地处西北要冲，接近牧区，成为牛羊交易的一个市场，现在西安还存有“西羊市”、“东羊市”街名，很可能是当时牛羊交易场所的遗迹。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一批阿拉伯商人、使者、士兵进入长安，传入了阿拉伯烤饼和煮制牛羊肉方法以及必备料如小茴香、八角、桂皮等。元代初期，长安穆斯林已经把煮制牛羊肉作为日常的食品。有人还用歌词形式记录了牛羊肉煮制的方法（见元末《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长安穆斯林还熔我国烤饼与阿拉伯烤饼于一炉，烙制成别具一格的小圆饼，名为“图尔木”，后来一般写成“饦饦馍”。煮牛羊肉和饦饦馍的出现，为西安牛羊肉泡馍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约在明代中叶，牛羊肉泡馍馆已在西安穆斯林家庭中传开。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西大街桥梓口天锡楼回民包子铺开业。之后，又由回族厨师马建勋掌勺兼营牛羊肉泡馍。迨清末民初专门经营牛羊肉的饭馆大量出现，新中国建立以后，一间楼、义祥楼、益华楼、同盛祥、鼎兴春、老

孙家等10余家牛羊肉泡馍馆相继开业。牛羊肉泡馍成了西安回汉群众喜爱的主食之一，是招待远方来客的盛馔。来到西安的人，不吃顿牛羊肉泡馍，似乎成了憾事。经营牛羊肉泡馍者全为回民，他们对泡馍的技术要求很严，煮肉和烙制饦饦馍的工艺特别讲究，有一套特有的传统方法，肉酥汤鲜，老少皆宜。

煮制泡馍前，吃饭的人自己先将馍掰碎，小如杏仁，掌勺师傅看馍定汤，逐碗烹制，武火急煮，两翻即成。传统煮法有“干刨”、“扣汤”、“水围城”。食时切忌搅动，讲究从一边“蚕食”，以保持鲜味。食后饮用“高汤”一碗，香益齿颊，回味无穷。

西安的“一间楼”

郭　新　坤

西安市东郊纺织城正街北头有一家久负盛名的牛羊肉泡馍馆。每天清晨，附近工人、农民及过往行人相继涌来，特别是饭口时间，顾客多得连个座位都难找到，店内一片繁荣兴旺景象。这就是闻名古城、驰誉渭北的清真“一间楼”牛羊肉泡馍馆。最早叫“德润福羊肉泡馍馆”。

“一间楼”是1927年回民刘德福开设的。地址在西安市五味什字，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1929年，刘德福退出，转由回民刘文玉、刘子俊、刘文喜兄弟经营。1932年刘氏兄弟将“德润福”迁到广济街，有4间门面，仍专营牛羊肉泡馍，伙计六七人，炉头为戴永录。因品种单一，热天顾客少，每年夏季要停业三三个月，影

响营业收入。但由于刘文玉等锐意改进制作方法，赢得了顾客的称赞，不仅还清了原欠的外债，而且使“德润福”牛肉泡在西安逐渐有了名气。1935年又迁至钟楼西北角现“德发长饺子馆”地址，因为只租赁到一间门面房带一间楼房，因而将店名改为“一间楼牛羊肉泡馍馆”。后来资金有了积累，又买了与门面相连结的10多间房和院子。西大街和钟楼盘道拓宽后，扩大成6间门面6间楼房，楼上增设了雅座，技师除戴永录外，相继聘请了马连生、刘汉民、米博义、马奎等技术较高的炉头（煮馍）、板头（切肉、煮肉、捞肉）和堂头（招待）。职工也发展到30多人。他们的牛羊肉泡馍，色、香、味、形俱佳。又在夏天增营水盆羊肉，使淡季不淡，四时顾客满座。因而“一间楼”不但誉满古城，而且在渭河以北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韩城等数县也享有盛名。

“一间楼”一贯坚持高标准，选肉用料均极讲究。如用花椒一定要陕西汉阴产的大红袍，桂皮要选料厚膘肥的通桂，草果用个大肉满的，大茴用上等瓣大无渣的，小茴用粒饱色泽鲜黄的等。制作方面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按小茴为首，花椒除头（即数量次于小茴），其它调料占五分之一的比例投放。炖肉刮去骨渣、筋、白膜后用水泡五六小时，中间换两次水，再用硬草刷刷净。先在沸汤中煮一二小时，后用小火（保持部分汤面冒泡）再煮五六小时。馍用窝窝馍（圆周厚，中间有凹窝而薄，用木锤捣制），做到“虎皮背，铁丝圈”（即保证质量又要外形美观）等。煮出来的泡馍不糊不散，汤鲜色正，入味可口。西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一间楼”品尝过。据业主刘文玉回忆，在“西安事变”期间，原任西安易俗社编剧的王绍猷一天来店联系说：“有客人要来就餐，只许做好饭菜，不许胡问乱说。”后来才知道是杨虎城将军在这里宴请中共代表团。听说当时就餐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吕正操等首长。饭后还称赞“味道好，有地方特色。”解放后，青海省长孙作实、西安市长时逸之都曾来这里就餐，回民著名爱

国人士马德涵老先生更是"一间楼"的常客。群众赞誉"一间楼"是"老店不欺客，花钱也值得!"又说："城里城外走一走，泡馍要数'一间楼'。"

1949年以后，业务经营有了新的发展。1962年，为使市郊工人也能就近吃上牛羊肉泡馍，经上级决定，"一间楼"由城里迁到纺织城。店堂共占地2.2亩，营业面积近1000平方米。业务经营仍保持了传统特色，店誉经久不衰。特别是在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鼓舞下，"一间楼"陆续增添了新设备，努力培养新的技术力量。楼上增设了雅座，除普通泡馍外，还增加了优质泡馍和鱿鱼、海米等海味牛羊肉泡馍及羊肉涮锅等新品种。月营业额翻了几番。

西安名菜馆天锡楼

马　德　宏

西安城内桥梓口西北角有座旧式二层楼房，这就是过去饮誉省内外的回民清真名菜馆天锡楼。一进门上面悬挂着长方形金字牌匾——天锡楼，系于右任先生手书。楼下设有普通座，楼上设有雅座。据说天锡楼有百余年历史，以经营民族名菜宴席兼营牛羊肉泡馍而出名。

天锡楼原名天锡永，后改名天锡楼。据说这里还有一段轶事：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逃来西安，曾在天锡永品尝过民族名菜宴席，饭后甚为满意，把天锡永更名为天锡楼。天锡楼过去顾客盈门，盛极一时，承包南北名菜喜庆宴

席，还备有抬盒、食盒、提盒为顾客送菜饭。

天锡楼是西安古城最早独家自营的清真菜馆，由于饭菜出名，接待过高级人物和社会名流。据天锡楼健在的70高龄的马耀先先生回忆，曾接待过蒋介石，常来天锡楼吃饭的有杨虎城将军，知名人士张凤翔、马玉贵、马鸿宾、马鸿逵等。

天锡楼菜谱有名菜百余种，光海参就有六七样，如纯海参、葱黄海参、鸡米海参、虾海参、红烧海参等。三仙有肉三仙、素三仙等。全羊席108样，有滚盘珠（羊眼）、百草关（羊喉咙眼）、百尝草（羊舌）、登云梯（羊蹄）、红烧云头（羊脑）等。像这样的宴席过去20多块银元一桌席，其他一桌席也得12至18块银元，价格昂贵，劳苦大众真是可望而不可及。

炒菜有炒鸡丝（鸡脯白条）、炒腰花、炒肝尖等。天锡楼最出名的有黄焖鸡、苡米鸭子、酱羊肉、红烧羊肉和砂锅炖肉。特别是春卷，做法是用面摊饼卷上鲜韭黄、香椿，然后切成寸条过油，炸出来外表象鸡的脖颈，吃起来味鲜美、喷香。

涮羊肉也很出名。主要调料能摆一桌子，有虾油、红豆腐、鲜辣子、腌雪里红、韭黄、豆腐、波菜、大白菜、绿豆丐条等。

天锡楼烤鸭、烤羊肉、烧鲤鱼，在做鱼之前先让顾客看是活是死，然后宰杀洗净；鸭子肚里装上冬菜，用木炭火烤，烤熟后用香油刷周身，色通红，当顾客面切片。

天锡楼的牛羊肉泡馍也很有名。他们从甘肃西峰镇买回优质羊，肉味鲜美，汤都是元汁汤，不多对水。天锡楼经营特点是：冬天牛肉为主，夏天羊肉为主。

天锡楼名厨师炉头有马建行、马建勋兄弟二人，手艺出众。马建行曾在北京、天津投师学艺，马建勋受“木兰居”名厨指点，请的名厨师有韦曲张姓，擅长牛羊肉宴席。1963年由于生意萧条，还邀请北京赵某名厨来西安，但时间不长就离去了。

天锡楼过去生意兴隆主要是兄弟8人同心协力，他们继承老

一辈懿德家风。前辈马彦令、马春令、马乔令，同姓不同宗，结成一家，情同手足，这在过去回民坊上也是难能可贵的。兄弟8人分工明确，管理经营马建行（大掌柜），马建勋（七掌柜）负责炒菜，其余兄弟马建吉（二掌柜）负责切肉，马建安(三掌柜)负责采购，马建元（四掌柜）负责跑堂，马建明（五掌柜)阿訇、马建功（六掌柜）泡馍炉头，马建文（八掌柜）负责财会。

其次是选料精细，烹调掌握火候，从不马虎。此外，对客人热情招待，一视同仁。过去饭馆有小费。顾客进门让座，拿出菜单点菜，然后端菜到桌前，吃完后还给热毛巾、漱口水、牙签，临走时顾客付给小费，堂官大声喊叫小费多少，全馆人员一齐大声喊谢！

至解放前的30至40年代，回民陆续开设了“月华楼”、“西来堂”、“清雅斋”等饭馆，对天锡楼营业不无影响，加之老掌柜年老体弱，有的先后去世，生意逐渐萧条，再没有恢复往日门庭若市的繁荣景象。

（本文承天锡楼大掌柜马建行长子马耀先先生提供资料，表示谢忱。）

洪福元和洪家街的兴衰

杨　荣　湖

洪福元的发家

洪福元原是陕西华平县人，后来迁到宁夏。因阿达（父亲）去世，母子生活无着落，15岁的洪福元决定去新疆，在西口外闯

出一条生活道路。

光绪年间，洪福元辞别老母，告别了乡邻，踏上西去的路程，寻找自己的理想生活。那时候，家中穷困潦倒，没有路费，没有马驴，只得步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火焰山下的吐鲁番。在吐鲁番，他给一家好心的巴依放羊，总算有碗饭吃。半年以后，他又翻越巍峨起伏的天山，来到富饶的昌吉县城。

昌吉是个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开始他在街上摆摊修鞋，后来给一家回族开的“易兴和”油坊当帮工。老板易升元见洪福元身强力壮，长得魁梧，一表人材，性格刚强，待人忠诚老实，很喜欢他。洪福元在油坊很快学会了炒葫麻、榨油等一整套技术，成了易家经营油坊的好帮手。

时隔不久，洪福元就被易升元招了女婿。婚后洪福元继续在油坊干活。过了几年，易升元给洪福元一点本钱，还给了一些地，让他自己经营京广杂货铺。这时，洪福元除了经商，还种些地。从此，他在昌吉扎下了根。

洪福元膝下有三子，他们是洪聚昌、洪聚海（后为昌吉县回文会会长）、洪聚清（后来被推举为昌吉县县长），还有四个姑娘。洪福元在新疆发了家，在陕西和宁夏的亲戚朋友，都闻讯来到新疆投奔他。不几年，陆续迁来昌吉的洪家亲朋已有近50人，洪家成了昌吉城内的有名大户。

洪家油坊大约在1910年修建起来的。油坊前面有三四间门面的铺子专门卖油，后面是一个宽敞的大院，有60多间房子。开始单榨，后来发展成为双榨，由原来的两盘磨发展到4盘磨。一个炒锅专门炒葫麻，有三四个油匠，八九个杂工干活。大榨每次可榨3石葫麻，出油600斤左右，小榨每次可榨2石5斗葫麻，可出油300多斤。昌吉县三工南戈壁一带是盛产葫麻的地方，从秋天葫麻打下来到来年的春季，是油坊生产的旺季，从来年的夏季开始到秋季是油坊的淡季。四乡五邻的农民可用葫麻兑换

油。到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吃油有困难时可先欠账，秋季再用葫麻顶帐。夏天，洪家到农民那里先预购葫麻，平常年累计能收购葫麻七八十石，收成好的时候能收购一百二三十石。洪家油坊的清油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迪化。

洪福元还雇人种地，生产粮食和饲料，供应油坊的杂工口粮和牲蓄饲料。每年还喂几百只料羊，年关在市场上销售。

清朝末年，在南关向南修了一条街，这就是昌吉县有名的洪家街。后来洪福元成了昌吉县城的首富，又被推举为昌吉县商会商总，人称洪商总，在昌吉、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的工商业中声望日增。

民国16年（1927年），昌吉南山大面积种植鸦片，其市场价格比黄金还贵。洪福元此时经营大烟生意，并赚了很多钱。

1933年春，马仲英进新疆围攻迪化，战争频繁，商旅不行，新疆一片混乱。洪福元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财产安全，向县政府建议组织商团与民团联防，保卫昌吉县城。后经官府同意成立商团，任命洪福元为昌吉县商团团长。商团在南关修筑栅栏，堵住巷口，布防守卫。同年，洪福元被马仲英部杀害，洪家从此走了下坡路。

洪家街的兴建和商业发展

清光绪年间，“昌吉县城内自东至西有正街一道，无市，城内自南至北有正街一道，内南北街合面门市。”从前，南关街以南是焦家车马店，车马店以南是一片野草丛生的牧地，人称乱杂岗，再往南是园丰乡农民的耕地。

清光绪年间，洪福元买下焦家车马店，又买下园丰李寡妇的半垧地，接着在南关街向南修建一条800米长街道（从现在的昌吉市开关厂到昌吉市外贸局）。在南关小十字西拐角处，他修建了4间门面的铺子，雇了账房先生马彦明（回族），为他经营京

广杂货、百货、清真糕点、食盐、葡萄干等土特产品，还有茶叶、水桶等，当时的流动资金约有二三万元。他在街两面修起了百十间铺子和手工作坊。后来这条街上又开了回族风味小吃店、米糖加工铺、铁匠铺、各种修理铺等几十家小铺子。洪家街的百十个小铺子大部分是洪家及其亲属经营，只有一小部分租赁给其他人经营。

铁器和工具是在洪家街上销售和交易的大宗货物，这里有几家维吾尔族铁匠生产的铁制农具、镰刀、铁铣、斧头远近闻名，一上市便销售一空

具有民族风味的小吃也很著名，每天这条街上叫卖声此起彼伏。有维族风味的抓饭包子、烤包子，具有回族风味的油糕、油条、火烧、油塔、羊羔肉，色鲜味美，香甜可口。清真饭铺的饭菜香味飘溢在洪家街上。

新疆伊、塔、迪一带的汉、蒙、回、哈、维族喜爱喝茶。昌吉洪家街市场上销售的大量的茶叶都是从迪化购进的。经营茶叶的资金周转快，利润很高。内地的丝织品、绸缎、布匹经过迪化运向昌吉，在洪家街市场销售。

洪家街市场上还销售南疆产的玉石、土特产品、葡萄干、桃干、杏干。回族妇女喜欢的金银手饰，各种玉制装饰品，如琥珀、玉带、玉珠之类在市场销售量也很大。

此外，洪家街的南关是各种牲畜，如牛、马、羊、骆驼、驴、骡的交易市场，还销售各种皮毛（羊毛、驼绒）、毡、毯、鞋、靴、食盐等。

总之，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洪家街已非常繁荣。1933年马仲英进新疆围攻迪化，攻打昌吉，洪福元在战斗中身亡。他家的铺子、货物、油坊被抢窃一空。从此，洪家街生意萧条。战争平息后，洪福元的长子洪聚昌又和姓余的合伙开油坊，后来又和洪聚荣合伙开过油坊。

解放后，1953年洪家油坊关闭，把车马店和商店都卖给马金堂，洪家就不经营铺子了。此后，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洪家街也被拆除，但这条街却在昌吉县近代回族工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页。

天成和商号兴衰记

李　凤　藻

宁夏吴忠的天成和商号，自1905年开业至1946年停业，历时四十余年。

天成和商号的兴衰史是解放前西北地区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的一缩影。为了比较详尽地记述这段历史，就我记忆所及，将个人的从商经历记述如下。

天成和商号的创业

天成和商号的奠基人是家父李秀。家父祖籍宁夏吴忠堡，生于1846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卒于1912年（民国元年），享年66岁。青年时期即跟随我祖父李发祥在吴忠堡西门内开一间小杂货铺，经营一些日用杂货。1872年（清同治十年），清朝政府残酷镇压以马化龙为首的回民抗清斗争，金积、吴忠一带的当地回民不问是否参加了起义，统统被迁散到南部山区，我祖父一家亦被强迁至固原南山居住。清光绪初年，家父才举家迁回吴忠堡，在南乡购置几亩田地后住下来，一面在农田耕作，一面利用自己的骡、马、驴与邻居牛生贵合伙搞一点长途贩运。当时主要从盐

池县境内的花马池购盐运往甘肃的平凉、环县一带销售。往返一趟要月余时间，一趟贩运三四百斤，获利十余两白银。未几，政局日趋稳定，经历了战乱的吴忠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恢复了往日那种集市繁荣、商贾云集的景象，外省市和外县的一些商人纷纷来吴忠开店设摊从事商贸活动。家父的长途贩运活动有了发展的条件，于是便从外地购进更多的农具、铁器和日用杂货销给市场上的商人。几年后，家父的长途贩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积攒了几百两银子，买了20峰骆驼，不仅贩运盐，还代客商转运货物，成为本地一支比较主要的运输力量。1905年（清光绪三十年），家父在吴忠堡购置了两间铺面，开了一座不大的店铺，取名天成合。当时有资金约千余两白银，除仍然从事运输外，还在店铺经营自己购进的各类日用杂品。

天成合店铺的创建，是家父商业活动的一个新的起点，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营运的方式，把采购、运输、销售结为一体。业务活动的扩大，使内部的分工也更细了。当时，我的长兄凤鸣已考取贡生荣归，专事协助家父坐庄经营，二家兄凤仪协助家父专事营运，家父掌管全盘经营活动，有时在店里亲自经销，有时随驼队到外地营运，这样做，可及时了解市面商品的供求，可亲自指导购货尽快出手。这种经营方式为后来天成和商号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光绪末年，商号销售从陕西关中地区购进的糖茶、布匹，深受当地回族群众的欢迎。

1907年，家父抱病，长兄一人掌管经营活动颇感吃力，决定三家兄凤喈和我辍学，协助经营，三家兄协助二家兄管营运，我进天成合店铺随长兄学生意。当时我年仅13岁，在店铺里先做杂务，诸如打扫卫生、看管柜台、为客送货、搬运商品等。这些活动统称为学徒。两年后，我学徒期满，开始做司帐工作，协助长兄管理商号的帐务。到1911年京张铁路通车，我们把甘肃陇南和陕西关中一带的活动减少，直趋向东面发展，购销业务直到张家

口地区。那时，长兄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多数时间由我随二家兄外出购货。我们先从陕、甘一带购进毛皮，用骆驼运往张家口，几千里的路程要走几个月，然后从张家口买进当地需要的各类商品运回来，这种长途营运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尽管如此，也丰富了市面的供应，为商号增加了很多盈利。商号铺面扩大了，骆驼队也增加了一倍，还开设了油坊，资金发展到3000余两白银。

1912年（民国元年）父亲病故，1915年长兄也相继病故，家中连遭不幸，使商号经营受到严重影响。三家兄生性怯懦，不愿承担整个经营业务，二家兄没有文化，且长年在外搞运输，我年纪尚轻，众多亲友都为我们担忧，一时曾使全家陷入混乱。幸有家母马氏为人刚强且精明能干，出面主持大局，将天成合商号的经营分为三部分，二家兄仍管运输，三家兄专管外务，商号经营交由我主持。在这个时期，吴忠堡地区的商业活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外省商人中以山西帮资金最为雄厚，他们全部开铺面经营（称为坐商），主要有“自立忠”、“自立长”、“天心协”、“自立兴”，称为四大家，资金多的达七八千两白银，少的也有三四千两白银。此外，本地一批富户也在市面开设店铺，使得小小的一个吴忠堡竟成为宁夏河东地区的商业中心。市场的繁荣也给商家的经营带来了困难，在各商号激烈的竞争中，要站住脚并且得到发展是件很艰难的事情。为了振兴我们商号的经营业务，我于1916年将天成合改为天成和，与两个兄长紧密团结，共谋发展。1917年，我先与吴忠的杨春华、天津的刘墨林在天津北马路开了一个店铺，一面专销宁夏运去的土特产品，一面作为收购各类日用百货的货庄。接着又在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两地购买房产，设立庄点，扩大在绥远一带的经商业务，由于我把天成和的商业从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发展到东边的绥远、张家口和津京一带，使我们商号大有“财源茂盛通四海，生意兴隆达三江”的局面。在短短的两年里，天成和商号的资金上升到4000

余两白银，成为当地回族商人开设的四大商号（即李家的天成和、白家的永兴隆、牛家的万生财和马家的福顺安）之首，与当时吴忠地区的八大家并驾齐驱。

1923年京包铁路通车后，我们的经商业务范围更加扩大，通过在陕、甘、青的收购点，将西北地区的毛、皮、甘草、发菜、枸杞用骆驼和木船运往包头，再装火车运到天津销售，颇受欢迎。然后再把从天津采购的布匹、棉花、绸缎、毛巾、鞋袜、肥皂、火柴、腊烛等日用百货、五金产品以及糖茶类副食品用火车运至包头，再以水路、旱路运回宁夏。由于我们购货齐全，运力强，周转快，一时间使天成和商号的经营十分繁荣，清晨即顾客盈门，络绎不绝。至此，天成和商号开始走上兴旺发达的里程。

天成和商号自初创经10余年发展到初期的兴盛阶段，一方面是家父所建立的一整套合理的经营方式以及我们的严格管理和勇于开拓，更重要的是我们十分注意为商号树立良好的信誉，频繁地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地联络各界人士，为商号经营活动迅速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条件。

1917年，即天成和商号更名的第二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募捐兴办回民学校，吴忠堡的回民小学由我牵头集资，我自捐白银近千两，占全部资金的一半以上，并且担任建校总务长。第二年学校建成，聘请名士马玉书任校长，内蒙古人巴宁任教导主任，教员数人正式开课。学校开课后，我因商务繁忙，遂将总务工作交马南轩接任。此外，我们天成和商号经常拿出一笔款项参加修桥铺路，支持穆斯林群众兴办清真寺，请阿訇开学讲经，冬、夏两季向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帮助，支持他们进清真寺念经。商号除对客户进行一部分赊销以外，还对小商贩以及其他困难户提供一部分贷款，不收利息，旨在助人度过危难。这些好的做法，无疑在社会上提高了商号的信誉。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做法，引起了一少部分有权势的人的嫉妒。1921年，马福祥离开宁夏到绥

远任都统之后，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所造成的影响波及到宁夏，吴忠堡地区社会秩序渐次混乱，土豪劣绅经常寻衅滋事，欺压百姓。当地一些贪官污吏与地方恶势力相互勾结，借故对各商家敲诈盘剥，使已经开始繁荣的商业经济蒙受了很大损失。天成和商号两次受到打击，损失也很严重。一次是从天津运回一批货物，未进吴忠堡即被勒令就地接受检查，结果被封存三月有余，不仅商品不能及时出销，占压资金，仅百十余头骆驼的饲料就耗费了一大笔款，此外还得给税局送上厚礼，请人疏通说情，前后损失500两白银。另一次是吴忠堡南门外秦渠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县政府抓了一批嫌疑犯关押审讯，结果均未审出来。后来决定准予取保放人，这批嫌疑犯中有一人叫李舫，系我们本家的远房亲戚，他有个兄弟叫李藻，签名保释了李舫。数日后李舫兄弟2人外走他乡谋生计。县政府有多事者翻出保状，硬说是我保释了李舫，逼我交出人犯，并把我二兄扣押起来。我无奈，向当地土豪劣绅马世恩（外号马歪脖子）送礼，请他出面疏通才算结案。结果先后折损白银四五百两。由于这类事情层出不穷，我目睹这种不公之事愤然不平，于是在1923年秋，弃商从军，只身赴绥远都统马福祥处投军。

天成和商号由于我的离去，暂时收缩了业务，使本来向上的势头遏制下来。

天成和商号的振兴

1928年夏秋之交，我离开军队回家，决定重操商业。但是当我看到离别五年后的家乡已被兵祸匪患践踏的百孔千疮，感到在吴忠堡重整天成和商号已是无望，便决定将总号迁至包头，制定以包头为基地，在西部的青海西宁、甘肃平凉、宁夏吴忠设立分号，然后再向东与京津张地区挂钩，逐步形成一个大的商业网，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批发业务上，将西北地区的资源运送到东部工

业发达地区，然后运回大量日用百货供吴忠地区各商号销售。在人员的使用上，尽量使用自己的子侄，分派他们在各公号常驻经办收购和经销事宜。我本人在包头统管全盘，只聘请一名管帐先生，其余各项业务都由我一个兼管。经过我们的苦心经营，自1928年至1937年，天成和商号的营运业务逐年盈利，使原来仅有的3万余元资金发展到26万余元，房地产从30多间发展到200余间，骆驼增加到200多峰。在这期间，振兴天成和商号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充分利用民族、宗教间的感情，广泛地建立了社会联系，为发展商业拓宽了道路。

1931年前后，由我首倡，联络一部分亲友自费赴麦加朝觐。我们数十人分成几批，经天津至上海乘日轮，过福建、广东、香港抵新加坡，换乘英轮经科隆坡入红海登陆，乘骆驼赴麦加朝圣。长途跋涉，经数月之久，万分辛苦。朝圣回来之后，又捐资在归绥（今呼和洪特市）建北古轩清真大寺，在包头独资建新亚街清真寺，以重金自北京、张家口、宁夏韦州等地聘请著名阿訇开学讲经，这些举动使我广交朋友，并深受当地穆斯林群众的拥戴，从而提高了天成和商号的声望，为发展商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1937年，正当我们商号进入一个发展的全盛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当日本侵略军进逼包绥时，我将所有资金和大宗货物迁往吴忠，仅留下在包头与陈子寿合资开办的吉庆公肥皂厂一部分资金。不料货物运至宁夏境内，竟被马鸿逵政府以“敌占区物资”名义扣压，以后虽经交涉终未获准发还。最后盘查结果，在包头被日军侵占的物资和资金约2万现洋，沿途遭土匪抢劫的物资损失约1万余元。被马鸿逵政府没收的货物主要是布匹、颜料、绸缎及日用百货，价值3万余元。这次的损失合计达6万余元。此外，我把天成和总号迁回吴忠以后，由于外边战事十分吃紧，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展经营活动，于是设在各地

的分号逐一撤销，原有的物资能运的运回来，不便运输的就地折价销售，这样一来也有几万元的损失。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我们天成和商号的资本损失三分之一。商号迁回吴忠以后，原想再好好干几年，不料事与愿违，刚刚避开了狼，接着又遇到了虎。因此，天成和商号从迁回吴忠堡开始便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天成和商号的衰败

当时统治宁夏的马鸿逵打着抗战的幌子，制造种种借口，大肆敲诈盘剥人民群众，肆意摧残民族工商业，为自己掠夺财富。

从1937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战时期，马鸿逵对宁夏地区的皮毛、枸杞等土特产施行所谓“统购”，对于利大的物资，他都用官办企业进行垄断，限制民间工商业发展。例如，我回吴忠堡不久，与当地几个商人联合开办了一座小型织布厂，目的是解决商号货源不足。开工不久由于从西安购买棉纱困难很大，我决定对设备稍加改动，用当地羊毛为原料，织粗毛线毯和粗毛布。这些产品在市面上很畅销。不料生产仅一年多时间就被马鸿逵官办的宁夏毛织公司勒令停办，所有机器设备均被强行拆除运到银川。此后，马鸿逵政府下令，凡羊毛、驼毛、皮张等均属抗战时期的重要物资，私人一律不得经营生产。1939年，马鸿逵政府在银川组建一个官办银行，即宁夏银行。强令各商界名人加入股份，股份的数额庞大，我是首当其冲，因为银行董事会已把我列为常务董事了。此外，马鸿逵政府还在各地增设了税收关卡，派遣骑兵缉私队，主要对付各商号的营运活动，见到货物运来便用“敌占区物资”先行扣压，然后从中挑选，凡是他们所需的便予以没收，对于选剩的货物则加大税收，这样一来常常使商人连本钱都赔了进去。还有就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摊派，不断地派粮，给农民加重了负担，对商界人士采取以钱顶粮的办法，而且数额十几倍地增加。

征兵一项，不仅给老百姓造成巨大灾难，就是商界也深受其害，常常是以钱顶兵。几年下来我们天成和商号仅交付粮款、兵款达3万余元。为了这件事，我三家兄被逼成精神病，未几便含悲而逝。

在抗战七年里，马鸿逵在宁夏一面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一面又加紧对各商业户进行大量的掠夺搜刮，天成和商号同宁夏大大小小的商号一样，到抗战胜利时已濒临倒闭了。我看到局面已无法挽回了，只得将此剩资产分为四份，分别按长兄、二兄、三兄和我平均分了，分到我名下的全部资产也就值4万余元。

至此，一个本来是生机勃勃的商号便彻底消亡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利用自己这部分资金在天津办了厂，得到了一些发展，到1952年参加了宁夏公私合营企业公司，加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列。

西安回民古玩业史话

马　德　宏

我父亲马羽鹤和三叔马静轩都是经营古玩行业的商人。虽然我没有继承家风而改了行，但耳濡目染，对这一行的情况还知道一些，兹就回忆所及和几位健在老人的叙述将这一行业的活动略述如下：

（一）

古玩俗称古董，包括古铜、古陶、古玉、古瓷器、象牙雕、骨雕、竹木雕、漆器、螺甸、牙骨镶嵌、石刻、石象、碑帖、古

器拓片、古画、古书、珍珠、宝石、宝玉等等，种类繁多。古人曾分类著录成书，如《宣和博古图》、《三代铜器》、《古玉图》、《古钱谱》等。上述这些古玩，今天都可以称为古代文物。对于这些古代文物，历代都有不少收藏家、鉴赏家，相应地也就产生经营这些古物的商人，而且有不少典籍记载着他们的活动。唐人笔记中记载这类事迹的就很多。经营者多系番商、胡贾。在这些番商、胡贾中，有一些是回族的先民。后来，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回民中，许多人继承了先民的衣钵，继续经营古玩行业。北宋时，长安也有古玩行。明代人中有“识宝回回”的说法。

从清代起，西安回民中已出现经营古玩的行业。其中有开古董铺的，有跑街的（掮客），有长途贩运的（京沪），也有在乡下寻求收购的。他们中虽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通过长期的实践，都具有一定的辨认古董的能力。

在辨认古董方面，他们并不完全依靠书本知识，主要靠长期接触实际积累的经验。如每个朝代器物的造型、花纹，代表各个朝代的风格。象宋瓷，从釉色、瓷质、工艺水平来看都较元瓷为优，还易辨认。但对究竟是宋瓷十大窑（柴、汝、文、官、哥、定、钧等）哪一个窑的产品，就非有多年经验才能确定。因此，他们的认货眼力如何，就成了第一要事。有一位在古董行业被人誉为“瓷圣”的老先生，对瓷器的理论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接触实际往往真假难辨，可见不断实践是多么重要。

古董行过去也有个别人发财致富的。光绪年间，回民最早在北院门鼓楼北开古董铺的苏兆年、苏兆祥兄弟二人，一天在西安鼓楼南一条很窄狭、人称砖头缝（即现在鼓楼南巷）的小巷内，看见一家炉院（搞冶炼的）院子内放着一个铜鼎，鼎上有铭文。苏就问炉匠准备将铜鼎咋办？炉匠说准备化铜打成门扣。苏氏兄弟接着问打成门扣能卖多少钱？答可以卖30两银子。苏氏兄弟二

话没说出了30两银子将铜鼎买回。鼎拿回后，苏氏兄弟即给北京京官陈官俊的儿子陈介祺写信告知此事，陈接信后即汇来白银100两，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由苏氏兄弟雇了一辆轿车，专程将铜鼎送到北京。陈介祺见到后视为至宝，将铜鼎锁在一间房内，不准任何人打印拓片。陈给了苏氏兄弟1000两银子作为报酬。苏氏兄弟回到西安后即用这笔巨款购置了房产，就洗手不干了。这个鼎就是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按：毛公鼎为周代毛厝所造，内有铭文300多字，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此鼎后由陈介祺转手以5万银元卖出，后又有姓文的以20万元的高价转买。据说仅毛公鼎的一张拓片，后来可以卖到30两银子。

约在民国10年前后，回民马德俊下乡收货，忽见一家井台上放着一个钧窑挂红宋瓷碗，是当地农民给鸽子饮水用的，马见到后为之一惊。开始咋说主人都不卖，说是先人留下的，经过几番周折，终将碗买回，转手卖了1000多银元，从此也再不干古董行了。这是回民从事古董行业流传比较突出的两件轶事。

（二）

过去回民开设古董铺大都集中在北院门鼓楼一条街。最早的就是前面说的光绪年间苏氏兄弟，以后相继有李二（李凤祥老人的父亲）、华茂轩、先父马羽鹤、三叔马静轩，还有白云秀、白云鹤、马步云以及刘瑞亭等七八家，到解放初期只剩下两家了。过去古董铺主要经营出土文物，也包括象牙制品、玉石雕刻、翡翠、玛瑙、刺绣、鼻烟壶、明清瓷器等。古董铺一般门前挂着所谓“望子”，在长方形白布上面画着各种青铜器、陶器、玉器、瓦档、古钱币等图样，引人注目。

古董出路大致有这几方面：一是卖给在西安的京客（大都集中在西安马坊门几家旅店内），一部分卖给西安有名望的古董商，然后转手卖给上海、北京的国民党达官富翁。过去上海有所谓古

董行4大公司，有的老板象戴叔宝、张雪庾等都亲自出马来西安买货，还有一部分卖给上海等地的古董客。古董商在西安有名望的象阎甘园、白辑云等都由先父马羽鹤（马二）、金启恒（金三）经手买过古董。

过去跑乡收购古董要担很大风险，旧社会乡下土匪多，碰上不仅财物被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了。如回民孙主麻、白辑云下乡买货，在益店遭到土匪杀害，留下孤儿寡妇，生活悲惨。人们常说古董行有能发财致富的，但也有常年不得温饱或遭到不幸的。

（三）

“行行出状元”，古董行也有几位经验丰富的行家。如李家三娃子，先父马羽鹤，今尚健在的83岁高龄的刘汉基等都是这一行出类拔萃的人物。古董行已故的孟廷杰讲过这样一件事：白辑云买了一件银壶，别人都说年分不够，但经刘三娃子鉴定，认为是唐器，后由南院门李道生买下，拿到北京卖了大价。孟廷杰称赞三娃子辨认古董的能力是数一数二的。又如先父马羽鹤在世时，北院门有位牙科医生吴云樵举办一次古玩展览，他去参观，买了一个没有花纹的豆青瓷碗，当时仅用了10元钱。他对我说这是宋瓷官窑，造型规矩，瓷釉厚，一般人认为是粗瓷，所以看不上眼。我奶奶生前曾对我说过：你三叔认古董不如你父亲，有次你三叔买回一件铜器让你父亲鉴定，你父亲未打开包袱用手掂了掂说是假的。你三叔不信，以后经别人看后确定是假的，才相信了。

刘汉基先生现在文物商店工作，对金石书画、出土文物，特别是对古钱、古币有很高的鉴定能力，现虽病休在家，文物商店有时还拿着收购的文物专门去请刘老鉴定。1952年，西安北广济街南口（胡全林刀剪铺前）挖下水道时，刘老路经那里，发现了弃置路旁的《司马芳碑》，立即用电话向文物馆报告，并及时运到博物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极其珍贵，现藏碑林第二展

室。刘老病休期间，文物商店领导关怀备至，工资全部照发，医疗费用由单位包干，并派专人护理。这和旧社会回民从事古董行业的颠沛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古董行回民中还有一位手艺高强的人，叫马德良（已故），人称“葫芦娃”，是焊壶的，对修补青铜器复原有高超的技艺。比如铜器有破损，甚至三层花或者耳子不全，经他修复，和原有花纹一模一样，真能以假乱真，连有经验的京客一时都分辨不出。可惜这一手艺未能流传下来，深感遗憾。

现在古董行回民老人尚在的除刘汉基外，尚有李凤祥、马培文等，年龄都在80岁以上。

（四）

解放后，按照国家保护文物政策，回民从事古董行业的相继自动转业。如我父亲转业经销茶叶，刘汉基、马培文、孟廷杰、李凤祥也都做了其他工作。

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由古董商白辑云等发起文物义展，征集组大都是回民。他们为义展征集了不少文物，有的还将自己珍藏的文物拿出参加义展，这个义展达数月之久。通过义展活动，文物馆很想吸收一部分回民参加工作，但多不愿意去，最后我父亲到文物馆工作，为时很短。1954年，文物馆又请刘汉基参加工作，直到现在。

（五）

总之，回民从事古董行业的大都是无师自学，文化程度低，缺乏系统研究，有时东西卖出去后才明白真正的价值。只知道卖古董赚钱，就心满意足，有的搞了一辈子古董，还是糊里糊涂，说不出个名堂来。现在回民中对古董行的知识了解的人更少了。

本文承刘汉基老先生在病中提供宝贵资料，特此表示谢忱。

第五章　回族的教育事业

回族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

马　寿　千

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1]，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阿拉伯语称满拉或哈里发）传习伊斯兰教功课以培养宗教人材的一种教育，它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早在唐宋时期，当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之初，来自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番客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清真寺。到了元代，从中亚以及波斯、阿拉伯等地陆续东来的大批回回人定居在我国各地，居住之处都要建立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当时清真寺的阿訇是由番客和回回人中的穆斯林学者及其子弟来担任，比如元代回回人夏不鲁罕丁由西亚来到泉州，在清净寺当阿訇。他的儿子夏敕以及后裔夏彦高、夏东升、夏日禹等在明代继续主持寺务。元代文献中有关回回大师（指阿訇）、回回哈的（指执掌教法的人）和答失蛮（指回回中的宗教学者）的记载很多，这说明当时礼拜寺虽然已经不少，但由于东西交通大开，宗教人才并不缺乏，既可以请进来（即请外来的穆斯林学者来当阿訇），又可以派出去（即派人通过朝觐或到阿拉伯、波斯等地求学，回国后再担任阿訇）。这是伊斯兰教传入

我国的初期阶段，即由唐宋直到明初的阶段，主要由外来的穆斯林学者在我国传教的阶段。这一阶段中还没有出现经堂教育。

约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回回在我国长时期的繁衍生息、落户生根，开始形成为我国的一个民族。回民所在之处清真寺普遍建立，这就需要数量更多的阿訇主持寺务宣讲教义。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封建王朝采取了“片板不许下海”的锁国政策，东西交通开始闭塞，把外国穆斯林学者请进来或者把中国穆斯林学者派出去的那种条件已经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伊斯兰教要在中国回族中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就必须在回族中培养自己的经汉兼通、回而兼儒的宗教职业者。明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回族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为在清真寺培养宗教人员提供了经堂教育所需的费用。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即主要由外来的穆斯林学者传教的阶段转移到由中国回族中培养自己的宗教人才来传教的阶段。

经堂教育于明中叶以后在各地逐渐展开，开始出现的时候已不可考，现在只知道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胡登洲（1522年——1597年）在陕西渭南家中招收学生传习宗教知识，一般都把他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字普照，渭南回民。早年研习儒学，后来又学习伊斯兰教的经典，成为一个经汉兼通的宗教学者，回民尊称他“胡太师”。他曾去麦加朝觐，回国后立志在中国广泛传播伊斯兰教。他在家里招收几名学生学习宗教知识，这比宋元以来阿訇只把宗教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弟扩大了一步。学生的食宿费用有的由胡登洲供给，有的则是一边自己从事劳动，一边来阿訇家学习，这算是经堂教育的一种雏型。此后经堂教育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就是由清真寺的阿訇担任这一坊的教师，在清真寺内招收若干名学生，学生的衣食住等项费用都由这一坊的回民群众供给，所以一个清真寺招收学生的多少，既要看这个清真寺阿訇的学问、声望，还要看这一坊回民的经济能

力如何。

从胡登洲在陕西兴学开始，清真寺内设学的风气逐渐推广，到了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周某（回民尊称他周老爷）的时候，经堂教育更加发展，陕西、河南、山东、云南各处清真寺纷纷兴学，出现了陕西、山东两个宗教学术中心，培养了一批批的著名阿訇。经堂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又曾出现过三种类型：一种称为大学，专门培养阿訇，这是经堂教育的主要形式，各地清真寺普遍举办这类教育；一种称为中学，是为成年的穆斯林传习宗教知识而举办的一种业余性的宗教教育，只有少数清真寺在举办；一种称为小学，是为儿童学习经文和宗教常识而设，这类教育只在回民聚居地区比较普遍。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堂教育则是专就大学一级而言。

经堂教育的课本，文字上主要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两种，有的阿訇专攻阿拉伯文，有的专攻波斯文，也有少数阿訇二者兼通。课本的内容主要是《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教各种教义教法等功课。由于受世界伊斯兰教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主学”曾经是经堂教育的主要课程。

为适应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特点，不少经汉兼通的宗教学者开始用汉文译著一批有关伊斯兰教的宗教读物，这种汉译著作在明代晚期陆续在江南等地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米万济的《教款微论》，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注的《清真指南》以及后来马复初的一批译著，等等。这批宗教著作的重要特点就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内容上采取了以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用这些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要“假儒理以发明教理”，要“援儒以附己”。他们的目的很明确，采用儒家学说去阐明伊斯兰教，借用儒学权威来维护伊斯兰教。与经堂教育相一

致，汉文译著的出现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这些汉文译著也大多成了经堂教育的重要读物。

接受经堂教育的学生学习期限没有硬性规定，一般是用几年时间把必读的宗教经典读完，具备了独立宣讲的能力就可以毕业。毕业时由教师和这一方的穆斯林群众为他举行授衣典礼，赠送一套阿訇穿的长袍，并赠送锦帛一方，说明其学业优良，作为毕业凭证，这个学生就有了被别处清真寺聘请去当阿訇的资格。

注　解：

①过去人们曾习惯地把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称作“回文”，意思是回回文字。实际上回回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民族，回回民族以汉语为自己的共同语言，阿伯伯文或波斯文只是一种经堂用语。因此，称“回文”并不科学。

平凉国立陇东师范

马汝邻

平凉国立陇东师范的前身是上海私立伊斯兰师范学校。

1928年8月，哈德成阿訇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聘请达浦生阿訇为校长，招收的学生以读过经文的海里凡为主要对象。学校的课程也以阿文教义为主要内容，如《古兰经》、《古兰经注释》等，另外加授汉文，最初只有一个班的学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炮击上海，出动大批飞机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学校停办，校长达浦生便去沙特朝觐。回国后，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接见了他。达向蒋汇报出国朝觐情况之后，

提出希望国民党政府帮助在后方继续开办上海私立伊斯兰师范的要求，得到蒋的允许。校址最初考虑设在成都，后来决定设在平凉。这是因为西北穆斯林较多，达浦生本人民国初年在甘肃教育司当过科员和督学，与甘肃教育界的回民和宗教界都有相当的联系。蒋介石批准学校经费由西北行营按月拨发，并给予一定数量的开办费，学生按月拨发主副食费，每年每人发制服一套。1938年春在西安成立了伊斯兰师范办事处，并派铁子房和上海伊斯兰师范毕业学生常立章等去河南各地招收回族学生。校址在平凉东关，1938年秋开学。开始是两个班，按程度分一、二年级，一部分年龄较大、程度相差悬殊的另成一班，后来称为速成班。全校教师不过6人，另有职员三四人，连简师课程也不能完全开设，但阿文教义课程各班每天都有。学生每天都要参加五时礼拜。

我是寒假前应邀到伊师担任教导主任的。1938年11月初，我和妻子刘希真在四川资中女中教书时得西安友人及在渝学生函告，上海伊师在平凉复校，盼我去主持教务。我考虑：一则从事民族教育对我更有意义，二则平凉距边区较近，易于恢复我的组织关系，便不顾女中校方和学生的挽留，毅然携妻及二幼女上路，历尽艰辛，直到11月下旬才抵达平凉，见到达浦生校长。他把办学宗旨和安排告诉我，我提出把培养的目的分开：一部以培养小学教师为宗旨，按简师标准开课，每周酌加一二小时的阿文教义课；另一部培养阿訇人才，另行设班，标准另定。他勉强同意了我的意见，除速成班外，都按简师课程编排，但教师远远不够。达校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把在他那里寄住的客人、中共地下党员马寅也排了数学课，并兼一个班的导师。我只好把没人担任的教育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等课程都包揽下来。

达浦生校长在社会上的声誉较高（是当时内地号称的四大阿訇之一），政治上比较中立。学校用人左、中、右都有，行政也比较自由，地方党政干涉影响极少。学校一切活动都不象一般学

校那样严格依照部章规程办事。那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期，社会上的空气还比较自由，特别是在一些从战区来的知识分子中间思想是很活跃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静仁以甘肃回民教育促进会专员的名义到平凉为兰州知行中学募捐，到学校作了抗日救国、民主团结和改善群众生活为内容的讲演。北平回民中学早期入党参军的刘屹夫路过平凉时也来校讲八路军抗战的事迹。

我到平凉不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海固回民起义。学生被命令去医院慰劳镇压起义群众的国民党97师受伤的官兵，同时，在平凉召集了十几坊的阿訇和回民代表人物开会，威吓平凉的回民不要受起义群众的影响，声称不得支持等等。会场气氛紧张极了，几乎把所有回民都看成是敌人的样子。以后平凉街头便经常见到被押解来的“匪徒”，其中有白髯垂胸的老阿訇，也有十几岁的娃娃。学校里每天都听到海、固、隆、化一带“清乡”的惨状。有的学生家中也遭到“清乡”的灾难，学上不成了，还要变卖家产到平凉托人送情，赎保他们在押的亲人。暑假到了，当局要伊师配合他们“清乡”和安抚工作，命令成立“平凉中等学校学生暑假宣传队”，我担任总队长驻平凉，下设三个分队：第一分队去海原、固原和后来设县的西吉一带；第二分队去化平（今泾源）、隆德等地；第三分队去向记不清了。每队队员有学生10名左右。第一队队长马寅（中共地下党员），副队长是国民党97师政治部浪某，队员中有思想进步的学生沙里士等。第二队正副队长是张静修、马衡甫，队员中海里凡出身的学生多一些。第三队中间状态的学生较多。宣传的时间：第一队一个多月，第二三队一个月。入秋以后，已接近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的人员在学校更加嚣张，成立了国民党小组，还成立了三青团筹备处，叫各中等学校学生一律集体加入三青团，并进行军训，布置他们的亲信学生试探学生的思想行动。我那时也因为学校经费不公开等校务问题和校长感情恶化了，感觉孤立

和威胁越来越大，就以采取参加国民党的手段避祸，于11月中旬请假离开平凉去宁夏了。

1939年海固回民起义之后，甘肃省当局要加强起义一带地方的回民小学教育，作为“善后”的措施，便向伊师要教师。这时速成班的学生在校学习不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学校就把他们一律作为毕业生派到海、固、隆、化四县去当小学校员。1941年7月，伊师由私立改为国立，校名改为“国立陇东师范”。达校长从重庆聘请王梦扬来校继我之后任教导主任，另外还增聘了一些新教师。1942年暑假前，校长达浦生被遴选为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9月初我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在原来三个班的基础上，增招简师一个班，又呈准教育部增设了附属小学。1944年又先后增设了普师和阿文专修班。普师是暑假招生的，回、汉学生兼收，这是陇师首次招收汉族学生。阿文专修班设在平凉河南旅平清真寺内，招收的20多名学生几乎全是念过经的“满拉”或年轻的阿訇。阿专班阿文课和汉文课大致三七开。阿文课程有《古兰经》注释、教律、文法、宗教哲学等课程，大致相当于旧经堂教育的内容。汉文课有国文、史地、科学常识、教育学等。阿专班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正主任是王静斋，是当时号称的四大阿訇之一，他的出任，对阿专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提高了陇师的声誉。副主任白心斋，是当时河南颇有名望的阿訇。1946年冬，阿专班第一届毕业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到1947年，全校共有普师4个班、简师5个班、阿专两个班、附小7个班，在校学生六七百人。

从1943年起陆续修建新校舍，到1947年共修建教室5栋、宿舍6栋和其他一些零星房屋。图书由原来的数百册增加到万余册，还添置了一些教学仪器和医药用品等。1947年10月，我接到部令，免去校长职务，由安庆澜接任校长。因我一时无处可去，好在安庆澜是我过去的学生，留我在学校当教员，直至1948年3月初我才离开平凉。

1947年冬，陇师奉部令阿专班停办，原有的两个阿专班办到1949年夏天毕业。当年招收的新生全部遣散了。普师、简师也改为只招单班。平凉解放后，在平凉军管会的支持下，留在平凉的陇师学生尚有百余名，由该校教员马毅夫维持复校，以后又由吴岳泰任校长。不久，平凉陇东师范合并到平凉师范。至此，平凉陇东师范就不存在了。

张家川私立新民中学

李文著　李生民

甘肃张家川私立新民中学是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的前身，成立于1946年秋天，到现在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

张家川是回族聚居地。解放前，这里没有一所初级中学，一些小学生毕业后要到清水县上中学。由于绝大多数回民小学生因家境困难，路途遥远，吃饭不方便，不能上中学读书。1945年夏天，回族青年李文著、李楷顺从重庆成达师范高师部毕业回到家乡后，分别应聘到南后街小学、阿阳小学当教员。当他们看到家乡教育落后，连一所初级中学也没有，便立志要创办一所中学，让各小学的毕业生就地上中学念书。他俩联系各方面的人士，并得到南后街小学任教的马霭堂老师的搭桥引荐，同地方绅士马桓武、马重雍、马振河、马惠清等人会面，酝酿办学之事。马桓武、马重雍等人表示积极支持。经过多次协商，在1945年12月成立了董事会，推选马桓武、马重雍、马振河、马惠清、马仰融、马霭堂、李文选、马国选、麻鹏轩、杨国栋、肖子馥11人为董事，马

桓武为董事长。董事会设想在张家川办一所清水县第二初级中学，并派人到国民党清水县政府去征求意见。当时清水县政府不同意，理由是张家川办中学，一是没有教员，二是学生来源不足。受阻后，便着手创办私立新民中学。马桓武将自己在东关的前后两个院子的18间屋和后院的一个梨园作为学校校舍，房院门前的5亩多地给学校做操场，其他绅士和群众也捐献了部分资金。学校将捐献的资金在双城门张榜公布。因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经常贬值，捐集都以小麦计价，折合成小麦贷给商人做生意，赚些利钱，填补学校经费的不足。资金由校董事会统一管理使用，指定由张华林具体管理，按月支付教师的薪水和办公费。解放前，私立学校要收很高的学费，而新民中学不收学费，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都能报名上学。

董事会公推马重雍担任校长，不代课，不拿薪水。教员有李文著（任教导主任）、李楷顺、马鬻堂。1946年8月招收初中一个班。原计划招收50名学生，实际招了48名，其中45名是回族学生。1946年9月1日正式开学上课。开学时，校董事会聘请张家川邮政局局长刘振儒兼任学校英文教师。刘振儒是山东人，广东中山大学毕业，他看到张家川的教育很落后，愿意为发展张家川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不要任何报酬，义务给学生教英文。又聘请张家川税务所所长傅照林教动植物课，他是甘肃庆阳人，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愿尽义务教学。当时，李文著担任数学、地理、音乐课；李楷顺担任国文、历史、体育课；马鬻堂担任公民课。学校还有两名职员，一名叫张浞，作秘书工作；一名叫杨国栋，做事务工作。当时，李文著、李楷顺通过重庆邮电局的朋友金宏发订阅的《新华日报》，用私人信件寄往张家川，被清水县邮政局发现，报告给国民党清水县党部。县党部派人到学校追查李文著、李楷顺的政治身份。校长马重雍认为他们是学校的主要创办人，对他们的态度是“爱屋及乌”，听之任之。第二学期开

学后，国民党清水县县长刘福祥亲自到新民中学作政治考察，查阅了学校的图书目录，检查了学生的课程，在查到李楷顺给学生选编的国文教材中有高尔基、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人的著作时，把李楷顺叫到办公室质问："是谁让你给学生灌输高尔基、鲁迅思想的？"李楷顺回答说："是我自己这样做的。"刘福祥也没有吭声，回到县里后要下令逮捕他。李楷顺于1947年6月下旬离开学校，8月在上海投考了复旦大学。

新民中学创办起来以后，先后又从天水市、清水县聘请了一批教师。学校教学质量逐步提高，学生管理、行政事务等项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关系融洽。

新民中学是张家川地下党组织的活动重点。地下党的负责人沈遐熙刚来张家川时，活动的重点在农村，后来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为给全国解放准备干部，1948年在新民中学的教师中发展了4名党员，在学生中发展了5名党员。这些党员为迎接张家川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张家川解放时，学校有学生三个班，计120名。解放后，因各方面需要干部，学校把第一班37名毕业生和第二班的一部分学生共50多人全部输送到清水县委工作，特别是张家川解放后成立区政府，从领导到工作人员几乎全都是新民中学的师生。他们在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和减租反霸中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后，新民中学由私立变为公立，改名为清水县第二中学。1953年成立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学校又改名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杨建荣　王存珠整理）

西安市回民中学的创建和成长

马 景 华

西安市回民中学坐落在西安市北院门街中段，占地7752.24平方米。它是一所历史较长的学校。解放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学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已成为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是西安地区唯一的一所民族中学。从1949年到1982年，先后毕业了31届高、初中学生5870名，其中回民学生1143名，占学生总数的19.5%。

创 建 时 期

西安市回民中学成立于1944年，是由回族冯耀轩先生等人倡办，经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批准的。当时的校名是陕西省立西安第一中学分校。第一届招收初中两个班，学生暂在西安清真大寺上课，回汉学生兼收；第二年，又盖了3座教室，并改建旧房10余间，增招初中两个班，改名为陕西省立西安第三中学。到西安解放时，这个学校已毕业4个班，学生约160人，其中回民约30人。当时学校仅有初中7个班，没有图书、仪器，房屋破旧，教学设备极为简陋。西安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员、教师刘昭九团结部分进步青年教师，为保护学校，迎接西安解放做了很多工作。

逐 步 成 长

西安解放后，学校获得了新生。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师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

“解放军为什么会胜利？”“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的讨论；组织师生上街扭秧歌，歌唱人民革命的胜利；宣传支援解放大西北等各项政治活动。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学生会，建立了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上级政府任命西北大学杨兆钧教授担任校长，接受了原陕西兴国中学的两班高中学生，又招收了两个班高中学生，成了一所有高初中的完全中学。与此同时，学校调整了部分课程，取消了公民课，开设了政治课。以学生宁秀云、易东林、王玉堂、刘志贵等为骨干组成一个秦腔剧团，排练了《穷人恨》、《血泪仇》等剧目进行演出，受到西安与外县人民的欢迎。由于学校是公立的不收学费，因之，西安近郊及外县来投考的学生很多，由陕北南来干部的子女报考的也不少。学校为了适应这种状况，为新生安排了宿舍，最多时在校学生达百余人。1949年暑期，学校选派教师参加教育厅举办的政治学习会。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又选派一名青年教师去陕甘宁边区教师研究班学习，并抽调部分教师参加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深造。这些教师学习归来后大部分成为教学骨干力量，学校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以沈钧儒为代表的大西北慰问团经西安时，还给学校赠送了一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旗。学生篮球队相当活跃，在西安地区锦标赛中多次获冠军。学生中参军和参加军干部及考飞行员者多被录取。1951年，为开发西北石油工业，经石油部和陕西省政府协商，将学校高中学生全部转出，另成立了西安石油学校。

1951年陕西省教育厅选调学校回民青年教师报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专修科（后因全国大专学校院系调整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专修班由苏联专家授课，使用苏联大专学校教材，教育学一门以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所编教材为主。结业后又到旅顺、大连等地苏侨子校参观见习，后仍回校。使用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学，一时在全国已成为一股热潮，这个学校因有教师在专修班

学习过，更受到教育界重视。陕西师大等大专院校先后来校实习，外县的学校也纷纷前来参观，还把一些经验材料印刷成册，供人参考。1953年西安市初中升学考试中，这个学校名列全市前茅。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实现了学校教育以教师为中心，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中心，政治思想教育非常活跃。全市初中升学考试，这个学校政治课、数学课、语文课三科的成绩分别名列全市第一、二、三名。

炼 钢 废 学

1957年起，学校又增招高中生两个班。1958年，由于提倡学校大办工厂，这个学校响应号召办了一个翻砂厂，教师带领学生以多数时间投入劳动，“炒毛铁”，继之又开始吹氧“炼钢”。表面上轰轰烈烈，还不断受到表扬奖励，但课堂教育大受影响，教学计划不能完成，文化课质量逐渐下降。后来虽经纠正，然而教育的整个质量没有起色。同年，学校由市下放莲湖区领导。1959年又把学校的高中部分师生调拨到市二十五中学，学校成为单纯的初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这个学校和全国的学校一样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图书、教学仪器损失一空，教学设施、教室及桌凳、门窗遭到严重破坏。最为痛心的是教师及行政上多年辛勤积累的教学经验资料等完全被毁，教师们一生心血成为泡影，回族学生从“文革”前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2％下降到8％。

雨 过 天 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雨过天晴，学校复苏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导下，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为学校被批斗审查的三名干部教师和23件冤案平反昭雪。学校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先后进行了反对“两个凡是”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以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职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积极性；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增强了民族团结；恢复了按教育规律办事和考试制度及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规章制度。1980年，西安市教育局拨款100万元为学校新建了2000平方米的教学大楼，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正 式 改 名

1981年，西安市委在检查全市民族政策落实情况后，为进一步办好我市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经市政府研究决定于1982年将学校正式改名为西安市回民中学（完全中学），并按重点学校对待。1982年9月17日西安市政府在校召开了大会，校友们都踊跃前来祝贺，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全市唯一的一所民族中学在古城诞生了。中央民委对这个学校极为重视，先后两次拨款，计1981年拨专款4万元，1983年拨专款10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增添教学仪器、图书等教学设备。继之又多次给予补助拨款，帮助学校增置了少数民族学生3个高考补习班。1983年后，又增招了少数民族4个职业班，2个财会班，2个旅游班。从全国恢复高考后，这所学校升入大专学校的学生共计106名，其中回民学生46名。截止1986年学校有初中11个班，高中7个班，学生总数758名，其中少数民族学生432名，占57%。教职工103名，其中民主党派成员8名。学生中团员173名。学校有理、化、生物实验室各一个，按普通完全中学课程要求，教学仪器齐全，还备有电脑微机、收录机、电影机、幻灯机、中外文打字机等，图书一万多册，订有报纸28种、计50多份，各种杂志67种、134份，体育器械多种，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西安第一所回民完全小学

马　希　明

1932年前，西安回坊虽有几处初级小学，如精一、崇实、明德等，但均无高级班次。所以从初小毕业的回民学生，有因家境贫困协助父兄经营小商小贩而辍学的，有因回坊无高级小学又不习惯去别处升学中途而废的，以致很多回民子女不能升学深造。

1928年，陕西回教公会主席冯梦麟（瑞生）、委员孙庆（锦云）商定，向当时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黄统（天行）要求，在回坊设立一所高级小学以解决回民子女的升学问题。经多次交涉，终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

1930年冬，杨虎城将军回陕任主席，冯梦麟、孙庆晋谒时，又提出上述要求，当蒙杨主席批令长安县县长陈志坚设法筹款，仍因重重困难还是未能成功。后来李范一任省教育厅长，适有安徽籍回民仝道云女士供职教育厅，冯梦麟、孙庆又多方与之周旋，虽得到仝女士的帮助，可惜亦未奏效。

1932年，李百龄（寿亭）任省教育厅长时，冯、孙屡次向其恳求，并多方奔走，最后经由“省政务会议”通过，在回坊设立实验小学。聘冯、孙二人为筹备委员，与教育厅督学潘莲舫共同筹备，选定城隍庙后街中段北侧的第十八陆军医院东偏院为校址。这个地方系陕西省立一中东宿舍，今市二十五中学东邻。校门面南，砖木结构，门楣上镶有“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木质匾一面。迎面屏风两扇，从屏风东西两侧可以出入学校。校门北面门

房5间，东4间为办公室，西一间是通往后院的走道。校门内西侧有一小屋是传达室。进入办公室北边的院内东西两侧各有厢房3间，东为事务室，西为储藏室。北面有一隔墙，中置圆门，圆门对面房子两间，是校长室。校长室东侧有一砖砌小圆门，是通往后院的要道。后院共有坐北面南宽为10间的两坡房6排，一、二排为校员宿舍，余均为教室，后面还有礼堂，礼堂后面的空地是操场。校址东邻为金亿成泡馍馆及居民院，西、北与第十八陆军医院毗连，南是庙后街。

1932年10月，筹备就绪，冯、孙二先生即辞去筹委职务，由潘莲舫督学代理校长，正式开学。校名定为“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因开学时间过迟，学生不到百人，暂分5级4班，由于一、二年级学生太少，合并一班上课。当时教师有胡定章、李逢源、孙连城、马赞侯、袁建基、胡景通（现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童培芝等。

1933年，教育厅改高中附小为第一实验小学，改该校为第二实验小学。周学昌接任教育厅长后，委西安回民大学生冯增辉（耀轩）任校长。民国23年（1934年）又改校名为“陕西省立西仓门小学”，校长改由河北省回族大学生王世琛（献之）接任。教师增加了马图轩、吴树仁、刘德润、马子勋、姬荆顺、陆淑德、李慕英、贠玉堂等。民国24年（1935年）又由李逢源继任校长。我于民国24年（1935年）上半年在该校毕业，考入陕西省立第一初级中学（今四十一中）。因师生谊深，所以时常来母校看望老师。我们虽已离校，曾在音乐老师刘德润（民盟盟员）的鼓励下，由学友王维祺（曾任中国科学院甘肃省分院副院长）、马士年（现任市二十五中学教师）、王素莲、周毓琴、马希明，还有已故的马俊英、王湘、朱幼贞等组织了“西仓门小学毕业同学学友会”，会址就设在校内。适逢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卖国政策，

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来，西安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我们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到西安西郊农村进行宣传。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我们还以歌曲、话剧进行过宣传，节目有“大刀进行曲”、“抗敌歌”、“打回老家去”、“长城谣”和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

1937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成立了“抗敌后援会”，西安各界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西安回民学校也成立了“陕西抗敌后援西安回教学生支会”，会址仍设在该校第五排最东边的一间房子。其成员已故的有：马生金（少杰）、马昌英（俊卿）、马俊英、马毅、金长麟、乌光炎、马骞；现健在的有马士年、铁锡光、刘希贤、马骕、马志明、马希明、海仪生等。当时主要是西安高中、一中、二中回民学生，活动是摘录各报抗日消息，配以大幅漫画（马毅绘制），编成大型墙报，张贴于回民聚居的洒金桥、大学习巷口、麻家什字路口，号召广大回民群众爱国爱教，激发抗日救国热情。这一爱国活动得到当时校方的大力支持，因之得以顺利进行。

以上是个人记忆中该校建校初期的一些概况。我毕业后，情况就不了解了。

新疆回族文化促进总会

郭　德　　马登贵

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更是无

从谈起。1933年，迪化发生了震憾全疆的“四·一二”政变，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利用白俄和东北军的力量赶走了金树仁，盛世才乘机登上了新疆最高统治地位——督办的宝座。他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提出了一系列革新旧政治的主张，其中还有“发展文化，提倡教育”的措施。这些主张和措施对于改变当时新疆文化教育落后状况，特别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回文会）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产生的一个文化教育团体。回文会建立以后，致力于促进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回族爱国进步人士，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回文会成立伊始，我就参加了该会的工作，是该会历史的见证人，现将我所了解的回文会的历史情况概述如后。

1933年，迪化回族中的知名人士于镇国、兰彦寿等人根据省府关于新疆各民族都准备成立文化促进会的要求，召集迪化陕西大寺、南大寺、西宁寺（现青海大寺）、坑坑寺、老坊寺、巴里坤寺、撒拉寺、西大寺、凤翔寺、邠州寺、北坊寺、头道巷寺、山西寺、肃州寺、宽巷子寺、兰平寺（现兰州寺、永登寺）、宁固寺、城内坊寺、西河街寺、西大桥寺、老满城东、石家园子寺、大湾寺的宗教人士和代表开会，决定在新疆成立回族文化促进会，提高各地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记得于、兰等人首先分别访问在回族中有声望、有代表性的耆老，向他们宣传成立回族文化促进会的意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取得一致认识后，由于镇国、兰彦寿、拜永泰阿訇、马德新阿訇和白玉林、马缓之、李德义、马国骏、苏美华、拜永思、马应泰、安吉寿、马福寿、安绪武、马毓文、郭德等人发起，进行筹备工作。具体办事人员有安绪武、马毓文、郭德等人。1934年8月初在迪化固原寺召开了成立大会，正式宣布新疆回族文化促进总会成立，并决定着手开展有关各项业务工作。

第一，为了发展新疆回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回文会首先具文呈报省教育厅备案，并请省教育厅领发印章，起草宣言，通知全疆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县也要成立回族文化促进会，积极集资筹办小学。教育厅通知下达后，伊宁、绥来、塔城、额敏、乌苏、绥定、景化（呼图壁）、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焉耆、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奇台、阜康、乾德（米泉）、承化（阿尔泰）、哈密等县，先后成立了回文会。不久各县在回文会的积极筹备下，多方募捐经费，先后办起回族小学、民校、夜校。各县回文会还把创办的回族小学班次、入校人数等情况及时报新疆回文总会备案存档。

第二，在迪化回族群众中进行重点募捐，筹备兴办回族文化和教育经费。当时捐款最多的人士是白玉琳（白老四）、马绥之，其他人也捐了不少，由于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了。

第三，利用筹集到的资金，制做学生桌凳200套，还制做了各种教具、黑板、教桌等。制做桌凳的木匠马长清师傅为支持回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只收一半工钱，其余的50％收入作了捐献。

第四，整理固原寺、河州寺、南大寺的一些舍房作为开办小学的教室。回文会在迪化开办小学两所。在河州寺、固原寺办的小学为回文会立第一小学（后发展到陕西大寺、西宁寺分校），南大寺为第二小学（后发展到坑坑寺、巴里坤寺分校）。回文会先聘请马文俊（汉族）为一小校长，不久调走，又聘柴普森（汉族）为校长（兼职），吴启钧、常天异、张钰（均系汉族）为兼职教员，聘拜永寿阿訇为临时经文教员。会立第二小学聘郭德为校长，安吉寿、海××、拜天民为教员，马长清为经文教员，他们均系回族。指定郭德兼任会立一小教导主任。会立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普通小学一些课程相同，只附加经文课。男女生同班，并招收汉族学生，当时汉族男女生入会立学校的还不少。

第五，利用各寺坊房舍开办夜校，如在东坊寺、南大寺、坑

坑寺、北方寺、陕西寺等处均开设民众夜校班，在回族城市居民中开展扫盲教育。

第六，1935年下半年又创办妇女初级职业学校一所。校长马治国，第二任校长为郭德。该校的课程设置与普通小学相同，还加授缝纫课。校址在北方寺内。回文会购置缝纫机10台，捐给该校教学使用。后来会立一小、二小、妇女初级职业学校奉令改为公办学校。一小改为省立第八小学，校长马福寿（回族）；二小改为省立第十一小学，校长郭德；妇女初级职业学校改为迪化初级职业学校，校长马治国。

1950年夏，回文会奉命移交给新疆民主同盟促进会，从此结束了会务活动。

昌吉县回族小学教育

王　玉　春

解放前昌吉县回族居住区除县城外，就数二六工、河州工村，其他农村也住有少数回民。当时回族文化教育落后，全县没有一所回民小学。1936年开办的县回民小学校和河州工学校是回民教育事业的开始。本文就这两个学校的建立和发展情况简述于下：

县回民小学的建立和发展

30年代昌吉县有3万人（当时统计数字），其中有回族人口4000左右，全是文盲。昌吉县的回族学龄儿童只有少数在清真寺

坊学习经文，城镇的儿童不上学，大都手提食品筐筐，满街叫卖。农村的则整天放羊、放牛，帮助家庭劳动。

1936年，盛世才提出要发展新疆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昌吉县长乔根重视此事，他同回族绅士洪聚海共同致力于回民教育事业，在群众支持下办起了昌吉县回族小学校。首任校长是迪化师范毕业的苏大章（回族）。在校学生五六十名。校址在南关老西街杨逢泰的四合大院（杨家在马仲英战乱中全家被民团杀害），教师有张春安、刘继善、魏春喜、苟建贞等人，他们都是迪化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回民小学校成立以后，教师配备齐了，桌凳全是新的，教室也刷白了，但学生人数太少。因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回民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念书。为此县里成立了一个劝学委员会，挨家挨户向回民进行宣传，动员他们送子女到校就读。回族文化促进会邀请各寺坊阿訇乡老开会，决定让阿訇在主麻日动员家长，送自己的孩子到学校念书，这样到校学生人数才逐日增加。城市儿童就学问题解决了，农村回民儿童教育怎么办？回族文化促进会同各乡长联系，派教师下乡劝学。学校还为就学儿童准备食堂、住宿房屋。各地学生自带口粮、副食品到校读书，农村回族儿童也可以上学。在校的学生人数由七八十名增加到一百二三十名，共办了6个班。省教育厅规定回民儿童班每周加授经文课两节，学校增设经文助教一人，由学校聘请经文水平较高、在回民群众中有威望的人担任，从而解除了回民不愿让子女念汉文的顾虑。1939年学校正式招收女生，教师由汉族女校调来王玉范担任。劝学委员会动员20多名回族女孩子入学就读（后来发展成复式班授课）。这个时期，教师流动性大，每学期都有教师调出调进。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教师的工资太低，社会上也称教师是穷教师。盛世才根据这一情况，规定全疆每月发给教师45斤（老秤16两）面粉以解决生活困难。

河州工回民小学

河州工回民小学是当地回民自发办起来的。河州工村回民人数很多，都是文盲。群众自发要求办学校，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化。经县上批准，于1938年正式成立河州工学校。学校聘请退伍军官张世祥任校长兼教师，开学时有20多名学生，暂借寺坊房屋作教室。1939年群众募捐新建了校舍，张世祥校长因有事请假，又调县回族小学校教师宗志远接任。1940年学生人数五六十名，4个年级，分两个复式班授课，并聘请马一清为经文助教。1942年学生人数达到七八十名，分3个班上课。农村的学生居住分散，离学校远的骑着毛驴上学。

1944年，因为教师的流动和时间的影响，学校遭到人为的破坏。解放后，这个学校才恢复了生机，现改为幸福学校。

国民党时期的回民小学

1944年国民党在新疆实行地方保甲制，教育方面也实行中心国民学校和国民学校的制度。中心国民学校人员配备齐全，实行四二制，学生班级10班以上。国民学校不设教导主任，学生只读到四年级就算初小毕业，然后保送到中心国民学校继续读高小两年。

1944年三区（伊塔阿）爆发革命，昌吉县人心恐慌不安，有的逃回关内，有的移居迪化。回民小学被驻军占用，学生解散回家。1945年春季，部队移防，学校腾出，这才正式开学复课。但此后，由于战事原因，人心不安，又加上物价上涨，教师生活受到威胁，工资拖延几个月发不下来。盛世才时期给教师补助的45斤面粉已取消，教师无法生活。回民学校的学生亦由原来的100多名减到70多名，昌吉的回民教育衰落下来了。

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吴 敦 善

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鉴于宁夏文化教育落后，人才奇缺，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培养师资，遂于1918年创办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该校兴建时的全部工程设备费以及成立后的教职员工资、学生的伙食津贴和公杂费等，统由马福祥的敦厚堂支付。校址在原马家公馆后面（今兴学巷），共建4个院落，全系相对称的砖木结构的古式出插房屋。其建筑规模之大，是当时银川的甘肃省立“五中”和“八师”有所不及的。为了整齐雅观，鼓励学生奋发向上，还给全体学生发单制服一套，以备在春秋两季旅行和集会游行时穿用。

学校分初小、高小、师范3部分。初小学生全是学校附近的儿童，90％以上是汉族子弟。高小和师范生大多是来自外县的回族学生。在我求学期间，全校约三四百名学生。高初小学的教材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高小有语文、算术、修身、自然和史地等课。另外，高小和师范每周有两节阿文课（高小另设蒙文课两节）。以前的师范班按教育部规定的正规师范课程进行教学。在我们这一期着重进修国文，内容有教学法、古文释义、四书和秋水轩尺牍等，称为国文专修科。每天上6节课，体育课上军训。师范学制3年，毕业后回原地，由当地学校校董聘请任教。

我从高小到师范共学习5年。校长先后有荀天枢（天水人）、渭树霖（青海人），监学肖景河（临夏回民），专职教师张天吾、史良弼、吴梅溪、马文明（银川回民）等人。还有两位兼职教师，是当时宁夏镇守使马鸿宾的秘书。阿文教师由当时银川东大寺王静斋阿訇担任。蒙文课先后由姓杨和姓郝的两位蒙古族教师担任。多数学生对蒙文课不感兴趣，认为学习蒙文无用。因而对学习这门课抱敷衍应付态度。

这个学校从名称看主要培养蒙回两族青年，实际在成立初期，还有过几名蒙古族学生，但不久相继辍学。我在校期间，除了一位蒙古族教师外，连一个蒙古族学生也不见了。

在蒙回师范学校设立的同时，官府将贺兰、平罗、金积、同心各县回民较集中地区的初小和高小名称上加上“清真”二字，校内附设宁夏回民教育劝导所，设所长一人。每年春秋两季对回民地区的初小和高小各进行一次视察，指导教学，帮助解决问题，并选拔升入师范的学生。我就是经过劝导所苏三光所长选拔升学的。

我在蒙回师范学习时，每月初和同班同学去敦厚堂领取当月的津贴制钱两串（当时校里为数不多的临夏回汉学生，每人津贴是3串），基本上够交一个月的伙食费。我是一个贫寒家庭的子弟，主要依靠这笔津贴维持生活，才得师范毕了业。我于1927年踏上了教育界，先后在通昌清真小学、灵武崇兴寨完小、省立金贵完小、通昌完小和甘肃省立西吉完小任教员和校长，直至1952年夏才离开教育界从事政府行政工作。

蒙回师范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29年底停办，毕业的回民师范生共约1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贺兰、平罗、金积、同心等县自己的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马福祥与回民教育

宁　文

马福祥一生，在夤缘角逐于政治舞台的同时，还凭借他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兴办回民教育，客观上为回民教育的兴起起了积极作用。他兴办回民教育的动机，不外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民族意识两方面，而以前者为主。他曾为兴办回民教育，陆续捐资达数十万元。

本文在整理过程中，承马杜亭、刘柏石、马汝邻、马廷秀、苏盛华、冶正刚、金玉书诸先生提供资料，谨此致谢。

马福祥倡办回民教育，始于他任宁夏护军使的后期。1918年，他出资设立蒙回师范学校于宁夏府城，并设“蒙回教育劝导所”于该校内，“派员下县，提倡督促各县回族聚居地方成立清真小学，劝导蒙回子弟入校学习”①。在1918至1920年间，他先后在宁夏道所属各县倡办回民小学59所。其中，宁夏县高级小学2所，初级小学5所；宁朔县初级小学5所；中卫县初级小学2所；平罗县高级小学2所，初级小学16所；灵武县高级小学2所，初级小学4所；金积县高级小学1所，初级小学8所；镇戎县（今同心县）高级小学3所，初级小学9所。总计高级小学10所，初级小学49所，在校学生约1230余人。马福祥共捐银60两、铜钱5750串。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宁夏累遭雹、洪灾害及兵匪之祸，特别是1929年马仲英到宁和1934年初的孙、马之战，加上马鸿逵对

教育横加摧残，任意停办学校，到1934年，即马鸿逵主政宁夏的第二年，马福祥倡办的59所回民学校，停办了21所，只剩下38所，有学生700多人。

蒙回师范学校校址在宁夏镇守使署前（今银川市中山北街回民中学校址），附设高、初级小学各一所。共有各种房屋60余间，全系马福祥“自置自修私产”。该校设有监督、副监督各1人，校长1人，教职员工16人。经费每年需大洋4500余元，由马福祥付给。②

1919年秋，蒙回师范正式开学。先收高小3班，初小4班。学生多为回民子弟，有少数汉、满、蒙族子弟。1921年，又招收回、汉、蒙、满子弟64名，成立师范班，学制2年。所学课程有：修身、历史、国文、算术、地理、经学、理科、体操、手工、图画、乐歌、英语等。③为了照顾蒙回学生的特点，每周分别为他们上两节阿拉伯文课和蒙文课；回族学生可上清真寺礼主麻（星期五的集体礼拜）。学校不向学生收学费，学生入学时还可领到制服一身，课本由学校发给，每月发生活费若干。④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一所回民中等师范学校，蒙族学生开始还有几名，并有一名蒙族教师，以后陆续退学了。

从1921年至1930年，蒙回师范学校师范部先后毕业学生5届，约230人，都到各县从事教育工作。

马福祥解决各县回民学校经费的办法是：开办费采用捐款的方式，经常费用靠捐献基金、学田、税款等收入。他自己先捐白银1500两，在宁夏县的纳家户（今属永宁县）建高级小学1所；又给各县做象征性捐款，共计银60两，铜钱500多串，以促使各县回族财主捐款办学。

1919年冬，马福祥回临夏路过兰州，有2名小学毕业无力升学的回族学生拜访他，诉说升学的困难，请求帮助解决。马福祥遂自捐大洋1500元，募捐2500元，交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委托

该会每年用此款作津贴，选派回族优秀学生到外省深造。该会前后用此款派出11名学生到外省深造。后来此款被人贪污，马福祥就直接供给这些学生费用。马福祥还在家乡临夏捐款办了几所回民学校，到抗战前夕，仅韩家集中心小学就有一至六年级学生243人：分校6处，学生500余人。未几，又成立了云亭中学⑤。

1922年，马福祥应段祺瑞政府之命出任绥远都统，后任西北边防会办、航空督办等职。1928年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或兼任国民党北平及开封政治分会委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随着宦迹的转移，马福祥开始在内地倡办回民教育。

20年代，王浩然等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在内地创办的回民学校只有少数在艰难中挣扎。一些小学毕业的回民子弟因为没有回民中学或交不起学费无法继续求学。例如王浩然在京创办的清真第一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交由官办，虽然每年都有毕业生，但是一则因为无人提倡，二则因为多数家境困难，故升学者少。至1928年止，升入中学者仅40余人，而其中能完成中等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

国民党政府对回民教育的落后状况置若罔闻，不仅引起一般回族群众的不满，而且引起一些回族上层的不满。马福祥就曾婉词指责说：回汉人民“同在青天白日之下，岂宜任其长期闭塞，独抱向隅！”⑥一些回族上层和知识分子纷纷募捐筹款，设立回民学校，得到马福祥的支持。其中主要的有：发起成立西北公学，扶植成达师范，参与扩建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和敦化小学，发起创办《月华》杂志等。

发起成立西北公学：1928年秋，马福祥与一些回族军政上层和知识分子在北平相会，“大家谈起各地回民文化的落后，稚愚鄙塞”⑦，“会议创设清真中学于北平牛街，推祥为董事，孙君为校长，收纳回民子弟，教以艺能，励其品节，广辟进身之

途，借储国家之用，冀于全国回民，有所裨益。”⑧于是，以“牛街旧守备署为校址，诸董事群策群力，共筹开办”⑨。先招学生50名，编成一班，于当年9月开学。经常费用，由马福祥每月给大洋40元，其余募捐。1931年，以“斯校既欲振导回民，而回民以西北为众，是以经营西北为本校最大责任，又以校之名称，倘限于教，量或未宏”，⑩乃由马福祥、孙绳武具呈国民党行政院批准，将清真中学改称西北公学，并予补助费每月1200元。到抗战前夕，该校有中学部6个年级，小学部6个分校，学生共约千人。

扶植成达师范：成达师范是1925年马松亭阿訇与穆华亭、法静轩及济南道尹唐柯三等人创办的，校址在济南捍石桥穆家东门清真寺内。办学伊始，招生10人，“一切活动的房屋场所均付阙如。”⑪不久，从北平某大学毕业到山东大学任教的刘柏石等回族青年，帮助制定规划，增招学生20名，勉强上课。到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成达师范被迫停办。马福祥在北平闻知，认为应迁至北平续办，并把他在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房舍作为校址。这所房舍原是马福祥在绥远都统任内派当地阿訇李宗庆到北平修建的，准备办北平穆民大学院，后因故未果。至是，成达师范得以迁入，继续维持。马福祥在经济上给成达师范以大力支持。《月华》杂志1930年2卷18期上载有成达师范学校民国19年6月份收到捐款宣单一张，在当月收到的156元捐款中，马福祥独捐100元，另外8人捐26元，两个商号捐30元。这样的宣单，在1929年至1932年的《月华》杂志上有27张之多。实际上，马福祥捐助成达师范的钱，远不止这些。原成达师范创始人之一、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马松亭阿訇对笔者说：“成达师范自1929年春搬到北平后，将从山东带来的13名学生和北平各寺的4名学生编为一班，当年秋天招收第二班，学生64名，以后隔年招生一班。到1932年秋天马云亭（云亭为马福祥之字）去

世时，师范部共招收了3班，毕业一班，小学部两班。每收一班，马云亭给开办费500元。他还拿出一笔资金给北平的古玩商作股金，所得利息为成达师范开支之用。成达师范的经费，一半是马云亭给的，一半是由中国回教促进会北平分会在各寺乡老中募捐的。1931年，马福祥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时从该会经费中每月拨款700元给成达师范。他去世后，这笔款子是成达师范唯一的大宗收入。”成达师范迁入北平后，不仅经济来源比较充足，学校规模日益扩大，而且课程内容也有了革新。在济南时，该校宗教学科占60％，普通学科（语文、常识等）占40％。迁到北平后，开设普通、宗教、社会、教育4个学科共24门课。其中宗教课7门，占1／3弱，比王浩然“经学中兼习汉文及科学”的回文师范学堂进了一步。

参与扩建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该校创办于1929年，由哈少甫、马福祥、马晋卿、蒋星阶等集资建筑3层楼校舍一所。下两层开办敦化小学校，由沙善馀任义务校长，并教授英语课；第3层即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由校长达浦生主持校务。马福祥去世时，该校经费日绌。为此，达浦生在1934年11月赴宁夏，希望能得到身为宁夏省主席的马鸿逵的赞助。曾任当时宁夏中阿学校校长的苏盛华先生对笔者说，达浦生到宁，受马鸿逵冷落，住在中阿学校。达曾对他说：“没有马云老（指马福祥）就没有我们伊斯兰回文师范。马云老去世时，前后资助我校数万元。现在马云老才故去两年，马少云（马鸿逵）主席就一个钱也不给了。真没想到，云老的儿子竟不象云老！”没几天，达浦生便悻然离宁而去。此后，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在艰难中继续办下去。抗日战争上海失陷后，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被迫停办，达浦生组织抗日宣讲团到中近东阿拉伯国家宣传中国抗日的意义，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同情与支持。他回国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把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迁到甘肃平凉，校名改称

“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1939年春，经达浦生多方奔走求助，该校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解决了长期经费不足的困难，校址仍设平凉。抗战时期，上海敦化小学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热心回民教育的人士的支持下，敦化小学复校，并扩建了中学部，群众公推沙善馀继续担任义务校长。该校到解放后由私立改为公办学校。

发起创办《月华》杂志：回族自己发行刊物，始于1908年留日回族学生所编《醒回篇》。从那时到1929年的20年间，云南、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相继有回族刊物不下20种，但创刊的多，因人力财力不足停刊的也多。1929年10月，马福祥与一些回族人士会晤于北平报子胡同私邸，谈及振兴回族文化教育问题，马福祥认为，“发行刊物，实为振兴吾教之要图。”于是，由在席5人为发起人，创办《月华》杂志，公举马松亭董其事，马福祥捐资筹备，并月出经常费以免中辍。这样，《月华》杂志于1929年11月5日刊。马松亭说，《月华》发行初期，“常川捐款，惟马云亭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自民国18年10月以迄于21年6月，每月兑付百元无缺。”1932年8月马福祥去世后，马鸿逵即停捐。《月华》发行初期为旬刊，抗战期间一度中辍。1947年改为月刊，行销于国内外，最高销售额曾达4000份。《月华》主要是一个宗教刊物，也宣传、倡导回民教育的改革和普及，对回民教育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马福祥对明代以来回族宗教学者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十分重视。1922年至1932年间，他前后数次出资，在上海中华书局、交通书局及北平清真书报社翻印王岱舆、刘介廉、马注、马复初等人的汉文著述30多种以广流传。其中有些著作因他刊印而免于散佚。

此外，陕西两所女子清真小学的建立，甘肃导河（临夏）清真高级小学的续办，无不得到马福祥的资助。他生前曾提出担负

成达师范学校第一届留埃学生的一半经费，他去世后，马鸿逵尚能遵其遗嘱（他临终时嘱咐后代要将他的遗产用在发展回民的事业上），从遗产中拿出5000元（大洋）送这些学生出国深造。1934年，马鸿逵建立了中阿学校，将马福祥的部分遗产支付该校费用。马福祥的夫人马书城也从留下的资金中拿出3000元（大洋），捐献给北平新月女中。回民子弟中的不少人因得马福祥资助而免于辍学。

马福祥对回民教育的倡导和支持不局限于经济方面。他在各种场合，常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向各界呼吁：应当遵照孙总理扶植弱小民族的遗训，推行蒙、回、藏各族教育，使他们与汉族“同为健全之国民。”⑫1931年，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设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员会并给予边疆教育基金的议案被通过。不久，一些热心回民教育的人拟在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指导之下，成立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这一建议作为马福祥专案呈行政院获准。由于某种原因，该会在马福祥去世一年之后才在南京成立，定名为“中国回教教育促进会”。

马福祥一生，历宦清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有“三朝元老”之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做出评价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仅就他倡办回民教育一事，根据有关资料和向几位知情人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供研究者参考。

注解：

①刘柏石《宁夏蒙回师范学校与蒙回教育劝导所》，未发表，原稿存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②《朔方道志》卷十《学校志·学校》

③同②

④同①

⑤苏盛华《甘肃省临夏县私立云亭小学视察报告书》，载《突崛》1938年第5卷第1期。

⑥⑦见《月华》1929年第1卷第1期。
⑧马福祥《西北公学纪念册序》,载《月华》1934年第6卷第22至24期合刊。
⑨孙绳武《校史述要》，载《月华》1934年第6卷第22至24期合刊。
⑩同⑧。
⑪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载《禹贡》1936年第5卷第11期。
⑫见《月华》1929年第1卷第2期。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

孔祥录　喇秉德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青海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而占有重要的地位。

青海回教教育，除伊斯兰教经学教育而外，历史上正规的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以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育，因宗教、风俗习惯和民族歧视等方面的原因而发展迟缓。民间重武轻文，重经轻书，故以习武中武举者及从事宗教文化者颇有其人，正如《西宁府新志》所载“郡东关回民甚多，多习回经而不读书”。直至清乾隆年间，西宁府佥事杨应琚前后宦居西宁10余载，因感这一带文化落后，少数民族强悍难制，欲以文治教化启蒙人心，遂致力办书院，举社学，兴义学。乾隆十一年（1746年），他在西宁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东关举办“回民社学”一处，“创设学舍，延师教读”，今西宁东关大街小学所在地即其故址，其东侧胡同因此得名“社学巷”，沿用至今。当时，因回族子弟多习经文，不愿读书，故成效不大。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左宗棠在镇压了南北回民起义后，从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系

列意在彻底杜绝回族反抗斗争的“善后”措施，除大规模的强迫迁徙以“涣其群，孤其势”外，力图从精神心理上施加改造，使之“同我华风”，认为“欲化回汉之见，义学不可不设”，因而奏准清廷，在回民聚居区再度倡办义学，实施同化性教育。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署理陕甘总督职衔，命令地方官在各回民居住区开设义学，曾在大通、贵德、化隆、西宁等地设立了回民义学。但在民族压迫严酷的政治背景下，各地义学形同虚设，回民也几经劫难造成生产凋蔽、生活资料极度贫乏而无力供读，是故义学中回族子弟“从者殊寡”。因而，有清一代，青海回族始终未能享受到与满、汉族同等的文化教育，始终也未能改变文化教育极度落后的状况。到1912年，西宁回民社学增为二处，但虚应故事，学生人数仍不过20余人。1917年，在原社学的基础上成立同仁小学，入学学生增至100余人，这对于落后的回族文化教育依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1921年，西宁东关同仁小学校长邵鸿恩（汉族）和教员田生芳（回族）等有感于回族文化教育之落后，向当时任蒙番宣慰使兼甘边宁海镇守使的马麒建议成立回教促进会，得到马麒赞同，即指派邵鸿恩、朱富贵、冶生录、苏兆泉等人为筹备委员，马彦彪、杨万枝、马文魁等人为调查员，着手筹备成立促进会各项事宜。同时，马麒具文呈报甘肃省教育厅（当时青海尚未建省，设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属甘肃管辖）批准，定名为“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于1922年5月27日正式在西宁成立，马麒兼任会长，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马骏为副会长，会址设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

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自一成立就制订并通过会章，规定促进会的宗旨是“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提出“急应进行事宜，即筹备设立宁海清真学校”，规定在所办的学校“加授回教经文”、“加授简单回文（即阿拉伯文，后简称阿

文）”。该会在“办学规程”中规定，促进会所办各校校长必须“呈请甘边宁海镇守使加委”，定学校的休息日为星期五（伊斯兰教之聚礼日，阿拉伯语称为“主麻日”），以便“回文教员可率学生入寺礼拜并听‘瓦尔孜’（即伊斯兰教教义及有关的劝谕等）”。

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成立后，根据会章所定的宗旨，一方面充实和扩大西宁同仁学校，使在校学生增加到150名；另一方面，在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碾伯（1930年以前的碾伯包括今乐都、民和二县）、巴燕戎格（化隆）、大通、湟源、贵德、循化以及西宁等地设立清真小学7所，各小学招收学生50至100名。学校所需经费概由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拨给。

1929年，国民军孙连仲部进据西宁及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所辖地区，国民政府批准青海建省，由孙连仲任省政府主席。在此之前，即1928年因国民军刘郁芬部赵席聘师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强行派粮派款、拉伕征兵、纵兵肆意横行等诸因素激成马仲英事变，波及西北。国民军中以此多有人对西北回族心存疑忌，刻意防范。孙部到西宁后针对马麒等地方势力（包括马麒统属的“宁海军”）陈兵西宁。据说当时正逢伊斯兰教斋月，回民以夜晚封、开斋等活动更加招致猜疑，以为回民“谋反”，国民军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竟然在西宁大城门城楼和两旁城头上架炮对准东关回族居住地区，准备随时镇压，而当时处于炮口严重威胁之下的东关回族居民中居然无人出为置辩。是时孙部回族师长安树德（当时任国民军青海省省垣城防司令）因熟悉本民族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及时辩白澄清，方才解除了国民军方面的猜疑和威胁。安树德以此痛感青海回族文化落后，愚憨麻木以至于斯，于是极力呼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改变愚昧落后状况。任省政府主席的孙连仲正欲扩充国民军势力，进而打击和摧垮地方势力，遂听从安树德的主张，乘机以安树德代替马麒任促进会会长，另以西宁回族绅士刘善为副会长，又将原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正式更名为

"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是为该会第一次改组。同年7月在西宁增建小学一处。1929年下半年，中原大战在即，在西北的国民军各部陆续东去，孙连仲亦率部于是年9月离开青海东赴中原参战，省府主席由马麒之弟马麟暂代。蒋介石战胜冯、阎后，复命马麒代理省府主席，于是马麒重新委任冶生录为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长，刘善为副会长，同时修改会章，提出以"阐扬回教真理"、"灌输三民主义"为宗旨，规定"在各县得设分会"，以及会员必须遵行伊斯兰教各项道德规范，服从促进会决议，违章由促进会"酌量情节惩戒之"等原则，使之在组织上有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

1930年8月，马麒病故。当此之际，原驻化隆的马麒次子马步芳以国民党新编第9师师长身份赶到西宁料理父丧，国民党政府遂以马麟再次代理省府主席之职。1931年，冶生录、刘善分别辞去各自所担任的促进会会长、副会长职务，以师长兼西宁城防司令的马步芳兼任会长，以刘善之子刘元勋（即刘骏臣）为副会长。接着，改会长制为委员长制，省略了促进会名称中"教育"二字，称之为"青海省回教促进会"，是为该会第二次改组。据当时在兰州出版的《新甘肃》创刊号载文说：改组之初，"即以促进教育为急务"；于是，在湟中的鲁沙尔和上五庄，在贵德、化隆、大通、门源、民和、循化、互助、湟源、乐都、同仁、共和等地分别成立青海回教促进会分会，共计13处。每分会均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会员共3804人，其中以省垣总会规模最为盛大，有会员1400人，其余各分会会员以当地回族人口多少或数十、或数百不等。与此同时，马步芳专门拨款1万余元在省垣西宁划址修建促进会第一附属中学。各县、镇分会在原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所设之清真小学的基础上，重新设立初级和两级小学（即初、高级兼有的完全小学），其中大通14所，门源7所，化隆6所，民和10所，湟源、乐都、同仁各1所，西宁、贵德各2

所，鲁沙尔、上五庄和共和等凡已成立促进会分会的地方也均设立了学校，共约54所，学生7819名，教员160余人（另据《青海历史纪要》载：回教促进会自成立至1932年，在西宁设立了中学1所，附设小学2所；各县分会也分别设立了97所小学，共有学生5900余名）。学校和学生的增加势必引起师资缺乏的问题，于是，总会曾一度举办师资讲习所，以尽快培训教学人员，适应学校教学的需要。

1935年，在西宁东关水城门外新建校舍，设立青海回教促进会高级中学。1936年，国民党中央以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继于1938年正式任命马步芳为省政府主席。当此之时，甘肃马万福（人称“果园哈吉”）所宣传的伊斯兰教伊合瓦尼派在青海、甘肃等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以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为中心讲台的各地经堂教育也相应得以发展，这在客观上分担了回教促进会成立当初所定的“阐扬回教真谛”等有关宗教方面的义务，使得促进会在文化教育上有所侧重。在此情况下，总会恢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并在委员长下特设置教育长，并增设都兰、祁连分会，使分会达15处，划全省（主要是回族居住地区）为12个学区。不仅如此，还将马步青（马步芳的异母兄，曾长期率部驻守在甘肃河西地区）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创办的青云中学和马全钦（为马占鳌之孙，时任国民军旅长）在河州大河家创办的魁峰中学，也都纳入了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的管辖系统。总会继又在西宁举办芳惠医院、芳惠幼稚园和青海印刷局等文教卫生设施，直接归总会领导。从此，在领导体制上，又增置了职权仅次于委员长的教育行政专职负责人，使教育进一步成为促进会的重心。领导范围开始延伸到省外，扩大到甘肃河西、河州一带。

1936年，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立高级中学更名为会立西宁中学，设初中14班，高中3班，另附设简易师范1班，学生人数达1200余名。学校还发行《星月》刊物，宣传内容除遵会章规定

的“阐扬回教真谛，灌输三民主义”外，亦多刊登学生习作。

1940年，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会立西宁中学正式改为会立昆仑中学。改名后，致力于扩大校址，扩建校舍，增设班次，加强师范、幼儿教育，创办女子教育等等。此时的昆仑中学已有初中15班，高中4班，师范6班；附设小学16班，幼稚园6班，在校学生人数达2000余人。1945年又分别办起了昆仑中学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市内另设阿文女子小学5处（亦称女子经学）、幼稚园两处。共计117个班次，学生8516名，教职员646人。1942年至1946年，曾举办基层地方行政人员训练班，分期分批轮流训练全省区、乡（镇）、保长等人员，轮训完毕，亦随即停办。1942年，将蒙藏中学与昆仑中学第三分校合并，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迁往玉树专员公署。在此前后，撤销外县7所中学，尽量把学生集中到昆仑中学，以利于提高，从而使昆仑中学规模更盛。

昆仑中学校部（原址即今西宁七一路青海省军区所在地）占地数百亩，校门坐西朝东，正面有前后两大院落，建有中山堂、礼拜堂、图书室、仪器室、教室及教职员室、学生宿舍和自修室，共约数百间，其余空地为操场，约占全校的三分之一。学生衣食文具等均为公费，来自外县的学生全部实行寄宿。当时，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马鹤天先生来西宁参观了昆仑中学后称许该校“建筑壮伟，设备完全，为各省立中学所不及。”当此之时，昆仑中学将原会立西宁中学校办之《星月》改为《昆中校刊》，组织昆中校友会出刊《校友通讯》，促进会省垣总会也印行《教育通讯》。后来这三种刊物合并为《昆仑周报》，影响扩及省内外。40年代中、后期，在原任校长马霄石去职后，由马步芳兼任校长。

到1945年，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15个分会所设完全小学达85所，初小245所，在校学生总数达1.1万余名，其中各地分会所设学校、学生人数依次为：

湟中县上五庄第一分会设完小4处，学生21名（疑有不确。据《新甘肃》创刊号表列数为94人）；初小12处，学生330名；鲁沙尔第二分会设完小5处，学生370名；初小23处，学生692名。

门源县分会设完小5处，学生192名；初小26处，学生498名。

大通县分会设完小14处，学生687名；初小21处，学生524名。

民和县分会设完小6处，学生390名；初小25处，学生480名。

化隆县分会设完小11处，学生390名；初小26处，学生812名。

循化县分会设完小10处，学生445名；初小19处，学生600名。

贵德县分会设完小4处，学生290名；初小19处，学生420名。

互助县分会设完小8处，学生692名；初小30处，学生924名。

湟源县分会设完小3处，学生270名；初小13处，学生417名。

都兰县分会设完小1处，学生34名；初小7处，学生180名。

乐都县分会设完小9处，学生718名；初小19处，学生493名。

同仁县分会设完小2处，学生95名；初小2处，学生75名。

共和县分会设完小2处，学生72名；初小3处，学生77名。

祁连县分会设完小1处，学生30名。

会立各学校课程设置与一般学校大致相同，唯在低年级（包括初中）另加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教义（每日1——2课时）。

促进会办学经费来源除由省政府拨款补助和回族人士捐赠以外，另从所收羊肠税、皮筏税和担头税（均为商业税收）中按一定成数拨充。

30年代至40年代，国内一部分回族人士，或为发展回族教育事业奔走呼吁，或致力举办学校，如马松亭先生在北平举办成达师范学校，躬行教育卓有成效。各地回族还竞相组织成立宗教、文化教育团体，互通声气，相与影响。1933年，青海组织成立“青海省回教青年会”、“青海省回教教育研究会”，配合促进会活动，并且同北平、上海、西安、兰州等地的回族伊斯兰教组织或文化教育团体取得联系，从而使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的影

响更加扩大。1941年以后，甘肃、陕西、宁夏、新疆各回族居住地区都效法青海相继成立回教教育促进会。40年代后期，青海总会还直接领导甘肃兰州、洮、岷、河州、平凉、河西一带促进会，并由西宁总会直接派人任这些地区促进会的教育长、青云中学和魁峰中学校长。

综上所述，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以最初的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为开端，历时27年（自1922年到1949年为止），终于办起了自成系统的民族教育。客观地、历史地看，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提倡教育，兴办学校，提高青海回族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试以省内回族居住最为集中、人口最繁的民和、化隆两地而言，民和地区在促进会成立之前，仅有当地回族开明人士白席珍、马洁诚等分别于1919——1921年间先后创办的上川口清真初级小学、中棚门回民小学（在马营）两处；在成立回教教育促进分会后，从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当中，办起完小和初小31所，在校学生达870名。化隆地区在未成立回教教育促进会时，没有民族教育机构，也没有本民族自己的专门学校，可以说，民族教育几乎等于零。自1931年成立化隆县促进会分会，到1949年，促进会办校40多所，在校学生达2000余人。昆仑中学以省内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中等学校，连同省内其他国立、省立和县立的各类学校的举办，在历来闭塞落后的青海地区，培养了一批各民族的文化人，得以到内地大学深造，涌现出了一些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因此，当时就有学者认为："旧中国开办回教教育，这两个学校（即北平成达师范和青海昆仑中学）均开风化之先"。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和它所举办的学校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和宗教影响，但促进会在倡办学校、发展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亦是客观事实。

青海回族女子教育

马　迪　甫

青海历来是多民族地区，其生活习俗、民情风土、生活水平、人口繁衍各有其不同之处，但除汉族外，其他各少数民族有一个共同点是文化落后。形成这种局面虽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历代封建王朝采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来自本民族的封建传统旧礼教习俗和宗教文化等影响，致使各少数民族在数百年以来一直处于蒙昧落后状态。回族文化教育亦不例外，特别是回民女子文化教育所受阻力和干扰尤甚，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立昆仑中学附办的3所女校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舆论，如人们的思想观念的禁锢、宗教意识的束缚等习惯势力下，宣传与强制相结合而产生的，来之不易，巩固更难。

1945年2月，促进会派该会职员张葸授、马鸣岳、马俊麟、马鸿鹤等到西宁东关地区上北关街阿文女校（今北关街粮店）、东关大街阿文女校（今城东公安分局小巷即新生巷）及南关、北关、白玉巷、玉带桥、小城门、路口子（今之路林巷）等各清真寺念阿文经的女生中进行一次广泛细致的登记造册，经解释宣传之后，发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印的“国民教育”初小一册国语课本，人手一册。暂由老师和阿訇配合施教，强行上两个小时的中文文化课，先识字，再循循善诱，使之养成习惯。经一个多月的努力，将筹备组成的3所女校合并到昆仑中学本部附设小学部，

学生近千名，命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立昆仑中学附设第一、二、三女子小学。学生年龄一般在8至15岁，第一次入校女生约500多名，各年级老师、阿訇配备齐全。第一女校（今北关街小学）有5个班级，学生约有160多名，主任由马鹤令担任，教员有马应才、马良泰、马得忠等5人，另有2名阿文教员。第二女校（今东关女子小学）学生约140多名，一年级4个班，二年级1个班，班主任由马训良担任，教员有曹兆凤、穆信、陈国栋等4人，另有阿文教员2人。第三女校学生近200人，主任由沈国玉担任，教员有马兆廉、魏生福、杨有智等4人，另有阿文教员2人。

为了鼓励学生热爱学习文化知识，安心求学，学校采取成绩比赛，争夺前5名优等生称号的办法，激励学生进取，努力完成学业。其后，有不少曾抱着观望、怀疑态度的家长消除疑虑，纷纷送女孩上学。学校除发给课本、笔墨纸张外，还给每个学生分发蓝色阴丹士林布7尺，一律由家长做成统一式样的小旗袍服为校服。

学校课程：每日6节课，上午4节，下午2节。上午是主课国语、算术、常识、阿文，下午教唱歌、游戏或讲故事。这是初小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以上加授珠算、图画、劳作、体育及课外活动。

除上述正常的学业外，还教学生们学习缝纫、纺织，每个女校配有两台缝纫机，聘请义源工厂的技师进行培训指导。

1947年8月，昆中校部在世芬学校礼堂举办为期3天的演讲会，选拔优秀学生准备好内容，上台讲演时不带稿子，当时也没有拿稿照读的习惯。为搞好这一活动，还选举成立了讲演比赛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昆中教导主任马英富担任，委员由马宣道、桑森、马鸣岳及3个女校主任，另有马鹤令、马训良、沈国玉等人组成。开幕式由副校长马玉龙主持，参加演讲女学生70多名，参加听演讲的中小学部各班级学生代表及老师约400余人。

当女生上台讲演时，掌声不断。尤其是平时不敢在人前讲话的回族姑娘首次登台，更是罕见的。这3所女校只经历4年，青海解放初，因故停办。1952年，党和政府重视回民教育事业，在原基础上恢复了回族女子学校，即今西宁市东关回族女子学校。从此，回民女青年不读书、不学科学的时代便一去不复返了。

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　国　英

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是1984年10月正式成立的一所培养造就年轻一代爱国爱教、有较高宗教学识和文化水平的五年制大专院校。该校规模为5个班，每班20名学员。学员必须作风正派、品行端正、身体健康，立志从事伊斯兰教的阿訇职业，具有高中毕业文凭，年龄在18至25岁，家居本省的未婚男性穆斯林。课程设置有：《阿拉伯语》、《古兰经》诵读、《古兰经》注解、《圣训》、伊斯兰教史、宗教常识、现代汉语、民族宗教政策、政治时事、法律常识、体育等。授课比例，宗教课占70％，文化课占20％，政治课占10％。学习期满后，经考试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并授以宗教职称，由原选送推荐地区宗教事务部门和伊协协商安排，从事宗教职业。

按照上述办学方针，我们在有关领导部门和伊协的支持帮助下，从省辖11个地、市的24个县筛选推荐的300余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第一批20名学员，因陋就简的于1984年12月17日在原“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旧楼内开了学。1986年6月又招收了第二批学

员，现在有回族、东乡族、哈萨克族的正式学员40名。

尽管我院师资缺乏，教材不齐全，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但是，由于全体师生凭着为主道服务的精神，都能刻苦奋斗，专心致志地学习，取得了一定成绩，有8名学生考取了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有5名选送中国经学院学习。从接待外宾工作来看，我院学生大部分能用阿语和外宾对话，在颂读、讲解《古兰经》方面也有较大进展。今年开始，甘肃省计委已将兰州经学院列入建设项目；省委统战部决定将省伊协在五星坪绿化园地中的25.9亩地皮划拨为经学院的正式校址已着手进行规划设计，并花费2万多元，购置了电化教学设备和厨房冰柜等生活设施，同时还增置了大小汽车4辆。

开学3年多来，我院共接待了近30批中外穆斯林代表团的参观访问，如埃及宗教部长努尔·穆罕默德为首的埃及宗教代表团、世界伊斯兰联盟亚洲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原巴基斯坦议长吉玛、沙特国王顾问纳绥夫，还有世界伊斯兰大会代表团、巴基斯坦学者代表团、摩洛哥、苏丹、印度、科威特等1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外宾，我们国内有云南、四川、贵州、宁夏、青海、陕西、辽宁和香港等省、市穆斯林代表团。他们参观访问后反映很好。如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考核了我院学生颂读《古兰经》后很高兴，表示愿与我院结为姊妹学校，互通信息，交流经验。我们也曾派出一名教师去阿尔及利亚参加了世界伊斯兰学术讨论会。我国国务院宗教局副局长宛耀宾同志数次来院视察，听取汇报，指导工作。中国伊协会长沈遐熙，副会长艾买提、马贤，副秘书长孔庆棠、龚清志等宗教界知名人士来院视察讲话。我省已故副省长年得祥同志在我院学生宿舍发生危机时，亲自来院视察，当场批示划拨了维修款，我院师生至今难忘。特别是在我院师资发生困难时，苏丹朋友蒂里卜先生派其弟苏建生先生千里迢迢不辞劳苦来我院任教。同时，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选派了优秀生马光忠同志

来院边实习，边讲课，给我院解决了很大问题，我院师生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兰州伊斯兰经学院供稿）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　明　贤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是经国务院批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及自治区宗教事务局领导下，由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举办的一所伊斯兰教高等学府。它筹建于1984年8月，正式成立于1985年4月。

校舍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西门桥西、银新南路北侧，占地面积28300.5平方米。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征地和工程前期的准备工作，伊斯兰发展银行为经学院基本建设无偿提供赠款113.8万美元。1986年10月破土动工，1989年11月竣工，历时3年。总建筑面积为9816平方米。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是由自治区设计院总体设计的一座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伊斯兰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它包括：教学楼、办公楼、礼拜殿、阅览厅、唤礼塔、大礼堂、专家公寓、教工宿舍、学生宿舍、体育场、餐厅、沐浴室等19个子项。整体建筑规化合理，布局周密，错落有致，浑然一体。从门廊、中心环廊、礼拜殿圆拱到唤礼塔呈4个层次，渐次拔高。整个建筑以白色为基本色调，饰以形状相似、间距相等的绿色圆拱托月装饰板，外观宏伟典雅庄重。

学院设计规模为7个教学班，其中3个本科班、两个大专班、两个在职阿訇进修班，全员在校学生210名。学院目前现有教职员工34名，其中：副教授3名，讲师4名，助教3名，青年教师5名。学院由院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下设一处（教务处）一室（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总务、伙管两个科；教务处下设宗教科、学生科、阿语经学教研室、汉语文学教研室、政史法学教研室。开设的主要课程有：《阿拉伯语　、《古兰经》、《圣训》、《教律》、《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学》、《民族宗教政策》、《伊斯兰教简史》、《中国回族史》、《经济地理》、《法律》等。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具有较高的经学水平和汉语文化素养的高级宗教职业者。目前学院拥有优越的教学条件和比较齐全的教学设施，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较完整的教材，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较完善的教学管理体系。学院自1985年至1992年底，共培养学员424名。其中3个大专班（学制3年），毕业学员已分别走上民族、宗教、统战、伊协等工作岗位，从事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七期阿訇进修班（学制一年），结业学员中，大部分已经重新担任开学阿訇之职，执掌一坊教务。

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自1984年筹建到1985年正式成立以来，得到了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统战部门以及地方的宗教团体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极力支持；得到了国内外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关心和鼎力资助，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穆斯林代表团体和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前来参观、视察，进行学术交流。

学院自1985年至今，已经先后接待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友好人士，其中著名的有沙特阿拉伯王国亲王、马来西亚王国亲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王储、埃及驻华大使、利比亚驻华大使、沙特阿拉伯驻华商务代表（大使级）、伊朗驻华大使、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塔尔驻华大使、巴林驻华大使、科威特驻

华大使、伊斯兰发展银行行长特别助理、伊斯兰发展银行伊斯兰国际援助部总干事、沙特阿拉伯王国高教部部长顾问、沙特“依玛目”学院院长等。

目前，宁夏伊斯兰教经学院不但是传授伊斯兰教知识的园地，为自治区150余万穆斯林群众所向往，得到国内外穆斯林的关注，而且其建筑特色和风格已成为银川市的一处景观，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人。

现已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正着手在原有学制和班次的基础上，扩大招生范围，面向全国回族散居地区的青年穆斯林，举办两年制外省区阿訇代培班和两年制阿拉伯语专修班。

青海伊斯兰教经学院

马 文 才

青海是国内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有回、撒拉、哈萨克、东乡、保安等民族达59万人之多。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已有900多座清真寺相继开放，入寺的宗教人员已达4300多人，这给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此基础上，青海省伊协自1984年起相继主持开办两期阿訇进修班，此后便成立了省伊斯兰教经学院。

一、阿訇进修班的开办

1984年3月，青海省伊协开始筹办阿訇进修班。省政协副主席、省伊协主任韩生贵率领考察组于9月底赴宁夏调查了解开办

阿訇进修班的情况。10月24日，省第一期阿訇进修班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举行开学典礼。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会祝贺。

本期阿訇进修班共招收学员33名，分别来自民和、循化、化隆等11个市县。招生办法，按各市县穆斯林人口的分布情况分配名额，由当地宗教团体推荐、考核后上报，经省宗教局复审择优录取。学员在政治上是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经学方面有一定基础的开学阿訇或具有同等学历的满拉，其年龄在35岁至55岁之间。

学员中有回族27名、撒拉族6名，学期为6个月。

在课程设置上，本着促进其爱国守法，增进知识，提高管理寺院的能力为宗旨，开设了以下课程：

（1）宗教经典课，有《哲俩莱尼》、《维嘎叶》、《圣训》、《依亥牙依》、《尕最》、《阿拉伯语》，占全部授课时间的85％。

（2）政治课，学习中共中央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占全部授课时间的10％。

（3）伊斯兰教简史，占全部授课时间的5％。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聘请的教员均为省内有声望的“阿林”，如韩生贵副主席（哈吉）、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教长马相臣、西宁市水城门清真寺教长马兆瑞、西宁市北关清真寺教长马长庆、化隆县阿訇马穆亥麦等均担任宗教经典课的讲授任务。政治课及伊斯兰教简史课，聘请省统战部、省民委、省宗教局等部门的同志授课。其班主任由省伊协副主任韩麦扫日、马进福两位哈吉担任，并授宗教经典课。

由于课程设置得当，教学得法，学员进步较快。撒拉族学员韩继良说：“我们过去是井底之蛙，经过6个月的进修，学到了在外面5年也学不到的知识”。回族学员马二卜原来对宗教信仰

的自由二字有片面的理解，通过学习，才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既受国家宪法及其各项政策法规的保护，又受其限制，不能脱离此范围。进修班的另一收获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别学员之间，交流了思想，消除了偏见，加深了理解，增进了友谊和团结。学员们说："党又为我们穆斯林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一些穆斯林群众还带着面粉、清油、牛羊肉等到进修班慰问各族学员。

进修班还组织学员到青海龙羊峡水电站建设工地、省毛纺厂、汽车制造厂等地参观学习，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1985年4月24日，第一期阿訇进修班学员以全部考取80分以上、其中8人满分的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举行了隆重的结业典礼。

1985年7月17日，全省第二期阿訇进修班开学，共52名学员，作法如上。

这些结业的学员回到本地后，均受到群众的欢迎，聘请他们主持教务。

二、成立省经学院

1985年的青海省政府39号文件批准成立省经学院，任命韩生贵为院长，西宁市北关清真寺教长马长庆阿訇为副院长，院址暂设西宁市东关大寺内。

1987年4月23日，省伊斯兰教经学院在东关大寺举行开学典礼。中共青海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出席了典礼，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国伊协分别致电祝贺。

经学院分设本科和进修两个班：

（1）本科班：

学制为5年，招收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愿意从事宗教职业的18岁至25岁的穆斯林男

性青年。招收办法是根据全省穆斯林人口分布情况，按比例分配60个名额，参加省经学院统考，科目有语文、政治、中外历史、中外地理、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义等。考后，划分西宁、海东、牧区三个分数档次，择优录取30名，其中回族24名、撒拉族6名。课程有宗教课、文化课、政治课、阿拉伯语等，教员有马长庆、冶万林、金镖、马少平、汪溶、韩建业、马文清、张世俊等。此外，学院设有图书馆、资料室、阅览室，订有50多种报刊杂志，供学员们阅读。

（2）进修班：

经学院成立后，又连续举办了2期阿訇进修班，由副院长马长庆兼班主任。其课程和教学形式同前，故不再赘述了。

第六章　风格独特的文化艺术和习俗

河州花儿

孟国芳　柯　杨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新的一种山歌，深受这四省区人民的喜爱。

“花儿”从整体上可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两大系统。洮岷花儿是汉族人民所创造和演唱的，而河州花儿则是以回族为主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这里，我们着重介绍河州花儿所反映的回族人民的生活史和习俗史。

出门人的歌

甘肃河州（今临夏）一带及毗邻的青海西宁东南的一块地方，历史上统称为“河湟地区”。这里居住着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和藏等民族，其中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相对集中。各民族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出绚丽多彩的乡土文化——河州花儿。

我们说河州花儿主要是以回族为主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所创造的，这得从“出门人的歌”谈起。

河州传统花儿中大量反映“出门人”离情别绪的歌，乃是这一地区回族人民在旧社会里经济生活特点的集中反映。这里由于

回族人在临夏地区的“出门人”中所占比例极大，而且在外谋生方面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缘故。

首先，回族人民有经营商业的历史传统。元代回族作家马祖常有《记关外经商》一诗，曰：“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途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里说的“波斯老贾”，正是往返于古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商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定居中国，成为我国回回民族的祖先。明朝的统治者大多鼓励回民经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朱元璋曾谕旨：凡回族商贩往来买卖应予照顾，“如过关津渡口，不许阻滞。”临夏地区回族人民的商业活动，在清人所写的《河州采访事迹》一书中也有记载，其中说：“（河州）北乡多木工，西乡多瓦匠，沿关喜射猎。商则汉民贸易不出乡关，回民负贩远及新疆、川、陕。”解放后，回族改变经商的重点和方式，像脍炙人口的兰州小吃“清汤牛肉面”、酿皮子之类十有九家是临夏回民所经营的，回民经营的商店生意兴隆。他们不仅“负贩远及新疆、川、陕”，而且东赴京津，西到西藏，南下港澳，甚至出国到阿拉伯、南亚等国家经商。如今有的河州回商家中的电器产品是清一色的港货，由此可见回回民族经商能力之强。

从历史上看，沉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是回民外出谋生的另一个原因。据《回族简史》记载，1936年前后，河州共有17134户人，土地271.6万亩，而其中仅占人口1.3%的234户地主却占有72%的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使广大回族人民落入赤贫的地步。清光绪年间有一首流传于河州的“花儿”这样唱道：“一对尕牛的庄稼汉，二百串大钱的帐哩，尕牛（哈）卖过了还帐哩。西口外大路上上哩。”歌词中的“西口外”指的就是今天的新疆。反映了河州的回族农民受不了高利贷的盘剥而出外另谋生路的情境。

回民外出谋生的原因之三是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频繁的战乱，

使这一地区的各族同胞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活极不安定。

歌随人走　落户新疆

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下，回族中个别人铤而走险，大部分人则只好外出谋生。除了经商外，多成为走乡串户的工匠、摊贩、水手和脚户，成年累月地奔波于他乡异地。每次回变被镇压后，都有一批批与战乱有关的回民逃亡新疆、云南、黑龙江等边疆地区，久而久之，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形成相对集中的回民聚居地，如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等。新疆《阜康县乡土志》中说："回本西域种，而县之回民自陇右西宁、狄、河迁徙而来者，盖十之七八。"西宁在1928年以前属甘肃省管辖，"狄、河"即今甘肃临洮、临夏。《昌吉县呼图壁乡土志》中也说："本境除土著汉民及川陕流寓外，多新旧汉回，皆自关内西安、河、湟来者。"歌随人走，河州"花儿"随着它的主人从甘肃临夏的太子山麓、大夏河畔迁徙到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落户"。从新疆回族传统"花儿"中可以看出河湟地区回族迁徙的原因。如"攻打河州的马仲英，逼得我上了个新疆；阿哥是八坊的苦命人，尕妹子看中了领上"　、"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十三省好不过兰州；跟上阿哥西口外走，新疆的生活（哈）过走。"然而，在旧社会，新疆并非穷苦回民移民的王道乐土，正如一首"花儿"所唱："新疆省有个妖魔山，妖魔山顶不住青天；新疆省我过了40年，心宽者没过上两天。"最能表达长工、佃户们辛酸生活的还要数那首《苦一年》，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腰杆子苦成了弓一样，指头子像根针壮"、"苦死苦活没人问，慢一步还得挨上几棍"、"人家阖家都团圆，我想娘泪湿了衣衫"、"一天的日子熬不到晚，长工的眼（哈）哭干"。这字字血，声声泪的歌儿是对万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也反映了迁徙者无比艰难困苦的

生活现实。

河州花儿是回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回族群众除务农、经商、做摊贩和工匠外，做脚户、筏客（即水手）的亦相当多。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闭塞偏僻。这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过去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唯黄河蜿蜒流过，大夏河、洮河、湟水等流经并交汇于此，虽多急流险滩，也总算条水路。过去，这一带的运输，陆路靠脚户，水路靠皮筏。由于生活所迫，许多回族青壮年往往受雇于富商大贾，或拉骆驼，或赶马队，成年累月奔波在他乡异土，饱尝离乡背井之苦。有不少“花儿”是反映脚户哥生活的，请听：

“甘肃（哈）凉州的十八站，嘉峪关续上者两站；日头它落在了戈壁滩，穷脚户啥时候到站？”“头一帮骡子者走远了，二一帮骡子们撵了；一步（吧）比一步远了，一阵（吧）比一阵想了。”

有的脚户哥远在千里之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情人或年轻的妻子，不由得悲伤地唱道：

“棉花（哈）放在了箱子里，啥时候捻成个线哩？远路上我把你牵挂哩，啥时候才见上面哩。”

“哈密的甜瓜（者）实在甜，戈壁上开下的牡丹；想想了尕妹心里酸，独个儿活下可怜！”

“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挣上些钱回家走，心上的尕妹（拉）着走。”

这种主要表达旅途之苦，同时也包含有一定爱情内容的“花儿”，在家乡的村子里是禁唱的，但在那“长空旷漠天如水，永夜银河月似舟”的古丝绸之路上，却可以直抒胸怀，大唱特唱，谁也管不着。

皮筏是西北别具特色的运输工具，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咸丰辛酉（1861年）以前，黄河上就有用皮筏作为运输、交通工具的。后来，由小筏到大筏，由短途到长途，逐渐发展起来。无论长途还是短途水手几乎全是回民。河州地区的许多回族同胞的青壮年华，是在惊涛骇浪和长途跋涉中度过的，每年深冬腊月才能返回故乡与家人团聚一次。有时筏子手们过峡谷急流，越过漩涡险滩，在平稳的水面上悠然自得，漫起“花儿”来，倒也别具诗情画意。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曾在1936年生动地描写过临夏回族水手们在劳动过程中唱“花儿”的情景，他写道：“他们于桨声‘哗啦哗啦’之际，常引颈高唱他们本地山歌，歌声高朗，震彻山谷，内容则多述男女爱情之思，如‘阿哥的肉呀！阿哥来时你没有，手里提的肥羊肉。”这是说一个男子提了肥羊肉去看他心爱的女人，而人又不在家，男子于失望之余唱出来的情调。”（范长江《中国之西北角》第273页），而守候在家里的妻子整天提心吊胆，望眼欲穿，当看到丈夫驾筏归来时，则高兴地唱道：“羊皮的筏子下来了，山里的花儿们笑了；阿哥是甘露者下来了，尕妹子的热病（哈）好了。”

“花儿”是一种山歌，亦称之谓“少年”。“花儿”指所钟爱的女人，“少年”则是指男人。河州花儿与所有民歌一样，反映男女青年的爱情，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比重相当大。在河州地区的家庭院落和村庄周围是禁唱“花儿”的。陈赓亚先生曾记载过“花儿”流行地区禁唱这种山歌的村规，上书：“无论居民或行人，若在近村唱歌曲者，执打柳鞭120下。”（陈赓亚：《西北视察记》1936年），但这条清规戒律多少年来未锁住青年男女的心声。他们唱道：“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还是这个唱法”、“尕妹的大门是万丈崖，啥时节踏出个路来？”“尕妹的庄子是刀枪林，你有心，闯一条大路子走哩！”花儿中也有不少反映不幸婚

姻内容的，比如："女婿娃尕了贪瞌睡，娘老子寻下的累赘。"有男女情投意合时火辣辣、甜滋滋的内心表白；有羞涩、拘谨的流露；有对负心情人的怨恨和指责；也有对真挚、热烈、忠贞不渝爱情的颂扬。请听："石头根里的药水泉，担子挑，桦木的勺勺儿留干；若要我俩的姻缘散，三九天，青坚冰上开一朵牡丹。"又如："青水儿打着磨盘子转，磨口里淌的是细面；宁叫他皇上江山乱，决不叫我俩的路断！"这种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凌驾于皇权之上，将帝王踩在脚下的气概，深刻地揭露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谁能说这类情歌软绵绵呢？

河州花儿深刻地、广泛地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倾吐心中反压迫、反剥削的怒吼。你听："紫油刮干了刮骨头，骨头上还得烤油；死了不如一条狗，少不了官家的税收。"

解放前，河州人民除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外，还要受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等甘、宁、青几个马家军事集团的残酷统治，由于西北诸马的家乡均在河州，他们独霸一方，大肆抓兵。河州人民用"花儿"控诉马家军的罪恶："马步芳坐了兰州城，河州城拔了个新兵，娘老子心痛（者）地面上滚，四乡里动了个哭声。"

但是，回族人民对抗击日寇则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如脍炙人口的《抗日少年》，开头的歌词曰："老牛恶虎兔儿年，日本鬼子他侵犯中原；阿哥是英雄上前线，尕妹妹，听阿哥唱个抗日的少年。"并以"阿哥们抗日上前线，尕妹们家里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河州花儿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回族人民的生活和高原的情调，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

河州的花儿多以“牡丹”为喻

河州花儿曲调丰富，以抒情见长，文词优美、朴实、生动、形象，结构严整。行段为四句、六句两种。一般单数句四顿，单字尾；双数句三顿，双字尾。演唱比较自由，以独唱为主。其曲调悠扬、辽阔、高亢、奔放，曲子极为丰富，音乐工作者从民间记录整理出来的曲谱就有100多种，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也有40多种，如《白牡丹令》、《河州令》、《尕马儿令》、《脚户令》、《大眼睛令》、《尕阿姐令》、《水红花令》、《憨肉肉令》、《撒拉令》、《保安令》等。这些曲调在河湟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在国内外也享有一定声誉。

花儿唱词大多采用比兴方式。每首开头两句与下文内容无关联，以地理典故（天、地、山、川、河）、历史典故（姜子牙、杨家将、三国人物、孙悟空、梁山泊人物）、眼前事物作比兴，抒发情怀。河州花儿多以牡丹为喻，反映回族人民的生活和情趣。你听：“白牡丹白者赛雪哩，红牡丹红者破哩”、“尕妹出来者门前站，活像是才开的牡丹”，这是多么绚丽的画卷！回族花儿中大量用牡丹作比喻，是因为河州地区的回族人民酷爱牡丹，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牡丹的缘故。明版《河州志》在记述当地花卉时将牡丹列为第一。清乾嘉时期，狄道（今临洮）诗人吴镇（1721—1792）写过这样的诗句：“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刊行的《兰州府志》中记载：“花则牡丹、芍药，河州最盛，有数十种”。黄陶庵编撰之《导河县志》中写道：“牡丹载旧志，有数十种，近来培养得法，冠绝全省。”导河就是今天的临夏。临夏人过去种花精心培植，不做买卖，纯为观赏，相互比赛。一年一度花开时，有好品种的人家门尽大开，任人参观，当地人谓之“浪牡丹”。这些历史资料说明，河湟地区人民有栽种牡丹的传统习俗，以回族为盛。河湟一带的回民在

迁往新疆时，连同他们所喜爱的牡丹一并移栽了过去。清代陇上回族画家马虎臣尤其擅长于画墨牡丹，故人们均以“马牡丹”呼之。临夏地区杰出的砖雕艺人绽成元等亦以砖雕牡丹驰名远近。时至今日，当地回族同胞在日常生活中，仍将健美的姑娘喻为牡丹，将喜爱的不同调的“花儿”称作“白牡丹令”、“二牡丹令”，甚至冲茶用的刚沸的水也叫做“牡丹花水”，其喜爱牡丹的程度可见一斑。总之，牡丹同河湟地区的回族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种牡丹、赏牡丹、画牡丹、唱牡丹，牡丹成了回族文化和艺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临夏回族宴席曲

周　梦　诗

宴席曲是西北回族人民结婚时演唱的一种民间传统仪式曲。曲调近似“花儿”，又别于“花儿”，可以说是“花儿”的姊妹歌。为什么称作宴席曲？西北回族人民把有喜事俗称“有宴席”，因此，把凡能在宴席场进行演唱的歌曲通称为宴席曲。这种民歌很早就在甘肃省临夏地区广泛流行，深受当地回族群众的喜爱。由于民族间的接触、通婚和交往，撒拉、保安、东乡族人民在结婚时也有演唱宴席曲的习俗，只是他们结合本民族的习尚有所变异，各具特色，与回族习俗不完全相同，没有回族那么系统、完整。但都明显看到，是受了回族习俗与文化的影响的。

宴席曲的曲调优美婉转，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能

歌能舞，保留着我国宋、元两代西北少数民族民间小曲的古老风格，为我们研究回族的历史、风俗习惯、语言文学以及文化艺术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从我们所见到的资料看，宴席曲大致可分为五类：散曲、叙事曲、五更曲、说唱曲（也称“打调”）和酒曲。散曲有《恭喜曲》、《青溜溜青》、《高高山上烟雾儿罩》、《十二个月》等20余首。叙事曲有《满拉哥》、《兰桥担水》、《方四娘》、《四贝姐》、《王哥》、《孟姜女》、《尕鹦哥》、《高大人领兵上口外》等20余首。五更曲有《哭五更》、《莫奈何》、《五更月》等10余首。说唱曲有《打账主》、《园子家》、《捉蚆蚰》等近10首。酒曲有《尕老汉》、《醉八仙》、《封牡丹》、《飞凤凰》、《数麻雀》、《数螃蟹》、《担杯》、《相谢曲》、《问答曲》等10余首。这些宴席曲大都有原始的曲牌名称，它们有的以衬词命名，如《牡丹月里来》、《莲花落》、《四莲溜儿落》、《打莲花》、《野麦青》等；有的以人名命名，如《方四娘》、《王哥》、《四贝姐》、《孟姜女》等；有的以题名命名的，如《兰桥相会》、《庄稼人》、《青溜溜青》、《五更月》、《五更鼓》、《哭五更》等。

宴席曲的传统演唱形式有独唱、表演唱、齐唱、和唱、随唱、问答、独唱加和唱、齐唱加和唱等，除了“打调”外，一般都有原始的舞蹈动作。

宴席曲产生的时代像“花儿”一样，无史料可查。

宴席曲是一种民族的民间散曲，只有唱词、舞蹈动作，没有人物故事，没有科白，不分场次，没有乐器伴奏，纯属清唱。它既不同于一般只唱不舞的民间歌曲，又不同于戏曲杂剧，而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

另外，在部分宴席曲中还有类似“花儿”一样的衬词、虚词，这一方面说明了它同“花儿”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

同名家撰曲的不同特色，真实地反映了元代民族民间散曲的艺术风格。

“酒曲”，它与回族宗教信仰相违背的宴席曲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受了其他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影响，学来的；二是与“甘回”构成的复杂成分有关。

宴席曲与“花儿”是不同的。许多人把宴席曲和“花儿”混为一谈，把宴席曲归入“花儿”的范畴，这是没有认真研究“花儿”和宴席曲结构特点的缘故。

“花儿”和宴席曲在叫法上就有区别。临夏地区的各族群众把“花儿”叫做“野曲”，把宴席曲叫做“家曲”。所谓“野曲”包含这样几种含义：一、“花儿”是在野外唱的曲子，不准在家里、村庄里唱；二、“花儿”大部分属于情歌，内容较“野”，在家里、村庄里唱，“有伤风俗”，不伦不类；三、“野曲”是“花儿”的原始名称。所谓“家曲”就是允许在家里、村庄里演唱的歌曲。但凡是“花儿”家乡的人都知道这个规矩，都讲究这个风俗。这些传统规矩在回族中表现尤为突出，早已形成了民族风俗习惯。有些大胆妄为的人因在村庄里唱“花儿”，曾引起过不少的纠纷，甚至发展成流血事件，而且多数都是带有群众性的，这是因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而造成的。就是宴席曲，一般也只许在“宴席场里三天没大小”的情况下，或是喜庆的日子里才进行演唱，平常不随便唱。解放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此种规矩虽有突破，但在有些地方仍然保留着。

在曲调上，宴席曲与“花儿”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花儿”的曲调高亢豪放，跌宕起伏，拖腔长而自然，旋律独特，乡土气息很浓，只要熟悉各种“令”调，就可以做到“一首歌词多令唱”，节奏不适于舞蹈。而宴席曲的曲调婉转柔和，优美轻快，潇洒抒情，节奏性强，很适于舞蹈。所以，能否舞蹈也是区分宴席曲和“花儿”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内容上看，宴席曲和“花儿”也有不同之处。“花儿”是在野外歌唱的，它的词意明朗蕊露，可以直接间接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情。宴席曲却不然，歌手只能演唱传统的爱情故事，要是歌手言词不规，就会遭到主人的指责。宴席曲中也有一些比较“花骚”的曲子，群众叫做“花曲”，如《五更月》、《闹五更》等，平常是不准唱的。

除此而外，宴席曲中的叙事曲、说唱曲、酒曲及其它一些杂曲都各具特点，需分别予以提及。

一、叙事曲。这种类型的曲多为两句式和四句式，多句式的也有，并不多见。其内容大部分是唱爱情故事和历史故事等。例如两句式的《方四娘》：

黄河南来是三乡，　　三乡里出下的方四娘。
一岁上尕来两岁上大，　　三岁四岁上说巧话。
五岁六岁跟娘转，　　七岁八岁上学茶饭。

又如四句式的《四贝姐》：

正月里到了正月正，　　媒人到家里来订亲；
婚姻订到大屠家，　　四贝姐心里不服嫁。

二、说唱曲。又名“打调”，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说唱形式，它的曲文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即起头、正文、结尾。起头起着一种承上启下和起韵的作用，正文叙述故事或即兴创作（夸奖主人、新郎、新娘、陪客及宴席场景等），结尾众和。曲文的句子长短不齐，流畅自然；语言生动活泼，诙谐风趣。内容既有传统的唱段，也有即兴创作。如《园子家》：

哎哟——　得儿一个了，了么了，
小曲子们（哈）唱完了，不打个调子是不热闹。
哎哟——　我给你们说的个园子家，
说的不好了甭笑话。
哎哟——　什么个背的是叉叉枪？

对着什么打一枪？　　什么个吓着土里藏？
什么个吓着脸脑黄？　　什么个吓着眼泪淌？
什么个的脸脑紫下了？　　什么个脸脑绿下了？
什么个脸脑长下了？　　什么个拄上拐棍了？
哎哟——　葱秧们背的是叉叉枪，
对着白萝卜打一枪：　　圆根们吓着土里藏：
黄萝卜吓着脸脑黄：　　葡萄们吓着眼泪淌。
茄子们的脸脑紫下了，菜瓜们的脸脑绿下了：
瓠子们的脸脑长下了，柿子们（就）拄上拐棍了。

众和：三朵花儿开哎．两朵金花。
小曲子有了再续上，野玫花！
嗨嗨，莲花，花儿野玫花！

说唱曲是由两种曲牌组成的，即说唱调和“三朵花儿开”调，用说唱调唱正文，用“三朵花儿开”调结尾。

从内容上说，它所反映的生活面极其广泛，有反映农民反抗精神的，如《打账主》；有反映农民生产劳动的，如《庄稼人》；有反映旧社会黑暗统治的，如《韩起功抓兵》；有用夸张手法讽刺懒汉的，如《懒大嫂捉蛇蚤》；有反映菜园知识的，如《园子家》等等，不胜枚举。

三、酒曲。这种曲名很多，规矩复杂，戒律比比，曲调优美，歌词有趣，每首都洋溢着艺术的风采。临夏地区流传的酒曲有十多首，比较著名的有《尕老汉》、《封牡丹》、《醉八仙》、《飞凤凰》、《数麻雀》、《担杯》等等。

演唱酒曲时，由于人们坐着吃酒，所以只是上肢有舞蹈动作，下肢不动。也有个别喜欢舞蹈的人，端酒在手，边唱边舞（没有传统的舞蹈动作），敬酒耍笑。酒曲有以手势表示数目的，有以动作表示唱词的，有绕口令式的、问答式的、相谢式的等，词曲并茂，情趣盎然。如绕口令式的《飞凤凰》：

我的红凤凰飞呀，　　飞不过了叫你的黄凤凰飞。
我的黄凤凰飞呀，　　飞不过了叫你的蓝凤凰飞。
我的蓝凤凰飞呀，　　飞不过了叫你的白凤凰飞。
我的白凤凰飞呀，　　飞不过了叫你的黑凤凰飞。
我的黑凤凰飞呀，　　飞不过了叫你的红凤凰飞。

这首酒曲须五人演唱，各代表一色凤凰，演唱时必须集中精力，做到听得清、记得真、唱得准，点到谁谁就唱，如果发生差错就要罚酒。每首酒曲都有类似的讲究和玩意，真是趣味横生，滑稽可笑。

四、散曲。上述三种之外的宴席曲叫散曲。散曲曲调很多，反映的生活面广阔，一般是一词一曲，固定不变，曲文结构各具特色。

如四句式的《哭五更》：

一更里鼓儿天，　　天天每日里不见个丈夫的面，
我丈夫要回来，　　还得个绵羊者献。

还有五句、六句等多句式结构的，大部分都没有雷同的词，所以不能换调演唱。

回族宴席曲，主要的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和唱、随唱、问答、独唱加和唱、对唱加和唱等，形式灵活多样。

一、独唱（或独唱加和唱）。在演唱中间，为了让“唱把式”们有点休息的机会（喝茶、抽烟、歇嗓记词等），由一名“调把式”出场“打调”，演唱正文，临完众和。因和唱曲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大家都会唱这首曲。有的地方，只是独唱，并无和唱。

二、对唱（即二人齐唱）。这是最普遍的演唱形式，每次出场的“对对”，声嗓和唱法要基本一致，这样唱出来的曲就好听，若是声嗓和唱法不一致，效果就不好了。声嗓有几种叫法，一般分作“苍音对”（男中音）、“尖音对”（即男高音）、“囊音对”（即鼻音）。演唱时，不化妆，无道具，二人边舞边唱，动

作简单朴实，潇洒豪放，各地有别。每唱完一段，众和后一句（指两句式的曲），若是唱三句以上为一段的曲，众和每段后两句，段段如此。

三、合唱。当各村庄的唱把式们来到主人门前，大家合唱“恭喜曲”（有的地方叫“讨喜曲”），这种演唱形式很少见，歌词是这样的：

恭喜恭喜大恭喜，　　各庄的乡亲们来讨喜。
恭喜恭喜大恭喜，　　没拿一把茶秆者空讨喜。
你打个调来者我唱个曲，　　欢欢乐乐地讨上个喜！
唱的不好了不要生气，　　宴席的伙伙里要和气。
恭喜恭喜再恭喜，　　你喜我喜大家的喜！

有的地方，先由两个唱把式唱完一段，再由相随的人们和唱第二段。有时，歌手们先后到来，就在院中连舞带唱，作为开场曲，祝贺主人。

四、问答唱。这种形式只有在唱酒曲时出现。由主人（或客人）端酒在手，一问一答，相互敬酒祝辞，作为祝贺。

宴席曲的演唱规矩各地有别，大同小异。一般是歌手们自发传叫，到有喜事的家里去演唱，成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和爱好。有些家境宽余的人为了使其婚礼体面一些，就打发人去请周围著名的唱把式来演唱，唱罢后摆席招待，披红赏钱。家境一般的人家，起码得用好茶、烟、糖招待。若有拒绝或冷待唱把式的人家，他的名声在村庄里就会一败涂地。

在规模较大的宴席场中，唱把式较多的情况下，由各庄自成体系的唱把式们轮流演唱，先让著名的，后让远路的，再让附近跟前的唱把式唱，进行比赛、学习和交流。听众大部是本庄乡亲和客人以及随同歌手而来的爱好者。

宴席曲的舞蹈基本上是2人或4人对歌对舞，旁人伴唱或众合形式。它的基本动作和动作名称几乎都是用拳术名字组成的，

如：鹞子翻身、黑鹰展翅、老爷抽刀、三道步、雁落平沙、四门斗子、犀牛望月、大小梅花、虎展腿、凤凰点头等，每首不同曲调的宴席曲一般都有固定的动作。这些刚健挺拔、潇洒奔放、浪漫豪爽的舞蹈动作，处处表现出回族人民强悍不屈、英勇豪迈的性格特点和民族精神，反映了回族人民热爱武术的优良传统和把拳术溶入自己舞蹈的独创精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1. 宴席曲都由男的演唱，妇女不能参加演唱。
2. 从内容上看，回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加上了回族的舞蹈形式以及曲调和自己的风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宴席曲。
3. 从风俗习惯上看，回族歌手们有意识地回避了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借汉族的口气唱出了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回族姑娘的口弦

丁一波

太阳出来照山川，
妹子邀我割马莲，
有心唤我怕爹娘，
口弦声声传真言。

在塞上江南的宁夏川，特别是南部山区的回族姑娘们最爱弹用竹子做的“口弦”。

“口弦”俗称“口口”，是一种民间袖珍乐器。巧手的回族姑娘们用篦梁或竹片削成三寸长的酒瓶形弦身，中间刻一舌簧，弹奏时将舌簧的一端轻轻含入双唇间，用丝线流苏吊穗扯动另一端，口弦簧则产生震动，于是便会发出“嗡嗡”的声响。弹奏的姑娘按照口形、气力的变化，借以传递心声，这种声响也叫口弦语。

相传很早以前，六盘山区遇到大旱，庄稼枯萎了，人畜眼看就要渴死了，小伙子和姑娘们翻山越岭找泉水，找了7天7夜，有位叫哈丹的姑娘发现了擀面杖粗的小泉眼，水汩汩地往外流，她正准备用柳枝撬土，冷不防被毒蛇咬了一口，这时恰巧她的情人达乌旦赶来，杀死了毒蛇，连忙用药草救活了哈旦姑娘，可是，哈旦姑娘再也不会说话了。她为了表示对达乌旦的深情，砍下黄竹子做成了口弦，用口弦语倾诉心中的痛苦和对达乌旦的爱恋。后来回族姑娘为了纪念哈旦姑娘，人人做了一只口弦，以表示对她的怀念。现在，每当春夏，在小河边，在山坡上，在柳荫下，回族姑娘们三五成群，比赛看谁弹的口弦最动听。她们能弹出很多诸如“骆驼铃”、“房檐滴水”、“珍珠倒卷空”等口弦令调，有时独弹，其时一人领弹，众声附合，似淙淙的山泉，如喃喃的燕语，悠扬清远，传情逗趣，魅力无穷。

米泉县回族民歌手韩生元

杨　杰

米泉县是新疆回族人民较集中之地，素有回族民歌“花儿”之乡美称。韩生元就是深受米泉县回族人民爱戴的歌手之一，他

自编自唱“花儿”有300余首，还创作了小曲、快板、民间故事、谚语等200余首，先后被接收为新疆民间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会会员。

一、苦难的童年

他的祖父韩忠（1855—1912）是青海省沙沟扶儿湾有名的“花儿”歌手，常编写“花儿”，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21岁时，他离乡背井，流落到新疆呼图壁县，在富豪马商总家当长工。残酷的剥削，牛马不如的生话，迫使他愤怒地唱道：

口里口外都一样，财主是喝血的灰狼。

有朝一日我对上，扒下狼皮还我的帐。

马商总闻后，以“刁民不轨”之罪将韩忠活活打死。其父韩德奎（1892－1928）仍是自编“花儿”揭露地主的暴行：

马瘦毛长（者）尾巴短，财主爱钱不要脸；

欺压穷人（哈）把活干，要钱（哈）就用鞭子染。

地主得知后，于1928年9月将其父秘密吊打致死，韩生元的母亲也被地主用开水活活烫死。

时年仅7岁的韩生元成了孤儿，靠沿村乞讨度日。他继承父志，又有一付好嗓子，聪明好学，一学就会。有一86岁的孤老汉收养他，并传授其甘肃临夏“花儿”。他13岁时，即独立走乡串户，靠演唱“花儿”为生，并担负起养老汉之责。

一次，他唱了几首“洗蛾花儿”，受到甘、宁两地逃难人的欢迎。后来，他又唱了几首“河湟花儿”，又得到青海逃到新疆的难民叫好。他想，如果把两种“花儿”揉合在一起，估计会受到来自各地难民的欢迎。于是，他走乡串户，拜各地“花儿”歌手为师，开始改唱新“花儿”。此时，害死他祖父的马商总狗腿子在破庙里找见他说：“你唱的不错，老爷请你到公馆唱几天。”韩拒绝说：“我不去！”狗腿子脸一沉：“明天你就是马老太爷

的长工，还你老子欠下的债！”说罢便扬长而去。爷孙俩抱头痛哭，乃乘风雨交加之夜，他搀扶老汉逃离了栖息6年的破庙，走进了茫茫的戈壁荒滩。几天后，老人去世，又丢下他一人。

二、“新疆花儿”

1934年夏，他逃离呼图壁县后，流落在米泉县。他曾心酸地唱道：

财主要了（哈）阿爷的命，命苦哩。娘老子死在一个坑，三辈儿留下我一条根，孤儿命苦哩，乾德县的大路上哭哩。

他边流浪边唱世道的不平：

穷人是苦豆子窝里的命，漫花儿，声声唱的是哭腔；有朝一日（哈）炸雷响，天塌下，阴间里把帐算下。

他乞讨到米泉县马场湖，人地两生，不敢贸然唱“花儿”。为生计，他给一姓马的地主当长工，白天一声不吭的下地干活，夜里苦思着新“花儿”。他把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编成唱词，三五遍地默默背诵着。两年后，他用新的“花儿”唱出了回族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的心声：

鸡叫头遍（者）把活干，黑摸的干，狗腿远处看哩；只让干活（哈）不让暖，丢个盹，脊背上就是两皮鞭。

他创造的这种新“花儿”，在格调上虽然没有“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严谨和特有的地方土语化，但在使用新疆方言土语的咬字吐音上则大众化了，唱词组织上更显得自由化了。在唱法上，他吸收各家之长，形成了“新疆花儿”的风格。所以，深受来自西北各地回民的喜爱。

三、跟着时代前进的“花儿”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后，他欣喜若狂，唱道：

东路上来了（哈）共产党，兰州城摆（哈）的战场。一仗打

垮了马步芳，和平解放了新疆。

王震将军(哈)领兵来，咋么个兵，神兵神将的解放军。解放军（哈）爱百姓，美的很哩，穷人要过上好光阴。

土改时期，他是农会主席，积极带领群众减租反霸。在穷人分得土地的大会上，他激动地高声唱道：

乳牛娃靠妈妈的奶水长，一场春雨稻苗儿壮。穷人翻身(哈)作主人，全靠伟大的共产党。

他的“花儿”唱出了穷人心里话，全场一片“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54年10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宣誓大会上，他热泪盈眶，深情地唱出了心里话：

共产党好比（者）亲爹娘，苦苗儿在红旗下入了党。党叫干啥（哈）我干啥，舍上个眼珠子也心甘。

1965年，他在县上听了自治区主席王恩茂关于建设新农村的报告后，又编“花儿”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

花里头要数牡丹花好，新农村要数兵团好。“五好”建设齐开展，汗水流出个新米泉。

他不断地吸收各种“花儿”的艺术精华，把新疆“花儿”提到一个新水平。他说：“山外有山山更高，人外有人人更强。”他追求的是，“花儿”不断的升华和提高，使回族人民喜爱的这朵艺术之花，在祖国民族艺术的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艳丽，更加芬芳。

河州的回族砖雕

李　亨

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砖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解放后在临夏市、临夏、康乐等县发掘的五座金代砖墓中就有大量精美的砖雕图案。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为临夏市南龙乡王闵家村南宋墓主人“进义校尉”王吉之墓，建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距今800多年。此墓由1000多块砖砌成，墓门券式，有甬道通墓室。墓室正方形，上部悬铜镜一枚，四壁为仿木建筑，犹如一座豪华宅院。墓内砖雕有人物：“王祥卧冰求鱼”、“李孙原毅”（深山葬母）；有动物：奔鹿龙蛇、猛狮；有花卉：牡丹、荷花等图案。雕刻精美细腻，造形生动逼真，表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这座砖墓现已搬迁到临夏博物馆复原展出。明清建筑的代表——河州北寺及万寿观也有许多砖雕佳作，北寺的砖塔，万寿观上的宝塔，有13级造像和图案装饰，不幸先后毁于民国17年（1928年）“河州事变”和“文化大革命”。

元、明、清时期，随着回族人在河州的定居和发展，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回族人口急剧增加，他们学习和借鉴当地汉族砖雕艺术的优秀成果，运用于自己的建筑技巧，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河州回族砖雕艺术的最大特点是：由于受伊斯兰教戒律的影响，砖雕图案多以山水花鸟为主体，一般没有人物及神像造型。著名的晚清回族砖雕艺术建筑幸存的有临夏市清真北寺砖雕、大拱北清真寺砖雕、

红园砖雕。北寺照壁高24尺，其顶为仿宋建筑结构，壁正中为浮雕的“墨龙三观”，龙的首、腰、尾三部分展现在浓云之中；壁左右为“凤凰来仪”，象征着盛世一派升平景象。四周镶嵌着镂空的博古蔬果，表现了中国式的对称艺术风格。大拱北系统的四川阆中县“久照亭”拱北，据《阆中县志》记载，系乾隆十三年（1847年）由甘肃临夏回族工人所建。进入磨砖圆门即有一砖雕照壁，全用特制方砖细磨雕刻而成，壁中心有一幅长2米、高1米的阆中古城全景浮雕图，其上镂空的花卉树木、山水楼阁布局分明，线条自如，一架浮雕桥横贯于嘉陵江上，静静地待人畜通过；在照壁反面，雕有松竹、荷花，笔工细腻，荷花亭亭玉立，出污泥而不染，和今日临夏市大拱北甬道正面砖雕所刻荷花，惟妙惟俏，如出一人之手。临夏市红园一字厅南侧照壁上的《泰山日出图》，采用国画荷叶皴的技法，两峰巍峨对峙，峭拔挺秀；中间石经奇险，逶迤曲折；更有宝塔耸立，泉水淙淙，崇阁朝阳，轩窗当风，面对这幅艺术珍品，似有身临其境，心旷神怡之感。北侧照壁上的一幅《多子双喜图》更是玲珑别致，惹人喜爱，石榴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只喜鹊，已饱尝了那珍珠似的熟透子粒，正用一只爪子擦去尖喙上的残汁，高超的构思，精湛的雕工，把生动的意趣再现在砖上。还有《碧波荷花图》更是巧夺天工，清风徐来，碧波荡漾，那碧波好像要破壁流淌下来，而荷花的幽香仿佛溢满了甬道，熏醉了游人，整个画面是那样传神逼真，那样令人神往。还有一幅《五松图》，描绘了泰山“五大夫松”的典故。五棵虎皮松盘根错节，古干参天，龙鳞虬须，蓊郁苍翠，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正如河州一位诗人描写的那样：“丹心捧日凌琼霄，黛色冲寒不肯凋”。

30年代初，河州马步青建造的三层木结构的私人官邸，称之为“东公馆”，在现存的砖雕艺术遗迹中是甘肃“砖雕集锦”之一，名闻遐迩。其规模之大，题材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吸收国

画程度之高、雕镂之精微，造型之优美，装饰领域之广阔，被观赏者评为西北第一流水平，是全国的上称妙作，蔚为壮观。

"东公馆"的建筑群，厅院相连，亭台楼阁，曲径迴廊，多用砖雕装饰。壁墙画廊中山河日月，飞禽走兽，均运用了东方艺术独特的线条美，意境深邃，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出之感。独具匠心的砖雕艺术家，以美学的动与静、平与奇、虚与实、疏与密、工与意、精与粗的辩证关系，使作品富有立体感，静如平湖明镜，动若行云流水，功见刀法，意在条纹，平中有奇，奇中有平。许多图案运用了精细的密体砖雕、书法线条，图案造型独特，神韵多姿。

当你进入一字门，便可见到扇形、圆形、方形和葫芦形结合的门洞。洞门两边相映，门楣更具美色，仿景泰蓝的一对宝瓶布置左右，采用雕刻和镂空相结合的手法，里面插着国色天香的牡丹，逼真的花瓣，玲珑剔透，层次分明，硕大的花朵，娇丽典雅，雍容华贵。门楣采用仿木四层结构建造，以名花蔬果和行云流水雕镂装饰于各层，形成砖雕洞门。

正面影壁上大型的《江山图》，宏伟雄奇，气势磅礴，是一幅尽收祖国山河于其上的巨幅力作，展现了祖国山河的壮丽景色；红日高照，山势峥嵘，波光粼粼的江水环绕小岛，苍翠的青松布满巍峨的山峦，江面上白帆点点，桅杆倒影水中，浮光耀金；山崖松林里高阙崇阁，无垠的碧空飘荡着白云，万里江山尽收一图；"间摘柳条编太极，细分花瓣点河山"，使诗书画意，溶为一体；周围是古典图案，雕刻的花边，方方连接，块块衔接紧凑。

前院门壁的一架葡萄，雕工纯熟，朴实动人。透熟的葡萄颗颗诱人，使人馋涎欲滴，进入洞门 正前方壁上的"松月图"更是惹人注目。明月高挂，千年古松郁郁葱葱，山崖之间山花烂漫，整个画面潇洒流畅，才气横溢，形象地表现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

正院南边的两边坎墙，两幅绝妙佳作映入眼帘：左面是红日高照下的花王牡丹图，正在含苞欲放；右面是“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荷花，亭亭玉立，争奇斗妍，美不胜收。

在三层楼的两侧，各有一幅上乘砖雕，其右，在奇石小草衬托下，苍翠宽大的芭蕉正旺盛生长；其左，在中秋明月下，深邃莫测；后面林中飞瀑垂挂百尺，撒竹散玉，分外引人。

东公馆院与院走廊连接，廊间全部镶嵌砖雕木刻，题材广泛，俯拾皆是，有些取材于临夏的自然风貌，其山、水、花、鸟、虫、草，显得朴实、亲切，生机勃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出了回族砖雕家的艺术构思。江山图，寓情于物，含蓄地表达了临夏各族人民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恋之情。而“五福捧寿”、“喜图”、“傲霜秋菊”、“参天松柏”、“风中翠竹”、“南方芭蕉”，则以浪漫主义手法表达出了人民的理想和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河州回族砖雕在80年代以前，有“捏活”、“刻活”之分。所谓“捏活”，就是先用配制好的粘土泥巴，用手和模具捏成龙、凤、狮、虎及各种花卉鸟虫等图案，而后入窑焙烧成砖，然后装饰于古典建筑的屋脊飞檐之上。所谓“刻活”，纯粹是在烧成的青砖（称细棉砖）上用刻刀制成各种浮雕图案和画幅，然后块块对接，形成画屏。由于回族不崇拜偶像，其雕刻艺术在山、川、日、月、鸟、兽、花卉博古等方面精益求精，并有所发挥。自清朝以来，这种建筑艺术广泛运用于青海、甘南及兰州、宁夏等地的回、藏、汉各民族的寺庙观庵、官厅公寓等方面，闪烁着古朴典雅的艺术光彩。在建筑物的各个部位，如山墙影壁、甬道、门洞等，因物设图案，巧施雕镂，美不胜收。在80年代以来，水泥钢筋建筑民用之后，砖雕艺术又有新发展。目前，在落实党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宗教寺院相继恢复重建，在临夏境内，出现了大量的仿砖雕水泥雕塑图案，如老王寺“赞圣词”，即用

仿砖雕的水泥刻字而成；南关大寺石壁墙上的“御赐连根古寺”图案，就是大型《江山图》的再现。其他如老华寺、大西关寺、前河沿清真寺、华寺拱北寺等最新建筑，各种经文图案、花卉博古，均用水泥砌制而成，目前这种捏刻的建筑风格因为减少焙烧、块刻手续，向大型高超方面发展，前景广阔。

河州自清至民国，回族中有几户砖雕世家，他们是绽成元、周声普及周镜堂、周镜德兄弟等。红园一字厅及东公馆的砖雕艺术，皆由绽成元及周声普2人设计完成；周氏弟兄之一周镜德曾在青海的化隆县为藏民设计吓群、达郎及拉卜甲三座寺院，近年又为化隆的群科、下多巴、上多巴三座清真寺设计完工三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唤醒楼。后起之秀李福海（回）为老王寺、华寺拱北寺设计了仿砖雕的水泥雕刻的各种花卉、经文及汉字图案。1985年，绽成元的儿子绽义带领一批学徒工修建了兰州邓家花园。一代新人陈进宝、周学礼、周尕率、周福福等都已投入砖雕、泥塑行列，为河州砖雕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协供稿）

回族武术

王新武

多年来，回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健身和自卫，学拳练武的比较普遍。各地清真寺的阿訇、伊玛目在向穆斯林讲“湿而滋”时，引用《古兰经》明训：“当你受到侵犯的时候，真主就授予了你反抗的权利”。穆斯林把习武看作是“随乃太”（圣行），激

励尚武精神，使回民习武形成传统，久盛不衰。

武术种类和特点

回民习武多在清真寺或寺的附近，所以武术界称回族武术为“清真教门拳”。拳谚中的“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可兹证明。后人们又把回族常习的拳种、器械、练功方法称为“昆仑派”，以西域昆仑山为标志，与少林、武当、峨嵋并称中国武术的四大武术流派。

由于回民居住是大分散，小集中，数百年来多与汉族杂居，又缺可靠资料记载，故尚难断言哪些是回族武术。这里，我们只介绍各地回民常习流行的几种。

（1）弹腿，有10路、12路、查拳弹腿之分。回民弹腿以其简练、朴实、严谨、功架规整、腿法考究、攻防意念清楚而著称，受到武林人士的喜爱，现已成为长拳基本功的组成部分，是长拳入门的向导和技术进步的阶梯。弹腿歌诀曰：“昆仑先师世界传，名曰弹腿奥无边。头路顺走人难挡，二路十字用脚尖……”，它的开头与结尾都有“都瓦依”式（双掌抹剑，捋髯动作），标出穆斯林特色。山东的王兆林、杨恩成，陕西的马恩臣，上海的马全林，南京的马心田等先辈都为传播弹腿做出过贡献。

（2）查拳，共10路，其中以4路查、5路查流传最广。

查拳的技术要求是：姿势舒展，发力顺达，动迅静定，协调完整，节奏鲜明。套路中有汤瓶式。现在流传的很多优秀长拳套路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查拳动作。

查拳盛于山东冠县、河北沧州、河南开封等回民聚居区。在武林天地中久负盛名的查拳名家都是回族，如山东杨洪修阿訇、张学生、于振声、马锦标、河北“大力王”王子平、河南常振芳等。

（3）回回18肘，是以肘法居多的短打招法，有“10手不如1

肘”之说。开式有“依玛尼”（右食指竖于鼻前）式，结束有“都瓦依”式，突出了穆斯林特点。此拳由宁夏固原回族拳师居奎在1985年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中所献（详见《宁夏拳械录》）。

（4）鱼尾剑，样式奇特，剑端呈鱼尾形，两个尖刃。据回族拳师居奎讲，他的鱼尾剑是祖传，上铸有阿拉伯文“阿里之剑”字样，可惜在十年浩劫中丢失。

（5）汤瓶7式，以汤瓶式为基式，7个大式又各派生出7个小式，共49式。由于视为回民“看家拳”，密不外传，鲜为人知。但回族老人杨耀钧、河南周口地区的一些老武师还可忆起一部分，急待挖掘和继承，以免失传。

（6）心意六合拳，相传是河南洛阳回民马学礼向山西名师姬隆风学形意拳后改创，买壮图所传，以10大形、鸡形4把最为流行。安徽回族武术家陶子鸿先生所写的心意六合拳著作已在宁夏出版。

心意六合拳以劲力雄浑，动静相济，快速整齐，节奏分明，神形统一为其特点，特别强调“内三合”、“外三合”。

（7）通臂劈挂拳，盛于河北沧州，传播全国，以回族武术家马凤图为代表，其子贤达副教授（全国武协委员、陕西省体委副主任）长于该拳。演练起来，甩膀抖腕，冷弹柔进，大劈大挂，两臂生风，气势雄伟，技法多样，风格独特，为很多武术爱好者所倾慕。

（8）八级拳，在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世代相传。八级拳的特点是动作简洁，劲力充实，短小精悍，发劲爆烈，讲究“崩撼突击”，“以短制长”。多肘、肩、背的撞靠动作。

（9）穆斯林八卦太级拳，是已故宁夏西吉县政协副主席于志祥阿訇所献的技艺。于老阿訇通汉、阿、波斯文，学识渊博，珍藏着阿文本的八卦太级拳书籍。

（10）穆斯林拳，是流传在宁夏固原地区民间的一种拳术，颇

具西北拳种特色，也有“依玛尼”、“都瓦依”和“汤瓶式”等动作。

（11）棍和鞭杆（5尺为棍，3尺为鞭杆），是西北回民多用的武术器械。武林谚语中：“东枪西棍”，指出我国西部各省区多棍术。西北是回民大面积聚居区，为何多习棍、鞭杆之类？可能与清王朝血腥镇压回民起义后禁止习武有关。据悉，清同治年间派左宗棠血腥屠杀回民，视回民习武为“谋反”，明令：“持械行走，课以重罚”，“聚众习武视同谋反”。从此，西北回民习武只能私下家传，无兵器可用，只能以棍棒、放羊鞭代之。由于当时西北回民被迁赶至穷乡僻壤，生活艰难，又禁习武，造成了西北回民武术在建国前已处于几乎失传的状态。

此外，由于“穆罕默德的宝剑”的传说，回民对宝剑很尊重，先师说曾有“苏勒剑”、“古兰剑”、“穆圣剑”等套路，但至今尚未见识。

回族历代习武名人

回族尚武，除上边提到的近代武术名师马学礼、买壮图、杨洪修、王子平、马凤图、常振芳等代表人物外，当代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如：北京体院教授张文广、广州体院教授张登魁、陕西体委副主任马贤达、上海体院副教授王菊蓉、山东工业大学副教授王新泉等都是回族武术界的皎皎者。在陕西、上海、江苏、宁夏、河南、广东、云南等省的武术队中都有回族教练员。回族运动员在全国以陕西省的赵长军最为突出，他蝉联四届全国武术全能冠军，荣任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安徽的白艳侠、朱多娟，吉林的韩炳男，北京的回旭娜，宁夏的王梁等都名噪武坛，多次在全国武术大赛中名列前茅并出国访问。

从普及面讲，以中国武术协会组成人员为例，主席副主席13人中，有3人是回族，占23%；委员84人中有回族12人，占

14.2%；全国武协下设3个委员会，9名正副主任中有3人是回族，占33.3%。这些数字都成倍地高于回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0.8%的比例。再如，参加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777名少数民族运动员中，回族队员130人，占17%，而参加武术比赛项目的在70%以上。其中山东、山西、上海、天津、江苏、安徽、河北、河南、陕西九省市的运动员都是以回族为主体，以武术为主项，说明武术项目在回族体育中的传统地位。

三、宁夏武术之发展

解放前，宁夏武术已奄奄一息。建国后，民族平等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宁夏武术也有了复苏。“张家枪，何家棍，马家软功，赵家的劲”在民间传播，银川的马洪，海原的马振武，固原的居奎，吴忠的何生洲、张明德等先后授徒，公开习武，活跃了回汉人民的体育生活。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1958年12月组建了自治区第一个少年武术队，1959年9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运会，蒋鸿燕的九节鞭获二等奖。1963年正式成立宁夏武术队，蒋鸿燕和王新武在全国武术比赛中多次获得好成绩，1978年6月在西北五省（区）武术比赛中，宁夏队获团体总分第二名，成为仅次于陕西队的西北武术劲旅。同时群众性武术活动日益发展，太极拳辅导站相继建立，公园、街头到处可见习武者。特别是马振武在全国武术观摩交流会上连续四次获一等奖，李小萍四次出访14个国家和地区，她的双鞭风靡中外，大大提高了武术在宁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1983年7月宁夏武术协会成立，从而标志着宁夏武术从濒临湮没到发展壮大，从默默无闻到全国知名，从技艺落后到正规提高，从冷冷清清到形成武术热，宁夏武术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回族老拳师马怀德

牛怀民　马迪甫

回族拳师马怀德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祖籍甘肃永登县芝阳镇，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迁居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南庄子。他幼年读过阿文和私塾，成年后善于绘国画，以裱字画为生。1953年逝世，终年88岁。

马怀德出生于武术世家，从小酷爱武术。其父参加宁夏金积堡反清斗争牺牲后，他跟随人称“三太爷”的堂叔马梅亭练功习武，他闻鸡起舞，寒暑不辍。虽然武功日深，名气颇盛，但他崇尚武德，绝不逞威，成名后仍向诸家请教，精益求精。

民国初年，他向兰州古城王门下学八门拳“分手八块”，又和号称西北名手“金蛤蟆”闵世杰切磋武术对练和散打，还在甘肃八大王手下学“周家母子”，与秦人张百川互磋“撕拳”、“登州捶”等。在原有家传少林武术基础上，不断吸收名家之长，推陈出新，逐步发展成为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八门拳种”。在永登时，他曾与马梅亭设擂，合力击败山东武术高手，继而数次与外地拳师交手，都操胜券；许多武林人士慕其武艺，凡到此地无不登门拜访，当时武术界均称马怀德为永登之“铁门坎”。但由于武功高强，树大招风，惹来多方武士之嫉妒。在其迁居民和县后，来与其比武者不乏其人。在七里寺农历六月六的一次庙会上，突来一甘肃临夏绰号“贼尕弟”的高手马世良，他气势汹汹，扬言“拳打河西，脚踢甘青”，指名要与马怀德比试较量。

忍不住心头怒火的怀德准备出场，而众弟子和友好再三劝他，勿与鲁夫计较，唯恐万一有失，实不合算。可是，马拳师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在双方激烈的拳脚较量中，他窥视对方破绽，使出“袖里梅花一点红”的翻手掌绝技，将“贼尔弟”推出场外数尺之遥，赢得了胜利。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召集陕甘青各省著名武术家，在兰州五泉山举行西北武术表演，四方豪杰云集。由于老拳师武艺精湛超众，舒展大方，风格独特，获得个人全能之冠，受奖一口“龙泉宝剑”，誉满河湟。

民国28年（1939年），青海著名武术家包得胜目中无人，趾高气扬，专程前往民和，夸口“拳打陕甘两省，脚踢西北英雄”，在一年一度的七里寺庙会上设擂比武，专与马怀德较量，见高低。在胜负的关键时刻，马怀德用“戳脚推掌”，将包打翻在地。经此次较量，包敬佩马的武艺，心悦诚服地拜怀德为师。

民国32年（1943年），永登驻军骑兵第五师师长马呈祥和当地县长李纲、绅士高裕武等人联合邀请各地武术家举办武术会演。在散打比赛中，马怀德又获胜受奖荣归。由于他勤学苦练，尤其历年来不断与各方众多高手比武，并善于吸取他人之长，功力显得日益精湛，力挫群英，名扬四方。当地驻军61师师长马全义慕其拳艺，欲试其武功。民国33年（1944年），马全义示意部队教官邓发旺在民和县享堂摆下擂台，与老拳师决斗。邓正值壮年，力大过人，单腿能挑起盛满水的驮桶，曾在乐都比武中打死人，这次摆擂比试，又扬言“死不偿命，立下生死状”。老拳师不畏官势，不惧强手，抱着誓死制“敌”取胜的决心，即按伊斯兰教规，洁身更衣，备好穿布（回民死亡后埋葬时所穿用的白布，规定男穿三丈三尺），安排好后事，毅然前往享堂，与邓生死交锋。老拳师胸有成竹，交手不久，即看出邓之弱点，勇气倍增。而借军威自以为取胜无疑的邓教官，自不量力，施展猛劲，想一拳击倒

老拳师。怀德以柔克刚，镇静若虚，在难分难解之际，乘其拳路之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荷叶掌”绝招，击中其面部。邓当即口鼻流血，急步退出半场，因恼羞成怒，邓稍息片刻后复冲上来，欲消此辱。当时马全义恐遭不测，当场阻止，喝令：“军人不与老百姓计较！”就此草草收场了事。此后，军方就以每年约500斤饷粮，聘马怀德为当地驻军武术教练。

同年，马全义将怀德多次赢得甘青宁名手比赛之优胜及为青海争光等事迹面陈马步芳，马步芳即聘马怀德任82军军长马继援（马步芳之子）之拳师。

马继援对他敬如上宾，吃饭同席。还特意安排住所，配备所需衣物用具、乘马侍从，款待甚周。马怀德任马继援拳师后，虽受到厚待，声誉日增，远近皆闻，但他从不倚此高傲自满，仗势欺人，而是一如既往，谦虚地处事待人，每日早晚从不骑马，徒步于西宁至乐家湾之间（往返15公里）。

当时西宁尚武成风，特别是部队和昆仑中学及其附属一、二两小学，都先后成立武术组织，聘名师，请教练，学醉拳、猴拳及单刀破矛等徒手与持械武术，尤其团体劈刀，普遍盛行。在各单位大力提倡苦练，择优选拔，重点培养之后，武艺不断提高。民国31至32年间，曾由官方邀请陕、甘、青、宁各省武术名流，前后两次在西宁举行规模宏大的拳把式观摩比赛，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来西宁的约有四五百高手，老拳师在两次比赛中均名列前茅。因此，他被聘为青海国术馆总教练。

马怀德老拳师一向谦虚谨慎，从不因屡受嘉奖而居功自满，仍专心苦练，平易近人，并能团结各方，努力消除派别分歧，善于吸取各家之长，精益求精。他曾将自己练就的软硬功夫传授给各族武术爱好者，为此而引起伊斯兰教内个别阿訇的强烈反对，说武术传授给外人，是违背教规，是不务正业的行为。但他不因舆论的攻击而退缩，仍一如既往，毫无保留地传授。

解放后，他所教的徒弟中，有的分别担任了省、市、县的武协主席和教练，如西宁市武协主席冶国福，民和武协主席马成乾（其孙儿）等人。他的门徒中除回族外，尚有汉族牛怀民、土族包生辉、藏族麻欠、撒拉族韩得铭等。因此，他受到各族武术爱好者的尊敬和爱戴。

回民习俗简述

马玉琪

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来自伊斯兰教义和《圣训》及阿拉伯社会的一些古习，还有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同汉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中国的回族人民虽然居住分散，但风俗习惯是大同小异。

节日及纪念日

回族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一样，都过“开斋节”、古尔邦节”。“开斋节”亦称为“肉孜节”，在回历十月一日举行。“古尔邦节”在回历十二月十日举行。两大节日相隔70天。节日之前家家户户都要大搞卫生，准备节日食品——炸馓子、炸油果。节日清晨还要炸油饼，烩粉汤。男性教民都要去清真寺“聚礼”。过“古尔邦节”时，有条件的人家都要宰羊（过去还有宰牛的）。宰羊的限期为3天。肉可分为3份，1份散给他人，1份请客诵《古兰经》，1份留自己吃。节日期间要求教民服装整齐、清洁，还要走亲访友，互相祝福。“开斋节”之后的100天为“阿夫拉

日”，大多数的回族人民都要吃7种粮食做成的粥（即大米、绿豆、黄豆、玉米、菜豆等），清真寺内还请客诵《古兰经》，赞圣庆祝。

回历三月十二日为圣纪日（穆圣诞辰日）。

禁　忌

回族的禁忌较多，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圣训》的规定。但现在已成为回族人民的传统习俗。例如：不食猪肉、骡子肉、驴肉、马肉以及凶禽猛兽之肉。任何家禽和牲畜被宰时流出的血浆都在禁忌之内，不能吃、喝。未经高呼“安拉”之名宰割的动物也禁忌食用。禁食鸦片、吗啡、海洛因等。烟酒亦为禁物，但现时不甚严格，好多年轻人都在吸烟。赌博是严格禁绝的。凡是禁物既不能吃，也不能买卖。

大　小　净

洗全身称大净，洗身体的局部称小净。回族人很讲究卫生，常做礼拜的中老年人每日的五次礼拜都要小净。读《古兰经》、送葬也要小净。但小净在大净之中，没有大净，小净是不成的。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是常做大小净的，一旦大净失去立即要洗，否则是不出远门的。

怎样的情况下失去小净？那就是：大小便、排气、出血、疮伤流浓血、呕吐、昏晕、疯癫等。

洗小净的程序是：洗手、洗两便、又洗手、漱口、饯鼻、洗面、洗两肘、抹头、抹耳及颈、洗两脚等。

怎样的情况失去大净？那就是：梦遗出精、夫妻同居、月经、分娩等。

洗大净的程序是：洗手、洗两便、又洗手、漱口、饯鼻、洗面、洗两肘、洗头、洗周身、洗两脚等。

回族中老年人很讲究沐浴。他们认为沐浴为万功之入门，做小净用汤瓶不用脸盆，做大净以沐浴为甚。

经名与葬礼

回族人有一习惯，即在婴儿出生后三天，请阿訇念经取名，谓之“经名”；孩子长大到读书时再起大名，谓之“学名”。出生后30天请客做满月，到了一岁则要吃“岁岁面”。男孩七岁时要进行“割礼”，女孩则要扎耳眼。

回族主张速葬，其葬礼一般讲是简单的。先在病人病危之际请阿訇念“讨白”（忏悔词），其次是病人咽气后，守护者即瞑其目，合其口，顺其手足，置遗体于洁净的土上。亲朋故友前来吊唁、送钱、送羊、送面、送油等以资助葬费，但不送花圈和挽联。在送葬前必须以洁净的温水洗濯遗体，穿“卡凡”（用两块写有经文的白布裹之）。这时请阿訇、满拉及念经的人站个圆圈，用《古兰经》转“乃率斯”。给每个接《古兰经》的人散钱（以资还补亡人在世时耽误的念、礼、斋、课、朝），之后把亡人移入“塔布匣子”，抬到院子的西端，头北足南。送葬者自动排成整齐的南北行，在阿訇的率领下屏声静气站在“塔布匣子”的东边，面向西给死者站“者那则”，也可说是给亡人开追悼会。送葬时妇女不去送殡，不去坟地。回族埋葬不用灵柩实行土葬。坟深4至5尺，长6尺，宽3尺。离坟底1尺处依西首穿穴，穴口深3尺，穴内南北长6尺，高3尺，上圆如弓背，下方为弓弦，将遗体置于内，枕北，足南，面西。坟内不放任何物体，穴口也不用砖石木料砌筑，只用土坯堵起，然后填实直坑。地面上堆成南北方向的鱼脊形坟堆。亡人入葬时，阿訇、满拉（学生）和其他人跪在坟前诵读《古兰经》，高声赞圣，送葬者环跪在坟的周围聆听。待坟包堆起，《古兰经》也已读完，算送葬完毕。此时主人请送葬者到家聆听阿訇诵《古兰经》，赞圣已毕，吃粉汤、油饼以谢

大家。回族在送葬时有施散钱财的习俗，富者多散，贫者少散，量力而行，没有定额。葬后亡人生前的衣服基本上都要散给鳏、寡、孤、独、无依无靠或贫穷者。葬后的7日、40日、100日、周年都可请阿訇及亲朋故友来家中诵读《古兰经》，赞圣纪念。

无依无靠或者外乡人亡故后，回族群众都会自觉自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相助，料理丧事。

饮　食

回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从事农业者较多，居住在城镇的多数都从事饮食服务业。在党的搞活、开放政策指导下，大批农村回族青年进城经商。凡是车水马龙的交通要道，熙熙攘攘的闹市，都可以看到头戴白帽，身穿白衣的回族男女叫卖着自己的美味食品。小吃名目繁多，如炒面、烩面、拌面、清汤牛肉面、汆汤肉、羊羔肉、粉条汤、杂碎汤、饺子、包子、馄饨、凉粉、凉面、酿皮子、火烧、油酥馍、油糕、油饼、麻花等等。这些小吃不仅是回族人民喜爱的食品，也受到其他民族的欢迎。这些小吃卫生、经济、实惠、可口，更受到进城赶市的农民和来往旅客们的欢迎。

回族人民家庭饮食：一般是拉条子、揪片子、臊子面、汤面条、大米饭、蒸馍、香豆花卷。也爱吃饺子、包子等。每逢节日家家户户都要炸馓子、炸油果、炸油饼、烩粉汤等。

回族人喜爱喝茶，一般以砖茶为主，但老年人多爱喝湖南花茶和熏茶，并要加方块白糖。

回族是好客的，招待客人多用盖碗盅子泡湖南茶和熏茶，除放白糖还要加红枣。个别人还要加核桃仁。桌子要摆13花的干果子（葡萄、杏干、核桃仁、花生、瓜籽、方块糖、水果糖等13样）。一般把请客吃饭称请客“喝茶”，可见对喝茶是很重视的。

回族人民过去办红白喜事，摆宴席惯用碗儿菜（又称“九碗三行子”，即碗蒸菜）。平时招待客人是4碟5碗，其中必有1

碟子或1碗红烧肉或者凉拌鸡肉。现在办喜事一般都是8至12盘子，但由于禁酒，所以不上小菜。肉食只限于牛肉、羊肉、鸡肉和鱼肉。

服　饰

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回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均有很大的提高，服饰也有了大的突破和改变，特别是男女青年的服饰追求时髦、新颖、大方、合体、美观，同汉族青年的服饰没有多大区别。但老年人还保留着过去的某些民族特征。

解放前回族青年妇女都要穿大襟绣花外衣，旗袍、旗夹、绣花胸兜、绣花围裙、绣花鞋，喜欢佩戴玉石手镯、金戒指、金耳环。殷实人家妇女还戴金胸花、金发卡、金笼子、金手镯等。未婚少女一般都梳一条辫子，已婚妇女要梳两条辫子。老年妇女喜欢穿青色布料衣服和白色衬衣，脚上爱穿白色袜子和黑色平绒布鞋或条绒布鞋，蒙白色盖头或青色盖头，穿大襟上衣和大裆裤，爱扎腿带（膑骨上边裤口和袜口扎在一起）。中年以上男子多戴小白帽，爱穿白色衬衣，青色和棕色坎肩，到了中年还多留须。阿訇和常做礼拜的老年人则戴白色、黑色、紫色和绿色的金丝绒平顶帽，多穿黑色的外衣和呢子大衣，多穿皮袜子和套鞋。

礼　貌

回族人民讲究礼貌，晚辈见长老要说色俩目："安色俩目而来孔"，对方要回答："吾尔来孔目色俩目，吾热罕买同拉希"。前者的含意是："祝福你平安"。后者的含意是："平安在你上，真主慈悯你"。年岁相似的人见了面互相说色俩目问好。有些人说色俩目之外还要攥"梭勒哇提"（两人的双手紧握后，再从自己的额部抹到下巴），表示亲热和敬爱。如双方动干戈或吵嘴生气之后，愿和好时，以攥"梭勒哇提"，表示向真主作证我俩和

好。这种礼节对穆斯林之间的团结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妇女见了阿訇和长辈也说“色俩目”问好。

回族婚俗

李树辉

回族在婚姻方面一般限于本民族内部通婚，限制女性与非伊斯兰教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男性通婚。但男性可以娶非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的女性为妻。与回族结婚的非伊斯兰教男女（多是女性，男性罕见）则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履行一定的“进教”手续，接受伊斯兰教规的约束。解放后，这些要求也不太严格了。

同父或同母兄妹、堂兄妹、同乳兄妹不能通婚，但姑表兄妹之间可以通婚，也为社会舆论所允许。这种近亲结婚的习惯，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关于优生学的宣传已有很大改观。

解放前，回族内部不同教派之间极少通婚，解放后，一般不大受此限制。

回族在传统上不反对多妻制。按伊斯兰教规定，一个男子最多可以娶四个妻子。教规禁止“待众妻不公”，如果不能公平对待，则不能多娶。所以回族实行多妻制时没有妻妾之分和大小之别。解放前，除了地主富商外，大多数人还是一夫一妻的。解放后，随着婚姻法的实施，一夫多妻制已完全废除。

按伊斯兰教规定，离婚妇女和丧偶寡妇均可再嫁，但离婚妇女改嫁必须在3个月之后，寡妇再嫁也要在4个月零10天之后。

离婚时有孕者，需待分娩后40天方可再婚。这些习俗称作"守限"。

解放前，回族男女结婚年龄均较早，一般男16岁，女十四五岁即可成婚，甚至还有童婚的现象。解放后早婚现象已基本消除。

过去，婚姻都是以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决定的。男女双方在订婚以后才可见上一两面。解放后，男女青年自由恋爱得越来越多，但仍要征得父母的同意并按传统习惯完婚，回族的婚姻一般都要经过提亲、订婚、迎娶、婚礼等过程。

一、提　亲

提亲，又叫相亲。由男方委托一媒人（俗称"底媒"）携带礼品往女家提亲。礼品一般为茶叶、方糖、红枣和核桃（或点心），俗称"四色礼"、"行礼包子"或"包包子"。又因这是第一次礼品，故又被称作"开口礼"。"四色礼"均要用红布包裹，并连同红布一起送给女家。女家一般不轻易接受礼品。若不同意，便让"底媒"将礼品带回。如若收下，便暗示着将对这门亲事予以考虑，并着手对小伙子及其家庭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过半月许，"底媒"再携带"四色礼"前来"取话"。女家为慎重起见轻易不"给话"，待"底媒"来过三四次后方明朗自己的态度。

对女家来说，来家提亲得越多越高兴，并引以自豪。有的女家同时收下好几家的礼品，从中对男方进行比较、选择。他们要选择相貌、品德、为人处事、身体状况、劳动能力及对伊斯兰教规遵守好的男青年。此外，对于小伙子父母及兄弟姐妹的为人、家庭和睦状况、经济条件、住房等方面也要考虑。一经确定，便通过"底媒"转告男方，表明态度，谓之"给话"。这时女家留下被选中男方的礼品，其余则通过各家"底媒"一一退回。

男方在得到"回话"后，便委派"底媒"前往女家，请女家

聘两个媒人作为女方代言人（多由姑娘的长辈亲属充任），谓之"点媒"。同时，男方也要再请一"陪媒"（一般由小伙子的长辈亲属充任）作为男方的全权代表。而后，由"底媒"、"陪媒"陪同小伙子携带"四色礼"邀请两个"点媒"。"点媒"在见过小伙子之后，将其印象转告女方父母。这是女方对小伙子的一次考查，两"点媒"的印象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婚事的成败。因此，小伙子在见面时格外谨慎小心，唯恐出错。

见过"点媒"之后，若无什么变故，"底媒"便再来女家商议订婚事宜。

二、订　　婚

订婚，俗称"挂坠儿"。这天，男女双方都要宴请四大媒人。菜一般是九碗，包括鸡、鱼、肉等，其中的鸡是必不可少的。九碗菜摆在桌上，横竖都呈三行，故又俗称"九碗三行子"。

在男方的宴席上，主人或"底媒"、"陪媒"要将两条鸡腿分送给两"点媒"，以酬谢来回奔波之苦。宴后，主人便摆出备好的订婚礼品，请四大媒人一一过目，征求意见（主要是两"点媒"的意见）。若"点媒"满意，不说什么，男方两媒就让主人收起；若两"点媒"说还缺少什么，男方两媒则催促主人立即准备。

订婚礼品一般包括：

1. 金耳坠儿（"挂坠儿"即戴耳坠之意，因此耳坠儿是必不可少的）。

2. 衣服或布料，要求花、红、绿、蓝四色齐全，故又俗称此为"花红绿蓝"。

3. 日用化妆品各样一对，俗称"瓶瓶罐罐"。

4. "封子"，即用红纸包好的现金，一般在50至200元之间，俗称为"干礼"。

5.“四色礼”（茯茶一板，其它各以两斤为限）。

一般“干礼”及耳坠儿由“陪媒”携带，其它物品则由小伙子及“底媒”携带。

到女家后，主人也要设宴。这次宴上的两条鸡腿则自“点媒”分送“底媒”、“陪媒”，以酬谢男方两媒为此来往奔波之苦。

宴后，男方呈上礼品请主人过目。女方父母亲一般不参与，大多是姑娘的姊妹查看。若有不满意就当面提出，四大媒人则极力承允下次补办。而姑娘的父母在饭后总要对小伙子的脾性、为人、礼节等方面作些劝导工作或婉言的批评。

过去，姑娘在这天都不进客厅，只在外间走走，和小伙子相互瞅上几眼。现在，即使最保守的家庭也要让姑娘端茶倒水同小伙子见见面。

女方也要给男方“回礼”，礼品一般都是鞋袜。此外，女方若对男方的礼物满意，还要另给未来的公公送一件衬衣。

此后约过半月至一月，“底媒”再来商谈送“大礼”事宜，谓之“讨礼单”。

这次，女方要将男方必备物品一一提出。“底媒”为能准确转达女方的意见，往往要求开出礼单。此时，女方便将早已备好的礼单拿出。

礼单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三点：

1.衣物，一般最少也要四套，内衣内裤女方虽不要，男方亦得自动配齐。如果男方送来的是布料，裁剪缝纫费仍要由男方负担。这些衣物婚前都不能穿。所有衣物（包括前面所说的“花红绿蓝”），结婚时都要由娘家带回，一件不留，被称为“回头货”。

2.“干礼”，即现金。

3.“踩门礼”，即由男方准备送给女方亲属的“四色礼”，其数目根据女方亲属的多少来定，家家都要送到。这样，在姑娘出阁时，众亲属也都要陪送些嫁妆。

以后，女方不能再提要什么，若认为还缺少什么，则由女方自己补置。

男方按礼单及女方的其他要求准备已毕便提出商定婚期，女方也就予以协商。

在农村，结婚的吉日多定在冬春农闲季节，避过星期二、节日、双方家庭的忌日及姑娘经期。

吉日前三天，“底媒”要送一次“催妆”，包括棉衣、棉裤及“通信”（现金，一般为50至100元），以督促女方筹办结婚事宜。

三、嫁　娶

吉日清晨，女家打发一小孩（男女不限，一般为新娘的弟弟或妹妹）携带钉锤及一红色门帘往男家“钉门帘”，并催促男方迎娶。所谓“钉门帘”，就是将红布挽成一个花结钉在门楣之上。

门帘钉毕，新郎便由伴郎陪同前往娶亲。随行的除有两个伴娘及“底媒”和诸亲朋外，还必须有一个男性长辈。众人来到女方庭院后，男方两伴娘与女方两伴娘互相交换“红包”（即用红纸包的钱），而后在女方伴娘引领下前往闺房。双方伴娘一般均由已婚青年女子（孕妇、寡妇及无子女者除外）充任。男客们则要请出新娘父母及众亲属一一道“色俩目”恭贺。

众人入座后，新郎在伴郎的陪伴下一一拜见岳父母及众亲属，俗称“认大小”。女性亲属由岳母介绍，男性亲属由岳父介绍。每介绍一位，新郎和伴郎都要道一声“色俩目”，同时要双手合十从上至下行一次鞠躬礼，俗称“唱诺”。受礼者则捧起双手由下至上答礼，同时要说“尔来空色俩目”。

认过众亲之后，新郎还要为厨师及烧茶者行“开笼礼”，即送每人一份礼物以酬谢其辛劳。之后便开宴招待客人。

回族素有“耍新郎”习俗，喝茶时，给新郎斟上辣椒水或醋，

就餐时趁新郎不备，将许多馍馍掰碎泡进新郎的碗里。遇到这种情况，新郎也只得喝完、吃尽，不能剩下或显示出不高兴的神色。否则，有人会趁新郎不备将茶或饭打翻在他的脸上、身上。也有的趁新郎站起时偷偷抽去其坐椅，使新郎不备摔倒在地。这些恶作剧，往往搞得新郎狼狈不堪，出尽洋相。

一般，新娘在出阁前一天便开始缩食，更很少吃流食或饮水。若去夫家出恭，一则不便，二来亦被认为有失体面。吉日前夜，新娘的好友（姑娘们）均来话别，并陪伴新娘直至深夜，亦有彻夜不眠的。谓之“喝陪女茶”或“喝离娘茶”。

当娶亲者就餐时，女方伴娘便开始为新娘梳妆打扮，并为之“开脸”（用线拔脸上的汗毛）。打扮完毕，便为新娘戴上红绸“盖头”，等待启程。新娘在这期间总是哭哭啼啼的，在告别父母及诸亲友时更是痛哭不已，若哭得不甚伤心就会被人们耻笑，这种习俗尤其在农村一直保留到今天。

娘家送亲的除两伴娘外，还有一个新娘的男性长辈亲属及一个专为新娘“压箱”的小孩，其余的则都是新娘的同辈或下辈人，父母不送亲。

嫁妆一般由男方负责携带。所有男方送来的衣物，这时也都要交专人负责全部带回夫家。此外，娘家也同样要备一份“四色礼”送亲家。

娶亲队伍沿途常受到人们的阻拦。阻拦者多是青年人，他们用绳拦路，或设置路障，或干脆成群结伙地堵在路中，索取糖果、香烟等。遇到这种情况，聪明的新娘或送亲的人抓些糖果和硬币抛向人群，趁众人哄抢时迅速冲过。

回族人民也有“结婚三天之内不分大小”的说法，亦有戏弄公婆的习俗。娶亲队伍将至时，众人便捉住新郎的父母或其他近亲长辈，用锅灰或其他颜料将其面部涂抹成花脸，或用线串些圆萝卜块充作耳环吊在女性长辈的耳边，或套在其脖子上，再强令

其手中握把破扇子，令男性长辈翻穿破皮袄，腰间束一草绳，背上再斜插把破扫帚，倒骑在驴背上，在众人的哄拥下去迎接新娘。有的则干脆在新娘乘坐的车前拴一绳索，令公婆在前拉车。当其使劲拉车时，驾驶员或驭手便使车缓缓移动少许，并故意走走停停。每停一次，拉车者都会被拽一个趔趄。甚至前进1米，又被拖回10米。直到众人闹得尽兴了，才让把车拖到洞房前。在这些戏弄公婆的人中，除青年人之外，还有与公婆年龄相仿且交情不错的同辈人，他们往往还是起主要作用的。

四、婚　　礼

回族人结婚，洞房门上都挂有一红色门帘。因地区和教派不同，有的洞房内张灯结彩，贴挂彩画，门上张贴对联，在新娘到来及举行典礼时，还要鸣放鞭炮，有的则无这些习俗。

过去，回族有“占房”的习俗，即新郎要在新娘进入洞房之前抢先进去。新娘进入洞房后，坐在预先放在炕上的椅子上（再婚者的椅子在地上），然后举行宗教上的“尼卡”仪式。由阿訇诵“赞圣”经文（又作“米提孩”经），询问双方是否同意结合等。

现在，宗教上的“尼卡”仪式多是在吉日清晨或前一天举行。证婚的阿訇是男方根据女方的意愿出面邀请女方一坊的。若双方所属的教派不同，“尼卡”仪式有的按女方教派习惯进行，有的则按男方的教派习惯进行。阿訇在进行“尼卡”仪式时，除了要询问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妇之外，还要问清是否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验看结婚证书等。但新娘一般不参加这种仪式，而是由其长辈亲属充任“外克力”（代表）代答。

过去，新婚之夜或前一夜还要搞“自乐班”，吹拉弹唱，十分热闹。歌词内容大多是以该家喜事为主临时编就的。此外，吉日里还举办赛马、刁羊、摔跤等活动。

从前，回族待客因宗教关系一般不设烟酒。60年代以来，因回族青年中吸烟者越来越多，加之为招待汉族宾客，大都备有香烟，也有在饭馆承包酒席或自设酒席的。客人就座后，先摆上茶水及干鲜果品、葵花籽及“木梳蛋蛋”（一种用木梳压制成形后再用油炸熟的粒状面食品，其味香酥可口）等，接着摆上油香、花卷儿、油香子等食品招待客人喝茶、吃糖果，最后给每人盛一碗“胡尔饨”（又叫“粉汤”，用肉、粉块、粉条及白菜、葫萝卜、土豆等制成的杂烩），米饭或抓饭盛放在桌子中间，由各人自己取。也有学汉族做许多道菜的。

五、闹　洞　房

闹洞房是最热闹，也是青年人最感兴趣的活动。时间一般在傍晚或天刚黑时。

所谓闹洞房，就是让新郎、新娘表演节目。节目的种类和数目并无限制，一般以时间的长短、来宾的兴致而定。

若新娘拒绝表演某个节目，爱恶作剧的青年便用树枝抽打新郎，直至新娘于心不忍，愿意表演为止。

众人散去后，由伴娘为新人铺床，并在床的四角放置核桃和枣。洞房内另要燃一盏灯，置于墙角，用东西遮住光线。这盏灯直至天明不能燃灭，谓之“长明灯”。

就寝前，“陪女婿”和伴娘要分别给新郎、新娘传授房事知识及注意事项。新郎进入洞房后，要两手倒背插门。插好后，不管什么人敲门，再也不开，直至次日清晨。之后，新郎要给新娘一个“封子”，谓之“见面礼”。床四角置放的核桃和枣由新娘收起包在毛巾里，必要时由新郎隔窗送给“听窗根”的人。

洞房花烛夜，“陪女婿”要守在窗前，聆听室内动静，必要时分别对新郎、新娘作些指导或劝慰工作。此谓之“听窗根”（亦有其他青年及少数青年妇女，包括新娘的妯娌参加）。翌晨，陪

女婿”要将夜晚听窗根的情况转告男方父母。若未能同房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要请阿訇念经，并分别做新郎、新娘的工作。从这些习俗中，亦可看出回族过去早婚、童婚的遗风。

六、回　门

新婚第二天早晨，新郎、伴娘要去岳父家道“色俩目”，俗称吃“睁眼包子”（有些地区则是娘家送一盘包子给新婚夫妇）。岳父家为捉弄新郎，常在包子中做手脚，或包上花椒、辣子、盐等，或用线将肉块串在一起，若咬上一口，就得吃完，不能剩下。

新郎返回时，岳父母要用盘子盛一把面，盖上一件为女儿准备的围裙随女婿往男家“下汤”，女方除了要带上为女儿准备的礼品及众亲友馈赠的礼品之外，还要给亲家送一份“四色礼”。到男家后，主人将女方带来的面及自备的面一起煮好，并另做四盘菜招待客人。待众人入席后，新娘由伴娘陪同前来拜见众亲。

第三天，由婆婆携带儿子、媳妇及众女亲带着礼物往女家“回门”。众人也要当天返回。新娘若不愿返回，女家也要劝其回去，不能留女儿住下。

第四天，女方的母亲及众女亲再次携带面和送女儿的抹布等物往男家下“四道面”。新娘这天下厨，亲自煮面招待娘家客人。

此外，新娘还要拜见公婆及亲戚，谓之“认大小”。新婚夫妇还要到女方亲戚家逐一认亲，并宴请女方众亲戚，谓之“请亲家客”，以拜谢四媒等。

七、认　干　娘

成婚一个星期后，新娘还要认一个干娘，俗称“卧曲利妈”。“卧曲利”是阿拉伯语，意为“主婚”。一般由新娘的娘娘、姨妈、大妈等人充任。若没有这些亲属，也可由新娘所敬重的其他女性长辈充任。还有的请自己的养母充任。

新娘在携丈夫认“卧曲利妈”时，一般要携带“四色礼”和布料等。“卧曲利妈”则要分别给干女儿和干女婿回赠一定数量的钱。自此以后，“卧曲利妈”便与干女儿、干女婿一直保持着关系，如同亲妈一样，在干女儿分娩坐月子时亦要前去探望。平时则多是作为干女儿的娘家人为干女儿做主，排解家庭纠纷。对于妻子的“卧曲利妈”，丈夫一般与妻子一样称呼“阿妈”，称其丈夫为“阿达”。个别的也有叫“姨娘”和“姨父”的。其子女则一律称干亲为“阿奶”和“阿爷”。

回族人民的婚俗大致如上所述，个别细节因教派、地区不同仍有差异，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回族爱好清洁

喇　海　青

回族是个爱好清洁的民族，这一良好的生活习俗是在回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回族绝大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仅富有宗教哲理，而且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遵守。伊斯兰教关于清洁卫生的规定，逐步演变成为回族的民族风俗习惯，得以继续保持和日益发扬。

回族群众爱好清洁卫生的良好习惯由来已久，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要求每个穆斯林不但要注意外表言行和生活环境的清洁，而且要从意念上达到“清洁”的程度，因而回族清洁卫生的每一个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和伊斯兰教的源渊关系。回

族有句俗语叫做“常洗大小净，百病难以生。”其中所谓的“大小净”，就是伊斯兰教对每个穆斯林的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古兰经》中曰：“信仰的人们呀！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骨。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出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当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摩脸和手。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使你们清洁”（第5章第6节）。又说：“礼拜寺内有许多人，爱好清洁，真主是喜欢清洁之人的”（《圣训》第9章第108节），因而除礼拜时必须作大小净外，每个穆斯林身上不能无时无水，一旦失去了大净，就该立即沐浴，以洗涤身上的污秽，清除认为本身不洁的意念。伊斯兰教规定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三天就要给婴儿进行“洗礼”，即作大净，表示洁净地来到了人世，成为一名穆斯林。孩子长到一定年岁时（一般是女孩9岁，男孩12岁），开始赋予了穆斯林在一生中所完成五项功课的使命，作大小净也随之成为例行的功课。伊斯兰教认为穆斯林不一定在坏了大净的时候才去作大净，而认为每7天洗一次大净最佳。穆罕默德说：“每个成年穆斯林每7天大净一次，是对真主的应尽之责”（《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第47页）。穆斯林去世后，对“埋体”（尸体）也要作大净，以示干干净净地去见真主。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经常沐浴的规定，不但使人清洁卫生，而且可以清除人们紧张劳动、工作之后的疲劳，振奋精神。因此，这一来源于宗教的规定，逐渐演变为回族一种优良的风俗习惯。

回族讲究清洁，还包含着更多的道德修养的内容。穆罕默德说：“外清内洁，是信德的一半”（《圣训》第56页）。“内洁”，就是要求人们通过洗大小净，以剔除邪念、私欲，加强信念，以防妄行，使内心世界达到一种清洁的程度。因而，现在回族洗大小净，不仅为了使表面清洁，更重要的是通过洗大小净，可以修

炼自己的美德，使自己成为一个表里纯洁的正派人。回族每洗一个部位都要相应地联想到一个实际行动。比如洗手时，要想到戒偷盗，不拿不义之财，要靠双手勤劳致富。洗脸时要想到顾全体面，羞于干见不得人的事。洗脚时，要想到防止走邪道，要踏踏实实地走正道。漱口洗耳时，要想到不能说坏话、造谣中伤、诬陷他人，不能妄语闲言，不听脏话，不偏听闲话等等。总之，回族通过洗大小净，要“净化”自己的内心，以便使自己成为一个内清外洁的人。

回族除常洗大小净的卫生习俗外，也很重视个人服饰、仪表和人体各个部位的清洁卫生。这些习俗，都与伊斯兰教教规有关。《古兰经》说：“你们应当经常洗涤自己的衣服”（第74章第4节），认为“白色最洁最美”，白色象征清白、吉祥，是幸福的象征。伊斯兰教还规定穆斯林礼拜时，不但要人体净，还要衣服净，处所净，穿着要整洁。因受这些教规的影响，回族平时很注重勤洗衣服。经常上清真寺或在家礼拜的回族，更讲究衣服的清洁，如果内裤被尿滴沾湿或外衣、外裤溅上污水等，要立即换下来清洗。回族为了清洁，喜欢穿白衬衫，戴白帽，缠白头巾。有的老人喜欢穿白袍，老太太喜戴白盖头，尤其到了开斋节、古尔邦节和主麻日（星期五）时，参加礼拜的回族群众一般都要穿整洁的衣服，有的人还要穿上白色的袍子。为了隔绝臭气，使得礼拜的环境清洁，他们一般在身上洒上香水，这样做被认为是“圣行”。回族在裹埋体（尸体）时用白布（“卡凡”）缠裹，“卡凡”上也洒有香水，尸体的鼻孔、指甲缝、口腔内要放上麝香等香料以避臭气、虫子等。伊斯兰教还规定穆斯林要常剪指甲、理发、净腋毛和脐下毛等。因而，回族不允许留长发和长指甲，因为手每天要接触东西，容易沾上细菌，尤其是指甲缝会藏下污垢，极不干净，能常剪指甲、勤洗手，就能防止将细菌带入口内。回族的这些习俗，既是为了清洁卫生，也是履行“圣行”的宗教功课。

回族在饮食方面的卫生习俗，也与伊斯兰教有着直接关系。《古兰经》说："信教的人们呀！你们要食用我所赐给你们的洁美的食物"（第2章第172节）。穆罕默德说："食一口不洁之物等于废40日的功修。"回族受这些教规的影响，禁食的东西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有四种：猪肉、自死物、血液和酒。伊斯兰教规定：凡是自死的动物，既便是牛、羊也不能食用。因为自死物的血液没有从体内全部流出，而血液中难免存有某种病毒菌之类的东西；即使因屠宰而流出的血液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不能食用，以防传染疾病。伊斯兰教除了禁食猪肉外，所有不反刍的动物都在禁食之列，如驴、马、狗等。狮、豹、狼等残暴动物和奇形怪状的动物也不可食。

回族还有美化环境的优良习惯。这些习惯的形成也与伊斯兰教有一定的源渊关系。回族讲究居住院落的清洁，倘若你有幸进入甘肃回族聚居的城乡，就会看到：不论是一幢幢回民庭院，还是一座座清真寺，一一扫得干干净净。尤其是回族妇女，她们十分勤快，一般在天亮时分就把院落内外洒扫干净，样样东西拾掇得井井有条。因为回族中有不少人在每日天亮前去清真寺做晨礼，晨礼后若看见谁家的门前还没有洒扫，显得不清洁，大家就会耻笑之，认为那家人很懒，晨礼完了还在睡觉。这也有宗教方面的因素。伊斯兰教讲，有无数个天仙充满人间，如谁家不清洁、龌龊的话，天仙就不会光临，不能带来吉祥与幸福。尤其在早晨晨礼前不将院落和屋子收拾干净，天仙就会从门前流泪而辞。受此影响，回族妇女更注意房内的清洁，她们将屋子打扫得窗明几净，瓶瓶罐罐擦得锃亮发光。回族妇女更讲究厨房卫生，她们把碗、碟、勺等盛食物的器皿翻扣在架板上，擦碗的抹布洗得干干净净，洗碗的污水不乱泼乱倒。她们在扫地时也很讲究，往往先用汤瓶洒水，然后将扫帚压低轻轻地扫，以免尘土飞扬，污染环境。

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的地方，也是回族群众聚会的地方。各

个清真寺都有一个“穆朵非”（寺师傅），每天将礼堂、水堂、庭院洒扫干净，堂内柱子、门窗、玻璃都擦得闪闪发亮。寺内不乱修饰、不乱张贴，显得庄严肃静。

回族还爱好养花。伊斯兰教义中讲，花在早晨开放时，其各种颜色是由天仙们描绘的，家里花多，会引天仙们光临，能带来吉祥、幸福和欢乐。因而，回族不但喜欢养花，而且对花特别珍爱。在甘肃省的临夏、张家川等回族聚居的城乡，夏天你能在某一个回民庭院的花圃中，领受沁人心脾的芳香，冬天也可在回民家中，欣赏到鲜花的美丽。

总之，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履行伊斯兰教中有关清洁卫生的规定，逐步养成了爱好清洁的心理因素，使之成为他们的民族特点。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

西北回族的宗教信仰

马　通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甘肃是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主要所在地。中国伊斯兰教在明中叶以前只有格的目一派，清末伊合瓦尼和西道堂相继形成，和格的目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教派。明末清初虎夫耶、哲合忍耶、尕德忍耶和库布忍耶等苏非派传入甘肃地区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苏非学派及其所属四十余门宦，这些支系大部分也在甘肃。故河州始有“中国麦加”之称。

无论教派还是门宦，其基本信仰一致，都以《古兰经》为根本教法；以“六大信仰”（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前定、信后世）为基本信念；以“五件天命”（念、礼、斋、课、朝）为基本功课。绝大部分穆斯林属逊尼派。教派、门宦及其支派间的不同点，主要是对《古兰经》注释和《圣训》的理解方面有不同见解，对修持理论和法定干功的认识和尊行各有侧重。同时门宦多以“始传者之子孙世世为掌教”，上有教主，下有热依斯和开学阿訇等一套严密的教阶组织，并且崇拜教主和拱北。

一、三 大 教 派

（1）格的目

格的目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一个教派。十八世纪以来，为与其他教派相区别，始名“格的目”，意为古老，故又称“尊古派”或“老教”。河湟地区因其在昏礼（沙木）之后开斋，故又称“后开派”。

格的目遵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信仰，属哈乃斐教法学派。重视五件天命功课和六大信仰，视坐静修持为副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汉文化的影响，教义中含有不少儒家思想。格的目虽对门宦与拱北持异议，但并不反对任何门宦的道乘功修，对各派持宽容温和态度，重视穆斯林内部团结。实行单一教坊制，以一个清真寺为一个教坊，各清真寺间互不隶属，各自独立。教坊的组织形式最早是“三掌教”制。但因时代不同，其名称和内容亦有所改变。明中叶以前由管理教务的长老（“筛海”）和管理民事的宗教法官（“嘎锥”）以及由政府委派处理侨务的“蕃长”组成；明中叶以后由领拜“依麻目”、讲经的“海退布”和呼唤礼拜的“穆安津”组成；清末以来被开学阿訇、二阿訇、“麻玛津”、“海退布”以及学董、乡老所代替。学董是一坊内宗教事务的实际掌权者，开学阿訇亦受其制约。

（2）伊合瓦尼

“伊合瓦尼”意为“同教弟兄”，通称新教。19世纪90年代由著名阿訇马万福创建于河州。

马万福是河州东乡人，1988年（光绪十四年），他去麦加朝觐留学，受宛哈比派的影响，回国后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实际，联络当时河州比较知名的“十大阿訇”，创建了伊合瓦尼派。在本世纪30年代以来，该派在甘肃、青海、宁夏地方政权的大力支持下，在这些地区确立了优势地位。

伊合瓦尼教义的基本特点是“尊起、革俗，反对异端”。它认为“五件天命”是一切宗教功课中的基本功课，绝不能有所松懈，要求以阿拉伯语标准语音读《古兰经》。它开始实行“单一教坊”制，后来通过“海乙制”，把互不隶属的教坊又统管起来。它对苏非派所属门宦的一些主张持反对态度。

马万福于1937年归真后，伊合瓦尼分为两派：一派以尕苏哈吉为首，奉行原来宗旨，称为“苏派”，居多数；另一派以尕白庄阿訇马德宝为首，改革原宗旨，称为“白派”，现在通称“赛乃菲耶”，或称赛来夫。他们主张遵从“前三辈”的教义教律；只承认《古兰经》原文和正确的注释；不主张给亡人转“费给耶”；主张男子留“满头”，妇女戴面纱。

（3）西道堂

西道堂为马启西于20世纪初创建于临潭。因其以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刘智等人“以儒诠经”的汉文著述为传教依据，故有“汉学派”之称。

马启西（1857—1914），字慈祥，号公惠，世居甘肃临潭旧城。他考准秀才后不求仕宦，一面攻读汉文经史，一面钻研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撰写的《清真大学》、《清真指南》、《天方典礼》等伊斯兰汉文论著，学有所得，遂设帐讲学，创建了“西道堂”。

西道堂的基本信仰仍是“认主独一”、“顺主从圣”，遵奉《古兰经》和《圣训》，履行天命五功，具体特点是将刘智等人的学说贯彻在宗教实践之中；在宗教礼仪方面兼收并蓄，基本和格的目相同，又和哲合忍耶有不少相似之处，具有高念派特点。创建初期，因简化宗教仪式，减轻教民宗教负担，移风易俗，提倡男女上学念书，因而发展较快。

西道堂的教权结构具有门宦特点，实行教主集权制。教主既是宗教领袖，又是道堂内世俗生活中总管一切的最高权威。这个

教派内部的组织结构，分集体户和个体户两部分。集体户生活在临潭旧城道堂内，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户1000余人，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个体户散居甘、青、新、川等地。

从经济结构看，西道堂又似一个带有封建庄园性质的经济集团。堂内集体经营商、农、牧、副各业，统一管理，统一分工，统一分配，全部财产归道堂所有。堂内设总经理统管各种经营，其下各行各业设经理，又下设专门负责人。

西道堂既是一个教派，又是一个社会经济团体。它的经济制度从创建到解体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屡受地方军阀势力的打击和本派上层的争权夺利，至1949年已趋于衰落，下层教民生活日益贫困。新中国成立后，西道堂作为宗教团体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

二、四大苏非学派及其所属门宦

苏非派传入甘、宁、青后，被通称为门宦。“门宦”一词来源于“宦门”、“门阀”等词意。清乾隆年间，地方当局因穆夫提第六代教主马显忠开办义学，鼓励回汉儿童上学，积极改善回汉关系，遂赐马显忠“统领”衔，命其管辖河州各教派，于是群众把穆夫提管的叫“七门八宦”，从此始有门宦家之称。门宦一名的出现表明苏非派是具有一种宗教世袭的身份、地位与特权的“高门世家”，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权力更集中、辖区更广大的教坊制度，它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有组织形式。

（1）虎夫耶学派及其所属门宦

“虎夫耶”主张低声默念“齐克尔”（赞主词），故又称“低念派”。

虎夫耶学派笃信《古兰经》、《圣训》，遵行天命五功，主要功修是静修参悟和默念“齐克尔”。所属各支系门宦因其传授不同，念诵方式亦各有异。该门宦教阶分为三级：最高一级是“穆

勒什德”，即太爷和教主，被认为是得了教门的人，具有“卧里”的品级，并能显示各种“奇迹”；次一级是“海里凡”，即“穆勒什德”的接替人，被认为是办教门的人，具有“筛海”的品级；再一级是上两级的忠实信徒，称为“穆勒得”，即追随者，被认为是学习教门的人。该门宦实行教主集权制。在继承方式上，教主在世时，精心培养几个“海里凡”，临终前，选择最得意的“海里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交给掌教印章或一至几件衣物，作为教权继承的凭证而成为下一辈教主。后来演变为“子袭父职”的世袭制。随着教坊的增多，虎夫耶将若干坊联结为一个教区，由教主指派海里凡主持教务，这就打破了以一个清真寺为中心的单一教坊制而成为教主管辖下的多教坊制。同时，由教主委任各坊教长，代替了单一教坊教长的推选聘请制，而成为教主的任命制。

教主殁后，信众为其修建拱北，加以崇拜，有些支系还将朝拜拱北和朝拜天房等同视之。虎夫耶学派有门宦21个，各支系独立传教和行使教权，教民主要分布于西北各省区，部分散居云南、四川、吉林、河北、河南等地。

毕家场门宦的创始人是马宗生（1639—1719），其祖为唐时落居长安的波斯商人，后迁居河州。1672年在青海湟中接受希达叶通拉赫·阿法格·曼什乎勒的学理，在河州传教。该门宦提倡“顺天理，守国法，行人情；先遵行天命五功，后力行静修默念”，主张不随意批驳别派或与之争夺教徒。共传四辈，其后均为主持，不称教主。

小刘门，是马宗生第四子入赘于刘姓，尊其父意在兰州传教，殁后葬于兰州小西湖，人称“小刘门门宦”，只传了一辈，其后皆为管理拱北的家人。

花寺门宦的创始人为马来迟（1681—1766），祖籍长安，后迁河州，18岁开始任教长，开学阿訇达20多年。1728年去麦加朝觐，并到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等地游学深造，先后研究了

沙孜林耶、尕德忍耶、什板丁耶和赛哈来外勒丁耶学理。1734年返回河州，综合各派教旨，传播虎夫耶学理。青海卡尔岗地区的部分藏族由于他说教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到本世纪50年代初已传七辈。

花寺门宦主张“闹中静”，重视天命五功和干“尔麦里”教民殁后，先去花寺拱北做祈求，并以《古兰经》转“费给耶”（赎罪）；站“者那则”时要求脱鞋。19世纪70年代，曾分裂为以循化马如彪为首和以河州马永龄为首的新老两派。后在反清起义中遭清廷镇压，从此一蹶不振。

穆夫提门宦的创始人马守贞（1633—1722），其祖系助唐平“安史之乱”的大食兵，落居长安仓门巷，宋时因犯罪逐放西宁，母田氏，父赫达叶统拉希。

1673年，马守贞接受赫达叶统拉希的意旨及其念珠、头巾等8件传教凭据，始传“穆夫提”（执掌教法的人）门宦。他以临洮北乡为基地，传教达50年。至本世纪50年代共传14辈。该派主张“长子世袭”；朝拜拱北与朝拜麦加同等意义；教徒见教主要行跪拜礼；在纪念先辈教主时，重视点香。

临洮门宦。穆夫提门宦传至第6辈教主马金焕时，其弟马玉焕为争夺教权，自立门户，率众迁往临夏瓦窑头传教，是为临洮门宦。至本世纪50年代共传13辈。

灵明堂。灵明堂俗称“疯门”，创始人马一龙（1853—1925），字灵一，世居兰州。后接受虎夫耶和尕德忍耶学理，在兰州西园传教。他常年身着破衣，沿街行乞，裹腹即止，行止近疯似癫，然其信守虔诚不懈，苦修至坚，受一些穆斯林尊重和追随，并为其在兰州修建拱北，起名“灵明堂”，后在新疆哈密、乌鲁木齐设有分堂。其接替人依次为单子久（已故）、汪受天。该派主张接替人（老人家）不娶妻室，终身出家干功，否则不能继承老人家职位，进行传教。

马一龙的崇信者皮毛商马仁甫，河南孟县人，抗日战争期间来兰州经商，加入灵明堂。后迁固原三营创建了“明月堂”，被尊为“老人家”，进行传教活动。仅传一辈，之后只有守墓人，没有传教人，现为兰州灵明分堂。

文泉堂，创始人马文泉（1840—1882），号穆罕默德·依布勒喜满，祖籍兰州。

马文泉曾三次去麦加朝觐，受教于麦加阿布都里·可勒木，归国后在福建、广西、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传教，后遭清廷杀害，教民在兰州修建拱北，名“文泉堂”。

平凉桥店马在兰州接受马文泉的教旨后在平凉传教。民国初年，银川人马通贵拜桥店马为师，其师去世后马通贵回原籍传教，被称为通贵门宦。

法门门宦，创始人法真，临夏人，殁于本世纪50年代末。法门以天命五功为主，以坐静干功为副，不发展教徒，其尊信者多为前来投师的学生。

丁门门宦，创始人丁祥，临潭人，曾在新疆沙车道堂求学，接受教旨，后在河州、兰州一带传教，逝世后葬于兰州华林山。丁祥不主张指定继承人，但其后裔仍相继传受，共传5辈。

鲜门门宦，创始人鲜美珍（1644—1722）。1673年鲜美珍在青海攻读阿文时接受了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的尕德忍耶学理，继又受传于赫达叶统拉希的虎夫耶学理。后去麦加朝觐，回国后他结合这两派的学理，创建了鲜门，信众较多。到第六辈时，分设为两个道堂，一为青海八站沟鲜门道堂，一为西吉前岔鲜门道堂。教众以西宁、兰州和西吉较多。该门宦的主要特点是：重坐静默念而松弛于五功；传教干功修持和传授“齐克尔”颇为神密，一般都在晚间进行，其静坐细节鲜为人知；教主娶妻成家，但须云游四方；对传教人极为崇拜，往往拉手相吻，借以“沾吉”；在念“求祈”时，有“敬香、吻香和叩头”之举；教权仍为鲜氏家

族世袭相继，共传六代。

撒拉教，本世纪40年代为循化撒拉族苏娃所传，后分为海孜若一支和母撒一支，遵行中既有虎夫耶学理，也具有尕德忍耶的修持，“文革”后期有一定发展。

刘门门宦，创建人刘伯阳（1649—1737），是鲜美珍在兰州的“拉以布”。刘伯阳晚年行动不便，由其子依玛目哈三继任“拉以布”。刘伯阳逝世后，葬于兰州西津桥，其家属为其修建了拱北，名曰明德堂，从此形成一派，通称大刘门门宦。

洪门门宦。洪海如在兰州求学时受传了“凉州太爷”的虎夫耶学理，后在同心县洪岗子设立道堂，进行传教，受到一些人的崇拜，通称洪门。他于1937年逝世后，家属为其修建了拱北，供教众念经祈祷。其后分为两支，一为海原马伯华，一为同心的王进禄。洪门的主要特征是在授教时：先行告诫，即宣布“十条戒律”（戒烟酒，戒赌博，戒高利贷盘剥，戒搬弄是非，戒卖寡妇，戒贩毒，戒忤逆父母，戒盗贼，戒色，戒欺骗孤儿）；次念讨白，决心从今以后要尊行戒律，成为忠诚信徒；三点“齐克尔”；四授“守头”，即暗记前辈道号，虽父母妻子亦不得外传。

（2）哲合忍耶学派

“哲合忍耶”意为高念，因主张高声念诵“齐克尔”，故有“高念派”之称，该学派传两姓三家共7辈教主。

创始人马明心（1719—1781），字复性，又名卫真，祖籍阶州（甘肃武都），后迁河州。雍正六年（1728年）随叔父去朝觐，中途失散，几经辗转，流落撒马尔汗和也门等地，接受乃格什板丁耶、尕德忍耶、沙孜忍耶等苏非派学理。乾隆九年（1744年）归国，始传其教。当时他穷困艰辛，常着羊毛褐衣只身周游各地，教徒有所奉献即随手转送穷人，他提倡简化宗教仪式，反对教权世袭，极力从事宗教革新活动。后在官川设帐讲学，故又有“官川门宦”之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因他的学生苏四

十三与老教发生械斗后被迫起义反清，马明心因受牵连而被捕，苏等率众攻占河州，围攻兰州，后被陕甘总督杀于兰州，男眷被充军云南他朗，女眷被充军新疆伊犁。

马明心罹难后，平凉人穆宪章（1755—1812）继任第二辈教主。以后，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马元章和马进西相继任教主。

该门宦教权结构是道堂、教区、教坊（清真寺）三级制。道堂既是建筑豪华的府邸和庄园，又是最高权力机构，教主高居道堂，掌握精神方面和门宦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力。教区是由若干教坊组成的，是道堂的派出机构，由“热依斯”代表教主管理事务。教坊是以清真寺为单位、由开学阿訇主持的教民宗教生活场所。热依斯和开学阿訇都由教主直接委派，任期不定。

该门宦的主要特点是不仅高声念诵“齐克尔”，而且还要高声赞圣；和其他门宦一样崇拜教主和拱北，并主张朝拱北与朝天房同等重要，特别重视和强调为宗教而牺牲的“舍西德”精神。在宗教习俗上，男子戴黑色六角锥体帽，不留腮须，妇女一般不戴盖头，不蒙面纱。

（3）尕德忍耶学派

“尕德忍耶”意为“大能者”。清康熙初由华哲·阿不都·董拉希首传入河湟地区。

尕德忍耶主张“先有道，后有教”。认为“教”是由穆罕默德的生平言行所构成，而“道”则是超然的，非创造的，亘古不变的。为了求“道”，只有割断夫妻恩爱，抛弃功名利禄的诱惑，摆脱现实生活，游深山、访名师，勤修苦炼，以求悟道；认为参悟是求道的捷径，“一时的参悟，胜过千年的功修”。它的修持理论是“定性复命”和“修身养性”。认为“性”是根，是永恒的；“命”是形，是暂时的，修身克己，清心寡欲都是为了养性。

尕德忍耶的各辈道祖被认为是出家修行的引路人和导师，道统继承是由道祖或当家人指定的，其先决条件是童子出家人，而且要经过长期巡游乞行和入山修行苦炼，基本上是师徒的承袭，而非父传子受。

尕德忍耶学派的教众分“出家人”和“俗人”两部分。“出家人”除上述巡行苦修者外，还有称做“勤炼人”或“记教人”的，他们也可以是童子出家，也可以是半路出家，不要求巡游乞讨，一般居住拱北修行。道统的继承者被称为“穆勒什德”或“卧里”；再一种“出家人”是管理拱北的“站拱北”者，其中称为“主持”或“当家人”的是拱北的掌权者，他们有的不出家。其主要功课是早晚敬香和默诵“齐克尔”。各种“出家人”事先要有“卧里”、“穆勒什德”的认可，出家后必须尊行反映禁欲主义的三条戒律和五条节守。阿訇和一般教徒被视为俗人。他们只是信道者，不履行修道的各种戒律和功课，只要求重视朝拜拱北和跟“尔麦里”。

尕德忍耶教坊基本上是单一教坊制。阿訇多由教众选聘，是一坊内的领导人。

尕德忍耶的主要门宦有大拱北、后子河、九彩坪、齐门（或七门）、香源堂和阿门等。

河州大拱北，创始人祁静一（1656—1719），经名西俩里，号买忍的尼，甘肃河州人。河州的大拱北、陕西西乡的鹿麟寺和四川保宁的巴巴寺是该派著名的三大拱北和静修地，历经9代而终止。

香源堂和阿门。香源堂的创建人为海阔，他的继任者是沙满拉，其后均是守墓人，没有传教人。阿门系一阿拉伯传教师所传，没有后继人。

除此，在青海大通有后子河拱北。创建人杨保元（1780—1873），亲传弟子9人。在宁夏有九彩坪门宦和齐门门宦。九彩坪门

宦的创建人为安洪雄，殁后由杨枝荣继其位，并在海原九彩坪修建了拱北，建立了传教中心。齐门门宦，又称“七门”，创建人马德明，主张带家修行。

（4）**库布忍耶学派**

明末清初传入甘肃，教徒主要分布在东乡族自治县和康乐县等地。据传始传者是穆呼的尼，阿拉伯人，落居河州东乡大湾头传教，改姓张，号玉皇，字普济，和他同来的还有其子艾海买提·克比若·白贺达吉，为第二辈教长，发展了不少教徒，当地汉民亦有皈依其教者，遂引起当地政府注意，以“引诱良民”罪将其下狱，殁于狱中。其子孙相袭教长已达十一辈。

库布忍耶门宦除遵行天命五功外，主要是静修参悟。静修分40天、70天、120天不等。届时幽居山洞，默念“齐克尔”、做礼拜，日食7枚大枣和数杯开水。干“尔麦里”时，点香高念《古兰经》和《卯路提》；以《古兰经》转“费给耶”；站“者那则”时不脱鞋。做“都哇”时抹两次脸面。

张门教权较松弛，实行单一教坊制。各清真寺教长统由教主任命，但一般先须取得本教坊群众的同意，不硬性派放阿訇。该派内部也有一些派别，一般都各行其事，互不干涉，也不为人所知。

格的目教派

马　通

自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算起，伊斯兰教在迁都（公元622年）29年前后就传入了中国。格的目就是最

早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派。

“格的目”系阿拉伯语，意为“尊古”，故称“老古派”、“尊古派”，普遍称为“老教”。甘青地区又因格的目一贯主张“沙木”（即昏礼）之后开斋，故又有“后开”之称。从这些命名看，也表明它是中国伊斯兰教中最古老的一派。

伊斯兰教历80年后，大伊玛目哈乃斐（公元699—767年；伊斯兰教历80—148年）取得教律学权威时，正是我国唐王朝中期，这时，大批伊斯兰教徒进入中国，他们所奉行的基本上是哈乃斐及其以前的教义教律，所以中国穆斯林，特别是格的目声称自己是大伊玛目哈乃斐的门徒，是有历史渊源和确切事实的。深受哈乃斐学派宽容影响的格的目，既不反对任何门宦的“功修”，也不攻击任何门宦和任何教派的遵守，处于中间调和地位。他们严守老规旧矩，重视“舍若阿提”（法定的干功），反对标新立异，主张“按老规矩去做就行了”。“格的目”这个教派传播流行的时间较长，从唐初到清康熙年间苏非派传入中国之前，经历了约1100余年的历史。他们长时期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接受儒家思想最深，是伊斯兰教中一个比较保守的教派。自18世纪苏非派传入中国后，这一教派开始发生变化，部分人参加了苏非派所属的各个门宦，部分人参加了“伊合瓦尼”派。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派人数大为减少，优势地位急剧下降，现在，全国各地约有400万左右的教徒，即使如此，在人数上它仍然还是一个多数派，在作风上，它是一个虔守正统、热爱和平、顾全大局的教派。从现实表现说，它是一个重视安定团结的教派。

格的目的教权组织形式是单一的教坊制。教坊在最初含有一定聚居区域之意，在一个聚居区内，通常有一至几个清真寺，后来教坊的含意缩小，教坊变为清真寺的别称，教坊即是清真寺，一个教坊就是一个清真寺。格的目的教坊之间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各自独立，各行其是。因此，格的目的教权组织是比较涣散的。

格的目的清真寺和其他派别的清真寺一样，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过宗教生活，但建立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穆斯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的政教合一时代，那时的清真寺就是政治活动的中心。清真寺之所以是穆斯林的宗教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主要是：它是穆斯林过宗教生活的场所，是调处穆斯林一般民事纠纷的法庭，是培养宗教接班人的学校，是协商和决策一坊群众事务的最高机关。在特殊情况下，它也是指挥作战的参谋部和司令部，这种作用在新中国建立后已消失。“三掌教制”最初是格的目清真寺的组织形式，这是承袭外国穆斯林的一种制度。“三掌教制”之前，在唐宋时代的番坊中设有管理教务的“筛海”（教长）和管理民事的“嘎锥”（宗教法官），这是穆斯林自选的。还有代表官方处理侨务的番长，这是官府任命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在当时既是穆斯林聚居区的“番坊”的最高领导，也是番坊清真寺的最高领导。它是“三掌教制”的始祖。“三掌教制”中的三掌名称，往往因地区不同，名称各异，但甘宁青一般都设有掌教（伊玛目）、海推布（教经）和穆安金（呼唤礼拜）三种职称。18世纪以来，改名为开学阿訇、二阿訇、玛金（即穆安金）以及学董和乡老等。开学阿訇是清真寺内的最高宗教首领，他率领教众礼拜、讲经、传教、主持宗教仪式等；二阿訇除可以代行开学阿訇职权外，主要是给经文大学讲经授课；玛金是呼唤礼拜者。学董、乡老不是神职人员，学董是清真寺事务方面的总负责人，一般由中上层教徒担任，负责收学粮，管理清真寺寺产，维修清真寺，筹办各种宗教活动如圣纪等。乡老一般由热心宗教事务的下层教徒担任，是学董的助手。它是清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回民的统治而推行的一种“乡约”制度的遗迹。

格的目清真寺的开学阿訇实行聘请制，伊玛目实行选举制，这是效法哈里发艾卜·伯克尔和欧默尔时民主选举哈里发的模式

进行的。在甘宁青大部清真寺都是开学阿訇兼伊玛目，开学阿訇实行聘请制，学董、乡老实行选举制。对受聘的阿訇，教坊的穆斯林要举行隆重的欢迎活动，届时，教坊选派代表，拿上礼品，去请阿訇。临近各教坊，也要送帐贺喜。设宴欢迎阿訇，招待贺喜的人。阿訇的任期因地方习惯不同而有差异，有2年一任的，也有4年一任的，大部分地区最长任期是6年。任期一到，阿訇在开斋节或古尔邦节会礼后，即向本坊群众主动提出辞学。若阿訇受群众欢迎，经群众挽留，本人同意，仍可继续任教，否则，由教坊群众举行欢送会，派人欢送阿訇回家，通称为“散学”。

格的目在教义上属于正统的逊尼派。在教律上属于哈乃斐学派。他们对遵从苏非派的门宦虽持有异义，但对各门宦中品学兼优，真正能按《古兰经》、《圣训》传教的人仍视为“贤者”，给予尊敬。同时，他们对国外来中国传教的“圣徒”、圣墓”，也表示崇敬，也去上坟，但不主张出资给他们修建拱北。他们认为崇拜拱北就等于崇拜人，而崇拜人就违犯了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的这一最重要教规。

格的目的宗教主张是重视“舍若阿提”（法定干功），对“妥若格提”（道路之意）只看作是一种副功。认为今世和后世是一个统一体。没有今世的干功，就没有后世的幸福。只有立足今世，才有来世的丰果，所以这一派基本上是个入世派。

格的目的干功（舍若阿提）就是要严格履行念、礼、斋、课、朝五件天命和坚信安拉、天仙、经典 圣人、前定、后世和复生等六大信仰。他们主张在完美“舍若阿提”的条件下，才允许做“妥若格提”。

格的目重视宗教末节，带有一些古老风格。他们给临终的人举行念“讨白”（忏悔赎罪）仪式时，当念到“真主独一”时，要临终的人举右食指，表示认主独一。格的目在聚礼时，除礼六拜“主麻”拜外，还要礼当天晌礼的十拜。在每年“斋月”前一月，每户都要宰牲念经，即转“白拉提”（赎罪），最后要到清真寺集体“了夜”。格的目是属于遵月派，见月封，见月开，斋

期需满30天。进入“斋月”后的14日要举行纪念“女圣纪”，27日要“坐夜”。格的目除过三大节日外，还要过“阿述拉”。“阿述拉”在伊历元月十日举行。阿述拉的意思是第十日。格的目和其他教派一样，要给婴儿起经名，男孩年满12岁时要举行“割礼”。男女成婚时要请阿訇念“尼卡”。举行葬礼时，主张以《古兰经》转“费达”，现在也有以实物转“费达”的。送“亡人”时，穿白戴孝。死后每逢头七、二七、三七、四十天、百天、周年、三年，都要宰牲于“尔麦里”，搭救亡人。格的目对《古兰经》的念法比较古老，和发音较准确的伊合瓦尼的念法形成显明对比。

总之，格的目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以致在他的宗教仪式中有不少汉族习俗。如给逝世的老人穿白戴孝，“头七”、“二七”等纪念日的名称等都与伊斯兰教义不相符合。

明末开始的经堂教育，首先是在格的目的教坊里发展起来的，以后在各个教派、门宦的教坊里得到了广泛推广。据白寿彝先生考察，最早是陕西咸阳人（一说是渭南人）胡登洲阿訇（公元1522—1597）倡导的。在他之后又有海巴巴、冯阿訇、兰州马、摆阿訇、周老师、米三爷、大刘阿訇、邠州虎爷、黑阿訇、建川马以及马德新、张古东、王龙、刘长清等相继倡导。这些人都是格的目派，宗教学识渊博，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较高，号召力大，所以经堂教育一时得到了大发展。

在苏非派和伊合瓦尼派相继传入中国后，使格的目的“一统天下”发生了动摇和分裂。但大的教争很少发生。在甘肃有记载可考的只有乾隆十三年和花寺门宦发生过一次纠纷，但只限于诉讼，没有械斗。《甘宁青史略》中记载：“乾隆初年河州回民始有前开后开之异。前开者先开斋而后礼拜也，后开者先礼拜而后开斋也。其始不知何时，然教遂至是分为二”。这里的“前开”即指花寺门宦，“后开”就是格的目。前、后开发生纠纷的原因何在呢？《甘宁青史略》中说：“马来迟者河州前开之回民也，

始为冥沙经……冥沙经一册，既简而省费，又新其耳目，一时翕然从之，前开之教愈盛。然其意，以巧取布施而已，无他志也。至是后开回民马应焕赴京控马来迟邪教惑众，经甘肃巡抚黄审题将马应焕依诬告反坐，从重照冲突议杖例问拟充军，并议令前开后开各尊祖教，遇有丧事不许一起延请两造念经，致滋事端，饬遵在案。马来迟马国宝父子遂往来行教”。马应焕是河州格的目派的一位大阿訇，因他告状未准反被充军云南，这样就给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父子传播虎夫耶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20世纪50年代，甘肃临夏、张家川、平凉等地区的格的目与伊合瓦尼发生了教争。在新中国成立前，伊合瓦尼依靠马步芳的势力，给格的目教坊硬性派了伊合瓦尼阿訇，宗教活动按伊合瓦尼的教旨执行，当时格的目教徒因慑于马步芳的反动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接受。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于是格的目教徒不要伊合瓦尼阿訇，推选格的目阿訇开学，恢复格的目原来的宗教仪式。于是冲突始起。诸如此类的矛盾和冲突，虽然一时激化，但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指引下，都得到了正确解决。

伊合瓦尼教派与马万福

马　占　彪

一

马万福（1853—1934），经名努海，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因朝觐过麦加，人们便称他为“果园哈吉”，一般

叫马果园。

马万福的祖父、父亲都是阿訇。他自幼受到宗教意识的影响，对阿拉伯文已有较好的基础，加之聪颖好学，十三四岁在东乡的红崖、瓦家里清真寺游学，曾受到“悟思达德”（老师）的赞誉，后又在北庄拱北的清真寺里受到当时很有名望的老消亭阿訇和瓦家里阿訇的指导，系统地学习了伊斯兰教的各门学科。当时，由于经文多是手抄本，很多不清楚，而且残缺不全，于是他就四处搜求经书，亲手抄录，从而练成了一手好字，可以写出生动的“拜体”（赞颂的诗篇）。

1875年，22岁的马万福在北庄拱北穿衣，正式取得阿訇的资格，到自己的家乡果园村任教。在寺内他招了20多个“满拉”，一面讲学，一面研究经典，发现和纠正了一些阿訇在经典解释和教义翻译上的错误。光绪十四年（1888年），33岁的马万福前往麦加朝觐。在麦加他看到的宗教仪礼比较简单，很适合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他研究了中国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不同点，认为在中国主要是缺乏分析教律、教义的经典，宗教学说得不到完整的传播，造成了许多谬误。在海上交通不便的时代里。中国的大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在经堂中讲习的经书多由陆路——波斯、阿富汗等国传来，大多是手抄本，完整的大部头经书很少。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之所以发生异变，主要是没有完整的经书，一些手抄本任人口传，随意解释，加之中国道教、佛教、儒家思想的影响，便产生了一些违背《古兰经》、《圣训》的习俗，他抱着探求真谛，追本溯源的态度，拜访了当时在麦加的知名人士海力巴氏，用比较流利的阿拉伯语同他交谈了很多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同时对沙特阿拉伯正在进行的伊赫万运动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海力巴氏很赞赏他的看法，并要求他留下来继续学习，于是他便在海力巴氏的学堂里深造。他决定回国后要凭《古兰经》、《圣训》重立中国的伊斯兰教。

在海力巴氏门下，马万福跟当地学者学习古兰经学、圣训学、教法教律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他博览群书，钻研探讨，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悉心研讨，力求得到明确的认识。他的好学精神和思维能力也被麦加的许多学者所称道。在麦加他更深刻地研究了“艾海力逊奈”，打算回国以后要以“艾海力逊奈”传播伊合瓦尼学派（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学派在中国一般称为新兴教。

二

光绪十四年（1888年），马万福从海路入广州回国，在河州同十大阿訇（一说是十大哈吉，就是在八坊比较有名望的达背阿訇、老消亭阿訇、张卜阿訇、红崖大鼻阿訇、高腰阿訇、滩子阿訇、大康阿訇、新瓦房阿訇、折子沟阿訇和马会三阿訇等）围绕从阿拉伯带回来的经典一边讲学，一边展开讨论，规定以《古兰经》为准则，以《圣训》为指南，与民间流传的经书相对照，认为不符合经典礼仪的习俗一概革除。他号召穆斯林群众严格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去做功课，按《圣训》的指导去行事，并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十条建议：

1. 不准修建和信仰拱北；

2. “尔麦里”（功课）自己干；“祷拜”（忏悔）自己做，不承认门宦老人家给“口唤”；

3. 不干“天命”，而干“余功”是“比代尔替”（异端）；

4. 人死后不准披麻戴孝，不能哭，不念七期、百天、周年的“海亭”，若给亡人念“海亭”应在主麻日或其他日子；

5. 不念圣纪，不念“阿术拉”（因“阿术拉日”是什叶派的重要纪念日）；

6. 嫁女、娶媳不准唱宴席曲，不准摆针线；

7. 不用《古兰经》传“费子耶”（赎罪），而用钱传“费子耶”；

8. 回族妇女戴上盖头，取消缠手帕，禁止缠足；

9. 不在坟地集体念《古兰经》，只能一人念，送葬人集体听，大家接“都哇”；

10. 信教男子留胡须，剃头，以示遵“逊奈提”。

这十条规定俗称“果园十条”。马万福的同学和“悟思达德”（老师）们看了经典后接受其主张，在各自任教的清真寺内开始传播伊合瓦尼。

马万福所倡导的伊合瓦尼教派的“遵经革俗”的主张，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这个口号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信教群众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临夏、广河、东乡等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内，信徒达到三四十万，而且传到宁夏、青海等地。

在“河湟事变”后，清政府的“善后”处理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回民群众，马万福由于支持和参与了这次反清斗争，遭到清府的通缉。他四处颠波，过起流浪生活。民国 3 年（1914年），马万福流亡到新疆哈密地区，在哈密继续传播伊合瓦尼。民国 5 年12月（1916年）哈密县长受新疆督军杨增新之命，逮捕马万福。翌年正月，置囚车押送兰州。当时住在西宁的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得知此事后。为了在政治上利用马万福的声望，扩大自己在青海的势力，稳住青海阵脚，与临夏各马争雄，并出于本人对伊合瓦尼教派主张的倾向，在私下取得甘肃督军张广建的默许后，便星夜派副官杨万财、哨官马克勤带领骑兵营营长（外号尕杂务）及其一连骑兵驰赴甘肃永登县境内，将马万福父子劫持到西宁。此后马万福便在马麒及其继承者马步芳的支持下又在青海传播伊合瓦尼。

三

伊合瓦尼教派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它的纲领“凭经立教，遵经革俗，反对异端”，它的口号是“一切回到《古兰经》中去！”

这就是要求返回到早期的伊斯兰教，“坚决按照《古兰经》、《圣训》办事”。马万福倡导的伊合瓦尼教派宣称按照“艾海力逊奈”来遵行教门，把穆斯林的信仰包括在诚信（真诚信仰）和遵行两个方面：在诚信方面，它注重宣传信仰的根本——伊玛尼。马万福说：“伊玛尼者，心里诚实，口里承认穆罕默德先知奉令主命传的一切教律”，必须诚心地念作证词，在诚信中必须认主独一，坚决承认并遵行“应受拜的主唯独安拉”。除安拉外不能崇拜任何人，任何物。同时要信六件：“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后世、信前定”。对此六件也要求心即诚实，口必承认。认为这六件是信仰的总纲，如果违背或者亵渎，就要断为“库付勒”（不可赦免的大罪）

关于“遵经革俗”的主要内容是：

（一）反对给念《古兰经》的人出“乌支勒”（代价）。所谓“乌支勒”就是穆斯林为了祭祀亡人或者祈福祛灾时，请阿訇诵读《古兰经》中的某些篇章，诵读结束，由主人施散给阿訇现金若干，同时还要设宴招待一番。马万福认为这种做法如果双方不是出于绝对自愿，而是迫于人情世故，不得不干，那么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买卖交易。按照伊斯兰教的正统理论是一种接受“乌支勒”的犯罪行为。他说，因为《古兰经》是命人行好，止人干歹的最高准则，不能依靠诵读《古兰经》谋取代价。《古兰经》中说道：“你们不要用我的启示换去一些代价”①，又说“隐瞒经典并以它换去一些代价的那些人，他们肚里吃的就是火烟。”② 伊合瓦尼派认为“念”是为了“说一、知一、诚信一。”“认真、敬主、归信主。”它提倡《古兰经》、“清真言都要自己念，别人不能代替”。认为念《古兰经》是为了遵行里边的话，不仅是为念而念，而且要身体力行。主张阿訇为教徒念经不收钱，教徒也不可因念经而备饭待客，否则不予念经。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吃了不念，念了不吃。”这一倡议减轻了教民的负担，一些无能力、经济比较贫穷的教民

可以不花钱，不备饭也能请阿訇念经，是符合教民利益的，因而有很多回民、撒拉族转而信奉此派。

（二）反对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伊合瓦尼教派传播以前，穆斯林对于亡人的葬礼和祭祀曾实行一套既繁琐又浪费的宗教仪式，人死以后，要披麻戴孝，从死人弥留之际，直到死后的一周年，亡者家请客念经多达10次以上，加上发给家属、亲友的孝布以及送葬施散的钱等花费是很大的。马万福及其所倡导的伊合瓦尼认为这些做法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是错误的，他曾严厉批评和抵制过这些做法，指出这些陈规陋习本来系自中国佛教、儒教（实指中国汉族）的影响，年长日久，就变成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这不仅是“来世的罪孽，而且是今世的不幸”。《古兰经》中说：“他们信主又行善的那些人，我只给他们课派力所能及的。”③ 穆罕默德说：“你们为自己和亡人舍散，即便是一口水也可，如果这也办不到，那就由自己念一段《古兰经》；如果对《古兰经》什么也不懂，那就央求真主的饶恕和慈悯，因为真主已许约要答应你们。”在马万福这些引经据典的倡导下，很多穆斯林改变了以前的祭祀活动，就连一些激烈反对他的门宦也改变了披麻戴孝的习惯。

（三）反对单一的经堂教学，提倡阿汉并重的经堂教育。马万福看到有些宗教职业人员的汉文水平很低，有的对汉文甚至一字不识，汉语表达能力很差；有些阿訇只埋头读经，对外界之事不闻不问。他引用穆罕默德的话：“求学是穆斯林男女上属于天命，从摇篮起到入坟墓为止”，“学问虽远在中国，必当求之”，要求清真寺教长对穆斯林青少年除鼓励他们学习阿拉伯文外，还要鼓励他们学习汉文。他分析历史上的回汉矛盾，认为是少数人挑起来的。特别是西北，回民不读书，文化落后，回汉之间思想不能沟通，以致互相猜疑，发生误会和冲突。

对清真寺的经堂教育，认为只学好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培养

出来的阿訇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不能确切阐述宗教教义，因为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是以汉语为自己的共同语言，尤其是在经堂教育中，需要将阿文、波斯文翻译成汉文，信教群众才能接受。而一些阿訇对阿文、波斯文的口译错误很多。比如：阿文词汇里的“伊里替法台”应译成“注意”，但经堂语都译成“小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教学方法上，马万福针对当时经堂教育中的一些弊病提出以下见几点意见：（1）因材施教，对求学的青少年注意观察接受能力，对接受能力强的多讲一些，对能力差的则少讲一点；（2）先教紧要的诚信，然后再教普通的宗教知识，由浅入深，由近而远；（3）先打好词法、语法的基础，再讲教义、教律学；（4）先熟读文章，然后再讲解意思；（5）每讲一段，反复数次，必须使受教者了解透彻；（6）严格遵守师生之道，要公道，必须喜爱受教者（学生），也要严格要求受教者。这几条教学方法到现在还在一般清真寺内应用。

四

马万福在临夏时就会同十大阿訇，择录《伊哈雅一》、《费格海》、《嘎最》、《伊目沙德》、《沙密》、《克俩目》、《麦卜苏推》等八部经典的内容，扼要地撰写了一本穆斯林遵行的经，取名为《布华里咱德》。在这本书里较系统地阐述了伊合瓦尼的主张。

马万福到西宁后，继续研究经典，他认为伊斯兰教的各信条中“信仰真主独一”是最根本的信条，对真主的概念赋于最高地位。崇拜偶象或把其他的神同“独一的真主”结合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都是损害和贬低独一真主的最高地位，是“最恶劣的，不可饶恕”的罪过。从这一教义出发，认为对圣徒、圣裔给以尊重，而不能加以崇拜。

伊斯兰教的宗教功课分为“费里则”（天命）、“瓦直布”（当

然）、“逊奈替”（圣行）、“台图卧尔”（副功），伊合瓦尼认为前三种是不可互缺的宗教功课，而后一种则是次要的宗教功课，主要做好“天命”、“圣行”、“当然”的宗教功课，行有余力而后作“副功”的宗教功课。对于前三种，它也主张须有轻重、首末之分。“天命”是头等重要的宗教功课，必须无条件遵行，次为“当然”的宗教功课，再次是“圣行”的宗教功课。反对把这三种宗教功课轻重不分，本末倒置的做法。

“念”、“礼”、“斋”、“课”、“朝”是《古兰经》中明文规定的宗教功课，统称为“五庄天命”，伊合瓦尼派认为这“五项功课”是伊斯兰教一切宗教礼仪中基本的功课，而“念”、“礼”则是最基本的，因而对它极端重视，必须具有“严肃庄重的态度”。它十分重视《古兰经》的读法，主张必须按照《古兰经》中阿拉伯语语音来读，认为不懂《古兰经》读法的人就不能率领教徒礼拜；在礼拜中念到“作证词”时起食指，以示真主独一，必须面准确朝向“克尔白”（麦加天房），而不是正西方；对于“斋功”，主张见月开，见月封，若不见月，则于上月见月之日推算30日以决定斋月之出入；对“课功”，要求凡施散天课，最相易的是从贫困的近亲（妻子儿女除外）散起，而致一切贫穷的穆斯林，对于有家资（应出天课之人）的人，不能散天课，也不能接受天课，天课一般规定年收入的1/40；“觐见”，要求有能力的人要严格遵守。

在婚姻、丧葬方面，伊合瓦尼也主张以“天命”、“当然”的方式进行，严格遵守“圣行”的传统习惯，离婚或死了丈夫的妇女必须经过严格的守“安代替”（限期）方可再嫁，一般规定限期为100日，否则便是违背《古兰经》规定的“天命”。举行婚礼时，主张用汉语说“我接受了”，反对用波斯语回答：“盖布力勒旦”；在葬送死人时，除主张用钱传“费子耶”（赎罪），反对用《古兰经》传“费子耶”外，还反对给临死的人由阿訇念“祷

拜”（忏悔），主张由临死亡者本人祈祷赎罪，别人在旁边给予启示；反对在坟上集体念《古兰经》，主张由一人念，众人倾听；反对为死者过七期、40天、百日、周年等祭日，主张遵照“圣行”的方式，只在主麻日祈祷、追悼亡人。

马万福倡导的伊合瓦尼教派对妇女是严酷的，它要求妇女戴上盖头，对妇女的社会、文化等活动加以限制，但它坚决反对妇女缠足，这在当时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它认为缠足是违背真主的造化意志的。

伊合瓦尼教派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和共同的宗教头领，清真寺的管理组织采用“学东乡老制”的形式，在集镇或城市一些清真寺多把这种组织称为“董事会”，“董事会”的负责人称为“学东”，其成员称为“乡老”。寺内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学东乡老们的讨论才能决定。

五

马万福倡导的伊合瓦尼教派的传播，是近代回族伊斯兰教发展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被称为是回族伊斯兰教的“维新运动”，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传遍了甘宁青等广大地区，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教派，这是有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本身等多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伊合瓦尼传播的时间正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陕甘回民起义、“河湟事变”等一系列反清斗争失败以后，苦难的回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穆斯林不仅需要休养生息，而且需要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中得到精神安慰。

其次，伊合瓦尼教派提倡经堂教育，特别是他主张中阿并重，提倡学习汉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回族大众的要求。因为，回族虽然有自己大小不同的聚居区，但在整体上来说还是和汉族杂居的，和汉族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就要求回族对汉族的文

化要有一定的了解。

再次，伊合瓦尼教派之所以广泛传播，是与它的培养宗教人才有关，它的倡导者马万福不仅自己出任讲学，而且委任和鼓励他的弟子们多招满拉，为推动和发展“伊合瓦尼新运动”准备条件，打好基础。在回民比较集中的一些地区设立回民学校，如青海西宁昆仑中学、兰州回民中学、宁夏中阿学校等。在这些学校中中阿并授，培养了一些有专门知识的宗教人才，为伊合瓦尼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伊合瓦尼教派以“宗教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反对宗教人员诵经时收乜贴，反对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反对铺张浪费，反映了教民的要求，得到教民的拥护。

第五，伊合瓦尼传播的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之际，回族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在回族内部出现了一种以军阀和商业资本家为代表的新兴的统治阶级。伊合瓦尼提出“穆斯林皆兄弟”的口号，顺应了回族中新兴统治阶级的要求，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得到西北军阀马麒、马步芳、马鸿逵等人的大力支持，加之该派的倡导者马万福“博学多才，善于言词”，有很高的威望，它的积极推行者宁夏郭四高、虎嵩山，甘肃十大哈吉以及青海的马俊、马祥臣等阿訇宗教知识造诣较深，经济力量强，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具有比较大的号召力，这就为伊合瓦尼教派的发展提供了其他教派所不具备的条件。

注　解：

①《古兰经》第二章四一

②《古兰经》第六章一七四

③《古兰经》第七章四二

西道堂教派

陆进贤　陆聚贤

创教的艰辛与发展

西道堂教派是我国伊斯兰教众多教派门宦中出现最晚的一个教派。它的创建，一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作为背景，二没有其他教派门宦的支持，三没有依靠任何名人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实力。相反，还不时受到外来的诽谤打击和某些政治势力的迫害摧残，真正是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就不能不先谈谈他们的道祖马启西先生。离开他，就无从谈起西道堂教派。

马启西先生在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甘肃洮州店子村的名儒范绳武先生门下，聪颖好学，绳武先生颇为器重，常语人曰：“此子在孔门即为颜回；在回教即为传道之穆罕默德。”1876年和1878年（清朝光绪二年和四年），马启西先后在甘肃临潭县试和巩昌府试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童生和秀才。先生时年20岁，正英年有为，功名利禄举步可得，但先生以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坚定信仰，立志继承和发扬穆圣之真传。于是负笈返里，一面循循善诱为师；一面孜孜不倦地学习，用汉学知识，精研伊斯兰教义哲理，既讲授汉文，又传播穆圣经义，深受群众欢迎。远近投门入学者日众，不仅有回民，而且有汉、藏、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的人。

启西先生在授徒和自学的几年间，既攻读儒学，又钻研和宣

讲金陵刘介廉等人的《天方性理》、《至圣实录》、《正教真诠》、《归真总义》、《清真大学》、《清真指南》等书，并以汉文解释《古兰经》或伊斯兰教的著作，从而进一步领会了伊斯兰教义的真谛。此后，他进入临潭西凤山洞坐静悟道10年，这又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马启西先生从1890年在本乡设金星堂私塾，开馆授徒。由于他学识渊博，阐理明确透彻，深受门生欢迎，不断有人投门求教。1897年坐静悟道完功，复开讲席，大讲伊斯兰教经义，临潭县归顺西道堂的回民日渐增多，并有汉、藏民也来皈依，道堂一时大为发展。

反对派以“树党结盟，倡奇立异，惑乱人心”为词，一面密告地方政府，一面寻衅闹事，企图搞垮西道堂。当时清政府洮州厅官吏受贿徇私，于1903年竟出示严禁，将西道堂主事人及马启西先生予以监禁，对远道而来的教民一律解回原籍。但教民们以坚定的信仰，不畏权势，不避艰险，多方奔走，联名上诉，几经艰苦曲折的斗争，才将原判撤销，马启西先生始得开释，恢复自由。

新生的西道堂于1904年又集资修建起一座自己的礼拜堂，继续开堂，扩充讲席。但是，反对派又以所谓“违叛古教，创奇立异”为词，不断诬罪上告，进而煽动受蒙蔽的群众寻衅闹事，几次打伤教民救人，打死一人，还企图拆毁教堂，纵火焚烧了道堂在卓洛村的麦垛。为此，迫使道堂教民不得不控告。后经过皋兰县17坊回族头目臧积德等人从中调解，暂时平息。1906年，马启西为避免是非锋芒，率同教民4人，前往麦加朝觐。仇视者暗在莲花山要道设伏，企图暗害，幸亏及时觉察返回，始免遭毒手。同年十二月又西行朝圣，经青海民和，至河西张掖涉戈壁，过沙漠，经北疆而至撒马尔罕，因遇战乱受阻，遂留住白帽城北道堂宣教讲学。1908年，教民丁全德等迎接马启西先生返回，路经迪化时，

又遭仇视者暗结官府，网络罪名，密告到迪化厅，企图阻止回来。但因调查无据，又巧遇一云南籍穆斯林出面作证，始得放行返回。先生回临潭后，即开始将金星堂正名为“西道堂”。

马启西先生从设金星堂授徒传教开始，在不断遭受迫害，屡经挫折的情况下，教徒仍日渐增加，有远至青海民和、化隆等地的人，有的竟携带全部家产来参加道堂，并有汉、藏、保安、撒拉、东乡等各族人民来归顺。这时西道堂在伊斯兰教中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教派，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仇视者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当时大权在手的西军头目马安良也自称要“顺从西道堂”，妄图使西道堂为他的政治野心服务。他邀请马启西先生到他的官邸以上宾款待，虚伪地说：“你老人家从天方归来，与凡人不一样。”启西先生回答说：“受主命者取主之喜，决不取人之喜。在圣人的途径上，许多人就不能成桩。”马安良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能成桩。”启西先生只笑而置之。

1914年，马安良派其弟马宗武和其子马廷章到临潭，向启西先生表面上行了跪拜礼后，马宗武挑衅地说：“我听说，‘勿利’（接近真主的）能显‘克俩买提’（即显圣迹），今日能显一下吗？”启西先生正色回答：“真正的‘勿利’没有‘克俩买提’，‘克俩买提’是从主上来的，它在‘引沙尼’（有道德的）上，不在‘哈瓦尼’（下流人或畜类）上。我的‘克俩买提’在我的后靠身上。”这几句话，既符合古兰经教义的真谛，又警告了仇视者。

同年5月19日，马安良派部下张顺元率兵突袭西道堂，将道祖马启西先生捕杀，同时遇难的弟兄、子侄和教生共27人。西道堂财产被抄没，80多人被捕押，40多名少妇被强行解往导河，欲为马安良部下发配为妻。因坚贞不从未果。西道堂教民上京控告，马安良派人将第一批上京的人拦路截捕，拟将第二批上京的丁全功、敏学成、马明仁等暗害，因防范机警而未成。马安良自以为

这样做就可以把西道堂镇压下去，孰不知具有真正伊斯兰教信仰的教民，有的毁家输难，有的输家产之半，全力支持上告伸冤。经过两年多的斗争，直到1916年，当时北京总统府才给甘肃督军电令："将田产土地归还西道堂，允许信教自由。"但在当时官官相护的情况下，凶手马安良却消遥法外，继续作恶。1917年，又在马安良指使下，发生了台子街惨案，致使第二任教主丁全功等6人突围时殉难，马明仁、敏学成等人被捕下狱。直到1919年马安良暴死后，马明仁、敏学成等始得获释。马明仁出任第三任教主，在敏学成协助下，开始重建教堂，使西道堂进入复兴发展阶段。

发展地方教育事业

西道堂教派的创建，就是从马启西先生创办金星私塾而开始的，这就说明从最初就重视地方教育事业。

第三任教主马明仁先生于1919年成立了临潭普慈小学，为临潭县当时唯一的一所私立小学，聘请汉族周望连任教，教材取民国初年教育部编修的课本，除动员本道堂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外，还招收各民族儿童一律免费上学，共有学生100多名，这是当时绝无仅有的。1921年，马明仁倡导集资白银万两，在临潭西凤山麓办起了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小，为当时临潭全县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一所小学。当时有临潭、卓尼、岷县三县各民族子弟150—200名，班级编制一至六年级，共6个班。课程有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五、六两年级增设英语。1929年，在兵匪抢劫、时局十分混乱之际，临潭全县学校都处于停顿和散伙状态，马明仁教主率领千余人避乱迁居到甘肃禄曲拉仁关陪室和卓尼车巴沟，当时在口粮都向藏族各寺院告贷的困难情况下，仍在拉仁关成立了临时小学，有学生20名，由丁启元讲授汉文课；在车巴沟公巴寺设立了临时经学堂，由丁四哥任教，讲授阿文课。

1931年，学校从拉仁关迁回旧城，立即重修了第四高小，1932年改为公立学校，更名为临潭县旧城第二小学。1933年，马明仁教主借赴兰州索取修建大寺看样之机，将数名学生送入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就读。1943年成立了临潭　西女子小学，招收当地回、汉女生150名，这在甘南附近各县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同时，还在卓洛农庄建立了“卓洛初级小学”，招收各民族学生50多名。1948年，又开工修建启西中学，于1949年6月竣工，准备秋季开学，因当时政治风云急剧变化，地方混乱，未得开学，旋即全国解放。

西道堂在重视本地区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关心外地的教育，马明仁教主曾给兰州西北中学捐赠了一大批扩建校舍的木料，该校曾修建“明仁堂”一座，以资纪念。

发展西道堂集体经济

西道堂对经济建设事业的重视和发展是十分显著的。这里既有历史根源，又有宗教的根源。人所共知的是我国回族人民在历史上就有善于经商的传统，但对宗教上的根源是鲜为人知，也少为人所称道。那么，宗教上的根源是什么呢，西道堂教民就是在“信主独一”的思想指导下，无私地为教内经济建设事业慷慨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例如，马启西道祖、丁全功教主、马明仁教主、敏志道教士等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集体所有，各乡庄的教徒如敏海峰、敏五九、敏五乙儿等50多户将全部家产捐献给道堂公有，这就奠定了西道堂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础。早在1904年，教徒丁重明向道堂捐献白银1万两，开设了天兴隆商号；翌年又捐献白银1000两，开设了天兴亨商号，奠定商业集体经济的基础。他们在集体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抽出资金发展林业和牧业，1906年购置洮河岸仓科林地一处。1912年向青海玉树派出行商收购畜产品，同年开设天兴泰商号。到1913年，道堂商业

由白银10万两发展到100万两。

1914年，道祖马启西殉难后，财产被马安良几乎没收殆尽，受了一次很大的挫折。1919年，第三任教主马明仁在敏学成协助下，又恢复了天兴隆总号和天兴亨、天兴泰分号，同年又建立了卓尼什路牧场。1920年，道堂先后在当地及岷县、兰州，四川甘孜、阿坝、松潘，青海果洛、同德等地开设商号10座，在总号设皮货加工厂一处。1922年，道堂又购置立杆林场一处，次年在果洛建立驮牛商队三帮，有驮牛200多头，并建立砖瓦窑二处，后又在禄曲建立牧场一处。1927年，道堂与北京永盛和商号各投资白银1万两，成立“公记”坐商一处。同时建立了骆驼商队，拥有骆驼60多峰，往返于包头、绥远、内蒙、张家口一带经商，购置帕乔林场一处。1928年至1929年因地方上发生变乱，西道堂的西大寺和道堂本部的建筑、商号、学校及旧城民房等在变乱中全部被兵匪抢劫后，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商号的大部分物资早以转移至藏区，行商均外出未归，虽受很大损失，但元气未伤。

1930年，西道堂已建立坐商13处，有流动资金20多万两白银，驼牛1000多头，马100多匹。1931年，坐商又开设了拉仁关、张家口、天津等地天兴隆号，建立了拉仁关牧场、麦务牧场，购置了贡却乎林场。1933和1934年两年间又先后开设了西门窝窝店，修水磨5盘、油房一座，购置罗儿沟林场一处，同时组织贩马队，先后两次赴陕西售马120多匹。

为了扩大牧区贸易，行商队由原来的13帮扩充到20帮，拥有流动资金17万多两，共有驮牛1700多头，经常往返于康定、青海玉树（结古）、果洛，四川甘孜、阿坝、松潘等地，马明仁教主还亲赴四川阿坝与藏族麦仓头人洽谈了商务交往事宜。除此之外，还成立了骆驼队。1937年，重修天兴隆总号，与青海马步芳合办起西北木厂，在临洮开设木材分销店。1939年至1942年间，先后购置建立了久尼、力加、吉拉等三处林场。西道堂在1949年全国解

放前夕，共有独资经营的坐商字号20处，合资经营的“公记”一处，分布在天津、北京、张家口，四川甘孜、阿坝、康定，兰州、岷县，青海同德等处，并与德商普伦洋行建立了商务关系。流动资金虽无可靠资料可考，估计拥有白银约200万两左右，行商驼牛、商队20帮（情况如前述），骆驼商队60峰（约3帮）。还拥有林场13处，约数万公顷。解放后全部献给国家，现为洮河林场主要采伐区。还有牧场3处，即夏河麦务、禄曲拉仁关、卓尼什路，其中以麦务牧场最大，有牛1000多头、羊2000多只、马100多匹。副业方面有：水磨12盘、油坊6座、砖瓦厂2处、粉坊和醋坊各1处。

农业方面。在教徒自愿将全部家产献给道堂公有的基础上，早在1946年前，先后由道堂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起集体经营的乡庄有：旧城、卓洛、长川、他那、坡岔、白土、新城、汪家嘴、太平、尕录提、下藏、什路、敏家嘴等13处，当时共有农业人口700多人，耕地71.82石（每石为10亩左右）。每个乡庄选1名负责人统一经营管理，发展本教门一切公益事业。

西道堂重视民族团结

西道堂教派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多民族杂居地区。这里有藏、回、汉、撒拉、保安、东乡等民族，回族中还有不同教派、门宦。因此，如何搞好民族团结和教派门宦之间的团结，西道堂教派从金星堂设馆授徒始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宣统二年（1910年），道堂一商贩的乘马在天兴隆商号门前惊弛，撞倒了一个别教门的孩子，另一教派便借故发动起多人来闹事，并以石头砖块砸毁西道堂天兴隆商号，损失很大。教徒告知马启西先生，先生不仅未发怒，反笑曰：“他们出气，我们必须忍气，还要给人家登门道歉才对。”于是便派人持礼登门道歉。对方不理，回告先生，先生复令再往赔罪，对方仍不理，先生即时念了

一段经文，劝解大家息怒。又如，马启西先生从撒马尔罕返回之后，得知有些曾经仇视过他的人相继去世，他抛弃前嫌，前往他们的墓地去诵经祈祷，表示悼念。有人问："你为啥给这些人去上坟念经呢？"先生答曰："遵圣行。因穆圣曾过墓为亡人祈祷而息争端，我亦步之，以求得主的好。"先生曾与旧城上寺有过不和，为了抛弃前嫌，争取团结，他主动率西道堂教民前往上寺做了一次聚礼。在这些事上，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的宽宏气度。

西道堂的行商、坐商（特别是行商）本着"友爱和平，忠诚老实"的精神，以薄利多销的原则，逐渐与藏族地区的头人和群众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友好关系。藏民称西道堂人为"求索玛"（即回民中的新教），买卖公道。西道堂建立的牛马商队远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就在甘、川、青三省边界辽阔的藏族地区往返经商，在甘南禄曲拉仁关所属四个部落建立了"主人家"关系，并与该地区头人唐弄郭哇"拴下了头"（即订立了合同之意），成了他们的生意人，取得了永久保护权，并扎庄成立了商号。他们还与前往阿坝、玉树、康定、甘孜等地区必经的藏南十二头地区的喇嘛、头人建立了"主人家"关系，然后开设商号，取得了藏民的信赖。

全国解放后的西道堂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1958年反封建斗争，西道堂的原有经济组织形式已并入公社组织而不复存在。西道堂的少数人曾从事过反革命活动，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粉碎"四人帮"后，省、州、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经过认真调查核对，于1985年对西道堂问题彻底平了反，过去强加的不实之词一律推翻，作了公正的结论。这几年，西道堂的全体信教群众本着过去的信仰传统，重建了三处清真寺，恢复了七处宗教活动点，在从简节省的原则下，举行了马启西、马明仁、丁全功

先教主的归真纪念活动。

本文主要资料由马真阿訇（70岁）、马明轩阿訇（73岁）及马文德（66岁）、强自强（64岁）、马润德（81岁）、马厚庵、马忠良等回族老人提供，仅在此表示谢意。

注　解

①摘自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②“海乙”制是中心寺的意思。在临夏、青海马占鳌及马步芳父子统治的地方设此种制度，以宗教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其他地区如兰州、宁夏、新疆等地，均无设此。

③摘自高万选《临夏清真寺“海乙”制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哲合忍耶教派创始人马明心

马　辰

哲合忍耶教派，是中国伊斯兰教苏非派中的四大教派之一（虎夫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哲合忍耶）。它原是也门的一个教派，甘肃人马明心在也门求学期间，就在这个教派的清真寺学习，回国后按照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现实情况，对该教派的内容进行了改革，使它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中的一个新兴的派别，传播于全国10多个省区的穆斯林中。现将该教派创始人马明心的史略介绍如下。因作者掌握的史料还不够全面，敬希熟悉马明心情况的读者指正、补充。

马明心经名为尕耶屯拉。生于清朝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

年），在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公元1781年）被清政府杀害于兰州城墙上，终年63岁。马明心原籍甘肃阶州（武都），因灾荒迁移甘肃巩昌（陇西）内官营，又因生活困难迁移到甘肃金县（榆中）马坡。

马明心少年丧父，由母亲抚养。后又因生活所迫，母亲带着他流落到甘肃河州（临夏）大西关。12岁时，奉母命伴随叔父去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途经新疆戈壁沙漠地带突遇狂风，叔侄2人被狂风吹散，迷失方向。马明心只身被困在戈壁沙漠中，在生命垂危之际，遇到一位老人救了他，把他领到家里，供他食宿。他在老人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在老人的指点下，独自一人到了中印边界的一个清真寺当了木杂费（勤杂工）。马明心在这个清真寺的3年中，一面做勤杂工，一面刻苦学习阿拉伯文，受到该寺教长的喜爱。到第4年年头，该寺教长去麦加朝觐，带着马明心做从人。他们2人到了也门，教长不愿带马明心到沙特阿拉伯去朝觐，理由是穷人没有朝觐的使命，马明心身无分文，教长要他在也门自谋生活，教长1人去了麦加。他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一日信步走进也门的一个道堂，教主伊本·载尼（当地穆斯林称他为太爷）接见了马明心，对他说："我欢迎你！中国的毛俩（教导人的人）。"马明心请求伊本·载尼收留他求学，伊本·载尼允许了。

马明心在也门求学13年，9次到麦加朝觐。他在13年的刻苦学习中，对伊斯兰教义有了较深的造诣。伊本·载尼见他学习成绩优良，给他穿了绿衣（毕业），成为阿訇。伊本·载尼又把哲合忍耶教派的教义传授给马明心，命他把哲合忍耶教派的教义传授给中国的穆斯林，并规定只传八代教主（伊本·载尼在也门只传七代）。这就是该教派常说的里七外八。马明心回国时，伊本·载尼送他3本经：（一）《古兰经》；（二）《满达耶赫》（赞穆圣诗词）；（三）《穆合曼斯》（穆圣传略）。以这3本经作

为哲合耶教派教义的传授经典。

马明心由也门回到甘肃的河州，此时母亲已去世，他无家可归，就住在河州西关的稍麻（小清真寺）讲学，传授哲合忍耶教义。

马明心反对用教权谋取他人的财物；不允许传教者为了贪图私利而篡改伊斯兰的教义；不允许以宗教的名义谋取名利地位；不允许违背经典随心所欲地树立宗教权威。

马明心传播的哲合忍耶的这些主张，很快得到周围穆斯林的拥护。他在河州讲学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上千名老教的穆斯林改信了哲合忍耶教派。当时有人不同意马明心宣传的哲合忍耶新教教义，于是对马明心采取了排挤、诬陷、打击、驱逐的手段，逼使马明心由河州迁居到青海省的循化县一个稍麻（小清真寺）以避风险。此后，他只身周游各地传教，先后到过新疆、青海、宁夏、陕西。

马明心在循化避难传教时，第二次受到一些人的迫害。他们勾结官府，以“传新教煽动人心，不服王法”等罪名上诉官府。官府在审讯时，打马明心50大板，将他的学生苏四十三打了150大板，并把他们师生2人由循化驱逐出境。马明心又由循化迁移到甘肃榆中马坡山中避难。此时，有云南古城的马海力非（后来称古城太爷）、新疆伊犁的苏阿訇、甘肃河州的祁阿訇、山东的金阿訇、陕西的陈阿訇、买阿訇、甘肃海原的田五阿訇等20多名阿訇来榆中马坡向马明心学习哲合忍耶新教教义，把新教教义传到全国各地。

马明心一生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他田无一亩，房无一间，在辗转流离的生活中经常住在山洞或土窖里。至今甘肃榆中县的马坡、定西县官川的马家堡仍然残存着他当年住过的土窑洞的遗迹。他传教40年，家无分文积存，全家8口人跟着他过着同样的艰苦生活。他先后娶过两位妻子，一姓韩（河州撒拉人），一姓

张（甘肃通渭县华家岭草芽沟人）。家里没有毛驴，吃的米面都是妻子抱着磨棍磨成的。他家的炕上没有铺过毛毡，常年睡在炕席上。他经常穿着一件毛夹衫，是妻子亲自用土羊毛拈成毛线，织成的毛夹布衣。由于他生活清苦，遵经传教，严正律己待人，不谋私利，他每到一地都受到穆斯林的尊敬，大家都称他为“尔来之”（尊贵的人）。

马明心的道德品格和渊博的宗教知识使他在穆斯林中的声名越来越大。这就进一步遭受到一些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的迫害。马明心又从榆中县的马坡迁移到定西县的莫尼湾深山避难传教。后因吃水困难，从莫尼湾迁移到定西官川的马家堡子居住。可是有些人仍不让他传播新教，他们贿通官府下令限制新教的活动。这时马明心预感到他要受到更大的迫害，想把传教的使命委托给品学兼优的人，于是他派人到平凉去请格的目教派（老教）阿訇穆宪章，到宁夏灵州请马七阿訇（马达天的父亲、马化龙的曾祖父），到宁夏灵州马家堡子议事。穆宪章的母亲反对儿子参加新教活动，马明心两次派人去请，穆宪章两次都受母亲的阻拦没有去官川。第三次马明心写信给穆宪章：“为了千年的教门，可以不从母命。”穆宪章才违背母命到官川。马明心将哲合忍耶教派接替传教的经典、念珠（太斯备合）交给穆宪章，穆宪章正式继承了哲合忍耶的传教任务。当时穆宪章问马明心：“我以后由何人接替？”马明心回答说：“灵州（指马达天阿訇）。”同时，马明心对穆宪章和马七说：“传教者，首先不务虚名，不贪富贵，力戒私欲。凡贪图今世，据教私有的人就不是我的朵斯提（弟兄）。”

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3月，青海循化地区的穆斯林韩哈拉勿、韩二哥兄弟2人，兄信仰马明心的新教，弟信仰老教，因母亲丧葬事兄弟2人争执不下。兄主张请新教派阿訇苏四十三站“者那则”（葬礼），弟主张请老教阿訇站“者那则”。

兄弟2人互不相让，引起两个教派之间聚众斗殴，结果老教失败，被打死1人，打伤几人，韩哈拉勿的母亲由苏四十三站"者那则"。苏四十三当场说，愿为此事争取得"舍西德"（为教牺牲至高至贵的人）。斗殴发生后，老教派上告到兰州的陕甘总督衙门。当时陕甘总督勒尔谨派兰州知府杨士玑会同河州副将新柱查办。杨士玑、新柱一意偏袒老教，打击苏四十三。苏四十三气愤不平，于三月十八日夜率1000多人反抗，当夜赶到百庄，把副将新柱、官员刘汉时等人杀死。天明又赶到旗台堡，杀死知府杨士玑、守备徐彦登、官员陈伏得、土司韩成琳等。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3000多人攻开河州城，杀死知州周植、都司李琦、千总米为奇、官员杨天德、徐烈等人，并打开监狱放走囚犯。同时得到了军火和库存东西，壮大了武装力量。

这时，有人在兰州趁机贿赂总督勒尔谨白银1万两，控告苏四十三破城杀官劫库的活动，并指明马明心是策划这次事件的后台。于是官府在定西县官川逮捕了马明心全家8口人，先押在定西，后解送到兰州，押在皋兰县政府。清兵在马明心家里没抄出一文钱、一件新衣、一斗粮食。

河州撒拉族、洮州回族中哲合忍耶派的穆斯林听到马明心全家遇难，自动集合1万多男女，由苏四十三和马明心的义女撒拉族的赛利麦率领直攻兰州。苏四十三率队攻打兰州南关，赛利麦率队攻打兰州西关，震动全城。兰州西关、海家滩一带的穆斯林放火内应，参加战斗。在西关战斗中，打死都司王宗龙、把总张廷栋、惠君遴，外委采廷才、张文斌、马士望、魏永悦等清政府官员40多人。

苏四十三和赛利麦领导的拯救马明心的反清运动，震动了陕甘两省，使陕甘两省官府惊恐万状，快马转奏朝廷。清朝乾隆皇帝连降圣谕：速调陕西、四川、新疆、河南、山西、蒙古各路兵马1万多人四面出击。命大学士钦差大臣阿桂、尚书和坤赴

甘办理。

三月二十七日，起义军再次猛攻兰州城，要求释放马明心，守城官吏王廷瓒用缓兵之计拖延时间，等待固原援兵，逼马明心登上城墙劝说苏四十三退兵停战。马明心身带枷锁，登上城墙，对城下起义的穆斯林说："朵斯达尼（弟兄们）！不要为我一人的存亡兴师动众，叫大家舍身亡命，家破人亡，这是我所不喜欢的。你们快退兵。"起义军见马明心身负重枷，痛哭不走。为了亲睹马明心一眼，起义军越聚越多，马明心生气地把手杖摔下城以示气愤，起义军为抢手杖，阵容大乱，拥挤不堪。王廷瓒看到马明心在穆斯林中的威望这么高，不敢释放他，就在城墙上杀了马明心。

穆斯林起义军见王廷瓒杀了马明心，奋不顾身，架起云梯攻城。此时固原镇总兵图钦保率援兵已到，经过一场混战，苏四十三兵败退守五泉山、四屯坪、华林山一带。赛利麦率女兵1000多人渡过黄河，在黄河北岸与清兵展开大刀战，她手持双刀，救出义军退上白塔山，不幸夫妻2人身负重伤，同时自刎。战后，穆斯林为了纪念她，在白塔山下的金城关建立了拱北（坟墓）。

苏四十三退守五泉山，兵败再退华林山，因敌人切断水源，在六月十五日战败阵亡。勒尔谨割下苏四十三的头传示各地。

苏四十三战败后，清军将马明心的妻子张氏连同3个女儿发配到新疆伊犁，马明心的两个儿子发配到云南，小儿子马顺真在押解途中病故于云南报木井，大儿子马顺真发配到云南他朗（墨江县）一金矿服劳役。

马元章与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

马　辰

我是马元章的曾孙，文中资料主要是根据我父亲所讲他跟随曾祖多年的亲身经历见闻，并参考曾祖平生写作的原稿(未付印)和官府来往的函电原件写成。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敬望读者不吝指数。

哲合忍耶是我国回族伊斯兰教中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教派。在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及同治年间马化龙反清起义失败之后，趋于衰亡的境地。至清末民初哲合忍耶教派又发展到一个鼎盛的局面，这是由于马元章对这个教派的复兴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马元章其人及家世

马元章原名云鹏，字光烈，生于清咸丰初年。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1716—1781年）的四世孙。

马明心有三男三女，次子长女均少亡。长子顺清是马元章的祖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马明心被清朝统治阶级杀害后，顺清被发遣到云南的他郎寨（墨江县）矿山服劳役。顺清到他郎后，适与在马明心处受过教的人称古城马三爷者相遇，被营救脱难。在他的帮助照顾下，娶妻成家，落居河西县之东沟，生有五子，其第三子马世麟（又名复生）是马元章的父亲。由于马顺清善于经营工商，兼务农业，至同治初年家业兴盛，遂为富甲一乡

的巨户。

马顺清、马世麟父子两代均为哲合忍耶第四代教主马以德、第五代教主马化龙在云南、贵州的“热依斯”（代理教主主持教务者）。马世麟曾两次到宁夏金积堡觐见马化龙，受到马化龙热情接待。并在今同心县锁家岔清真寺念经两年。马世麟后参与云南杜文秀反清起义，至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失败自杀，教内尊称云南老三太爷。

马元章少年聪颖好学，博通中国文史，在阿文方面造诣很深，十八岁时背诵《古兰经》如流，使得当时许多阿訇、长者惊叹不已，赞曰奇才。同时，元章十分注重时事学习，在固原专设商号“义和昌”，订有全国著名的报刊杂志10多种，每日翻阅，并请当地各族有名的学者名士作教师，如清翰林哈锐（回族，甘肃天水人）、翰林安维峻（汉族，甘肃秦安人）、翰林刘尔忻（汉族，兰州人），甚至还有宣统皇帝的堂叔清道尹爱新觉罗·善昌。元章和这些学者谈古论今，受益匪浅，因此成为当时宗教界一位博通古今的名人。他用五年多的时间抄写了3函《古兰经》（一函30册），据识者说，他写的阿文与众不同，别具风格，书法流畅而优美。他曾给教民写过很多阿文字画，留作纪念，虽经十年浩劫，仍有不少保存至今。

元章一生著有20多篇修身济世的文章，300多首关于宗教、为人处世的诗词。主要阐述：怎样作虔诚的穆斯林，怎样力行伊斯兰教教义维护伊斯兰教法典，尊崇和实行至高无尚的《古兰经》。还有如何战胜日本的文章，1936年，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此文章从郭南浦处抄去作参考。至今还记得他在谈到待人接物方面有这样几句话：“雨落于焦土，勿落于顽石；焦土润泽，顽石罔觉。恩施于君子，勿施于小人；君子报德，小人昧良。”还著有《省己格言》、《天难问》、《古之忠奸论》等，均本之《古兰经》的精神，掺以中国儒家的道德标准，劝勉自己，教诫后人。

马元章热衷于办教，布衣素食，一生俭朴。民国7年（1918年），他去兰州，回族官吏郭南浦为他准备了豪华的住室，他却将下榻处的地毯叫从人拖到黄河里洗净铺到床上，把沙发退回，并对郭南浦说："我是勤功办教的人，我不是坐享清福的人。"显示了俭朴的"圣行"。

元章娶两妻，一是灵州夫人，一是云南夫人。生四子，忠武、广武、仁武、震武。

虎口逃生

同治初年，云南回族首领杜文秀、马如龙等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分别在滇西、滇东南起义，杜文秀自称"伊斯兰教人大元帅"。马世麟也在通海地区响应起义。在清朝统治阶级的忠实走卒云南总督岑毓英残酷镇压下，经过3年多的战争，最后收降了马如龙，打败了杜文秀，攻占了回民起义军的根据地大理城。

同治九年（1871年）十月，投降清军的马如龙引导清军总兵夏毓秀、杨广智等围攻通海的回民起义军老营东沟寨。以马世麟为首的义军2000余众被清军围困1年多，马如龙企图诱劝马世麟投降清军，说："只要开寨投降，交出武器，诚心受抚，我愿以穆民的良心明誓，决不加害。并宽恕东沟所有的回民原地不动，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杀家灭族！"寨内的回民起义军识破了清军降而杀之的阴谋，坚决抵抗。在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寨内的起义军家眷争先自尽，伤病员也多举火自焚，以节省粮草，砥励士气。最后能战之士仅30余人，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年仅18岁的马元章见此形势，为了保存力量，起义军重要人员由早已挖好的地道分散潜出，相约在成都集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马元章兄弟3人同主要随员杨云鹏、穆云海、马寅武等由成都扮作商贾捐客，流亡西北。马元章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通缉，将原名云鹏改为云章，伪装成汉民捐商，走遍全国10多个省。

经常风餐露宿，　腹而行，备尝艰辛。至光绪初年，秘密到达甘肃张家川，住在李家沟李麻子家。在西北开始了哲合忍耶的复兴活动。

营　救　马　进　成

光绪初年，马元章在甘肃张家川得悉，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起义首领马化龙的部分遗族被押解在西安，即派马云襄、马树勋潜往西安，由马金玉贿通解差赵八月，始知马化龙之孙进成、进西兄弟的消息。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清政府解马进成去北京宫刑，进成时年12岁。马元章闻讯，亲自带杨云鹤、马寅武、马树勋、马德全、穆云鸿、李发财、杨义兴等扮作皮货商去北京，在昌平见到了马化龙的妾白氏（人称西府太太）磋商如何营救马进成，由于北京戒备严密，未得机会下手。

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马进成受宫刑，发配汴梁(开封）满城将军文生家为奴。马元章为接济马进成生活所需，专派穆云鸿（秀才）、金奎二人扮作卖瓜子、花生的小贩，日往满城，风雨无阻，达6年之久。以后文家逐渐放松对马进成的约束，准其自出购物。马元章为长期在生活上照顾马进成，便在汴梁北大街开设“义兴成”小商号，由马周、马阳春、耿文德、陈士良等主持。从此马元章和马进成经常见面，商讨复教的事情。马元章多次劝马进成逃走，把船都买好了，但马进成都以“身已遭残，不能再理教门”为由拒绝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马进成病故于文家，时年26岁。

营　救　马　进　西

马进西为马进成之弟，光绪五年（1880年）夏，马进西也到了12岁，清朝统治者命将进西由西安解往北京宫刑。马元章在汴

梁得悉，星夜派亲信杨云鹤、马寅武、马云襄、马德全四人前往营救，并当面嘱咐说："灵州太爷（指马化龙）300多口家眷，仅留这一个亲孙，如这次再营救不出来，灵州太爷的根苗绝了，我再无颜见众教民，你们也不要回来见我，从此各讨方便。"杨云鹤、马寅武等四人奉命扮作客商，潜随清军囚车而行，至山西洪洞县张毛峡石，见地僻人稀有机可乘，马寅武便潜伏道侧，击毙十多个解差，劫了囚车，背马进西越太行山，昼伏夜行，备经艰险，始达汴梁。又由汴梁奔亳州上船，顺流赴扬州转至杭州住在陶茂春家，马元章抚育马进西十多年直至成家娶妻。马元章又迎接西府白氏由昌平到汴梁。马进西被劫后，清廷一直在追查杀死解差者及马进西的下落。至1900年"庚子事件"，慈禧太后逃到西安，马元章趁清廷外患危急，授意马化龙之妾白氏请甘肃提督马安良向慈禧太后说情，希赦免对马进西的缉捕。请赦书由马元章亲自执笔，其中一句曰"赦一人可安万民，杀一人万民难安"。慈禧看了请赦书，赦免了马进西，结束了该案。马元章为营救马化龙的亲族后代，不畏艰险，竭尽全力，受到教内的一致称赞。

被西北回族称之为"左屠夫"的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残暴刑罚，将金积堡回民反清领袖马化龙以凌迟处决，并将头骨在全国游示10年。光绪八年（1882年），会宁刘阿訇献出自己的头换回马化龙的头骨，送往张家川，马元章为马化龙建拱北，写下"为众舍身"的碑文。为此，取得教民的信赖和支持，大大提高了威望。

积极开展复教活动

同治以后，清政府宣布马化龙的新教为"邪教"，严禁活动，清真寺被焚毁，拱北被夷平，道堂被充公。如发现有信奉马化龙新教者，轻则下狱，重则杀头。加之清朝统治者从中离间新、老教派之间的关系，造成新老教派之间严重不和。

马元章从云南流亡甘肃后，虽然处境极端困难，但仍秘密进行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活动，他鼓励教民团结起来，不要灰心。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马元章为复兴教门走遍了全国的13省。

马元章为了重振处于衰亡的哲合忍耶教派，首先在回民中揭穿左宗棠“以回制回”的阴谋。采取“多求友少树敌，凡是回民皆兄弟，何必煮豆燃豆箕”的方针，搞好回族中不同教派间的团结，联合回、汉各方面的绅商百姓，搞好团结，消除过去的积怨。以安定地方，和平共处，休养生息为基础，再图恢复教门。在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的情况下，这个团结广大回、汉群众的方针，适应了群众渴望安定的心理，所以很快受到回汉各族人民的欢迎，结束了甘肃陇东、陇南地区回汉人民长期对立的局面。

光绪八年（1882年），马元章奉西府白氏之命，与马化龙三弟马成龙之女于六月十六日结婚，落居沙沟。从此沙沟就成为马元章恢复发展教务的基地，有人称哲合忍耶为沙沟门宦，始因于此。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太子少保董福祥因“庚子事件”，获罪洋人，避居固原。董福祥以镇压屠杀回民起家，曾于同治年间协助左宗棠血洗金积堡。所以董福祥到固原后目睹哲合忍耶教派在马元章的领导下又重新在甘、宁、青崛起，十分忿恨。妄图用他手中所掌握的团练重新剿灭哲合忍耶教派。马元章闻讯后镇静自如，当即修书一封，向董福祥陈明利害。信中警告董福祥：不要利令智昏，要认清时势，今日之时代，不是同治十年。今日之沙沟不是当年之金积堡。今日的马元章，非当年之马化龙。今日之董福祥更不比当年的左宗棠。左宗棠15万兵马未灭马化龙的教派，你董福祥千余团练奈我何？你是畏惧洋人缉捕，逃之山林避祸，如你竟敢用兵沙沟，我可电告北京及各省教民，向八国使馆控告，董福祥并未死，畏罪避居固原，继续殃民，欺骗洋人。

后果如何，你立身朝政多年，谅会自裁。

董福祥接信后，十分惶恐，立即复信差人到沙沟向马元章道歉，说他并无此意，实是坏人挑拨造谣。望元章豁达大度，宽释前嫌，以桑梓为重。此后董福祥再不敢敌视沙沟，反而经常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这样一来更提高了马元章在教门中的威望，回民也敢戴着回民帽子在固原大街上自由行走，再不受辱骂歧视，结束了回民不敢进城的时代。

二次营救马进西

民国5年（1916年），河南白朗军队攻占天水诸县，打死天水镇守使马国仁，有人乘机向甘肃督军张广建挑拨说：马进西父子勾结白朗阴谋造反。天水官府奉命将马进西和二儿子捕押天水，并对其二子刑讯逼供，打断胳膊。马元章闻讯后即日夜兼程赶赴兰州营救，在张广建面前替马进西说情，并得甘肃造币厂厂长、回族官吏郭南浦的财力支援，贿送张广建白洋1万元，才将马进西父子解至兰州释放。

此次马元章在兰州，受到官方的出郊欢迎，待以上宾。这是哲合忍耶前六代教主从未有过的盛况。马元章高兴地说："我的先辈在兰州作过阶下囚，而我今为坐上宾，沧桑之变，事在人为。"马元章在官方的支持下，在兰州举行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马明心被难之地及苏四十三战斗过的地方，如华林山、四墩坪、五泉山、萃英门（原海家滩）、金城关、雷潭河、皋兰县政府、韩家花园等处，马元章都率全家及阿訇、教民诵经悼念。马元章乘张广建赠送的八抬绿呢大轿，周游兰州市，盛极一时。

马元章在五泉山上感慨地对家族及数百教民说："在民国成立，五族共和，才有我们的今天。不过喜中有忧，我们在尊主命的同时还得尽人事，小心强过托靠。"

民国8年（1919年）的时候，哲合忍耶教派由清代两起两落之后又处于一个兴盛时期。这个教派以一贯反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压迫而闻名全国，马元章、马进西也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著名的反清人士。

这时哲合忍耶教派发展很快，教民遍布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四川、江苏、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等地，而且统一了分散在甘肃河州、定西及青海循化一带，由原哲合忍耶教派第二代教主穆宪章时代分裂出去的“老官川派”（只信仰马明心一个人）。这主要是由于马元章奉行的和平复教策略的成功。

复教策略

马元章常说：“悟往者之不可谏，知来者之犹可追。”他吸取了哲合忍耶历代教主遭受清朝统治阶级镇压残害的教训，在西北振兴哲合忍耶教派时，在政治、经济、人事与宗教关系方面处理得比较得当。

在政治方面，吸取了马化龙失败的沉痛教训。马元章认为，传教者决不能与当政者搞对立，应尽量融洽政、教之间的关系，以取得立足之地。故此马元章在发展宗教的同时，十分注意政治影响并与政界官吏交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马元章55岁生日，清朝隆懿太后手书“寿”字中堂，送到沙沟祝贺表彰马元章是“今世师表一代完人”。清政府也借此笼络回族上层人物。

民国5年（1916年），张广建、马福祥互争甘肃督军，马福祥以同教关系，请马元章向总统府为他玉成其事。袁世凯征求马元章意见，张、马二人谁为甘肃督军合适。马元章回电称：要想西北民众安居乐业、国家太平统一，不重演西夏分裂局面，愚见还是张公适宜；而当地人做当地之官没有不培植私人势力的，此为千古通例，祈总统明察。于是袁从其谏，委任张广建为甘肃督军

兼省长，因而使马福祥、马鸿逵父子二人怀恨在心。民国7年（1918年）马元章到兰州，在张广建倡议下，兰州各界赠马元章“东南西北人，江河湖海船”的大帐。

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参加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中国参加了英美为首的“协约国”。马元章看到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国家参加了同中国敌对的国际集团，而他本人又是中国伊斯兰教派中的领导人物，惟恐涉嫌，搞成同治年间甘回与陕回株连的局面。于是马元章致电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申明他竭诚拥护中国政府的对外立场，他虽同土耳其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但素无来往，以求谅解。袁世凯回电致意马元章是中国宗教界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并颁赠一等“稼禾”勋章以示嘉勉。与此同时，马元章将四子震武送往北京，名为在总统府供职，实则为人质留在北京，以免袁世凯生疑。马元章说：“袁世凯是当今的曹操，两次逼宫，第一次是宣统，第二次是孙中山，此人反复无常，比司马昭还坏，要慎重处理。”

在经济上接受了马明心失败的教训。马元章认识到，若要宗教发达，得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支持，否则是难以长久立足的。因此，马元章在振兴教门的同时，十分注重发展个人的经济力量，以作为团结教民、交官结吏、发展宗教的基础。

马元章有庄园几十处，土地数万亩，四省之地都有产业，牛羊成群，富甲一方。当然这些产业的来源都是取之于教民，当时教民的宗教负担是相当重的，据统计，一个普通教民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六用于负担清真寺、拱北、道堂的宗教费用。

“和为贵”，这是马元章为人处世及复兴教门的一贯主张。在各教派之间马元章主张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各行其是，所以和各教派之间的关系非常和睦。在回汉团结方面，马元章曾作了大量的工作，缓和了因历史上清统治阶级制造的回汉分裂和积怨。马元章主动交结了许多有声望的汉族人士，如刘尔忻、安维峻等。

他常对教民讲："没有回汉的团结，就不可能复兴教门。"要求教民主动摒弃成见，和汉民交朋友，化阻力为助力。他也常为汉族群众解决困难，甘肃一些地区的汉族群众称马元章为"马大善人"，到沙沟看望他的汉族群众络绎不绝。至今西海固地区的有些汉族老人谈起马元章仍赞念不已。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一带回民起义，海原马匡匡杀死该县县长，由固原提督邓增办理善后，邓因在同治年间被起义回民割去耳朵，怀恨在心，趁此不分良莠，乱杀回民，一县之地，杀死3000多人，形将激起大变。马元章挺身而出，向兰州总督上书陈述实情，痛陈利害，以免重蹈乾隆和同治年间的复辙，洋洋洒洒，3万余言。兰州总督转奏清帝，得到嘉奖，同时清帝又以失察罪名，责问平凉府官吏。元章又以"民不举，官不知，民隐难明"为理由，为官府说情辩护，一时得到清廷上下的好评。事后海原全县回汉百姓给元章赠送了"万家生佛，恩惠桑梓"的万民伞，以表谢意。

马元章常以《出师表》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来作借鉴，对待与他患难与共的同人，在教派兴盛的时期，都作了妥善的安置，使他们安家立业，欢度晚年。他常对人说："我不作晋文公、朱元璋、刘邦，功成名就之后薄待功臣。没有无名英雄的牺牲，那来有名英雄的成功？今日教门的兴旺抬头是大家的力量，所以享福人人有份。俗话说，'物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我主张永远不喜新弃旧。"对于中途变节，后来无路可走又重新投奔他的人，如山东耿文德，也能不念旧恶，给予生活出路。因此，跟随马元章办教的人都能甘心效力，这也是马元章复教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元章吸取了以往流血教训，改革了历代哲合忍耶教主强调"舍西德"（为教牺牲）的作法，而极力主张休养生息，和平兴教。这是哲合忍耶教派在清末民初能够从衰亡发展到鼎盛的重要

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

朱　刚

约在250年前（即清乾隆初年），一个新的伊斯兰教派——华寺门宦在青海省循化、化隆地区的撒拉、回回等民族中出现，并受到广大教众的拥护，乃至原来信佛教的许多藏族也改信此教派。其创始人是马来迟。

马来迟，回族，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八坊人，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农历九月初八日出生在一破落的富户家庭。据传马来迟的父亲马家骏原是当时河州城内一富商，年近半百，膝下尚无子女，使他很伤心。后来，其父娶常菊花为妻，生一子。然在一片恭喜声中，突遭天火，四间当铺顷刻间化为灰烬。其父悲喜交集，抱其子叹道："儿呀，你来迟了！"遂命名为马来迟，经名为艾比力·夫图海。

马来迟8岁时，被其父送至呼拉海庄清真寺学经。寺内阿訇即后来被称为太巴巴的人。太巴巴教马来迟阿拉伯文、波斯文，教导他阅读了寺内所藏的一切经典。10年后，马来迟穿衣时（即毕业），他的学识已超过了老师。太巴巴非常赞赏马来迟在求学方面表现出来的超人天资和勤奋，更喜爱他作人的高尚品德，故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许配给了他。

据手抄本《华寺拱北史录》记载，马来迟穿衣后，先后在青海省民和县的马营，河州的东乡、三甲集等地清真寺开过学。

清朝初年的青海，水陆交通极不便利，致使广大穆斯林难以

改革措施。

相传哲合忍耶教派的创始人马明心在也门求学时，就向也门教主求得“辈辈举红旗（流血），走‘舍西德’的道路”的教导。“舍西德”也就成为哲合忍耶教派的宗旨而不同于其它教派。哲合忍耶教徒认为：真主用最大的“白俩”（灾难）来考验穆民的心，为了信仰，不怕灾难、不怕流血，觉得灾难越大越自豪。决不忍受“卡非尔”的迫害，跟随教主为教献身无尚荣光。教民们认为“舍西德”是手提血衣进天堂的捷径。哲合忍耶教派的教权高度集中于教主一人，教主的“口唤”是至高无尚的命令，教民必须坚决服从。教主必须走“舍西德”的道路，或被异教徒所杀，或死于突然事件（如地震）。若正常病故，又被掘墓焚尸也算“舍西德”，如穆宪章、马以德等。教主若没有“舍西德”的条件是不够“穆勒什德”（教导者、引领者）的资格的。因此，哲合忍耶教徒在思想上构成了“舍西德”是进天堂必由之路的信念。发誓“杀头风吹帽，舍命不舍教。前辈都是血脖子，我愿染个红胡子。”遂因此，在清乾隆四十六年及同治年间，哲合忍耶教派的教民有90％惨遭杀害和充军，多数流落到甘、宁、青、新的穷山僻壤，过着穴居野食、半饥半饱的牛马生活。

同治末年，这个教派表面上是被消灭了，而地下活动相当活跃，如聚薪待火之势。就在这时，马元章来到西北，组织领导哲合忍耶教派的复兴运动。他首先营救马化龙的后代，为马化龙建立拱北，赢得了人心。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教民热衷于“舍西德”的心理，引导教民用“舍西德”的精神来进行和平复兴教派活动。不要为“舍西德”而“舍西德”。马元章常对渴望追求“舍西德”而早进天堂的教民讲：“伊斯兰教是为活人创立的，不是为死人立的。我们都‘舍西德’了，《古兰经》叫谁念？绿旗（伊斯兰教的旗帜）叫谁举？‘舍西德’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最后迫不得已的，自找的死，就不是‘舍西德’。教门未成身先死是最大的

遗憾！”他还用中国历史上的故事作比喻说：“越王勾践有会稽之耻，卧薪尝胆，苟且性命，以图再起。我们有成千上万的教民，难道不如一个兵败国亡的勾践？只想‘舍西德’而不去图生存、兴教门、救万民，如你在天堂看见你的家园被毁、妻儿被人抢劫，你在天堂能坐得住吗？”马元章将教民动辄动刀兵的“舍西德”的狂热思想引导到复兴教派的实际行动方面。

在马元章领导哲合忍耶教派的40余年中，运用和平复教的方针，提倡休养生息，罢兵戈，注意培养教育人才，开办清真寺阿文学校，设汉文私塾。此后这个教派出了许多学者名人，这都对教派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宗教仪式上，马元章理教时与前代不同的是，强调“古尔邦节”（宰牲节）要隆重举行，不象前代教主强调朝“道堂”等于朝麦加。他说：我们没有财力朝“克尔白”，可以在中国隆重庆祝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节日，至于“道堂”绝不能当“圣地”朝拜。他本人理教40余年，严格按照经典办事，从不标新立异。他说：“个人传授容易传错，如脱离伊斯兰教正轨，形成尊人不遵经就不得了。”为此取得了其他一些教派学者的赞同。

由于马元章采取了上述策略，使得被清政府两次镇压禁绝的哲赫忍耶教派又重新发展兴盛起来。各地教民在被战争夷平的残垣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清真寺，修复了兰州、吉林、平凉、伊犁、金积、云南等地的拱北。

民国9年（1920年）十一月初七晚，在甘肃大地震中，马元章逝世于西吉滩道堂，终年67岁。初葬沙沟，后迁葬张家川宣化岗，两处均建有拱北。

马元章逝世百日，由马元超在张家川举行宗教纪念大会。上至大总统，下至回汉黎民百姓，由全国各地发来唁电、唁函、挽诗、挽帐等几千件，可见当时之盛况。马元超后印有《光烈荣哀录》一册，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作为纪念。

做到“五功”之一的朝觐。但是，马来迟却认为，朝觐除表示对五功的遵行外，朝觐者还可以从伊斯兰教发源地直接学到外地无法学到的知识。这种思想使他萌发和坚定了去麦加朝觐的信念。并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进行出国朝觐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大概康熙五十年(1711年)，马来迟年近40岁的时候，麦加之行，终于成为现实。他辞学启程，步行出嘉峪关，翻天山，穿中亚，历经酷暑严寒，吃尽千辛万苦，到达麦加。

在麦加，马来迟做完了朝觐的一切功课后拜当地伊斯兰学者艾海默德·尔格来为师，开始踏上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以及进行宗教活动的新起点。通过入道堂，到阿拉伯、也门等地游学，马来迟领受了虎夫耶和尕德忍耶两种教派。他在学习中所表现的惊人毅力和在学业上取得的特异成果，博得了许多道堂及导师的一致好评。作为“中国哈吉”的马来迟在异国所获得的荣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临回国前，马来迟的导师艾海默德·尔格来送他传教的“伊扎则提”（资格和权力）。在虎夫耶道堂求学的人成百上千，各国的穆斯林都有，但获得传教权力与资格者为数不多；（二）各道堂导师共赠一印，文为“将一切人引导在主的独一上的是中国的艾比力·夫图海”。

马来迟所学的虎夫耶和尕德忍耶是两种学说不同、教义有别的教派。回国后，他结合中国西北的实际，取各派教门之所长，创立并传扬了一种属于虎夫耶、但又不完全雷同于阿拉伯的虎夫耶的华寺教派。这个教派与当时其它教派之不同处为：（一）除《古兰经》外还以《冥沙器》、《卯路提》为主要经典，从事宣讲教义、赞主赞圣、祭祀祈祷等活动；（二）马来迟从《古兰经》等经中选其精华，编成一经，名曰《奥拉提》，教众于每日晨礼后圈坐一堂，齐声颂念；（三）在斋月开斋的时间上，一反常例，改礼拜后开斋为礼拜前开斋，得到了广大教众的拥护。

马来迟回国后，大约有10年时间花在广州、云南、河南、陕西等地的开学、传教上。彼时彼地，马来迟并没有着手传授自己的教门，只是在他回到河州、西宁后，认为他所创教门的教义、礼乘日臻完善后才开始公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大胆向其它教派挑战。这时约在乾隆初年。春去冬来，年随景迁，马来迟已经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了。

马来迟谦虚勤奋，待人真挚热情，不分贫富远近，但有来访者，必以宾客相待，亲奉茶饭；问及教门诸事，必须引经据典，从不信口开河。在教派问题上，他认为：各行其是，各干所得。对其它教派他不批不辩，不比高低；对其教众亦是一视同仁，往来如亲。他遗训子孙后代：虔诚敬主敬圣，重德洁本，凭经立教；勿生异端，勿立山头；勿聚厚资，勿营华屋良田……

阿訇的言行，为穆斯林师表。马来迟处处身体力行，开始了“劝化人心”的活动。他在河州站住脚后，迅速转向循化、化隆地区传教。这里是撒拉、回回、藏等民族的聚居区，马来迟及其长子马国宝通过开学讲经等方式，向广大教民及各族首领宣讲自己的教义。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撒拉十二工世传总掌教韩哈济“师而事之”。化隆卡力岗工原来居住着笃信佛教的藏族，马来迟到后，大胆劝化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经过努力，竟然获得了成功，卡力岗、德恒隆、群科尔等地的藏族群众先后集体随教，变为今天讲藏话，着回服，信伊教的穆斯林。到乾隆二十六年左右，马来迟所传的教门已经在循化、化隆占了绝对优势，并且迅速向大通、湟中、西宁、民和、门源等地广为传播，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华寺门宦的信徒和寺院。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九月九日，马来迟去世，享年86岁。嘉庆八年（1803年），华寺门宦的教民为了纪念他，在河州（今临夏市）西郊为其修建拱北。华寺门宦教主共传了八辈，他们是：

第一辈　　马来迟
第二辈　　马国宝
第三辈　　马光宗
第四辈　　（不详）
第五辈　　马永瑞　马永琳
第六辈　　马如彪
第七辈　　马显福　马显维
第八辈　　马玉良

马国宝是马来迟的儿子。据说马来迟有四个亲生儿子、四个义子，称为“八房头”，各踞河州八坊。八坊一名即源于此。

关于“华寺”之名来源，众说不一。但以“花”字起名，又以“花”字转为“华”字，此点则是共同的。

尕德忍耶九彩坪门宦

周　彦　奎

伊斯兰教的尕德忍耶教派（意为大能者），相传渊源于波斯人阿布杜·尕的尔·吉拉尼创立的苏非派卡迪里教团。该教团在1391年前的阿拉伯和中亚地区传教，约在清朝康熙初年（17世纪末），由穆罕默德29世圣华哲·阿布都·董拉希把尕德忍耶教义传至中国，并受中国文化思想影响而形成独特的一派。

尕德忍耶教派分为三大支派（门宦）：

祁门门宦，由华哲·阿布都·董拉希得意弟子祁静—（1656—1719）创立的，故称之为“祁门”。至本世纪50年代，该门宦已传10辈。

九彩坪门宦，是由华哲·阿布都·董拉希的门徒云南马（或称马上人）创立的。后因其传教中心在宁夏海原县九彩坪，故称九彩坪门宦。该派已传10辈，其前7辈称道祖，后3辈称老人家。

齐门门宦，又称七门，其源于第4辈教主马德明，因经名七十子，故教民取其经名的七字。该派创于清末，由宁夏同心县窑山马胡子阿訇到麦加朝觐后，在同心、固原、七营一带传教创立的。今已传5辈，教主是马胡子阿訇、余德省、余海珍、马德明、海正发，教民称其为老人家。

尕德忍耶教派是个较庞杂的体系。这里仅简述九彩坪门宦的情况。

一、九彩坪门宦的道统传授

该门宦的头辈道祖是华哲·阿布都·董拉希，殁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葬于四川省保宇府盘龙山。二辈道祖是云南马，道号为奴绒明的尼·索非弄拉希，殁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农历六月六日，葬于云南省碧江县白头崖，著有《卖尔树格》。三辈道祖是巩昌的周良俊，道号为拜哈印的尼·乃格石般丁耶，殁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葬于巩昌北山（今甘肃陇西县），著有《代来为士》。四辈道祖是西安广太门的马吉安，又称马依麻目，道号为神宗真人·舍目孙的尼·赛亥本奴本外提，殁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农历一月二十五日，葬于青海省化隆县堡子滩龙泉拱北。五辈道祖是西安广太门的马阿訇，道号为拜哈印的尼·奴吾畏里俩耶提，系四辈道祖之侄，因尕德忍耶是传贤不传子，马阿訇便改姓冯，殁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农历九月九日，葬于宁夏海原县九彩坪，著有《游长安》、《调养五行》、《黑白案》等。六辈道祖是陕西彬县白吉塬的安裕和，道号为格买弄的尼·索哈本则玛尼，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殁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兰州小西湖，著有《认己宝鉴》。七辈道祖是青海省后子河的杨保元，原名杨士元，字复初，道号为塔仲奴尼穆哈印的尼，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殁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农历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宁夏海原县九彩坪拱北，著有《钢鉴》，教民称为封印道祖，此后再无称道祖，改称老人家。

安宏秀老人家，平凉人，生于同治二年（1862年）农历四月一日，殁于1920年农历十一月七日海原大地震。杨枝云老人家，固原县铁家沟人，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农历二月二日，殁于1959年农历一月二十五日。李德贵老人家，海原县关桥乡贺家堡

人，生于1940年农历二月二日。

九彩坪门宦主要分布于宁夏固原地区，青海的西宁市、化隆县，甘肃的兰州市七里河区等。

二、九彩坪门宦的特点

九彩坪门宦除力行念、礼、斋、课、朝五项天命功修外，还必须静修、参悟，否则不能达到认主、近主的目的。静修功课是坐静默念“则克热”，要做静修参悟功课，必须儿童出家，脱离世俗，终身不聘妻，将来才有资格执掌教权。其传教是传贤不传子，反对世袭。教主预选一少年，名为儿童出家，在教主身边劳动、念经、学教，待教主归真即为继承人。

教主无私财，除自身衣物外皆公物，亲属不可沾染。教民视拱北为圣地，每逢祭日，均到各道祖和老人家的拱北敬香叩拜，过“尔麦里”做善事，或敬献财物。

虎夫耶洪门门宦

马　峰　玉

洪门门宦的道堂设在宁夏同心县下流水乡洪岗子村，属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分支。虎夫耶一词系阿拉伯语，即“悄悄地”、“暗暗地”或“低念”的意思。

洪门的始传人为洪寿林，字海如，教众主要分布于同心县、海源县、固原县及甘肃省靖远县、兰州市等，是地区分布广、教众多的虎夫耶门宦的一个支派。现将其道统、道乘和教乘修持分

述如下：

一、道 统 史 略

洪门的道统溯源，相传来自伯哈稳迪尼·乃格什板丁耶派，由他的一个称为阿印科的修道士在清朝初年先入新疆设堂布道，后入甘青回族地区传教。据悉，阿印科是印度斯坦人（今巴基斯坦）。有一传说，乃格什板顶耶总道堂的穆勒什德（导师）给口唤（命令）阿印科到中国来传教，嘱咐他要走到一个白天在泉水中能看到月亮的地方设堂传教。他进入中国地区后，昼夜不停，风餐露宿，翻山越岭，穿越戈壁，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地寻找。一天，他走得精疲力尽，又饥又渴，恰遇一清泉，便急忙贪婪地喝着泉水，这时他看到泉底部映出一轮明月。此泉所在地是新疆的阿克赛。于是他停止前进，设道传教。从此，“白天映着月亮”的这个泉及地方，维吾尔语称之为阿印科，意为月儿泉；他的道堂称为阿印科道堂，他本人被尊为阿印科道祖，其原名便无人知晓了。

阿印科在新疆传教中，据传共放了5 位海里凡，其中有1 位是甘肃安西县大湾村回族安西大湾太爷，其道号是苏利塔尼·阿力目·努勒·索芬义。安西大湾太爷又放了5 位海里凡，其中两位又放了海里凡，即青海湟中县的康城道组，道号为阿布冬拉西利哈的·克必勒力阿咪伏；青海大通县上五庄的黑龙江太爷（因充军到黑龙江故以此称之），道号是希拉智·艾哈默德·阿立·穆撒·巴给。黑龙江太爷放了3位海里凡，第1位是肃州（酒泉）韩太爷，道号沙海·哲玛力·穆罕默德·苏来玛乃，他同时又受康城道祖传教信物和口唤，所以韩太爷便成了两道渠水打一盘磨的海里凡。韩太爷共放了9 位海里凡，其中一位是青海门源县代通老太爷，道号穆勒色力·阿布的·义布尼白哈勒。代通老太爷又放了3 位海里凡，其中1 位是甘肃景泰县碱沟井老太爷，道号

是化哲·智尼·西尼。碱沟井老太爷放了一位海里凡，即青海大通县凉州庄太爷，道号由门则玛尼·阿林·兵俩西。凉州庄太爷放了4位海里凡，其中最后一位是同心下流水乡洪岗子的洪太爷，道号苏哇哩本则玛尼·默尔的努力罕给·穆祖西龙的尼·苏哇龙拉西。

以上是洪门道统史略。

二、教乘和道乘

洪门是一个“舍若阿提”（教乘）、“妥若格提”（道乘）并重的门宦，既重视伊斯兰教的教乘方面的功课，也重视伊斯兰教的道乘方面的修持，它认为“道”和“教”的关系，如同核与壳的关系，“教”是“道”的基础，“道”是“教”的高级阶段。

虎夫耶的信仰和教乘修持与老格的目类似，诚信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教，笃信《古兰经》和《圣训》等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它的信仰也是信守安拉、天使、经典、先知、前定、后世，遵循哈乃非的教律教法，重视念、礼、斋、课、朝五大天命以及其它“当然”、“圣行”的宗教功课和礼俗。故现在一般把虎夫耶与格的目统称为老派，他们的关系历来融洽，可以共同在一个“折玛梯”（清真寺）里进行宗教活动。教乘不同的只是个别细节问题。

洪门的道乘遵循虎夫耶“闹中静”的办法进行修持，既要修道，又不逃避现实生活，在“现实的繁华”中进行修道。修道功课主要的就是默念“孜克尔”（赞主词），而且经常念诵的“孜克尔”有两种，一种叫“依斯目咱提”，意为本然的大名，就是念“安拉乎”一词，也称“记主词”；一种叫“乃非·伊思巴提”，意为否定与肯定，就是念清真言的前两句，一句“俩以俩海”即万物非主为否定词，二句“引兰拉乎”即唯有真主为肯定词。

虎夫耶的道乘修行人员一般分为三级，最高一级的阿拉伯语称为“穆勒什德”，即传教授道的导师，汉语称之为老人家，过

世后被遵称为“老太爷”。其创始人被称为“道祖太爷”。次一级的是“海里凡”，即替位人，是穆勒什德的高足弟子，通常称之为“老人家”。成为“海里凡”，必须经过穆勒什德的特殊传授和调养，品学兼优，念诵“孜克尔”的功夫一定要精深，并要经连三九的“坐静”（即要在门窗紧闭的黑屋中连续静坐默念“孜克尔”27天）。此期间，每天只能吃少许食品，每餐一两粮、三枚枣、一杯水。他渡过这27天苦修难关后，经教徒公认，穆勒什德才向他传教“依扎孜”，即放他的“海里凡”，取道号，并给他传教印章，或把自己的宗教用具给他一二件以作凭证。穆勒什德在世时，可以传几个“海里凡”，由他们分别在各地传教授道。穆勒什德亡殁后，这些“海里凡”即可升任该地区的穆勒什德，并再向下传“海里凡”。穆勒什德和“海里凡”病殁后，教众为其修建“拱北”，视为宗教贵地，供教众拜谒，念“索儿”，上苫单（即用一块六七尺长的白布或毡子、被面复盖在坟上，为一种施舍）。每到忌日，教众以坊为单位或个人拿上“乜贴”（施舍）到拱北，宰牛羊，念经和干“尔麦里”，进行悼念活动。

三、从凉州庄传到洪岗子

虎夫耶一般恪守传贤不传子的教规，因此在甘宁青地区就形成了虽属一个道统，但又存在着没有相互直接联系的20多个支派，各派均独立行使教权。这里，主要介绍虎夫耶从凉州庄传入洪岗子的过程。

凉州庄老太爷，名叫马栋，圣名尤努斯，青海大通县凉州庄人，故称凉州庄老太爷。生于1822年，殁于1898年。他是按甘肃景泰县碱沟井太爷口唤，在甘宁青地区传授虎夫耶。

凉州庄老太爷一生严守虎夫耶教规，生活俭朴，反对聚财。他转坊传教从不骑马乘驼，总是肩背行囊、汤瓶徒步行走。他于1898年春从同心、海原一带转坊回家，一天晨礼后对老伴说：“我

已年逾古稀，归真的口唤将要到了，虎夫耶教门的这杆旗由西面转向东面了。”又说：“你记住，如果我一旦归真后，百日时有一个从宁夏地区来的姓洪的上坟人，你就告诉他是我的口唤叫他坐7天静，坐静出来后，如向你要东西，你就将静房侧边门的钥匙交给他，让他自己进去拿所需要的东西。”是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凉州庄老太爷病殁。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凉州庄老太爷百日时前来上坟的教众不少，唯独没有洪老太爷。凉州庄老太太便派专人到同心叫洪老太爷，当面转告凉州庄老太爷临终前的口唤。洪老太爷遵口唤入静房坐静7天，向凉州庄老太太索要边房门钥匙进去后，拿到代通老太爷金印一枚，凉州庄老太爷金印一枚，拜毡一条，代斯太尔（头巾）一条。洪老太爷带着这些信物在同心县洪岗子设立道堂，在同心、海原地区传授虎夫耶教门。

四、洪寿林创建洪门门宦

洪老太爷，名寿林，字海如，圣名舍力夫，生于1858年，殁于1937年，享年84岁，祖籍甘肃景泰。

他6岁时，正值西北各族人民反清，兵荒马乱，连年天灾，全家11口只剩下爷爷、父亲、妹妹和他。他们一家4口在家乡无法生活，只好沿途乞讨，逃奔他乡，终于在同心县西八庄暂时落脚。时值初冬，全家已两天没进颗粒，妹妹又患病，爷爷对他父亲说：“我守着古苏，你领舍力夫到前庄上讨点吃的。”父亲领着他去讨饭，当返回原地时，爷爷和妹妹已不见了，只留下一堆残骨和碎布，显然被野兽吃了。父亲遭此打击，精神一蹶不振，白天到富户人家扛活，晚上到爷爷和妹妹的坟上嚎哭，没熬上3年，忧郁成疾，离开了人世。老太爷成了孤儿，被庄上人收留，住在寺上，帮师傅打柴、烧水。他起早睡晚，勤勤恳恳，劳累之

余与满拉一起听讲诵经。3年中，他将30本《古兰经》背诵如流。阿訇学董惊异地说："这个娃娃用功心灵，日后必成大器。"从此不让他做杂务，让他专一念经，开始正式走上宗教事业的道路。

他先后在化平（泾源）、河州等处访师求学，不仅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还学习了古汉语，但他始终保持着谦和求学的态度。他遵循凉州庄老太爷的教诲，努力求学办功课。如前所述，正值洪老太爷40岁，遵凉州庄老太爷的口唤，接印传教。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洪老太爷集资筹建兰州市徐家湾拱北，并从青海孟塬迁请代通太爷骨骸安葬于拱北正亭；从甘肃景泰县迁请碱沟井太爷父子二人骨骸安葬于拱北北面；从青海大通迁请凉州庄老太爷骨骸安葬于拱北东面。

1937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洪老太爷归真后，"哈湾德"（教众）在洪岗子修建拱北，将洪老太爷安葬于正亭，并从景泰迁请第三辈洪老太爷（海如堂祖爷）骨骸安葬于正亭北面。

临夏市八坊清真寺

马　占　奎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个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多种民族杂居的地方。其中，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通称穆斯林，人口70余万，占全州总人口的50％以上。在临夏，穆斯林居住的村庄或街道，习惯上称为"坊"，阿拉伯语叫"者麻提"。由于信教群众进行礼拜、诵经、送葬亡人等宗教生活的需要，每个"者麻提"建有一座清真

寺。清真寺规模的大小因坊民的多少和群众经济富裕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的宏伟庄严，有的因陋就简，在建筑风格上也各具特色。

陇原古城临夏市是临夏回族自治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市区南关的八坊是临夏回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这里商业繁华，清真寺林立，享有“中国麦加”之称。

一、八坊清真寺的创建发展概况

清真寺在回族群众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历史上凡有回族群众集中居住的地方都建有清真寺，这在全国各地基本上是相同的。临夏八坊清真寺的历史大体上与回族群众在这里的定居时间相一致。临夏古称河州，唐代“丝绸之路”南道通过这里，并经青海省乐都通往敦煌。唐宋时期，不少大食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中国经商，有些贡使、商贾“往往散行陕西诸路，久留不归”，其中有一部分留居河州。元朝时，大批西域签军、工匠、回回色目人随蒙古军屯戍河州，这是以后形成临夏回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据传，临夏市最早出现的清真寺为元末所建的南关大寺。当初，该坊穆斯林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将寺棚搭在两棵还在生长的古树上，做为简易礼拜殿，故称其为“连根柱寺”。明清两代，八坊回民兴建的清真寺逐渐增多，相继兴建的有城角寺（又名西关寺）、王寺、华寺、祁寺、下二社寺，与南关大寺统称为六大寺。这时的清真寺已经在建筑规模上有了较大发展。一般都有正规的礼拜大殿，高耸的唤醒阁。南关大寺也于明洪武年间得到了扩建。其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又由城角寺（西关寺）分出大西关寺，下二社寺分出上二社寺，祁寺分出北寺和西寺，加上新修的铁家寺、水泉寺，连原有的六大寺，因都在八坊区域内，统称为八坊十二寺。

清同治初年，陕西回族因武装起义失败，被赶出八百里秦川。

因而，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活动的中心从长安（今西安）转移到临夏。从此，临夏八坊的南关大寺、王寺、城角寺、华寺、祁寺成为经堂教育的重点场所，这里培养的宗教学者遍布河湟地区及西北其它地区，“小麦加”或“中国的麦加”的声誉由此逐渐传播开来。

1928年春，回族青年马仲英发动武装事变，围攻河州城，反抗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国民军驻河州镇守使赵希聘为了进行报复，下令火烧八坊回民居住区，该区民宅和清真寺建筑在一片火海中化为灰烬。1930年后，随着战乱的结束，八坊回族群众重建家园，并开始重建清真寺。时青海省主席马麟及侄子马步青、马步芳为笼络人心，先后出资帮助修建了南关大寺、华寺、城角寺，其它各寺也相继得到修复。在以后的近20年中，八坊各清真寺教事繁忙，经堂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寺培养的宗教学者不断增多。1933年至1949年，从八坊各寺去麦加朝觐的哈吉达67人。1935年，著名记者范长江来临夏采访，在《大夏河回藏两要地》的报道中写道：“河州是中国西北的回教圣地。中国西北回教中主要的宗教、军事和政治人物，以出于河州者为多。”至解放前夕，该地的清真寺达到16座。

二、主要清真寺简介

南关大寺

南关大寺始建于元朝末年（具体年代不详），扩建于明洪武年间。元明时为群众礼拜场所，清中叶经堂教育兴起后，开始培养宗教学者。1894年伊合瓦尼派（新教）产生前，该寺一直由老格的目派（老教）信教群众主持。1916年后，西宁镇守使马麒利用新教创始人马万福（果园哈吉）发展新教，将王寺“海乙”制设于南关大寺，以此为中心传播新教。从此，南关大寺地位显赫，不仅统领八坊各寺教权，而且还给四乡各寺放了不少新教阿訇。三四十年代，马步芳继续支持该寺，进一步扩大了该寺教权。在

经济上，该寺的财产也不断增多，至解放前夕，该寺拥有土地40余石，铺面房屋140余间。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了南关大寺的“海乙”制特权，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保护。1958年反封建斗争中，南关大寺遭到封闭，财产被没收。1962年，当地政府批准南关大寺及王寺、华寺、水泉寺四个清真寺为八坊信教群众宗教活动点。“文革”中，逼迫南关大寺于1967年拆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南关大寺得以重建。这次修建中，人民政府拨款6万元，群众集资60万元。1979年动工，1983年建成。

新建的南关大寺，坐落在临夏市中心南门广场西南角。拱门院内，礼拜大殿坐西面东，奠基地下室之上，殿堂隆起，高脊飞檐，是一座钢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大殿雕梁画栋，安装玻璃门窗，采光充足，空气清新；大殿前檐高耸着三个钢筋水泥结构的阿拉伯式绿色圆顶塔楼，中间一楼高达32米，是唤醒阁，又是望月楼，登临其上，临夏市区尽收眼底。塔楼顶端的宝瓶和新月，配以电器设备，夜晚与繁星媲美。唤醒阁的拱门饰以古体《古兰经》文浮雕，与大殿前壁的河州砖雕图案相配，显得古典文雅，肃穆庄严。

新建的南关大寺占地2160平方米，气势雄宏壮观，集中国古典建筑艺术与阿拉伯建筑风格于一体，在寺院松柏、花草的衬托下，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平时，寺坊的群众来寺礼拜，每到礼拜五（主麻日）或开斋节、古尔邦节，临近各乡的穆斯林按照传统习惯涌来南关大寺，参加聚礼。1984年5月4日，世界伊斯兰联盟代表团成员在该寺参加主麻日聚礼，教众达万人左右，盛况空前。

王寺

清真王寺位于八坊中部的王寺街。该寺始建于明朝初年，一直由老格的目派信教群众主持。初建时殿堂比较简陋，后由王穆夫捐资扩建，故称王寺。“1871年（同治十年）穆氏后代名塞利目来到临夏，得到马占鳌的赞助，始于王寺创立了‘海乙’制，

选聘品学兼优的阿訇到该寺开学，并总管八坊十二寺。 1916年后，该寺的“海乙”制被马麒设于南关大寺。王寺于1928年同样毁于八坊大火。1931年至1933年得到重建，建成礼拜大殿、唤醒阁、学房。可惜在“文革”中又被拆除。

现在的王寺是从1983年开始修建的，经过4 年多时间，分步修竣了大殿、讲经堂、唤醒阁，于1987年10月完工。新建的王寺全部采用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东边迎门而建的唤醒阁为亭式五级塔楼，飞檐翅角，挺立高耸，西边的礼拜大殿与唤醒阁相对称，其风格为前卷后殿式，宛若一座庄严的宫殿，肃穆静谧，可同时容纳1500人礼拜。南北讲经堂（包括居室）为庭院式平房建筑，布局合理，极其协调。大殿内有水泥仿砖雕艺术雕刻，左为《原教篇》，右为《赞圣篇》，均选自清代中国回族学者刘介廉先生所著《天方典礼》。

城角寺

城角寺修建年代比南关大寺稍迟，因建于河州城的西南角而得名。1928年被毁后，于1933年重建。三四十年代，马步芳推行新教时，由于喇世俊（回族，清举人，曾任甘肃省政府委员）任该寺学董，马步芳未敢放进新教阿訇。该寺在“文革”中同样惨遭拆除，1980年至1982年得到重建。现有宫殿式礼拜大殿，五层钢筋水泥结构唤醒阁（高25米），另建有学房、洗澡间、厨房等。该寺拥有老格的目大拱北、临洮、毕家场、华寺等五个教派门宦的信教群众，各教派之间互相尊重，团结良好。城角寺因位于北大街旁，故沿街修铺面42间，月收入三四百元，为“以寺养寺”提供了条件，减轻了群众负担。

华寺

华寺位于八坊西北角，创建于明洪武年间。初建时，规模简单，到清康熙初年，有一马连生者，富有资财，乐善好施，待人诚朴，人称“仁义王”。那时，居民日渐增多，旧寺不敷众用。马连生遂捐出自己的花园为寺址，修筑了一座规模宏伟，建筑精

巧的清真寺，寺门外水渠上建拱桥一座，叫水过凉亭，牌坊走廊甚是壮观．始叫花寺，后称华寺。临夏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因家住华寺附近，故称华寺老太爷，华寺门宦也由此而得名。该寺先毁于1928年，1942年重建，1967年又毁于“文革”，1979年以原样复建。因西大路建设，该寺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部分。

另有祁寺、北寺、西寺、水泉寺、上下二社寺、大西关寺均为清时所创建。现在的建筑风格也各具特色。

韩家寺、白家庄寺，系民初所建。小南寺建于民国28年，加上其后及50年代新建的新王寺（区别于老王寺，由赛来奉耶教派群众修建）、新华寺（区别于老华寺）、铁家寺、前河沿寺等，现在的八坊共有27座清真寺，各坊的信教群众充分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八坊各清真寺由于地处商业繁华的街道两旁，因此大多数寺院临街修建铺面房屋，出租给商人，收取房租，用于寺内开支和阿訇、教长的生活。同时，南关大寺、老王寺、老华寺、城角寺、大西关寺、水泉寺等近年来恢复了经堂教育，根据党的宗教政策，招收18岁以上的学经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或百人。学经的满拉大多为本地人，也有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区慕名而来者。

西安清真大寺

马　良　骥

西安清真大寺，地处鼓楼西北隅化觉巷内，故称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历史上，该寺院也曾有过“相寺”、“清修寺”、“礼

拜寺”、“化觉寺”、“东大寺”等叫法。清真大寺历史悠久，建筑规模宏伟、格式奇特，可与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凤凰寺齐名。唯其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式建筑风格结合伊斯兰教建筑特点而形成的伊斯兰教寺院，因此建筑风格又别于其它寺院。

清真大寺不仅是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陕西省重点对外开放单位和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寺院即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元月，国务院又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我（马良骥）16岁开始就在这座寺院就学当满拉，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文。1960年后，开始任寺院阿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受到冲击被迫离开寺院。十年动乱结束后，仍回到寺院负责主持寺院修复工程和宗教活动。我大半辈子多半是在这座寺院度过的，所以和这座寺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同时，我对寺院的了解也较多。在此，我想从寺院的历史沿革和建筑艺术特点、组织形式、活动、寺院的保护、修缮和开放时期的寺院等四个方面将寺院作一概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寺院的历史沿革和建筑艺术特点

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是伊斯兰教在我国建寺年代较早的寺院之一。据寺内所藏牌文记载肇始于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扩建，始成今日之规模。

关于寺院创建的确切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目前主要有唐代说、宋代说、明代说三种说法，其依据均出自寺院现存的碑石。这里，我把三种说法扼要作一提示：

（一）唐代说。这一说法主要是根据寺内现存唐朝天宝元年所刻“创建清真寺碑”，碑中有这样的文字：“……遂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创建其寺，以处其众。”在寺院几通明代的

修寺碑中也有类似的文字记载。

（二）宋代说。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现存的明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碑”（此碑在大学习巷清真寺）中记载：“……至赵宋时建清修寺于陕西鼓楼西北偶，会城人奉其教育者萃于中，翻译诵拜。”

（三）明代说。持这种说法的人，一是根据寺内明永乐三年所立“敕谕碑”，该碑文记载有在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盖造礼拜寺一座的文字；一是根据寺院内现存建筑多系明清所建立论。寺院建筑确多是明清建筑，但寺院内今保护的一座建筑“敕修殿”，其举架开间，分明是早于明代之物。

上述三种立论，诚为专家学者所谈论之话题，非本文所要介绍的主旨，不过是想趁此机会摆出各家不同之见解，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有识之士的研究兴趣。通过深入研究、考证，最终得到一个趋于一致的定论，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弥补寺院原始资料和文字记录的不足。

化觉巷清真大寺总体平面呈狭长型，东西走向，长宽比例为5：1，北边围墙几乎是化觉巷整条巷子的长度。寺院占地总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全寺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占寺院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殿宇厅厢共计120余间（不含亭子、牌楼等建筑），绝大部分系木质结构，其它为砖石结构。

鸟瞰寺院全景，整体布局由五部分组成，一个部分即一个院落。五进院落或筑楼或置墙相隔，前后贯通。分散的单项建筑楼、亭、台、殿错落在其中，疏密得宜，遥相呼应。寺院不设正门，南北两旁设门，叫“礼门仪路”，是中国宫殿建筑的一个特点。正门的位置上是一座砖雕华饰大照壁，高大雄伟。寺院文物保护标志碑竖立其下。

从南北门进入便是第一进院落。院中心轴线上，一座三开间木质大牌楼耸立，牌楼高9米，琉璃歇山顶，翼角飞檐，极为壮

观，是现今西安仅有的一座保存完整而古老的木牌楼，建于明代中叶（清代乾隆年间曾翻修过），距今已360余年。牌楼南北对称建有仿古大厅各一座，单檐卷棚，棂窗雕门，配有平房。此为近年修缮中增建。在第一、二进院落之间是一栋面宽五间、进深两间的建筑，名曰五间楼。“清真寺”彩绘木匾悬挂明檐。

出五间楼至敕修殿，便是寺院第二进院落。距五间楼不远处有石碑坊一座，三间四柱式，浑朴而透灵秀。石牌坊中楣镌刻“天监在兹”，两侧楣刻“钦翼昭事”和“虔诚省礼”。石牌坊稍左右两侧，各竖冲天雕龙碑一通，北边石碑是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立，碑额篆书“重修清修寺碑记”，碑阴刻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道法参天地”五个骨力遒劲的大字。南边石碑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立，碑额篆书：“敕修清真寺碑”。在石碑北边围墙上有一大门，门楼是硬山式卷棚屋面，门楣刻工繁缛，此门为清代增建。大门对面是近年增建的碑亭一座，飞檐攒顶，小巧玲珑。院内南北各添建有面阔七间厢房：一为陈列厅；一为文物复制部，有各类旅游工艺品供旅游者选购。

第三进院落的入口处是古朴的敕修殿。殿两侧辟有垂花角门。这座殿四角飞檐，朱门金钉，明代书法家董其昌题字：“敕赐礼拜寺”，古老匾额悬于前檐。殿前檐两梢间筑砖墙半人高，上边再镶木板墙，板墙上用木条钉成拱北造型轮廓，形似窗口，这种装饰法揉合了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形式，极富情趣。敕修殿在明嘉靖年间重修时，是寺院正门（在现北偏南），到了明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时，将此殿迁建在寺院中轴线上（即现址）。这座殿是该座寺院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殿，经宋、元、明、清历代重修。虽经多次变动，但是它的举架开间，仍保留着宋建筑风格。殿内存有明景泰六年刻“长安礼拜寺无相碑”、阿拉伯文“月碑”和其它碑刻。“月碑”是清初寺院一掌教小西宁编著。此碑内容是讲伊斯兰教斋月历法的。西安市穆斯林在封斋、开斋的时候，如遇阴

晦雨雪，看不到新月，就以此碑推算封、开斋时间。此碑是中国阿訇根据经典规定并结合本地地理、气候特点而写成，至今仍然沿用。它是中阿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历法方面结合的成果，为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所重视。有关“小西宁”其人其事知之者甚少，甚至连姓名、生卒情况未留下。只知道他是青海西宁人。传闻小西宁年轻时来到这座寺院，因为人忠厚老实，被一些人视为笨，不太瞧得起。但他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品德修养高，终于学成，受到人们的敬重。

越过敕修殿，迎面就可看见“省心楼”。此楼建造在一座八角形的台基上，三檐两层八角形。上下层均有外檐廊，上层廊檐挂着一大匾，上写“省心楼”，故此得名。“省心楼”亦叫“邦克楼”，是召唤人们礼拜的建筑物。因楼较低，因此召唤人（穆安津）不用登上楼呼唤。但楼仍然具有无声呼喊的作用。楼底层内柱之间砌砖墙一周，四面各砌有圆拱门洞，在东西两向有踏道。底层地坪中心，嵌唐代石雕盘龙一方，有木栅栏护之。从某些部件看，此楼有元代建筑遗貌。省心楼南边有厢房15间，东端为礼拜前洗“阿布代司”（小净）、“乌苏底”（大净）的沐浴室，俗称“水房”。西边连着与北边“讲经堂”对称的建筑——外宾接待厅，厅里摆设全是古代家俱陈设，中间是耀眼的鱼骨镶嵌“英雄独立床”，整个厅内富丽堂皇。省心楼北边也有厢房15间，主要建筑是“讲经堂”。讲经堂也叫北宫殿，对面外宾接待厅也叫南宫殿。经堂内珍藏有清代穆斯林阿訇手抄本《古兰经》和描绘伊斯兰教圣地及分布的“麦加图”，这幅图是中国式的阿拉伯世界图，因为绘制者没有到过阿拉伯，更没有去过圣地麦加，因此他完全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绘制了这张图。该图深受世界穆斯林的喜爱和重视。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的夫人通过我国新华社转达她个人的意思，她说，中国西安清真大寺的中国式阿拉伯世界图极为珍贵，要妥善保存。“麦加图”人们

称它为“克尔白图”。讲经堂内的麦加图、阿文对联，还有藏经匣、清制家俱，使经堂尤显恬淡幽静。

第三、四进院落接壤之处有一道墙，有三座门楼南北并列，叫“连三门”。经“连三门”进入第四进院落，院内有南北两厢、凤凰亭、碑亭等建筑。南北两厢厅房（俗称南北亭子）各面阔七间。南厅后檐接有卷棚与碑廊相连，平面呈“工”字形。唐天宝元年“创建清真寺碑”、明嘉靖元年“重修清修寺碑”，陈列在碑廊里，这一部分是近年修缮南厅时增建的。南北厅之间院心建有“凤凰亭”一座。亭子建在高80厘米的台基上，台基中间呈六角形，两端近乎方形，周围绕石栏杆，中间东西两向有踏道，主亭在台基中央，为六角形，两侧亭子为三角形，三个亭子连在一起，形似凤凰展翅，故名“凤凰亭”，造型特异，独具风格。亭子正面檐下悬挂“一真”雕龙匾，为明建文元年兵部尚书铁铉所书。

凤凰亭至月台甬道两侧有护道栏杆，石栏杆外各有一海棠形鱼池，中砌函洞相通，池中叠石成山，喷泉水溅。鱼池两边各有四角形亭子一座，亭内各竖石碑二通。北边亭内一通碑即为明代永乐三年所立“敕谕碑”。月台正面三座石门，三路踏道，中路丹墀。月台呈长方形，纵铺大方砖四十块，故有“四十不进地”之说。月台中央有白莲花盆二座，东北向有古代测时用的日晷和试官石一块。试官石据传可以预兆新官前途凶吉和为官廉洁与否？

在石栏环绕、平坦宽敞的月台西端，是望之俨然、巍峨壮丽的礼拜殿（俗称大殿）。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九间。三个大屋顶用勾连搭式连缀一起，平面呈凸字形，整个殿瓦覆琉璃，砖磨对缝，建筑面积近13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礼拜。殿明间内檐悬挂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颁赐给当时寺院主持赛义迪哈马鲁丁（阿拉伯人）敕谕“护持”匾一面，至今保存完整。与此匾相对悬挂着“临下有赫”大匾。殿内梁柱均是人不能合围的巨木

做成。站立在这样的空间里，使人徒然增添一种深邃神秘的感觉。殿内天棚由660余幅彩绘藻井组成，每幅藻井中心全由阿文“都哇”（吉祥词）绘成，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绘画的独特手法。后殿西壁整个为壁板雕画，蔓草花纹中套雕古兰经文。壁板中央“窑窝”象征“克尔白”（麦加天房），造型工艺精湛至极。整个壁板采取中国民族传统装饰刻花工艺和伊斯兰教建筑装饰工艺有机结合手法而成，浑然一体，珠联璧合，观后令人叹为观止。难怪伊朗一位阿亚图拉叫推布斯的伊玛目来到大殿观赏壁板后，竟不想走了。他说：“伊玛目，这里太美了，现在我不想离开这地方了，我好像已经进入另外一种境地了。”他还以恳求的语气要求允许他在壁板前照张像留作纪念。1987年的尔德节，伊朗驻华大使布鲁杰迪一行三人，专程从北京赶到西安清真大寺和西安穆斯林一起欢度尔德节。在尔德会礼前，布鲁杰迪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穆斯林的大团结。他还代表伊朗政府向寺院赠送了《古兰经》和一块地毯。

大殿后身，南北各有一座高过围墙的土丘，这里是斋月始末寺院的阿訇登临看新月的望月台，也是寺院总体的最后。

综上所述，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宗教建筑特点在这座寺院体现无遗。寺院整个建筑都是以中国民族传统建筑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是某些建筑物本身的作用和悬挂在建筑物前的匾额内容已经向人们昭示了伊斯兰教的性质。从一踏进寺院看到五间楼的“清真寺”匾开始，到石碑坊的“天盟在兹”、敕修殿的“敕赐礼拜寺”、省心楼的内心呼唤、凤凰亭的“一真”匾，再到大殿的“临下有赫”、“能有有有”、“钦若昊天”等匾，无一不在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告诫真主的独一无二，真主造化万物的大能和提醒信仰者敬畏真主、崇拜真主而不能稍懈的宗教教义，这是中国式的宣扬，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砖雕门楣阿拉伯化的说教了。寺院的另一个特点是整个建筑群保存

完整、规模宏大。寺院主要建筑沿中心线东西合理布局，其他建筑南北对称设置，形成一组较庞大的古建筑群阵容，这种格制前疏后密，步步紧逼，给人造成一种气势连贯、高潮迭起的感觉。建筑艺术的特色，还在于传统建筑艺术和伊斯兰建筑艺术二者巧妙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组占地广大、建筑群完整的空间里，中国式传统建筑艺术使人感官上能获得民族传统美的享受；寺院处处弥漫的宗教气氛，又使人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这是中国各族人民智慧的再现，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结晶。

除去建筑之外，寺院还保存着二十余通明清各代阿文、汉文刻的石碑以及二十余幅木制牌匾。牌匾中有以中国对联式书写的阿文书法，或以伊斯兰教典故为内容的中国书法对联。如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巨蟒道安赢驼转健，熟羊告毒烹鲤言机"，说的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圣人的"四大奇迹"，读起来绕有意味，寺院的建筑和实物为我们今天研究这座寺院的历史沿革、建筑和艺术，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寺院的组织形式、活动及其他

清真寺，阿拉伯语为"迈斯吉德"（礼拜的地方），是穆斯林大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这庄严神圣的地方，教徒们能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宁。但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清真寺不仅仅是过纯粹精神生活的场所。首先可以说它是教民的基层组织形式，教民围绕它从事各种活动。大至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小至家庭生活等，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反映。每一座清真寺的历史变化都可以和当时当地的穆斯林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同样，千百年来历史沧桑的沉浮，也可以在这里留下可辨认的痕迹。

清真大寺地处西安穆斯林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在它周围的化觉巷、西羊市、北院门等街巷里居住的穆斯林，绝大多数

是这所寺院街巷里居住的坊民。由于其寺规模大、坊民众，在解放前就有“八百家大寺”的称法，至今，寺院教徒之多，活动规模之大，仍不减当年。清真寺的阿訇不是世袭的，而是受人聘请的，其条件主要取决于阿訇本身的品德、学问、修养诸方面的因素。据碑刻文字和故老传闻，化觉寺清真大寺自明、清到现在留下姓名的历任开学阿訇有30位左右。这30多位阿訇只是这座寺院历史上就任阿訇中的极少部分（可惜绝大部分都没有留下姓名或文字记载）。在这几十位任职阿訇中，既有西安市的，也有外省市的，如本地阿訇有穆超、郭连益、米万选、韩镜湖、马谦益、金启善、金启祥、韩文玉等；外省阿訇有杨嘎嘣、小西宁、者万选、禹月明、马金贵、者广思、白有明、马旸、米明善、冶亮普等。上述人中不乏著名的阿訇，有的是我国经堂教育大师胡登洲（胡太师）的嫡传弟子；有的因“尔林”（学问）高深，学识渊博，广徒广众；还有的则因精研经典，弘扬教门，受人欢迎，连聘连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沈钧儒率领中央慰问团来陕西慰问时，曾来到寺院慰问西安的穆斯林。陕西省、西安市穆斯林的宗教团体——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和西安伊斯兰教协会现办公地址就设在清真大寺。

三、寺院的保护和修复

历史上，各朝历代对寺院都进行过重修或修葺。考寺院碑石记载，自唐迄今，大的修缮工程，官修或民修统计在一起，有10次之多。主要有：

①宋靖康二年（1127年），差指挥佥事阿讨剌督工重修；

②元延祐二年（1315年），复差平章政事赛典赤督工重修；

③元至正二年（1342年），马虎仙自备资财竭力重修；

④明景泰六年（1455年），满拉刘志杰率诸奉教者……各捐

己资……肇工于景泰甲戌，毕工于乙亥仲春；

⑤明成化二年（1466年），长安人马斌督工重修；

⑥明嘉靖元年（1522年），督工人马清……督同教中耆老募缘赀财千两□采材集工，大启栋宇；

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本寺礼部掌教官马光元……各捐赀不一，同心协力，营此修葺；

⑧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重新立碑。

其中明嘉靖五年至明万历三十四年间的一次重修规模最大。其时“充拓门殿，规模广远，栋宇高耸，较前若位。”（见明万历三十四年《重修清修寺碑记》），就在这次的重修中，迁敕修殿于寺院中轴线上，又向东西两向扩延土地，初具今日寺院的规模。

清乾隆三十三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缮。封建王朝修宗教寺院都是有附加条件的，即信教的人要绝对效忠皇帝。大概是在清代修殿时，在大殿门首设立“万岁”牌位，遗制现仍保存，凡教徒礼拜之前都先要向当朝皇帝敬一炉香，然后再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这是封建王朝不尊重宗教信仰的历史见证。

国民党统治时期，常年战乱，民不聊生，致使寺院年久失修，荒败不堪。据1933年《月华》第五卷刊登王曾善《长安回城巡礼记》一文写道：“寺院闲旷之地，野草横生，荒芜若无人问，一若鲜花美草不堪植于寺院”，“房舍都可数十余间，雕椽画柱，工程艰巨，现在则十室九蔽，缺乏生气，与古木芜园之任其自生自灭者同其可怜！”凄凉景象可以想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寺院大殿西南角发生严重倾斜，危及大殿结构和礼拜教徒安全，有鉴于此，当时寺院掌教马谦益号召坊民捐资抢修，并率先解囊。后用筹集到的款将大殿西南修葺，这是民国时期寺院最大的一次保护修缮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的保护工作。1953年拨款整修了一次寺院，抢修加固了一些古建筑，并粉刷了寺院，这样才使寺院面貌稍得改善。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又将寺院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大殿前檐大梁断裂，政府又拨款修缮。

十年动乱中，红卫兵破“四旧”时，清真大寺周围的一些穆斯林群众甘冒危险自觉保护清真大寺，使这座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清真大寺虽然没有被毁于一旦，但是以后陆续的占用，把寺院整体人为地分解成几处小块块。如，第一进院被一所小学占用；第二进院被一家铁工厂占用；第三进院也被街道小工厂占用；大殿被做了抄家物资的仓库，教徒的宗教活动也被迫中断。在这些“小块块”里，文物古建筑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而是以它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承受着过度的负担。人为分解造成的损失，加之这些近千年的古建筑没有经过较为彻底的整修，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奄奄一息的地步了。南北厢房（南北亭）倒塌了，尤其南厢房已变成一堆瓦砾废虚。省心楼的顶层和凤凰亭的“凤翅”眼见就要掉下或倒下，岌岌可危。寺院建筑的精华——大殿外形虽在，但主要木构架几乎全部朽蚀中空，这是此次翻修大梁落架时发现的，情况实在令人吃惊，也着实叫人感到后怕。

1972年，在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怀和穆斯林大众的通力支持下，依靠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开始了一场十分艰巨的保护修复工程。当时，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成堆，诸如修缮经费、施工力量、施工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在整个文物修复工作中，为解决每年的修缮经费和施工中的技术难关，施工中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古建筑材料等等问题，我是常常穿梭往来于中央、省、市各级党政部门之间，颠波奔忙在城市与乡间阡陌之上。当时，我所遇到的各级领导、各族兄弟、穆斯林大众对我是支持的。有的行动支持，有的精神支持，尤其接触较多的文物和建委两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均给了财力和物资上的大力支持。

从1972年至今，经过十七年的不懈的努力，破烂不堪的寺院得到了较为彻底的修复。寺院五进院落中的全部建筑都修葺一新。众人瞩目的大殿修复工程业已基本完毕，在第一、二、三进院落里，还添建了仿古大厅、陈列厅、外宾接待厅等建筑。阿卡汗建筑基金会董事长阿卡汗殿下在参观寺院时，对仿古大厅颇感兴趣。他说，这种大厅建筑形式他还没见过。他指派专家们对大厅进行拍照和勘测。在彻底修复寺院建筑的同时，我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对寺院的环境绿化和家俱陈设进行彻底改造和添增。过去荒草丛生的庭院，现在百花吐艳；昔日满目凄凉的寺院，现在一片葱绿。原来寺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家俱陈设，近几年我们从北京或从当地民间陆续挖掘到一些古式家俱和宫内陈设，如：清式楠木桌椅、清制黄杨木12扇屏风、红木8扇屏风等等，现寺院所有建筑物都程度不同的相应配备，古老建筑配古式家俱陈设，格调和谐一致。

今天，寺院古木逢春，花草缤纷，亭台楼殿，相映生辉，建筑更为完整，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寺院特点更加突出，更加光彩夺目。难怪前来参观的中外人士都要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我们的修复工作也给予肯定和鼓励。如加拿大总督让纳·索维参观后说："你们采取的文物保护措施很好"，"你们这里保护成功了"。阿曼宗教、司法大臣萨马尔赞誉道："你们清真寺保护得这么好，不仅是中国的珍贵历史遗产，也是世界伊斯兰教建筑的珍贵文物。"1982年，清真大寺曾被世界著名的阿卡汗建筑基金会推荐为获奖候选者之一，还在基金会的会刊上专门介绍了寺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刊物《信使》(1981年第10—11期合刊)上将清真大寺列为十六世纪世界伊斯兰文物。

十年动乱后进行的寺院保护修复工作，其规模之浩大、工程之艰巨、耗资之巨大是寺院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正像有些穆斯林老人所说的，这项工程比得上历史上修寺的总和，

而且亲眼看着修得扎实，真放心了。人民政府给我们穆斯林办了一件祖业活。我们深信，若不是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开放改革的英明，清真大寺是不会有今天这种兴盛局面的。

四、改革开放时期的寺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清真大寺在一边从事日常宗教活动，一边进行繁重的寺院修复工作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于1978年5月开始对外开放。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寺院已接待前来参观访问的亚、非、拉、欧、北美和大洋洲约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近50万人次。凡是到清真大寺参观访问的客人，无不被这具有历史意义和壮观的古代建筑艺术所吸引。这座中国式伊斯兰教寺院完整的古建筑群更使他们赞叹不已。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说："来西安一定要看西安清真大寺，我在世界上看过不少清真寺，没有看过这样的清真寺"，"密特朗上次访问中国为什么没有来这里，我回去要告诉他，下次访华一定要来这里，这里简直像一座花园，太美了！"科威特驻华大使迈哈米迪评价说："清真寺，我们的迈斯吉德！又像你们皇帝的宫殿，又像一座漂亮的花园。"

前来参观访问的各国贵宾和朋友们普遍想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地位和我国伊斯兰教的状况，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情况。但也有些人对我国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怀有种种疑虑，特别需要我们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和介绍，以加强相互了解，增进友谊。我们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有时对用新旧社会和"文革"前后两种对比的方法，通过具体事例和生动语言给予介绍和解答，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宾来这里参观，她们亲眼看到寺院宏伟、完整的古代建筑群保护得这样好，穆斯林群众能在这里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并且生活的幸福愉快，他们自己便真正相信现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民族宗教政策是实实在在的。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清真大寺被确定为省市重点旅游窗口。这样，外事任务固然繁重了，但我们绝不因此而影响穆斯林群众日常宗教活动和修寺工程。几年来，我们积极协调，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使三者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我们为求得寺院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增加寺院的一些收入，我们不断探索前进并且改进工作。我们白手起家办文物复制部，经营具有寺院特点和伊斯兰教色彩的纪念品。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我们先后通过各类方式培训了10余名搞接待服务的工作人员。现有8名工作人员，有3人已能用外语自如地接待外宾。寺院工作人员少、任务重，但他们往往一人身兼数职，能出色完成各项外事接待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既扩大了与海外人士的友好联谊，又为国家赚取了外汇，也为寺院开辟了财路，从根本上减轻了穆斯林群众对寺院的经济负担，走上了自给自足、以寺养寺的道路，还培养了人才，可谓一举数得，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马健君整理）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

孔祥录　喇秉德

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是青海最大的清真寺，也是省内外比较著名的宗教建筑之一。全寺总面积为1.3万多平方米，其中大殿面积为1320平方米，可容纳1400余人礼拜，聚礼日达五六千人（扩及大殿前露天场地）。每值伊斯兰教的盛大节日开斋节和宰牲节，参加礼拜的教众则摩肩接踵，大殿四围，重门内外，密密匝匝，

略无空处。1984年开斋节会礼，参加礼拜的教众曾达2万人之多，盛况空前。

西宁清真大寺由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风格独特，故与西安化觉寺、兰州桥门寺、新疆喀什艾提戈尔清真寺齐名，合称西北四大清真寺。

一、大寺的兴衰史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屡遭兵燹，历经沧桑。据《重建西宁大寺碑记》载："西宁清真寺，创自明代，毁于兵燹"。根据民间广泛而较一致的口碑资料，东关清真大寺建于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约在1380年前后。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派大将沐英（回族）镇守甘肃（今青海积石山、日月山以东地区，包括西宁隶属甘肃管辖）来西宁时，与回族上层人士冶正明商议在西宁修建清真寺，经奏请朝廷允准，即于现今东关大街动工兴建。占地2.8万平方米，大殿面积2000余平方米，略大于今清真寺总面积与大殿面积。据西宁耆老回忆，清真大寺对面原有一处清真寺的碑亭院（俗谓"尕庙"），内竖红砂石碑数十座，其中一高达丈余之碑记有大寺敕修历史（当是洪武年修寺所立），另有一室专门陈列历代皇帝所颁圣旨以及其他有关清真寺兴建沿革等文物。

清自顺治五年甘州丁国栋、米剌印以"回民保明不保清"为号召掀起反清起义，继有乾隆四十六年之苏四十三起义。此后，回民及其所宗之伊斯兰教为清朝统治者所歧视，尤其自乾隆中、后期为始，凌侮有加，以咸丰、同治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之被镇压最为惨烈。东关清真大寺在左宗棠为扑灭西宁、陕西回民起义联军而发动的西宁之役后，于同治十二年(1877年)为清军所毁，其碑亭院同毁于斯难，一座历经500年的古寺连同其宝贵文物就这样毁于一旦。时隔不久，西宁回民以被镇压之余痛，备受欺凌之新恨，继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掀起反清起义，但仍遭失败，

再次受到更为残酷的镇压。在这种严酷的政治背景下，回民元气大伤，而官府则无意复修。

二、大寺的重修扩建

辛亥革命后，河州回族世家马麒充任甘边宁海镇守使（治所西宁），适得无宗教活动场所的东关回族群众、阿訇和部分耆绅提议重建东关大寺，马麒即“捐资为倡”，继而采取募捐等方法，筹得白银万两。《重建西宁大寺碑记》载是事曰：“民国2年五月，庀材鸠工，阅年而工竣”，“计建成大殿5间，唤醒楼3层，东厅5间，北厅9间，南厅浴室3间，寺门3间，庖厨浴漏皆备，计费银万两有余”。

民国5年(1916年)春，马麒将宣传伊合瓦尼教派的河州同乡马万福父子迎来西宁传播其教派的主张。马万福以西宁东关大寺大殿方位不合克尔白（在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为世界穆斯林朝拜景仰的最大中心，亦称天房）礼拜的方向，提出重建。马麒及西宁回族教众代表人士等听从此建议，遂于同年把新建不久之大寺尽行拆除，重新测定方位，以大殿等主体建筑适于西向礼拜与大街成45度斜角施工重建。于是“购大木，聘名匠，两易寒暑，始落成焉，瑰伟庄严，洵为陇上清真寺之冠，又费银万两”①。

1929年，国民军孙连仲部来到西宁，促成马麒原先建省之议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青海正式建省。孙部旋即撤离，指派马麒之弟马麟继任省府主席之职。未几，马麒去世，已升任国民军师长的马麒次子马步芳进据西宁，以后逐步取得青海省军政大权。清真大寺自1916年重修后历经30年，到马步芳在政治、军事上达到炽赫一时的1946年，因“鉴于东关大寺年久失修，且地当省会，为四方人士观瞻所在。爰商同地方绅耆，谋所以恢扩寺址，改建新宇，以宏圣教，乃庀材鸠工……。计建修南北楼2座，唤醒楼2座，水塘1座，饭厅宿舍等80余间，铺面3间半，西式大

门、重门各一座”②。“自民国35年开工，迄36年四月，始告落成”③。以上就是马麒、马步芳父子几度重修扩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过程。

三、大寺的建筑艺术

大寺的整体结构与国内其它清真寺格局略同，但风格颇异。

西式大门（亦称前三门）正面临街，两侧是八字水磨砖墙，上有典雅对称的花草砖雕壁饰（两面八字墙于1958年底扩修街道时拆除）。进了前三门，脚下是青石板铺地，四围一色水磨砖墙；行约百步，十数级花岗石台阶与正门和大街成45度角斜向而砌，石阶台地上是中间一大圆拱门、两旁各二小圆拱门的重门（与前三门相对，亦称中五门、五门），重门两端耸立着高达5丈有余的宣礼塔，对峙相望。拾级而上，但见重门及宣礼塔砖壁上规则地分布着嵌铁卐字图案（象征吉祥福寿绵长兼有加固砖壁之作用）；步入重门，一片方正的场地，以大青砖铺饰，两厢楼对称而立，迎面是大殿雄踞于九级台阶的平台上。整个建筑布局合理，对称协调，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大殿外形呈“凤凰单展翅”，殿顶结构为“两脊一卷”，是中国传统的“明脊暗卷”式古老宫殿建筑风格；殿门前是横向柱廊，两侧为砖砌9扇屏，上面是精美的花草图案砖雕，工艺典雅超绝；殿堂内外皆铺以木板。殿堂面积虽1000余平方米，但穹窿之下，给人以空旷幽深之感。寺院布局以前门、重门、大殿依二重平台的特殊地势次第而进，更显得三门端庄，五门挺秀，宣礼塔巍峨高耸，两厢楼拔地而起，而大殿独以古朴庄重、宏伟壮观的气势，使寺院益增其庄严肃穆、宁静清雅的氛围。尤其是大殿殿脊中央安装的三个镏金经筒和宣礼塔六角顶上安装的两个镏金经筒，以其特有的风姿为凝重的大寺平添了异彩。据早年曾任马麒师爷（相当于今之秘书）并于1916年复修清真寺时的与事者马

敏斋先生（1886—1983）和其他见证人证实，1916年复修清真寺竣工之时，拉卜楞寺僧众以同属信仰宗教之谊、与拉卜楞作为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治下之故，特派寺僧专程来西宁赠送三个经筒作为礼物致贺。当时负责清真寺修建事宜的董事会盛情接受了这种馈赠，并且也回赠了相当于两个经筒价值的银钱等物。宣礼塔顶的两个稍小经筒，则是1946年扩建增修时，董事会特派古维祺和马兴泰去塔尔寺联系，请塔尔寺的工匠加工制作的④。拉卜楞寺僧众所赠经筒其二呈圆柱形状的法幢，通体有精巧雕镂工艺，分置殿脊中部两端。中间寓有吉祥之意的经筒，与两旁经筒从造型到配置堪称珠联璧合。宣礼塔六角飞檐顶端的两个镏金经筒因本属定做更见其比例谐和，有如天造地设一般。五个经筒与整体建筑浑然一体，在碧绿色琉璃瓦的映衬下，益发显得金碧辉煌，光采耀目。每至晴初日丽之时，从南、北禅寺山顶远眺，亦见其五点金光闪烁于尘埃之中。这一为国内各清真寺所独有的佛教色彩的建筑装饰的形成，与乐于支援修寺而准许购买梁柱等殿材的乐都胜番沟范姓人家（汉族）及大通广惠寺土族僧众⑤，还有参与修寺工程的汉族工匠等有极大关系，表现了藏、土、汉族人民对回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反映了各族人民间和睦相处、友好团结的密切关系。

大殿门廊上原有许多匾额对联，殿门正中有已故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为大寺亲题之“敦崇教育”匾额，其下为已故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亲题之“以教勖忠”匾额，还有其他原国民党政府名人戴季陶所题“天德好生”，孙连仲所题“瞻仰真理”，陈立夫所题“公道立德”，白崇禧所题“兴教建国”等匾额。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亦为大寺题“至仁极慈”刻石置正门处。民国初年之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安徽合肥人氏）亦为大寺题：

横额　教阐天方

上联　清净明心义通释旨

下联　真实进德理合儒宗

以上所有匾额对联在“文革”中均遭毁殁。

四、大寺的经堂教育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经堂教育在省内、西北乃至豫、皖、湘、鄂、川、滇、粤、沪等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8年《边声》创刊号署名“浩”题为“西宁”的文章就说：“此不谓东关回族同胞之信仰寄托地，亦为西北回族最高之学府，四川、陕西各地回族同胞来此求学者不乏其人。”马万福自1916年来到西宁，以“尊经革俗”、“凭经立教”为宗旨，尽平生所学，致力讲学。西宁地区的一些知名阿訇慕名求教，影响逐步扩大，宗教上层人士如古铭瑞等许多哈吉也纷纷改宗伊合瓦尼，于是，伊合瓦尼教派迅速发展。马万福又先后去化隆、湟中等地开学讲经，通过10年的辛勤培养，造就了一批“尔令”⑥很高的“目勒孜”⑦，成为伊合瓦尼教派的骨干力量。比较出名的有马遇真、马遇道、马遇明、马遇德、马世荣、马德庆、马永庆、马受庆、马顺庆等等，他们不仅在省内各地，而且在甘肃兰州、河州、广河、东乡、康乐、平凉一带，甚至在新疆、上海、湖南、云南、陕西等地开学讲经，使伊合瓦尼教派得以在许多省市传播。在该派所开展的经堂教育中，除授阿拉伯文外，还授汉语文，这对于提高回族的文化素养是颇有裨益的。

由于马万福个人的不懈努力及马麒、马步芳的支持，伊合瓦尼得到长足发展，从而确立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全省暨邻近地区的海乙寺地位⑧。这一时期，青海全省和河州等地区有1000余座清真寺，所有这些寺院的开学阿訇，或直接由东关大寺选派，或经东关大寺认可，拥有很大的任免权。对已经开学的阿訇，东关大寺坚持进行分期分批的轮训，一般每期一年，对经学“尔令”达不到标准的，则令其连续学二、三、四年不等，直至合格。每年招收满拉，定额100名，实际住寺满拉常年保持在120人左右，

分中学班、大学班（小学由各小寺办）。全部实行寄宿制和供给制，经费由马步芳、教长和教众分担。这种官方赞助、社会支持、寺院负责的经堂教育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甘青地区伊斯兰教宗教理论的学习研究。民国30年（1941年），由教长马祥臣发起，在东关清真大寺举办了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班，有青海、甘肃两省比较出名的阿訇马遇道、马士福、马兆瑞、马宝仁、敏万卿等14人参加，集中研究了《克俩目》、《撒尼》、《嘎最》、《拜亚尼》、《满俩》、《胡赛尼》、《者良乃里》⑨等有关《古兰经》的伊斯兰教经典，并就教条、教义、教法、教规等方面进行了尽可能准确、全面的阐述，系统综述了伊合瓦尼教派的基本主张。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以海乙寺地位作为最主要的讲坛，通过四方开学讲经和各寺普遍举办经堂教育，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伊合瓦尼的后继人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宁买成章、韩生贵、马相臣、马兆瑞、马士福、马得福阿訇以及门源的童阿訇，湟中的马桂林阿訇，民和的马阿訇，上海小桃园的马驯（尕湖北阿訇），汉口的殷阿訇、马光清阿訇，湖南的李仁山阿訇，河南的白阿訇、郑州的马超仁阿訇，云南的高阿訇，四川的朱阿訇，兰州的杨阿訇，大肃州阿訇、尕南乡阿訇等等。一时人才济济，他们或于各所在清真寺主教长之职事，或开学讲经，为弘扬伊斯兰教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至此，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重建后截止解放前夕的历任教长，多是马万福培养的“目勒孜”和大寺经堂教育造就的伊合瓦尼派知名学者，他们是：

第一任马显福阿訇（因教众习惯于以乡籍或其它特征称呼阿訇，故人称白疙瘩阿訇）；

第二任寨子沟阿訇（也叫歪嘴伊玛目，河州大西乡人）；

第三任马骏（也叫长脖子阿訇）；

第四任由马步荣（马骏之子，人称五师傅）代理教长；

第五任马禄（字祥臣，马辅臣之弟，马麒外甥）；

第六任马步丰（马步銮之弟）。

五、解放后的清真大寺

1949年9月9日，西宁回族群众在东关大寺隆重举行大会庆祝西宁解放。王震、贺炳炎、王恩茂、廖汉生等解放军指挥员亲临参加，廖汉生同志并在会上宣讲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政策，回族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1950年，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来青海慰问各族人民，其间他还亲自到大寺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旗。

1956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赴藏途经青海，亲自到大寺视察访问，并捐赠人民币1000元。

1958年，全省开展宗教改革运动，解放后首任清真大寺教长、大学阿訇买成章哈吉被批斗投监（后冤死狱中），宗教活动为之停顿。

1962年调整宗教政策，信教群众得以去清真大寺礼拜。1964年“四清”开始后宗教活动再度沉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全面冲击，清真大寺于1966年8月24日关闭；70年代初、中期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演戏、放电影、举行球赛等，五个经筒也一度拆除。

1979年6月29日，几度关闭达十五六年的清真大寺，在党中央拨乱反正、重申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英明决策下正式开放。省人民政府先后7次拨款共26.7万元，迁出“文革”期间入寺居住的数户人家，扩建水塘，改善殡葬服务条件，很好地满足了回族、撒拉族等群众的宗教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实际需要，所有建筑也全部油漆、粉刷、整修，焕然一新，五个经筒也拭尽历史的尘

污安装原处而重放光彩。继买成章（已平反）、韩生贵（第二任教长，现为省伊协主席、省政协副主席）之后，大寺仍由穆斯林民主选举马相臣阿訇任教长。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自1979年开放以来，日、美、英、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友人、港澳同胞以及国内各种团体和个人来青海观光旅游访问中，均到清真大寺参观访问，清真大寺在国际交往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近年来，每年开斋、宰牲节举行隆重的会礼时，省、市党政负责人到寺向广大穆斯林祝贺节日，节日的喜庆气氛也使历经沧桑的古老大寺旧貌换新颜。

注　解

①《重建西宁大寺碑记》（1914年），现存东关清真大寺。

②③《重建西宁东关大寺碑记》(1948年)，现存东关清真大寺。

④有关清真大寺大殿三经简事，参见李文实先生《〈青海地方史略〉琐议》（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4期合刊），汪溶《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的修建——兼谈礼拜堂屋顶经筒的来由》（载《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宣礼塔二经简事经本文作者走访古维祺本人及当初参与修寺的者正祥先生等介绍的情况叙述。

⑤关于大殿梁柱栋材事：大殿立柱用材初向大通广惠寺拥有之鹞子沟购买时因未说明修寺原委，寺僧向来视大树为神木未许，后经说明是修寺所需，即与购；修大殿所需之大梁，访知乐都胜番沟范家坟院有特大松树堪做大梁，初派人购取时，范家以祖上遗留未许，后亦经说明原委，范家以“回民修寺，汉民修庙，都是善行功德”而慨然赠予，马麒等闻讯，即派员拉马搭缎，携带银元，专程赴范家登门致谢。

⑥尔令：阿拉伯语音译，指宗教学识。

⑦目勒孜：阿拉伯语音译，指学生、门徒、弟子。

⑧海乙寺：伊斯兰教各寺坊教众聚礼、会礼的中心寺院，一般负有对各中、小寺培训、指派阿訇的职责。

⑨《撒尼》为宗教法学；《嘎最》为古兰经注解，侧重法典学；《拜亚尼》为阿拉伯语修辞学；《满俩》阿拉伯语语法；《胡赛尼》为波斯文古兰经注解；《者食乃里》为古兰经简易注解；《克俩目》为宗教哲学和教义学。

乌鲁木齐市陕西大寺

乌鲁木齐市政协

陕西大寺是乌鲁木齐久负盛名的回族清真古寺，它的历史虽然不如喀什市的艾地卡清真寺那么悠久，但是它的名声却在天山南北，甚至在西北各地的穆斯林中都有传闻。

各地的清真寺，大都和当地的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陕西寺在乌鲁木齐的出现，正是陕西回民徙居乌鲁木齐的结果。清朝政府从1775年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集团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之后，即以乌鲁木齐为移民屯垦的腹地，据日本西域史学家川村狂堂的记载："乾隆征服准噶尔后，以陕西回人移居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这批和以后移居乌鲁木齐的陕西回民在自己安家落户的土地上修建进行宗教活动的礼拜寺是很自然的。于是，一座能够代表陕西回民特点的清真寺就在乌鲁木齐庄严落成。不过当时的陕西大寺并不是现在的陕西大寺，最早的陕西大寺是建筑在乌鲁木齐的北梁地区（即现时第一中学校门北侧），占地广阔，建筑宏伟，基本造型与现在的陕西大寺相似。清朝同治初年(1862年),陕西回族阿訇妥得璘由金积、河湟一带来乌鲁木齐，即驻北梁陕西大寺为依玛目（主教）。妥得璘又名妥明，经名达吾提。陕西回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举行反清起义时，妥得璘曾参与起义。1862年来乌鲁木齐后就联络了在清军中任乌鲁木齐中军提标参将的回族将军索焕章，在回族中进行了反清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藏军械于礼拜寺中"（《湘军记》卷七）。1864年，他和索焕

章领导了乌鲁木齐的回民起义，并被推举为“清真王”。由于清朝政府一贯执行着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所以在1876年左宗棠、刘锦棠驱逐了外国入侵者阿古柏后，就把北梁的陕西大寺查封，后来又将寺院改为“文昌宫”。尔后著名爱国者、新疆回族中的大阿訇马良骏在南关地区另建陕西大寺，不过改建的陕西大寺规模还不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渭河流域一带来乌鲁木齐的回民又捐资重建。

原北梁陕西大寺在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于1927年将“文昌宫”改为孔庙。后经迭次变迁，现在只留大殿故迹，已经破烂不堪。后来被某军事单位后勤部改作家属住宅区，原来寺的面貌就不复辨认了。不过原大殿南北山墙的经文刻石依然清晰可见。

1906年重建的南关陕西大寺，坐落在现在的和平南路永和正巷，目前是乌鲁木齐最大的清真寺，平时可容纳500人作礼拜，每逢聚礼和节日期间，来寺礼拜的教民可达千人。大殿高达10余米，系我国古典式砖木结构，前部为单檐歇山式，屋顶铺嵌绿色琉璃瓦。大殿周围走廊有36根朱红圆柱，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大殿后部为上八下四的重檐式的八角梁，用以看月以确定封斋或开斋日期，并作为呼唤礼拜之用。殿内四壁和门窗的装饰刻工精美，砖木刻均以花卉、瓜果为图案，既严格遵循不使用偶像和动物纹饰的伊斯兰教义，又保持了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风格。

大殿前面是宽敞的大院，东南北三面均建有厅堂，北厅是讲堂，南厅为浴室，东厅是各地阿訇进修的场所。

南关陕西大寺为全疆各地培养出不少经学渊博的宗教人才，特别是爱国耆老马良骏教长先后住寺多年，使陕西大寺不仅成为培养回族宗教人才的学府，而且是进行爱国教育，增进民族团结的会堂。抗日战争期间，马良骏教长经常召集各坊教民在此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支前募资活动。一年一度的“圣祭”聚礼，邀请各族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会人士参加，寺里洋溢着民族团结的浓

郁气氛。

新疆解放后，马良骏教长更是意气奋发，以爱国、爱教的崇高精神把陕西大寺办成宗教界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学校。在抗美援朝的年代里，陕西大寺曾为全市宗教界人士开展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慰问信和大批支援捐献都从陕西大寺发往朝鲜前线。50年代，曾有埃及、叙利亚、苏丹、约旦等国伊斯兰教友好人士来陕西大寺举行礼拜和参观访问。党和人民政府为了保护这座清真古寺，于1956年至1957年，拨款1万元进行了维修。十年动乱期间，陕西大寺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陕西大寺恢复了正当的宗教活动。近年由中央拨款35万元，并由国内古建筑技术人员的协助，对陕西大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并重建大殿。

伊宁回族大寺

马玉林

（一）

坐落在新疆伊宁市新华东路的回族大寺，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的一座古老的著名清真寺，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这座伊斯兰教寺院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进行续建而完成了全部工程。这座寺院的面积约6000多平方米，现存3000多平方米，其建筑的造形和布局是典型

的中国宫殿式兼有阿拉伯装饰风格，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建筑物的独特形式。此寺外形和西安市化觉巷的清真寺大体相似，前有山门和正门，两侧为双重八字影壁，正中门楼高耸，是一座三层亭式建筑，其二层呈平面四角形，三层为六角尖亭形式，教徒称之为宣礼楼（即邦克楼），从山门到大殿中间有鱼池和玉带桥，今仅存遗迹。进入山门之后，即面对坐西朝东的礼拜殿，是这座寺院的主体建筑物。礼拜殿的殿堂楼亭，大小适宜，青砖对缝，结构严整，造形古雅优美，布局考究而气势宏伟庄严。大殿由外殿、中殿和里殿三个部分组成，面积有600多平方米，为全寺面积的1/6左右。除前后两侧卷棚走廊外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礼拜。大殿的顶端由三个屋顶环以围廊，构成连塔形式，内部形成一个大空间。

里殿是一座外形四层八角形的攒亭式窑殿建筑，内部为穹窿结构，此即领拜人所处之位置——小窑殿。小窑殿上面前壁的雕刻和绘画至今仍保留着原有的色彩。雕刻的阿拉伯字是清真言，意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钦差"。教内称此句话是"洁净真言"。小窑殿两侧雕刻着古兰经选段第六章（艾奈阿母章），右侧一段意为："举行一件喜事的人，可获类似它的十倍"；左侧一段意为："举行一件恶事的人，仅只照样还报，并不亏损。"窑殿两侧各有一个挖空的窗棂和两个门，右门内壁上刻着的经文意为："作尘星之重的喜事者，将要看见它"，"作尘星之重的恶事者，将要看到它"。右门外壁上雕刻着"认主独遵"四个大字，右侧是："一点霞光两世照"；左侧是"认主难保本来真"；左门外壁上刻的四个大字是"赞主清静"，其右侧是"一道真光"，左侧则为"绕亮天地"。中殿两侧也有窗棂，左右内壁雕刻的经文意为："安静的性灵啊，你满意且获喜爱着归到养主吧，你入到我的众仆一流吧，你进我的园林吧。"里外殿由玻璃窗隔开。

大殿北面和东面原来均有讲堂，是教长和学生们讲解经典和学习的地方。从山门到大殿以及北讲堂、东讲堂都是檐廊阁式建筑，檐廊卷棚，两廊对厅，照壁绘画，园门走廊等建筑物齐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建筑群。1958年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曾将这个建筑群重新油画一遍，更显得彩艳夺目，庄严肃穆。可惜旧中国这里战乱纷纷，因而很多有历史价值的石碑、匾额、寺谱等都被破坏和遗失，无从修复原样了。

（二）

伊宁市清真大寺原名宁固寺，以后又取名凤凰寺、金顶寺、陕西大寺、陕甘大寺等。解放初期，各地来伊犁的穆斯林不断增加，为了有利于内部团结，取名回族大寺，该寺的坊民现近千户。

建寺的历史渊源，因碑石、匾额多数被毁，现无确实记载可查，根据传述有两种说法：

（一）清乾隆年间，该寺附近坊民50多户为了开展宗教活动，在掌教人吴元科、肖成柏和众乡老人马代、马霞、马登魁、杨宗成、周玉、李坤等带动下，前后两次修建，贾银830两，用20年时间，在原沼泽地上建筑起来的。由于坊民多数来自宁夏、固原，故取名宁固寺（现殿有一小匾额，可以为证）。

金顶寺位于伊宁市东西哈尔墩梁，现名花果山，该处原有一座喇嘛寺，因殿顶部分披金色，故名金顶寺，当时对伊宁市也有称金顶市的。喇嘛寺被拆后，由于老百姓叫顺了口，对回族大寺也叫起金顶寺来。

1790年前后，即回族大寺建成后的30年前后，在回族大寺西面约一英里处整修了白吐拉大寺。此后，在回族大寺南面又修建了乌孜别克族的按占寺。北面则修建了塔塔尔寺。以上两寺原皆有尖塔。从远处观望回族大寺像凤凰头，两面的寺像两

只翅膀，白吐拉寺则像凤凰尾。因此，回族大寺又有凤凰寺之称。

（二）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准噶尔贵族首领达瓦齐勾结沙俄在格登山发动了叛乱，清政府派兵平息叛乱之后，为了纪念格登山一役战死的25位勇士，在昭苏县西苏拜河东岸竖起一座格登碑。当时边界发生的外国侵略事件也引起了清廷对伊犁的重视，为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清廷采取了若干实际措施，修建宁固寺即其中之一。因为从回教历史上看，清真寺在平时是传播伊斯兰教教义的讲坛，而一旦有事，又是号召、动员和组织穆斯林进行政治斗争的指挥部。据传当时地方政府曾允许乡老到关内捐收虔良（银两），还派关内建筑师帮助修建大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即是在政治上有所考虑的。

（三）

这座大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外享有盛名，是伊宁市重点文物保护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是广大回族群众和各族穆斯林施行宗教礼仪和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其他各族群众也常到这里遊览参观、摄影留念。但是，十年动乱期间，这里的建筑群遭到严重破坏。1973年，在马玉堂、马文炳等回族老前辈的带动下，坊民们自费维修了殿顶，铺了砖瓦，殿内铺了席单，整理了寺院。粉碎“四人帮”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得到了落实。1979年以来，人民政府拨了专款，又将路面和大殿维修了一遍。经过整修后的清真大寺面目一新，重新开放，各族穆斯林前来进行宗教活动，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有几千人欢聚一起参加会礼。

同心清真大寺

马峰玉　马占珍

宁夏同心县城清真大寺是中国现存的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它建筑规模雄伟，结构特殊，具有我国古代传统建筑和宗教形式相结合的艺术特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不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团结广大回族反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的营垒。1936年，西征红军帮助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政权——陕甘宁省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一、大寺的建筑造型规模及其艺术特色

同心清真大寺修建在隆起地面7米的高台之上。高台四周均用青砖包砌。墙壁平直，上下收分严紧，东西通长60米，南北延垣53米，为金钟体状。占地面积约2870平方米。台上建有礼拜大殿、邦克楼和南北厢房。台下入口拱道对面建有照壁一座，附八字墙壁。

清真大寺正门为三孔道，辟在高台西南折角处。墙面上部饰有砖雕垂莲。在垂莲的枋额间，中门上方为“清真大寺”四个大字，右为“洗心”，左为“忍耐”。三者中为二方阿拉伯文篆体字，两种文体的门额对称和谐。

拱门正西建一座照壁，青砖砌成，宽9米，高6米，立面分成三段：下段是须弥座，中间雕一幅“月挂松柏”的秀丽图案，

两侧刻有“万物偏生沾主泽，群迷普渡显圣恩”的对联。顶上覆以仿木结构的砖砌壁顶，盖以烧制脊兽。整座照壁比例匀称，雕刻精细，可以说是砖雕艺术的杰作。

礼拜大殿是寺的主体建筑，坐西向东，砖木结构，南北厢房分列左右。礼拜大殿由前后两座殿宇和门前抱厦相连结而成。抱厦进深 2 间，面阔 5 间，除两侧有低矮、透空的栏杆外均为空廊式。柱枋之间还装有云纹挂落，斗拱挑檐。大殿的前后两叠，前殿进深 5 间，面阔 7 间；后殿进深 4 间，面阔 5 间。两殿净空面积为408平方米，可容纳800人礼拜。前后殿内均立四根擎柱，并巧妙地将三根垂柱运用斜梁搭接，既减轻了木结构架的承担量，又增加了殿后视线度。

前后大殿的八根擎柱上原挂有四副抱匾，匾联为：

（1）尔来礼拜呼？须摩着心头，干过多少罪行，向此处鞠躬叩首。

谁是讲经者？必破除情面，说些惊吓话语，好叫人入耳悚神。

（2）真教衍西方，理通三乘，方见独一真光。

大道传东土，道完五功，始开百千暗幔。

（3）生天生地，并生万物，仰真主之大生，生生不已。

化人化神，兼化百灵，溯至圣之妙化，化化无穷。

（4）致斋以敬，唯期忍性动心，

昭事为诚，方是追源报本。

这些抱匾，现存的只有“化人……”一联，落款为“陕甘布政司”，其余均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邦克楼”坐落在大殿南侧、三孔入口拱道之上，高 2 层，是大寺的主要建筑之一，面阔和进深均为 8 米，平面呈正方形。楼顶为四角攒尖，每层屋脊均缀有砖雕纹样，柱枋之间缕刻硬木挂落，给人以精巧玲珑之感。

礼拜大殿两侧建有南北厢房各 5 间，为砖木结构的全起脊瓦

棱式建筑，它同大殿围合成一座端庄对称的三合院。

在南北厢房同大殿的连接处各开一个小月门，上面分别刻有“进退有度”和“出入是门”的字样（南厢房中一间为穆民重大节日出入院落的门道）。

总之，整个大寺建筑虽占地面积不到4000平方米，但气势雄伟，图案精巧壮观，浑然一体。虽历经沧桑，却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二、大寺的始建、重建和修缮

同心清真大寺始建年代没有文字记载，据考，始建于明初，是在一座倾塌的喇嘛寺庙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距今约600年的历史。

同心清真大寺从始建至今，经历了三次重修，一次维修。

第一次重修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第二次重修于清乾隆年间。这次重修的规模是比较大的，殿楼建筑的屋顶全部以绿色的琉璃瓦覆盖。建筑造型和规模基本定型。

第三次重修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这次重修是因清朝统治者镇压了同治年间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后，对该寺即行拆烧，以解其恨。这次人为的破坏，使这座大寺冷落了40余年。直到光绪年间，由西吉沙沟道堂教长马元章带头捐资白银300两，让同心城的教徒们捐款重修。这次重修寺的主体建筑基本保持了清乾隆年间重修的规模，但其装饰、构架不及以前那样富丽堂皇了，瓦路也改为青筒瓦。只有抱厦中脊挂几路琉璃瓦，这就是现在的清真大寺的模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同心县城清真大寺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曾拨款维修过大寺高台围墙。1980年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根据同心

县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和维修清真大寺的报告，由区人民政府批准维修，并拨款38万元（1983年3月又追加13万元），由国家文物局推荐的陕西省韩城县古建筑工程维修队承包修缮。

这次维修的主体工程有10项，即礼拜大殿、大殿八字照壁、大寺院落、南北厢房、邦克楼、台座护墙体、三孔大门洞拱道及踏步墙、照牌、高台四周散水。

在自治区拨款维修大寺的同时，国家宗教局于1980年拨款10万元，将原建在寺院西侧、将要倒塌的“沐浴堂”移建在寺院的南侧。另外在东面又建了4间宾仪室。

这是一次由国家直接拨款的重大维修。维修项目之多，修补面之广，工程量之宏大仅次于重修。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保护文物和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视。

三、清真大寺的革命历史和文物价值

同心清真大寺的文物价值不仅是以它宏伟壮观的建筑形式和在宗教中的影响，而且还是著名的革命旧址。在这里曾经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县级回民自治政权——陕甘宁省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是由于这一光辉历史，大寺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由于这段历史，这座清真大寺才在十年动乱中幸免于难，使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1984年5月2日，维修一新的清真大寺第一次迎接了由代秘书长穆罕默德·本·纳赛尔·阿卜迪率领的世界伊斯兰教联盟代表团一行6人。这些外国朋友在中国伊斯兰协会代主席沈遐熙和副主任安士伟陪同下参观了大寺，并与同心城镇的穆斯林一起在大殿内立了“敞什尼”拜。世界伊斯兰教联盟秘书长阿卜迪称赞说：“在中国的山区穆斯林居住地区，有这样一座建筑雄伟精巧的古老建筑被非常完好地保存下来，是我想不到的。”他深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是真实的。因此，同心城清真大

寺又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世界友人面前的见证。

陕西伊斯兰教

冯钧平

在辛亥革命前后，陕西全省有4万多回民，主要居住在西安、安康、汉中等地，分属伊斯兰教格的目、尕德忍耶、哲合忍耶、伊合瓦尼、色赖菲耶各教派。现分述如下：

一、格的目派。它是中国伊斯兰教中最古老的教派，在教法上属大伊玛目，即哈乃斐法学派，观点是较客观和宽容的，故数百年来此教一直按传统宗教教规办事，反对“比达尔提”（即标新立异），重提“舍拉尔提”（即念、礼、斋、课、朝），把“妥勒盖提”（即道乘）仅作为个人修行的“副功”。但是，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极力推崇，所以格的目派比以后形成的伊合瓦尼和色赖菲耶等教派所受其影响较大。该教派学者极力把儒家理论道德观念及其思想意识同伊斯兰教附会融合。例如在婚礼与丧葬之类的仪式上，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汉族习俗的影响。

陕西格的目教派是比较古老的。它自明代后期该派胡登州兴办经堂教育以来，陕西便成为当时全国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学术中心。辛亥革命前后，因伊合瓦尼教派在陕西的兴起，格的目教派的统治地位有了变化，其人数仅占半数略多，其余则属其他教派的人。例如在西安城内的12座清真寺中，属于格的目教派的有

化觉寺、广济寺、南城寺等6个寺。

二、尕德忍耶派。它产生于波斯一带。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该派在中国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的“大拱北”创始人祁静一，在陕西汉中等地静修传教。祁病殁后，葬于他静修的西乡鹿令寺内。“大拱北”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在陕南深山大林里静修和安葬的。所以，陕西西乡等地皆有大拱北先贤墓庐。

此派属伊斯兰教苏非派，带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色彩。它传入中国，又受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影响，重视静修和参悟。

清朝乾隆年间，该派的第6、7辈道曾在西安的广德门和彬州的白吉塬等地传教，至今在西安还有其后裔。但因陕西格的目派占绝对优势，故此派在陕西没有多大发展。至今，此派只在陕南有数百户教民，与其他教派来往较少。

三、哲合忍耶派。它是清朝乾隆年间由马明心首先在甘肃河州传播的，今分布陕甘宁青等地，影响较大。它在陕西的北部三边地区有少数教民，其中又有一些教民加入了格的目教派。例如，该派有一叫刘学元的，原为哲合忍耶教主马化龙之侄，同治十年（1871年），宁夏金积堡陷落后被清军押至西安，后因年幼乘机逃脱，为化觉巷回民刘某收养，遂改姓刘，长大成为格的目派阿訇，在化觉寺任“哈菲兹”之职。

四、伊合瓦尼派。它在陕西自称逊奈蒂，一般称之为新派。

此派是清末在甘肃河州兴起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它的倡导者马万福在陕西安康清真寺开学，深受群众欢迎。民国3年（1914年），继西安的李四阿訇后，刘遇真阿訇在西安清真北寺宣传此派主张。抗战初，因由河南逃陕的此派教民增多，所以成为陕西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它在西安，有大学习巷寺、大皮院寺、西寺，新市区有东寺、西寺、道北寺等；在安康，有西关寺、小寺、城里寺；在汉中，有南寺、城里寺。

伊合瓦尼派是瓦哈比耶原教教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除与

格的目派在教义有细节的不同外，也反对后者的某些中国习俗。它提出的“凭经立教”和“尊经革俗”的主张，即得到众教民的赞同，也形成了同其他派别的对立。

五、色赖菲耶派。一般称之为“三抬”，是因在礼拜时抬手三次而得名的。它比伊合瓦尼派更接近原教旨主义，复古守旧，否定《古兰经》注释，只承认其原义，主张尊奉“圣训”。它与中国绝大多数穆斯林不同，不属哈乃斐法学派，而是罕伯里法学派，因而受到孤立。

此派在抗战前夕，由朝觐者马得保即“尕白庄阿訇”带入中国，1937年在临夏（即河州）先从伊合瓦尼派中分裂出来。40年代后期传到西安，只有极少数人秘密信仰。解放后，在临夏学习瓦哈比耶派经典的定省三阿訇回西安后才开始公开传教，人数渐多，但在陕仍居少数，西安的营里寺为其活动场所。

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孔祥录　喇秉德

一、伊斯兰教传入青海和回族在河湟地区的早期活动

在唐代，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交使团主要活动于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同时，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也多往来于这一路。从那时候起，就有了以经商坐留年久不归的“番客”和战乱结束后在中国安家落户的大食兵，① 并且为数不少。7世

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镇压了持续达12年之久的以什叶派教徒为主反抗倭马亚王朝的斗争后，“曾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王朝的迫害而到了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② 据《甘宁青史略》卷首之三载：伊斯兰教于“唐天宝后，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而天宝后正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交替、阿拔斯王朝向东扩展，其东部疆域同当时唐朝的西北边境接壤的全盛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同唐朝间的联系更加广泛密切，当时西域“胡商”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了蜀中。以此推论，较之便捷的河湟地区当更是经商范围：一批什叶派穆斯林之避难逃居中国北方，当然也包括河湟地区。

根据为编纂《青海省·民族志》回族志调查收集到的口碑资料，唐代中亚商人越过葱岭和祁连山，到达青海河湟一带，经营商业贸易，继从事耕作。现在西宁回族中的哈、丁、穆、白等姓的先祖，据说就是当时移居来到此地的波斯人，他们成为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最早传播者，这同前面述及的有关历史事实和记载等史料是完全吻合的。与此相关联的是，甘肃临夏（同青海回族历来联系频仍密切）回族中关于唐代曾有伊斯兰教十大“上人”到临夏居留直至终老的传说与“先有哈家坟，后有枹罕城”的古谣有相同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入青海自唐代为始，或者说可以追溯到唐代。

到10世纪60年代，北宋建立，仍旧“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继续从陆上沿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到罗布泊附近，因为这时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据，他们要去宋朝辖地进行外交、贸易活动，无法通过，就东南入柴达木盆地，经青海湖北岸过西宁，循湟水谷地到洮河流域，走临洮，再由陇南进入关中平原，东去洛阳、开封”。③ 也就在这时候，在已趋衰落的阿拉伯帝国原统治地域的葱岭以西到咸海附近，由当时已经信从

伊斯兰教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突厥人和回纥人建立起哈拉汗王朝（我国史书称黑韩王朝或喀喇汗王朝）。之后，该王朝的疆域就由中亚越葱岭经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向东延伸到于阗一带。在哈拉汗王朝统治了南疆南部以后，伊斯兰教在这一广大地区传播、发展很快。从此以后，因利趁便而进入南疆一带的阿拉伯等地的使者、商人等就经常同当地的穆斯林一起东经青海、陇南、关中到开封进行贸易。北宋收复湟州、洮州以后，青海路被视若通衢，而往返于这一路的穆斯林使者、商人等就更多、更经常了。他们也免不了因宋与吐蕃、西夏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冲突或者缓解，不得不经常在沿途各地滞留，而当时处于宋、吐蕃、西夏及金等势力交接要冲的鄯州（今青海西宁），这种滞留的情形就可能更为经常，这无疑对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较大的推动。宋代的青唐城（即今西宁）已经成为中亚、西域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直至南宋绍兴三年（1096年），大食进奉使节仍沿青海路经西宁到熙州（临洮），前后历史达100余年。清人冯一鹏的《塞外杂识》记载说："西宁之西50里曰多坝，有大市焉，细而珍珠玛瑙，粗而毡毯藏香，中外商贾咸集。一种缠头回子者，万里西来，独富厚于诸国，又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这里特别提到万里西来的"缠头回子"，显然是指循青海路贡道而来的中亚等地穆斯林商人。其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正说明西宁作为继宋代以来的中外贸易市场，穆斯林经商活动的规模不小。

青海路的开辟与西宁成为这一孔道上的重镇，使不少穆斯林商人留住下来。公元11世纪以青唐城为中心建立的唃厮罗政权所统属的部众中有回纥数万，足以说明当时居留在青海的回族先民其规模弥足可观。④另据陶宗义《说郛》、李远《青唐录》记载，当时的青唐城的东城居住着"陷羌及陷人之子孙，夏国降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当时的青唐城与今西宁市的城区基

本相同，其东城就是现在的东大街至东关一带，而这一带一直是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清代同治年以前，城东北一带颇多清真寺，今西宁一中所在地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清真寺，康熙时马守祯、马家骏等人曾在此寺拜谒过圣裔赫达叶·通拉希；同治年间西宁回民起义被扑灭后为清军所毁，以清军将领刘锦棠之父统领刘松山在与回民起义军作战中被杀之故，改称统领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今日西宁回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和源流之端倪。

到了元朝初年，马可·波罗在来到西宁时仍然看到，“西宁境内管辖的城市和堡寨，同样划归唐古忒省的疆界之内，属于大汗的版图。这个国家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不过也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⑤ 这里所说的西宁当指今青海东北一带，故而说“这个国家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马可·波罗当时在西宁一带见到的伊斯兰教徒，不仅仅是随蒙古人西征而来的回回人，恐怕主要还是当地原来的穆斯林。

尚需说及的一点是，直到现在，西北地区回族妇女（主要是姑娘和少妇）中普遍喜欢用凤仙花的叶染手指甲，这种风俗很早以来也影响到本地汉族妇女中，人们普遍习惯于把凤仙花称之为“海纳”这一阿拉伯名称。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早就对此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并说“今回回妇女多喜此”。这类情形还反映在一些日常用语中，如言称倒霉、懊丧之心情，就说“鼠迷”，或“鼠迷白道的”，这里所说的“鼠迷”正是阿拉伯语和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用语。又如指挑拨、逗弄是非的人或事，就说某甲受了某乙的“龌唆”云云，这里所说的“龌唆”也原本是伊斯兰教的经堂语言。现在，西宁地区无论回、汉，相处既久，在回族逐渐采用周围多数人（主要是汉族）所通用的语言——汉语之同时，本地汉族在其口语中也汲取了早期回族先民曾使用过的一些阿拉伯、波斯语汇，这种情形也只为西宁等不多的地区所特有，而且即使在城中汉族聚居区也依然存在，可见回族先民

居留西宁年代之久远，及其与汉族在习俗、语言等方面相互影响之一斑。

二、伊斯兰教在青海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元初，“天方圣裔故土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6] 以穆罕默德20世孙在成吉思汗征服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后，由伊拉克来到中国，先去云南，继又率从者来到西宁从事讲经活动，“复命归真”后，当时坐镇西宁的元西宁王速来蛮特地为其在西宁凤凰山（即南禅寺所在峰顶）修建“拱北”，并立碑以志纪念。[7]

以“圣裔”之尊贵身份来华而后去云南，继来西宁，相从徒众必不在少数；后来“复命归真”修建拱北，其跟从徒众及其它信从之人由尊奉其人，到崇拜拱北，遂相聚相守而终老当地，这在伊斯兰教中是极明白而合理的事，拱北周围的四座坟墓就是确凿的证明。直至明代修东关清真大寺时，尚有回族上层冶正国主持拱北之事，沿及于今，仍有人结庐而守。这是青海伊斯兰教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位“圣裔”之从伊拉克来我国云南，而后再来西宁，说明西宁已经有穆斯林居民，并且是伊斯兰教已经传播的地区。据说，现在西宁北关、南关和白玉巷等处的清真寺，就是元代修建，清代被毁后于近、现代才修复的。因此，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播到青海，至迟在元代已经有了公开并集体进行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正规场所——拱北和清真寺（在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拱北作为伊斯兰教某个教派贤人的陵寝，有时起着与清真寺同等的作用），这表明当地穆斯林居民人口业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西宁王速来蛮修拱北的事，起码表明了他对伊斯兰教及其贤人的尊崇，这种尊崇以修建拱北、树碑立传的方式表现出来，无疑对伊斯兰教在该辖区的传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在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从中亚回军经由甘肃河西走廊

东归实施其灭夏、灭宋的政治军事计划，曾于1227年攻取洮、河、西宁等州。这时，随同东来的数百万计的“西域亲军”（即主要是被签发的葱岭以西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连同随军的工匠和妇孺等均由蒙古军队的首先征服西北，其大部或以驻守，或从事屯聚牧养于西北各地。《甘宁青史略》卷十三载：“世祖二十八年，是岁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赛赤、哈散等，俾耕种之”。《元史·世祖本纪》亦载：至元二十五年，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于是，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甚多”⑧ 的情形。当时，从六盘山到黄河的宁夏和甘肃的河西、五条河等地，是一个主要的农垦地区。现今青海回族主要居住的省内东部农业区在历史上正是属于甘肃的一部分，五条河垦区则全部包括了今日青海回族居住的大通河、湟水流域和古代被称作析支的循化、化隆到贵德的黄河谷地。

元朝末年，封西域回回薛都尔丁为甘肃行省佥事。及明代洪武四年归附朱明王朝，仍授原职，并命其率部众往驻米拉沟（在今青海民和），起初以其来之西域故称为缠回，明清两代数百年间作为西北地区18家土司之一世袭罔替，今天民和米拉沟、巴州一带冶姓回族基本上就是薛都尔丁及其部众繁衍发展而来的，冶土司祖先弟兄中有叫米来者住西沟里，后来称西沟为米来沟，米拉沟即由此变音得名。因而，冶土司及其部属的世居此地，加上其它社会历史原因等，使民和成为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公元14世纪中后期（约当元末明初），青海撒拉族的先民在其首领尕勒莽弟兄带领下，从中亚撒马尔罕地方分别沿天山南北两路东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经长途辗转来到现在的循化街子一带定居下来，而传说中的尕勒莽弟兄原来就是撒马尔罕地方在伊斯兰教方面因有很大影响和声名，受到国王忌恨为避祸而携带《古

兰经》不辞万里东行到此，这部《古兰经》是用精制羊皮抄写的，几百年来，撒拉族人民视为本民族最珍贵的文物保留到现在。⑨应当说，撒拉族先民的移居，是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重大事件，而骆驼泉的传说则是这一事件在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生动反映。

综上所述，故土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及其从行者的到来，回回军户在河湟流域的屯田垦戍，西域缠回薛都尔丁率其部众的驻扎并以此世居米拉沟、巴州，以及撒拉族先民的集体入居循化，与唐宋时即在河湟地区居留下来的穆斯林不期而合，这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伊斯兰教。同时，在青海这一历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在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促使形成了新的人们共同体：即在全国回族形成的同时形成了青海回族；另以从撒马尔罕东来那一部分穆斯林为基干，与周围回、汉、藏等民族融合，形成了为青海所特有的民族——撒拉族。明初，征西将军沐英（回族）奉命为巩固明廷的西北边防等军务来西宁后，应青海回族上层人士的请求，奏准朝庭，在西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大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从元初西宁王速来蛮为圣裔修建拱北，到明初征西将军沐英请旨修建清真寺，其间一百多年是伊斯兰教在青海以西宁为中心向整个东部农业区稳固发展的阶段。

三、伊斯兰教在青海随着回族大迁移而进一步广泛发展

明代，将“移民实边”做为一项国策，数度移民青海。明王朝建立伊始，就采纳以经略西北到青海的征西将军邓愈、长兴侯耿炳文的奏议，将人烟稠密的“江右”（长江东南）、“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居民大量移居西宁卫及所属之今乐都、贵德、同德等地，由是史称“卫所军民皆事垦辟矣”。移民中固多汉民，

但宋元以来，“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⑩因而也一定有江南回回人同被迁移。洪武十三年，邓愈督修贵德城完工后，“因此地土著多系羌戎”，便移河州回民48户于此，给其田亩，免其赋税，⑪ 这部分回族的移居使伊斯兰教在贵德地区得以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11月7日、8日，在民和大庄金家嘴窝子地出土了一个金壶和五个银壶，考古确定为明代器物。这几个金、银壶形状大小基本一样，高为24－25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7.1－7.2厘米，最大腹径12－13厘米，把高11厘米，壶嘴长约10厘米。金壶底部有一行阴刻铭文：“大庄民寺金瓶一对。”其以大小形状似应为壶而称之为瓶者，正是伊斯兰教教徒礼拜行大小净专用的汤瓶。由大庄之为回族聚居地，其拥有汤瓶之民寺显然是清真寺。而拥有金银制汤瓶的清真寺，其规模绝非等闲可比；壶之制于明代，由此可以想见至迟在明代，民和一带回族居住之盛。

到了清代，由于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各种形式来到青海的回族较列代更多。清初甘州（甘肃张掖）米剌印、丁国栋领导的一度有席卷西北之势的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曾有一部分起义者为逃避镇压屠杀携眷翻越祁连山来到门源、祁连一带落户，他们中的一部分曾依附于蒙古人托茂公受到庇护，并娶蒙古女子为妻，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既受到蒙古族某些习俗的影响，又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青海托茂人。《甘州府志》记载这一事件说：“我朝顺治八年，叛回米剌印、丁国栋余党数百人善鸟枪者逃出，降于番夷滚卜台吉。滚卜亲率诸回驻牧于巴丝墩以为羽翼”。雍正三年，罗卜藏丹津事件平息后，仅修大通卫（包括今大通、门源、祁连）所属大通、白塔、永安等三处城垒，即从山西、陕西、甘肃、北京等地迁来大批回民以实边。这部分回民先后大批地移居青海，不仅壮大了青海回族，而且使伊斯兰教在北从大通河流域东经湟水谷地，南至黄河积石山流段的整个河湟地区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

清代中、后期，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的高压政策，激起回族、撒拉族人民多次掀起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其中以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的西北回民大起义最为壮烈。西宁做为当时的四大起义中心之一，青海全境的回族、撒拉族人民也同仇敌忾地投入了这场斗争中。但在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等严峻形势下，基本上各自为战的西北回民大起义依次被镇压。西北回民被成千上万地屠杀的同时，引起大范围的逃难流徙。青海回族居住地区处西北偏僻地带，也因陕甘宁等起义中心依次丧失的缘故，陕、甘等地起义回人，或因失败避难，或因继续进行抵抗，陆续来到青海。同治初年，河州回民起义由于马占鳌父子等人的叛卖而断送，不甘屈服的起义回民曾一次避居化隆500余人，另外也有投奔西宁等地的。与此同时，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部2万余众辗转退据西宁，驻小南川一带，抵抗清军失败后经大源去新疆；当清军刘锦棠部攻进西宁时，西宁仍有陕西回民2万余人，左宗棠把他们迁到甘肃的平凉、秦安等地。这两地陕西回民数万之众流散于西宁等地者亦不在少数。今民和马场垣团结、金星二村的回族就是同治年间自西安到兰州城关营、苦芦湾，后又来到民和的。大庄张、安、海、马四姓回族据称也是那时自兰州皋兰等地迁来的。这里的白、苏等姓回族则是直接从白彦虎起义队伍在甘、青辗转抗击清军过程中掉队流落下来的。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加上后来左宗棠为彻底杜绝回民造反而采取旨在“涣其心，孤其势”⑫而强迫迁徙为主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原先相对集中的回民力量被大大削弱。强迫迁徙分散的结果是，自唐宋以来发展到清代不下70万的陕西回族以“十不存一”，急剧减少，使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影响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镇压回民起义的屠刀下劫余的幸存者西向迁移避难，在客观上使伊斯兰教在一些偏僻地域得以传

播和发展。。

还应看到，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发展中，一部分汉族人也逐渐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于是随着思想信仰上改宗伊斯兰教，在族属上也就自然地加入到回族中。在青海称为“随了”。同治年间，马桂源受抚清廷任西宁知府期间，曾采取了一些意在改善回、汉民族关系的措施，如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二月劝令西宁所属汉民改良畜牧方法以促进生产；同治七年（1868年),为汉民修缮孔庙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部分汉民的好感，愿意改随伊斯兰教。如《近代史资料》记载，同治年间，“西宁八属汉民，尽随其教，马智元（即马桂源）兄弟格外庇护，得以安业”。其他以姻亲婚嫁等关系而多改随伊斯兰教者，尤其是在回、汉杂居地区更为常见。

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无形中日益扩大，对宗教生活也更加重视．因而去麦加朝觐的人次越来越多．由于朝觐的时机和所经过的途次等的不同，朝觐者接受了阿拉伯国家流行的不同学理、教派，特别是他们中专门的学经者，在受到各种不同的教理传授归来后，讲经传道，标新立异，于是形成了不同教派和门宦。

注 解：

①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③马士年：《伊斯兰教在陕西的传播发展与演变》，载《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参见《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马可·波罗游记》第69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引文中的唐古忒，也称唐兀，约当今宁夏全境、甘肃北部及青海东北部地区。

⑥⑦《南禅寺天方圣裔复命归真碑文》。

⑧《明史·西域传》。

⑨此节叙述参见《撒拉族简史》第二集族源部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⑩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砂磺》条。
⑪《青海省志·民族志·回族志》（油印本）。
⑫《西宁府新志》卷十一。

朝觐亲历记

韩 生 贵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大天命之一，按《古兰经》的要求，凡成年穆斯林男女，在经济、身体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须在教历十二月八日——十二日集体朝觐麦加一次，完成各项宗教功课。朝觐也是世界各国穆斯林交流思想，增进友谊，发展友好关系的良好机会。建国初，我国政府为了满足国内各族穆斯林朝觐的愿望，加强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相互了解，积极组织朝觐团。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破坏，均未能实现。1955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朝觐团才顺利成行。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朝觐活动。

朝觐团共有37人，团长是包尔汉（新疆人，归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团长是原北京市民政局局长李恕和金凤山（宁夏人，归真前为宁夏政协副主席）。为了沿途照顾朝觐人员的健康，还配备了一名医生。

6月28日，我们乘专机从北京起程，经云南昆明机场飞抵缅甸首都仰光。在此停留了五天，我们参观了坐落在市中心的昂山将军墓和著名的仰光大金塔，参加了缅甸政府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会上，联邦政府司法部长兼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吴钦大阿訇致欢迎辞，表示缅政府和人民欢迎中国使团的到来，并对我国政府

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称赞，他祝愿缅中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发展。

离开缅甸，经印度第一大城市加尔各答到达印度最大的港口城市孟买，尔后越过蔚蓝的阿拉伯海抵达位于波斯湾西部的巴林岛。这里气候非常炎热，我们作礼拜，沐浴洁身开始受戒①。脱去便服，改着两块不相连的白布，一块披在肩上，遮盖上身，另一块围在腰间，遮蔽下体，免冠赤足，袒露右臂。7月9日，又飞越象海一样的沙漠地带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乘汽车到麦加，进行了一系列的朝觐活动。

麦加坐落在沙特希贾兹境内，距吉达港90公里。因其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发祥地而成为全世界穆斯林敬慕之地和朝觐中心。它每年都要接待千千万万个伊斯兰朝觐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朝觐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朝觐后都同等获得“哈吉”的荣称。当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踏上圣城的土地，不由地不断赞念：“真主啊！我来了，我遵命来了！”我们走进圣寺巡礼天房克尔白②。圣寺就在麦加城中央，因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又称“禁寺”。圣寺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可容纳50万人同时礼拜。它巍峨宏大，格局严谨。天房就在寺中心偏南处，其周围是供朝觐者巡游天房的露天广场（麦塔夫）。环绕圣寺四周的是长拱廊建筑，以上下两条走道分开。面对圣寺墙垣的是一排圆柱，每根柱间有一穹拱联结，每4根柱之上有一精湛的圆顶。这类圆顶据说有500多个。圣寺有大门64道，其中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门、副朝（欧木赖）门、和平（赛俩目）门上各建有92米高的两座尖塔。我们随着白色的人流绕行天房克尔白7圈，边绕行边高念各种赞颂辞。

克尔白南北长12米，宽10米，高15米，以灰色岩石建成。天房四角各有专名：东面称黑石角，北面称伊拉克角，西面称叙利亚角或沙姆角，南面称也门角。殿门为金门，高3.2米，宽2米，

饰以长7.5米、宽3.5米的门幔。东南角距地面约1.5米处的墙上镶嵌一块玄石，黑中透红呈酱色，直径约30公分，外镶银边，据传是天使哲布勒伊来从天上带给易卜拉欣的。朝觐者绕行克尔白经黑石时都必须去亲吻抚摸它，以示敬意。游毕天房，到东边不远处的先知“易卜拉欣曾站足处”行两拜礼，以示怀念。继而再去南边天房旁的渗渗泉饮水。据传是易卜拉欣圣人之妻哈哲尔为寻水源，七次奔走于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其子易司马仪因干渴而啼哭，足蹬石块而涌出一股清泉，遂被视为“圣泉“。炎热干渴的暑天，更渴望饮用清凉圣洁的泉水，饮了渗渗泉水浑身顿觉清爽。接着到相距400米的萨法和麦卧尔两山之间完成往返奔跑七次的仪式，以纪念哈哲尔寻水之功。

7月21日、22日两天，我们赴麦地那圣地进行参观瞻拜。麦地那在沙特阿拉伯的希贾兹境内，距麦加约200公里。在这里，先知穆罕默德建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公社，建造了著名的“先知清真寺”，穆圣归真后又安葬于此，因此，又叫“先知之城”，是伊斯兰教的又一大圣地。先知寺建于公元622年，后又经扩建，建筑雄伟，富丽堂皇。全寺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有5座尖塔，9道大门，门均高6米、宽3.2米，以黄铜镶色。寺殿和过廊由232根圆柱、474根方柱、689个拱门结构联结。寺中心有两处露天庭院，最吸引人的是宣讲台，它共有12层台阶，其中3层在宣讲门外，9层在宣讲门内，是罕见的伊斯兰珍贵文物。先知寺的东南角，有先知穆罕默德陵墓，还有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两位哈里发墓。我们在圣寺里参加了主麻聚礼，瞻仰了圣陵，并施舍“赛德盖”③，救济了贫苦的穆斯林兄弟。

完成了副朝的任务，继而进行正朝。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八日（7月28日）那天，我们和所有朝觐者二次受戒，于麦加城东郊的密纳山④做礼拜和宿夜。十二月九日正午，所有朝觐者于麦加迤东25公里处的阿拉法特山进行了隆重的祈祷仪式。那天，人山

人海，人中一位伊玛目仿效当年穆罕默德圣人的做法，站在一块巨石上大声宣讲教义。日落后，我们陆续离山返回麦加，途中夜宿距麦加约12公里的穆兹达里法山，并在那里礼拜，采集石子。翌日日出后，我们每人拣小石若干粒，到密纳村边荒野的亚喀巴巨石处向三根石柱掷石粒（教历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每日各掷三次）。据传当年这里是易卜拉欣圣人带其子易司马仪献祭，仪布勒斯（魔鬼）教唆引诱其子背叛的地方。投石仪式就是像征抗拒魔鬼挑拨并痛击魔鬼和邪恶之意。投石结束后便举行宰牲，我们每人宰了一只羊，以庆宰牲节（尔德）。十二月十日（7月30日）我们再度去巡游天房，绕行了7圈。在完成朝觐所有仪式，离开麦加前还巡游天房，进行辞朝。

从8月1日起，我们先后访问了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富汗等国。我们受到埃及政府宗教部长巴库尔的亲切迎接，并陪同我们参观了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伊斯兰博物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游览了尼罗河。我们到胡才尼清真寺瞻仰了胡才尼的头颅，先知穆圣的一块旁袖，两根胡须、拐杖以及早期《古兰经》抄本。埃及国王纳赛尔还在国王府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合影。

在约旦，我们专赴世界闻名的古城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称之为“古都斯”，意为“圣城”，位于巴勒斯坦的中部，是世界穆斯林的第三大圣地，其旧城区有我们崇敬的艾克撒清真寺、萨赫莱清真寺及“飞石”石墙、圣石等圣迹。

艾克撒清真寺，又称“远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寺。它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在公元612年教历7月27日夜，哲白拉乙里天仙唤醒沉睡的先知穆罕默德，要他乘上伯拉格“飞马”，从麦加夜行至耶路撒冷，踩在一块圣石上升到七层天，亲眼见到了真主的一切迹象和奥妙，会见了古代到圣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等，参观了天堂和地狱，最后受主命由日做50次礼拜减免为日

礼5次。先知于当夜黎明时平安返回麦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伊斯兰教初期，曾作为穆斯林的礼拜朝向达14年之久。它位于圣地的南端，建筑宏伟，寺殿高88米，宽35米；殿内有大理石圆柱53根，方柱49根；寺殿偏东方向还有哈里发欧麦尔率众礼拜过的地方，称作欧麦尔寺遗址。

萨赫莱清真寺又称圆顶寺，位于艾克撒清真寺北面，两寺之间隔着一段著名的“飞马”石墙。萨赫莱意为“悬石”。寺呈八角形，每面宽205米　高9.5米，全用石砌，故又有“石殿”之称。其造型美观，结构严谨，中心突出建筑为一硕大的圆顶，圆顶内部有一圈大方柱和圆柱支撑。圆顶表面及八角檐梁铺满彩色瓷砖，上面彩绘和雕刻有精美的古兰经文。圆顶下面即放着“萨克莱圣石”。该寺体现了阿拉伯人民的聪明才智，也是极为罕见的清真寺建筑杰作。我们在各处虔心瞻仰了一切圣迹，祷告了真主的伟大、慈惠，圆满地完成了伊斯兰教三大圣地的朝觐瞻仰活动。

为了照顾部分成员的健康，经讨论，决定金凤山副团长等15人于8月18日先行回国，其余人员则继续到亚非各国参观访问。在访问叙利亚、约旦等国后返回埃及开罗，包尔汉团长因公先行回国，剩留人员在李恕代理团长的率领下还访问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富汗等国。

在利比亚，我们应邀参加了塞努西教主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叙利亚，我们参观了被列为伊斯兰第四座圣寺的大马士革清真寺。这座建于公元705年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古寺，全用瓷砖铺地，寺院东、北、西三面为柱廊环抱的长廊，廊壁上为古代大马士革风景彩画，院中有三座封闭的圆顶建筑，其中西面的是藏经楼，东面的是钟楼，分别藏有《古兰经》抄本和古钟。寺中央有一座大理石水池。大殿正面为凯旋式穹形大门，门两旁有圆柱，柱顶为皇冠形，殿顶中部为圆顶，美焕绝伦，殿内墙壁及圆柱上有镶嵌着黄金、宝石、贝壳的红、白、黑色大理石雕刻。南墙为正向，有

4个精致的大理石四壁和一个珍贵的大理石宣讲台。全寺有三座尖塔，是阿拉伯建筑艺术上举世闻名的杰作。

在参观访问中我们接触了各国社会上层人物，也接触了普通群众，他们对我国政府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致赞同向往，尤其是我国支持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斗争、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正义立场，得到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极大好感，对中国朝觐团的访问给予了极热烈友好的款待。

在沙特阿拉伯期间，中沙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沙特对中国朝觐团给予了很高的外交优待。现被称为国父的沙特国王阿卜都拉尔则孜亲自派人在吉达港迎接我们，在整个活动中为我们指定了专门的向导，特别是他在“克尔白”亲自接见了我国全体朝觐人员，带领我们绕行了“克尔白”，还两次接见包尔汉、李恕、金凤山等同志，尤其是7月15日那天，在极其隆重、庄严、肃穆的洗天房[5]典礼上，沙特邀请了各国朝觐团领导人，却破格邀请了中国朝觐团的全体成员，阿卜都拉尔则孜国王还请我团的包尔汉团长一起进天房，受到特殊关照。

朝觐期间，很多国家的哈吉们主动和我们联系，在阿拉法特山上，我们和不少国家的哈吉们在一个帐篷里共同进行朝觐功课，包尔汉团长还在帐篷里发表了演说，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情况，表示了中国人民愿意和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增进了解，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动世界持久和平的愿望。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北非等国家的哈吉们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内容生动的演说，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政治生活以及和平友好的愿望。在密纳山，我团的帐篷成了最活跃、最热闹的地方。

当我们离开沙特时，沙特国王还特意给我们每个人赠送了一块镶有沙特国王阿卜都拉尔则孜像的手表和一套沙特政府高级官员穿戴的白色服装。

在埃及访问爱资哈尔大学时，该校校长阿卜都拉何曼·塔基先生对我们深切地说："中国主张东方属东方人，亚州属亚洲人，而不应该属于西方，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参观解放省时，该省宣传部长介绍情况时说："我们的建设成就是学习中国和苏联的，我们的合作社摆货方法都是学习中国的，我们计划主任正在访问苏联，不久也要访问中国。"在参观亚历山大王宫时，我们遇见了一群埃及的中小学教师，他们热烈鼓掌欢迎我们，其中一位教师对我们说："我要把埃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告诉给学生们，传给后代，永世不忘。"在旅馆里，当出席阿拉伯青年大会的突尼斯代表看到我们后，立即围住我们，纷纷要求和我们合影留念。

当时，埃及及阿拉伯各国人民反英情绪十分强烈，埃及全国男女老少都参加了军事训练。在一次重大会议上，埃及邀请我团参加这一大会，当包尔汉团长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人民和全体穆斯林全力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时，整个会场一片沸腾，他们高呼："人民中国万岁！""亲爱的中国万岁！"等口号，苏丹的一位宗教界人士称赞我国说："中国已经赶走了侵略者，没有帝国主义的统治，就象清真寺一样的纯洁。"

在黎巴嫩期间，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降萨巴牧师见到我们十分热情，他曾到过中国，还写了一本赞扬中国人民的书。他告诉我们："我把我的心放到中国了。"和我们合影后又说："照片比我幸福，因为它同你们可以到中国去。"

在约旦期间，我们见到一位汽车司机在车窗前挂着一张毛泽东主席的像片，他对我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救星。在朝鲜，毛泽东的军队把美国军都打败了，真了不起，中国军队是神兵。"约旦一位叫萨克南的诗人写了一首名叫《诚恳的启示》的诗，对周恩来总理表达了无限崇敬之情，他说："周总理，您在哪里？我在您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离别约旦时，旅馆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两个大西瓜，说这是叙利亚的一位汽车司机路过闻讯

后，特意赠送给我们的，让中国客人品尝解暑，以此表达他的崇敬之情。在从耶路撒冷返回途中，一饭店主坚持要我们品尝他亲手采摘的密枣。后来才知道，这位店主为了让我们吃到密枣，跑了很远的路才采来的。在参观访问期间，我们不论到哪里，那里的人民就献上一片爱心，一片友谊，这种友爱的场面，处处都有，枚不胜举。1955年11月16日，我们结束了4个半月的朝觐、参观、访问活动，平安返京。我们满载着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朝觐活动。

注　解：

①沐浴受戒：朝觐者进入麦加前履行的一项宗教仪式，包括在规定地点沐浴净身，披麻衣，戒修饰，戒房事等，直至朝觐活动结束。

②克尔白：此为阿文的音译，指麦加圣寺内一座方形石殿，中国伊斯兰教称其为天房。古阿拉伯人奉它为神圣之所。

③赛得盖：凡朝觐者自愿向穷人散钱。

④密纳山：麦加附近的一座小山丘，朝觐者必游并夜宿一次。

⑤洗天房：每年由沙特国王亲手洒洗，这是一次隆重的盛典。

第八章　历史知名人物和事件

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

马　青　年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诞生于1936年10月20日。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西征解放同心县后，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从陕北来宁夏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委会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黄镇、杨奇清和我等人组成。

筹备委员会首先拟定了回民自治政府机关负责人人选名单，并请这些同志积极参与《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以便掌握全面情况，为顺利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当时西北的形势，研究讨论了回民自治和抗日救国以及土地等重大问题，起草了回民自治政府的各种决议和文件，拟定了代表大会的全部议程。并于10月初，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通电》。

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

毛主席并转红色中华社、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全国总工会及各省、各县、各团体；土耳其代表、韩德、各地回民教主名流；朱总司令、彭司令员并转第一、二、四方面军、各回民独

立团、回民游击队指战员、全体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回民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剥削与屠杀的痛苦，在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与回奸马鸿逵等统治下，我西北回民所受之一切痛苦更百倍于往昔。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我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得以一旦解除！真正实行了回民的自由。回民自一切苛捐什（杂）税，抽丁派款等完全（废除），不论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相庆更生。这一切的事实，更足以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所主张之民族自决才是全国民族等各少数民族唯一救星。

现在各处最热烈地进行回民自治解放运动的动员，并决定于本月20日召集各地回民代表、回民教主举行豫海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准备讨论西北形势与回民自治与抗日救国各问题，正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今后，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争取豫海回民和整个中国回民之永远解放。目前，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西北之时，我们努力号召西北回民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合全国同胞，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保卫西北，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

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启

《红色中华》报还发布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定于20日在同心城成立》的消息：

“豫旺以西及海原地带的回民区域，现以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窖山及海原城东，新成立完全的回民县，实行了‘民族自决’的口号。于本月20日在同心城开成立大会，广大的回民群众自己选派代表参加。豫旺属两个自治乡政府，也选举代表前往参加。这是回民政府的第一次！是回民解放的先声！”

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和会址确定后，广大群众无比兴奋，积极准备参加庆祝大会，同心城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10月20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是同心回汉族人民永远难

忘的喜庆之日。祖祖辈辈受尽欺压的回族儿女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最幸福的一天，最欢乐的一天。

10月20日这一天，天晴日朗，阳光照耀着连绵起伏的山岭。微风习习，秋日融融。同心清真大寺会场沐浴着灿烂的朝晖。

获得解放的回族人民，穿着节日盛装敲着锣，打着鼓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少白发老人也拄着拐仗前来“跟会”（参加会的意思），就连按世俗不能随便外出见人的回族妇女也搭了盖头走出家门参加庆祝大会。沉睡多年的同心城里，锣鼓喧天，红旗如林，鞭炮噼啪，全城震动。参加庆祝大会的人们欢腾雀跃，川流不息，笑声朗朗，歌声嘹亮。有几首歌曲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地方人人爱，看见么，只有苏区里，人民好自在，一切剥削都打倒，生活好痛快。”这是发自回族人民的肺腑之声，他们边唱边跳，表现了回族人民对苏区的无限热爱和获得自由解放的兴奋之情。

另一首歌曲是：“政权与苏区，代表中国人民打倒汉奸卖国贼，驱逐狗日本。”这首歌曲，当时在同心回民群众中，几乎人人会唱，个个会吟，它表达了回族人民对政权的向往和对汉奸卖国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憎恨。

还有一首：“西北同胞大家赶快起来吧，日本鬼子强占我东北，眼看到西北，打倒小日本，保卫我西北……”。这首歌曲是回民群众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并广为流唱，大大激发了回族人民抗日救国的热忱。

人们迎着金色的朝晖，喊着口号，迈着雄健的步伐，步入会场。会场里站满了人，歌声不息，口号四起，红旗随风飘舞，令人心情激奋。

庄严雄伟的清真大寺，在阳光的映衬下，黄澄澄，金灿灿，更显示出它古老壮观的雄姿。清真寺四周和寺顶屋檐上彩旗迎风招展，怒放异彩，鲜艳夺目，装扮着古老大寺，格外美丽。墙壁

上、大树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在秋阳映照下，熠熠发光。

这些标语口号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回民自己的事情由回民自决，回民独立平等自由！”

“热烈庆祝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

“回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回民抗日军，去救华北穆民！”

“打倒土豪劣绅，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拥护红军！”

“中国共产党万岁！”

“苏维埃政府万岁！”

“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

“回汉两大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蒋贼救西北，打日本救中国，打土豪救穷人！”

大约九时许，庆祝大会正式开幕。

回族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和红军代表、回民独立师以及其它有关方面的代表以及各界人士在主席台就座。当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李富春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里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来自各界的人士和代表向大会赠送了贺词、锦幛、匾额和其它礼品，以表示热烈祝贺回民自治政权的诞生。

紧接着，马和福同志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到主席台的最前面，庄重宣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他的话音刚落，会场里群情激奋，兴高彩烈，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震耳欲聋。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热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和福同志精神振奋，掌声平息后，他以铿锵有力的声调继续讲：“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援助下，我们回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掌声），我们要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争取豫海回民、整

个中国回民之永远解放（掌声）。我们坚决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同全国同胞联合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保卫家乡，保卫西北，驱逐日寇出中国，为我中华民族的自由，战斗到底！”他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掌声。

庆祝大会结束后，来自各方的代表济济于清真大寺举行会议，会议共开了3天时间。代表们怀着满腔热忱，讨论了当前西北的形势和回民自治、土地问题以及抗日救国等重大事项。一致通过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关于《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决议案。

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领导人：主席马和福（回），副主席（若干），下设文化宣传委员、粮食没收委员、保卫委员、财政委员。

我作为红军和回民独立师代表被选为政府军事部长。

在会上还决定从政府成立之日起，启用刻有党徽和阿文、汉文两种字样的政府印章。

为庆祝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的召开，在大会举行期间，红15军团星火剧社为群众和代表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这些节目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赶编的新剧，内容政治性强，形式多样，很受鼓舞。有些节目在观众们再三鼓掌下反复表演，犹如欢度盛大的节日。大街上，清真大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整个同心城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为了庆祝回民自治政府成立，21、22日星火剧社表演了两天新剧。21日又逢集，又演戏，人山人海，真是热闹非凡。剧社的东北回民和（西北）回民再不受压迫，尤其是一幕哑剧“五常抽血工厂”，观众都说：“啊呀，日本鬼子真不得了！”戏演完了，群众还不愿意走，要求再演唱。

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及时报道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代表大会》盛况：

"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一个庞大的清真寺里开幕了。四个区的代表有100余人，各界送匾有10多幅。在3天的会议中，通过了回民政府的一切决议案。全同心城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到22日会议圆满结束。"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保密，以利开展工作，这篇报道中没有报道大会主要内容和暴露政府领导人员名单。但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同心县城的热烈欢腾景象和回民群众群情激奋、喜气洋洋的动人场面。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辖八个巩固区：

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和豫旺堡。

四个游击区：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地区。总面积约22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余。

为了便于工作，自治政府设在王家团庄北堡子内。不久，陕甘宁省委派了一名从中央党校毕业的红军干部学员贺恩宽（现名贺旭东，任广东铁路局政治部主任）担任县委书记，韩民栋任少共书记，加强了党对自治政府工作的领导。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县一级回民自治政府，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民聚居地区的最初尝试，是我党我军在抗日前进道路上又扩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是为保卫西北、华北，进而保卫全中国而联合的一部分民族力量，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在广大回汉人民的心田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使豫海这个偏僻山区的回汉人民，看到了中国还有一个代表回汉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为解放中华民族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红军队伍。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诞生，给同心的广大回汉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使他们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进一步认识

到，只有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驱逐日寇出中国，才能求得民族的真正解放。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从筹备到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为“造成西北革命的伟大新局面，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做了大量工作：

一、组织回民解放会，建立地方武装。

根据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建立回民解放会”的决定，组织回民自己的游击队和“回民解放会”，保卫新生的自治政权。

一是组织了有40多名以马和福同志为队长的县回民游击大队，这支游击队很有战斗力，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以后红军转移离开同心后，还坚持打游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他们的协助下，豫旺、同心等地区也先后组织了近10个游击队，其基本任务是：1.保卫新生政权，消灭土匪，防止敌人破坏；2.掩护群众打土豪，镇压反革命；3.帮助正规军扰乱和牵制敌军；4.担任警戒、放哨、抬担架；5.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二是在唐天际、王柏栋指导下，组织了抗日江湖救国游击队，争取哥老会。这个游击队一部分为哥老会成员，但回汉基本群众和窑山煤矿工人占大多数，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余人。军事方面由我负责，王柏栋任政治委员，马振龙担任总指挥（窑山煤矿工人，50多岁），郑希武担任参谋长（窑山煤矿的帐房师爷，窑山人），基层干部一部分是从红1军团和15军团派来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争取哥老会（当时敌人也在争），改变哥老会对红军的敌对情绪，造成抗日救国的声势，帮助正规军扰乱和牵制敌人。因战争环境，红军转移撤离同心后，游击队虽然有的人回家了，有的逃跑了，但也保留了一些骨干，归回民独立师后编入红15军团。

二、动员人力物力，保障红军供给。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从成立之日起，粮秣委员就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当时主要是组织回民群众收割红军解放同心时逃跑地主的庄稼，刨挖逃亡地主的粮仓和财产（当时豫海地区逃亡地主近百户，以后经过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回来一部分），我记得豫旺堡以东杨家园子的杨廷栋、杨廷杰潜逃后，在他家堡子里就挖出银元3万多块，粮食数千担。其次是发动富裕户捐献欢迎粮、拥军款、支前物，总共筹集粮食6万余斤，银元八万多块，大烟土一万多两，二毛皮1000多件。换回棉花1000多斤，布匹2000多匹，保障了红军供给。

三、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巩固区。

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成立后第五天，马和福同志就拿着宣传部长黄镇草拟的、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修改后的《告北圈子四周的同胞书》（今下流水乡），亲自到北圈子、海原兴仁等偏僻地区宣传发动群众，使这里的回民群众深受教育，震动很大，主动接受政府领导，并响应政府号召，捐粮捐款，支援红军。

四、废除苛捐杂税，繁荣市场贸易。

红军西征胜利占领同心城时，不少群众和商人逃跑了，店门关闭，停止营业，街上冷冷落落。经过部队努力工作，广泛宣传，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号召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恢复集市，逃跑的群众和商人很快都回来了，店铺也开门营业了。人们把自己生产剩余的农副产品拿到集市，换回自己所需的用品。很快，同心市场繁荣，买卖兴隆，一派欢乐景象。

五、召开军民联欢会，回民红军一家人。

红军在同心驻扎期间，经常在红城水王华门、豫旺城内、王家堡子、吊堡子、下马关和同心城召开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庆祝自己的解放，感谢亲人红军为解放回族人民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深情。1936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同心县解放三个月之久，

军民建立了鱼水情，乡领导带领各户户主拿上月饼、西瓜慰问红军，和红军一起欢度中秋佳节，红军还为群众表演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豫旺一次联欢会上，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也参加、采访了联欢会，从此，斯诺在豫旺地区生活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豫旺这个名字，把同心回民的风俗和回民红军的深厚情谊，真实地记入了他的杰作《西行漫记》，传到了全中国、全世界。

豫旺南原王家堡子召开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会上，斯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诸位英勇的同志们，在你们热烈的欢迎中，我万分激昂和荣幸。在你们的伟大胜利中，现在二、四方面军又很快地同你们会合了，你们的前途是无限的开展着（全体鼓掌）。"

"我今天替你们红军拍摄的活动照片，我将带到世界上去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的人——广大的劳动大众，尤其是你们的同志兴奋鼓舞。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几条消息：

（1）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奋斗，如西班牙、比利时。

（2）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到处在罢工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进展之下，使你们更加兴奋，斗争更加坚决。

日本侵略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动，来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

最后，你们应努力把中国的革命模范（地）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

我们高呼：

中国革命万岁！

红军胜利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斯诺这个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回民群众和红军战士。当时驻在杨家堡子的红军战士把这个讲话用墨笔写在墙壁上，一直保存到文化革命中期。

六、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会合。

1936年10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出腊子口向甘南进军。党中央命令我西征红军前往甘肃静宁、会宁一带迎接。徐海东军团长亲自带领一个骑兵团去会宁迎接。在此期间，自治政府广泛宣传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重大意义，发动回民群众，除了筹备粮食外，还有500多件皮背心和干衣，三四千双鞋，一万多只羊牛，保证了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西征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帮助回民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其主要原因：一是党的民族“自决”政策的无比英明正确，经过红军的广泛宣传，被广大回族人民所接受、所拥护。二是我们有一支铁的纪律和随时随地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红军队伍。这两条在当时发动群众和联系少数民族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豫海苏区的开辟和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虽然只存在了8个多月的时间，但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12月13日，红军撤离同心后，自治政府遭到马鸿逵反动派的破坏，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坚持同敌人斗争，直到马和福主席遇难后才中断。但是，她在我国回族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面鲜艳的旗帜，将永远飘扬在同心回汉人民的心中，鼓舞着人们奋勇前进。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诞生

田　忠　诚

1954年5月以前，我在中共乌鲁木齐地委组织部做干部管理工作。这年5月，我奉命随禹占林、刘坚两位领导同志参加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筹建工作。7月15日，自治州正式成立，我又留在州上，并且一直工作到今天。为了给编修地方志提供一点资料，现把筹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经过简要地记下来，以供参考。①

建立筹委会

全国解放之初，党中央和新疆分局就很重视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1953年秋，在鄯善东巴扎回族聚居乡进行区域自治的试点，1954年3月成立了焉耆回族自治县，接着又着手筹建昌吉自治州的工作。当时在属于乌鲁木齐专区的12个县（即乌鲁木齐、玛纳斯、呼图壁、昌吉、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木垒、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中，都有回族人民聚居，其中乌鲁木齐、米泉、昌吉三县的回族尤多，分别占该地总人口的30％以上。经过酝酿，报请中央批准后，决定在这三个县建立回族自治州。

新疆分局决定成立回族自治州筹委会，并且派分局统战部长回族干部禹占林和中共乌鲁木齐地委副书记刘坚为首组建筹备班子。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是从乌鲁木齐地委机关和专署各机关中抽调的。1954年5月，回族自治州的筹建工作开始了。

培养提拔民族干部

建立以回族为主体的自治州，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本地民族干部。干部从哪里来呢？当时的地委书记张世功、组织部长张稼夫和米泉县委书记李嘉玉等都非常重视培养、提拔当地的回族干部，如现任副州长的马品江同志，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马桂珍同志，原任州畜牧局副局长的祁成君同志，曾任米泉县长和州外贸局长的沈子和同志，曾任州委统战部长的冶诚灵同志，曾任米泉县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副市长的杨海臣等同志就是从米泉培养、提拔起来的。当时地委组织部长张稼夫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刻苦学习，他写的总结报告，有骨头有肉，令人佩服。他作为组织部长，还有提拔干部不拘一格，“知人善任”的好作风。一次，米泉县委报来要把马邀邦由行政村长提拔为县民政科长的报批材料，当时组织部内有人认为这样提拔太快了。张稼夫部长当场就说：“党的事业发展得这样快，不提拔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怎么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马邀邦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后被提升为自治州法院副院长。

1954年，张稼夫调到可可托海矿区任党委书记去了，地委组织部长由李嘉玉接任。他新上任时正值托克逊县召开建国后的第一次人代会，为了考察了解干部情况，他派我去托克逊县，还亲自替我开了介绍信，信上写着要我参加县委会议。当时我还是个新党员，要我参加县委会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所以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时托克逊县委书记李尚官，在他亲自主持的县委会议上，提议由铁木尔·达瓦买提任县长，并且对候选人作了详细介绍和说明。由于事先思想工作做得细，所以人代会的选举也进行得很顺利，铁木尔·达瓦尔提同志当选为县长。

“昌吉回族自治州”名称

由三个县组成的回族自治州，名称怎么叫曾有过一番争论。有人认为：既然是由三个县组成的，所以就应叫“乌、米、昌回族自治区”。有的则主张：既然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是昌吉，还是叫“昌吉回族自治区”好。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后者，并且经上级批准后，就正式定名为“昌吉回族自治区”了（编者按：1956年根据《宪法》规定，将昌吉回族自治区改为昌吉回族自治州）。

自治州的党政领导机关所在地，选定原昌吉县南端的戈壁滩上，这里东临头屯河，周围是农村田园，环境优美，地处乌鲁木齐至伊犁公路之间，交通非常便利。当时自治州机关进行基建时把党委和政府的两个大院的办公室联成一体，体现出回族自治州的特点。具体摆布是：政府在南，党委在北，在正方形的建筑群中四个拐角都不接连，是各部、委、科、室的办公地点；中间一栋较大的房子为州一级领导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这样，建筑群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回”字画面。另外又在州政府的南边建立了一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在当时来说还算是一个较大的建筑物呢，它既可开会，又能放映电影和演出节目。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大会和以后的重大节日活动都在这个会议室里举行。

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诞生

1954年7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批准召开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届一次人代会，正式宣告昌吉回族自治州诞生。会议期间酝酿州政府负责人的人选时，需要去乌鲁木齐地委组织部取回有关干部的档案，当时是我搭了便车去取的。返回时，我和张世功书记搭乘了一新的小卧车，此时才发现前边坐的是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文件。

自治州一届一次人代会选举禹占林为州长，尕文祥、史洛夫等为副州长。

注　解

①：昌吉回族自治州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的南缘，行政区划面积9.2万平方公里，占全疆面积的5.28%。现辖昌吉市和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米泉、呼图壁、玛纳斯七县，全州人口116万（1984年统计）其中回族约13万人，占全州人口的11.18%，占全疆回族的20%。

爱国民主人士马辅臣

汪　溶

马辅臣是解放前西北地区数得着的工商界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一名爱国的进步人士。他原名马佐，字辅臣。马辅臣于1897年生于甘肃省临夏乩藏大庄，与马步芳家族同里，而且有近亲之交。清同治年间河州地区回族起义首领之一的马海晏是他的外祖父，他的舅父马麒，后官居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和他是姑表弟兄，原马步芳所属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他的族侄。

他生在穷乡僻壤，父亲原是忠厚朴实的农民，一家数口耕种10多亩薄田度日。马辅臣家境本不富裕，又遭幼年丧母之痛。继母为人严厉刻薄，对他及其同母弟马侯臣另眼相看。由于家庭不和，生活困难，他到十三四岁就赶上一头毛驴离开家乡，往来于甘南拉卜楞与河州之间，有时替人驮运货物，有时贩运布匹茶叶，开始了经商生意。解放前甘青地区将这种行业叫“驮脚”，把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叫“脚户”，或“脚户哥”。在那个时代，一个

穷脚户要想发大财成大事那简直是黄粱美梦，难于上青天，所以当时他只知道生活的重担压在肩上，在谋生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奔忙着。

1912年（民国元年），马麒晋升为西宁总兵，数年后又改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等要职，掌握了青海军政大权。马麒当时以兴办地方实业为名，包揽青海盐务，即要其外甥马辅臣经办。从此马辅臣结束了自己独自跑商的生涯，开始投身到地方官商势力之中。他以茶卡盐场为中心，包揽产、运、销业务，并在湟源、西宁等处开设盐店，沿途设立督运站、查验卡，承包湟源盐局盐税，将青海所有盐的开采、运销、征税等业务统由他独家经营，成了当时西北最大的盐商。1918年马辅臣又担任了马麒所统率的宁海军矿务营管带（营长），直接掌握一支武装力量，往来于各处金场、盐场，稽查关卡税务，人称之为矿务大人。

之后，马辅臣家庭境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了富豪巨户。辅臣弟兄共有6人，二弟叫马侯臣，被称为矿务二大人，三弟夭折，四弟马玉臣，五弟马世臣，六弟马俊臣。其二弟精通阿文，一般称尕阿訇，是马果园的十大弟子之一，解放前曾当过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五弟马世臣曾任过甘肃省和政县县长，时间不长辞去官职，后来也跻身于工商界，筹办建兰公司，成为主要经纪人，其它两个也都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甘青地区。第二年宁海军被国民军改编，马辅臣任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9军26师骑兵第9旅17团团长。中原战事爆发不久，马辅臣所部奉令由青海开出，辗转于察、绥一带，1928年冯部失败后返回。这时青海已建省，马麒接任青海省主席，马辅臣仍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协助马家办矿务、盐务。那时青海的铝、锌、锡等矿藏没有大量开采冶炼的能力，工商业以羊毛、皮革、药材、青盐等为主。马辅臣由于有官方支持，打着官方旗号，所以有人称他为“官商”。那时办盐务

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盐场附近的少数民族人民多半从事牧业，他们最需要的青稞必须从西宁和农业区运进。广大牧民将青盐用牦牛、骆驼或马骡源源不断地驮至西宁，盐商用一升青稞可换进一升青盐，看起来是等价交换，其实粮价收进时压得低，这样青盐收进的价不高，但出售的价随便提高，一进一出，牟取大量利润。马辅臣就这样一天天发起来了，生意商号远至京津，一时钱多位尊，名闻西北。1937年担任青海榷运局局长后，他与盐池订立合同，自备大车200辆，承揽茶卡盐池到各岸仓、常平仓以及由西宁到兰州的官盐转运全部业务。专运专卖，排挤了不少资金少、又无政治背景的小户盐商。

马辅臣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金之后，逐渐与马家脱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在西宁周家泉设骆驼场、货场，将茶叶、布匹、青稞运往牧区，又将牧区的货物运到西宁，再由西宁运往省外，骆驼跑河套远到包头，在天津开设了德义恒商栈，将大宗的羊毛、皮货等运往天津等大码头和港口向外商销售。在西北，火柴、木材是他经营的重要项目。1940年之后他在兰州又开办了汽车厂，主要跑甘、凉、西宁一带，搞短途运输。后来还在临夏筹办了一个发电厂。到40年代，马辅臣已拥有百万家财，除拥有几座工厂、10多部汽车外，还有好几处田庄和几百亩良田，以及成群的牦牛和骆驼。当时甘青两省的百姓说："马步芳的权，马矿务的钱。"据估计解放前他在工商业方面的流动资金达100万元（银币），加上房产、土地、磨房及其它家产，总计约在150万元（银币）以上。

马矿务虽然与马家两主席是至亲，但他在政治上并没有掌上大权，军队上也为时短暂。据说马步芳在财政上发生困难时，常向矿务借贷，借后装作不知，若无其事，不愿偿还，而马辅臣也不敢索债要钱。马步芳地方官僚资本兴起后，二马之间关系便开始发生裂痕和矛盾。1937年马步芳暗中指使他的部队在日月山抢

夺了马矿务由西藏运货回来的牦牛帮和车辆，四五百辆木车和货物全部抢夺一空。1943年马矿务由临夏来西宁，马带他到乐家湾兵营参观，集合军队将他抬举了一番，并宣称：矿务来慰劳大家，慰劳品是军装和银元。事后便将马辅臣从西藏运来的黄卡几布据为己有，做成军装发给士兵，接着又派人向他索要劳军银元。马辅臣有口难言，只得如数奉进。

马步芳独揽青海军政大权后，特别是成立德兴海商号及湟中实业有限公司后，开始在工商业方面配备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多方面打击马辅臣在工商业方面的地位。马辅臣自知难以对付，于是在许多方面作了让步，工商活动的重心开始逐步转向甘肃的兰州、临夏地区及其它省市。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长征到了甘肃地界。当时他听信说“红军要杀回灭教，要活埋地主、资本家”等谣言，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巨大利益和财产，曾多次向马步芳要求要招兵买马，成立一个骑兵旅，想自任旅长。但马步芳对他仍有戒备，怕他在青海军界得势，虽口头答应，实际上反对，仅以“国事要紧，私事暂缓”为理由，让他挂上某团副团长军衔参加河西阻击红军的战役，战事之后仍操旧业。

马辅臣受马步芳排挤后大部分时间都避居临夏老家，其间他曾捐资在临夏堡子修建了完全小学一所。先后在西宁、湟源、临夏等地为穆斯林修建清真寺六七座之多，并在交通不便之地花钱修筑短距离公路，架设小型桥梁，这些当时都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好评。

抗日战争期间，马辅臣曾先后两次去阿拉伯麦加朝觐，最后一次还携带妻子、儿子一同去游览伊斯兰教的发祥地。他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两次出国朝觐，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对新鲜事物有了接触，思想由保守转向开朗。这一阶段他的商运事业最为隆盛，远及西藏、印度，外货运进后内销，地方特产运

出去外销，羊毛等在天津卖给外商，运往英美。

1949年秋季，蒋家王朝已气息奄奄，蒋军已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乘胜追敌，向西北大进军。马步芳看到大势已去，就在兰州失守时从西宁带少数亲信和眷属乘机仓惶外逃。这时马辅臣也携眷避至湟中上五庄。及至一野一兵团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率部经甘肃永靖、青海民和沿山路先取西宁，一兵团余部经临夏西乡进循化，再渡黄河西上时，西宁商会和地方绅士组成临时维持会，推选马辅臣、张昌荣、马子信、祁昌善等人组成代表团，赴循化迎接解放军，回到西宁后又向王震司令员及军首长详细介绍了青海地势及散兵活动情况。

青海解放不久，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这时马辅臣按照王震司令员的指示，曾写信给族侄马呈祥，劝其迷途知返，和平起义。同时有关方面还组织马辅臣、马振武（马步芳二姐夫马驯之子，曾任82军190师师长，兰州失败后，逃至湟源三角城集结残部，向解放军投诚）、马全钦（曾任宁马旅长、人称“尕旅长”）等多人为使团，随同解放军赴新疆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为争取骑五军中的青海官兵做了不少工作。从新疆回青后，他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充分信任。1950年马辅臣被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工商业部副部长，后又调到青海担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作为一个开明的资本家，在解放初期，他还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在那一阶段他在临夏投资兴办了发电厂、糖厂、养蜂厂，电厂公私合营后成为临夏地区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临夏人民的照明用电和工业用电，解决了不少困难。

1953年之后他担任青海省副省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任职期间，他工作认真负责，生活俭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为青海各民族的团结和爱国统一战线的

发展，为青海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好评。

十年动乱开始后，马辅臣被扣上“反动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帽子。1968年农历十二月初八因病逝世。“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为马辅臣同志平反，恢复了名誉。马辅臣同志的爱国进步事迹和他的生平事迹才得以彰明于世。

“和平老人”郭南浦

师　纶

郭南浦，名福金，字南浦，回族。祖籍陕西渭南，同治九年（1870年）迁徙于化平（今宁夏泾源县）。南浦先生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幼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然奋力求学，终考举为清末一秀才，并继承祖父之业，攻习中医。后由化平到固原行医，与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沙沟门宦教主马元章相识。他到兰州定居行医后，马元章让他任兰州地区的“热依斯”（即教长）。

民国之初，南浦先生以行医治病常与甘肃军政上层人物交往，曾历任甘肃省政府顾问、印花处处长、参议、国大代表、第八战区长官部顾问、西北行营参议等职务。他曾经商，获利后转而资助伊斯兰教事业和地方教育事业。因此，郭南浦先生在西北政界和伊斯兰教界有一定的威望，也是著名的老中医。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曾当面劝诱马震武和南浦先生出走，遭到他们的婉言谢绝。同年8月26日

兰州解放后，我军对武力解放宁夏有绝对把握，但为了免除地方人民的损失，力求和平解决问题，决定物色向宁夏国民党当局通报此消息的人选，南浦先生乃欣然应命而去。他对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说："我与宁夏马家虽不同姓，但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族之情谊和为国为民之宗旨转告他们。"这时南浦先生已 80 岁， 19兵团首长担心他年事已高，不便长途跋涉。他却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马之智可用也。"表达了他愿为和平奔走、造福地方的坚定信心。

在19兵团联络部的组织下，以郭南浦为首的 9 人赴宁和平代表团组成，他们是郭南浦、马守礼、马季康、白连升、吴鸿业、马凤图、马元凤、马忠汉、马宏道。19兵团联络部甄华部长说："你们此次之行，如宁夏方面能立即表示和意则更好；如不愿和谈，但兵临城下，大势所急，他们总会被迫求和的。不论何时，只要他们有诚意和谈，你们便一面以郭南浦名义给兰州彭副总司令去电报，一面到前线和我军联系。"甄华为了代表团的安全，还派联络部干部林一生（徐飞）、吴天雄、阳光等人和 5 名战士护送。为免除对方误会，代表团雇用一商家汽车，于 9 月 6 日从兰州出发，途径华家岭、静宁、隆德、瓦亭、固原等地。

13日，在同心县马家河湾，代表团与向宁夏进军的19兵团64军和刚从银川出来的孟宝山先生相遇。孟原为宁夏马鸿逵部的交通处少将处长。一个月前，孟受甄华部长之委派，由西安到银川做宁夏马鸿宾和马鸿逵的和平劝说工作，但未收效。64军曾思玉军长听取孟的汇报后，决定代表团与孟再进宁继续做和平的劝说工作。于是，他们穿过火线，当夜11时抵达银川，由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接待，住在招待所。

这时，马鸿逵已被蒋介石召到重庆，宁夏的军政大权由他的次子马敦静掌握。马敦静始终不跟代表团见面，并派人监视其活动，扬言："我是看在阿爷、阿大的面子上，不然的话，我叫他（指

南浦）白胡子变成红胡子！”

15日下午，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马鸿宾到招待所见代表团。他对代表团说：“自从兰州解放以来，我们始终摆出和平姿态。你们是讲和平的代表，未曾到宁夏，就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不平咋能和哩？”南浦先生答：“我们在路上因为下雨耽误了时间，虽是和谈，但还没有停战，所以双方接火也是正常的。”经过解释，双方交谈进入实质性谈判。马鸿宾表示，宁夏的事，权在马敦静手中，他无能为力，他只能负责81军的起义问题。于是，马鸿宾一方面与其子马惇靖（81军军长）电话联系，一方面派汽车送代表团返回中宁。当晚，孟宝山与代表团的马季康、白连升、马守礼4人冒雨抵达中宁县，向64军曾军长汇报了上述情况。于是，19兵团与81军几经磋商，终在9月19日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国民党81军宣布正式起义。

马敦静见大势已去，亦于9月19日晨偷乘国民党代理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飞机逃往重庆。其宁夏兵团三军将领当日在吴忠堡仁存渡口秘密集会，商定由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向解放军通电求和。但通电尚未发出，宁夏兵团主力128军竟在金灵地区掘渠放水，妄图负隅顽抗。19兵团于19日11时发起进攻，全歼128军，俘敌官兵7000多人，解放了金积、吴忠。9月23日，19兵团某部进军银川，宁夏正式宣告解放。

19兵团杨得志、李志民两位首长为了表彰南浦先生在解放宁夏中所做出的功绩，特赠他一面绣有“和平老人”四个大字的锦旗。

解放后，南浦先生历任甘肃省人大代表、省政府委员、省政协常委，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因“左”的影响，南浦先生在1958年反宗教封建特权斗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于同年9月19日含冤而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省民委为南浦先生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时任我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于1986

年亲笔题词："南浦老人赤子心，宁夏解放建功勋"。省政协、省委统战部于1987年9月23日举行了"纪念郭福金先生座谈会"，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平勇士王莲如

赵 长 明

五十年代初期，在全国广为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王大妈要和平》。这首歌，热情洋溢地颂扬了一位为了实现世界和平而"东奔西跑"的"王大妈"。这位"王大妈"就是当时西安市第四区（今新城区的一部分）尚德路30号的女穆斯林王莲如。

王莲如的老家在前热河省。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热河，王莲如同她的丈夫受尽欺凌，怀着满腔愤懑离乡背井，辗转流落西安，开了个修理车子的小铺，勉强维持生活。

饱尝旧社会之苦，才深感新社会之甜。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王莲如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投身街巷工作，被选为第四区妇联副主任和第九居民小组的组长。她热心替群众办事，关心群众胜于自己，大雨天帮助邻里排水，寒冬腊月替贫苦居民缝制棉衣，深受街巷群众的赞誉和拥护。

1950年，全国开展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时，王莲如回想过去沦陷区人民遭受日军欺压之苦，忘寝废餐地上街宣传，征集签名。她不识字，便约了同区一个识字的妇女代表史彩萍一道开展工作。从5月间开始，她们除动员自己组内的居民签名外，还去住地附近的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征集签

名。7月27日上午，西北民主妇联筹委会召开西安市各界妇女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大会，王莲如在发言中高呼："让战争贩子们看看我们爱好和平人们的力量吧，他们想发动战争没有那么如意！"表示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日下午，她便紧张地行动起来。当时，许多群众不懂得和平签名的意义，征集签名要费很大的劲。例如，尚德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就说："我这么大年纪，快死了，一个女人家签名能顶啥？"不但自己不签名，还阻止儿媳妇签名。王莲如耐心地给她讲："中国的妇女在反动派时代，只知道吃男人的，穿男人的，被人轻视，糊里糊涂地过日子。现在毛主席解放了我们，妇女已翻了身，能独立自主了，如有开火车的，开拖拉机的等。但美帝国主义者又想发动战争，来摧毁我们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反对它。"这位老太太被感动得不仅自己签了名，而且动员家里其他6口人也签了名。这样，仅数小时的时间，她们就征集到361人签了名，此后，王莲如和史彩苹每日早晨6点半便上街征集签名，不顾酷暑与饥渴，一直忙到晚上。截止7月底，她们共征集签名2520人，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王莲如"和平勇士"的光荣称号。1950年8月28日《群众日报》以"和平勇士王莲如老太太"为题，报导了王莲如的事迹，同时配发了她在街头征集签名的照片。

抗美援朝战争伊始，王莲如做了八个慰问袋，装着自己购买的茶杯、牙刷捐送往前线。美帝飞机狂轰滥炸，使朝鲜和平居民陷于苦难之中。王莲如除捐献了自己节省下来的四袋面粉外，并积极向群众募捐，支援朝鲜人民。美帝单独对日媾和的消息传来，她以极大的义愤约了街巷好友，采用秧歌队、开会和登门走访等方式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1952年，王莲如参加了取缔妓院的活动，被派到专门收容妓女的生产教养院当大队长。她待从苦难深渊中跳出来的学员亲如姊妹，手把手地教她们劳动生产，先后为被服厂絮了3000套棉军

衣，钉了2万套军衣扣子，做了4000双军袜。天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亟需棉帽，她便冒雨带着学员赶往工厂给最可爱的人做棉帽。亚州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开幕后，她欢欣鼓舞地进行宣传，并给学员们讲："积极支援咱们的志愿军就是给和平会议的献礼！"组织学员很快地给志愿军做了8000双袜子。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军服生产任务，她动员学员："大家把活做好，免得穿上不牢固，耽误战士杀敌的大事。"学员们一致反映："王大队长领导得真好！"1952年10月25日出版的第34期《西北画报》，以"和平勇士王莲如"为题，用23幅连环画表彰王莲如；文艺工作者也以她的先进事迹创作了《王大妈要和平》这首为人们喜爱的歌曲。

王莲如热爱和平的行动，受到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先后选她为区人民代表和妇联副主任，西安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民委委员。1954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国庆节在怀仁堂还亲切地接见了王莲如。

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回族妇女，10年浩劫中竟被诬蔑为修正主义，遭到人身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才为王莲如昭雪了不白之冤。

1987年4月5日，王莲如老太太因病逝世，享年84岁。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赴青海的回忆

马　丕　烈

1984年7月，我到新疆见到了阔别35年的老首长王恩茂同志。王对我说："马老，解放青海时，你我都还年轻。记得那时你的

一个侄儿扼守黄河，你主动提出给他写信，劝他不要抵抗。后来，你的侄儿果然撤退了，解放军得以顺利渡河，解放了青海。你为解放青海做了有益的工作，立了功，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老首长的一席话，使我热泪盈眶，35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949年8月22日，解放军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率主力部队解放了甘肃省临夏县城。3天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妻儿老小从乡下回到县城家中。见家中院内虽住满了解放军，但一切物品的安放如旧。一位住在楼上的参谋长热情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们正在找你呢？”他用电话告诉王司令员说：“我们的房东回来了。”我当时心里很不踏实，一边喝茶，一边预卜着自己的前途：“我和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年前还当过82军的少将副官长，以后又当过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去南京开过会……”正想着，一位解放军干部说：“马先生，王司令员派我来接你。”

司令部设在临夏的“东公馆”。当我到司令部时，王司令员很客气地对我说：“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看法？”我当即答道：“很及时，很好。完全拥护，欢迎。”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王司令员竟如此称呼我，所以答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但也表达了我对解放军的敬佩之情。

待镇静下来后，我说：“韩起功在临夏抓壮丁，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青年都被抓去当了炮灰。老百姓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日子难过得很，现在解放军来了，临夏回汉人民得到解放，这是大好事！”

王司令员说：“你是民主开明人士，我在西安时就知道你。”他怕我听不懂，又举例说：“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就是一位民主开明人士，他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很高。”

王司令员的一席话，使我心里更踏实了。接着，他让我看了

墙上贴着的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约法八章”，并边念边解释。之后，他说：“现在解放兰州的战斗已经打响，马步芳的100师师长谭成祥的部队守东岗镇，马振武的部队守沈家岭、狗娃山一带，马继援的司令部设在庙滩子……”

说起马继援，王司令员惋惜地说：“他还年轻，听说对士兵也不错，他为什么要替蒋介石卖命呢？”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丕烈先生，你可不可以去兰州给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再打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呢！你与他有亲戚关系（马继援是我的外孙），你考虑能不能去兰州做做工作？”我当即爽快地说：“很好，能去。”

王司令员很关心地问：“你去后，他会不会为难你？”

我很有把握地回答：“我认为不会。即使是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人身上，没关系，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第二天，我去见王司令。他说：“兰州正打得激烈，恐怕你过不去。我们再看看情况，然后定行止。”当晚11时左右，参谋长又派人通知我说，王司令有事要我去。去后，王司令高兴地说：“丕烈先生，兰州已解放。马继援已由永登跑到河西走廊去了，兰州不需再去了。”他又问我说：“丕烈先生，你能同我们一起去解放青海吗？”我立即回答：“过去我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次日，我向王司令推荐马良同去青海①。因马良是马步芳的叔父，可以发挥作用。还建议选上两位汉族代表同去，以做好回汉族工作。此建议，均被王司令采纳。

离开司令部，我去前河沿学校参加欢迎会。刚出大门，遇见我的族弟马朝庸，他是带着马全钦的意思专门来找我的。他急忙说：“马全钦已经逃过黄河了，现在官亭。他听说你欢迎解放军，让我来问问你，他该怎么办。”于是，我又返回司令部请示。王

司令说："马全钦来临夏，已赶不上了。明天我们就去青海，你告诉他，我们循化见。"我立即将王司令的话转告了马朝庸。第三天，马全钦到循化见了王司令，并高兴地回到家中。

当日下午，由我和马良以及徐季直、祁子厚两位汉族代表组成的赴青海和平代表团宣告成立②。王司令通知参谋处写好路条后，突然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两个，一个已在兰州大学附中毕业，另一个还小。"王司令员说："我保他去北京大学继续念书好不好？"我高兴地说："那很好，好得很。"

我们刚聊了几句，参谋处干部就送来我们一行去青海的路证和保送我儿子去北京大学的介绍信，以及去京的50元路费，全交给了我。

第二天，我们分乘两辆小车和王司令同去循化。路坎坷不平，越过大力架山，来到罗家庄时天已黑了，我们就在附近一个撒拉族老汉家里住了一夜。

次日，我们到距循化还有10华里的石巷时遇到了一条约十几丈宽的深沟，木桥已被韩起功在撤退时烧毁了，部队正在抢修，汽车无法通过。王司令向跟前的部队要了两匹马，叫我和他骑上，绕深沟，抄小路，继续往循化方向赶路。我们过了石巷，走进了一个荒凉大滩，一小时内不见人烟。

我边走边想，王司令过这样的大荒滩连一个警卫员也不带，真不愧是一个有识有胆的好将军！我还想，王司令对我如此信任，对我毫无戒备之心，也不把我当外人看，实在令人感动！

我们通过大荒滩，穿过循化城，来到了一个叫草滩坝的庄子，见到了王恩茂同志。他向王司令汇报了黄河对岸敌军的防线情况："对岸马家部队和民团已经挖好战壕，准备抵抗，指挥官是马全义……。"

当我听到马全义名字时，心里一动，说："马全义是我的侄儿子，对我还尊重，可以写信叫他不要阻止解放军前进。"王司

令同意后，我立即动笔写信。大意是：解放军纪律严明，进入临夏后一枪未放，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各清真寺、拱北都受到了保护，士兵连百姓家的上房都不进。最后写到“吾侄见信后千万莫阻止大军，立即放弃阵地撤退，弃暗投明，不要让各族子弟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因马良与马全义有亲戚关系，也请马良按了手印。我们在当地找了一撒拉族水手，因水把信送到对岸马全义手中。

夜深人静，我还向对岸敌军喊话，劝他们不要阻挡解放军西进。

第二天，黄河对岸的敌军全撤了。

王司令高兴地告诉我：“敌军已全撤退了，我们正在搭浮桥。”我说：“浮桥至少一两天才搭好，让我先过去，争取时间劝说马步芳官兵投诚。”他问我怎么过河，我说：“这儿附近有个车汉大寺庄，以前我在那里办过木料，他们可以用木料把我送过去。我还想让马良和两个军代表同去。”王司令同意后，遂派卢德和李骥参谋与我同行。我们走后，徐季直和祁子厚2人便返回临夏去了。

当日，我们4人来到车汉大寺，找到熟人比西勒阿訇。我叫他找两个水手，绑好木排，把我们送过了河。在阿华庄又找了熟人者麻力，由他找4匹马，我们骑上跑40里，来到了化隆县城。我让朋友马炳安把群众召集起来，将临夏、循化解放的情况以及循化县吉福祥大商号的马瑞斋当了县长的事全向大家讲了。群众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就安心了。

我们在化隆县城吃饭后，即向西宁进发。走出约30余里，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马辅臣、沈海珊、马子乾等20多人，全是西宁市的绅士。他们说是来欢迎解放军的，我说：“大军正在过黄河，今天还到不了。和我们一块来了两个军代表，你们赶紧欢迎去。”他们立即请军代表上卡车，向西宁开去。

当晚10点多，我们到了西宁。

汽车直接开进了省政府，只见院内乱七八糟，破坏十分严重，甚至连椅子上的座垫也被人偷走。因此，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便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市内极混乱，到处发生抢劫事件。我急忙派人找来了国民党西宁市警察局的督察长，对他说："你赶快维持社会秩序，制止一切抢劫事件发生！"这样，就由他带着30多名警察负责维持治安。

次日晨，我们得知从兰州败退到青海的部分军官到了上五庄。我马上找了两辆车，同马良、李参谋前去劝降。途中，见逃散的官兵到处鸣枪，我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叫马良陪李返西宁，由我独自去劝降。

我在上五庄原马步芳的洋楼里找到82军副军长赵遂和他的参谋长马文鼎、100师师长谭成祥、129军副军长韩得铭及师长杨秀戎等人。我先向他们介绍了临夏解放的情况，宣传了解放军的约法八章，然后说："你们不要怕，一切还来得及解决。你们现在能集合多少就编制多少人，立即向解放军投诚，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

经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打消了顾虑，准备投诚。我连夜返回西宁，向两位军代表报告。他们立即给投诚的人写信，主要内容是，你们的行动很好，生命财产将受到我军的保护等。

我带上信又回到上五庄。赵遂等人见信后很高兴。当时，在三角城还有一批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官兵，我又前去找到190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参谋长李少白、团长马得义，82军248师师长韩有录等人。他们在三角城还有一个完整的旅，旅长是马英，也是在兰州溃败后由河口退到这里的，已抢了不少牛马，准备逃跑时在路上杀着吃。

我首先给马振武、马英等人做工作，向他们宣传政策和当前

的形势。他们听后便集合其他军官们请我讲话。

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详细介绍了临夏解放后，共产党尊重我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政策，对投诚的军官及其家属都做了妥善安排等情况。我针对他们想逃西藏的心理说："有些人想走，可是走到哪里去呢？去西藏吗？我知道那里的情况，这条路确实不好走，你们的生命，还有老婆孩子，身上带的财产，能保得住吗?!再说，马英这一旅人大多数想回家，他们最多和你们跑一二站就都开小差跑了。"在场的军官听后，个个低下了头。

我见时机成熟，就直接说："解放军的政策这样好，这样宽大，我看投诚是最好的路！"

马振武说："我们可以听你的，愿意投诚。但是，你要做担保！"

我说："我可以做担保！你们先赶快把枪枝、电台集中在一块，我马上去西宁向解放军代表报告，给你们按上五庄的样子要个证明信来。"

正当我要走时，远见几辆大卡车开来，原来是湟中公司疏散货物的4辆大道吉汽车，全是空的。我让人挡住，准备装枪枝、电台。

我回到西宁，把马振武等人愿意投诚的情况汇报给军代表。他们很高兴，立即仿照上五庄的方式写一证明信。因时间紧迫，我在西宁未久留就往三角城走。刚走到上五庄，天黑了，便住下。次日，马振武派人接我和马文鼎进三角城，并将解放军的证明信交给了马等人。他们高兴地把枪枝弹药一齐装上了汽车，又让团以上的20多名军官坐一辆车上，到上五庄与赵遂等人一同去西宁。此时，解放军也开到三角城来了。

我们到西宁后，解放军贺炳炎军长召见了我和投诚的军官，鼓励他们立功赎罪，重作新人。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到西宁，住在湟中公司。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上五庄、三角城的劝降经过。他很满意，并对我说："明天在东关大寺召开群众大会，投诚军官也参加。到时我们一块去会

场。”次日晨，我到王司令员住处，他向我介绍了廖汉生同志：“他就是青海省政府主席。”从此，我又和廖汉生同志相识了。

群众大会开始时，王司令让我先讲话。我先向大家介绍了王司令和廖主席，然后又将解放军在临夏纪律严明和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等情况给群众介绍了。

王司令也讲了话。他驳斥了马步芳的“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谬论。他说：“所谓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来保他的命；所谓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来保他的产。”他的话，激动人心，感人落泪。

散会后，我跟王司令走进了大寺西北角的会议室，里面坐满了投诚军官。王司令让我先讲话，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即向大家介绍了王司令和廖司令，并请他们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肯定了投诚军官归顺人民的成绩，同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立功赎罪。至此，我完成了青海的劝降任务。

注　解：

① 马良于1952年逃往甘南参加叛变，后被我解放军歼灭。

② 徐季直、祁子厚系临夏汉族绅士，二人于60年代先后去世。

张乐山事略

张　春　在

先祖父张学仁，字乐山，回族，1875年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曾祖父张绍先先移居今积石山大河家，后迁到临夏西川，少时在

马占鳌部下当马弁，后升为管带，光绪初年任洮岷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曾随马福祥入京，抗击八国联军，后任宁夏镇总兵。

祖父幼年时，严以律己，勤奋好学，既潜心渴求学问，又注重情操修养。在他初入西川肖家庄王氏书院求学时，严格要求自己，一不让家人早送晚接，二不吃专门为他做的饭菜，三不穿华贵衣着。同时，聪颖好学，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因此深得先生的钟爱及学友们的钦佩。王先生病故后，遂转入河州凤林书院。从此，学习更加刻苦，生活上依然如故，还主动调解学生中发生的一些纠纷。当时，有这样两件事深受老人和师长的赞赏。有一次，他在家用餐时，边吃饭边看书，因专心入迷，把包子放到墨盒里去蘸，惹得全家人捧腹大笑。另一次在书院里，有两个学友因打赌而发生争执，胜者要败者背他在院内跑一圈，而败者不从，两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时祖父主动背起胜者跑了一圈，便很快平息了两人的争吵。老师知道后，在他的作文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赞语："此乃以柔克刚，平息事端！可取！可取！"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祖父与其好友何淑刚等同去兰州府赴考，同中秀才，遂去宁夏镇总兵府供职。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曾祖父退职还乡。期间，除在导河县参议会担任一段秘书工作外，在家博览群书。

民国10年（1921年），马福祥升任绥远都统后，即电召祖父赴绥，委任吐默特总管。除在都统府阅办文书、处理日常事务外，专管蒙旗等少数民族各项事宜。期间，他热心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并秉公办事，妥善解决了多年来各民族间的许多地界、草原纠纷，促进了民族团结，赢得各民族群众的一致称赞。

祖父一贯克己奉公，廉洁清明。他常说："仗势欺人岂是丈夫，无功受禄何为仁子！"他在绥远虽任要职4年余，但无分文积累，弃官回归时，因路费无着，不能成行。待曾祖父差人送去

盘缠后才得以返回。

由于祖父为人正派，才能出众，深得马鸿宾器重。他多次聘请祖父为其辅佐，祖父念其情谊，于民国18年携眷赴宁夏，在马鸿宾部下供职。当时，西北诸马纷争，各自扩张势力，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祖父对此深为不满，为时不久，又弃官归里，决计耕读传家。

民国19年马麒病逝后，马麟继任青海省主席。马麟曾多次写信、派人请祖父为其辅佐助政，委任秘书长职务。但此时，青海省军政界里少壮派得势，苛捐杂税日重，贪官污吏横行，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此乱局，祖父无力整饬，不到3年，又忿然辞职。马麟迭次挽留，祖父婉言谢辞，致使马麟十分不快，拂袖而去。

民国22年夏，马步青任骑5师师长，驻防凉州（今武威）。因文官奇缺，曾派人将祖父劫去军营，为其效劳。祖父深知马步青生性残忍，为人不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不随从，并愤怒斥责其践踏人格之暴行。马步青无奈，只好将祖父放回。

马氏叔侄对祖父两次忿然拒绝之行动怀恨在在心，曾暗示临夏警备司令马为良寻机报复。民国23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马为良派兵丁8人持刀背枪，来到我家所住的西川金家庄。因天黑误入上院三祖父家，将三祖父张学谦一刀砍倒在地。三祖母赵九月见势，便持刀拼杀，砍死一刺客，另一家伙遂开枪打死了三祖母。

1947年后，解放战争席卷全国，蒋家王朝如西下之日，气息奄奄。1949年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为了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派韩起功来临夏抓兵。一日，韩起功派人来请祖父，说：“韩军长请你去议事”。祖父毫不客气地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又将发生一场灾难，议什么事！”拒绝赴邀。第二天，韩起功一行5人带厚礼来家会晤，要祖父为其效劳。祖父遂婉言谢绝：“我子早亡，家下一老一少，均为无用之辈，望韩先生另请

高明吧！”次日，遣我将其礼品退送军部。这一来，可惹怒了韩起功，他即一面电告马步芳，说张乐山阻碍抓兵，一面指示乡长，派人来我家抓兵。我当时还不到15岁，祖父无奈，将我藏匿于衣柜中，并速上书马鸿宾，请求说情。由于马鸿宾帮助，才幸免遇难。

1949年6月，陇东固关之战大捷后，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兰州挺进。在一个中秋之夜，一位陌生人给祖父送来一封信，祖父在客厅热情接待了他，并回书一封，交给来人带去。在此之后的一些日子里，城乡的亲友纷纷来我家，同祖父商议逃难之事。而祖父则反复给大家讲战场上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教育他们不要盲目出逃。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那封信是王震司令员写给他的。

临夏临近解放时，军政要员纷纷潜逃，一时古城无主，人心惶惶。祖父即同临夏回族地下党员拜学忠、汉族绅老张质生等商议决定，于8月22日，组织各族各界群众数百人牵牛拉羊，披红戴彩，前往四家嘴，夹道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临夏获得了解放。

1949年8月底，临夏军管会成立，祖父出任军管会副主任，从此参与了人民政府工作。同年9月中旬，临夏专员公署成立，祖父遂荣任第一副专员之职，先后被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甘肃省政协委员。

枯木逢春，热忱满腔。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祖父为建设家乡竭诚服务，献策出力。1950年，在中共临夏地委的领导下，经祖父倡导，有关方面努力，从八坊引水进城，解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回汉人民心花怒放，将其称为“团结水”。1951年，祖父建议在八坊地区设立了临夏女子中学，并亲自兼任校长。同时，还先后推荐回族知识分子蒋清、马有信分别担任了韩集中学、临夏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1年，祖父参加了西北少数民族参观团，任副团长，赴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参观团在北京受到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一起照了像，还在怀仁堂见到了毛主席。回来后，他在回汉人民中广泛宣传祖国建设成就，称赞“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好”。

1956年临夏回族自治州筹备成立，祖父任筹委会第一副主任。时因患鼻窦癌，经多方精心治疗无效，于8月16日病逝，享年84岁。在祖父患病期间，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及省政协的有关领导曾多次探视，多方关照。

祖父逝世后，临夏地委、专署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临夏州、市各机关单位、学校和部队1000多人参加，由中共临夏地委书记马青年同志致悼词。

马德涵事略

马士年　丁　旭

德涵先生又名德咸，字向治，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于西安。其父坤玉曾作过太平军随军医生。德涵先生青年时期去四川成都投奔同籍回民亲友，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入成都陆军军官学堂学习。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同盟会成都分会成立，在军学两界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大量发展会员，德涵先生即于此际加入了同盟会。

先生胞弟友师在辛亥陕西起义胜利后，参加了马玉贵部下的回民骑兵队，任队长。清军反扑礼泉时，这个骑兵队与清军激战，

友师阵亡。德涵先生之母为此函促先生速回西安。先生到家安置好一切后，于1912年（民国元年）去兰州等地教书。在此期间，他与马麒、马麟、马安良等结识，但他厌倦从政，以教书为乐，马步青曾受教于先生门下。1928年先生双耳失聪，携家眷返回西安，以绘画卖画维持生计。先生擅长山水画，对米芾父子山水画法特感兴趣，曾在新画一扇面上题诗说："平生好学米家法，云烟缥渺了不差"。扇面点墨成山，山下溪上横一小桥，桥上一人披蓑戴笠作雨中行状，全局以淡墨点染，山树亭阁均在云烟笼罩中依稀隐现，意境超逸。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消息传来，德涵先生立即在小皮院清真寺向回民群众慷慨陈词，痛斥日寇暴行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随即发动回民群众组成了陕西回民抗日救国会，先生任会长，附近回民先后参加的约五六百人。回民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活动是游行宣传、抵制日货、为东北抗日将士募捐等。

1936年冬天，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到西安。在此之前，我西路军在河西战役失败后，一部分人被困在张掖等地，不少人被杀害，还有不少人被俘。周恩来同志当时积极地组织对西路军的营救工作，准备在西安回民中物色一位和马家军有关系的人去河西沟通关系，故通过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和张文彬等同志与住在西安回民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吴鸿宾同志取得联系。周恩来同志让吴和张文彬商量，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能与青海马家军谈上话并传达我们意思的人：只要他们对被围困的红军不伤害，对他们提的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这些人的生命。吴接受任务，与张文彬仔细计议，经过反复考虑，想到了和他有交往的马德涵先生。吴深知德涵先生曾在甘肃教书，为人正直，政治上可以信赖，且与马麟又熟识，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遂连夜走访德涵先生，

告之有几个朋友在张掖为马家军所困，想让他找马步青疏通一下。先生满口答应，只考虑年近花甲，远走河西，交通困难。吴答复容明日找人设法解决。次日，吴向张文彬汇报了与德涵先生谈话结果，张让吴转告德涵先生这件事是周恩来同志委托的。吴再度去找德涵先生，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并转告了周恩来同志殷切嘱托之意。德涵先生当即慨然应诺，并兴奋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花甲已过，此事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的解决，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这次蒙他对我如此信赖，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而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谈妥后，张文彬同志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商议，由吴鸿宾找了他的一位至交甘肃海原回族商人马宪民陪德涵先生同去。1937年2月，德涵先生以65岁高龄与马宪民乘飞机前往兰州。到兰州后，德涵先生找青海省办事处，借个人画展为名，要去武威见马步青军长。办事处用电话向武威联系，马步青答复说欢迎德涵先生前去。德涵先生随即乘汽车去武威，向马步青讲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协力抗日的重要意义，然后问到张掖一带西路军的情况。马步青说已打散了，俘虏了不少人。德涵先生劝告马步青要优待俘虏，不要虐待，等共产党派代表前来商量善后。马步青答应可以商谈解决，并介绍德涵先生去张掖找100师300旅旅长韩起功商谈。到张掖后，德涵先生谈及被俘红军时，韩答复说，不久前已送往青海。至此，德涵先生河西之行已告一段落，就乘汽车返回兰州。德涵先生原先到兰州时，张文彬同志也同乘一机到了兰州，德涵先生见张后详谈了河西之行的经过，张即电告周恩来同志。随之德涵先生又乘飞机回到西安。

1937年，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从阿拉伯朝觐回国，路经西安准备停留一段时间再返回青海，与他同行的还有青海省政府秘书

长谭光敏。吴鸿宾同志得悉这个消息后，以为应该借此机会想法与马麟接触一下，并建立关系，这样既可进行统战工作，也可了解被送到青海的西路军人员的情况，以便营救。吴找张文彬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同意这样做。吴就约请马德涵先生同去大麦市马麟寓所拜访马麟。拜访马麟后，吴又与张文彬同志研究，拟由德涵先生与自己作东，宴请马麟，同时也请周恩来同志参加，与马麟会见。张文彬同志将此设想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同意。5月初，德涵先生与吴二人联系请马麟、谭克敏赴宴，席设西羊市71号（现77号）德涵先生寓所，并商定暂不向马麟告诉周恩来同志参加的事。这一天，周恩来同志、张文彬同志先到，待马麟、谭克敏到达，宾主入席间，德涵先生请出周恩来同志向马麟作了介绍，马麟先是一惊，随即镇静如恒，双方握手互相致意后，相继入席，边吃边谈。当时马麟曾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有关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同志扼要谈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以及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马麟不住点头表示赞同，露出钦佩之情。周恩来同志还谈到希望优待并送还在青海的红四军人员，以利团结抗日。马麟也说团结抗日有好处，并答应回青海后查清红军人数，要尽力而为，将在青海的红军人员遣返西安。交谈一小时左右，气氛和谐，没有出现任何干扰。后来吴鸿宾同志趁马麟去礼拜之际，到清真寺再次会见马麟，听听对那天宴会后的反应。见面后，吴问马麟对周恩来同志的印象，马轻声说："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接着他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很钦佩的"。

事后，周恩来同志对德涵先生不顾个人年迈、长途跋涉前去河西，并甘冒风险请马麟与自己会见深表感谢，并对这两件事的结果感到满意。因这对营救西路军的工作起了有益的作用。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和马德涵先生见过三次：初见是1937年1月下

旬，地点在小皮院清真寺北厅；第二次见面是在1937年2月，德涵先生飞兰州之前，地点在七贤庄周恩来同志住所（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第三次见面是在1937年5月，在西羊市德涵先生住所，即德涵先生与吴鸿宾同志宴请周恩来同志与马麟相见那一次。自此以后，德涵先生即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常联系，办事处历任处长都和先生熟识，他常从办事处带回一些书刊，在一些回民中散发，并作一些宣传。他还介绍过一些愿意参加革命的回、汉族青年到安吴青训班去学习。经他介绍的青年名单，现在八路军办事处展览馆展出。1938年夏，德涵先生曾携他的二儿子马毅同去武汉看望周恩来同志。在那里，他还会见过郭沫若同志。因德涵先生耳聋，周恩来同志与他谈话只能借助笔谈，就特意赠送他一副德国造的助听器。

1946年，德涵先生参加民盟，同杜斌丞先生从事进步活动。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解放军到西安北关后，德涵先生就在回民地区组织群众去欢迎解放军，他和回民群众一起排着队，打着小旗迎接解放军进城。西安解放不久，马军反扑，德涵先生当即以西安回民名义写了《西安穆斯林告马军官兵书》，印刷万余份，由我第一野战军在前线散发，并在1949年5月27日的《解放日报》第一版刊出。

解放后，德涵先生先后任省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省民盟委员、省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市人民政府委员、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委员，他的绘画作品曾参加1953年全国国画展览。周恩来同志对德涵先生的生活、健康一直很关心，遇陕西到北京开会的同志，就委托他向德涵先生问好。1954年，周恩来同志从日内瓦开会返回，途经西安，曾在人民大厦亲切接见了德涵先生，并将他营救西路军事迹，向当时的省长赵寿山等人作了介绍。

1958年3月间，德涵先生患病住院，经治疗无效，于5月20日逝世，终年86岁。先生逝世后，省市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了吊唁

活动，并到墓地送葬。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在挽幛上题写了“帮助革命精神虽死犹生”的悼词。1978年10月30日，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曾给陕西省委统战部批示说：“马德涵老先生1937年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委托，同马步青（马德涵先生给他教过书）谈判释放西路军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以后他一直同党保持联系，做了一定的工作。”

德涵先生一生从事爱国民主活动，成绩显著，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爱戴。

深切怀念马腾霭同志

马　思　忠

我和马腾霭同志是在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相识的。那时候，他在宁夏各族人民中就有很高的声望。“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和他一起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后来，又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共事。多年来，我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关系融洽，感情笃深。而今，他虽离去，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的脑海里萦回。

腾霭同志一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对宁夏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怀有深深的眷恋。他在与我们党的长期合作中，以自己勤奋的工作，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党内外同志的爱戴。事实说明，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亲密的老朋友，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回族和伊斯兰教界的杰出代表。

（一）

腾霭同志出生在宁夏吴忠一个宗教世家，是我区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解放前，军阀马鸿逵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大肆抽捐加税，到处抓兵，使宁夏土地荒芜，农商凋敝，民不聊生，社会黑暗，民族灾难极为深重。在那黑暗年代，腾霭同志就体恤民情，为民说话。吴忠板桥回民丁福举的儿子在马鸿逵部队里当排长，作战时失踪，被咎认“逃兵罪”。丁福举全家3口受到株连，被马军抓去当劳工。马腾霭见到马鸿逵的秘书长便当面指出：“民为邦之本，你们这么整，还让老百姓活不？”迫使当局把被抓的劳工都放了。解放前夕，地下共产党员金三寿等人从边区来到吴忠，与腾霭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从金三寿那里了解到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从那时起，腾霭同志就从心底里开始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为边区政府做了有益的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腾霭同志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认清时局，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可贵的。

宁夏解放后，腾霭同志积极拥护党的民主改革，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从50年代起，腾霭同志先后担任了宁夏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省政府副主席、吴忠回族自治州州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人大副主任等职。

1954年到1958年10月，他在担任吴忠回族自治州州长期间，十分关注农业的发展。那时吴忠地区水稻播种方式落后，品种退化严重，产量很低，为发展粮食生产，他支持有关部门从天津小站请来农业技术员，向当地群众传授水稻插秧新技术，并引进水稻新品种，使水稻亩产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腾霭同志在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期间，较长时间分管卫生、体育等项工作。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卫生、体育工作的方针，

十分重视地方病、传染病的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鼓励医务人员到基层为群众防病、治病，勉励体育工作者要刻苦锻炼，为国争光，他为改变全区卫生、体育的落后状况做了很大努力。回族聚居的泾源等县，是地方性甲状腺肿严重发病区，经过当地政府的努力，防病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85年，腾霭同志到固原地区检查工作时发现碘盐供应不足，少数群众不愿食用碘盐。他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做好群众工作，保证碘盐供应，使这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进一步巩固。1987年盐池县个别地方发现了传染病疫情，腾霭同志获悉后，立即指示自治区卫生厅要密切监视疫情，并要求政府办公厅指派专人，昼夜值班，随时了解疫情情况。腾霭同志还十分重视儿童免疫工作，认为这是关系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大事。他亲自主持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狠抓落实，使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为后来我区实现儿童免疫达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腾霭同志分管卫生、体育工作期间，正值国家对卫生、体育实施改革。为把我区的卫生、体育改革搞好，他和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反复交换看法，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各项改革措施都较顺利地出了台。

（二）

多年来，腾霭同志与党和政府诚挚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和他先后共事的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都说：腾霭同志是党真诚的朋友，值得信赖的同事。

腾霭同志经常这样说："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回族当家作主、治穷致富的，作为宗教人士没有理由不支持。"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始终以实际行动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为了改变南部山区贫困落后面貌，1983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作出了"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决策，决定搞移民"吊庄"工程，腾霭同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开始有些群众有疑虑，他亲自深入固原、

泾源等县的“吊庄”点上察看，亲切地对搬迁到“吊庄”的群众讲：“不要看现在你们住土房，过不了两年，你们就会有瓦房住；不要看现在刚栽的树木小，过几年就会绿树成荫，派上用场。”在他的鼓励和关心下，许多群众解除了疑虑，坚定了信心。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回族地区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更是一件大事。腾霭同志认为：回族要兴旺发达，也要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他多次对我说：“南部山区是回族聚居地区，为什么经济落后？除了自然条件制约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太快，如果不抓计划生育，我们取得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吃光。”在腾霭同志的主持下，研究起草了我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暂行规定。后来，这个暂行规定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为推动我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腾霭同志非常关心我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初他就在家乡办起了板桥完小，还兼任过宁夏民族公学副校长，并推荐了不少回族青年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1986年他到盐池县了解到该县教师进修学校缺少师资，回银川后，即与有关部门商量，拨出专款，帮助该校解决了师资培训的困难。

他还就培养回族干部、建设清真饮食服务网点、解决回族特需商品供应、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落实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给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在对待和处理宗教事务上，腾霭同志一贯遵循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各行其是，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从不以宗教事务去干扰政府工作。他经常教育信教群众要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注意搞好回汉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积极支持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提倡各民族之间互敬互谅，互相帮助。他走到哪里都积极宣传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在区内是这样，在区外也是这样。一次，他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晚上许多群众来看望他，他不顾旅途劳顿，即席

讲话两个多小时，勉励当地群众加强民族团结，努力发展经济。

在“文化大革命”中，腾蘅同志也受到了冲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落实政策后，有的人为他抱不平，而腾蘅同志却宽厚地说：“那个时候不是正常时期，连党内干部、中央领导都受了冲击，我这点损失算啥，过去的事纠正了就行了。”充分体现了他不计个人得失，与我们党诚心合作的宽阔胸怀。

（三）

腾蘅同志非常珍惜党和政府对他的信赖，他为人正派，平易谦和，淳朴敦厚，因而，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他从不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不向党提出特殊要求，他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有一个学校新建的教室，由于偷工减料，时间不长就塌了，砸死了学生。他对这种对人民不负责的行为，非常气愤，立即责成有关部门严肃查处。他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非常重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一次，他和吴忠市人民代表在杨马湖乡视察，群众向他反映饮水含氟量高，煮出的米饭颜色发黄，有的人因此而失去了劳动能力，要求政府帮助解决。他听说后激动地说：“解放40年了，群众还饮用这种苦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回到区上后，他立即向政府负责同志反映，使杨马湖乡改水工程的资金很快得到落实，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当时一些海外亲友不断来电来信询问国内情况，腾蘅同志向他们如实地介绍了国内情况，让他们不要相信社会上的流言。当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一次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动情地说：“在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帮助我们回族当家做主的，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腾霭同志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多次出访，为增进我区各族人民与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发展国际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6年，腾霭同志作为全国青联常委，到埃及参加了世界青年联合会。同年，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1983年，他还率领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到麦加朝觐，发展了与阿拉伯地区穆斯林的友谊。

近年来，腾霭同志积极致力于发展宁夏与中东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1985年，他以宁夏穆斯林代表团副团长身份除访问巴基斯坦外，还访问了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金融界、宗教界、工商企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增进了友谊，宣传了宁夏，建立了一批合作关系。1986年，他还应邀出国参加了伊朗革命七周年庆祝活动。腾霭同志还利用多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以及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成就。1989年3月，他在匈牙利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81届大会讲坛上作了关于反对种族主义，促进少数民族权利的发言，着重向世界各国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状况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用事实证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情况，有力地驳斥了种族主义者的谬论，受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的欢迎。

腾霭同志十分关心宁夏的对外开放。近几年来，他在宁夏接待了一批批来自世界各伊斯兰国家的使者、宗教人士、金融家、企业家等，为宁夏发展同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和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利用到美国探亲访友的机会，积极动员美国、台湾的亲戚为宁夏经济建设出力。

腾霭同志病重期间，我多次到医院看望他，希望他安心治疗，早日恢复健康。但他却仍然惦念着人民群众，一再询问我区遭受

冻灾的情况，关心着全区经济的发展。他还希望我和常委会的同志共同努力，克服困难，尽快制定出我区的自治条例，把民族区域自治法落到实处。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腾霭同志为宁夏回族的发展与繁荣、为宁夏回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作出了毕生的努力。我们要学习他顾全大局，襟怀坦白，言行一致，作风正派，待人宽厚，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品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宁夏经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工作。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怀念。

忆父亲洪寿林掩护红军

洪　清　国

我的父亲名叫洪寿林，字海如。红军长征路过我家时，他已84高龄。当时的宗教职务是伊斯兰教虎夫耶洪门的教主。

父亲出身非常贫苦，又是孤儿，从小受尽了千辛万苦。清朝末年，由甘肃的景泰县逃荒到了宁夏，落脚到同心县。他在同心一带拉长工打短工，后来经人介绍到清真寺当了勤杂工。他在清真寺白天干活，晚上跟随满拉（学经典的学生）苦读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由于10年寒窗，刻苦攻读，终于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后来穿衣当了阿訇（教长）。他广读经典，

德才兼备，为人耿直，平易近人，广泛联系群众，很受穆斯林大众的尊敬，后来做了虎夫耶洪门教主。

1936年，红军长征经过同心时（当时县名为豫旺），了解到我父幸的为人和身世，就派人秘密和我父亲接触。第一次接触，我父亲就热情地接待了红军，后来发展到了秘密往来（因为当时我家还属国民党统治区）。红军派的代表常常穿便服来我家，地址是现同心县下流水乡洪岗子村（原名豫旺县洪岗子）。有一次，红军代表来到我家里后，被当地国民党民团发觉，他们派人在我家周围监视。由于他们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不能轻易抓人，只能见机行动。父亲怕红军被敌人抓去，就将两位红军同志藏在自己的“静房”内（教主修心盘道之净地，任何人不得进去），白天由我母亲一人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和我父亲经常谈到深夜。当时，因反动派造谣说，红军要共产共妻，消灭宗教；同时，他们还搞坚壁清野，几乎十室九空，给红军供给造成了极大困难。红军代表向我父亲谈共产党的宗旨，谈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谈抗日救国的道理，深深地感动了我的父亲。7天后，父亲为了安全起见，将两位红军同志打扮成阿訇模样，由周生斋和田凤海等人护送回去。从此以后，父亲给教民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讲回回为什么要支持红军的道理。他说：“红军是仁义之师，必定胜利。”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不久这里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了。红军指挥部为了表彰我父亲，来了60多人，由敌工部长唐天际和程宗受、马青年带领。父亲宰了5只羊招待红军。他们给父亲送来了150只羊和一面长方形大红缎幛。幛面写着：“寿林回族大教主法正，爱民如天。汉族同胞唐天际、程宗受敬赠”。同时，还给我父亲送了豫海县回族自治政府委员的聘任书（此聘书不幸在土改时混杂在我家的地契中烧毁了）。父亲给每个战士回赠了3块大洋。父亲逝世时，他拿出了红军送的锦幛对我说：“我留给你的这面锦幛，比什么家产都珍贵，

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我遵照父亲的嘱咐把锦幛放在罐子里，用黄腊封上口，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现存宁夏博物馆）。

我父亲接受了红军送来的150只羊和锦幛以后，心情非常激动，7天后赶做了一面锦幛。据还健在的当事人田凤山回忆，是一面绿色杭缎大幛，两边还配有条幅，幛面题词是“太阳之光，普照大地”。我父亲派周生斋和田凤海将这面锦幛和两箱蜡烛送到同心红军指挥部，并告诉周、田两人，请转告红军领导，我送给他们蜡烛是有含义的。

当红军撤离豫海以后，马鸿逵发现我父亲私通红军要找麻烦，后经马鸿宾说情，才算了事。

1987年10月，我的两个儿子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里拜见了唐天际同志。唐老对我的两个儿子说：“你祖父洪寿林，支援了工农红军，贡献特大，我们应该永远记在心中。”他希望我的孩子要继承爷爷的好思想，并与我的两个儿子合了影。

著名经师刘遇真

马靖夷　马德宏

刘传三，字遇真（1861—1944），祖籍西安北郊高庙村。由于他曾两次朝觐麦加，在弟兄中排行第二，所以人们多称他刘哈吉或刘二师傅。他出身经师世家，其父系清咸同年代伊斯兰教著名经师，人称高庙刘阿訇，曾在西安洒金桥北寺和大荔、凤翔等地清真寺任开学阿訇。他共有四子。1862年（同治元年）陕西回

民反清起义，高庙刘阿訇与二子及部分回民群众移居甘肃平凉化平（今宁夏泾源县）等地，其余二子留在西安。

遇真阿訇家学渊深，又曾受教于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1522—1597）九传弟子者万选与一名经师穆原复（均咸同至光绪年间人）门下，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他性情耿直，刚正不阿，诚实笃信，虚怀若谷，好学不倦。为了履行五项宗教功课之一的朝觐，遇真曾在光绪年间两度去麦加。第一次是在1891年（光绪十一年）他30岁时，因为家境寒苦，先徒步去上海，一路挑担而行，担子一头是经典，一头是行李。到上海后住在某寺，人们认为他是穷阿訇，不太重视他。但在遇真阿訇为该寺系统整理了经库的经籍以后，人们才了解他学问的渊博。当时该寺的教长是我国近代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哈德成，他敬佩刘的学识，待为上宾，并请刘教他波斯语。遇真阿訇在与他同行的几位甘肃的朝觐者以及上海教众们的资助下，循海道到了麦加。这一时期，正是阿拉伯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遇真阿訇到麦加受到一些革新思想的影响，并曾在当地伊斯兰教著名学者沙特·赛义德门下受教，刻苦研习教义、哲学、法学，宗教知识迅速增长。他这次朝觐，万里跋涉，艰辛备尝，确实难能可贵。回国后，曾在宁夏泾源、沙堂川清真寺和西安洒金桥北寺任开学阿訇。通过宗教活动实践，深感中国宗教经籍手抄本多，完整的印经籍少，个人在教旨、教律等方面研习不很精深，时遇疑难，遂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再度去麦加朝觐，以求深造。到麦加后，他再向老师沙特·赛义德求教，并对当地教律实施、各种宗教仪节作了较详尽的考察探究，还在当地搜集了一些我国国内少有的宗教经籍，带回西安。

遇真阿訇在西安历任大皮院清真寺、洒金桥清真寺开学阿訇数十年，为西安回民办了不少好事，在“遵经革俗”、提倡回民教育等方面贡献很大。

“尊经革俗”是一件意义很大的事。由于伊斯兰教自唐初传

入中国以后，教众在经济、文化方面吸取了不少汉族的先进的东西，促进了信教各民族的发展。但在自唐、宋、元、明到清代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初传入时简单的礼俗、仪节中融入了大量的汉族礼俗和仪节，主要的是宋、明以来，封建统治者强制推行儒家仪礼，在伊斯兰教教众的婚礼、葬丧祭仪节方面很多都是按“周公之礼”的规定行事。仅就西安早年回民婚俗而言，除教规规定的简单仪节外，额外的仪制（由订婚到结婚）就有十几种，仔细推究大多合于“周公之礼”。回民丧葬祭的礼俗虽较婚礼稍少，但仍有一些教规规定以外的仪节。长期以来，广大穷苦教众苦于负担那些繁琐的婚丧费用，以至常常有人无力婚娶。这种陋俗沿袭既久，几与宗教仪制混合一体。早在明末清初，一些有远见的伊斯兰教宗教学家、名经师，如马注、王岱舆、舍蕴善等都曾提出过具体的革俗主张。到了遇真阿訇提出“遵经革俗”的宗教主张的时候，很自然地得到广大穷苦教众的支持、拥护。为此，遇真阿訇用了长时间并付出过相当大的努力，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与反对，但得到了不少穷苦教众的拥护与支持。通过遇真阿訇的倡导。“遵经革俗”主张逐渐得到实现，不少教众由此而减少了在婚丧仪俗上的不必要的、繁重的经济负担。

19世纪的最后几年，正是清王朝摇摇欲坠之际，长期遭受封建统治歧视、压迫与残酷剥削的回族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文化十分落后。为了使广大回族人民摆脱这种困境，“回族的知识分子曾经想通过提倡文化教育和提倡宗教来振兴本民族。”（1963年出版《回族简史》49页）虽然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在当时全国各地回族知识界、宗教上层多在进行这种尝试，一时成为风气，西安也是如此。在遇真阿訇的毕生活动中也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回民要兴学困难很多，特别是缺经费，无校舍。1907年前后，北京著名经师王宽首倡将清真寺内进行经堂教育的经堂改为新式学校，在牛街清真寺创办了回教师

范学堂。同年，回族知名人士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了清真偕进小学。在此之前，镇江回族知名人士童琮创办了穆原小学。此后，王宽还在北京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这些学校大多设在清真寺内，经费由回民中的热心教育人士捐助。在清真寺内办新式学校，并由众所尊敬的教长倡导，一时各地回民纷纷效法，成为风气。辛亥革命前夕到民国初年，西安回族知识界和宗教上层人士，在全国各地回民“提倡教育，振兴民族”这一浪潮促进下，先后办起了各类学校，最早的是在化觉巷清真寺开办的义学，此外还有私塾、夜校。刘遇真阿訇特别重视发展回民教育，早在民国初年他第二次朝觐归来后，就提倡在寺院办小学、夜校，让回民儿童和成年人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他在大皮院清真寺、洒金桥清真西寺先后任开学阿訇时，仍一贯热心致力回民教育。对大皮院清真寺设立的精一小学大力赞助支持。在洒金桥西寺，他一面对设在该寺的明德小学竭力支持外，还在明德小学旁边开办了女子小学，一个宗教上层人士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确实不同凡俗。明德小学办的时间很长，今天西安回民中不少古稀老人曾在这个学校受过教育。

遇真阿訇宗教知识博深，精伊斯兰教教义（认主学）、伊斯兰教哲学、多种《古兰经》注、伊斯兰教法学，谦虚好学，诲人不倦，门生桃李遍陕、甘、豫，受其教育者后多成为知名阿訇，如西安大皮院清真寺开学阿訇刘学海、大学习巷清真寺开学阿訇马志俊、陕南安康清真寺开学阿訇刘宗云、历任河南洛阳和武汉清真寺开学阿訇马振明等。遇真阿訇交游很广，知名宗教学者、经师如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等阿訇来西安时都与他过从甚密。

1944年冬，遇真阿訇殁于西安，终年84岁，葬于西关外老坟台，1953年迁葬北郊广大门。他的品德懿行，至今犹为人们所怀念。

西安市化觉寺掌教马谦益

马　希　明

马谦益，字受丞，号吉六，西安人，生于1874年农历七月初一日，1949年农历五月初二日在西安逝世，享年76岁。因其身躯高大，陕西土语称“大汉子”，故称“汉子马”；一说世居寺巷子，也叫“巷子马”。他是伊斯兰教格的目派的著名阿訇之一。

他出身在古城西安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马德功为人诚实质朴，生有四女一男（即谦益阿訇）。青年时做小生意，后来当“车揽头”①，收入仅能糊口，生活较为窘迫，但他省吃俭用，供给谦益求学。

马谦益幼时跟从西安清真大寺前“道中”②刘志祥（即小学刘）之父老阿訇学习阿拉伯文，经过近20年孜孜不倦的学习，终于在禹月明门下“穿衣挂幛”③。因其品端学优，于1914年应聘到西安南城清真寺任主讲。在任期内，鉴于该寺大殿破烂狭小，即号召坊民捐资扩建。竣工后坊民赠以“学粹功高”匾额一面，悬挂寺内（此匾毁于“文革”），以表坊众爱戴之情。

1916年应甘肃平凉七里店及平凉东关牛市巷清真寺之聘赴任。1918年应西安洒金桥清真寺之聘，由平凉返陕任教。任教期间，他深感回民群众经济基础薄弱，又没文化，政治上、经济上常受歧视和压迫，处于贫穷落后状况。要改变这种面貌，只有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改革经堂教育才行。当时社会上虽有创办的学校，但不论官办或私立，一般学费负担很繁重，回族家庭清贫，

多数少年只有宫墙外望。同时，回民家长由于宗教信仰等原因，也不愿让孩子上“洋学堂”。谦益阿訇决心兴办业余学校，免费招收家境困难的青少年入校学习。一时报名者争先恐后，甚为踊跃。课程既有阿文，又有汉文，谦益阿訇任校长。

1921年应西安北广济街清真寺之聘兼任主讲之职（未辞洒金桥清真寺之职），两寺半月轮换一次，任期内曾倡仪募资对两寺进行修建。在广济街寺完工后，建筑工匠来寺结帐，马谦益问：“还欠多少钱？”工匠说：“80块。”他听罢，将自己的皮袍子交工匠拿去卖，并说：“多退少补。”这个工匠很受感动，说：“您老人家为修寺能卖自己的皮袍子，我就不要您老的钱了！”

1936年，马谦益朝觐归来，途经上海，即被绥远丰镇县隆盛庄清真寺邀任主讲之职。抗日战争开始，交通被阻，不能返里，又被绥远集宁县、包头榆树沟、萨拉齐、察哈尔（河北省）张北县（张家口）等清真寺邀请先后兼任主讲。

1944年，他想回陕探望阔别8年之久的家属，但东路交通被阻，遂绕道陕北、平凉东行。在途经陕北定边县时，受到了边区政府的接待和关怀。据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杰同志回忆说：“1944年，我在陕甘宁边区民族学院工作时，组织上得知定边县回民自治乡有两位来自绥远的大阿訇，他们都是到过阿拉伯麦加朝过圣地的人，要路过陕北回乡探亲，派我和民族学院的刘春、宋友国、丁溪野三人负责接待。鼓华巷乡长，定边县新华街清真寺的伊玛目④杨学智等人也参与了接待工作。为了便于礼拜，我们将两位阿訇安排到离清真寺较近的一处回民饭馆，边区政府还给予两位阿訇进出境免验的优待。两位阿訇是乘驮轿来的，受到边区穆斯林的热情欢迎。经过介绍姓名，我们才知道一位是西安大阿訇马谦益，一位是甘肃大阿訇浦儿（普洱）马（马鸣春），两位阿訇对我们的接待表示感谢。当时正逢伊斯兰的开斋节，我们请客人领200多人作了礼拜，与穆斯林握手互祝“色

俩目”。⑤两位阿訇欢度了斋节后，高兴地说：“外边听到的谣言宣传，说共产党杀回灭教，强迫回族吃猪肉……和我们亲眼看到今天这里的情况完全相反。事实胜于雄辩，面对边区穆斯林生活的现实，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民族平等当家作主的幸福。”

到了平凉，他受到了商会会长吴锡龄等人的盛情接待，因他在平凉多处开过学，平凉的穆斯林准备次日开会欢迎。但谦益阿訇闻悉这一消息后，没等天亮就坐交通汽车后换乘胶轮大车不辞而别，随行的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是回家探亲的，并非莅位开学，不能麻烦人家。

谦益回到西安后，每逢穆斯林聚集礼拜就利用宣讲教义介绍朝觐情况，同时讲述他途经陕北受到边区政府和众多穆斯林热情欢迎的情景。他说：“边区穆斯林修建了清真寺和住宅。边区政府对阿訇很尊重，我们走时边区政府工作人员送了40多里才依依告别。”

他当年在西安主持清真大寺教务时，这个寺大殿西南角倾斜将倒，急需修葺，但有人提出：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筹资不易，应缓修为宜。他力排众议，聚礼日在殿上当众宣讲捐资修寺的重大意义，号召坊民捐资修建共谋盛举，并带头捐款百元，又敦促各理事先坊民而捐助。结果不长时间，就筹集了一批建筑费用，修葺工程完成后有余款，遂把连三门等处整修一新。修寺的事，似乎成了他的爱好。

1947年冬，他应平凉清真上寺之聘前往担任主讲，次年2月因病返里就医，屡治无效，于1949年农历五月初二日在西安逝世。坊民男女老少悲痛万分，次日同坊举行殡礼，埋于该殿大后院，并立有石碑一座，以资纪念。

30余年来谦益阿訇在陕西、河北、甘肃、内蒙等地清真寺开学20余年，整修寺院八九处，受业门徒达百余人，其中德才兼备的如任西安南城、陕西渭南清真寺主讲的固原马元吉，任四川雷

谷坪清真寺主讲的西安安德明，任湖北宣昌、武昌山后及广益桥等清真寺主讲的西安刘文奎（子明），任内蒙萨县清真寺主讲的平凉拜长明，任山西大同清真寺主讲的金殿甲等以及张家川的曹德真、平凉上杨家的刘万有、周至的马志鳌、西安的马宏恩、马凤鸣、安凤岐、马保定等，门生桃李，人才济济。

注　释：

①车揽头　旧时给人介绍乘坐马车或受人委托代找马车运货的人。

②道中　伊斯兰教语，清真寺内协助掌教管理教务的人。有：穆夫提（督教）、海推布（衰教）、穆安津（鸣教）。

③穿衣挂幛　对伊斯兰教阿拉伯或波斯文原著经典的研读颇有建树，并能担任其他清真寺主讲一职时举行的仪式，相当于毕业仪式。

④伊玛目　意为"首领、表率"；中国伊斯兰教教职，称"掌教"、"教长"，指主持伊斯兰教清真寺教务和宗教仪式的人。

⑤色俩目　阿拉伯文的音译，原意为"平安"、"和平"、"安宁"，伊斯兰教徒相互祝安问候用词。

我的外祖父马良骏大阿訇

赛　明　月

我是马良骏大阿訇的外孙，从小深得他老的宠爱，常随其后，不离左右。

我阿爷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上磨庄，自幼刻苦好学，19岁时就完成学业，出师掌坊。民国2年（1913年），他进疆传教，深得民心，曾任新疆回族总教长。1957年7月病逝于乌鲁木齐市，终年90岁。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伊斯

兰教，学识渊博，情操高尚，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始祖胡登洲阿訇的第五代真传弟子。

我阿爷到了晚年，更加爱国爱教，为民族团结与和平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他一生中的闪光点。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现记述如下，以寄托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怀念。

深明大义，促进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王震将军率领的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胜利向西挺进，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顺应人民的意志和历史的潮流，作出了和平起义，迎接共产党和解放军进疆的抉择。但当时新疆的和平解放还潜伏着隐患，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中还有主战派，马呈祥就是其中最顽固的一个。马呈祥是骑5军军长，马步芳的外甥。马步芳死守兰州，使解放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酝酿新疆和平解放之际，马家骑5军作何举动，便成了和平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

当时马呈祥在迪化及附近各县加强扩充军备，在迪化老满城军部加紧集训部队，阴谋反对和平起义。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了实现和平解放的愿望，多次召集新疆各界上层人士商讨对策，担心马呈祥孤注一掷，破坏和平起义。我阿爷当时任新疆监察使署的监察使，又是新疆回族总教长，他追求和平，深明大义，竭诚拥护包尔汉主席和陶峙岳总司令的义举，在关系新疆的前途和安危问题上采取了明智的行动。

1949年9月20日，我阿爷受包尔汉主席之托，不顾个人安危，带着秘书赵福宝乘黄包车到老满城骑5军军部去劝说马呈祥。马呈祥在门前迎候，向我阿爷道了个安，便陪他进了客厅。坐定后，阿爷就问："解放军势如破竹，迪化已是塞外孤城，不知军长有何打算?"

马呈祥故作镇静地回答："来了，那就打呗！"

这种回答已在我阿爷意料之中，他正色道："蒋总统去后，国统大数已尽，新疆的武力难以抵抗解放军，况且陶峙岳将军已有归向共产党之意。虽说军长的骑5军骁勇善战，但已是孤军无援，士无斗志。军长若要开战，只能是以卵击石。再者，战端一起，生灵涂炭，我迪化几万教民和无辜的黎民百姓将遭一场劫难。无论我教，还是历代哲人圣贤都以和为贵，以平为上。贵圣穆斯托法为光大我教，历经磨难，仍善劝理导，仁慈为怀。军长此时对新疆的局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若稍有不慎，军长给百姓、给历史将会留下什么？对自己的一世功名又能增添什么呢？"

一席话晓之以明理，喻之以大义。马呈祥坐立不安，在大厅里来回踱着，他突然停下来问道："那我该咋办？"

我阿爷见其心已动，便说："共产党光明正大，办事磊落，他们说话算数，既往不咎，我看军长还是一起降了吧。"

马呈祥说："共产党饶得了别人，决不会饶了我马家的骑5军。我们在黄河口把红军杀得黄河水都染红了，降了共产党，只怕是把我千刀万剐也解不了他们的恨。"

"兵书曰：'能战则战，不战则守，不守则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国民党大员都选此路，军长也只能委屈了。"我阿爷答道。

马呈祥听后，低头不语，半晌才说："那就请老人家容我再考虑考虑，和其他弟兄商量商量吧。"

阿爷当天就向包尔汉主席汇报了会见马呈祥的情况，并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第二天又带着秘书到了骑5军军部。

进了迎客大厅，只见马呈祥正襟危坐，两下文武兄弟神色各异，见他老进来，他们一齐离座向他老道了色兰礼，并握手祝安。接着马呈祥道："马大阿訇两顾敝部，意在慈悯众生，使我教民免遭涂炭。但我马家军众弟兄均为血气男儿，理应拼死疆场。今

日若承您老人家贵言，岂不落个贪生怕死的名声，愧对祖宗一世风云！”说着声泪俱下，其他人也唏嘘一片。

他老听后，镇定地说：“军长若能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是不会忘记你的。到底是和是走，望军长明断。”

“和是万万不行的。走，两手空空怎么个走法？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我怎么能忍心他们落个悲惨下场。”马呈祥终于亮出了他的想法和要求。

他老一听，立刻道：“军长能以体恤众生为怀，想必包尔汉主席会资助你们兄弟路费的，我也发动23坊的高穆（坊民）来给你等送行。”

马呈祥最后只好说：“那就遵你老人家的口喻吧。”

他老立即向包尔汉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省政府便派人给马呈祥送去了500两黄金。他老也动员23坊的回族穆斯林携带银元、布匹、茶糖和牛羊肉到老满城去送行。马呈祥终于交出了骑5军的兵权，带着家属和亲兵，取道南疆出国。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就这样扫除了。9月25日，陶峙岳将军代表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9月26日，包尔汉主席代表省政府通电起义。我阿爷也率领新疆监察使署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欢迎共产党、解放军进疆，他们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爱国爱教，衷心拥护共产党

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我阿爷的远见卓识和功绩，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党和人民政府也十分关怀和尊重他老人家，新疆省人民政府聘请他为顾问，1955年4月，阿爷接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发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他激动万分，在一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招待会上说：“我现在真正认识了共产党。”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厚爱，使他焕发了青春，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继续致力于伊斯兰教的研究，钻研伊斯兰教经典著作，热心伊斯兰教教育，注重各民族间的团结，主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

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出于热爱和平和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义愤，在迪化23个寺坊连续发表演说，强烈谴责美帝的侵略行径，鼓励广大教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志愿军保家卫国，为正义与和平做贡献。他还四处奔走，发动全疆的穆斯林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募捐，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我国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动员和集中所有的社会闲散人员投身到国家的生产建设事业中来，在当时显得特别重要。可是广大的穆斯林群众解放前大都从事个体经营，传统的小生产观念根深蒂固，有些穆斯林群众还担心影响宗教活动，所以不能积极参加工作，投身于新疆的各项建设中去。于是，阿爷又奔波于各个寺坊，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意义，号召穆斯林积极参加生产建设。

在1956年4月的一个“主麻”日聚礼上，他向几千名穆斯林说：“我祖阿旦圣人就是奉真主之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学会耕种土地，得以充饥的。哈娃太太也是奉真主之命，第一次学会纺织毛棉，得以取暖的。男耕女织，自古有之，上至贵圣，下至百姓，都要自食其力。养家肥地乃我教天命，勤奋劳作乃我穆斯林优良品德。当今共产党治国，自有良策妙方。其一就是要把大家集中起来一起劳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大家一心跟着共产党干，生活一定会更富裕，国家一定会更太平。”

在他一再宣讲下，新疆回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在晚年就是这样不遗余力，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表示对共产党的衷心拥护。

阿爷学问渊博，又具穆斯林之豁达胸怀，在宗教上能顺乎潮流。他终身执教，教授得法，受业门生均得真才实学。在寺坊管理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曾讲道："教义要随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伊斯兰教在公益方面对教民的要求与国家对公民的要求是一致的，既然国家在这方面以法律形式体现出来，我们就要以穆斯林之贤德奉公守法。"这些既符合伊斯兰教义，又符合我国实际的宣讲，是对教义深刻理解并能灵活运用的典范。

他热爱我们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所做的正确选择，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临终遗言，树楷模万古流芳

1957年5月起，阿爷病重卧床。他在人生曲折的道路上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光明天地。他每天除了勉强起床做五番礼拜外，其他的时间都卧床静息。他的神智格外清晰，他的思想开始升华和凝聚。有关政府领导和团体、组织不断派人来望他，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全疆几十万穆斯林的代表也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更使他无比激动，感到世界的美好，每次会见这些代表，他都谆谆教诲他们多学知识，尊重他人，搞好团结，遵纪守法。

7月14日黎明，他在家人帮助下挣扎着起床，洗了小净，坐着做完晨礼，开始念"讨白"，他那深沉的音调顿挫抑扬，完美悲壮，对人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和震撼。他躺在床上，眼眶里噙含着的泪是那样的明亮，似乎映照着他一生智慧、慈爱、无私、坚毅的生命之光。

他向跟随自己多年的助手马元新嘱咐道："我去后，请政府不要搞什么仪式和活动，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我一生只为真主的教门做了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愧对教门和教民，挂一漏万之事只能留给后人品评了。我是个孤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现在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这样看重我，请转告领导，这种知遇之恩，我深表感谢，并祝他们事业兴旺，取得成功！"

他又将家人叫到床前，叮咛道："我一生学了'而领'（知识），追求的是认得真主的大能和人的美德，没有学下其他的本事挣钱发财，让你们跟我吃苦受难一辈子，也没有置下家产，请你们给我口唤。我就念了几句经，给大家讲了几句'买赛来'（教义），而虔诚的高们却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将我们一大家养育了几十年。这些恩德一要知感真主，二要知感众穆民。也许因为我能秉公办事，两朝政府都任用我做了点事，得到一点俸禄。我去后，你们一定要听从主事人的安排，不要在这些钱财上计较。再者，广大穆民把我抬举得太高，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另起墓地修建拱北，要事事从简，更不能借此收受钱财，搞不当之事。"

安顿了很长时间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教门历来是善劝。真主说，'凡信我教者，皆为兄弟'。要谨记穆斯林'伊玛尼'的5条，不伤命，不遣怒，不昧财，不丧德，不忆测。圣曰，'安宁是教门'。你们凭着行善与他们和睦相处，相互帮助，万不可妄自菲薄，惹事生非，破坏各民族的团结关系。现在国家的政体已经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解放才六七年，就出现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局面，足见共产党治国有方。共产党兴的是政教分家，我们办教门的切不可将教门介入国家建设，与政府的政策对立。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办好教门。"他最后再一次提醒我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听共产党的话，给人民多做点事情，要永远跟共产党走。"

他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又渡过最后的90分钟，归入了永恒。

我阿爷已经归真30年了，但他临终前对我们的嘱咐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宗教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他一生弘扬教义，严于律己，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楷模。他德高望重，声誉远扬，实为一代贤人。作为他

的一个外孙，我已继承了他的事业，成为一名宗教人士。我要牢记他的谆谆教诲，以他老人家为榜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遵经奉道，努力工作，为增进民族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

乾德县第一任回族县长马征履

杨　洁

（一）

马征履，字绥之，回族。1892年生于云南建水县回龙村，出身官宦之家。其父马万迭，号月生，清政府曾授他为议政大夫。马征履生于滇，却长在四川，“天府之国”发达的文化，为他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他聪明好学，七岁就熟读诗赋，习练兵器，深得长辈宠爱。

1908年，16岁的马征履毕业于四川高等法政学堂预科班，后进湖北陆军大学深造。时逢武昌起义，他投湖北新编陆军讨川第一师，在师部充任掌旗官。后任川军第三师一旅一团团副，1913年出任该师二旅二团步兵一营营长。

云南蒙自人杨增新任新疆都督后，为维护其军阀统治，着力网罗云南同乡，培植亲信。经马福兴推荐，杨增新于1915年4月电邀马征履来疆。马征履来疆后，杨增新见他英俊豪爽，气度不凡，十分赏识，立即委任为喀什混成旅顾问。是年10月又改委陆军骑兵二营营长。1924年，又委派他办理马福兴专案。翌年

3月结案，6月出任英吉莎尔、莎车、泽普三县的北征委员。1927年2月，任莎车海关税务局局长。1929年任和田、叶城、皮山三县监政委员。翌年又改任英吉莎布干山水利委员、中校参谋。10月，任南路剿匪总指挥部参谋。从1915年4月进疆到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杀，13年来，马征履深受信任，为杨增新尽了犬马之劳。

杨增新被刺后，金树仁登台，新疆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1931年马仲英率部入疆，欲夺取新疆政权。1933年初，其部下马世明率部攻打省城，乾德县被马部所占。

乾德县（今米泉县）原属迪化县管辖。1928年设县，为三等小县，全县总人口不足三万，其中72%是回族。当时战乱不断，民族间的仇杀屡屡发生，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1930年，金树仁政府委派魏鑫铭出任乾德县长，希望他能治理好省府之重要屏障。可他上任后却寻欢作乐，不理政事，搞得乾德县民众怨声载道，局势更加混乱。省府追问为何造成这种局面？他推诿说："此乃穷乡僻壤，县城辽阔荒凉，刁民如毛之多，且回民最甚……"，并欲"派兵剿之"。乾德县各族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对魏恨之入骨。

马世明部到乾德后，极力煽动民族仇杀，再加上"归化军"的侵扰，魏鑫铭扔下县府官员和众百姓逃之夭夭。乾德县人民纷纷逃往乌鲁木齐水磨沟、七道湾等地避难。

（二）

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在省府的一次会议上，督办盛世才要与会者推荐一名有能力的回族官员去乾德接替县长空缺。有人推荐了任孚、阜、昌、乾四县宣慰员的马征履。盛世才一听马上想到这是杨增新旧属，且文武全才……起先摇头表示不行，片刻之后，他想到"以夷治夷"的策略，就说："收拾乾德残局，

非他莫属。”是年5月1日，马征履接到通知后，当天下午就搭乘马车到了乾德县县府所在地三道坝。

县政府内，除一名伙夫外，空无一人。他和副官到村里借了马，视察了县境。所到之处，只见烧焦的房屋，横七竖八的尸体，刺鼻的尸臭令人窒息。在羊毛工还盘踞着马仲英的残部。目睹战乱后的惨景，他仰天长叹：“万能的真主啊，这是造的什么孽?!我马某不赶走匪军，恢复生机，无颜对上峰与百姓。”

马征履到任后，迅速招回政府官员，令其各司其职。他严肃政令：“渎职者、懒惰者、徇私者、受贿者、逃跑者严惩不贷。”他命回来的官员收拾文书档案、印鉴卷宗，并把他们分成五组，分别到各村镇体察民情，抚慰百姓。他亲自走村串户，了解和掌握“匪乱”始末。在韩家庄村倒塌的牛棚里，他找到一位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老人，副官告诉那个汉族老汉：“这是新上任的马县长。”他一听“马县长”三字吓得跪下叩头，连说：“我一家六口，只剩下我一条老命。我们汉族和回族没怨没仇，你不要杀我……”。马征履扶起老人，沉痛地说：“回族、汉族自古就是一家人。杀人放火是少数坏人干的，他们不会有好下场。”

他又骑马赶到乌鲁木齐水磨沟难民住处看望那里的300余名乾德难民。难民们见县长前来慰问十分感动，纷纷向他诉苦，求他给一条生路。他一一进行安慰，并拿出自己的银钱，派人买了300斤大米，宰了两头牛，做了几大锅抓饭，接济难民。他劝大家早日回乡生产：“农务在即，季节不饶人，放心地回去吧，我马某和诸位患难与共。”在他的感召下，难民陆续返回乾德县。他又从省城调来一个排的保安队，维护县内的治安。他亲自起草安民布告：“上宪有令，匪类流行。派兵剿办，良莠要分。造谣煽惑，回族心惊。公家惩创，不法之人。设官保护，尔等良民。从此以后，各自安身。甘心作乱，法所必惩。”在他的努力下，乾德县的动乱局势开始有了好转。

（三）

1933年7月20日夜晚，马征履正在批阅文件，副官急匆匆送来马仲英军冶指挥官的密信，信上写道："本军早予夺取此地，血洗三道坝，杀尽汉人。但碍县佐初任，未敢下手。你我穆斯林天下一家，况早闻贵佐之威名所敬。见字后你可一人避逃，不得晓喻他人，22日将血染县城。"马征履看后气得两手颤抖，将信纸丢落在地。当时，省府派的一排保安队只剩下8人，县政府官员闻讯后，吓得面无人色。而马县长沉着镇定，照样办理公务。21日晚，副官牵来一匹马催他快逃，大家也劝他不要吃眼前亏。马征履义形于色，拍案明志："放他姓冶的狗屁，老子一不走，二不逃。要死，我和汉族兄弟们一起死；要活，我和汉族兄弟们一起活。大家镇静，不要慌乱，一切由我马某周旋。"

22日凌晨，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副官报告：三道坝村镇已被马军团团包围。县政府全体人员聚在马县长身边，静候着事态的发展。

一个多小时之后，枪声大作，马蹄声、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团。在一阵吆喝声中，冶指挥带领一帮人气势汹汹地进了县政府。马征履强压怒火，面带笑容，对冶指挥说了"色俩目"。冶指挥官勉强回了礼，他见马县长没有离开，很是诧异。他双手插腰，操着满口的青海腔说道："阿们是有言在先呗，阿没溜？你还咋哩话？"马征履义正辞严地答道："冶指挥官的好意我领了。兄弟是乾德县的父母官，没有各族百姓拥戴，我又给谁当官？你杀了无辜的百姓，真主知道了也是不答应的。"冶拔出手枪，蛮横地吼叫道："我杀的是反对我军的老汉人！"

马征履说："你执意要杀人，我也没有办法，你就先杀了我吧！"说罢，脱下帽子，把头伸了过去。冶指挥见马县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倒吃了一惊，连声说："哪儿的话，兄弟不敢……。"

马征履见他有了转机，就说："既然老兄无意杀我百姓，我马某千恩万谢，卑府虽穷，也要略表心意。"最后，送了200两银子、40匹马，才把马军打发走，使三道坝的汉族群众免遭更残酷的屠杀。在此之前，已有180余名汉族百姓被杀害。事后马征履逐家安抚，发放安葬费1000两银子，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四）

1933年8月，盛世才派兵剿灭了马仲英残部，乾德县的难民才全部返回家园。但这时全县的百姓家中一贫如洗，忍饥挨饿，挣扎在死亡线上。"民以食为天"，马征履知道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必先解决吃粮和籽种两件大事。经他实地调查，全县农家要生产尚缺种子1000石，口粮500石。而县政府之财力和物力，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要。他使出全身解数，四处奔波，借款筹粮，救民于水火。他趁秋粮上市之机，迅速派人赴玛纳斯、昌吉、乌鲁木齐等地不惜大价购买粮食（每石稻子的粮价高达400两银子之多），及时分发各户，以解燃眉之急。又到吐鲁番、鄯善两县，以秋后4石高粱兑换大米1石，每石小麦加息3斗的条件，借得麦种300石、高粱800石，解决了粮食问题。还从焉耆、伊犁、阜康等地购买耕牛84头、耕马50匹和部分籽种。粮食的运输除乾德农民自备车辆外，又雇驴12帮、骆驼五帮，仅运粮脚价就高达1200两银子。当时为救济难民，新疆省政府财政厅给乾德县拨款总数，还不足雇用这些车马户的脚价费。

为减轻农民的负担，扩大耕种面积，他又呈请省政府核准，"凡农民开垦之荒地，免收租税2年，并减免3年的军需大米1000石。"鼓励全县农民开荒，两年共开荒8000余亩。第一年就还清了债务，第二年达到自给有余，乾德县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

马征履十分重视教育，他认为"兴地方，必先兴学校"。在

乾德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后，他即着手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回族的文化水平。1935年9月7日，他给新疆教育厅呈文："乾德地方狭小，回多汉少，原在古牧地设有初级小学一处，学生30名。因地方风气闭塞，回民子弟多不上学……地方发生匪乱，古牧地学校被焚毁，器具桌凳净尽，迄今3年不能恢复原状，要求恢复和发展乾德教育。"教育厅拨给专项公款1.7万银两，他又发动商绅民众捐助，是年冬古牧地小学修复竣工。同时新建了三道坝、长山子、羊毛工三所国民小学，第二年三月开学，共招收150学生。他还在人口稠密的村庄，开办农民冬学（即扫盲教育）。据民国26年（1937年）统计资料记载，全县参加扫盲人数500余名，农家第一次有了读书声。

1934年前，乾德县只有乌鲁木齐至阜康一条古老的官道过境，县内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春秋雨水受阻，夏季桥洞常塌，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十分不利。1934年春，马征履带领县府官员，走遍乾德上下八渠，亲自勘察路线，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路搭桥，两年间共修公路3段，长达903丈，大小桥涵22座。县内主要交通沟通，共耗银48.982万两。三道坝一个姓李的校长赞道："乾德千年行路难，绥之一朝变通途。"

（五）

马征履治理乾德县才两年，便使过去一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烂摊子恢复了生机。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全县各界民众志愿捐款24万元（新疆旧币），要为马县长铸造一枚金质勋章。

1935年6月1日，乾德县民众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同意民众之要求，呈请县长批准。马征履深知盛世才为人阴险，嫉贤妒能，认为此举不妥，他向民众代表再三劝阻无效，只得呈文给省府和盛督办。两个月后，省府复函："既然民众有此呼声，足见马县长治县有方，年轻有为，亦惟省府之荣光。"尽管省府有文，但

未见盛督办亲允，马征履心里还是不踏实。乾德县的民众不知其中的深浅。

1935年8月1日，县民联召集各界人士1000余人，给马征履举行了隆重的授勋大会。会上，回族代表刘一清，汉族代表田庆山，代表全县各族人民给马征履挂上了金质勋章，并致词称赞“县长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领导人民恢复生产扩大春耕，发展水利，修筑道路桥梁，发展教育，救济民众，赊欠米粮，任劳任怨，各民族同声感戴，虽赠奖章，实难以报高原于万一，不过之寸衷，以资致人。”马征履此时不知在想什么，以致大家鼓掌要他讲话时，他才慌忙致了简单的答词：“历任3载，建树毫无。工作中的成绩也是谋督办、主席政策之正确。恢复生产，本属职责。承各同赠章，致十二分的谢忱。”

马征履受勋后六个月，省府突然宣布要他于1936年2月27日卸任，移交给新任县长李瑞霖。3月18日，他交清手续后，回省府述职。进了省府大院，迎接他的却是全副武装的卫队，马征履被秘密逮捕了。

马征履入狱后，在一审中，没有追问别的，只是要他交待有关“贪污”一事。他气糊涂了：“这是天大的冤枉，是陷害。3天以后，他才明白过来，掏出那枚闪光的勋章，一阵大笑，“啊，原来如此……。”他要来文房四宝，奋笔疾书：“做地方官者，谁能如人意，以致积怨招谤……足见人心之险恶，陷人于死地。”他多次上书，均无下落。年复一年，身陷囹圄，一个强壮的中年汉子，被折磨得瘦骨伶丁，一身是病。

（六）

马征履被解职羁押后，乾德县社会秩序急转直下，县长李瑞霖干了两年，就于1938年2月21日换成李灿荣。李灿荣为了讨好盛世才，于5月11日呈文给盛：“兹有前任马县长征履，曾在乾

德县三道坝建有公馆一处，地址在县政府附近，有十数间房屋，极为宽敞。马前任正在修建之际，因案进省，亏欠公款若干，可将此房拨给县府公用，在公家方面，可收一笔公款，在马前任方面，可以抵还亏款，真乃一举而数善尔。”这个举动，激起了乾德县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

是年6月3日，汉族陈月樵等6人，回族李寿禄等6人，商民田庆山等5人，农民刘保元等17人，以及维吾尔族农民竹奴等35人呈文省政府，要求释放马征履。6月17日，汉族刘金城等21人，回族杨华等8人，商民谭树林等9人及哈萨克族36人再次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马征履。6月20日，乾德县农民200余人集会，选派李克志出面为马县长捐款捐粮，他们说：“马县长欠多少，我们补多少，不能难为这个好人。”乾德县各族各界采取了要求释放马征履的一致行动。

消息传到狱中，马征履声泪俱下，他对同伴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百姓。只要他们有这颗心，我马某死而无憾。”盛世才闻讯后，把上任不到半年的李灿荣免了职。他深知民心不可违，又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得派员重新调查马案。1939年3月10日下文结案：“马征履案下实欠官粮60石，出狱后一年还清。”这是盛世才给自己下了个台阶。6月12日，马征履关押3年后，终于获释出狱，并移居迪化五道巷公馆。由于在狱中备受摧残，忧郁成疾，马征履于1940年11月20日不幸去世，时年48岁。

马征履去世的消息传到乾德县，各族人民悲痛万分，有的骑马，有的骑驴，有的坐马车，还有的步行，纷纷赶往迪化，要最后再见马县长一面。一些汉族人还送去香、烛、纸，按照他们的习惯表示对他的沉痛的悼念。12月21日，在马征履遗体送往头宫“拱北”的路上，两千多人排成长队为他送行。啼哭、诵经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场面之大，前所未有。

盛世才得知后又气又怕，惊呼：“一个犯官，居然有如此威

望。”1941年10月9日，盛又以“抗欠不交”为由，将马征履遗孀马秀贞逮捕入狱。乾德县知名人士刁久长、马炳祥、田庆山、李金银、李松柏、王启明等6人冒险为之作保：“愿以马征履原迪化五道巷及乾德县房产抵还欠款大米60石，自愿上交，概不反悔，空口无凭，立约为证。”翌年5月2日，马夫人获释出狱。为防不测，马氏带着两个女儿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至今下落不明。

马征履一生短暂，在乾德主政不过3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他做为米泉县历史上第一任回族县长，却给人们留下了久久的思念。

春蚕到死丝方尽

于志祥口述　于秀兰整理

我今年94岁，人生坎坷，能活到我这把年纪，确实不易。

我祖籍陕西省高陵县。祖父在世时，家境较兴旺，有地200多顷，在当地够得上大户人家。同治年间（1862—1874），陕甘宁青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廷的诛杀，祖父于金平舍弃家业，与舅父一道扶老携幼，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到宁夏西吉县玉桥乡落户务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腊月十四日，我便出生在玉桥这个明月映照着的清秀小山村。

我4岁时，祖父按伊斯兰教教规（回民男娃4岁零4个月时，要入清真寺学经）送我到本村寺里学习，并起经名为侯赛尼。当

时，经文是阿訇用笔墨写在牛的板骨上，我一天能记熟13块，师傅（即二阿訇）夸我："这娃的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不料我8岁时，因家境贫寒，只好辍学回家务农。

我的叔父于金升是当时兰州、西安一带有点名气的拳师。我11岁时，即向叔父习武。不久，叔父病故。我经父亲同意，并遵叔父之遗嘱，又拜其生前好友马登彩为师。马登彩时为人称威震国内武林的"江南红"的高徒，我跟他习武3年，学会了气功、形意六合拳、梅花棍、四把锤等武功。

15岁时，父亲又让我入寺学经，几年学成当满拉。此后，我为求学深造，开始背着干粮袋奔波于平凉、宁夏、泾源、固原、河州（今甘肃临夏）等地，历时8年，终于掌握了深奥难懂的克俩目尔领（即经文哲学）和乃麻尔提的尔领（即经文神学）。此时，按常规，我可以穿衣开学，养家抚老了。然而，我感到自己的经学和武功不深，决定外出云游四海，寻拜高师。于是，在1927年底，我挥泪告别故乡父老，开始了我一生中颠沛流离的征途。

1927年底，31岁的我步行千里到了古城西安，向博学的阿訇和武林高手求教，受益匪浅。次年冬，我乘火车到河南开封，拜访了慕名很久的冶金明阿訇，后又去桑坡向洪保金求教。他们见我经学功底扎实，便推荐我到河南省博爱县开学，当了大伊玛目。

1929年至1934年，我又辞学广游，先后到过京、津、沪、青岛、烟台等地学经习武，还向名医及闯荡江湖的医士学医术。6年之间，我浪迹江湖，饱尝人间之苦，看到了旧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无比痛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

1935年初，我云游至山西曲沃县开学讲经，并经营一药店。但好景不长，因我向教民讲经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故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并将我逮捕入狱，逼我供认与共产

党的关系。我素与中共无来往，他们无证据，但又不敢放我，便让我久蹲监狱。后来，经曲沃几方清真寺阿訇和教民的联名保释，当局才放我出狱。

我出狱后，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干事的好友伊广宇悄悄对我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劝我回老家迎接全国解放。我也感到此地已不宜久留，故辞去寺院之职，草草卖了铺店，于1935年阴历8月25日回到了阔别8年的西吉县玉桥家乡。

我回家的消息传出后，附近乡镇清真寺相继请我去开学讲经，一些回族青年纷纷向我学习武术，从而逐渐赢得了乡亲们的信赖。

1935年秋，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离玉桥15里的单家集镇时受到当地广大回族群众的欢迎。大部队过后不久，一天，忽有3个掉队的红军伤员来到玉桥。我见他们有伤，行走艰难，便安置在我家治疗。3天后，他们执意要追寻部队，便让两个轻伤战士先走，留下那位重伤的山东战士在我家继续养病。他们说："这样会连累您老人家。"我说："你们放心，我要是怕受连累，当初就不会收留你们治伤了。"我为两个轻伤战士备好了炒面，又给每人2块银元，送他们上了路。

那个重伤的山东红军战士，年仅16岁，伤口化脓生蛆。经几个月的治疗，终于康复。他提出去陕北找红军，我舍不得他走。于是在我的苦苦劝说下，他留下认我为义父，并娶妻安家。解放后，他在土改中成为积极分子，发挥了作用。

1954年后，我历任固原地区卫生处副处长、民政处副处长、福利部部长，后负责筹建西海固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

筹建任务紧迫，经费不足，困难较多。我利用自己在回族群众中的威望，走乡串户，设法购买便宜的木料，并多方筹措资金，将自己多年行医的秘方献出来，为此受到州领导的表扬。

1957年，我又接受了筹建固原地区卫生学校的任务。我吃住

在工地，带民工上山砍树，一次不慎，从悬崖上掉下来，血流满面，不省人事，从此留下了下半身麻木的后遗症。

1962年，我被选为西吉县政协副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这个70多岁的老人也在劫难逃，被打成“牛鬼蛇神”，驱赶至农村强迫劳动改造。1979年，党为我落实了政策，重新担任了县政协副主席，并出任县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复职后，我分工抓计划生育工作。所以我在讲经中，要求教民们响应党的号召搞好计划生育工作。县医院领导高兴地说：“于老，您关于计划生育的一番话，胜过我们磨一年的嘴皮子，功劳不小啊！”

1982年9月，我时已86岁，很荣幸地到呼和浩特市参加了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并应邀表演了梅花刀、形意六合拳、四把锤等武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中国青年报》记者为我这个高龄运动员写了通讯报导。后来，宁夏区体委又将我的武功招式录了像并记录整理了我的口述资料，国家体委还为此奖给我一把青龙宝剑。

我除每日向穆民讲经外，还跪在炕桌旁默写两个小时的早年记忆中的经文。这些已失传的经文，我整理出3大本。

1984年，聂荣臻元帅到我县视察时，专到我家看望。他握住我的手说：“真想不到啊，您这一辈子和共产党合作得这么好！谢谢，谢谢！”

我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古语说得好，“春蚕到死丝方尽”，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社会主义出一份力。

注　解：

于志祥老人已于一九九〇年九月归真。

何义江生平事略

何　凤　祖

家父何义江，字远源，宁夏灵武县崇兴寨人，回族，生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病故于1969年10月，终年84岁。

我祖父何殿元，以务农为业。民国元年，何义江27岁时，家境贫寒，每天赶上两头小毛驴到离家百里外的磁窑堡、石沟驿煤窑，买上300斤渣子炭驮到灵武县崇兴寨和邻近的吴忠堡街上贩卖，每次约获利一倍以上。后来，家境较好转，且节衣缩食，买了两峰骆驼，除继续贩卖渣子炭外，还贩运食盐和粮食。到民国3年（1914年），他与当地商人马兆生、山西商人王金堂在崇兴寨街上合资开办了“义顺生”杂货铺，共有资金3000多银元，有3间铺面，经营布匹和杂货。他和马担任董事，经理由王担任，店员有董福奎、谢善卿等人。

因经营有方，股东之间和睦相处，店员又忠于职守，故盈利不少。至民国10年，商号已呈现一派兴旺景象，资金达七八万银元之多。为扩大经营，经营方式由原来的零售改为批零兼营，并收购土特产品，如羊毛、甘草、枸杞、发菜、皮张等。同时，还在包头、兰州、天津等地设点，为商号采购货物和推销土特产品。民国16年（1927年），因内地货物适销对路，营业额逐年上升，

资金扩大到20多万银元，店员增至16人。但在民国18年（1929），商号遭惯匪杨自福（绰号杨猴小子）的抢劫，受到严重损失，内部分崩离析，各奔前程，致使商号歇业。

商号歇业的当年秋，父亲从沙特阿拉伯朝觐回来后，又在灵武县崇兴寨创办义顺源货栈，后改名为聚源恒货栈，不设门面，以批发和收购土特产品为主要业务。开业时有五六万银元，自养骆驼六七十峰、马、骡、牛共16匹（头），牛马车4辆，同时在包头、绥远、天津、西安、兰州、武威，定边等地常驻庄客（俗称坐庄老板），还经常派店员去西宁、兰州、平凉、一条山、武威等地坐庄收购土特产品和推销货物。货栈业务由父亲主持，雇佣店员10余人。他经商重信誉，对顾客和结交的商人说话算数，不坑骗人，既便是物价后涨也按原协议付货。父亲在经营上，坚持灵活多变，薄利多销，多中取利。因此，资金周转较快，商品积压少。他要求店员对顾客说话要和气，不准吵架，但在生活上还是处处关心他们。在进货方面，注意市场行情，尤其注意回族群众的特殊生活需要和风俗习惯，尽力予以满足。

商号的运货工具主要靠自养的六七十峰骆驼。每年春秋两季，除10个拉骆驼工友外，店里派杨金才等人骑马持枪押运。由灵武崇兴寨起程，货物有羊毛、甘草，枸杞、发菜等，共七八十担。骆驼队经过人烟稀少的内蒙伊克昭盟沙漠和草地，从昭君坟或大树湾渡黄河到包头卸下货物，全程历时18天左右。休息几天后，再将包头的日用百货，如布匹绸缎、棉花、瓷器、海菜、糖茶、水烟、火柴、蜡烛等，原路运回崇兴寨，然后再将大部分百货分运西宁、平凉、武威等地销售。返回时，又将收购的羊毛、药材等经加工打包运往包头，后上火车运天津。如此往返，年年依旧。

夏天如骆驼下场放牧，货物则用木船或皮筏子由黄河运货。一般在吴忠古城湾或仁存渡口上船，每次三四只船，每船装60担，顺水行10余天到包头，逆水有时装货或空放，全程需30天左右。

聚源恒在1933年前，有骆驼七八十峰，骡马牛10余匹（头），5辆大车，天津有市房70余间，吴忠有市房50余间，崇兴寨街上有市房30余间，家中有房60余间，商号有资金50余万银元。总之，商号已成为灵武县有名的货栈。

抗战爆发后，京津相继为敌所占，归绥和包头也随后失守，商号的货源断绝。父亲开始从西安、兰州开辟新货源，如由西安采购雁塔、五福、古渡等牌号白布，从兰州采购王字、恒字等牌号水烟。

父亲还热心公益事业。民国14年，他出资兴建了崇兴寨完全小学，又与李凤藻等人创办灵武简易师范（后改名为吴忠简易师范）。他还在崇兴寨捐建一所清真寺，1947年又与他人一起捐建了一所清真寺。

父亲在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对生活困难的乡亲故里多有接济，凡借出的钱粮布等从不计利息，有时还赠送。

1937年抗战后，商号逐日萧条。原因是天津的货源断绝，包头中转站也为敌占领，存货损失大半，后经多方交涉，于1939年春运回宁夏一部，但马鸿逵以敌占物资为借口而没收。此外，商号由甘肃一带收购羊毛达20万斤，也被马鸿逵无理没收。这两项货物损失达五六万银元之多。

马鸿逵对商号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每年征兵，聚源恒一家在17年中共征兵40余人，多是花钱雇兵，总计2万多银元。1939年冬，马以宁夏回教协会名义，要把《古兰经》译成汉文，强迫商号捐2万银元。1943年，马在银川为其父兴建“云亭纪念堂”，又强迫商号捐1万银元。同年，马为其孙子办婚事，也强迫商号捐送50斤鱼翅。

至于地方兵痞、官衙的骚扰更是屡见不鲜，穷以应酬。到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致使聚源恒仅有10万银元资金。

解放后，父亲积极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历任宁夏省政府委员、省工商联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任、全国工商联常委等职务。在建国初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父亲积极购买建设公债和为抗美援朝捐献。1950年，他与其他人捐款修建宁夏面粉厂。1951年，他与金三寿修建灵武排水沟，又捐款2万多元。在50年代，父亲与他人在地方兴办了吴忠电厂、吴忠建新织布厂、聚源织布厂、聚源恒商店，为发展地方工商业做出了贡献。

1955年10月，父亲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回到宁夏后，他将自己多年积蓄的300两黄金捐献给国家。这一爱国行动，受到党和政府的表扬。1962年，父亲又捐资4万多元创办了银川利群中学，并任校董事长。

“文革”期间，父亲遭受迫害，于1969年10月病故吴忠，终年84岁。1980年9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为父亲平反，隆重举行了追悼会。

实业家冯瑞生先生

马希明　马锡屏　冯钧平

冯瑞生先生名梦麟，字以行，回族，陕西省西安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农历六月初八日，殁于民国23年（1934年）农历三月廿一日，享年53岁。

先生外貌威严，然待人行事却谦虚和善，急公好义。幼时聪

敏勤学，攻读私塾5年，因家寒辍学。稍长，又拜师李和村习武，刻苦锻炼，于光绪廿七年（1901年），中西安府乡试武举。光绪廿九年（1903年），随父、兄在西安南门什字经营牛羊肉泡馍馆。辛亥革命时，曾在西安南院门街头演讲拥护五族共和，遂被回民给以“开花”（大炮）的绰号。1914年，放弃旧业，离家出走，往来于陕甘等地，一边经商，一边广交朋友。“五四”运动后，积极投入各项社会活动，兴办实业，创办民族教育。“九·一八”以后，又积极参与爱国抗日运动，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曾有过联系。先生先后担任过陕西省政府参议，陕西省商会常务委员，陕西省石油业同业公会主席，陕西省赈务会顾问和陕西省回教公会主席等职，是陕西近代回族社会中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一、倡办工商企业，发展回族经济

民国初年，西安回族人士马玉如、白楚珍、马有义等联股筹设德泰光煤油庄，经营美孚石油。1915年与美孚洋行签订合同，在西安东大街马厂子对面现碑林公安分局以东设店开业，先生亦为其董事。但经营数年，濒于倒闭。1924年，先生任董事长兼经理，大力进行了整顿，聘请白楚珍、马有义为副经理，丁宏谋为会计，并改德泰光煤油庄为西安德泰光美孚煤油股份有限公司。他动员回民投资，自己带头入股，使公司的股份由原来以董事会为主的10余大股发展到大小不等的200余股，成立了新董事会，由冯瑞生、马玉如、白楚珍、马有义、马睦生、马平甫等任董事。公司职工主要来自回族，这是当时西安比较完善、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回族民族商业。那时，陇海铁路只通到河南陕县，卸货后，用马车运至西安或用船由黄河、渭河运抵潼关、渭南等码头；水涨时，还可沿渭河运至西安北郊草滩镇，再用马车装运至城内。后来为了不误运输，公司招收了一些回民装卸工，用自己的车装运。此时，西安又有好几家经营煤油的商店开业，同德泰光公司

展开了激烈竞争。于是，冯改变了以往商业坐等顾客上门的陈规陋习，派人到西安的大街小巷上门推销，并加强了同西安一些较大的煤油分销店如西门里的“积庆玉”、南院门的“聚兴德”、竹笆市的“同义成”、东关的“商业实践室”等的联系，遇到货源紧张，就多给他们一些，油价涨落时，也预先通知他们，因之建立了良好的往来关系。有时候还让他们直接在渭南等地拉油，以减轻运输费用。此外在大荔、渭南、潼关、咸阳和甘肃平凉等地设立了德泰光煤油公司分理处，扩大了业务。

由于冯善于经营，使德泰光煤油公司有了很大发展，销售量由每月的1000多桶增至8000多桶。1927年以后，每月的销售量高达100吨左右，折合 1 万多桶，占全省销量的一半，经营的品种也由单一的美孚煤油扩大到虎牌煤油、鹰牌煤油、鹰牌蜡烛、飞马牌汽油、机器用油以及美孚油灯、蜡烛、凡士林等。与此同时，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冯派其侄冯增辉赴武汉商科大学学习外贸，为公司培养涉外人才，以便同外商打交道。德泰光石油公司的发展，为回族经营工商业树立了一个样板，增强了回族群众的自信心，受到了回、汉商界和群众的赞誉。

1930年后，冯先生受到武汉回族实业家陈经畬的启发，认定关中地区的棉花资源丰富，大有可为，但缺少打包设备，运输不便，于是决心筹建西北棉花打包厂，以便将关中棉花加工打包后运往沿海、汉口等地销售。1932年，冯与白楚珍等人开始在渭南筹建“西北棉花机器打包厂”。他们把德泰光石油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和盈余作为投资，又通过冯的私人关系从上海银行借到了一部分贷款，并从他的好友和西安回民中筹集到一笔股金，组成打包厂董事会，由冯瑞生、白楚珍、马平甫、马睦生、段敬甫、马锡屏、白逸安等为董事，冯任董事长，委任懂业务、善交际的段敬甫（汉民）为经理。职工回汉兼有，汉民居多，每车间男女工人近百人，全厂约千人，男工每日工资 8 角，女工 5 角。机器是

从德国礼和洋行进口的两斗推盘式打包机，动力是50马力的柴油机，聘请苏联人尤尔柴夫为技师。设计要求为投产后每天打包600余件，每件重约500斤，最后运往天津等地销售。

在筹建打包厂的过程中，先生积劳成疾，在试车验收后返西安的途中，不幸患中风症，经多方医治无效，遂于1934年农历三月廿一日在家病故。打包厂由白楚珍接任董事长，直到抗战期间因日军轰炸而解体。

1931年前后，冯个人曾在东大街北侧钟楼附近开设了一家经营北京风味的清真餐馆“西来堂”。该堂地处西安闹市，门面装饰典雅，内部陈设考究，使用的餐具全是景德镇的精品，桌椅是陕西凤翔漆器，厨师是从北京请来的高手，饭菜品种和质量均属上乘，一时门庭若市，顾客不绝。他还在东大街开设了“德新和”商号，经营香烟、茶叶、煤油等杂货；在西大街开设了“仁中和”商号，经营棉布等纺织品；在竹笆市开设了“同义成”商号，经营日用杂货。

冯先生兴办工商业的成功，除了他本人善于经营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一贯重视商业道德和信誉。例如有一次，汉口一家商号给他多汇来了500元，他便及时令人退回。对方深为感动，向他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有“商界泰斗”四个大字以示崇敬。

二、慷慨解囊，大力兴学

民国初年，西安回族教育十分落后，除了几家私塾外，连一所初级小学都没有。冯于是联络回族中的有识之士马子健、韩子元、李和村、孙锦云、白九皋、贾吉安等积极筹建“义学”，并拟设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前院。在清真寺内办普通学校的阻力比较大，冯作了大量的说服宣传工作，使西安回族的第一所新式小学“精一学校”于1922年在清真大寺前院开学了。学校是民办官助性质，冯先生首先慷慨解囊，回族中一些热心于民族教育的

人也纷纷捐款。他又利用其社会关系，多次与陕西教育当局交涉，为学校争取到了一点经费，使回族子弟得以免费入学。学校设有国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课程，冯先生被大家推为校长。教师由校长聘请，除满族何先生外，回族教师有韩子元、马俊甫、马友骥、童培芳、苏玉阆等人。冯先生还自己出资制备了校服，建立了军乐队，购置了风琴和体育用品。尤其是在清真寺前院进行音乐、美术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不易的。冯先生对学生的学习十分关心，经常到教室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如果学生回答对了，就当场给予奖金。该校于30年后改为“长安县化觉巷小学”。

西安回族成年人中文盲很多。冯先生在创办精一学校的第二年，又办起了“精一夜校”，免费招收成年人入校学习汉文。夜校用的是“精一学校”的教室，由“精一学校”教师兼任教学。在创办“精一夜校”过程中，他看到回族青年生活比较单调，身体素质下降，便联络武术爱好者铁彦彪、马云青、马云庆等人又成立了“精一健身会”，自任会长，邀请金启恒、马宗林、马仲英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回族拳师任教练，教青年人练武。“精一健身会”设在精一学校内，平时夜晚开展活动，并经常在“主麻”日（星期五）、开斋节、古尔邦节和欢迎来宾的会上进行体育、武术表演。

1930年，冯先生在西羊市街东段路北又租用了房子数间，办起了西安回族第一个女子小学“淑德女子学校”。学校每天上午由汉族女教师南碧泉、王玉珺讲授国文、算术、常识、手工等，下午则由回族女教师讲伊斯兰教文化知识。“淑德女子学校”一直办到1934年3月冯先生逝世为止。1930年前后，冯先生又以陕西回教公会的名义号召回族群众集资办学，并带头捐款，在西安小皮院、洒金桥等处办起了回民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及其他小学。他还邀请在陕西教育厅工作的安徽六合回族女士仝道云等晋见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和教育厅长李百龄等，商量拟在回族地区筹建公办

完全小学，得到杨主席的支持和教育厅的同意，由冯先生、孙锦云等人为学校筹备委员，派教育厅督学潘莲舫协助筹办。1932年12月25日，在回族较集中的庙后街成立了“陕西省立第一实验小学校”（即现在的庙后街小学）。潘莲舫、冯增辉、王进琛、马有骥、李逢源（汉族）、马俊甫、童培芝等先后任校长，教师中约半数是回族。学校开始时有学生两班99人，以后冯、王两校长任期内迅速发展为6班315人和8班427人，回族学生约占1/3。1934年，该校更名为“西仓门小学”。

1931年，冯先生参观北平回民所办的“成达师范学校”时，正逢该校经费困难。冯先生见到校长马松亭后．当即以50块银元捐赠给该校。其后，马松亭在《月华》杂志上以“成达师范断炊之际，西安冯瑞生先生慷慨解囊”为题，赞扬了冯先生这一义举。

三、热心公益，造福群众

民国以来，西安回族群众公益事业少人过问。冯先生联络回民中热心公益的人士马玉如、马子健、马声亭、孙锦云、苏房山等人，发起成立了“回民促进会”，会址设在清真大寺前院，开展一些有关群众利益的活动。1929年，陕西大旱，粮食歉收，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回族的情况更是悲惨，冯先生奔走各地，到处募捐，呼吁救灾。经与其他人士的努力，得到了陕西政府救灾机关的一批救济粮、款，又得到华洋义赈会会长朱子桥先生按月发给的救灾物资。冯先生得到粮款后，立刻组织成立了“陕西回教救灾会”。“救灾会”在清真大寺里垒起锅灶，开始施粥，每天领粥的约有四五千人。同时对一些生活特别困难的人进行登记，优先发给食物并给予适当的救济款。对“精一小学”的师生，也就近供应食物。救灾会还组成“掩埋队”，对回族中一些饿死的人进行速葬，以免瘟疫传染。

1930年，在回教救灾会的基础上，冯先生组织了“中国回教

公会陕西分会”（也称为陕西回教公会）。回教公会的成立对团结回族群众起了积极作用，得到回族各阶层的一致拥护。冯先生多次被公推为公会主席，直至1934年先生病逝。

1931年，陕西又发生瘟疫，回族中患病者不少，先生除领导回教公会配合政府卫生部门积极防疫治病外，面对一些回民死后无地安葬的问题，多次吁请在玉祥门外夏家庄拨地22亩，作为西安回民墓地。

1932年前后，陇海铁路即将铺到西安，铁道部门拟定的西安火车站的位置正好在北关外回民公墓外。消息传出，回族群众焦虑，苦无良策。冯先生不忍惊动公墓遗骸，也为了社会的安宁，便亲赴南京铁道部，恳请西安火车站改址，南京政府批转铁道部次长兼陇海铁路总局局长钱宗泽处理。冯先生又多次往返于南京、郑州、西安之间，面恳钱宗泽，照顾回民感情。铁道部门最后同意由北关外东移到现在的车站处。

四、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等活动

1911年10月，陕西革命党人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西安回民成立了“回民民政公所”，先生积极参与公所的领导工作，组织街道回族青年，晚间轮流值班放哨，维护回坊社会治安。

1930年冬，杨虎城率部回陕，冯玉祥西北军在陕西的统治摇摇欲坠，西安局势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冯先生积极参加陕西士绅所组成的“和平委员会”，为和平解决陕西问题多方奔走。杨虎城主陕后，冯先生被聘为陕西省政府参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纷纷展开了抗日救亡活动。冯先生组织西安回民成立了“西安回教抗日救国会”。这时，在陕西省银行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格平同志（回族）看到冯先生思想比较开明，在陕西社会上也有影响，就以其同族关系时常接近。在冯先生的支持下，刘也进入了“西安回教抗日救国

会”，后又担任领导工作。刘以“西安回教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的名义多次在东大街召集回族青年马明德、苏玉寿、苏玉阗、苏集贤、马锡屏、马俊英、安友兰、刘志善、白逸安、马昌英、安惠生等人开会。在抗日救国会内部又组织起了一个“青年读书会”，每周由刘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传播革命思想。读书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冯得知后，即派人通知刘格平迅速转移。50年代初，全国人大代表马平甫（回族）到京开会时，刘格平同志曾向马打听冯先生的情况，并说冯是个好人，让马代向其子女问好。冯先生除了领导回民群众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外，还和陕西商会的一些同行及各界人士组织集会游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募捐救济东北等地逃来的难民。由于他为抗日救亡积极工作，后来被选为陕西省反日会的委员。

五、望重乡里，誉隆阛阓

冯瑞生先生一生的活动，受到了省内外各方人士的称赞和回民群众的推崇景仰。民国总统黎元洪曾赠予银质奖章一枚，并题赠“急公好义”匾额一方。杨虎城将军和邵力子、赵寿山、孔从周、申伯纯等均赠有匾额。杨虎城将军赠送的匾额是“誉隆阛阓”，省主席邵力子所赠的是“望重乡里”，孔从周所赠的是“人杰地灵”，清真大寺掌教马谦益也用阿文书赠了牌匾“确实慈主，慈惠同近善者”。1932年12月，西安市各界人士还在清真大寺内举行了“恭颂陕西回教公会主席冯瑞生先生大会”，对冯先生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国内报刊著述记载冯先生事迹的也不少。如《月华》杂志就记载了恭颂大会的盛况。南京政府立法委员王曾善在他写的《长安回城巡礼记》一文中也赞誉冯先生兴办淑德女子学校是“殊不多见”的义举。

冯先生生前，淑德女子学校教师王玉珺创作了《欢迎冯瑞生之歌》。冯先生逝世后，教师们又编写了《冯公与世长辞》的歌

曲，以表示对冯先生的怀念。为了铭记冯先生对回族的贡献，回族人士马寿山、童培芝、孙锦云、苏房山、孙连成等人发起为冯先生树碑立传的活动，碑石已经选妥，碑文由马寿山撰书，可惜当时社会动乱未得刻石，现碑石仍闲置于化觉巷清真大寺内。虽然碑石未立，但冯先生的业迹将永远铭刻在西安回族人民的心中。

回族名医马芾轩

马　德　宏

（一）

马芾轩先生本名锦棠，字以行，西安市人，生于1866年，殁于1933年，葬于西安东郊广泰门马静山家祖茔。马宅坐落于西安市小皮院西口东南角，门前两棵槐树，现依然存在。昔日的诊病室已在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先生健在时一般上午在家应诊，下午出诊，有请必到，从不耽误。出诊时坐轿，抬夫四人，轿前一人，轿后二人，一人在旁替换。当时在西安坐轿的医生仅一二人而已。

先生长于治疗瘟病，早年曾在回族名医马哲臣先生门下受业，尽得秘传。

先生中等身材，黑胡须，面目慈祥。少时在王怀真（曾任江西知府）家塾读书，天资聪颖，过目不忘，深受老师青睐，王怀真曾对人说："马芾轩过目不忘，将来定成大器，成就在我之上。"先生十六七岁时开始学医，由于刻苦学习，潜心精研，年方弱冠，

即悬壶西安。有人记得马芾轩年少学医时整天背诵汤头歌诀：犀角酸寒，化毒辟邪，解毒止血；羚羊角寒，明目清肝，祛惊解毒，神志能安。”他后来教诲弟子：“只有熟读，才能得心应手。”

（二）

马芾轩先生在40余年行医中对贫富贵贱、新朋旧友都是平等对待，特别对经济困难的患者不仅免收诊费，还让其在先生开设的福生堂药铺免费取药。

1930年，霍乱流行，死亡枕藉。据老人说，人们怕传染，连送葬都不敢去，真正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先生为了解救群众疾苦，大锅熬药施舍，救治者甚众。1928年，有一扶风农民，慕先生之名来西安就医，不慎途中将钱丢失，坐在先生门口不敢进去。适逢先生出门看见，问明情况后，不但免费诊病，还在处方上签字，让他到福生堂免费取药。看好后，又送给其回家的盘费，使这位农民感激不尽。

民国初年，西安回民中曾发生伊斯兰教新、老派之争。西安清真大寺掌教马谦益是老派阿訇，先生是新派中有影响的人物。马谦益患病，想请先生诊治，但又怕请不来。先生得悉后，欣然前往悉心治疗，使谦益阿訇的病得以痊愈，一时传为佳话。

先生开设的福生堂药铺每年结帐时，以先生名垫补的药费就不少。医生诊病，不但不赚钱，反而还要赔钱。这在旧社会是罕见的。

至今，回、汉群众缅怀先生的崇高医德，仍赞誉不已。福生堂药铺1956年公私合营，易名为庙后街中药店，现仍在庙后街东段路北原址。

（三）

先生不独擅长治疗瘟热时病，对各种杂症也有专长，可惜由于终日诊务繁忙，无暇从事著述，其生平临床经验遗留很少。先

生治疗瘟病重视舌苔、脉象，用药方面随症化裁，不蹈陈规，慧眼独具，疗效卓著。

先生用药灵巧，一般以银翘散、桑菊饮结合局方藿香正气散加减使用，很少用麻黄。有时根据病情对神昏壮热病人常用犀角地黄汤，犀角有时用至数钱（一般犀角使用不过钱）。先生特别重视“望诊”，注意观察病人神态、面色、形体和某些特定表现，如病人由人扶持前来还是自己步行走来，等等。

在治疗瘟热病中，很重视病人饮食，忌暴食暴饮。因此，在一般回民群众都知道了得病时要忌面食荤腥。这一经验在回民群众中流传很广，这对促进疗效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对小儿麻疹，先生治法与一般迥异，初期宜透，中期宜清，末期宜养阴兼清余毒，对体质虚弱、麻疹不能透发者采用扶正透疹办法，一般开始不用温补，以防邪毒内陷。

由于先生医术精湛，药到病除，治愈患者很多。

先生结合自己数十年临床经验，在福生堂自制开胸顺气丸（俗称包包药）、至圣保元丹、硇砂安神丸、舒气保肝丸、瘟疫至宝丹、淡菜枇杷膏（黑色小磁罐盛装）等中成药，疗效显著。在群众中享有一定信誉。

1925年，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失眠12年，两眼肿胀，多方医治无效，特邀先生赴平凉诊治。张当天服了第一付药，晚上即能安睡，翌日张大开中门迎接先生。病治愈后，张一再挽留，并要为先生开办医院，先生婉言辞谢。张曾给先生“医高中外”牌匾。由于张兆钾大病霍然而愈，一时先生之名盛噪西北，前来求诊者应接不暇。

1929年，吉鸿昌（冯玉祥西北军第三十军军长）的母亲患病，经先生治愈，吉鸿昌给先生赠“上医医国”牌匾，并赠诗一首赞扬先生，惜诗已佚。

清末，陕西抚台恩寿、陕甘总督升允久病未痊，经先生治好

后，前者给先生赠送“清静传家”牌匾，后者给先生赠“惟精惟一”金字大匾。西安大湘子庙街望族晁少甫久患杂痨医治无效，经先生治愈后，用鼓乐抬送礼品敬谢先生。靖国军胡笠僧将军女儿有病，经先生治愈后，胡赠先生“妙手回春”匾额。先生还为北京总统府叶伯英看过病，赠匾是“垣成国手”。

约在1929年间，先生给吴佩孚侄女（溥仪弟媳）看病时，因当年看病，妇女卧床，只能把手伸出帐子让医生诊脉。后来先生给人说：这是他生平最不安心的一件事，因为看不到病人神态、气色，诊断不会确切。

先生经常说，医生的担子很重，尤其是大症，更须操心。因此，先生对大症开两个方子，一个是处方，一个是病历，充分说明先生对病者极端负责的精神。

农民土专家丁学礼

丁学礼口述　李艳整理

我于1910年出生在宁夏吴忠堡马莲渠乡的一个贫苦回族农民家庭里。家无寸土，祖辈给地主当长工，或靠打短工过日子。

我在二十四五岁时，虽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家里仍是度日如年，生活艰难。当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年年抓兵扩军，名义上规定一户二丁抽一，实际是乱抓一气。所以，弟弟虽被抓兵，我也在劫难逃。当时当兵如下狱，我只好挥泪别妻，逃到内蒙陕坝地区，给一个兰州商人饲养骆驼。一逃就是三年，虽时时惦念老母和妻子儿女，但不敢回乡。一次，妻子偷着让人捎口信，说

70多岁老母体弱多病，非常想见我一面。我心里很着急，便花点钱通过关系，到国民党内蒙驻军傅作义司令部开了一个为期一月的通行证，日夜兼程地赶回了家。我先探望了老母，又到古城岳父母家见了妻子和孩子。三年不见，方知妻子和孩子们如乞丐一般，令我潸然泪下，便决定在此落户。

古城是黄河的一水陆码头。我开始是帮一船家摆渡来往行人，几年后有了积蓄，自己就买了一只羊皮筏子，独立经营摆渡。

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我分了地，就开始种庄稼。

1955年，古城成立初级社时，我被选为社长。从此，我感到肩上的担子不只是自己的妻儿老小，而且还有全社几百人如何过上好日子。当时，大伙的积极性很高，但水稻亩产不高，其原因是思想守旧，还沿用祖先多年的耕种习惯，不敢创新，不敢引进新品种，所以使亩产仍停滞在解放前的三四百斤上。为此，我从1956年起，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便迷上了科学种田。

过去，古城地区一直种白皮稻，亩产最多400斤。1956年夏，我从农科所引进了水稻新品种——“京祖107号”，先在古城三队试种。开始因不摸其生长习性，结果是只长苗，不抽穗，颗粒无收。许多人泄气地说：“古城历来种白皮稻，现在换成这么一个喝清水的新品种，用黄河水怎么能种好它呢？还是种咱们的白皮稻吧！”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也有点犯疑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但后来去参观东塔寺种的“京祖107号”，我回来就琢磨人家用黄河水就种成功了，看来，我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水。于是，我向老农请教，从土质、种植时间、田间管理方法等方面找原因，心里有了底。

第二年（1957年），我在一块四面环水渠的四十亩水田里，提前一个月播种。秧苗长高后，我为了防止出现只长高而不抽穗的势头，便用镰刀将秧苗打去一节，控制了长势，促使秧苗很快

抽穗。真是令人惊喜，秋收时，亩产比白皮稻提高一倍，总产达到3万多斤。当时高级社主任党忠礼高兴地捆了一车籽粒饱满的稻谷，拉到大街上，逢人便宣传“京祖107号”新稻种的优越性。党组织也积极宣传我们古城的经验，指出去年试种没有成功，不是新品种的问题，而是没有掌握新品种的种植技术。经过宣传和组织参观，全公社在1958年开始大面积推广种植“京祖107号”，产量猛增。

在推广新稻种的同时，县领导于1958年又从四川省请来几位老农，先在我们古城公社传授插秧技术。许多农民看到这几位四川老农卷起裤腿儿，弯腰在水田里做插秧的示范动作时，很反感地说：“咱们这里种稻是撒播，一人一天能撒十几亩，他们这几个人插秧，一人一天顶多能插五分地，还干得腰痛腿酸胳膊乏，真不合算！”我仔细观察人家的插秧技术，觉得有道理，于是便向大伙解释说：“插秧是咱们古城人没见过的新技术，它比撒播好，可以提高水稻秧苗的成活率，适当增加种植密度，能够提高单产。”县委书记张文林支持我的看法，并在古城召开了推广插秧新技术的现场会，大伙也就跟着学起来。当年秋收，全公社引种的“京祖107号”亩产达到千斤多。1959年，这种插秧新技术在全县推广，从此改变了多年撒播的落后种植习惯，全县粮食产量也上去了。

1960年，我参加了在永宁县王太堡宁夏农校召开的良种栽培先进生产者会议。当时王太堡农场的专家马超对我说：“我们农场有一些新品种，亩产可达1300多斤，你看哪个适合古城，可以给你调换点。”他带我看了新品种的秧苗后，我说：“听过去老人们说，稻子不见叶，谷子不见穗，这是良种的标志。我看，‘公交12号’品种比‘公交10号’长势好，就给我调换点‘公交12号’吧。”

1962年初春，王太堡农场派人送来3000斤“公交12号”新稻

种。我们同时培育了“京祖107号”和“公交12号”两种秧苗，前者已出苗，后者却不见动静。大家埋怨我不该领这个头，我心里也不踏实，害怕选错了品种而给大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于是，我天天蹲在水田里照料，10天后，“公交12号”终于出苗了。实践证明，它秧苗硬挺，好管理，秋收入库，亩产达到1200斤。县委又在古城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我们的经验，并用“公交12号”新米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做了一顿饭，大家赞不绝口，称我是土专家、种子迷。

196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来到古城参观，号召全区农民向我们学习。

1967年，我听说“京引39号”稻种亩产可达到1400—1500斤，自治区农科所从福建请来三位农民技术员传授温室育秧技术，我便前去学习。之后，我就从农科所换了些“京引39号”新品种，按照福建农民技术员的做法，找来些木板和塑料薄膜，开始了温室育秧试验。开始，因为掌握不好秧苗所需的水份，致使秧苗出的参差不齐。后来，我又重新育苗，整整三昼夜未合眼，精心照料着，终于试验成功，小苗齐刷刷地破土而出，竞相生长。自治区农科所组织千余人到古城参观我们的育苗，受到了好评。

当时，正是发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古城因为是杨静仁树立的先进典型，我也是古城的劳动模范，所以被扣上了“杨静仁培养的黑秀才”帽子。我倒不在乎黑的、红的，反正我是个庄稼人，谁都得吃饱肚子才能干革命，所以种好庄稼是我的头等大事。不管谁批判我什么，我每天照样锄头不离手，不断地钻研科学种田。

1978年，我荣幸地参加了打倒“四人帮”后的全国首次科技大会，聆听了郭沫若院长做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的报告。从北京返回宁夏后，我又在古城大队二队试验麦稻两熟种植技

术，结果获得了亩产超2000斤的好成绩。自治区立即推广我们的麦稻两熟经验，中央电视台和《宁夏日报》也专门报道了此经验。

1983年，我因年事已高而辞去了领导职务，但还是常给娃娃们出出主意，当个参谋，闲不住。总而言之，人是活到老，学到老，才有意思。

后　　记

本书是根据1986年西北五省区暨西安市政协第五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的《协议》，由宁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安各省区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共同编辑而成的。

本书为我国回族与伊斯兰教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在此，我们对热情为本书撰写史稿的作者们，对积极支持本书编辑出版的宁夏宗教局、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及西北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书编审工作的有张源、吴尚贤、刘德元，参加有关各章编辑工作的有关君放、苑仲淑、吴强国。

因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教。

编　辑　组

1993年7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作者=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
页数=549
SS号=10352491
出版日期=